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



绪 论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中国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继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之后的第二次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它既是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战争，也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场抗日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由战略防御到战略相持再到战略反攻的过程。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起，中国各族各界人民，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与日本侵略者进行了气壮山河的斗争，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赢得了反抗帝国主义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谱写了中华民族解放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上的光辉篇章。

(一)

中国的抗日战争，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发生的。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世界资本主义已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阶段。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的特点，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即争夺领土”。又指出：“‘世界霸权，是帝国主义政治的内容，而帝国主义政治的继续便是帝国主义战争。’”继帝国主义争夺霸权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各帝国主义国家立即开始了新的争夺霸权的斗争。英、法、美、意、日等战胜国，在战争造成的新的格局的基础上，经过激烈斗争，建立了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国际关系体系，实现了对全球利益的再分割。但是，这个新的体系不仅没有解决它们之间的固有矛盾，反而增加了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各战胜国之间的新矛盾。这种状况，预示着新的国际冲突的不可避免。特别应当指出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了一个社会主义苏联。这一划时代的变化，打破了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统天下，使帝国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与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随着帝国主义经济、政治发展的不平衡，德、日、意等国的实力很快得到恢复或加强。它们要求重新划分势力范围，成为英、法、美等国的对手，使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重新尖锐起来。而1929~1933年的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更加剧了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逐渐形成了以英、法、美为一方的“维持现状派”和以德、日、意为另一方的“打破现状派”。这两个集团之间的争夺愈演愈烈。为适应对外扩张争霸的需要，德、日、意开始向法西斯道路迈进。它们既与苏联和被压迫民族、周边弱小国家为敌，也与其他西方大国为敌，甚至不惜通过战争手段改变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格局，企图建立由它们主宰的世界新秩序。

日本早在明治中期，就形成了以中国为主要扩张目标的大陆政策。在明治维新以后的70多年内，日本曾发动和参加过14次对外侵略战争，其中有10次是对华侵略。经过甲午和日俄两次战争，落后的日本不仅挤进了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行列，而且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地区的优势地位。日俄战争后，日本已发展成为一个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以武力夺取世界霸权的欲望更加强烈。为了独霸中国，日本利用列强准备和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

《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10页。

《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89页。

利时机，扶植奉系军阀张作霖，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并利用袁世凯称帝的机会，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随着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日本法西斯势力的崛起，日本的侵华活动更加猖獗。

1927年田中义一内阁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要》。其核心是首先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然后以满蒙为基地进一步向中国内地扩张。会后田中给天皇的奏章中提出“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的侵略扩张纲领。从而把日本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推向一个新的阶段。东方会议后，日本加快了实施新大陆政策的步伐，又两次出兵山东，并相继制造了济南惨案和皇姑屯事件。特别是1930年席卷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波及到日本后，为了摆脱危机，日本更迫不及待地准备发动侵华战争，妄图首先把中国东北变成它直接统治的殖民地。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社会处在激烈的动荡之中。一方面，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分别支持各派新老军阀，控制着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使中国继续维系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处于连年内战，国弱民穷，科技落后，生产停滞的局面；另一方面，中国以1919年五四运动为标志，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随着中国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随着无产阶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及其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

在法西斯国家准备发动侵略战争，西方列强苦于应付经济危机，苏联忙于国内建设和中国贫弱与进步并存的情况下，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首先在东方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了对中国的武装进攻，迈出了独霸中国、争夺亚洲、称霸世界的第一步，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奏。

（二）

日本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既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略中国战争的起点，也是中国人民进行曲折的抗日战争的序幕。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蒋介石国民党却违背全民族的意志，对日本的进攻采取“绝对不抵抗”的方针，集中兵力进行“剿共”的反革命内战，致使日军乘虚而入，继占中国东北之后，又进犯上海，并炮制伪满洲国，把中国东北变成了任其宰割的殖民地。在这种情况下，处在反“围剿”环境中的中国共产党，尽管受到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干扰，但在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对日妥协和出卖民族利益，主张武装抗日方面是坚定的。“九·一八”后，中国共产党代表全民族的利益，连续发表宣言、决议，号召全国人民武装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派出大批干部加强中共满洲省委，开展东北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支持、影响下，东北沦陷区和其他地区人民及部分爱国军队，一反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开展了波澜壮阔的抗日救亡运动，尤其是东北人民武装的抗日游击战争和上海第19路军的抗战，曾给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

1933年1月，日军又侵犯热河和长城各口及其以南地区。随后，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伪满洲国。此时，蒋介石国民党仍继续推行“攘外必须安内”的反动国策，一面在国内集中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四、第五次“围剿”，扼杀长城抗战，破坏察哈尔抗战，镇压主张抗日的

福建人民政府，禁止抵制日货运动；一面对日步步退让，先后与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以适应日本关于华北特殊化的要求。

在华北危急、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站在抗日救亡的最前列，积极引导和推动部分爱国军队和广大群众，冲破国民党政府设置的重重障碍，开展了多种形式的抗日斗争。同时，发表“八一宣言”，作出“十二月决议”，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并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一二·九”运动。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如火如荼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左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列强和国民党中亲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于1935年11月五中全会以后对日政策开始发生了一些变化，但反共内战政策仍未放弃，直到西安事变及其和平解决，国民党才被迫改弦更张。

1937年2月，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基本接受了中共关于团结抗日的意见，从而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中国全民抗战的发动、坚持和胜利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建立起了示范作用。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经过一系列准备之后发动了卢沟桥事变，妄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三个月灭亡中国。“七·七”事变，标志着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全民族共同抗日局面的实现，标志着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的开始。

“七·七”事变后，国共两党又经过多次谈判，于9月得以正式形成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有广泛的民族性和深刻的人民性。中华儿女不分民族、阶层、党派、宗教，也不分工、农、兵、学、商各行各业以至海外侨胞，都聚集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汇成了全民族抗战的洪流，到处都燃烧着抗日的烽火。特别是敌后的抗日游击战争，其规模之广，时间之长，作用之伟大，为古今中外所罕见。

这次全民族抗战不同于第一次中日战争。它是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华民族空前觉醒的时代进行的；是大而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反对小而强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解放战争；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由国共两党领导的两支军队，在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既有战略配合又独立自主地实施的战争。这些基本特点，决定了中国抗日战争的长期性、艰苦性、复杂性和胜利的必然性。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中日战争的特点，提出了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指明了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道路。国民党在抗战初期也提出了“持久消耗战略”，指望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单纯和敌人拼消耗，消极地以空间换时间，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求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采取不同的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对抗战争的进程产生了完全不同的影响和效果。

在战略防御阶段，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正面战场国民党军队的广大官兵，在忻口、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役中，顽强抗击，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重大胜利。但由于国民党最高当局实行片面抗战路线和消极防御方针，造成了许多本来可以避免的损失，

导致半壁山河迅速沦丧。尽管这样，国民党正面战场仍是抗击日军战略进攻的主战场。在敌后战场配合下，粉碎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分别挺进华北、华中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创建了一大批敌后抗日根据地，对破坏敌战略进攻，争取相持阶段的到来发挥了重要作用。

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广州以后，再无力举行战略进攻，中国也需要积蓄力量，准备反攻，于是抗日战争便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进入相持阶段以后，日军对国民党当局采取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方针，而将战略重心转向敌后战场，妄图扑灭人民游击战争，达到其巩固占领区的目的。客观上敌后战场就被推上了主战场的位置。敌后战场军民不畏强敌，主动挑起了主战场的重担。而国民党却随着日军战略重点的转移和诱降方针的影响，开始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

1939~1940年，日军在加强敌后战场兵力，重点进攻敌后根据地的同时，对正面战场加紧诱降活动，并通过军事进攻、战略轰炸、封锁沿海等手段，逼迫蒋介石步汪精卫的后尘，使国民党正面战场出现了危机。此时，国民党一面对日军的进攻进行防御作战，一面与日本秘密交涉，并开始制造反共磨擦和反共事变。面对当时的不利形势，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克服国民党顽固派的投降、分裂和倒退的危险，维护了团结抗战的局面。敌后战场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并向日军发起百团大战，“将日军主力吸引到自己周围，挽救了国民党战场的危机，支持了长期的抗战”。

1941~1942年，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最困难的阶段。日本在德、意法西斯横扫西欧北非、闪击苏联暂时得势的刺激下，为了打破中国战场的僵持局面，迫不及待地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在此前后，日军为了解除南进的后顾之忧，并把中国占领区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战略基地，遂集中2/3到3/4的在华兵力，对敌后战场实行残酷的“扫荡”、“蚕食”、“清乡”和“治安强化运动”，实行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和经济封锁，给敌后根据地带来空前的灾难。但是敌后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持贯彻“十大政策”和“敌进我进”方针，开展广泛的群众性的多种多样的游击战，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威力，粉碎了敌人的进攻，渡过了难关，巩固了根据地。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随着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中国战区的建立和美英等国对中国援助的增加，中国战场出现了新的转机。但是国民党未能加以利用，而是继续保存实力，依赖外援，坐待胜利，以便将来用于消灭在艰苦抗战中发展起来的人民革命力量。因此，这段时间国民党除派遣中国远征军赴缅直接协同盟军作战外，在正面战场几乎没有什么作为。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开始进入恢复和再发展阶段。八路军于同年秋冬在华北敌后揭开了局部反攻的序幕。与此同时，中国驻印军也在缅北开始了反攻。

1944年初，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国军队加紧了对轴心国军队的战略反攻。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也开始了走向胜利的阶段。此时，正面战场拥有2亿多人口的地区和600多万军队，本应在反攻中有所作为。但由于蒋介石奉行保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896页。

十大政策：对敌斗争，精兵简政，统一领导，拥政爱民，发展生产，整顿三风，审查干部，时事教育，三三制政权，减租减息。

全实力在先，抗战为次的避战方针，致使正面战场在日本于 1944 年春发动的打通大陆交通线的作战中，严重失利，只是中国远征军在缅北和滇西的反攻作战中取得了一些胜利。与此同时，敌后战场主动承担了对日举行局部反攻的任务。由于敌后战场反攻的胜利，弥补了正面战场的损失，并在整体上使在华日军的战略态势迅速恶化。进入 1945 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势如破竹。日本法西斯在太平洋和中国战场面临最后崩溃。中国敌后战场军民乘势进一步扩大局部反攻，取得了春季攻势和夏季攻势的重大胜利。国民党正面战场也进行了有限的局部反攻，同时，中国远征军继续在缅甸境内消灭日军，打通了中印、滇缅公路。这些都为转入全面反攻创造了条件。同年 5 月，希特勒德国战败。7 月，中、美、英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8 月上旬，当美国先后在广岛、长崎投掷原子弹，苏联对日宣战并出兵中国东北之际，中国敌后战场军民对日伪军展开了全面反攻。8 月 15 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9 月 2 日，举行日本投降签字仪式。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以同盟国的胜利和法西斯的失败而告终。

（三）

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它不论在中国近代史还是在世界近代史上，都是极其重大的事件。它的胜利，改变了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中国抗日战争不是孤立进行的，它是反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世界性的联盟战争，参战的同盟国的各个成员国都为赢得这场战争的胜利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中国作为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五个最大的国家之一和亚洲大陆上反对日本侵略的主要国家，为取得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做出了重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贡献。中国人民第一个举起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义旗，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算起，长达 14 年之久，从 1937 年全国抗战开始也 8 年有余。

1939 年欧战爆发以前，英美等国不仅没有承担反法西斯的责任，反而纵容法西斯国家，造成对中国十分不利的国际环境。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独立承担世界反法西斯的重任达数年之久。经过艰苦抗战，粉碎了日军企图在短期内征服中国，变中国为其争霸亚太地区的战略基地的侵略计划，使其陷入“中国泥潭”，延缓了整个法西斯勾结起来扩大侵略的进程，为主要反法西斯国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对粉碎远东慕尼黑阴谋，动员和鼓舞世界反法西斯力量，促进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壮大，都起了重要作用。欧战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在欧、亚、非大批国家沦亡的情况下，中国始终与苏、美、英等盟国一道屹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前线，把日本陆军主力死死地“钉”在中国战场上。对保证美、英、苏实施“先欧后亚”方针，避免两线作战，聚歼德国法西斯，对支援盟军太平洋战场反日作战，对阻止德、日法西斯会师中东，都发挥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中国战场是战胜日本法西斯的主要战场。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唯一战场，抗击着日本陆军总兵力的 80% 左右；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国仍是抗击日本法西斯的主战场，抗击着半数以上日本陆军。据日方统计，日军在战

争中共死伤 195 万人。其中中国战场死伤 133 万人，占伤亡总数的 70%。中国军民在这场抗日战争中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共伤亡 3500 多万人（其中军队伤亡 380 多万人），占第二次世界大战各参战国伤亡总数的 2/5；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折合 1000 亿美元以上。而美军在对日作战中仅伤亡 32 万余人，苏军伤亡 3.2 万余人。当然，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与同盟国和世界各国人民的支援分不开的。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从根本上改变了远东的国际政治形势。中国人民在这次战争中所发展起来的雄厚力量和积累的丰富经验，特别是半殖民地弱国打败帝国主义强国的经验，对战后世界特别是远东局势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鼓舞了被压迫民族和国家的反帝斗志，促进了各国革命和进步力量的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这次战争的胜利，对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和走向胜利具有直接而重大的意义。自 1840 年鸦片战争开始的中国近代史，是一部中国人民受尽凌辱、侵略的历史，也是一部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进行英勇斗争的历史。饱受帝国主义奴役之苦的中国人民，在历次反对外来侵略的战争中，都表现出了大无畏的英勇斗争精神，但大都失败了。唯有这次抗日战争开创了历史记录，中国人民取得了第一次反侵略战争的完全胜利，显示了处在进步时代的中华民族的觉醒和团结的伟大力量，推进了中国革命的进程。这场战争不仅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而且通过战争大大削弱了中国的反动势力，大大增强了新的革命因素，使中国人民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进步达到了新的高度。作为中华民族先进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都由几万人发展到 120 多万人；党领导的解放区不仅是全国抗日的模范，也是全国民主的模范，新中国的雏型；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空前提高。所有这些都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迅速胜利和新中国的建立创造了有利条件。经过这次抗日战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学说和人民战争的理论更加成熟，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成为战后指导革命和建设的强大思想武器。这次战争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这种觉醒的共同内容就是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国家民族命运息息相关，爱国主义蕴含着民族的巨大凝聚力。它不仅是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伟大精神力量，也是永远鼓舞着中国人民团结前进的巨大动力。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宏伟事业中，继承和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必将促使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日益富强昌盛，为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日〕《昭和史事典》，1980 年日文版，第 212 页。

〔日〕黑羽清隆：《日中十五年战争》，株式会社教育社，1979 年版，第 266 页。

出版说明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最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中国人民在长达 14 年的抗日斗争中，付出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创造了光辉的业绩，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伟大的贡献。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编写出一部全面系统地反映 14 年斗争的抗日战争史，总结和借鉴抗日战争的经验，对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精神，促进祖国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富强，具有重要的意义。

在承担《中国抗日战争史》的编写中，我们力图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角度，探讨中国抗日战争从局部抗战到全国抗战的进程和规律，全面反映正面和敌后两个战场的军事行动，以及政治、经济、文化和外交等各方面的情况。全书共分三卷六编。上卷（1931.9.18—1937.7.6）分为第一编东北沦陷，第二编救亡高潮；中卷（1937.7.7—1940.12）分为第三编举国关，第六编走向胜利。各卷均附有照片、地图及大事记。

在编写本书过程中，得到了军事科学院郑文翰、王诚汉、蒋顺学、杨永斌、姜思毅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中央档案馆、中国人民解放军档案馆、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国防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解放军出版社、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等单位以及本院有关部门，给予了支持帮助。彭明、张注洪、丁守和、吕永和、马仲廉、何理、莫阳、沈宗洪、傅吉庆、吴春秋、谢钢等同志，参加了上卷史稿评审，提出了许多宝贵意见。本书还吸收了近年来学术界对局部抗战研究的成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所限，难免存在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
1990 年 11 月

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卷)

第一编 东北沦陷 (1931.9.18 ~ 1932.12)

第一章 “九·一八”事变前的国内外形势

第一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短暂的和平时期，实际上是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准备时期。日本发动侵华战争，是其对外侵略扩张的大陆政策的产物，同时，也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所形成的国际格局及其矛盾的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

一、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形成及其矛盾冲突

(一) 巴黎和会与凡尔赛和约

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 年爆发于欧洲，东方的日本与中国也先后参战，卷入战争的国家共达 33 个。战争结束后，美、英、法等战胜国为处理战败国，并协调战后国际关系，先后召开巴黎和会与华盛顿会议。然而，这两次会议未能消除战争根源，却埋下了爆发更大战争的种子。

巴黎和会于 1919 年 1 月 18 日揭幕，与会有 27 个战胜国及 5 个新成立的国家，代表共约 1000 余人。到 1920 年 8 月 10 日签订对土耳其的色佛尔条约为止，和会历时 1 年又 7 个月。会议由英、法、美、意、日等协约国五强国控制，而美国总统威尔逊、英国首相劳合·乔治、法国首相克里孟梭三巨头是会议的主宰者。

各战胜国依据自身的利益，各有打算。美国参战于 1917 年 4 月，参战最晚，损失最小。到战争结束时，虽然海陆军事力量不及英、法，但由于在战争期间向协约国销售军火，获得暴利，成了世界上头号债权国，纽约取代伦敦成了世界金融中心。总统威尔逊在 1918 年 1 月 8 日的国情咨文中提出“十四点原则”，主张废除秘密外交，缔结公开和约，实行公海航行自由，撤销经济壁垒，建立国际联盟等，为 1918 年 11 月 11 日贡比涅停战协定及巴黎和会定下了基调。

英国在大战中受到相当的削弱，失去了世界经济和金融中心的地位，成了美国的债务国，但在军事力量上仍处于领先地位，海军力量占有相当优势。英国力图维持其“日不落帝国”的地位，阻挠法国利用德国的战败而过分扩张，并维护在战争中获取的既得利益。

法国因在战争中遭受损失最大，元气大伤，负债累累。但法国仍然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控制着重要的战略地区。法国决心确立和巩固其在欧洲大陆的霸主地位，并力图通过勒索巨额赔款、分割领土等手段进一步削弱德国，进而控制中欧及部分东欧和巴尔干地区。

意大利的经济和军事力量虽不及英法，但它除了要求得到 1915 年《伦敦秘密协定》所许诺的利益之外，还要求在巴尔干诸地扩张势力，要求割取阜姆港（今南斯拉夫里耶卡），变亚德里亚海为意大利的内湖，在东地中海建立霸权。

日本也是一个发了战争横财的国家，它乘欧洲混战之机，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大肆扩张。

1914年10月占领原德属太平洋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马里亚纳群岛等，11月抢占中国青岛和胶州湾。

1915年1月18日，迫使中国袁世凯政府接受“二十一条”，力图独霸中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日本的工业生产、黄金储备都大幅度增长。因此，日本决心保住战争中掠取的既得权益并进一步同英美等国争夺远东霸权。

中国曾参加协约国方面对德奥宣战，也属战胜国。但中国的参战，一开始就受到日本的操纵和控制。中国为参战经费等问题，在权益方面遭受巨大损失。中国政府希望能通过和会修改同列强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

鉴于上述背景，和会自开始便充满了矛盾和斗争。协约国五强力图根据各自意志来安排会议，美国总统威尔逊主张首先讨论国际联盟的建立，尔后再讨论赔偿等问题；英法两国首脑则首先关注对德国的惩罚、战争赔款及殖民地分割，认为首先建立国联会更加强化美国的地位。因此，在英法两国的强力坚持之下，和会决定首先讨论德国殖民地与土耳其领土的处理问题。而中国山东问题，是关于“处理德国以外之德国权利及利益”问题中的重要事项，故围绕山东问题，中国代表与日本等列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外交战。

日本对中国的山东志在必得。日本政府对其代表团规定：“第一、……绝对的使命：即要求由日本接管德国在山东省的各种权益及财产，并领有原德国占领的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1919年1月27日，日本代表牧野伸显发言正式提出，日本作为战胜国，根据同中国的“二十一条”及同英法等国的秘密协定，应该继承在山东的权益。翌日，中国代表顾维钧发言，驳斥了日本的说法，指出中国作为主权国和战胜国，依据国际间的基本准则，完全应该收回本国的领土主权。顾维钧强调：“胶州租借地胶州铁路及其他一切权利，应直接交还中国。青岛完全为中国领土，当不容有丝毫损失。……且中国对德宣战之文，业已显然声明中德间一切约章，全数因宣战地位而消灭。约章既如是而消灭，则中国本为领土之主，德国在山东所享胶州租借地暨他项权利，于法律上已经早归中国矣。”中国代表的发言，义正词严。巴黎报界普遍报道：“中国声明受到除日本以外各大国代表的一致赞扬。”中国在舆论上取得了胜利，“形势对日本不利。”

4月16日，英、法、美、意、日等五国会议讨论中国山东问题。美国代表在会上提议将山东先交本会暂收，以后再议定交还中国。日本代表牧野坚决反对，要求先由日本接收山东，然后再寻求解决办法。英、法、意三国代表执缄默态度，美国转向妥协。4月22日，在美、英、法三国首脑“三人会议”上，由中国代表列席。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他“不赞成顾的看法，即与日本订立的条约是不公正的安排。条约的神圣正是大战的主要动力之一，它并非一堆废纸。如果条约与和平赖以存在的原则不符，我们还是不能废除过去的义务。”英国首相说：“英国与日本的订约是在极度需要日本的支持时进行的。……订立条约是严肃的，英国现在不能掉过头来对日本说‘行了，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7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1年版，第265~267页。

《顾维钧回忆录》1.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86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449页。

谢谢。当我们需要你的帮助时，你给予帮助，可是现在我们认为条约很不好，不应该执行。’”而法国首相克里孟梭随之附和共同压中国妥协，以接受日方观点。

日本代表还向会议表示，如果日本在山东问题受挫，将拒绝在国联问题上签字。建立国联是威尔逊最大的愿望，威尔逊于是提出，如果日本在一切军事权利上让步，而将协议仅仅限制在纯粹的经济问题方面，他就将同意日本的要求。

29日，美、英、法三国会议邀日本代表出席，最后于4月30日议定了凡尔赛条约。其中第156至第158条对中国山东问题规定：德国将按照1898年3月6日与中国所订条约及关于山东省之其他文件，所获得之一切权利所有权及特权，其中关于胶州领土、铁路、矿产及海底电线，在胶州领土内的德国所有动产和不动产均为日本获得，各项有关档案证券及文件，均于3个月内移交给日本。

这样，名为《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竟把对于战胜国领土主权及铁路、矿山等方面权利的分割写入条文，完全剥夺了中国作为主权国家和战胜国的一切权利。这是巴黎和会的分赃性质以及威尔逊“十四点原则”虚弱性的大暴露。消息一传到中国国内，人民愤怒之极，立即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五四运动，因此，中国代表团亦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巴黎和会决定建立国际联盟，是一个重大国际事件。1919年4月28日会议通过了《国际联盟盟约》，并将它列为《凡尔赛条约》的第一部分。1920年1月10日国联正式宣告成立，协约国方面的五强国为常任理事国。国联成立后，实际上操纵在英法手中，美国因其要求未能达到，一度拒绝参加，苏俄也被排斥在外。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正义，实现国际和平与安全为根本宗旨，但国联盟约并没有能够确定关于侵略的定义，也未能制定出制裁侵略的办法。国联不过是各帝国主义大国维护其自身利益，推行侵略政策，重新瓜分殖民地的工具。

6月28日，各国在凡尔赛宫明镜厅正式签署《协约和参战各国对德和约》，共432条。战败国殖民地随后由国际联盟根据委任统治制度加以处置。这些殖民地被分为土耳其地区，中非地区，及南非和太平洋岛屿三类，分别由委任统治国实行治理或纳入版图实施统治。德国的欧洲领土被割让1/8，赔偿问题先决定赔200亿金马克，最后决定的数额是1320亿金马克，并要担负占领军的全部费用。德属殖民地的中非多哥和喀麦隆由英法瓜分，东非的坦噶尼喀划归英国，太平洋的新几内亚划归英国自治领澳大利亚，萨摩亚划归新西兰，马绍尔群岛、加罗林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划归日本。列强从德国手中夺走殖民地总面积295万平方公里。这样激烈争斗的结果，英国维持了海上霸主地位，法国确立了在欧洲大陆上的优势，日本扩张了在中国及南太平洋的势力。从而形成了列强在欧洲、西亚和非洲的“新秩序”即凡尔赛新体系。对战败国处置的各项条约，基本实现了英、法的复仇愿望，但战胜国之间的权益分配并不均衡，中国等被侵略国家的正义要求没有得到伸张。所以，旧的矛盾没有解决，新的冲突又在酝酿。正如列宁所说：“靠凡尔赛条约来维系的整个国际体系、国际秩序是建立在火山上的。”

《美国对外关系——巴黎和会1919年》第5卷，第146~148页。

《列宁全集》第31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第292页。

（二）华盛顿会议与九国公约

巴黎和会所确立的凡尔赛体系没有解决远东问题，也没有能解决中国问题。德国势力虽然在远东消失，但日本的扩张却危及列强特别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利益，日美之间的争夺逐渐加剧。美国在巴黎和会上空忙一场，并未得到多少实惠。因此，它除了在欧洲扶植德国外，又把扩张方向移向亚洲，试图在东方的争夺中得到补偿。1919年8月6日，美国总统威尔逊针对日本有关宣传发表声明，重申美国关于山东问题的态度，强调巴黎和会由日本归还山东的决议，公开警告了日本。

1921年7月，美国致函英、法、意及中国，建议召开会议，讨论远东及裁军问题，得到响应。1921年11月12日华盛顿会议正式开幕，除上述邀请国之外，还有荷兰、葡萄牙和比利时，共9国。会议上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美国国务卿查理·伊斯·休斯、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詹姆士·贝尔福和日本海相加藤友三郎。

华盛顿会议首先从限制海军军备问题开始谈判，美国以维护“和平”、解除军备重担的响亮口号，要求限制英日的海军势力。会议通过的第一份文件是1921年12月13日所订立的美、英、日、法《关于太平洋区域岛屿属地和领地的条约》，该条约要求互相尊重四国在太平洋的岛屿领有现状。四国条约的订立拆散了原有的英日同盟。会议通过的第二份重要文件是关于海军裁军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美、英、日、法、意五国的海军主力舰吨位比例为5:5:3:1.75:1.75，其数额美国、英国为50万吨，日本30万吨。这一条约对美国来说是又一个胜利，它使美国取得同英国海军相等的地位，并挫败了日本所要求的对美英比例70%的要求。美英亦对日作出了让步，承诺不在菲律宾、关岛等接近日本地域新建或扩建海军基地。

关于中国问题，这是华盛顿会议的核心问题之一。中国为改善国际地位，废除不平等条约，对华盛顿会议寄予了莫大希望，派出代表团人数多达130人，而巴黎和会专使团不过35—40人。11月6日，中国首席代表施肇基向“远东及太平洋委员会”提出要求各国尊重中国领土完整及政治、行政上的独立，声明中国不以本国领土或沿海地方割让或租借他国，中国赞同开放门户，与约各国一律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各国对中国政治上、法权上、行政上之各种限制应从速取消或废止等解决中国问题的十项原则。中国代表提出的赞成开放门户，实行与约各国在中国享有工商业机会均等，适应了美国的需要。美国为削弱英日两国在中国的地位，以“尊重中国主权与独立”的口号，反对独占和肢解中国，要求实现在华利益均等，以加强美国对中国的控制。

11月21日，美国代表卢特根据中国代表所提原则，为大会起草了有关中国问题的决议草案，并归纳出“四点原则”：“（一）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二）给予中国完全无碍之机会，以发展维持一有力巩固之政府，并解除由改革年久之帝制政府后所生之困难。（三）尽吾人权力所及，为世界保护各国在中国全境商务实业机会均等之原则。（四）不得因中国现在状况，乘机营谋特别权利或优先权利，而减少友邦人民之权

利，并不得奖许有害友邦完全之举动。”

在会议进行中，1922年1月16日和17日，会议议长、美国国务卿休斯进一步引伸和补充了卢特“四原则”，强调反对划分在华势力范围，承认工商业机会均等。英国在华的势力虽受到了美国的排挤，但是，不让法国在欧洲加强霸权和不允许日本在远东确立统治的默契，使英美两国在远东暂时取得了一致。法荷等国意欲遏制日本的过分扩张，都追随美国。2月2日至4日会议上，中国代表再度就“二十一条”及山东问题发表声明：“1919年之中日条约及换文，当加以公正之审查而图废弃之。”最后于2月4~6日正式签订《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及附约》、《九国关于中国事件应适用各原则及政策之条约》、《九国关于中国关税税则之条约》等3个文件，其中关于山东悬案的规定是：“第一条日本应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

第二条 中、日两国政府关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租界地之行政权及该地域之公产，并解决其他应行清厘事项，……。

第四条日本政府担任于移交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行政权之际，并将移交行政权时所必需及移交后中国治理该租借地及胶州湾周围五十启罗迈当地域所必需之档案、图样、册籍、单契及其他证书或各项签证之副本，现为日本所有者，交付中国政府。

第九条日本军队、包括宪兵在内，现驻沿青岛、济南铁路及其支线者，应于中国派有警队或军队接防铁路时，立即撤退。

第二十三条日本政府声明并无在胶州德国旧租借地设立日本专管租界或公共租界之意。中国政府亦声明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

上述各条，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中国解决山东主权问题的愿望，也达到了列强遏制日本的目的。在九国公约签订后不到3个月，美国于1923年4月宣布废除1917年订立的《蓝辛——石井条约》。但是新条款仍然保持列强在华的经济特权，中国将德国旧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外人在该区域自由居住，实际上并未真正解决山东问题。1927年和1928年，日本正是借口保护在华日本人，三次出兵山东，制造了震惊世界的“济南惨案”。在税则问题上，则完全保留了“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掠夺性原则。中国坚决要求的废除“二十一条”问题，也未得到根本解决。日本放弃了有关铁路借款优先权等次要条款，但在东北等地的殖民势力则完全没有受到动摇。

至此，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就以凡尔赛——华盛顿诸条约的缔结为标志，正式形成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部分解决了战时尖锐化的国际冲突，使战后国际关系重新得到了调整。但是，两次会议又带来了新的矛盾冲突，整个20年代，各种矛盾都在与日俱增，酝酿着新的世界性大战。

（三）国际裁军会议

华盛顿会议只规定了主力舰比例，未规定巡洋舰及其以下的辅助舰的发展规模。各国海军军备在华盛顿会议之后，有增无减。一些对凡尔赛——华

北京政府外交部编：《外交文牍》华盛顿会议案（上），第8页。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208~211页。

盛顿体系不满的国家，如意、日等国都在竭力发展本国的军事实力，英、美、法等战胜国强国，也在努力加强各自的军事优势，并力图胜过对方，为了限制军备竞赛，1925年12月国联决定成立裁军筹备委员会展开裁军工作，自1927年至1930年，筹备委员会召开大小裁军会议118次，勉强拟定了一个60条的裁军公约草案，并附有各国提出的49项保留意见。

上述裁军活动，并没有能够真正限制各国军备的扩充。日本表面上裁减了部分步兵兵员，却加紧发展摩托、航空，电讯等现代装备，不断改善军备质量，谋求先进武器与技术优势。美国凭借巨大的经济力量，稳步扩充海军力量，使具有200年海上霸主地位的英国深感担忧。1929年10月7日，英国以外相亨德森名义，向美、日、法、意四国发出邀请，在伦敦召开海军裁军会议，得到响应，1930年1月21日会议正式召开。

会议上的分歧与冲突十分激烈，首先是意大利要求同法国平等，而法国坚决反对，英国调解无效，于是法意两国均拒绝在协议上签字，剩下英、美、日三国。英同美的要求也差距很大，经过讨价还价，达成英国巡洋舰比美国多1.6万吨。

会议上矛盾最尖锐的还是美国同日本，日本一直将美国看作是争霸太平洋的劲敌，因而力图坚持：“1.水上辅助舰总吨数为美国的7成；2.大型巡洋舰为美国的7成；3.潜水艇保有量为7.8万吨。”但美国则要求日对美比例仍如华盛顿条约所规定的主力舰比例6成，双方坚持不下，3月13日美国提出了最后妥协案：日对美总比例为69.75%，大型巡洋舰为60.22%，轻巡洋舰为70%，驱逐舰为70.3%，潜水艇为5.27万吨（与美国相等）。日本迫于国内经济危机，于4月1日由内阁会议同意并上奏批准。4月22日，日本代表在伦敦条约上签字。1931年6月31日，由国联邀请全部加盟国，准备在纽约召开陆海空全面裁军会议。但这些裁军会议均未取得任何成效。

总之，二十年代一系列国际裁军活动，并未能真正限制各国军备发展或制止战争。相反，日、意、德等国都从裁军活动中得到掩护，完善了各自的战争准备。特别是日本，以伦敦条约问题为导火索，激化了国内各种矛盾的冲突，法西斯势力飞速膨胀。日本统治阶级为转移矛盾，解决经济政治危机，加快了对外侵略准备的步伐。

二、十月革命与共产国际的建立

列宁所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经过多年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7日）宣告苏维埃政权成立，对于当时还在进行的世界大战以及战后国际关系均有着深刻的影响。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宣布《和平法令》（11月8日），提出了缔结和约的不割地不赔款原则，与德国于同年12月签订了为期10天的停战协定，随即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开始了谈判，并缔结了和约。翌年3月，俄共第7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列宁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决议，以暂时性妥协和让步，退出战争，使世界上第一个新生的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得到了短暂的喘息时机，以巩固十月革命的成果。

《冈田启介日记》，见《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页。

《现代史资料》7，第44页。

列宁所领导的苏维埃政权制定并推行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和临时政府所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废除秘密外交。反对帝国主义国家的压迫和剥削，废除沙皇俄国欠下总数达 160 亿金卢布的对外借款。同时也宣布废除沙皇俄国强迫周边弱小国家所订下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支持各弱小民族的平等独立要求。1917 年 12 月 18 日承认芬兰独立。波罗的海沿岸三国也取得了独立。12 月 3 日公布《告俄罗斯和东方全体伊斯兰教劳动人民书》，宣布废除沙皇政府对外订立的关于强占君士坦丁堡、瓜分土耳其和波斯等方面各种秘密协定。1919 年 7 月 25 日和 1920 年 9 月 27 日，苏维埃政府先后两次发表对华宣言，1923 年 9 月 4 日发表声明，宣布放弃过去沙皇政府强加在中国人民身上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和约定。1924 年 5 月 31 日，苏联与中国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苏联政府声明前俄帝国政府与第三者所订立之一切条约、协定等项，有妨碍中国主权及利益者，概为无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根据各种公约、条约、协定等所得之一切特权及特许等。

在 1920 年共产国际“二大”上，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现在全世界已经划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人数众多的被压迫民族，另一部分是人数甚少的、拥有巨量财富和强大军事实力的压迫民族。”列宁还拟定《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宣布：“共产国际在民族和殖民地问题上的全部政策，主要应该是使各民族和各国的无产者和劳动群众为共同进行革命斗争、打倒地主和资产阶级而彼此接近起来。因为只有这种接近，才能保证战胜资本主义，如果没有这一胜利，便不能消灭民族压迫和不平等的现象。”苏维埃政权以实际行动支持了各弱小民族的斗争，例如对土耳其的凯末尔运动的支持，对伊朗人民独立运动的支持等。苏联派出了越飞、鲍罗廷等来华支持中国革命。帮助国民党进行改组，支持国共合作，协助创建黄埔军校，派出了军事教官，提供武器装备，为反对旧军阀的革命战争培训了干部。

为了更好地领导各国人民和各国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同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划清界限，坚持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原则，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为建立新的国际进行不懈的斗争。经过 1918 年 1 月各国社会党左派在彼得格勒的准备会议，1919 年 1 月在莫斯科召开各国共产党、共产主义小组和左派社会主义代表会议，最后于 1919 年 3 月 2 日至 6 日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举行了第三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通过了《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决定组成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成立了以列宁、季诺维也夫等组成的五人执行局。1920 年 7 月 19 日在彼得格勒召开第二次共产国际代表大会上，列宁作了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形势与共产国际基本任务的报告。大会特别关注朝鲜“三一”起义和中国五四运动的意义及其对各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影响。

1922 年 1 月召开远东劳动者大会，进一步支持和推动了东方民族解放运动。各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之下，开展无产阶级革命，使共产主义运动成为遍及全球五大洲的具有世界规模的运动，世界革命形势迅速发展。

苏维埃政权的诞生及其对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使西方列强感

工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 3 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 年版，第 423～425 页。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333 页。

《列宁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1972 年版，第 272 页。

到十分恐惧，他们实行武装干涉，企图扼杀这一新生的政权。1918年3月，英国协同法国组织干涉军队，在摩尔曼斯克登陆，占领阿尔汉格尔斯克，扶植沙皇将军，建立“北俄政府。”4月4日，日本海军陆战队借口三名日本商人在海参崴被杀而强行登陆。7月，日本又同美国一道派兵支持被遣返回国途中在远东叛乱的捷克军团。到10月底，日本进入西伯利亚的军队达7.2万人，并扶植了谢苗诺夫等傀儡政府。11月底，英法等国所支持的前黑海舰队司令高尔察克上将在鄂木斯克叛变，建立军事独裁政权。

1919年3月，由列强所支持的高尔察克叛军在北海、乌克兰等地集结，向莫斯科发起进攻，被红军所粉碎。

1919年9月，邓尼金等人在英法等国支持下，向莫斯科发动了第二次大规模进攻，再度被年轻的红军所粉碎。1920年苏俄击败以波兰军队为主的协约国的第三次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和红军所取得的胜利，完全打破了列强武装颠覆新生红色政权的阴谋。

1920年1月，美国宣告从西伯利亚撤兵，日本继续赖在西伯利亚，企图长期占领该地区。日军在西伯利亚的占领遭受到俄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游击队及俄国人民的沉重打击。美国出自维持远东平衡，反对日本的过分扩张，因而迫使日本在华盛顿会议上表示撤军。

1922年10月，除北库页岛之外，日本从西伯利亚大陆撤出。

至此，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权，终于冲破了帝国主义的封锁，粉碎了列强的武装干涉，在国内建设上亦取得了成就。苏俄以崭新的姿态屹立在世界，迫使列强走向谈判桌上。1922年，在热那亚和海牙先后召开欧洲国家经济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西方诸国包括苏俄共34个国家。会议讨论了关于沙皇政府所欠下的外债问题，苏俄要求英法等国赔偿武装干涉所造成的损失，会议未能对此达成协议。会后，苏俄同德国缔结了恢复正常关系的《拉巴洛条约》。英国于1924年2月2日向苏联递交照会，正式承认苏联。同年10月德国承认苏联。1925年日本自北库页岛撤兵。

苏联所取得的胜利和成功，共产国际的建立及其活动，各国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一战结束后的国际秩序，打破了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统天下。在帝国主义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之外，出现了一个以社会主义苏联为首的共产国际阵线，国际政治格局中又增加了两种社会制度的对立。帝国主义国家中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在发展，列强之间的矛盾冲突在加剧和扩大，列强殖民宗主国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各帝国主义国家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矛盾，社会主义国家与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相互支援，又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三、世界经济危机和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

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局势发展有着直接的关系。战胜国对战败国的宰割及其分赃不均，造成一战后的民族复仇主义、民族沙文主义势力膨胀，连同2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特别是20年代末的大危机，是国际法西斯主义势力得以崛起的两个重要条件。

国际法西斯主义的主要发源地是欧洲的意大利和德国。意大利法西斯主义势力兴起于一战期间，其头目墨索里尼自1914年主办《意大利人民报》以

来，大肆宣传民族沙文主义，鼓吹侵略战争，于 1919 年 3 月正式组织了“战斗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在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支配下，意大利成了首先恶化一战后欧洲格局的主角。在巴黎和会上，意大利曾作为“四强”发起人之一，坚持要求巴尔干半岛和亚得里亚海的权益，要割取阜姆港。但英法美等国不愿意意大利势力在地中海过分扩张，只将的里雅斯特等地割交意大利，而将阜姆划给南斯拉夫。意大利法西斯主义乘机鼓动沙文主义，要求修改凡尔赛和约。墨索里尼指责政府软弱，提出：“要么修改（凡尔赛）条约，要么进行新的战争。”法西斯文人邓南遮则组织志愿队占领了阜姆城，宣布阜姆与意大利合并。在这些民族沙文主义的狂潮中，意大利法西斯势力迅速膨胀。而国内经济危机又为法西斯主义提供了温床。据统计，1921 年第一季度与 1914 年相比，一个普通工人家庭生活开销增加 560%，1919 年和 1920 年移居国外人数占当时人口总数的 2.26%，达 86.7 万余人。在这样的条件下，1920 年 5 月 24 日，在米兰召开了意大利法西斯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暴力行动为方针的基本纲领。进而在 1922 年 10 月发动暴乱，组织“向罗马进军”，成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法西斯政府。随后，经过一系列自上而下的行政手段，1928 年颁布法律决定法西斯大委员会为国家行政机构，确立了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的完全统治。

德国的法西斯兴起于 20 年代初，由希特勒组建了“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即纳粹党。希特勒在其《廿五点纲领》及《我的奋斗》中宣布，纳粹党的根本目标是取消凡尔赛条约，建立大德意志帝国。由凡尔赛条约而重新划定德国边界，并剥夺德国的海外殖民地，成了纳粹党煽动复仇主义的借口。纳粹党首先在德国南部的慕尼黑地区迅速发展，德国国防军及巴伐利亚军人在这里组织有军国主义的“自由团。”曾任德军总监督，与兴登堡总参谋长共掌军权的鲁登道夫居住在这里，是希特勒的坚强支持者，也是 1923 年纳粹党组织“啤酒馆暴动”的直接参预者和领导者。

1929 年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大危机，以西方所称为的“黑暗的星期四”，即 10 月 24 日纽约华尔街的金融交易所倒闭为开端，迅速波及全球，给世界各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以巨大冲击，特别是对于意、德、日法西斯主义的膨胀，起到了刺激作用。在德国，危机期间工业生产降低了 40.6%，数十万中小企业破产倒闭，全国工人将近半数失业，小农成批破产。希特勒以“社会主义”为旗号，向广大民众许诺提高工资、消灭失业、企业国有、严惩奸商、实行土地改革等，蒙骗了大批群众。纳粹党员从 1925 年的 2.7 万人，激增到 1930 年的 38 万人，并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希特勒鼓吹民族沙文主义和复仇主义，鼓吹反“凡尔赛压迫”。

1932 年希特勒在演讲中煽动说：“凡尔赛和约给德国带来了物资、政治和领土的损失，”“13 年来我们由他人摆布！”凡尔赛和约所造成的国际格局与德国的国内危机形势相结合，最终导致希特勒的纳粹党于 1933 年夺取了政权，并凭借德国国力形成了欧洲主要的战争策源地。

国际法西斯主义自产生伊始，即鼓吹战争，提出一整套赤裸裸的对外扩

加莱阿佐·齐亚诺：《意大利面临战争》，米兰 1939 年版，第 16 页。

费德利科·卡鲍德：《当时意大利（1918—1948）》，意大利 1961 年版，第 28～29 页。

林茂等：《日本内阁史录》3.第一法规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97 页。

朱庭光主编：《法西斯主义与第二次世界大战》，华夏出版社，第 47 页。

张理论。墨索里尼认为，“对法西斯主义来说，帝国的倾向，即各民族扩张的倾向，是一种生命力的表现；而其反面，或守在家里，则是一种没落的标志。”他还宣称：“法西斯主义不相信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与有益性。……同样，一切国际性和社会性的（和平）组织与法西斯主义的精神也是格格不入的。”希特勒信奉“战争万能论”。他鼓吹“德国不是所有国家中唯一建立在纯粹力量的政策基础上的帝国的杰出榜样吗？帝国的胚种细胞普鲁士是由于赫赫的武功，而不是由于金融的操纵和商业的买卖而建立起来的，而帝国本身又完全是积极进取的政治领导和视死如归的军人气概的光荣结果。”他说，“俾斯麦国家的创建者不是逃避兵役的胆小鬼，而是置身前线的将士。”

他认为，经济也只能依靠战争来推动：“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是靠和平的经济手段建立的”，“没有剑，就不可能有经济政策，没有权力，就不可能有工业化。”

国际法西斯势力的兴起，极大地冲击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国际局势。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由于法西斯势力的促动，国家内外政策发生巨大变化，造成列强之间矛盾冲突加剧，动摇了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建立起来的短暂平衡。意大利法西斯率先发难，于1922年3月3日突破列强对其向巴尔干扩张的限制，以武力夺取了南斯拉夫的阜姆城。接着，1923年8月31日武装占领了希腊的科孚岛，当希腊向国联提出控诉后，墨索里尼拒绝国联干预。科孚岛是亚德里亚海的锁钥，意大利占领科孚岛，显然极大地危及了英国的利益，英国摆出战争架式，向意大利提出最后通牒，才迫使意大利同南斯拉夫一道回到谈判桌上来。1924年意大利控制了利比亚。1926年11月胁迫阿尔巴尼亚订立“地拉那条约”，使阿尔巴尼亚成了意的保护国。1931年意大利征服了利比亚。

在20年代的德国，纳粹党虽未最后执政，但也同东方的日本法西斯一样，在多方面影响着德国的内外政策。

20年代后半期德国外交家施特雷泽曼（1878—1929年）在去世前曾对英国记者谈到：由于纳粹党及右翼团体钢盔团等组织，“我们本来能争取德国青年支持和平和新欧洲，但我们都没有做到——这就是我们的悲剧和你们的过错。”1930年，纳粹党在608席的国会中已占有107个席位，成为一股不容轻视的势力。

国际法西斯在20年代的战争叫嚣，对于英美等国的和平主义也是一个沉重打击。美国总统威尔逊拟定的十四点计划所宣扬的各国平等，限制军备，防止战争，曾在和会上产生一定影响，并促成一战后裁军及和平主义的潮流。英国战时内阁还决定，英国的军事部门编制预算所依据的假定应该是：“不列颠帝国在今后的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要派出远征军。”但到1932年3月23日，英国麦克唐纳政府决定，十年无大战“这个假定业已取

《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10期，第26页~29页。

同上。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40页。

（美）威廉·夏伊勒：《第三帝国的兴亡》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79年版中译本，第123~124页。
迪特尔拉夫：《德意志史》，香港中文版，第261页。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第1分册，中译本第73页。

消了。”意大利、德国和日本等国的法西斯主义在东西两半球磨刀霍霍，这不啻于对世界人民造成了巨大威胁，同时也是对英美等国的民主派一记耳光。国际法西斯的战争叫嚣，严重毒化了一战后的和平空气。

欧洲法西斯主义运动对于日本的法西斯军国主义起到了巨大的支援作用。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在西方泛滥，分散了列强对于日本在东方扩张的注意力。同时，日本还从意大利和德国方面取得了借鉴。国际法西斯主义的兴起，使日本同德意等法西斯国家相互支持、相互推动，加速了法西斯战争准备的进程。

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卷1 第1分册，中译本第74页。

《美国与1933—1938年的远东危机》哈佛大学出版社。

第二节 日本的军国主义及其侵华战略

日本国与中国和朝鲜隔海相望，为西太平洋上一个新月状岛国，本土面积约 37 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北地区的 1/3，发动侵华战争前夕的 1928 年，人口约 6210 万人，相当于中国 1/8 强。日本也是一个资源小国，作为近代经济与战争所需要的铁、煤、棉等主要物产，均不能自给。然而，正是这样一个先天不足的国家，近百年来竟然成为地球东半部发动侵略战争的主角！自明治维新后不久的 1874 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岛的战争开始，每隔 5~10 年左右，就要进行一次对外侵略战争。日本在近百年间成为一个最富有侵略性的国家，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和社会根源。

一、日本军国主义及其大陆政策的形成

（一）军国主义的历史传统

日本国历史上曾长期分裂，战乱持续不断，在 11 世纪前后形成以战争为职业的武士阶级，日本的封建社会实际是武人执政的军国主义国家。武士阶级在长期的封建历史中，形成了以忠信、勇武为主要内容的封建主义伦理道德观念的“武士道”。它不但是军国主义的思想道德支柱，也是近现代日本军国主义穷兵黩武发动侵华战争的重要工具。正如日本学者所指出：“在维新后的新时代，武士道精神仍然保持着这样的指导性地位。”

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以中国为对象的侵略战争，其筹谋由来已久。丰臣秀吉（1536—1588 年）统一日本之后，就提出要攻略朝鲜，进取北京，占领华北，在东亚大陆列土封疆。他向部下许诺：“自将兵入朝鲜，驱其兵以躏明地，分割土壤以封诸君。”佐藤信渊（1769—1850 年），在其《宇内混同秘策》中宣称：“今世界万国中，为皇国所易于攻取之地，舍支那之满洲外无他……故皇国之征满洲，迟早虽不可知，但其为皇国所有，则属无疑，满洲一得，支那全国之衰微，必由此而始。故取鞞鞞之后，始可逐次而图朝鲜、支那。”吉田松荫（1830—1859 年）主张：“晓谕琉球朝谨，使之于内地诸侯等同，责问朝鲜，使之抵押人质，奉纳贡物，如古之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作进取之势”。日本的军国主义传统及其历史上的扩张思想，对后来日本对外侵略不无深刻的影响。

（二）大陆政策的形成

1868 年，日本开始明治维新，逐渐走上了近代化道路。同时，也开始了对东方各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侵略和扩张。

1868 年 4 月 6 日，日本政府以天皇名义发布施政纲领《五条誓文》和《宸

〔日〕高桥龟吉：《日本近代经济的育成》，时事通信社，1982 年版，第 28 页。

汪向荣、夏应元：《中日关系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4 年版，第 508 页。

汪向荣：《中国近代化与日本》，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71 页。

玖村敏雄：《吉田松荫的思想和教育》，岩波书店，1942 年版，第 168 页。

翰》（即御笔信），宣布要“经营天下，安抚汝等亿兆，欲开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提出进行对外扩张侵略的总方针。

明治政府为实行其侵略政策，又改革军制，推行“国民皆兵主义。”于1872年12月28日发布《全国募兵诏书》，强制国民为其战争政策捐献生命，贡献“血税”。

1882年以天皇名义颁布《军人敕谕》，宣布：“朕乃汝等军人之大元帅，朕依汝等如股肱，汝等仰朕为头脑……。”要求全体官兵遵循“忠节、礼仪、武勇、信义、朴素”等武士道德行，成为侵略战争的驯服工具。

1879年至1880年，日本参谋部先后派出桂太郎等10余名军官，以驻在武官与语文研究生名义到中国，刺探中国的洋务运动等各方面情报，并综合写成《邻邦兵备略》。日本参谋部首任参谋总长山县有朋借助此书向天皇上奏说：“兵强，国民志气始可旺，国民自由始可言，国民劳力始可积，然而国民之富贵始可守。”露骨地提出通过“强兵”以“富国”的侵略方针。

为推行其扩张路线，明治政府通过军事改革确立了近代的军国主义体制。

1878年，将属陆军省的参谋局改为参谋部，规定参谋部长直接辅佐天皇，在有关统帅权事项方面可以直达天皇而进行“帷幄上奏”。1889年日本颁布宪法，规定：“天皇统帅陆海军”，“天皇决定陆海军的编制和常备兵额”。同年未公布《内阁官制》，规定“凡有关军事机密和军令问题上奏天皇，除按天皇旨意下发内阁之文书外，均需由陆军大臣、海军大臣向内阁总理报告。”这样剥夺了内阁的兵权，决定了“参谋部长的地位优于陆军大臣而与太政大臣并立”。

1893年，海军也成立了海军军令部，同时颁布《战时大本营条例》，使参谋总长以大本营参谋长的身分，协调和控制陆海军。至此，形成统帅权独立于内阁，陆海军并属于天皇，军政与军令权分立的极端专制的军国主义体制，它造成了一部以默武扩张为根本任务的战争机器。

在明治初期扩张路线和军国主义体制的基础上，日本在90年代初期进一步确立了大陆政策。

1890年12月6日，在日本第一届帝国议会上，内阁首相山县有朋发表施政演说，宣称“盖国家独立自卫之道，本有二途。第一曰守护主权线，第二曰保卫利益线。其中，所谓主权线，国家之疆域也。所谓利益线，曰与主权线之安危密切有关之区域也。……欲维持一国之独立，唯独守主权线，决非充分，亦必然保护其利益线。”同时宣称“我方利益线之焦点，在于朝鲜。”

山县有朋在对天皇奏文中进一步写出：“釜山、义州间之道路即通往东亚大

伊文成等：《明治维新史》，辽宁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第356页。

松下芳男：《日本军制和政治》，黑潮出版社，1960年版，第25页。

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4页。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馆，中译本，第28页。

森松俊夫：《日军大本营》，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中译本，第34页。

松下芳男：《明治军制史论》上，有斐阁，1956年版，第15页。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203页。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197页。

陆之道路而后必成为横断中国直达印度之途。”公然将邻国领土视为本国利益线，毫不掩饰地表达了对外扩张企图。因此，以山县有朋的“二线说”为标志，日本对东亚大陆的侵略扩张政策业已形成。

1875年后，日本开始把中国作为主要假想敌，提出日本对外扩张的主要敌手“不是英国，不是法国，亦不是俄国，而是邻邦清国。”山县有朋曾在一份上奏文中说：清国“地泽财丰，兵数不下百万，其幅员人口与全欧洲比齐。”因此，日本对华“兵备之急，尤如渴饮饥食。”1882年，日本侵略朝鲜之后，作为陆军上将兼参事院议长的山县有朋，上奏强调：“恢复我邦尚武之遗风，扩张陆海军，以我帝国为一大铁舰，力展四方。”其后强调要在俄国远东铁路计划完成之前，同英国修好结盟，早日分割并控制朝鲜与中国。1890年山县有朋还先后抛出《军事意见书》和《外交政略论》，鼓吹侵略中国、夺占朝鲜，与英、俄等列强争斗。山县内阁外相青木周藏又向日本政府提出《东亚列国之权衡》，要点是：将俄国逐出西伯利亚，“日本将领有朝鲜、满洲及俄国沿海州”，要对朝鲜“采取强硬手段，施行干涉主义”，得到内阁认可。

据此大陆政策及对华对朝战略，日本加剧扩充陆海军，逐步完善了侵华作战的组织指挥系统。

（三）早期侵华活动及其在东北的殖民势力

早在明治政权建立之初，尽管羽毛未丰，日本军国主义就开始了不间断的对外扩张及侵华行动。

1874年，日本借助所谓难民问题，发动“征台之役”，武装进攻中国台湾，经英国调停达成协议，迫使软弱的清政府承认其出兵是“保民义举”，赔款白银50万两。1870年3月，由内务大臣率领军队与警察强行进入冲绳，镇压了琉球王的反抗，将琉球改为冲绳县正式并入日本版图。软弱的清廷徘徊观望，举措无方，只好于同年8月由北洋大臣李鸿章请求美国前总统格兰特调解。对于格兰特的分割琉球建议，日本政府起初同意将冲绳群岛的宫古和八重山岛归属中国，其北划归日本。然而由于中国清朝政府软弱无能，对琉球鞭长莫及，日本终于将琉球完全侵吞。

在对南边海域扩张同时，日本又西侵朝鲜。日本视朝鲜为侵入东亚大陆的跳板，是利益线的“焦点”。曾于1882年、1884年两度策动兵变，均遭到朝鲜人民及中国人民的联合反击，虽攫获部分权益，但未能完全独霸朝鲜。1894年7月，日本再度借口朝鲜问题，发动了旨在吞并朝鲜，掠夺中国辽东等地的侵略战争，即“甲午战争”。通过这次侵略战争完全占领了朝鲜，割取了中国的辽东半岛（后经列强干预退还）和台湾、澎湖列岛，勒索赔款白银2.3亿两（包括中国赎回辽东半岛费），还取得了新的通商特权等各种

《日本历史》卷18，岩波书店，第137页。

山县有朋监修：《陆军省沿革史》，日本评论社，1942年版，第68页。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原书房，1966年版，第92页。

大山梓：《山县有朋意见书》，第119页。

藤村道生：《日清战争》中译本，第21页。

远山茂树：《日本近现代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中译本，第38页。

权益。

日本的军国主义凭借巨额的侵略战争赔款、新的殖民地市场及原材料的获取，在本世纪初完成了资本主义工业化，成了世界上新兴的帝国主义国家。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日本出兵最多，迫清政府签订《辛丑条约》，取得在中国天津与北京等华北心脏地区的驻兵权。其驻军称作“清国驻屯军”（后改称“中国驻屯军”）。紧接着日本发动了1904年至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在中国的领土上厮杀，夺占了俄国在中国东北南部的殖民权益，吞并了辽东半岛。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日本借口对德宣战，于9月派遣一个混成旅在山东半岛北岸登陆，旋即占领济南，夺取了胶济铁路经营权，攻占胶州湾，最后于11月7日攻占海军基地青岛。这样，日本军队控制了辽东、山东两大半岛，黄海几乎成了日本的内海，再加上在天津等地的驻军，渤海几乎被完全控制。中国京畿重地直接裸露在日本的兵锋之下。

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袁世凯政府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企图将中国完全变成日本的附属国。最后，迫使袁世凯承认了除第5条之外的所有要求。

1916年又发动了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同沙俄签订第四次日俄密约，妄图直接统治满蒙地区，虽未完全达到目的，但其在华的殖民势力得到进一步扩张。

通过上述侵略活动，日本成了在中国大陆拥有最大殖民势力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势力遍布福建沿海、长江中下游、华北各地。其中特别在东北地区，建立了以旅大为中心的关东州强大殖民机构。其主要组织机构有：

关东都督府，1905年设关东总督府，翌年改为都督府，设都督一人，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管辖关东州，掌管南满铁路。都督府下设民政部与陆军部，分管行政事务与军事。

1919年，改民政部为关东厅，长官以文官充任；改陆军部为关东军，司令官由现役陆军上将或中将充任，直属于天皇。关东军的设置强化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力量，并为其进一步扩张侵略铺平了道路。

南满洲铁路股份公司，简称满铁，正式营业于1907年4月1日，总部设东京，后迁大连。满铁的建立及其性质，正如其首任总裁后藤新平所说：“……不把满铁看成是一个营利的铁路事业，而拟使之成为帝国殖民政策或我帝国发展的先锋队，其本旨确实如此。”满铁除经营南满铁路各线业务外，还控制大连、旅顺、营口等港湾交通和进出口贸易，并广泛经管东北地区的矿山、金融、电业、农业、森林以及学校等各种经济、文化事业，例如抚顺的煤矿开采，鞍山的铁矿采炼等等。

1925年12月至1928年5月，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投资额14亿余日元，其中由满铁名义投资75150万日元，占其总额54%。满铁还要经营所谓“满铁附属地”，即南满各线路干线两侧各31米及车站附属土地，这使满铁铁路线成了一块独立的国土。满铁还担负了各种对华情报调查任务，建立有庞大的“满铁调查部”。法西斯头目大川周明曾在该部任职。满铁的情报活动为日军侵占东北、华北等地提供直接的情报服务。

鹤见佑辅：《后藤新平》卷2，第914页。

《现代史资料》11，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167页。 34，

此外，还有驻奉天总领事馆，始建于1906年，它以外交为掩护，从事各种公开的侵略活动与秘密阴谋活动，也是最早的对华侵略据点之一，臭名昭著的战犯土肥原贤二等就曾在该馆任职。

上述三家主要机构，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东北的三把刀子。它们之间的关系表面上各有归属，相互独立，但又互相勾结，互相补充，在日本军国主义实现其大陆政策方面，都有一部罪恶的历史。

二、日本的国防方针与侵华作战计划

（一）国防方针的制订及修改

1907年，日本政府和军部以天皇御批的形式，决定了《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其主要内容有：

第一，确立“攻势作战”原则，《国防方针》规定，“帝国国防将以攻势力根本宗旨。”从而正式将先发制人，不宣而战，突然袭击作为日本进行对外侵略战争的战略基本原则。

第二，强调重视初战，实行速战速决。这也是日军一贯的原则。《国防方针》规定，“要保持初战的强大威力，采取速战速决主义。”

第三，关于主要假想敌国，日本军国主义所确定的假想敌国是依据不同形势和不同的时代而不断变化的。1907年的国防方针所确定的头号假想敌是俄国，目的是维护并扩张日本在满洲等地的既得权益，设想的基本战场也是在朝鲜及中国的东北地区。在朝鲜被日本吞并后，中国的东北则继之成为其首要目标。中国在实际上是日本所认为的主要的战争对手。

日本的国防方针提出之后，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于1918年和1923年进行了两次修订。

关于对多国作战问题，在1918年的国防方针第一次修改中，提出要作对多国作战的准备，但又认为日本国力难于承受，应力争避免对多国作战。然而1923年的第二次修改，则制定了对以美俄中为作战次序的构想，从而确立了对多国的进攻作战原则。这也反映了日本对外战略的冒险性。

关于主要假想敌国，1923年第二次修改中规定：帝国国防方针应该立即以“防备与我有冲突的可能性且具有强大国力与兵力的美国为主要目标，对于与我接壤的中俄两国应以亲善之旨为用，但同时应经常保持对其震慑之威力。”在这里，中国在字面上是日本的第二号假想敌，其实，日军从来就是把中国作为其首要的进攻对象。即使是在构想对美、俄作战时，日本军部也在筹划着“平定大陆要域的所必需兵力的整备”，这些要域包括：“满洲、华北、华中各要域及华南一局部。”日本战犯铃木贞一在战后回忆说：日本陆军一直在“以对美俄中同时作战为中心而筹划方案。”对日本来说，无论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军战备》，朝云新闻社，1979年版，第60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战史丛书·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159页。

〔日〕《陆军军战备》，朝云出版社，1979年版，第93页。

〔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6页。

〔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7页。

对美、对俄作战，日本都要筹划其“不足资源需在中国寻求。”无论日本的国防方针怎样改订，中国都是日本军国主义首要的侵略对象。

（二）侵华作战计划

根据上述国防方针，日本于1925年制订了1926年度作战计划，其兵力计划动员32个师，其分配是：对美作战3个师又1个支队，对俄作战13个师又1个支队，对华作战16个师。分别占9%、41%和50%。从兵力分配看，其作战重心在对华作战。而对俄作战的大部分兵力也还是以中国东北地区为作战基地。

在对华作战计划中，其兵力分配用于京津及山东方面作战7个师，多于其他方向。其具体计划和兵力分配是：在东北方面，部署关东军5个师，首要目标是“平定”南满洲及北满一部，重点以间岛（延边）地区及南满铁路沿线，大致以嫩江以南之四（平）洮（南）线、辽东半岛地区为第一阶段作战目的，在其他地区的兵力行使，则依具体情况相机而定。

在华北的京津、山东方面，设置一个方面军，2个集团军共7个师，准备在秦皇岛、塘沽，天津及山东半岛以足够兵力登陆，占领河北及山东要地。

在华东华中的上海、汉口方面，派遣1个集团军共3个师，在上海附近的扬子江岸选定登陆地点，其作战实施应依据具体情况而走。

福建方面，派遣台湾军1个师，依具体情况相机处置。

1926年度作战计划成了1931年日本侵华作战的蓝本。在这期间日本还筹划了在对中国的心脏地区汉口的进攻作战，其方案是“根据情况，以华北驻屯军沿京汉线南下与沿扬子江西进的华东军相互策应，进行在汉口附近的作战”，为完成这一计划，1925年由日军参谋部作战科长烟俊六上校为团长，纠集各主管作战、要塞、船舶等方面的参谋人员及陆军省、海军方面的官员，用一个月左右时间，对汉口等地区进行了现地侦察。

（三）东方会议及《田中奏折》

1927年6月27日，日本在东京召开了东方会议，讨论中国局势，以进一步制定侵华政策。会议由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与会的有外务省、关东军、陆军省、参谋部、海军省、军令部等各方面官员，会议历时10天，7月7日，由田中宣示了8条《对华政策纲要》，以作为会议的决议。其内容摘录如下：

“五、此间常由不逞分子乘中国政情不稳，猖狂扰乱治安，而有惹起国际不幸事件之虞，……帝国在华权益及日侨生命财产有受不法侵害之虞时，除根据需要采取断然自卫措施予以维护外，别无他法。

尤其对捏造虚构日华关系流言，挑起排日抵制日货之不法活动，固应解除其疑惑，但为维护我之权利，须进而采取适当措施。

六、对于满蒙，尤其东三省地方，因与我国防及国民生存具有重大利害

〔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出版社，1974年版，第249页。

据〔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301~302页计算。

〔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60页。

关系，我国不仅必须予以特殊考虑，且该地区维持和平、发展经济，使之成为内外人士安居之所，作为接壤之邻邦，尤须具有责任感。

七、（本项不予公布）

……东三省有力者中，对尊重我在满蒙之特殊地位，认真谋求该地方政局之稳定者，帝国政府应予以适当支持。

八、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紊乱，有侵害我在该地特殊地位及权益之虞时，不论其来自何方，均应加以防护，并须做好准备，为保护内外人士安居与发展之地而不失时机地采取适当措施。”

上述决议乃公开文件，用语经过了仔细斟酌，尽量带上温和色彩。但是，其中所强调要“断然自卫”、“采取适当措施”，宣布在满蒙有“特殊地位”，并要支持满蒙地区中依附日本的“有力者”作为傀儡等，已经清楚表明了日本企图分割满蒙，扩张在华权益的侵略方针。

除上述公开的决议外，首相田中义一在会后根据会议内容起草了一份奏折，于7月25日呈送天皇，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奏折中说：

“对满蒙之积极政策

“所谓满蒙者，乃奉天，吉林，黑龙江及内外蒙古是也，广袤七万四千方里，人口二千八百万人。较我日本帝国国土（朝鲜及台湾除外）大逾三倍。其人口只有我国三分之一。不惟地广人稀令人羡慕，农矿森林等物之丰富，世之无其匹敌。……故历代内阁之施政于满蒙者，无不依明治大帝之遗训，扩展其规模，完成新大陆政策，……惟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倘支那完全可被我国征服，其他如小中亚细亚及印度南洋等，异服之民族必畏我敬我而降于我，使世界知东亚为我国之东亚，永不敢向我侵犯。此乃明治大帝之遗策，是亦我日本帝国之存立上必要之事也。……考我国之现势及将来。如欲造成昭和新政，必须以积极的对满蒙强取权利为主义。以权利而培养贸易，此不但可制支那工业之发达，亦可避欧势东渐，策之优，计之善，莫过于此。我对满蒙权利如可真实的到我手，则以满蒙为根据，以贸易之假面具风靡支那四百余州；再则以满蒙之权利为司令塔，而攫取全支那之利源。以支那之富源而作征服印度及南洋各岛以及中小亚细亚欧罗巴之用，我大和民族之欲步武于亚细亚大陆者，握执满蒙利权乃其第一大关键也”。

在东京的东方会议之后，为了加快实行侵略计划的步伐，同年8月15~21日，日本又在中国旅顺秘密召开了第二次“东方会议”。由日本外务省次官森恪主持，驻华公使芳泽谦吉，关东厅长官儿玉秀雄，驻奉天总领事吉田茂，以及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等人参加。会议针对侵略中国东北的具体步骤进行了策划。

东方会议是日本将对外侵略的大陆政策进一步发展和具体化的重要会议，它将日本的对外侵略路线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日本侵华史上一个重大事件。会后，《田中奏折》及其侵略计划，于1929年12月被中国南京出版的《时事月报》杂志揭露，立即引起世界各国的重视。1931年11月，英、美、苏各国报纸均披露了《田中奏折》，日本的当权人物慌忙通过舆论工具矢口否认。但是，正如日本战犯重光葵所供认“要想消除外国对这一文

〔日〕《大本营陆军部》1.第276~277页。

《时事月报》第1卷第2期，南京版，1929年12月。

件存在的疑心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以后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发展，正是按照这一轨道而运行的。

三、日本国内危机与法西斯势力的崛起

（一）日本国内危机加剧

日本经济的发展是建立在侵略战争的基础上的。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从中国掠得的巨额赔款作准备金，于1897年10月开始实施金本位货币制度，完成了金融体系的近代化改造，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产业革命。甲午战争前日本各公司资本只有6785万日元，但战后的1897年增为53252万日元，增长近7倍。到本世纪初，其公司总数的84%，工厂总数的50%，是在1894年之后建立的。在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中，又暴发横财。其黄金储备1914年还只有34100万日元，1920年增为217800万日元，增长5倍多。

在一战前的1912年日本负有19亿日元债务，战后不但全部偿清，且进而成为拥有27.7亿日元的债权国。

日本军国主义专靠战争掠夺而致富，这种暴发经济具有很大的虚弱性，潜伏着巨大的危机。虽然重工业为战争需求而畸形发展，但基础工业和轻工业相对落后。农村中仍处于寄生地主制统治之下，农业生产力很低，生产规模小，破产农民不断增加，城乡人民生活贫困。

1923年9月1日，东京地区发生7.9级大地震，死伤失踪共达246531人；房屋毁坏共计701627户，受灾总数达340万人。造成空前严重的损害，同时亦对日本的社会、经济、政治带来了巨大影响。

震灾发生后，以政府的救灾票据问题为中心，引发了1926年和1927年的金融危机。这时，中国的北伐战争顺利推进，又对日本发生巨大影响。

1926年日本对华输出由1925年的4.85亿日元降低到4.21亿日元，减少约12.5%。

1927年3月21日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日本的股票市场立即暴跌；4月3日由于日本陆战队的挑衅，发生了同中国民众冲突的汉口事件，日本股票跌落更甚。金融危机爆发，东京和横滨许多中小银行，接连不断地被迫歇业，有名的台湾银行也陷入窘境，濒临破产。这次危机使日本银行停业31家，资金达17845万日元，而前一年末的储蓄存款总额不过77563万日元。这次金融危机使广大中小银行遭受沉重打击，日本于3月29日公布《银行法》（1928年1月1日实施），对中小银行进行了整顿，促进了大银行资本的兼并与集中。

1929年10月，自美国首先爆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使尚未从金融危机中恢复过来的日本经济受到了新的冲击。日本政府1929年11月宣布自1930

重光葵：《重光葵著作集》1，第15页。

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0页。

守屋典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东京青木书店，1955年版，第103页。

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

土屋乔雄：《日本经济史概况》，第186~187页。

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商务馆，第174页。

年1月11日开始实行“黄金解禁”，试图促进出口，振兴经济，同时实行通货紧缩政策，借以摆脱危机。然而“黄金解禁”带来相反的结果，黄金外流1930年达27552万日元，1931年外流43310万日元，不得不于1931年12月再度决定禁止黄金输出。另一方面，通货紧缩又招致生产萎缩，原材料价格猛跌。据统计从1930年6月到1931年6月，原材料下跌21.6%，生产资料下跌29.3%，消费资料下跌16.7%。从股份市场看，以1924年1月的股票价格指数为100，则1929年6月为104，1930年6月下跌到74，同年10月进一步跌到63。危机还进一步使日本金融业遭受打击，据大藏省调查，全国普通银行774家之中，有58家被迫停业。许多中小资本被兼并或削弱，1930年至1931年减削资本总额达73000万日元，被解散公司资金达104000万日元。大量工人失业，工资指数急剧下降，而一些大公司垄断组织资金膨胀，卡特尔和托拉斯进一步发展，危机还波及到日本的海外殖民地与半殖民地，满铁的收入也急剧减少，1931年还出现了创建以来的第一次赤字现象。

与上述经济危机同来的是日本的社会政治危机。1923年9月1日大震灾发生之际，日本政府为了巩固其统治，加紧镇压异己。9月2日首先在东京部分地区实行戒严，4日扩大到埼玉、千叶两县，出动兵力达5万人。许多进步人士和外国侨民遭到逮捕杀害。

1925年，日本通过了治安维持法，加紧对民众的政治控制，各政党也日益陷入危机，1928年3月15日至翌年4月，日本政府实行“大检举”，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及其他社会主义革命分子、工农运动积极分子，实行白色恐怖，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1928年，工人斗争总数为1021起，参加人数1.2万人，1930年为2289起，参加人数19.2万人。佃农斗争1928年发生1866起，1930年达2478起。有的甚至发展为武装暴动，通过斗争发展了农会组织及许多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左派组织，如1926年建立了“劳动农民党”，1928年建立了“全国农民协会”等。

面对上述经济政治危机，日本统治阶级一方面在国内实行恐怖政策，加强镇压和控制，另一方面煽动对外的掠夺战争以转移国内矛盾。一时间在日本的军界、政界及财界，战争呼声甚嚣尘上，军政当局及民间法西斯分子纷纷抛出各种侵华战争方案、计划。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1931年5月29日发表对各部队长官训词中，即公开提出进攻中国的主张：“环顾目前帝国情势，国难内外交逼，国家前途确实令人忧虑难当。要很好地打开这一现状以谋国运的发展，妥善处置将来世界变局而维持东洋永远和平。以此确保帝国高远使命其必然之路，第一步应该是根本解决满蒙问题。”

（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崛起

1919年，与意大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组织出现的同时，日本法西斯的鼻祖北一辉，写出了《国家改造案原理大纲》（1923年发行时改名《日本改造

梶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7页。

梶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东京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第166~167页。

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卷，第225页。

梶西光速、大岛清等著：《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第220页。

小林龙夫、岛田俊彦编《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5页。

法案大纲》)，要求对日本实行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翌年，北一辉与大川周明组建了日本第一个法西斯团体“犹存社”，该社以北一辉的《大纲》为指导纲领。他们的根本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专制，要“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下之政党政治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之皇国政治。”在犹存社的基础上，又派生出了众多的法西斯团体，如行地社、大化会、大行社、白狼会等。大川周明同军部要员往来密切，他主持“大学寮”，为军部培养法西斯主义对外侵略活动的骨干分子，培训出的学员大多分配到中国、朝鲜等国家从事侵略活动，大川周明还经常去陆军大学、陆军士官学校讲课，灌输其扩张理论，煽动军队内部的法西斯活动。

军队中的法西斯势力，是推进日本法西斯运动的主要力量。1921年，三名赴德国考察的青年军官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冈村宁次在莱茵河畔的巴登巴登温泉聚会，订立盟约，决意回国后将全力推动日本的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改造。东条英机随后也参加了聚会。这就是所谓的“巴登巴登密约”。

1923年永田铁山等人归国建立了二叶会。以后，军队中的法西斯运动，在20年代日本的政党政治发展、经济危机加深的情况下，也日益加速发展起来。1927年，由北一辉的信徒西田税等人筹建“天剑党”，1930年，参谋部幕僚派少壮军官以桥本欣五郎为首建立了“樱会”，海军中也建立了“王师会”等。与二叶会活动的同时，有由铃木贞一、石原莞尔等人组建了“木曜会”，其后与二叶会合流，于1929年5月19日成立了“一夕会”。法西斯一夕会所奉行的是一条上层路线，他们以和平渗透手段相互提携，控制了陆军省、参谋部、教育总监部、航空部、内阁资源局、关东军等许多要害部门的实权职位。永田铁山、东条英机、板垣征四郎、冈村宁次等人，都先后成了日本军政首脑人物。

日本的法西斯力量从其形成之日起，就是日本最活跃的侵略战争论者。

1919年北一辉首先提出了日本的“生存空间”问题，他比希特勒早出好几年地强调人口增长与领土关系的矛盾，他要求建立一个囊括中国东北和内蒙东部、苏联西伯利亚与远东地区，及英属澳大利亚等广大地域，即包括所谓“北俄南澳”的大日本，“使后世史家叹赏这是黄人罗马帝国。”石原莞尔则鼓吹：“战争破坏文明，同时又是新文明诞生之母。”

军部法西斯势力的崛起，加剧了日本国内政治的冲突和变化。法西斯势力为推倒代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主义的政党政治，建立专制和独裁，推行对外侵略政策，发动了一系列阴谋事件和政治事变。在20年代末日益严重的政治经济危机中，他们经常发布“怪文书”，攻击政党内阁。北一辉还利用伦敦裁军条约问题提出了“干犯统帅权”的说法，与军部的死硬分子沆瀣一气，攻击政党内阁的协调外交，最后导致滨口首相被刺杀，助长了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大川周明则伙同军队法西斯团体“樱会”头目桥本欣五郎等人，在1931年筹划了两起未遂政变。上述军队的法西斯运动，为后来法西斯国家体制的确立打下了基础。

30年代初，日本军部法西斯势力分化成两大派。在由少壮军官组成的“皇

大川周明：《日本文明概说》，东亚会社，1939年汉文版，第168页。

今井清一：《日本近现代史》第2册，第187页。

〔日〕《北一辉著作集》第2卷，美铃书房，1959年版，第223页。

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58页。

道派”大肆活动的同时，由军队幕僚派所组成的“统制派”，亦从1930年伦敦裁军会议后分化出来，并以更加隐蔽的手法，推动着日本自上而下的法西斯化。他们的目标是建立法西斯主义的以军部为核心的“统制主义”政治和“统制经济”体制；他们所主张的国家改造的基本手段，是对外侵略战争，并以中国满蒙为首要目标。

1928年1月的法西斯“木曜会”第三次聚会上，东条英机、石原莞尔等人相互盟誓要夺取满蒙。他们认为在“国内改造之前应积极迅速地解决满洲问题”。

20年代新兴的日本法西斯主义，对于加速日本的战争准备起了重要作用。它是推动日本对外扩张进行侵略战争的基本力量之一。而对外侵略战争，又反过来推进了法西斯化的进程，使其确立了日本的法西斯体制，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完成了政治准备。所以，法西斯与对外侵略战争这两方面相互促动，相互补充，使日本给亚太地区包括日本人民在内，造成了一场空前的历史灾难。

四、日本的对华战争挑衅

20年代，正当中国处于急风暴雨式的革命发展与复杂多变的政治局势之时，日本田中首相推行对华强硬路线，即所谓对华“积极外交”，试图利用中国的变局，夺取更多的殖民权益，对中国进行了一系列的战争挑衅活动。

1927年5月，国民革命军攻占长江一线，北洋军阀势力败退山东、河北等地。为日军所支持的张作霖、张宗昌等人的地位岌岌可危。日军借口侨民问题，由5月27日内阁会议决定，调驻东北的第10师第33旅出兵山东，另由海军编成第2遣华舰队在山东海面协同。7月5日，正在召开臭名昭著的“东方会议”的日本内阁决定，直接侵占济南。这就是第一次出兵山东事件。1928年4月，国民党政府再度宣布“北伐”，又一次受到日本干预。日本调驻天津的中国驻屯军组成临时济南派遣队，于4月20日进驻济南，另调国内的第6师(师长福田彦助中将)到山东，先头部队于4月25日在青岛登陆，先于国民党军侵入济南。5月1日，国民党军一部进入济南，但主力却于5月5日绕离济南继续“北伐”，避免同日军接触。为扩张在山东等华北地区的权益，用武力震慑中国，日军蓄意制造流血事件，其参谋总长对福田师长的作战命令中说：“对中国军队的停战，必须以显扬国军威信并根绝祸因为条件。”3日，日军便对少量中国守军与和平居民进行大屠杀。日军不顾国际外交惯例，冲进国民党战地政务委员会外交公署，抓捕并捆绑南京政府新任驻山东特派交涉员蔡公时等人。蔡据理抗议，驳斥日军的野蛮行径，竟被日军惨无人道地割去耳朵、鼻子后，加以杀害，随员遇难者共达17人。日军还烧毁了外交公署办公楼。5月7日，日军向中国提出“禁止南北两军在商埠地区及胶济路沿线二十华里以内驻扎”等6项条件，限12小时答复。由于中国军队主力早已于两日前北上，日军便借口没有得到中国政府答复，于翌日再次进行大屠杀。5月9日日本向济南增派第3师，5月11日完全占领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页。

信夫清三郎：《日本外交史》下，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中译本，第531~532页。

济南。日军的暴行使千余家房屋烧毁，中国军民死 6123 人，伤 1700 人。但蒋介石却下令“忍辱负重”，撤出济南，绕道北上。面对国民党南京政府的妥协政策，5 月 16 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关于维护满洲地方治安的处置案》，并于 5 月 17 日向中国方面发出照会，声言：“当战乱发展至京、津地区，其祸乱将及于满洲之际，帝国政府为维持满洲治安起见，不得不采取适当而且有效之措施。”与此同时，向驻旅顺的关东军司令部发出了进兵奉天的命令。

1927 年 6 月，张作霖出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军阀最后一任总管。但张在全国反帝浪潮的冲击下，不愿意永远充当日本的走卒，对日本在东北的筑路、开矿、租地等无理要求，未能全部满足，并有所抵制，日本遂决定除掉张作霖，另选傀儡。1928 年 6 月 4 日，日军在皇姑屯附近的京奉铁路与南满铁路交点上安放炸药，炸毁退向关外的张作霖的列车，张受重伤不久死去。奉系军阀封锁死讯，声称张只受了轻伤。日军不知虚实，未敢贸然行动。奉军“少帅”张学良秘密返回沈阳，在张作霖等人支持下，于 7 月 3 日就任东北保安总司令，控制住了局势。

8 月，日本利用张作霖丧事，派遣曾任过驻华公使的林权助为吊唁专使，到沈阳活动。林权助同日本驻奉天总领事林久治郎等人多次威胁张学良：如果“与暴乱的南方达成妥协之类事情，为了维护我国既得权利，则将不得不采取必要的行动。”张学良集国难与家仇于一身，坚持和南京政府谈判统一问题。南京国民政府在与张学良交涉的同时，电告驻日公使，令其抗议日本驻奉天领事干预中国内政。

美国驻华公使马克谟也亲自到沈阳，在美国领事馆会见杨宇霆，支持张学良归顺南京。最后，南京政府终于和东北当局达成协议，1928 年 12 月 29 日凌晨，由张学良等人联名正式通电全国，服从国民政府，改易旗帜。

东北地区的局势演变，打破了日本侵吞东北的美梦。田中的“积极外交”遭受挫败，田中引咎辞职，而军国主义势力却更为猖獗，河本大作供认：皇姑屯事件之后，“我把石原弄到关东军来做我的助手。从那时起我已拟定了满洲事变的计划”。日军的侵略战争准备，继续加紧进行。

此据国际红十字会济南分会调查统计。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下），第 116 页。

白井胜美：《日中外交史》塙书房。1971 年版，第 139 页。

森克卫：《满洲事变内幕史》，第 279 页。

第三节 “九·一八”事变前的中国

中国是世界上文明发达最早的国家之一，但由于封建专制主义的长期束缚，特别是清朝政府的腐朽统治，逐渐落后于世界，19世纪后半期，遭受西方列强入侵，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华民族又是一个富于革命传统的伟大民族，在近百年忧患之中，涌现了无数的仁人志士，掀起了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浪潮。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给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因此，中国又是一个除旧布新、面向近代化发展的新兴国家。有如西方明眼人所预见，中国这头睡狮正在觉醒。日本的侵华战争和中国人民的抗日自卫，正是在这积贫积弱与变革发展的双重因素作用下发生的。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社会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形成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受尽列强的野蛮侵略。

1840年英国发动鸦片战争，1856年英法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1884年中法战争，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及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战争，腐朽的清王朝在这些战争中屡屡失败，被迫签订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清王朝为保住自己的统治，竟不惜公开宣谕“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人民遭受到空前的困苦，国家陷入严重的危局。到本世纪初，国土瓜分豆剖，大部被划入各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沙皇俄国控制了蒙古和半个东北；日本在割占台湾之后，又进据福建和东北南部；法国侵入广东、广西及四川、云南等地；英国割占香港之后渗入长江流域等大半个中国，并武装侵略西藏；德国进入山东；葡萄牙割占澳门。美国虽没有控制到多少地盘，却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要求在中国实行“利益均沾。”

列强还在中国沿海各大城市或通商口岸掠取所谓“租界”，租界由列强管辖，可以任意使用或转租他人，实际上是一块块的“国中之国”。到本世纪初，租界遍布广州、厦门、天津、汉口及九江等许多重要的通商口岸，仅上海一地就被英、美、法等国租占地方约6万亩。

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掠夺是极为贪婪和多方面的。首先是赤裸裸的战争掠夺，通过五次大的战争，英、法、日本等国共勒索中国赔款本息共12.79亿银两。其次是非法的掠夺性的鸦片贸易，到1914年，列强利用鸦片贸易所掠取的利润总额达20亿银两，约合15亿美元。

依据协定关税等不平等条约，实行对华不平等贸易，也是列强进行经济掠夺的一个重要方面。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前，列强以商品输出为主要手段，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造成中国连年入超。据统计自1895年到1927年的33年间，入超总额达37亿海关两，平均每年损失外汇达8000万银两之巨。到本世纪初逐渐转为资本输出为主，投资额逐年递增，1902年为15亿

清政府“上谕”（1901年2月14日），中国史学会编《义和团》第4册，1957年版，第87~89页。

蒋建平：《简明中国近代经济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26~127页。

陈绍闻等：《中国近代经济简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0页。

美元以上，1914年为22亿美元以上，1930年接近35亿美元。而各国对华投资，资金大部又来自对中国的直接掠夺。

列强利用借款和投资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矿山、冶金、交通等经济命脉。在财政方面，列强以借款担保等名义，控制了中国当时的主要财政收入渠道如关税、盐税与田赋，从而完全控制了中国的财政。在金融方面，利用在华投资大办银行，至1913年在华新设银行13家，分支机构85处，到1926年，有外资银行65家，分支机构226处。1931年，中国华资银行29家，资金总额却只及外资银行的1/4。矿山方面，列强迫中国订立各种条约、合同和协定。例如煤业，列强的投资占全国煤炭总投资比例，1919年为60.6%，1926年为72.1%，其中机械采煤量更占90%以上。冶铁业，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只有两家新式冶铁厂，其一是汉阳铁厂，日产铁650吨，为日本借款所控制，另一家合兴铁厂属中国资本，但日产仅12吨。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夕，全国铁产量连同土法生产量在内，70%为外资控制。在交通运输方面，铁路几乎全部为外国资本所控制。到1927年，共建有铁路13040.48公里，而列强直接经营和控制的达11996.54公里，占92%，中国自主的仅1043.94公里，只占8%。水上运输，出入各通商口岸中外轮船吨位对比，到1930年，中国船只占18.8%，外国船占81.2%。此外，列强还在中国各地开办教堂，派驻传教士，开办学校，实施文化侵略，推行奴化教育，培养其代理人。

鸦片战争之前，中国封建社会内部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鸦片战争后，随着各资本主义国家的商品和资本大量涌入，进一步打破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在客观上刺激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但在外国资本侵夺与官僚资本的压榨之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发展缓慢而畸形。从行业上看大多集中在投资较少、规模较小的轻、纺工业部门，机器大生产程度低，商业资本远较产业资本额大；从地域上看，大多集中在沿海及各交通口岸，广大内地和农村仍然是自然经济占据主导地位。在农村，地主占有大多数土地，农民交租量达5成至8成以上，赋税沉重，甚至预征多年，1926年四川样桐预征税已征到1957年。人民生活困苦，衣食尚无保证，更无力改良土壤和改进生产工具。故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文化极端落后，商品经济很不发展。落后的自然经济与封建政治势力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的进步。而列强则竭力维护中国的封建制度，压制中国的民族资本，扼杀中国的革命。中国虽然形式上还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但实质上已沦为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共同支配和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二）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与北洋军阀统治

中国人民富于革命传统，既不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也不甘居于反动阶级的封建统治。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总是与封建统治的压迫相结合，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52页。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第134页。

严中平：《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32~133页。

严中平：《中国近代史统计资料选集》，科学出版社，1955年版，第199页。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97~98页。

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成了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并给中国人民的革命斗争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的双重任务，这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内容。

自 1840 年反对英国侵略斗争开始，中国人民曾先后发动太平天国运动、戊戌变法运动、义和团运动等。这些运动虽然都归于失败，但对于推进革命形势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特别是 1911 年爆发的资产阶级的“辛亥革命”，将中国的旧民主革命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峰。

辛亥革命是在中国社会矛盾普遍激化的背景下，由孙中山等人领导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同盟会”等组织经过多年准备爆发的。1911 年四川、广东和湖南等地人民的“保路运动”揭开序幕，10 月 10 日，武昌起义取得成功。12 月初，革命派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临时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变革措施，于 1912 年 3 月颁布了中国第一部具有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数千年的封建帝制，极大地冲击了封建专制主义，为近代中国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历史变化。

但是，中国是一个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农业国，封建专制主义的根基雄厚。近代工业很薄弱，民族资产阶级十分弱小，农业人口占据了社会人口的绝大多数比例。孙中山等人所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辛亥革命虽然取得了一时的成功，随即在帝国主义支持的封建官僚、军阀等保守势力的联合反扑下遭受失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总统职，由封建买办官僚的代理人、大野心家袁世凯窃取了政权。袁世凯上台后，对外实行卖国主义，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对内实施专制独裁主义，镇压了国民党的“二次革命”，并于 1915 年末演出了一幕复辟帝制的丑剧。中国人民掀起了“护国战争”，讨伐袁的倒行逆施，迫使袁世凯放弃称帝并在忧惧中死去。此后，北洋军阀分裂成三大派，皖系段祺瑞、直系冯国璋和奉系张作霖，分别在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各霸一方，横征暴敛，连年混战，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给人民造成无穷的灾难。

1917 年 8 月，孙中山曾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集合南方军阀势力讨伐北洋军阀，一度出现南北对峙局面。但西南反袁势力很快与北洋军阀实行妥协，护法运动宣告失败。孙中山愤然辞去护法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职，回到上海。护法运动的失败进一步证明，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强大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政治经济力量软弱的资产阶级，不可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中国革命必须要有新的领导阶级，走新的革命道路。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展

（一）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加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使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一度得到发展，从而使资产阶级以及其他各派政治力量更加活跃起来。

1919 年中国产业工人数量达到 200 万，交通、邮电等部门工人约 100 万，此外还有大量的工场手工业工人，中国工人阶级作为社会新生力量的迅速发展，为中国社会变革开创出了新的局面。

1915年9月15日，由陈独秀主办的《青年》杂志（翌年9月改名《新青年》），在上海创刊，揭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是杰出代表。新文化运动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革新政治，改良社会，发展现代文化的要求，在1916年袁世凯死后和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推动之下，曾得到很大发展。新文化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封建的专制主义、伦理道德和迷信愚昧，大力宣传了民主和科学；强调人权平等及思想自由，破除了封建主义的束缚，形成了空前的思想解放潮流，促进人们寻求革命真理改变现状，并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创造了条件，为五四爱国运动的发动作了舆论和思想准备。

当巴黎和会召开之际，中国各界人士曾寄予莫大希望，认为和会可使中国“稍挽百十年国际上的失败，”“固为我国之大幸”。但是，巴黎和会在实际上是战胜国宰割战败国，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强国瓜分世界的分赃会议。中国提出的修改不平等条约，收回山东主权等正当要求被完全否定。1919年4月30日，和会对德和约有关山东问题的条款正式议定，由日本接收山东权益。5月1日，中国《大公报》首先报道：“政府接巴黎中国代表团来电，谓关于索还胶州湾租借地之对日外交战，业已失败。”其余各报相继作了报道，全国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高等师范等13所北京高校学生3000余人首先到天安门举行游行示威，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誓死争回青岛”等口号。北洋政府立即出动军警，逮捕爱国学生30余人。5日，北京全市学生实行总罢课。6月5日起，上海工人阶级走上街头，商界随后也举行罢市，使运动迅速进入了全国性的工、学、商联合斗争的新阶段。江苏、四川、广东、河南等20余省及天津、杭州、成都、昆明、沈阳、兰州、广州等100余个城市的工人、商人参加了罢工、罢市。据不完全统计，自1919年至1921年，全国罢工达161次参加约24万余人，在当时民族工业还很弱小的情况下，年轻的中国工人阶级已经成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力军。

全国人民爱国运动的浩大声势，迫使北洋政府不得不释放被捕学生。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三人职务。在巴黎的中国使团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至此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五四运动后期，运动的主题已不再局限于巴黎和会上的山东问题，而是在新文化运动基础上，发展成为一场新的以宣传马列主义和各种社会主义观点为主要内容的思想解放运动。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建立学会、书社等群众组织，主编进步报刊，介绍十月革命的情况，宣传社会主义思想，加速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五四运动杰出的历史意义，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过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对封建主义。在五四运动中，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作为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中国历史的舞台，成为运动的主力。五四运动表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由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逐渐发展到以工人阶级为主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新阶段。五四运动为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产生，作好了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上海《民国日报》1919年1月5日。

《时事新报》1919年2月11日。

（二）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工农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

在五四运动时期，各地相继建立了若干共产主义小组，列宁所领导的共产国际，派代表维金斯基（化名吴廷康）来华帮助。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创立了中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随后，李大钊、邓中夏等在北京，董必武、陈潭秋等在武昌，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烬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陈公博等在广州相继成立共产主义小组。此外，周恩来、赵世炎等在法国巴黎，施存统、周佛海在日本东京，分别成立了旅欧和留日共产主义者小组。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产生，为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共产党组织创造了条件。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上海秘密举行。由7个地区共产主义小组选派毛泽东、董必武、李达、张国焘等12名代表参加了会议。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尼柯尔斯基也出席了大会。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党纲，确定党的奋斗目标是在中国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实现共产主义。党纲规定了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党的纪律，并确定当前把组织和领导工人运动作为党的中心工作。大会选举陈独秀为中央局书记。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党的革命纲领。大会宣言指出：中国社会的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党的总任务是“要组织无产阶级，用阶级斗争的手段，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当前最近迫切的任务是：“一、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二、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三、统一中国本部（东三省在内）为真正民主共和国”等12条。

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以共产主义为最终目标的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的成立，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在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各族人民指明了革命胜利的方向，中国革命开始出现新的面貌。

为了领导工人运动，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由张国焘、邓中夏等负责。在湖南、湖北、山东、广东等地设有分部。1922年5月，在广州召开了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中共还选派了优秀党员深入工农群众，领导工人组织工会，开展斗争，使工人运动迅速发展。自1922年1月到1923年2月，全国罢工斗争达100余次，参加罢工人数超过30万人，形成了中国现代史上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由于遭受到北洋军阀政府的残酷镇压，在“二·七”大罢工后，工人运动暂时转入低潮。

1925年5月1日，全国第二次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全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总工会章程，成立了以林伟民为委员长、刘少奇为副委员长的全国总工会，为全国工人运动的重新高涨作好了组织准备。紧接着，以日本资本家在上海枪杀中国工人顾正红为导火索而爆发的反帝大示威，遭到英国巡捕暴力镇压，成为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在上海市总工会领导下，上海20万工人举行总罢工，5万学生罢课，大部份商人罢市，反对帝国主义暴行。随后得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77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第36页。

到各地罢工、罢市、罢课斗争的支持，形成了全国反帝斗争的新高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是香港和广州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这次大罢工前后坚持1年零4个月，它沉重地打击了英帝国主义等列强，是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时间最长的一次大罢工。

在领导工人运动的同时，中共还重视了对农民运动的领导。由彭湃、毛泽东等人领导的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从1924年至1926年9月，先后举办6届，共培养农民运动干部797人。广东农民运动迅速发展，到1926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共有62万余人，农民自卫军3万人。由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湖南农民运动，到1927年1月，农民协会会员已由1926年6月的3.8万人猛增到200余万人，与此同时，湖北、江西、福建、浙江、河南等省的农民运动，也开展得轰轰烈烈，各地农会成立了“梭镖队”等组织，有力地打击了封建势力。

1927年2月12日，毛泽东写出《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充分肯定了农民在中国革命中的伟大作用，总结了湖南农民运动经验，进一步推动了全国农民运动的发展。1927年3月，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在武汉成立，毛泽东、邓演达、彭湃、方志敏等13人被选为执行委员，农协组织已遍及全国17个省。至6月底，全国农协会会员已达945万人。

蓬勃发展的全国工农运动，其斗争矛头直指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直指封建阶级的反动统治。1927年1月，英国侵略者迫于声势浩大的反帝群众运动，不得不将汉口、九江英租界交还中国。1926年10月和1927年2月，上海市总工会两度发动全市工人罢工并发动武装起义，配合北伐军推翻北洋军阀在上海的统治，遭受失败。这时，周恩来到达上海，担任中共上海区委（江浙区委）军事委员会书记。3月21日，周与罗亦农、赵世炎等人组织了第三次大罢工并转入武装起义，参加群众达80余万人，经过30多小时血战取得胜利。于3月22日召开上海市人民代表会议，宣布成立人民政权机关——上海人民临时政府，迎接北伐军顺利进入上海。在工农运动的普遍发动中，人民群众经受了反帝反封建民主革命的洗礼，民族的觉醒已进入新的时期。

三、国共合作与北伐战争

（一）国民党改组与第一次国共合作

孙中山领导反对北洋军阀的“第一次护法运动”遭受失败后，于1921年5月5日再度到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发动了第二次护法运动，但由于陈炯明叛变又归于失败。在这屡遭挫折，一筹莫展之际，孙中山开始得到了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

继1922年6月的杭州西湖会议之后，中共于1923年6月在广州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讨论了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合作建立统一战线问题。会议决定，共产党员可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帮助国民党改组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但同时保持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孙中山接受中共建议，并在中共的帮助之下完成了改组的准备工作。

1923年11月，正式发表《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和党纲草案。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代表165人，其中共产党员23人，占代表比例11%。大会通过了国民党新的党章、党纲和改组的具体办法；通过了宣言，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大会决定同意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正式决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改组后的国民党纲领，与共产党的最低纲领基本一致，成为国共两党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政治基础。大会选举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共产党员李大剑、谭平山、于树德等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瞿秋白、张国焘、林伯渠等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改组国民党，标志着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从此，国民党开始转变为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孙中山多年奔忙却屡遭挫折的局面得到扭转，中国的民主革命有了新的转机。

1924年5月，孙中山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之下，在广州黄埔创办了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培养军事干部。一批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被派到军校工作和学习，周恩来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肖楚女、聂荣臻、叶剑英等担任了各种负责工作。黄埔军校自1924年6月正式开学到1926年北伐战争前，共招收学生5期约7390余人，为建立广东根据地、平定商团叛乱和进行北伐战争，以及中国革命战争的进一步发展培养了大批武装骨干。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南方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革命形势不断高涨，北方各派军阀却在各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不断进行混战，先后爆发过1920年的直奉战争，1923年的江浙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1925年初奉浙战争，其间还有1924年冯玉祥在北京反直，1925年11月郭松龄反奉战争等。战祸连年，民不聊生。

1924年1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提出了“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及召开国民会议，统一全国的13项主张，得到孙中山支持。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主张召集国民会议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并带病北上，12月底到达北京，同北洋政府进行了斗争。1925年初，广东军阀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患病之机，发动叛乱，进攻广州，革命政府以黄埔军校学生军为骨干，组成东征军，两次东征，彻底消灭了陈炯明势力，巩固了广东革命根据地。同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将所辖武装力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南方革命形势得到巩固，为扫荡北洋军阀的北伐战争作了准备。

（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及蒋介石、汪精卫背叛革命

随着革命形势的高涨，统一战线内部斗争也日益尖锐起来。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国民党内部分化加剧。左派廖仲凯、宋庆龄等人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不久，右派暗杀了廖仲凯。蒋介石策划了1926年3月20日的“中山舰事件”，5月抛出“整理党务案”，排斥和打击共产党，并窃取了国民党中常委主席、组织部长和军事部长等大权。

1926年6月4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临时全体会议正式通过了出师北伐案，6月5日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7月1日发布动员令。

北伐军兵分三路：主攻一路指向湖南、湖北；一路指向福建、浙江；另一路指向江西。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主体组成的第4军叶挺独立团为先

锋，第4、第7、第8军等攻克醴陵、株洲、长沙等地后，随即攻入湖北，连克要隘汀泗桥和贺胜桥。

10月10日攻克武昌。另一路以李富春、林伯渠担任政治部主任等要职，并有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第2军和第6军，攻入江西歼灭了孙传芳主力，占九江、南昌要地。至此，北伐军歼灭了数倍于自己的吴佩孚、孙传芳两部北洋军阀主力，革命势力从广东扩展到长江流域。同时，退守绥远的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帮助下，于1926年9月17日率所部国民军在绥远五原誓师，挥戈南下，占领陕西，进军河南，策应国民革命军北伐。

北伐的胜利引起内外反动势力的恐惧，英、日、美等帝国主义除继续支持北洋军阀残余势力，进行直接的武装干涉之外，还分化破坏国民革命统一战线，暗中拉拢蒋介石作为它们新的代理人。蒋介石为谋求外国的“援助”以实现其军事独裁的统治，亦密谋和帝国主义勾结。在帝国主义、大资产阶级和流氓头目的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批屠杀和逮捕共产党员、工人领袖及革命群众。在江苏、浙江、广东各地亦进行了同样的逮捕与屠杀。7月15日，在武汉的汪精卫亦召开“分共”会议，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破裂。

四、新军阀的统治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继续

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实行“清党”与“分共”，国民党由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变成了一个代表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政党。其内部宁、汉、沪、桂等派系不断进行明争暗斗，蒋介石曾于8月暂行下野。1928年宁、汉、沪三派由对立转向合流。2月，国民党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改组政府和中央党部，由蒋介石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会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桂（系）四派达成暂时妥协，“并于4月发动讨伐奉系张作霖的“北伐”战争，张作霖被日本预谋炸死，张学良出任东北保安司令，改易旗帜，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在此之前，新疆也成立了以杨增新为主席的省政府，于6月20日宣布服从南京国民党政府。至此，国民党在形式上完成了全国范围内的统一。

这种形式统一，不久又告分裂，产生大规模的持续混战，先后发生1929年3月的蒋桂战争，10月的蒋冯战争，12月的蒋桂张（发奎）战争，1929年12月至1930年的唐（生智）石（友三）反蒋战争和1930年的蒋冯阎桂中原大战等。在这些混战中，由于蒋介石控制着中央政府，并得到英、美帝国主义和江浙财阀的支持，军事经济实力雄厚，又以进攻威胁与分化瓦解相结合，因而多以蒋的取胜而告终。

1931年5月，蒋介石召开“国民会议”，制订了所谓《训政时期约法》，为其军事专制披上了一层“合法”外衣。并依靠军警宪特的血腥屠杀，建立独裁统治，垄断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广大工人农民在大革命时期所争得的一切权利均被剥夺，工资待遇、劳动条件、生活条件及言论行动等各方面状况日益恶化。农民遭到地主豪绅的剥削，单是附加税，就超过正税“三十倍有之，二十倍者有之，十倍则普遍皆是。”

李作周：《中国的田赋与农民》《新创造》2卷1、2期，1932年7月。

蒋汪叛变革命后，白色恐怖一时笼罩中国。由于逮捕和屠杀，全国共产党员人数由6万人减少到1万人，工会会员由300万人减少到3万人，而农会会员大部分散失，革命转入低潮。1927年7月，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发动南昌起义，进行武装斗争。8月1日，在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下，2万余北伐革命军在南昌起义，一举攻占南昌，随后向广东等地转移。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和创建人民革命军队的开始。

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错误，决定了开展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并把发动农民举行武装起义作为当前主要任务。9月9日，毛泽东根据中共中央决定，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发动秋收起义。12月11日，由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张太雷及叶挺、叶剑英等人领导，举行了广州起义。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到达井冈山地区，随后与转战而来由朱德等率领的南昌起义部队汇合，逐渐发展形成联结赣、湘、闽、粤等省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辟农村革命根据地，这是一个伟大的创举，中国革命从此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正确道路。自1927年秋到1930年间，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各地农民武装起义还有：湖北、安徽、河南边界地区的农民起义，后来开辟成鄂豫皖革命根据地；方志敏、邵式平等在江西弋阳等地领导农民举行起义，后来建立闽浙赣革命根据地；贺龙、周逸群等在湖南、湖北西部发动起义，开创了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彭德怀、黄公略等领导湖南平江起义，创建了湘赣和湘鄂赣革命根据地；邓小平、张云逸等在广西左右江地区发动士兵起义，开辟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此外，粤、陕、川、苏、鲁、冀等省，也有共产党人发动起义，开展游击战争。全国共有300多个县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大小共15个革命根据地，全国工农红军发展到10万多人。

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使得国民党统治集团惊惶不安。他们不断地向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组织一省或数省的“进剿”、“会剿”，直至由蒋介石亲自指挥大规模的“围剿”，但总是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创建红军、进行土地革命战争，逐步取得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经验。红军不断发展壮大，基本形成了主力红军、地方红军和群众武装相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在巩固和扩大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中，把武装斗争这个主要形式和其他必要的斗争形式相结合，把武装斗争同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一切人民的斗争，同政权、经济和思想战线的斗争相结合，开创了人民战争的新局面。

蒋介石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实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独裁统治，对外投靠帝国主义，对内以新军阀代替旧军阀，对革命人民进行血腥镇压，企图扑灭革命的火焰。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民族民主革命的大旗，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屠杀，坚持革命事业，开展土地革命，使新民主主义革命进一步深入。在同蒋介石所发动的反革命内战的斗争中，毛泽东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战争的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建设新型的人民军队，实行人民战争，运用游击战和运动战的战略战术以不断歼灭敌人、壮大自己等一整套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原则，从而解决了怎样以弱小的兵力和劣势的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强大敌人这个复杂而困难的问题，为

指导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以及尔后的抗日战争奠定了胜利的基础。

第二章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及其国际反响

第一节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

中国东北地区是日本自幕府末期和明治以来一直觊觎的侵略目标。“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和长期准备，实现其独占东北，进而灭亡中国，称霸亚洲所采取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一、制造舆论，拟定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从幕府末期开始，随着“大陆政策”的形成和“东方会议”的召开逐步加强。皇姑屯事件后，日本帝国主义继续加紧密谋策划，在较短时间内完成了侵略中国东北的各种准备。日本的一些军政要人、反动党派头目和“民间团体”的右翼分子，以及日本驻中国东北的各个侵略机关，纷纷出动，加紧制造侵略东北的舆论。他们宣称“满蒙”是日本的生命线，同日本有特殊关系，强调日本对“满蒙”的重大“贡献”，否认中国对东北的主权，鼓吹武装占领东北。

1928年9月，日本政府制定了《对华政策要点》，以“防止共产主义分子潜入东三省”为名，表示对东北“无论如何不可漠然视之”。

1925年5月，由一批少壮派右翼军人组成的“一夕会”举行碰头会，通过了“重点解决满蒙问题”的决议。7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奉命起草了一个题为《关东军占领满蒙计划》的文件，明确地提出了日本要巧妙地解除中国军队的武装，维持治安以及防备苏联入侵东北等问题。

1930年末，日军参谋部在制订《1931年形势判断》时，就怎样解决满洲问题进行了讨论。确定分三个阶段实施，即：打破现状，建立亲日政权，最后完全占领东北。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主张“在满洲惹起事变后，政府若不迫随，就决心发动军事‘政变’，使满洲问题易于解决”。

1931年1月24日，“满铁”调查科科长佐多弘治郎，在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表题为《科学地观察满蒙对策》的演说中妄称：“要建设大日本的超级大国，很显然，必须取得相应的领土或具有同等价值的东西，……这就需要把满洲置于我国绝对权力的统治之下。”同年春，前满铁副总裁、政友会议员松冈洋右，发表《动荡之满蒙》的小册子，声称：“今天满蒙之地位，对我国说来，不仅在国防上十分重要，而且对国民经济也是不可缺少的。换句话说，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看，不仅在我国国防上，就是在经济上，也可以说是我国的生命线，而不必害怕任何国家和任何人。”3月，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在日本陆军步兵学校发表演说，公然声称：“如果单纯地使用外交的和平手段，归根结底不可能达到解决满洲问题的目的。”板垣还强调指出：“如所周知，在对俄作战上，满蒙是主要战场；在对美作战上，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8—1945）下卷，1969年版，第118～119页。

〔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74页。

〔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第85页。

〔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35页。

〔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67～68页。

满蒙是补给的源泉。从而，实际上，满蒙在对美、俄、中的作战上都有最重要的关系。由此看来，可以充分了解：满蒙在军事上有着何等重要的地位”。

这次讲话，不久即印成《从军事上所见到的满蒙》的小册子广为散布。4月，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在他提出的《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中，强调占领满蒙地区“不只对于战争命运有着重大影响，且关系到帝国的百年大计。”5月29日，关东军司令官菱刈隆在一次会上说：“唯满蒙之地，与帝国之国防及帝国之生存具有很深的特殊关系，不可以单纯之经济观点视之”，“对满蒙问题作根本性的解决，实乃完成帝国崇高使命之第一步”。

6月19日，日军制订《对满蒙方策》。然后，在参谋部新任作战部长建川美次主持下，由陆军省军事科长永田铁山、人事科长冈村宁次、参谋部编制科长山胁正隆、欧美科长渡久雄和中国科长重藤千秋等组成所谓“五科长会议”，经反复研究，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这个秘密文件，明确规定了有关侵略中国东北的方针、步骤和措施，并确定将“采取军事行动”。这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7月31日，日本陆军省密召关东军参谋长三宅光治回东京，将这个《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作为指令下达。8月3日，日本陆军在东京召集军司令官和师长会议，传达在满洲作战的计划。裕仁天皇分别接见各司令官，暗示了他知道并且批准预定在最近将来发生的事件。次日，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在会议致词中说：“满蒙问题只能用武力解决”，并勉励军人善尽“应变责任”。9月6日，日本政友会头目森格公开发表题为《紧迫的满蒙对策》的文章，声称：“日本消耗了20亿的国家经费，以10万同胞鲜血，好不容易才把俄国的势力，从日本之生命线和满洲人故乡的满洲驱逐出去；并以和平的开发政策，取代武力的封锁政策，在满洲各地进行经济建设”。9日，他又在名古屋市举行的一次讲演中说：“满蒙并非中国的领土，满洲作为清朝始祖即爱新觉罗氏的发祥地，是满族的领土”。驻京都的陆军第16师第3飞行团，9月7日向福井、金泽、富山、松本等地空投了10万张传单。传单的题目是“醒来吧，国防！”主张用武力解决东北问题，并附有注明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的地图。同一天，日军参谋部中国组组长影佐祯昭在东京召开的一次“对华问题协议会”上也妄称：“作为东洋盟主的日本，为了惩治中国之恶行而进行打击，是理所当然的”。

在制造侵略中国东北的舆论方面，一个叫“满洲青年联盟”的组织也曾起过极大的作用。该组织在日本军政当局的策动下，于1928年11月正式成立。

1929年1月，制定了“必须使满蒙的天地真正成为我们的理想之乡”的方针。1931年3月，该联盟为激起旅居中国东北的日本侨民的对外扩张情绪，组织了“全满日本人自主同盟”，声明：“为自立地死守满蒙和拥护国权，

〔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44页。

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71页。

同，第145页。

此处指关东军、朝鲜军、台湾军司令官。

《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50页。

〔日〕山浦贯一：《森格》，第995~996，第993~994页。

〔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9年版，第412页。

全满同盟实行大同团结”。他们还印发了 1 万多册名为《满蒙问题及其真相》的小册子，在日本国内广为散发。文中声称：“满蒙不仅作为我国国防第一线 and 国军的军需产地有它的重要性，而且作为产业的原料产地和食品供应地，对我国的生存来说也是极为重要的地区”。6 月 20 日在沙河口举行讲演会，支部长结城在开幕词中狂呼：“我们站起来的时候终于来到了！”7 月，该联盟向中国东北和日本国内发行了 500 册名为《满蒙三题》的宣传材料，声称：第一，日本在中国东北的特殊权益，是“我们先辈”估计到日本资本主义的危机可能到来而确定的，所以把它作为生存权而加以保卫，则是理所当然的；第二，日本侨民在东北的大地上，有必要建立以民族和睦与日本文化为背景的共和乐园；第三，为了拯救中国这个落后的民族，取消张学良政权。“日本就理所当然地”要在东北驻兵，进而“打倒半封建的东北政权”。

这些策划和蛊惑人心的煽动，使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战争的狂热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日本关东军为详细了解东北各地情况，制定具体的作战计划，曾多次组织所谓“参谋旅行”，非法地到东北各要地进行军事侦察活动。其中规模较大、时间较长的有 4 次，即 1929 年 7 月的“北满参谋旅行”，10 月的“辽西参谋旅行”，1930 年 5 月的“长春参谋旅行”，以及 1931 年 7 月的第 2 次“北满参谋旅行”。

“参谋旅行”的主要人物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和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中校。日军参谋部作战部长畑俊六少将曾亲自带领关东军参谋前往长春进行过一次侦察。通过一系列现地侦察，日本制定出了攻占沈阳、哈尔滨、锦州等城市的作战方案和侵占中国东北后如何进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至此，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现地侦察工作已基本完成。

二、扩充军备，加紧部署，频繁演习

1930 年度日本军费为 4.4 亿日元，占国家总预算的 28.5%。军需品和其他战略物资的进口占贸易总额的 41%。日本在不断扩大军事工业的同时，将 90% 以上的大中型民用工业也都作了转产军火的准备。到 1931 年日军总兵力已扩充到 30.8 万人，其中陆军 17 个师 23 万人。

1931 年 4 月中旬，日军参谋部调驻仙台的第 2 师（师长为多门二郎中将），与驻中国东北地区的第 16 师换防。第 2 师由日本北方士兵组成，为的是适应侵略东北在寒冷地区作战。

7 月 1 日，日本军事参议官会议决定：日本调 1 个师常驻中国东北，废除驻满日军每隔 2 年调换 1 次的制度。同时，还密令独立守备队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当月，将两门 240 毫米的榴弹炮等（攻城重炮）从旅顺秘密运到沈阳，安置在独立守备队第 2 营的兵营里。这两门重炮是分解后分别装进外形似棺材的木箱里，用客赐从神户运到大连的。为掩人耳目，他们把火

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51 页。

同上。

同上，第 152 页。

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 年版，第 162 ~ 163 页。

炮安装在事前挖好的掩体内以后，进行了操作训练，预先标好了目标。“这些火炮后来在攻击北大营时发挥了难以估量的威力。”在加强关东军独立作战能力的同时，日本还于7月从本上增派了1个师进驻朝鲜，准备随时渡江参战，并且，命令驻朝鲜的日军开到图们江岸，待机行动。

8月1日，日本军部进行了异常的人事安排，任命本庄繁中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土肥原贤二上校为沈阳特务机关长。当日上午，本庄繁中将到叶山夏宫晋谒日本天皇，得到天皇赐膳，并由天皇亲自向他授子新职。本庄繁是侵华老手，曾当过张作霖的顾问和驻华武官，对中国东北的情况十分了解。而土肥原贤二则是有名的“中国通”，日本将此而人派来东北，显然是为发动侵略战争而作的安排。同月3日，本庄繁在给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的信中说：“熟察帝国存在及充实一等国地位，势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国（苏联）五年计划未成，中国统一未达以前之机，确实占领我30年经营之满蒙，并达大正7年（1918年）出兵西伯利亚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与我（日本）朝鲜及内地打成一片……”

“九·一八”事变前夕，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如下：

司令官 本庄繁 中将

参谋长 三宅光治少将

第2师 师长 多门二郎中将（驻旅顺）

步兵第3旅 旅长 长谷部照悟少将（驻长春）

步兵第15旅 旅长 天野六郎少将（驻辽阳）

独立守备队 司令官 森连中将（驻公主岭）

独立步兵第1~第6营

旅顺重炮营

关东军宪兵队等，总兵力1万余人。

8月20日，本庄繁走马上任。9月1日，对所属“训话”，反复强调要“应付非常局面”。9月7日，他视察了南满铁路沿线的日军，检查战备情况，进行战前动员。9月8日，本庄繁到沈阳，在石原莞尔陪同下访问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就时局问题交换了意见。9月13日，本庄繁偕板垣、石原等一行9人赴长春视察，在给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的训示中说：“查最近匪贼跳梁益甚，不仅妨害铁路运行，并且多次窥视我附属地，诚堪忧虑。对于敢于轻视我军威严之此类不逞之徒，应采取断然措施，以求完成铁道守备任务，同时消除帝国侨民之不安”。14日，观看长春日军演习。15日，赴四平、公主岭等地检阅日军。18日，检阅第2师驻辽阳的部队，在讲评的最后，本庄繁对多门师长说：“现在，满蒙的形势日益不安，不许有一日偷安，当万一发生事端时，希各部队务必采取积极行动，要有决不失败的决心和准备，不可有半点失误”。

日本关东军经常进行军事演习，进入1931年后，演习活动更加频繁。

1931年4月，多门师刚从辽南登陆，就进行了进攻金州（金县县城）的演习。6月9日，驻长春日军借满铁占用地区举行城市巷战演习，不顾中国

〔日〕岛田俊彦：《关东军》，1969年版，第94~107页。

《简明日本近代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88~289页。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297页。

〔日〕稻叶正夫：《昭和战争史讲座——满洲事变》，第68页。

公安警察阻拦，强行越出满铁占地界架设枪炮。7月15日，驻长春日军第3旅司令部宣布：自即日起，废除过去在铁路两旁进行军事演习需于10日前通知中国的惯例，在所定范围内，无论昼夜，日军将自由实施一切军事演习。8月4日，驻朝鲜日军在图们江进行军事演习，擅自越界架桥，施放水雷，侵犯中国领土领水。

15日，日军更越过图们江到中国境内进行军事演习。20日，日本驻朝鲜的第19、第20两个师，全部调到中国边境图们江沿岸。8月18日，驻沈阳日军守备队在皇姑屯一带进行居民地战斗演习。9月，军事演习接连不断。9月2~5日，驻沈阳日军在文官屯、旺官屯、关帝庙各处，分别进行围攻东北军北大营、东北兵工厂及沈阳城等各种作战演习，驻长春日军以城西五里堡、新立屯、田家油坊等地为战场，演习攻击长春城。7日，安奉（今丹东至沈阳）铁路日军守备队第3营，开始向苏家屯、沈阳一带集中。8日，东北各地日侨在乡军人会会员奉陆军省密令，分赴沈阳、长春、哈尔滨三城市报到。同日，驻沈阳日军在北大边门与合堡大街等处进行攻城、巷战等作战演习。

15日，在沈阳的日军第29团、独立守备队、宪兵队、特务机关举行攻打沈阳城墙的联合夜间演习，战争气氛愈来愈浓，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三、挑起事端、寻找借口

1931年7月、8月，日本帝国主义先后挑起了“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事件”。

（一）“万宝山事件”

万宝山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制造侵略东北的口实，导演的一起大规模反华事件。

万宝山位于长春以北约30公里的长春县三区境内。这里完全是中国政府所辖之地，既不是“满铁”附属地，也不属于1909年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日图们江界约》所走的特区。1931年4月间，“长农稻田公司”经理、汉奸郝永德，在万宝山地区租得肖雨春等生熟荒地400余垧，为期10年。呈县有案。“查租种稻田例须经过官府许可之程序。”但是郝永德不经县政府批准，就擅自将上述土地转租给被日本帝国主义剥夺了土地而流落到中国来的朝鲜农民李升薰、李造和等9人耕种，也以10年为期，此项契约也未交报长春县政府批准立案。到5月上旬，在长春居住的朝鲜农民40户计200余人移居该处，立即从事开垦。此处地势甚洼，朝鲜农民为了引伊通河水灌溉，便着手在中国农民的熟田里开设一条引水渠。这条水渠“宽约三丈，深在三丈以内不等，长约二十里；此壕工作强横进行，已完大半，损坏良田一百余垧；将来渠成，一值大水之年，附近良田二千余均悉将直受水害”，因而引起当地中国农民的担心。5月20日，中国农民代表100余人向当地政府呈诉。

条约规定划图们江以北的吉林省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四县为特区，容许朝鲜人垦殖。

东北土地面积的计算单位，每垧相当于7亩。下文的一丈为3.3米。1里为0.5公里。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76、75页。

5月31日，长春县政府派人前往劝告朝鲜农民停工，日本驻长春领事田代重德反而引来了大批非中国籍的朝鲜人加紧挖渠筑坝。日本领事馆还增派了约50名警察，准备镇压中国民众。7月1日中国农民眼看沟坝将要修成，自己的大片熟田会被淹没，这是个关系到死活的问题，于是自发地集合起300多人前来填沟，结果双方发生冲突。日本警察公然开枪，后来，在日本警察“保护”下，朝鲜农民于同月11日修成沟坝并通水。

在这次冲突中，中国农民多人受伤、被捕，而日本警察和朝鲜农民并无伤亡。可是日本却大造舆论进行欺骗宣传，煽动仇华，因而在朝鲜国内发生了大批杀害华侨的流血惨案。仅在7月3日到9日的1个星期内，华侨就有100多人被杀、90多人失踪、160多人受伤，民宅、商店被毁数百所。在日本掀起的朝鲜暴力排华风潮中，自朝鲜返回国内的受难同胞，到7月10日为止已达4500人，其中返回安东（今丹东市）的难胞为2881人。

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此为满足，继续扩大事态。7月7日，日本政府召开了内阁会议，讨论万宝山事件和朝鲜排华问题，主张采取更强硬态度。

15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林久治郎向吉林省主席张作相提出保留万宝山水田租约效力，所筑沟坝不得损坏，赔偿朝鲜人损失，准许朝鲜人在东北自由居住等无理要求。同日，朝鲜人在万宝山马家船开渠放水，致使民田被淹数百垧。日本军警在该地强行搭设帐篷20余座驻扎，附近不许中国人进入。7月19日，民政党总裁、日本政府首相若槻礼次郎，也对万宝山事件表示了蛮横的态度。他在秋田市民政党大会上说：“我国在满蒙地方，享有同国民生存关系紧密的权益，为了保卫我国之生存权，必须不惜任何牺牲，毅然奋起”。从7月22日起，中日双方开始交涉。日方竟然搬出向袁世凯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有效，来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辩解，使谈判陷于僵局。这场朝鲜移民与中国农民争水夺地的纠纷发展成为“万宝山事件”，本来就是日本为了借机扩大移民和制造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借口，所以直到“九·一八”事变爆发，谈判毫无结果。

（二）“中村事件”

日军参谋部上尉部员中村震太郎，于1931年6月奉命到中国东北执行秘密军事侦察任务，随同者有一名旅居东北的日本退伍骑兵上士、一名蒙古人和一名白俄人。他们化装成中国农民，到兴安岭索伦山一带进行军事地理调查后，在准备经挑甫返回途中，于6月26日在兴安区葛根庙附近苏鄂公爷府被驻防当地的中国屯垦军第3团（团长关玉衡）所部拘获。经搜查，在“他们的行囊和中村的棉裤中搜出调查笔记、军用地图甚多，并查出寒暑表、指北针、测绘仪器和一支南部式手枪”，中村“将军用地图对照现地，加以纠正改绘，凡他所经过的地区，关于雨量、气候、村落、居民、土质、水井以及可容驻的兵力等都记载很详。”他们的间谍罪证确凿无疑，团长关玉衡遂下令将中村等人处死。为维护国家主权、这样处置一个证据确凿的间谍本无可非议。但是日本当局却借题发挥，一方面向中国抗议，另一方面煽动反华

[日]今井清一：《太平洋战争史》1，第260页。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逃亡到中国来的俄国人，其中大部是旧贵族。

《文史资料选辑》第3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第72~73页。

战争的狂热。8月20日，日本召开内阁会议，陆军大臣南次郎提出要求中国方面保证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否则日本将使用武力。前关东军司令官白川义则、菱刈隆在军事参议官会议上提出“应利用中村事件这个机会诉诸武力，一举解决各项悬案，确保我之各项权益”，并强调关东军司令官应“调动兵力”。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考虑得更具体，他认为：“中村事件是向附属地以外的地方出兵之天赐良机，甚至可以成为在柳条沟（湖）行使武力的前提”。据日本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的记载，当时许多日本军人都感到“事变”即将爆发。

四、“九·一八”事变爆发，大规模武装入侵开始

在日本军部和政府为侵占东北策划了多年之后，预定的事件终于爆发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制造“柳条湖事件”，对中国东北地区发动了武装进攻。这就是历史上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柳条湖位于沈阳内城以北2.5公里处，在沈阳站与文官屯站之间。关东军之所以选择这个地方作为爆破地点，其原因有二：一是这里较为偏僻，便于行事；二是距东北军北大营较近，便于诬为中国军队破坏，也有利攻击。

早在1930年冬，关东军作战主任参谋石原莞尔就准备把柳条湖作为挑起武装侵略的地点。1931年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等人订出了制造柳条湖事件的概略设想。同年6月，板垣征四郎和石原莞尔将爆破任务交给了奉天特务机关辅助官花谷正少校和曾经担任张学良顾问的柴山兼太郎的助理官今田新太郎上尉，让他们负责组成爆炸铁路的秘密班子及有关事宜。不久，奉天宪兵队长三谷清中校也参与其事。今田把工兵出身熟悉爆破技术的河本末守中尉，从独立守备队第2营第3连（驻虎石台）调到柳条湖分遣队，并当面向他下达密令。计划中决定在爆炸铁路的同时，攻击北大营，在一夜之间占领沈阳城。这一任务分别由独立守备第2营营长岛本正一中校（驻沈阳）及其所属的第1连连长小野正雄上尉（驻沈阳）、第2连连长川上精一上尉（驻抚顺）、第3连连长川岛正上尉和第2师的第29团团团长平田幸弘中校（驻沈阳）、奉天宪兵队队长三谷清中校（驻沈阳）负责。制造事件的时间本来确定为9月28日，待当地的高粮等农作物均收割完毕，便于作战。但是到9月中旬，柳条湖事件的计划在日本国内暴露。陆军大臣南次郎等派参谋部作战部长建川美次少将前来东北，转达军部不同意在近期内发动事变的意见，而建川美次是在8月间军部人事调整时担任该职的，也是参与策划在东北发动事变的人物之一。9月15日，他在启程之前有意向参谋部俄国组组长桥本欣五郎等人泄漏军部的意图。桥本立即利用建川与板垣之间使用的私人密码本，向板垣接连发了三次密码电报。第一次说：“事暴露，立刻坚决行动”。第二次说：“在建川到达沈阳前，应坚决行动”。第三次说：“国内不用担心，应坚决行动。”板垣接到桥本的电报后，与石原、花谷、今田等人反复研究，因得知建川预定在9月18日傍晚抵达沈阳，因此决定提前在9月18

〔日〕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1，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420页。

同上，第422~423页。

〔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日发动事变。在作为特使制止关东军行动的建川美次被安置在菊文饭店欢宴住宿的同时，争变的准备工作也已一切就绪。

9月18日，今田新太郎告诉河本末末等人“今晚动手”，川岛连检查装备，进行全副武装演习，其他部队亦整装待发。入夜，河本带领七八名部下，将今田准备的黄色方形炸药放在距离北大营800米的铁轨接头处的两侧。是夜，“弯月挂起，高粱地里黑沉沉一片；疏星点点，长空欲坠。”22时20分，炸药点燃，一声巨响，震荡长空，炸毁一段路轨。以爆炸声为信号，早已准备好的全副武装的日军，便向预定目标攻击，同时沈阳站附近的日军大炮向北大营猛烈轰击。23时46分，花谷正以土肥原的名义给旅顺关东军司令部发出第一份电报，谎称中国军队在沈阳北部北大营西侧破坏了铁路，袭击日本守备队，日中两军在冲突中。19日零时28分，花谷正又发出第二份电报，诡称北大营中国军队同日本守备队虎石台连正在激战，日军陷于苦战。接到电报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石原莞尔等人紧急研究对策，一致认为此时是诉诸武力的“绝好机会”。本庄当即决定，按照预定的计划，迅速将主力集中到沈阳，先发制人，“惩罚”中国军队，占领东北三省。

9月18日夜，当日本侵略军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北大营第7旅时，因王以哲旅长不在军中，参谋长赵镇藩当即一面下令全军进入预备阵地，一面给王以哲家打电话，并用电话直接向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报告。荣臻命令：“不准抵抗，把枪放在库房里，挺着死”。敌人已从西、南、北三面接近营垣，情况非常紧急。赵镇藩就决定利用敌军前进迟滞的间隙，从南、北两面出击，以掩护非战斗部队由东面撤退。据赵镇藩回忆：

“我军与敌人激战到下半夜三点多钟，伤亡颇多……敌人已从南面突入营垣。我当即命令旅的卫队连，反击突入营垣之敌。……接着旅部前后都发现敌人，展开了巷战，我始下令突围。……在抗击敌人进攻的战斗中，第7旅的大多数军官和广大士兵都是英勇的，他们奋不顾身地抗击着装备优良、人数众多的日军的进攻，他们还不知道国民党政府已经给他们的长官下了可耻的不抵抗主义的命令，因此，他们一面反击敌人一面问：‘兄弟部队为什么不前来增援呢？’‘我们的飞机为什么不起飞参战呢？’及至撤出北大营，他们还很关心的问：‘我们几时反攻回来呢？’这说明了广大的东北军的军官和士兵是爱国的”。

19日凌晨1时30分至2时之间，本庄繁向关东军下令：驻辽阳第2师，驻公主岭独立守备队第1、第5营等迅速开往沈阳，攻击该地中国军队；驻长春步兵第3旅准备进攻长春。同时，还向驻朝鲜日军求援。最后，本庄繁将他的命令及战况正式报告给军部。为了便于指挥，19日凌晨3时30分，本庄繁率领关东军司令部火速赶往沈阳。

9月18日夜，日本在沈阳的驻军只有独立守备队第2营和第2师的第29团，人数仅几千人。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军连夜向沈阳增兵。驻扎在铁岭的部队，于19日凌晨4时到达沈阳，配合第2营于5时30分占领北大营。

〔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3页。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06页。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78年版，第26~27页。

与此同时，驻扎在海城和辽阳等地的第2师所属部队及师长多门二郎也于19日凌晨5时抵沈阳，与原来驻在沈阳的第29团一起行动，6时30分占领沈阳内城。然后该师又与独立守备队采取联合行动，向距沈阳10公里的东大营进攻，日军南北夹击，东北军和讲武堂学员不战而退，中午12时许，日军占领了这个东北军的第二大营。由于东北军绝大多数部队执行了蒋介石“不准抵抗”的命令，一夜之间，日本侵略军便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城。东北边防军长官公署、辽宁省政府、兵工厂、飞机场及一切重要军政机关和东三省官银号等悉被占领，所有驻省城的军警均被缴械。仅沈阳兵工厂，即损失步枪15万支，手枪6万支，重炮、野战炮250门，各种子弹300余万发，炮弹10万发。东三省航空处积存的300架飞机，尽力日军掠去；其唯一的金库所存现金7000万元，亦被洗劫一空。

9月18日夜里，关东军在南满铁路沿线展开了全面攻势。

19日，日军攻占南满、安奉两铁路沿线的重要城镇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邦子等地。

19日凌晨4时，日军向长春发动总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后在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毋须抵抗”的命令下含愤撤退。当日22时许，长春陷落。

柳条湖事件发生后，日本军部立即于19日7时召开会议。参加的有：参谋部副总长二宫治重中将，总务部长梅津美治郎少将，代理作战部长今村均上校，情报部长桥本虎之助少将；陆军省次官杉山元中将，军务局长小矶国昭中将等。情报部长桥本介绍了沈阳附近的战况，他说：“到目前为止，张学良的部队还没有全体出动攻击”。军务局长小矶认为：“关东军此次之行动是完全适当的”。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准备向内阁提出增兵案。10时，日本首相若槻礼次郎召开紧急内阁会议，讨论关东军的报告，考虑到侵华策略的需要和外交上的反应，决定了“不扩大”方针，并在会议后由陆军大臣和参谋总长分别给关东军发了训示电，在传达内阁决定的“不扩大”方针的同时，赞扬关东军司令官的“决心和措施是适当的”，“提高了日军的威望”。同时，军部的桥本欣五郎给关东军发了一份电报说：“参谋部停止军事行动的命令是对付内阁会议的表面文章，参谋部的意思并不想停止军事行动”。关东军领会到军部和内阁的意图，即于18时继续调兵遣将，由擅自入境的驻朝鲜日军第39旅驻守西满，将第2师等关东军主力集中到长春，准备进攻吉林和黑龙江省。同时，向陆军中央请求增派3个师的兵力。20日上午，陆军三长官（参谋总长、陆军大臣、教育总监）会议一致决定：“此时，军部希望一并解决满蒙问题，万一内阁不同意军部这一方案，则以此为理由，直至推翻内阁亦在所不惜”。海军也积极支持关东军。这就为关东军扩大侵略提供了保证。21日上午，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作出攻占吉林的决定，占领长春的日军第2师奉命乘装甲列车于当日下午抵达吉林。由于吉林省代理主席、军署参谋长熙洽叛国降日，中国军队退出吉林，所以日军第2

今村均：《自述·一个军人60年间的哀欢》，芙蓉书房，1971年版，第187~193页。

〔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编》，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4页。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11页。

〔日〕中野雅夫：《桥本上校手记》，1963年版，第118~130页。

〔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朝日新闻社，1963年版，第117页。

师兵不血刃占领了吉林。

从9月18日至25日一周内，关东军占领辽宁、吉林两省的30座城市，并完全或部分控制了12条铁路线，完成了“九·一八”事变军事进攻的第一阶段。

日军占领的城市：19日有沈阳、长春、营口、田庄台、盖平、复县、大石桥、海城、辽阳、鞍山、铁岭、开原、昌图、四平街、公主岭。还有安东、凤凰城、本溪、抚顺、沟帮子。20日有熊岳城。21日有吉林。22日有通辽、郑家屯、牛庄。23日有敦化、蛟河。24日有巨流河、新民。25日有洮南。日军控制的铁路：除南满、安奉两路外，对北（平）宁（沈阳）、中东（由哈尔滨西至满洲里东至绥芬河南至长春）、沈（阳）海（龙）、四（平）洮（安）、吉（林）长（春）、吉（林）敦（化）、大（虎山）通（辽）、洮（安）昂（昂溪）、吉（林）海（龙）、营（口）沟（帮子）各线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控制。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与东北沦陷

一、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民族投降主义方针

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通过“九·一八”事变，迅速占领整个东北地区，从中国方面讲，主要是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推行了绝对不抵抗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准备侵占中国东北的时候，蒋介石于1931年6月6日发表《告全国将士书》，称“赤祸”是中国的“最大祸患”。21日，蒋介石离南京赴南昌，7月1日在南昌行营发布命令，亲自指挥30万国民党军队，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万宝山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7月23日发表的《告全国同胞书》中说：“惟攘外应先安内，去腐乃能防羹……故不先消灭‘共匪’……则不能御侮。不先削平‘粤逆’，完成国家之统一，则不能攘外。”这是蒋介石首次作为国策公然提出的卖国方针。11月30日的讲话，把“攘外应先安内”改为“攘外必先安内”，作了进一步强调。以后蒋介石的许多讲话，反复强调反共第一，抗日第二，亦皆源于此。

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其主要原因是他站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立场上，极端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力量。在蒋介石看来：“革命（不论什么革命）总比帝国主义坏”。在“九·一八”事变前夕（8月22日），蒋介石又在南昌宣称：“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仍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可得。”宣誓3个月内“肃清”江西红军。

11月30日，蒋介石在顾维钧就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的宣誓会上发表演讲，他说：“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未有国不能统一而能取胜于外者。故今日之对外，无论用军事方式解决，或用外交方式解决，皆非先求国内统一，不能为功。盖主战固须求国内之统一，即主和亦非求国内之统一，决不能言和。是以不能战，固不能言和；而不统一，更不能言和与言战也”。

12月20日，宋庆龄发表时局宣言，指责蒋介石国民党“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而美其名曰党治。”1932年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开“剿共”会议，部署第四次“围剿”时说：“我们这次‘剿匪’戡乱，就是抗日御侮的初步”。同年12月14日，在内政会议上又称：“攘外必须安内，是古来立国的一个信条”。当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成立了伪满洲国，并侵占热河之后，1933年4月10日，蒋介石在南昌部署第五次“围剿”时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能言抗日，违者即予最严厉处罚”。这样，在民族存亡的

《蒋总统秘录》，中央日报译印，1976年版，第7册，第185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6页。

荣孟源：《蒋家王朝》，第51~52页。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8年版，第128~130页。

《国闻周报》第9卷第1期，1931年1月1日。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41页。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0页。

紧要关头，蒋介石专心致志地进行“剿共”战争，对民族敌人推行不抵抗政策，就不足为奇了。

其实，早在1927年10月，蒋介石由张群陪同访日时，就于11月5日与日本首相田中义一达成“圆满的谅解”，其中包括“中国承认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和权益”。蒋介石从日本回到上海会见新闻记者团时，表示“保证对日本在满洲的特殊地位加以考虑”。1931年10月，蒋介石派遣密使许世英赴日本谈判时，许代表蒋介石声称：“如果日本能担保中国本部十八行省的完整，则国民党可同意向日本……让出东北。”1932年，蒋介石为其不抵抗政策辩解：“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之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必至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

“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指示东北军将领，对于沈阳紧张局势，“不必惊慌，有九国公约及国联，日本不能强占我国领土。”9月19日，外交部致日内瓦施（肇基）代表电称：“现已完全证实，我方毫无挑衅举动，日军公然向我攻击，我方虽绝未抗拒，而彼仍继续向我开火，炮轰我营房及兵工厂，星期六晨六时半，占据沈阳全城及其附近……中国政府请求国际联合会立即并有效的依照盟约条款，取适当之措置，使日军退出占领区域，保持东亚和平，中国政府决定服从国际联合会关于此事所为之任何决定。”9月22日，蒋介石在国民党南京市党部党员大会上，要求全国人民“此刻必须上下一致，先以公理对强权，以和平对野蛮，忍痛含愤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后来的事实证明，国联决不会也不可能有效地制止日本侵略，蒋介石依赖国联，实质上也是为推行他的不抵抗主义作掩护。

二、张学良执行蒋介石不抵抗的命令，绝大多数中国军队不战而退

“九·一八”事变后大片国土沦丧，其主要责任应由蒋介石承担，因为他是不抵抗主义的决策人，这已经是历史的事实。但张学良也有一定责任。就连张学良的部下、东北军著名将领何柱国也承认：“东北军的不抵抗，蒋介石固然要负主使之责，而东北军自己也并不是没有责任的。”“九·一八”事变前后，蒋介石曾多次指示张学良，对日本的侵略要采取不抵抗主义，张学良均一一遵照执行。

1931年6月8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告全国将士书》表示“钦服莫名”，愿率旅“唯钧座之命是从”。7月间因万宝山事件，蒋介石在江西抚州给张学良拍发电报称：“发生全国的排日运动时，恐被其利用

〔日〕山浦贯一：《森恪》，森恪传记编纂会，1940年版，第614页。

《九·一八事变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75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出版，1981年版，第317页。

《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32页。

李云汉：《九一人事变史料》，正中书局印行，1977年版，第453~454页。

《申报》，1931年9月23日，第八版。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53页。

《国闻周报》第8卷第23期，1931年6月15日。

共产党，呈共匪之跋扈，同时对于中日纷争，更有导人一层纷乱之虞。故官民须协力抑制排日运动，宜隐忍自重，以待机会。”张学良复电也说：“努力隐忍自重，勿使日本乘其间隙。”中村事件发生后，蒋介石于8月又给张学良发一铣（代16日）电，内称：“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张学良曾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守。9月6日，张学良电令臧式毅代主席、荣臻参谋长：“查现在日方外交渐趋吃紧，应付一切，亟宜力求稳慎，对于日人无论其如何寻事，我方务须万方容忍，不可与之反抗，致酿事端。即希迅速密令各属切实注意为要。”正是由于张学良忠实执行了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才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动步步得逞。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解除了思想武装，对日军疯狂的战争准备毫无戒备，以致事变发生后缺乏有力的指挥，被日军各个击破。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张学良长期留驻北平，9月18日，得知沈阳事变消息时，他偕夫人正在前门外中和剧院看梅兰芳表演的京剧《宇宙锋》。东北边防军代司令、参谋长荣臻正在忙于为其父作寿。黑龙江省主席、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万福麟也留住北平；黑龙江省军政大权交其子万国宾代理，他在北平遥控，当时他最关心的是尽快将眷属家财由齐齐哈尔转哈尔滨再转天津。吉林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长官张作相，因父歿回锦州治丧，由军暑参谋长、省府委员熙洽代理。在沈阳城内的东北及辽宁省各机关军政要员，事变前也大半不在岗位。“九·一八”事变之夜，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旅长王以哲未回军营指挥。3个团长，王志军在营中，张士贤当晚回家未归，王铁汉听到炮响才从家返回营中。因此，当日军突然袭击北大营时，无法进行有组织的抵抗。

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导致在兵力上占优势的中国军队大都不战自溃，丧失东北大片领土。“九·一八”事变发生时，日本方面关东军的正规部队约有1.04万人，另有在乡军人约1万人，满铁沿线的警察等约3000人，共计约234万人。而东北军的总人数约有30万人左右。除因军阀混战调到关内的11万人外，留在东北的尚有近20万人，其中驻辽宁6个旅，驻吉林9个旅，驻黑龙江5个旅，另外还有公安、警察部队。

“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边防军序列如下：

司令长官：张学良

副司令长官：张作相 万福麟

参谋长：荣臻

驻辽宁部队（张学良兼）

第7旅 旅长 王以哲

第12旅 旅长 张廷枢

第20旅 旅长 常经武

骑兵第3旅 旅长 张树森

洮（安）辽（通辽） 镇守使 张海鹏（辖省防旅）

《盛京时报》1931年7月15日影印本，第79册，第449页。

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第8卷，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236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7页。

东边道	镇守使 于芷山（辖省防旅）
驻吉林部队（张作相兼）	
第 22 旅	旅长 苏德乃 后为赵 毅
第 25 旅	旅长 张作舟
第 26 旅	旅长 邢占清
骑兵第 4 旅	旅长 常尧臣
吉(林)长(春)镇守使	李桂林（辖第 23 旅）
延吉镇守使	吉兴（辖第 27 旅）
滨江镇守使	丁超（辖第 28 旅）
绥宁镇守使	赵芷香（辖第 21 旅）
依兰镇守使	李杜（辖第 24 旅）
炮兵第 10 团	
卫队团	
驻黑龙江部队（万福麟兼）	
第 1 旅旅长张殿九	
骑兵第 1 旅旅长吴松林	
骑兵第 2 旅旅长程志远	
黑河镇守使马占山（辖第 3 旅）	
呼伦贝尔警备司令苏炳文（辖第 2 旅）	
炮兵团	
卫队团	
海 军	
海防舰 11 艘	
江防舰 8 艘	

东北军除装备、教育训练和作战准备不如日军外，数量居绝对优势，加之群众支持和熟悉地形等条件，如能坚持抗战，即使一时不能取胜，也不致失败得如此之惨。日本发动这次进攻，连他们自己也没有胜利把握，非常害怕中国一致合力抵抗。如驻北平的日本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给关东军的秘密报告中说：“须知‘九·一八’，迄今之帝国对华及历次对中国作战，中国军因依赖国联，而行无抵抗主义，故皇军得以顺调胜利。……倘彼时中国官民能一致合心而抵抗，则帝国之在满势力，行将陷于重围，一切原料能否供给帝国，一切市场能否消费日货，所有交通要塞、资源工厂能否由帝国保持，偌大地区，偌多人口，能否为帝国所统制，均无确实之把握，同时反满抗日力量之集结，实行大规模之游击扰乱，则皇军势必苦干应付矣”。可是，据张学良的机要秘书郭维城揭露：“九·一八”事变当时，张学良将军在北平，一夜之间，十几次电南京蒋介石请示，南京方面却若无其事地十几次复电不准抵抗，把枪架起来，把仓库锁起来，一律点交日军。张学良则叫东北军政大员“严饬所属对此切持镇定，以免另生事故，干事无益”，并“望国民冷静隐忍，勿生枝节。”而荣臻说得更明白，他命令北大营驻军：“不准抵抗，

东边道镇守使驻山城镇，管辖辽宁东边一带 23 个县。

国民党政院档案〔2〕3374。

《东北日报》1946 年 3 月 24 日。

《张学良将军传略》，辽宁大学出版社，1987 年版，第 330 页。

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当时驻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第7旅，8月间即预感到日军要采取行动，旅长王以哲专程到北平请示张学良。张学良说：“蒋指示暂不抵抗，准备好了再干，一切事先从外交解决；……遇事要退让，军事上要避免冲突，外交上要采取拖延方针”。

王以哲根据这一方针，决定对于日军的进攻，采取“衅不自我开，作有限度的退让”的对策，“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全军退到东山咀子附近集结，候命行动。”这样，不抵抗主义，从中央到地方层层下达，贯彻比较彻底。结果造成大片国土轻易地落入敌手。满铁的土木建筑公司经理榎谷仙次郎在10月2日的日记中，夸耀日本侵略军进攻“北台（大）营”的战争，创造了世界战争的记录，敌人有1.2万人，而关东军用650人即以1/20的兵力，战斗7小时，就把它攻占了”。这就是不抵抗政策造成的恶果。沈阳的陷落，也并不是日军攻陷的，基本上是从敞着的大门开进来的。当日军进攻北大营时，沈阳城门大开，荣臻和臧式毅会商应付办法，认为日领事馆已经说了日军不进城，“如果进城，吾方即闭城门，日军亦可用炮击毁，不若开城听其如何。”果然，日军一炮未发，便从敞开的城门进入城内。

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严重限制了东北爱国官兵的抗日行动。黑龙江省代主席马占山，在日军发动进攻时，曾一再退让，力避冲突，直到冲突不可避免时，他才被迫自卫还击，领导部下进行了有名的嫩江桥抗战，但国民党政府未给予任何实际支援，终于未能扭转战局。

更为严重的是，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还促使了某些人叛国投敌，引狼入室。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省城进攻时，吉林省军参谋长兼代理主席熙洽，借口“不抵抗”的指示，出城迎敌，并责令所属守军缴械投降。最后，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伪“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进犯时，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公然向日军投降。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也于10月15日发表投降宣言，叛国投敌，充当了汉奸。张景惠暗中策划在哈尔滨宣布“独立”，9月27日宣布组织东三省特别区的“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宣布招募伪“特别警备队”，均以日本顾问为主宰。不久，他就成了公开的大汉奸。在这些叛变投敌分子的协助下，日本帝国主义轻而易举地夺城掠地，迅速扩展占领区。

三、日军占领东北全境

（参见附图1）

日本关东军占领沈阳、长春、吉林等地后，日本陆军中央部于9月23日内定了“关于军事占领地的范围”，还规定了几条逐步扩大的军事占领界线。第一道是最小限度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为辽河一线，即以

《文史资料选辑》第6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页。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

〔日〕《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7年版，第103~104页。

《辽吉被占纪实》，《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小林龙夫：《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资料篇，第126页。

郑家屯、新民、营口为界。东线以吉林、海龙为界。第二道是可以向外扩张的所谓满铁两侧“警戒线”；西线以洮南、通辽、大虎山为界，东线以敦化及延边地区为界。第三道是哈尔滨和延边地区，对后两个地区，仍以保护侨民为借口，暂由外交官出面交涉。日本实际上已放弃“不扩大方针”，变本加厉地扩大侵略战争，日军迅速占领了整个东北地区。

（一）夺取江桥，侵占黑龙江

黑龙江省处于日本势力范围之外，而且与苏联接壤，日军直接出兵侵占尚有顾虑，便首先利用叛国投敌的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伪军向龙江（齐齐哈尔）发动进攻，企图达到不直接出兵而取得黑龙江的目的。张海鹏是奉系军阀元老之一，因向张学良谋取黑龙江省主席未成，与日军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后，张海鹏投降日本，10月1日宣布就任伪边境保安司令，脱离张学良，并答应日本北上进攻黑龙江的要求。

当时黑龙江省主席兼东北边防军副司令万福麟远在北平。

10月中旬，张学良任命步兵第3旅旅长马占山代理省主席职务兼任黑龙江省军队的总指挥。

16日拂晓，张海鹏部向江桥发起进攻，马占山率部将其击溃，并将嫩江桥破坏三孔。

日军利用张海鹏伪军进攻失败后，决定直接出兵攻占黑龙江省。日军认为，中国军队破坏嫩江桥是它出兵的“天赐良机”可以“依然利用张海鹏军担任此项任务，或依靠关东军自己的力量，或两者并用”，以实现其“征服北满的方略”。10月27日，齐齐哈尔日本特务机关长林义秀少校，以关东军司令官代表的名义向马占山提出要求，限令在一周内即11月3日前修复嫩江大桥，否则，日本将以武力为掩护自行修理。当时，日军已决定由第2师第16团的1个步兵营、1个炮兵营、1个骑兵连和1个工兵连组成嫩江支队，准备到达江桥附近以武力掩护修桥。

11月2日，林义秀偕同清水面见马占山，声称：奉日本政府及关东军司令官的训令，因洮昂路修筑原有日人借款，既有借款关系，嫩江桥应由日方派满铁工人修理，已派兵来监护工作等。当即遭到马占山回驳。林义秀将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通告转交马占山。通告说：“（1）自即日起，嫩江桥不得为战术上使用；（2）在11月4日正午以前，两军各自桥梁撤退至10公里以外之地点，至修竣为止，不得进入10公里以内地区。修竣之日期，俟预计后随时通知两军。对于违背上述要求者，即被认为对日军怀有故意而行使其合法之武力”马占山决定对日修桥取放任态度，但江桥阵地不能后撤，采取必要自卫措施。随后，双方开始交火。

日军经两日激战夺取江桥后，继续向纵深推进。11月8日，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经林义秀向马占山提出警告：“马占山如欲避免日军进入齐齐哈尔，

〔日〕《现代史渊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

同上，第339页。

同上，第354页。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0页。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67~368页。

应速披沥诚意”。并要求当晚12时以前答复。下午，林义秀又将所谓诚意条件用短札方式交给黑龙江省外交主任王春。信中说：“考察目前之时局，避免战祸、维持地方秩序的唯一方法是马主席下野；同时黑省政府与张海鹏之间实行和平授受政权，除此之外，别无良策。”9日，马占山书面答复本庄繁说：“为披沥诚意，本拟与张海鹏交涉，可是张尚未奉中国政府之命，而且日军又将江桥附近路线切断，为此，不可能与张协议授受政权。”日军认为马占山没有诚意，遂于12日13时又由林义秀转交了本庄繁的通告：（1）马占山下野；（2）马占山军从齐齐哈尔撤退；（3）为保障洮昂线安全，日军之一部派至龙江车站，并限于12日晚12时以前答复。但当日晚，即遭到马占山拒绝。

关东军用“和平”手段威逼失败后，积极准备发动新的进攻。11月11日，关东军发布命令，调第2师全力向大兴方面集结。12日中午，日军骑兵第2团在部分步、炮兵的配合下向中国守军阵地发起进攻。13日，日军将嫩江桥修复，满载补给物资和兵员的列车开到。关东军司令官命令第2师师长指挥该师和混成第39旅的3个步兵营以及嫩江支队，向三间房守军进攻。13日深夜，关东军接到陆军大臣有关与马占山交涉的训令：（1）马占山军必须撤退到齐齐哈尔（含）以北；（2）马占山不得向中东铁路以南出兵；（3）马占山军不得妨碍洮昂铁路的运行，如有妨碍，帝国将立即采取必要而有效的手段。上述条件，限马占山自11月15日起10日以内实行，限16日正午以前答复。随后，又接到参谋总长命令：（1）马占山军如接受并实行我方建议，可令嫩江支队将主力集结于郑家屯以东；（2）马占山军如不接受我方建议，或接受而不实行，贵军可自行采取必要的自卫行动。关东军一方面让林义秀和清水通过在哈尔滨的黑龙江省政府委员张仲仁，将此意通知马占山；另一方面命令第2师从17日起发起进攻。至18日，日军第2师主力已全部增援至嫩江方面加入战斗。守军顽强抗击后被迫撤退。日军沿铁路及其两侧分三路追击。

19日下午，占领齐齐哈尔。从此，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也沦于敌手。

由于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政策，使东北三省的大部地区，在两个月的短时间内，即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在全国各界的谴责和国民党派系斗争激化的情况之下，蒋介石本人也不得于12月15日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及陆海空军总司令等职。但他在暗中仍操纵着大权，并伺机再次上台。

（二）侵占锦州，攫取辽西地区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之后，即将作战方向转向锦州，以夺取整个辽西地区。锦州为辽西重镇，是北（平）宁（沈阳）、锦（州）朝（阳）两铁路的交叉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1页。

同上。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3页。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652页。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89~390页。

同上。

点，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日军夺取锦州和辽西地区，不仅能巩固日本对东北的占领，也为进一步侵占热河和入侵关内作战取得重要的前进基地。

“九·一八”事变后，沈阳的东北军大部撤退到锦州和辽西地区。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及辽宁省政府行署，以张作相代理边防军司令长官，以米春霖代理省政府主席，荣臻也率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大部分职员到锦州办公。9月底，两署在锦州开始办公后，调驻通辽的骑兵第3旅、驻桃南的步兵第20旅集中锦州附近，连同原驻锦州的步兵第12旅沿大凌河布防；另外还有步兵第19旅、炮兵第8旅与炮兵第6旅第13团以及沈阳步兵第7旅之一部，兵力约2万，火炮约70门。

1931年10月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下令轰炸锦州。

10月8日中午，日机11架（侦察机6架、轰炸机5架）从沈阳机场起飞，13时40分飞抵锦州上空，对辽宁省政府所在地的交通大学、第28师兵营和张作相公馆等处投下25公斤重的炸弹75颗。接着，日本关东军派其豢养多年的汉奸凌印清为“东北自卫军总司令”，派奉天讲武堂教官日本预备役步兵上尉仓冈繁太郎等14人为顾问，收买利用土匪组织伪军，骚扰辽西地方治安，并策动张学成叛乱，企图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出兵辽西。但是，这两股汉奸土匪武装均被锦州地方当局迅速消灭。这样，日军便又寻找别的借口，以便直接出兵攻占锦州，夺取辽西地区。

11月间，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按照关东军的训令，在天津先后制造了两起暴乱事件。11月26日夜，关东军接到驻天津日军的急电称：“在天津附近，日华两军再次冲突，军决定断然行使自卫权，击退当面之中国军，切望迅速增兵。”本庄繁立即复电：“军准备立即集结兵力，然后向山海关前进，救援贵军的危急。”11月27日凌晨1时，关东军司令官命令混成第4旅沿北宁线进至大凌河一线，掩护军主力开进，并为进攻锦州附近中国军队阵地实施侦察；令混成第39旅和第2师主力到沈阳集结。同时派飞机搜索锦州方面守军的情况并支援混成第4旅行动。8时以后，日军在白旗堡绕河一带与中国东北军发生战斗。由于国民党政府经与英、美、法等国商谈，已于11月25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所以这时，日本政府和军部恐怕引起国际上的反对，又于当天下午两次电令关东军停止前进，进入辽西的部队一律撤回辽河以东。日军其他后续部队也退回沈阳。

12月上旬，关东军为了一举侵占锦州和辽西地区，一再以所谓“讨伐匪贼”的名义要求增派兵力。

12月7日，日本陆军大臣致电关东军，表明了军部关于攻占锦州的意图。12月13日，关东军司令部制定了《进攻锦州的方略》，决定从北向南直指锦州。经天皇批准，于12月17日派遣混成第8旅，27日派遣第20师司令部和混成第38旅，以及坦克、野战炮兵等部队侵入中国东北参战。日本新组成的犬养毅内阁也同意了军部进攻锦州的计划。

天津事件：1931年11月8日晚，由日本浪人及汉奸组成的便衣队，从日租界冲出袭击华界，与中国军警发生冲突。驻天津日军下令戒严，土肥原等策动薄仪去东北充当傀儡。11月26日，土肥原又制造第二起天津事件，关东军以侵救天津日军为名，越过辽河，指向锦州，遭到中国军队的英勇抵抗。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22页。

12月15日，日军参谋部给关东军下达侵占锦州的内部训令，关东军随即作好了进攻锦州的一切部署。12月28日，日军第2师、第20师、混成第39旅、混成第8旅和飞行队向锦州发动进攻，1月1日从三面包围了锦州。锦州守军由于得不到支援，将领又缺乏抗战守土的决心，从12月29日起即开始撤退；1月3日晨，全部撤出锦州。3日下午，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锦州的失陷，为日本向华北扩张打开了大门。日军占领锦州后，迅速占领山海关外的全部辽西地区。至此，辽宁省全部被日军占领。接着，关东军下令重新调整了部署。

（三）侵占哈尔滨，攫取东三省特区

哈尔滨当时是东三省特别行政区官署所在地，北满的政治、经济中心，中苏共管的中东铁路的总枢纽。“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顾及到对苏关系，暂时放弃了直接出兵夺取哈尔滨的计划，利用与日本早有勾结的东三省特别行政长官张景惠，建立了傀儡政权，取名为“东省特区治安维持会”，并建立了2000余人的特区警察队。但是，哈市群众反日情绪高涨，再加上吉林边防军代理副司令李振声、东铁护路总司令兼第28旅旅长丁超、第26旅旅长邢占清等部表示抗日，所以张景惠暂时还不敢公开当汉奸。

吉林沦陷后，熙洽在吉林组织伪省政府。11月间，张学良和张作相即电令原吉林省政府委员诚允在宾县建立吉林省政府，并委派其任代理主席，委派冯占海任吉林省警备司令兼第1旅旅长。不到一个月，各县政权组织迅速恢复，形成了与熙洽为首的吉林省伪政权的对立，打乱了日军占领整个北满的计划。于是，日军一面拉拢张景惠，一面把投降日军的原吉林省军编成5个旅，并以投敌叛国的原师长于琛澄为“吉林省剿匪司令”，企图消灭抗日力量。1932年1月，于琛澄率领伪军王树棠、李毓久两个旅及马锡麟、刘宝林两个混成旅，在日军少校东宫铁男等人的直接指挥下，由舒兰向北推进。1月16日，于部伪军在榆树将东北军第25旅击溃。23日在拉林附近与吉林省警备军冯占海部发生战斗，冯部撤退。然后，于部伪军向哈尔滨节节逼近；日本大特务土肥原也到哈市主持特务机关，企图里外夹攻，正当哈市形势岌岌可危、人心惶惶之时，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领1个团于25日星夜赶赴哈尔滨，与第28旅旅长丁超等成立吉林省自卫军总司令部，推选李杜为总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司令，决心保卫哈尔滨。于琛澄另派刘宝林率一支伪军开到双城堡东十里铺附近，2月1日被第22旅旅长赵毅所率领的部队包围，大部被歼。

当关东军司令部得知于琛澄伪军进攻受挫后，便以哈尔滨形势不稳为理由，要求出兵，立即得到陆军参谋部的批准。关东军司令官于1月28日凌晨4时命令步兵第3旅旅长长谷部少将率该旅（欠步兵第29团）、野战炮兵第8团第1营主力组成长谷部支队，紧急开赴哈尔滨；同时命令驻沈阳的步兵第29团准备出动。29日，本庄繁又命令第2师主力和第29团到长春集结待命，沈阳的独立飞行第9中队也调至长春。

30日，中东铁路南段落入日军之手。随后，日军第2师经双城、哈尔滨外围等激战于2月5日进占哈尔滨。吉林抗日军向宾县、巴彦方向撤退，但数量不过1.2万余人。至此，历时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及一个特区全部沦陷，原省区的政权和东北军逐渐瓦解，以若干爱国将领率领的部分东北军

为主体的对日抵抗活动逐渐消沉，代之而来的是东北各地掀起的义勇军的抗日斗争。

第三节 日本炮制伪满洲国

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的出笼

日本帝国主义在发动“九·一八”事变以前，即提出了对中国东北地区如何实行殖民统治的种种设想。在1931年4月制定的日军参谋部形势判断中，曾提出了三个阶段亦即三种形式：一是扶植卖国集团，成立亲日政权；二是建立“脱离中国本土”的“独立国”，即扶植傀儡政权；三是吞并中国东北，划入日本版图。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起，即9月19日至22日的几天内，关东军反复讨论了这个问题。日军参谋部派遣的建川美次少将以特使身份参加了讨论。经过研究之后，确定了“满洲问题解决方案”。这个方案的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

建立由我国支持，领土包括东北四省及蒙古，以宣统皇帝为元首的中国政权，成为满蒙各民族的乐土。

第二要领

(1) 根据新政权的委托，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管，交通、通信的主要部分也由日本管理。

关于其它内政，由新政权自行处理。

(2) 关于元首及我帝国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

(3) 为负责维持地方治安，大致起用下列人员为镇守使：

熙洽（吉林地区）

张海鹏（洮索地区）

汤玉麟（热河地区）

张景惠（哈尔滨地区）

（以上这些人原属于宣统帝一派，与本军有联络关系）

(4) 地方行政，由省政府任命新政权的县长。”

这个方案是日本帝国主义统治中国东北的一个基本方案，也是后来建立伪满洲国的一个草图。

关东军根据陆军省军务局长小矶国昭的推荐，起用日本满铁调查科松木侠为国际法顾问，又起用日本外务省“特约顾问”驹井德三为财政顾问，研究和炮制建立“新政权”的具体方案和各项殖民政策。

1931年10月21日，松木侠与关东军参谋板垣、石原等炮制的《满蒙共和国统治大纲草案》，10月23日，满洲青年联盟理事长金井章次提出的《满蒙自由国建设纲领》，以及1932年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根据板垣的汇报，共同制定的所谓《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等等，可以说都在这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的基础上，作了些具体补充。这些方案虽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61、第189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89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84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42页。

然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设想，但其基本点，都不外乎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所说的“关于建立新政权的三条根本原则”，即：“（1）使满蒙完全脱离中国本土。（2）一手统一满蒙。（3）表面上由中国人统治，但实质上要掌握在我方手里。”“至少要掌握军事、外交和交通的实权。”1932年1月13日，板垣捧着日本天皇的敕语，带着《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由东京返回沈阳。从此以后，关东军依据日本政府的旨意，进一步加速了建立傀儡政权的步伐。为了转移国际视听，板垣给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少校发电，让他制造事端，遂酿成了上海“一·二八”事变。

二、拼凑伪省政权与成立“自治指导部”

日本关东军炮制出《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时，向东北各地的进攻仍在进行，所以决定随着军事占领地区的扩大，先成立省、县等地方伪政权。

1931年9月22日，日军参谋副总长致电派到沈阳的建川美次，表示同意开始进行谋略活动的意见。于是，当天16时，关东军向天津日军司令官发出电报，让他把住在日租界的傅仪等置于其“保护”之下。接着又连日派人分别同哈尔滨的张景惠、吉林的熙洽、桃辽的张海鹏、东边道的于芒山等人进行联络。经过这一番紧锣密鼓的活动，首先宣布“独立”的是吉林省的熙洽。熙洽是溥仪的远支宗室，是搞清朝复辟运动的宗社党一派的巨头之一。他准备借日军的力量，恢复清朝。他曾发誓说：“……为恢复清朝的统治，就是肝脑涂地亦在所不惜。”9月26日，熙洽宣布伪吉林省长官公署成立，自任会长，统辖吉林省的军民两政。9月28日，熙洽声明同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脱离关系，宣布“独立”，并“聘请”日本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和吉林“满铁”公所长滨田有一等7人为顾问团，掌管长官公署军政各方面的实权。

辽宁省伪政权的建立几经周折。日军占领沈阳后，根据吞并领土方案，立即任命土肥原为沈阳市长。当改为建立“独立国”方案后，日本陆军中央认为关东军直接实行军政太过露骨，关于地方行政只应做到维持治安的程度。为物色适当的人选，直到10月20日，关东军才让土肥原下台，起用日本豢养多年的汉奸赵欣伯，充当伪沈阳市长，另派几名日本顾问进行监督。辽宁省的傀儡政权，先是在1931年9月24日，利用亲日派袁金铠和老牌汉奸于冲汉等，出来组织“地方自治维持会”，9月26日，改为“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袁金铠充当委员长，于冲汉、阚朝玺充当副委员长，暂代行省政府职能。与此同时，日本侵略者又指示汉奸组成“辽宁四民临时维持会”，以恭亲王溥伟为会长，又组织了“东北绅民时局解决方案讨论会”，为其进一步拼凑整个东北傀儡政权大造舆论。9月28日，赵欣伯等与“辽宁地方维持委员会”一起，发表了一个所谓“独立宣言”，宣布脱离张学良政权。

11月10日，辽宁省伪政权正式组成，以袁金铠为伪省长，并从11月20日起，将辽宁省改为奉天省。后来，关东军认为袁金铠这个傀儡效命不力，

关宽治、岛田俊彦：《满洲事变》，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版，第418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191～192页。

《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6页。

“四民”指商、工、农、学。

12月13日决定用事变后被软禁的前省政府主席臧式毅出任伪省长。12月15日，伪奉天省政府成立，臧式毅就任伪省长，袁金铠的“辽宁省地方维持委员会”解散。16日，臧式毅通电声称，不承认在锦州设立的张学良政府。臧式毅就任后，任命原维持会顾问金井章次为省政府首席顾问兼交通委员会顾问，大雄峰会骨干分子中野琥逸为奉天市首席顾问；其它重要部门也均有日本顾问。至此，在辽宁总算拼凑成了脱离中国而在日人控制下的“新政权”。

张景惠在哈尔滨拼凑治安维持会。当时的哈尔滨和中东铁路附属地属于东三省特别区管辖。“东省特别区”长官张景惠和日本人早有勾结。“九·一八”事变时，张景惠正在沈阳。9月22日，板垣秘密策动他返回哈尔滨宣布“自治”。9月27日，张景惠宣布组织“东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9月30日，又以“维持地方治安”为名，招募2000余人的“特区警备队”，枪支弹药均由日军秘密提供。由于哈尔滨周围驻有抗日武装，哈市人民抗日热情高涨，所以直到1932年初，张景惠才发表“独立宣言”，公开叛国。

另外，在日本人的积极策动下，吉林洮辽镇守使张海鹏于1931年10月1日宣布“独立”，自任伪边境保安司令。同月16日，辽宁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成立伪“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黑龙江的伪政权是在马占山决定投敌后建立的。

1931年11月19日，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马占山率部退至海伦，继续坚持抗日。

25日，日军扶植劣绅、前黑龙江省府委员赵仲仁等，在齐齐哈尔成立“地方维持会”，同时决定由张景惠出任伪黑龙江省主席。张景惠见马占山未降，迟迟不敢就任。30日，日军第2师师长多门二郎曾致函马占山诱降，马未予置理。但马占山常与赵仲仁及哈尔滨义祥火磨经理韩云阶（后为黑伪省长）等来往。这两个汉奸常到哈见张景惠和日本人，密谋将马占山出卖，实际上他们已成为马占山的入幕之宾。12月6日，本庄繁派板垣一行5人到海伦诱降。马占山于7日晚会见板垣。板垣以不反抗日军为条件，诱使马占山就任黑龙江军政帮办或警备司令之职，而把黑龙江省主席职务让给张景惠，遭到马占山的拒绝。此后，板垣极力催促张景惠出面，从事诱降活动。马占山允许张景惠到黑省政府主持政务。但不许有日人干预，且马部军费仍由省府照拨。1932年1月1日，张景惠在板垣的指使下，在哈尔滨发表“独立宣言”，就任黑龙江省省长。1月6日，马占山由海伦赴哈尔滨，会见张景惠和驹井德三，表示愿与张合作，张即于当日下午乘火车赴龙江。翌日，张景惠发表就任伪省长宣言。然后，委派当地绅士吉祥代理伪省长职，并组成顾问部。当天下午，张景惠返哈尔滨。伪省府的实权，完全由日本顾问村田恂鹰等人掌握。至此，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的伪政权都建立起来了。

为了把所谓“自治运动”扩展到县、市，1931年11月10日，日军指使汉奸于冲汉在沈阳成立伪“自治指导部”，其任务是监督和指导各县行政，拼凑县一级政权等。

“自治指导部”受关东军参谋部指挥，实权掌握在日本顾问中野琥逸和中西敏宪手中。“自治指导部”下设总务、社会、调查、指导、监察五部和自治训练所。关于“自治指导部”的情况，曾任该机构社会部长的笠木良明，战后在东京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认：“这个团体的主要目的是发展独立运动，

给独立运动以指示和援助。这个团体的头目虽然是中国人于冲汉，此外还有几个中国人，但占全体人员的 90%，并居于最负责地位的，都是日本人。”“这个团体的活动经费，是由关东军拨给的。我们与关东军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的一切政策和活动，都必须得到关东军的同意”。

“自治指导部”成立后，除命令各县贯彻“自治指导部”的条例和章程外，并分派日本人到各县就任自治指导委员会委员长，负责监督改组和指导各县的施政。各县傀儡政权的骨干，大多由“自治训练所”（后改为大同学院）培训出来的汉奸充任。

“自治指导部”不只是日本侵略者攫取县市一级政权的主要工具，同时还是制造伪满洲国的重要宣传机构。许多有关“满蒙独立运动”的宣传品，以及各县所谓“促进”伪满洲国建立的电文，都出自这个机构，以图盗用“民意”，蒙蔽世界公众耳目。

三、策动溥仪到东北

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被迫退位。1924年11月5日，溥仪被冯玉祥的国民军赶出北京皇宫，以后逃入日本公使馆。1925年2月，溥仪被送到天津日租界居住。日本用各种方法拉拢和控制溥仪；而溥仪则“一心专作恢复满清的迷梦。”他恰好成了日本统治东北的一个理想的傀儡人物。据日本战犯“城野宏笔供”交待：“溥仪之所以被选中”，首先，他“同中国本部的国民党没有任何联系”；其次，“满洲和蒙古的一些旧的阶层对于清朝还怀有传统的向往”；第三，“一般无知的农民……对由满族的爱新觉罗家实行的王道政治似乎更加欢迎”……溥仪具备作为傀儡的优越条件。于是便决定迎接溥仪出山。”

日本侵略者筹划建立全东北的傀儡政权，可以说是与拼凑省、县傀儡政权同时进行的。“九·一八”事变的前两个月，曾任天津日军司令部参谋的吉冈安直少校，通过回国度假的溥杰，给溥仪捎了个口信，说：“你到了天津，可以告诉令兄：现在张学良闹的很不象话，满洲在最近也许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这是东北将要发生事变的信息，也是要起用溥仪的一种暗示。“九·一八”事变后，9月30日，关东军派罗振玉和日人上角利一到天津，向溥仪转达了板垣的意见，并递交了汉奸熙洽的“劝驾信”。信中请溥仪“勿失时机，立即到‘祖宗发祥地’主持大计。”这次会见是由中国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安排在海光寺司令部进行的，香椎见溥仪“犹豫不定”，也借口“天津的治安情形不好”，希望溥仪能“动身到东北去”。

板垣等人更是积极活动，曾先后派川岛浪速和金梁到天津，劝诱溥仪。

〔日〕朝日新闻法庭记者团：《东京审判》上卷，第 345 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 366 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 387 页。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 264～268 页。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 264～268 页。

10月下旬，关东军向奉天特务机关长土肥原发出训令：“不管怎样，希望利用良机，将溥仪极为秘密地转移到最安全的地区。”于是土肥原奉命秘密去天津，具体策划挟持溥仪的阴谋活动。土肥原是日本陆军上校，在“九·一八”事变前约18年间居住

中国，被视为陆军部内的中国通，是个善于搞阴谋诡计的两面派。“溥仪笔供”称：土肥原贤二“极力地劝我上东北主持，他表示日本决没有领土野心，一切由我自主。他说满洲是清朝故乡，我应当到满洲主持一切等等的話。……我想这是恢复满清唯一机会，我便答应了他的要求。”

土肥原急于把溥仪带到东北，除指使特务在给溥仪的果品筐里放炸弹，写恐吓信之外，又在11月8日晚制造了“天津事件”。张壁、李际春组织的汉奸便衣队2000多人，等海光寺日本军营警钟一响，都从日租界出动，分赴马场道、草厂庵、鱼市一带开枪射击。驻天津日军司令部立即下令占领了日本租界的外围线，断绝了与中国管辖市区的交通，并把溥仪居住的静园严密封锁起来。在这一片混乱中，土肥原实现了秘密将溥仪带出天津的计划。

1931年11月10日傍晚，按照计划，瞒过所有的耳目，由祁继忠把溥仪藏进一辆双座敞篷汽车的后箱里，载出了静园。吉田坐在一辆汽车上，悄悄跟在后面，顺利通过了各个路口，到了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在这里他们给溥仪换上日本军装，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畅行无阻地到了英租界的一个码头，登上一只没有灯光的小汽艇。郑孝胥父子俩如约等候在里面。另外，还有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在十多名日本兵的护送下，十分紧张地逃到大沽口。然后，溥仪被送上日本商船“淡路丸”，13日到达营口市的满铁码头。关东军派来的甘粕正彦，把溥仪接到汤岗子温泉疗养区的对翠阁旅馆暂住。

当时，国联正在开会，日本处境孤立，因而日本内阁不敢贸然行事。11月16日要陆军大臣电告关东军：“关于拥立溥仪之事，操之过急会徒然刺激列国，望与中央联系后处理”。于是，关东军借口汤岗子附近有匪，于11月18日又把溥仪转移到旅顺大和旅馆，严密封锁起来。

四、伪满洲国的建立与“日满议定书”的签订

1931年11月21日，国联大会决定组织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九·一八”事变，日本政府为了造成事实，对付调查团，决定在调查团到达之前，抢先建立伪满洲国。

（一）“建国会议”与“建国运动”

1931年12月11日，日本着槻内阁倒台。12日，政友会头子犬养毅组成新内阁后，日本政府对军部和关东军在中国东北建立傀儡政权的计划和行动，采取了完全支持和赞同的态度。12月29日，前任日本陆军大臣南次郎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351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369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267页。

（时任军事参议官）被派到中国东北“视察”，回国后，向日本天皇作了“满洲近况”的报告，并提出了建立傀儡政权，实行殖民统治的一些具体办法。

1932年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后，新任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立即催令板垣或石原去东京。1月4日，本庄繁急忙召集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石原、片仓衷以及顾问驹井、松木侠等，讨论建立伪“满蒙中央政府”的具体“设想”，把它作为关东军司令官的“指示”，由板垣带到东京，向日本政府汇报。根据板垣的汇报，1月6日，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和外务省共同制定了如前所述的《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1月13日，板垣带着这份“纲要”回到沈阳，关东军更加紧了拼凑东北傀儡政权的活动。1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三宅主持召开了高级幕僚会议，参加者除了参谋板垣、石原、松井、竹下、和知、片仓以外，还有土肥原、花谷等，讨论了松木侠起草的所谓“新国家”最高机关的问题、“人权保护条例”、交换备忘录，决定了大纲。板垣在与汉奸赵欣伯多次密商后，于27日到汤岗子拟制了一个有关伪国的“建设顺序的纲要”。

2月初，田中新一少校从东京来到沈阳，传达日本陆军大臣荒木贞夫关于在2月中旬以前宣布建立“新国家”为上策的指示。从2月5日到25日，关东军接连召开了10次所谓“建国幕僚会议”，加紧策划并具体制定建立伪国的方案。由于这时马占山的态度尚未明朗，决定由板垣、张景惠等加紧作诱降马占山的工作。辽宁伪省长臧式毅也派人同马占山、张景惠、熙洽等联系，提出“联省自治”方案。

2月14日，关东军参谋片仓衷在板垣的授意下，并得到司令官本庄繁和参谋长三宅光治的允许，同臧式毅就以下事项进行了磋商：（1）马占山来到后，16日下午4时，四省长正式“访问”关东军司令官。（2）16、17日的会议，中国方面可采取任意形式。（3）18日发表宣言。（4）推举马占山就任（黑龙江）省长。（5）建立政务委员会的地点，由会议决定。（6）本会议主要讨论的事项是：政体、国号、首府、主要职员、“新国家”成立的日期、委员的具体人选等。

2月16日，按照关东军的指示和板垣拟定的“纲要”，在沈阳召开了伪“建国会议”，出席会议的主要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马占山四人，所以又称“四巨头会议”。参加会议的还有老牌汉奸于冲汉、袁金铠和赵欣伯。关东军方面参加会议的有参谋长三宅，参谋板垣、和知及特约顾问驹井德三等。在这次会议上，板垣迫令“四巨头”放弃“联省自治”主张，接受他事先拟定的制造伪国的计划，并限于3月1日成立“新国家”，会议决定建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宣言，并指定专人起草“建国宣言”。2月17日14时，伪“建国会议”举行第2次会议，成立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张景惠为委员长，臧式毅、熙洽、马占山、汤玉麟、齐王（哲里木盟的齐默特色木丕勒）、凌升（呼伦贝尔盟）为委员。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这个伪组织的名义，发表“宣言”，宣布“东北四省和一个特别行政区及蒙古各王公组织一个机关，名曰东北行政委员会。本会成立的同时，通电内外，从此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32~333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56、351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67页。

与国民党政府脱离关系，东北省区完全独立”。这个宣言的署名者中，汤玉麟、齐王、凌升并未参加会议，马占山托病返回海伦，也未签字，足见其欺世盗名的把戏了。从2月18日到24日，这一小撮汉奸在日本侵略者的操纵下，连续召开所谓“建国会议”，虽然一致同意溥仪为“元首”，但对国体、政体却有意见分歧。熙洽叫他的代表张燕卿、谢介石坚决主张实行帝制，而张景惠、臧式毅、赵仲仁等坚持立宪共和制。其实，一切争论都是徒劳的。最终得由关东军司令部的“建国幕僚会议”决定。2月25日，板垣拿出了关东军制定并经日本军部和政府批准的方案，以“东北行政委员会”的名义发表。这个方案具体规定，所谓“新国家”叫“满洲国”；国家元首叫“执政”；国旗为红蓝白黑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新国家”的政治为“民本主义”。2月29日，关东军还决定溥仪为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为国务总理，张景惠为参议府议长，于冲汉为监察院院长，赵欣伯为立法院院长，等等

在召开“建国会议”的同时，关东军指使“自治指导部”自2月15日起，普遍开展“促进建国运动”，千方百计地从事伪造“民意”的宣传。此项所谓“促进建国运动”，每五天一期，分三期展开。第一期为宣传、准备时期，由省城各团体发表通电，主张“脱离国民政府”，建设“新国家”，“推戴”溥仪，各县复电表示“赞成”；第二期为地方运动时期，由省、市、县等各地以“民众名义”，组织拥护建立伪满洲国的游行示威；第三期是组织全省的游行，最后在沈阳组织各省、区代表的所谓“总游行”。

沈阳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日本侵略者伪造“民意”、表演“建国”丑剧的中心。关东军司令部指令伪省、市政府，伪“自治指导部”及伪市商会等联合组成所谓“民众促进建国大会筹备委员会”，负责筹备工作。2月27日早晨，在沈阳南市场召开了所谓“市民大会”。2月28日上午，在“自治指导部”大礼堂（同泽女中校址）召开伪“全省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宣言和决议。29日中午，召开了“全满建国促进运动联合大会”，强迫代表通过大会宣言和决议，并选出11名代表去旅顺迎接溥仪。下午又组织了由数十辆汽车组成的游行队伍。吉林、哈尔滨、齐齐哈尔各地的“促进建国运动”也都如法炮制，丑态毕露。

（二）溥仪粉墨登场

溥仪到达旅顺以后，受着甘粕正彦和上角利一的严密监视，除了清室余孽郑孝胥父子和罗振玉极少数人以外，不准接见其他人。板垣在汤岗子拟定了一个伪国“建设顺序的纲要”以后，于1932年1月29日，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之命，到旅顺去探询溥仪的真意。溥仪虽然同意当“新国家”的元首，但是主张恢复帝制，保留皇帝的称号。后来，溥仪听说“东北行政委员会”按照关东军司令部的决定，通过一项决议，要在中国东北成立一个“共和国”时，立即写了12条必须恢复帝制的“理由”，叫郑孝胥、罗振玉去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385页。

同上，第391~392页。

同上，第395~396页。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302页。

沈阳交给板垣。2月21日，郑、罗二人在沈阳同板垣进行了会谈，恢复帝制的主张未被采纳。2月23日下午，板垣奉本庄繁之命到达旅顺会见溥仪，当晚谈了3个小时，溥仪始终表示不能放弃这个皇帝身分。于是，板垣冷冷他说：“阁下再考虑考虑，明天再谈。”便告辞了。第二天，板垣根本就不再与溥仪面谈，而是通过郑孝胥等向溥仪传达：“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果不接受，只能被看做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做答复，这是军部最后的话！”

溥仪听了这个回答，便怔住了。最后，只好以罗振玉提出的“暂定一年为期，如逾期仍不实行帝制，到时即行退位”为条件，叫郑孝胥去和板垣商量，结果板垣表示同意。溥仪就这样抱着未来“复位登极”的幻想，公开叛国投敌，充当了日本帝国主义者血腥统治中国东北的帮凶。

3月1日，日本侵略者假借伪满洲国政府的名义，发表了一个所谓“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的成立。同时，按照关东军的安排，张燕卿、谢介石等9人到达旅顺，作第一次“请驾”。溥仪先叫郑孝胥代表自己接见，然后亲自出场，无非是一方“恳请”，一方“婉辞”。历时不过20分钟，各自退场。3月4日，“代表”增到29人，作第二次“请驾”。溥仪表示“暂任执政一年”。最后，又由张景惠、赵欣伯、谢介石等作第三次“请驾”。走完“过场”，3月6日上午，溥仪和婉容以及郑孝胥等人，在日本特务的严密监视下，乘火车离开旅顺，下午到达汤岗子。张景惠、赵欣伯、张燕卿等人早已等候在那里，表示“恭迎”。此时，板垣和片仓衷等来到汤岗子，决定伪满洲国的最后人事安排和作其他文书等准备。他们在此过了一夜，次日一同前往长春。3月8日，火车到达长春站。“车还未停，就听见站台上响起军乐声和人们的呼叫声。”溥仪在汉奸张景惠、熙洽以及日本特务甘粕、上角等一帮人的簇拥下走上站台，“看见到处是日本宪兵队和各色服装的队列。在队列里，有袍子马褂，有西服和日本和服，人人手中都有一面小旗。”当他看到“一队夹在太阳旗之间的黄龙旗”时，不禁热泪盈眶，觉得他的复辟“是有希望的。”溥仪坐上汽车，被送到“执政府”。

3月9日，举行了溥仪的“就职典礼”，“满铁”总裁内田康哉、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参谋长三宅光治、参谋板垣等都到了场。参加“典礼”的还有汉奸郑孝胥、罗振玉、张景惠、熙洽、臧式毅、张海鹏以及清室余孽胡嗣援、陈曾寿、三多、赵景祺，蒙古王公贵福、齐默特色木丕勒和贵福的儿子凌升等等。臧式毅和张景惠二人献上了“执政印”。郑孝胥代念了“执政宣言”。然后，溥仪“接见外宾”、内田康哉致“祝词”，罗振玉代溥仪读了答词。

第二天，溥仪根据关东军司令部提出的名单，任命了伪满洲国的官吏。他们是：伪国务总理兼文教部总长郑孝胥，民政部总长兼奉天省长臧式毅，军政部总长兼黑龙江省长马占山，财政部总长兼吉林省长熙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司法部总长冯涵清，实业部总长张燕卿，交通部总长丁鉴修，此外还有立法院长赵欣伯，监察院长于冲汉，参议府议长兼北满特区长官张景惠，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06页。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第307页。

爱新觉罗·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81年版，第312页。

参议府副议长汤玉麟（未到任）。议员袁金铠、罗振玉、张海鹏、贵福。伪满洲国的各级政权组织均设日本顾问和官吏掌握实权。正当日本侵略者大肆宣传在它刺刀下扶植的伪满洲国代表“民意”时，一度动摇妥协，被诱逼参加伪政权的马占山，通过所见所闻，认识到他受了欺骗，遂于4月1日率部队反正，重新举起抗日义旗，揭露伪满洲国产生的内幕，给日本侵略者的丑恶表演以当头一棒。

（三）“日满议定书”及密约

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溥仪当了“执政”的第二天，根据板垣的事先安排，他同日本帝国主义签订了一个卖国条约。这项密约形式上是溥仪递交本庄繁的，而实际上是本庄繁强迫溥仪签字的。其主要内容有：

（1）敝国关于日后之国防及维持治安委诸贵国，而其所需经费均由敝国负担；

（2）敝国承认贵国军队凡为国防上所必要，将已修铁路、港湾、水路、航空等之管理及新路之布设，均委诸贵国或贵国所指定之机关；

（3）敝国对于贵国军队认为必要之各种设施竭力援助；

（4）敝国参议府就贵国之人选有达识名望者任为参议，其他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亦可任用贵国人，而其人物之选定委诸贵军司令官之同意。前项参议之人数及参谋总数有更改时，若贵国有建议则依两国协议以增减也；……”

这纸文件的签署，彻头彻尾地表现了伪满洲国的傀儡性质。

3月12日，日本公布了内阁会议决定的《处理满蒙问题方针纲要》，声称：满蒙要“脱离中国本部政权而独立”；“满蒙的治安”“由帝国担任”；“将满蒙地区作为帝国对俄对华的国防第一线”。还声称：为达这个目的，“应增加帝国陆军驻满洲的兵力”和“进行必要的海军设施”。

同一天，日本指使伪满洲国外交部总长谢介石，向英、美、法、日、意等17国发出所谓“建国宣言”，并要求各国承认。

5月15日，日本法西斯少壮派军人发动武装政变，史称“五·一五事件”，杀死首相犬养毅等。事变平息后，5月26日斋藤实上台组阁，7月6日任命“满铁”总裁内田康哉为外务大臣。为了加强对伪满洲国的统治和殖民化，以及准备下一步的侵略，日本扩大关东军的编制和权力，采取军事、外交、行政三位一体的形式，并于8月8日，由日本天皇任命教育总监兼军事参议官武藤信义上将为关东军司令官兼任特命全权大使和关东厅长官，陆军次官小矶国昭为参谋长，冈村宁次为副参谋长。并将原司令官本庄繁，于翌年任命为天皇近侧的侍从武官长，以奖励他侵占中国东北的武功。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同日上午，武藤信义率幕僚随员等多人到伪执政府与溥仪会面，并与伪满洲国国务总理郑孝胥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其主要内容有两条：

〔日〕黑羽清隆：《日中15年战争》（上），教育社，1979年版，第120~121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第409页。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04~205页。

“（1）满洲国在将来，即日满两国尚未另行签订约款前，对于日本国或日本国臣民在满洲国领域内根据以往日中两国间的条约、协定、其它条款以及公私契约所享有的一切权益，应予以确认和尊重。

（2）日本国和满洲国确认，对于缔约国一方的领土及治安的一切威胁，同时即成为对于缔约国另一方的安宁和存在的威胁，两国相约共同担负防卫国家的责任，为此需要日本国军队驻扎于满洲国内”。

在《日满议定书》里，除保留了3月10日的密约外，又增加了新的密约，例如：《关于满洲国政府铁路、港湾、航路、航空线等的管理和铁路线的敷设、管理的协定》及其“附属协定”，《关于设立航空公司的协定》，《关于规定国防上必需的矿业权的协定》。只是为掩人耳目，这些条约作为附件，而未敢公诸于世。通过这些奴役性的条约，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一切大权，把中国东北完全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集大权于一身的武藤信义，成了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溥仪成为地地道道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傀儡。两年后的1934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这个所谓“满洲国”，打扮得更象个“王道国家”，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为“康德”。但是，不论其名称如何改变，一切都得听任日本帝国主义宰割，溥仪只不过是儿皇帝而已！正如他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所说：

“表面上‘满洲国’是独立国家，但在事实上完全是关东军干的。”“满洲国”的“大臣全是中国人，而次长绝大多数是日本人。所谓大臣不过是一种装饰品，实际是由日本人次长操纵行政。”“就‘满洲国’政权而言，由日人担任的总务长官权力最大，远在国务总理之上。一切敕令或国务院令都在以总务长官为主席、第四科科长为副主席，还有各部次长参加的秘密会议里决定。我们把这个会议称作火曜会议”。“在‘火曜会议，上已经决定的事情是不许中国人反对的。一旦有人反对，总务长官便厉声说道：‘这是既定方针！’如果你坚持反对，那是有生命危险的。因此，‘满洲国’的中国人都有恐怖心，即使是阁议或首长会议上，也是什么话都不能说。后来，吉冈中将受命于关东军司令官，来到我身边监视我的一举一动。”“吉冈中将不许我与‘满洲国’军司令官单独谈话，即使许可也是只限于用纸笔，这已属常事，无须惊奇。我过生日时北平的友人来祝寿，也是不准见面的。”

这就是傀儡皇帝的处境，其他傀儡走狗的景况更可想而知了。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原书房，1969年版《文书》，第215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499～505页。

“火曜”即星期二。

《法庭上的皇帝》，吉林文支出版社，1985年版，第32～34页。

第四节 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后的国际反响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妄图变中国为它的独占殖民地。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首次发生的用武力重新瓜分世界的重大行动，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各国人民强烈谴责日本的侵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各国政府基于各自的立场，作出了不同的反应，其中反应最强烈的是苏、美、英、法等国政府。

一、苏联在道义上同情与支持中国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出于对被压迫民族的同情和自身安全的考虑，在道义上始终是同情和支持中国的。9月21日，苏联《真理报》谴责日本对中国的野蛮侵略，揭露英美帝国主义对日本的纵容说：“发起非战条约各国对日本帝国主义之举动，无只字反对，故对于自身之工作，不啻自唾其面，国联为和平工具之价值何在”。9月23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致电中国政府说：“日军在东三省行为之扩大，实出苏联意料之外，苏联对于中国甚表同情”。9月24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发表声明，表示：“苏联在道义上、精神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并愿作一切必要的帮助”。9月25日的《真理报》写道：“只有一种力量能够结束帝国主义者对中国劳动者的强暴行为——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赢得中国工农革命的胜利。……当日本帝国主义企图镇压中国人民时，全世界的工人正在奋起保卫中国革命。苏联的劳动者极其认真地关注中国的斗争，他们的同情心在中国人民一边。”

10月19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再次发表声明提出：“苏联所奉行的主义与国际侵略行为根本是水火不相容的，苏联决不允许与帝国主义者合作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苏联人民极盼中国从速用自己巨大的力量，来制裁日本在满蒙的阴谋”。10月29日，《真理报》在评论中指出：“（日本首相）若槻向美国新闻记者谈话，指满洲事件由于中国对日侵略结果所激起，并苦诉中国之对日经济抵制，其意殆图掩饰时局，一若中国为占领满洲之造端者。全世界劳动界皆目击日本帝国主义者毫无羞恶之心，劫掠中国。”

11月5日，《真理报》又进一步揭露：“日本所以欲攫取满洲者、无非欲在太平洋上争得霸权。”在此期间，苏联人民还多次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当日军侵占辽吉两省许多重要城镇，继续沿中东路北上扩大侵略时，苏联政府于9月23日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提出强烈抗议，表示：“日本侵犯中东路权利时，苏联在相当范围内不得不取

《国闻周报》第8卷第38期，1931年9月28日。

同上。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2辑，四川省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32~333页。

《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

《东方杂志》第39卷第1号，第22页。

同上。

防止手段”。由于苏联的警告，迫使日军暂时停止了沿中东路北侵的计划。当东北部分抗日义勇军于1932年冬被迫退入苏联境内时，受到了苏联政府的热情接待。后来，苏联政府又严词拒绝了日本方面“引渡”义勇军将领的无理要求。中苏两国于1932年12月12日恢复了自1929年以来中断的外交关系。这些举动，无疑是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和鼓舞。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长期在帝国主义包围与威胁之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苏联，过高地估计了日本进攻苏联的可能性，过低地估计了中国人民的抗战意志和能力，为了苏联自身安全，竭力避免同帝国主义国家发生激烈的正面冲突，因而在具体的外交政策上采取了中立主义的立场。柳条湖事件发生40天后，苏联代理外交人民委员向日本驻苏大使广田弘毅声明，苏联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正的不干涉政策。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莫洛托夫，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节的演说中，重申了上述立场。11月20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再次向广田宣布：“苏联政府在同其他国家的一切关系中一贯严格执行和平与和睦关系的政策。它认为，维护和加强同日本的现有关系具有很大的意义。它严格遵守不干涉各国之间冲突的政策。苏联政府希望，日本政府也要维护两国间的现存关系，并将在其所有活动和决定中考虑不违背苏联的利益。”同年12月底，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在会见途经莫斯科回国，即将出任外相的日本驻法大使芳泽谦吉时，提议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初，又暗示有意转让中东铁路。其后，苏联又通过外交途径多次提及此事，甚至流露出假若日本同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方面可以默认伪满洲国的意向。另外，苏联还不许中国从欧洲各国购买的抗日用的军火途经苏联。苏联这种严守中立的立场，使它对中国的支持显得软弱无力了。

二、美、英、法等国的两面政策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是对英美在亚洲势力范围的严重挑战，是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猛烈冲击。但是，由于他们正处于严重经济危机的困境之中，日本的侵略范围暂时还局限于东北三省，又打着反苏反共的旗号，所以英美对其抱有幻想。他们曾经希望日本帝国主义，假道中国东北，北上进攻苏联，自己坐收渔人之利。

“九·一八”事变前一天，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商谈并达成一项秘密谅解：美国允许“不与闻满洲事变”，而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9月20日，美国国务院远东局局长霍恩贝克奉国务卿史汀生之命，召见日本驻美大使出渊胜次，对“事变”发生表示“惊讶”。9月21日，国民党政府请求美国政府向日本指出：“日本在中国东北的行动是违反1928年8月27日的凯洛格——白里安公约的”。可是，美国国务院认为没有必要公布中国的照会，而且也没有给予任何答复。同日，国联秘书长德鲁蒙德曾征询美国政府，它是否打算控告日本违反凯洛格公约。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立刻回答说，美国并不认为对东北事件进行这种干涉是合适的。9月24日，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事变”

〔苏〕安·安·葛罗米柯等：《苏联对外政策史》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中译本，第318页。

〔苏〕耶·马·茹科夫：《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5页。

表示“遗憾”、“忧虑”，希望中、日两国政府“各自调处其武装军队”，按照国际公法与国际协定，“达到解决歧见之举动”。

10月8日，日本空袭锦州。美国担心日本向关内扩张，于10月9日召开了专门内阁会议。国务卿史汀生在会上指出，日本的行动表明，它已把各项国际条约“视如一堆废纸”。史汀生提出对日本实行经济制裁可能导致美日战争，只能施加外交压力，即所谓进行“道义制裁”。

10月下旬，美国总统胡佛竟发表谈话赞同日本侵略中国，他说：“假使日本人公开地对我们说：我们不能再遵守华盛顿协议，因为……我们在北方已和布尔什维克的俄国为邻，如果在侧面再有一个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我们的存在就要受到威胁，所以，让我们有恢复中国的秩序的机会吧！……我们是不能提出异议的。”这样，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更加有恃无恐了。11月初，日军向黑龙江推进，西方国家如释重负，以为它要进攻苏联了。于是，美国国务卿史汀生于11月5日向日本驻美大使宣称，美国对东三省事件之态度并未变更。11月16日，美国列席国联理事会的特别代表道威斯在巴黎发表谈话说：“日本为保卫日侨生命财产的安全起见，对满洲的进兵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当日军攻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以后，日本即照会苏联，表示对苏并无意采取敌对行动。而且，于11月26日，由日本驻国联代表芳泽谦吉通知美国，日本准备回师进攻锦州。美国便通过驻日大使向币原外相面交一份备忘录，表示“对此殊为关切”；同时，策动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但日本为了独吞中国东北，进而打开侵占华北的门户，于1932年1月3日占领了锦州。对此，美国政府于1月7日向中、日两国政府发出照会，宣称：

“……鉴于目前的局势及在此局势下美国本身的权利与责任，美国政府认为它有义务照会日本帝国政府及中华民国政府，美国政府不能认许任何事实上的情势的合法性，也不拟承认中日政府或其代理人间所缔订的有损于美国或其在中国国民的条约权利——包括关于中华民国的主权、独立或领土及行政完整，或关于通称为门户开放政策的对华国际政策在内——的任何条约或协定；也不拟承认用违反1928年8月27日中日美均为缔约国的巴黎公约之条款与义务的方法而获致的任何局势、条约或协定。”

这就是美国的所谓“不承认主义”。1月8日，美国国务院又发表补充宣言，表示：美国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也不拟过问任何解决事件之方法，但此项方法不得破坏美国在中国的权利。美国政策的基本点是，既利用日本的北进行动，又限制日本的向南扩张，一切均不得妨害美国在华的权益。这清楚他说明，美国在“不承认主义”中维护的，并不是中国的主权，而是美国在华特权和利益。对日本帝国主义来说，这个所谓“不承认主义”只不过是一纸空文，不起任何作用。

实际上，美国政府不但在外交上支持和纵容日本侵略中国东北，还在武器装备方面向日本提供援助。从“九·一八”事变爆发到1932年底，美国供

《国闻周报》第8卷第39期，1931年10月5日。

〔日〕秦郁彦：《太平洋国际关系史》，福村出版股份公司，1972年版，第201页。

《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13页。

《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4年版，第196页。

《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476页。

应日本军火价值达 1.81 亿美元。

美国报刊舆论与政府观点不尽相同，有少数资产阶级报刊，曾发表过支持日本侵华的评论。如 1931 年 9 月 25 日的《纽约日日新闻》说：“日本自俄国继承满洲，努力开发，至于今日，其功绩之伟大为世人所公认。” 11 月 14 日的《纽约论坛报》写道：“日人军事行动为对于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政策所不能免之反响”。但是，多数舆论是同情中国、指责日本的。9 月 21 日的《纽约世界电闻》指出：“日本乘世界各国政治经济，俱感困难，手足无措之时，占领满洲，不但蹂躏开洛（即凯洛格）非战公约，连把保障中国安全的华盛顿九国公约，亦视同废纸”。《纽约晚报》在 9 月 22 日的评论中说：“日本人依然不脱中世纪之东洋人。……由中国夺取沈阳。他们的凶残，没有国际信义，全然不脱支配旧日本的野蛮酋长的特性。”

美国的人民群众曾多次举行反日示威游行，对被侵略的中国表示同情。

英国对日本侵华的态度比美国更为消极。英国作为一个老牌帝国主义国家，既不愿日本扩张其在华势力，损害和威胁英国的既得利益；又企图利用日本势力，对付苏联和中国革命。英国的在华势力主要在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只要日本的侵略局限在中国东北，英国就不会反对。张伯伦公然宣称：“在满洲事变发生之初，日本曾容忍了中国方面无数挑衅的举动，因此，局势是非难分，我的同情完全在日本方面”。英国《泰晤士报》在 1931 年 11 月 2 日发表评论说：“日本在南满之建设工作，吾人固予以同情与钦羨。日本在满洲所有之重要利益，吾人固承认之。华人妨碍日人合法事业之行为，……以及其他挑衅事件，如日人所陈诉者，……日本在中日交涉中似可立于不败之地矣。”这显然是明目张胆地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辩解。

当日本侵占锦州，美国国务卿史汀生的“不承认主义”照会发表后，英国外交部次官艾登仍明确地表示：“中日关于东三省之纠纷已达 30 年，英政府对此问题，屡加研究，愈不愿冒昧行事。”英国一个内阁成员甚至宣称：“英人最好保持一公平坦白之态度，无论对华对日，均不表示同情。” 1932 年 1 月 11 日，《泰晤士报》在社论中评述英国政府关于对中国东北问题的公告时声称，维护“中国的完整”不是英国的事情。“这种完整在 1912 年时没有存在过，今天也不存在”。该报还自欺欺人他说：“日本人并无意在满洲建立脱离中国而独立的行政机构”。

法国政府对待“九·一八”事变的态度，与英国大体相同。法国的一些官员和资产阶级报纸，赤裸裸他说，他们认为日本是亚洲的“好警察”。英法两国对日绥靖主要是通过国际联盟的活动进行的。法国外长白里安，当时作为国际联盟处理“九·一八”事变问题的会议主席，对国联的活动有决

《东方杂志》第 29 卷第 1 号，第 18 页。

《东方杂志》第 29 卷第 1 号，第 18 页。

《东方杂志》第 29 卷第 1 号，第 17、18 页。

《东方杂志》第 29 卷第 1 号，第 17、18 页。

《现代国际关系史》，知识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95 页。

《东方杂志》第 29 卷第 1 号，第 19 页。

《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37 期，1932 年 9 月 19 日。

〔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 年，第 126 页。

《1931—1939 年国际关系简史》，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 年，第 10 页。

定性的影响。英法两国对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尽管也表示不满，但是，英国还是照常给日本运送大批武器弹药，法国的军事工业康采恩“施耐德—克列索”、“戈特契基斯”、“洛林”和“狄特里赫”等，和日本签定了大批武器和装备的供货合同。法国还向日本提供了8亿法郎的贷款。

美、英、法等国政府的对日绥靖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愈加嚣张。日军在占领锦州从而控制了整个东北以后，立刻把侵略矛头伸向了华北地区。

三、国联决议及李顿调查团

（一）国联决议与执行情况

国联标榜以“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为目的，实际上是帝国主义国家推行侵略政策，对殖民地进行再瓜分的工具。领导权主要操纵在英法两国手里。1931年9月改选后的国联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为英、法、德、意、日等5国；非常任理事国为中国、西班牙、爱尔兰、巴拿马、挪威、危地马拉、南斯拉夫、秘鲁、波兰等9国。美国因同英法争夺领导权失败而未参加，但对国联的活动具有一定影响。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奉政府训令，于21日根据《国联盟约》第11条规定，向国联理事会控告日本侵略中国领土、破坏国联盟约。中国代表要求理事会立即采取措施，制止日本对和平的威胁和形势的恶化。9月22日，国联理事会举行会议，讨论这个问题。当时，日军已经侵占了沈阳、长春、吉林、辽源等26座大小城市。中国代表施肇基在会上发言，要求理事会迅速采取相应的行动，并声明“中国政府准备接受国联为此作出的任何决议”。日本代表芳泽谦吉在会上竭力颠倒黑白，他把“九·一八”事变说成是由于中国“挑衅”而引起的，日本的进攻纯属“自卫”；并宣称日军行动仅是一个局部事件，日本政府准备与南京政府直接交涉，谋求解决。他要求理事会延期讨论，等候日本政府训令。于是，国联理事会按照英国代表薛西尔的主张，授权西班牙代表、国联理事会主席勒乐，对中日两国政府发出内容相同的“紧急通告”：（1）务须避免一切足以使事变扩大或足以妨害和平解决之行为；（2）两国立即撤兵，并使两国人民之生命财产不受妨害；（3）将关于本事件之会议记录及其他文件，通知美国。

国联的这个决议，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无视日本侵略军已侵占中国大片国土的现实，荒谬地要求中国军队从自己领土上“撤兵”。这明明是偏袒日本，为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开脱罪责，哪里有蒋介石、汪精卫们所依赖的“公道”可言？尽管如此，完全听命于国联的国民党政府，仍于9月23日发表声明，严令中国军队避免对日冲突，要求国民维持严肃镇静之态

〔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版，第431页。

国联盟约第十一条为：“（一）兹特声明：凡任何战争或战争之威胁，不论其直接或间接涉与联盟任何会员国，皆为有关联盟全体之事。联盟应采取措施，以保持各国内之和平；如遇联盟任何会员国之请求，秘书长应即召集行政院会议。（二）又声明：凡涉及国际关系上任何足以扰乱国际和平或危及国际和平所依赖之良好谅解之情势，联盟任何会员国有权以友谊名义提请大会或行政院注意。”《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第57页。

度，以待国际公理之解决。日本当局认为：“美英法在远东的利害关系互相对立，还没有形成遏止日本势力发展的联合体制；苏联正在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也没有兼顾西伯利亚的能力。”他们判断，国际联盟并没有实力干涉日本的行动。因此，9月24日，日本政府发表表明，在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解的同时，宣称：日本在中国东北“无任何领土野心”，“日本政府有诚意”采取“防止事态进一步恶化的方针”；并表示愿意将军队撤至“满铁”范围内，就在这“撤兵”的烟幕下，日本侵略军又接连侵占了洮南、洮安和敦化等地，并准备继续向北满推进。

9月30日，国联理事会在日内瓦开会，又作出9项决议，重申日本声明在东北并无领土野心，日本准备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即将军队撤退。决议呼吁中、日双方尽力避免形势恶化，并决定于两星期后复会。这个决议，虽然是提出要日本撤兵，却未规定撤兵期限。这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疏忽”。据国联领导人解释说，这种“疏忽”，是因为日本代表已能使国联行政院理事国相信：仿佛“由于军人固执”，规定确实的撤退期限就会在实际上延长这一期限。国联中消息灵通人士中得悉：美国也不支持关于规定撤兵期限一点，他们借口说这样做“会被认为是强迫日本接受外来的条件”。国联还以对侵略者十分关切的态度，在决议中同时规定，日本撤兵的条件是，在日人生命财产安全得到保障之后。这就为日本拒绝撤兵，扩大侵略提供了借口。结果，日本政府随即照会国联理事会，声言：“因中国政府不能担保东北日侨生命财产之安全，故军事当局不得不取消撤军之决定。因各地日侨无日军保护，危险日增，致使恢复原状，特别困难。”与此同时，日本又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或强迫东北地方中国官吏叛变祖国，组织在日军控制下的伪行政机构；积极策动汉奸张海鹏向黑龙江进犯；并于10月8日出动飞机轰炸了锦州。

鉴于中国东北局势日趋恶化，国联理事会应中国代表要求，于10月13日在巴黎召开会议，法国代表白里安充当主席。在会上施肇基控诉日本在9月30日理事会后，不但不退兵，而且暴行愈演愈烈。日本代表芳泽竭力为日本侵略辩护，竟称东三省为日本生存所系，故不能从该地撤军。白里安表示，中日双方均负维持远东和平责任，应各自约束，理事会当尽最大力量帮助解决。10月16日，美国代表基尔伯以正式观察员资格参加会议。

10月24日，国联理事会作出7项决议，中心内容是：要求日本即日开始撤兵，于11月16日以前完全撤退；要求中国切实保护在华日侨；撤兵完成后，中日两国开始交涉；设立调解机关，解决中日间纠纷。但是，日本方面不仅公然拒绝接受，而且于11月初开始大举进攻黑龙江省。由于英、美、法等大国领导集团不愿因中国受到侵略而去冒与日本直接对抗的危险，不敢制裁日本，因而使国联的3次决议都成了毫无价值的一纸空文。

11月16日，国联理事会在巴黎举行会议。当时，日军已侵占黑龙江省省会齐齐哈尔，并在天津制造事件，增兵沈阳，积极准备进攻锦州和辽西。这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的权益直接受到威胁。美国急忙授意国民党政

〔日〕粟屋宪太郎：《文献昭和史》2，第87页。

〔日〕《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2，朝日新闻社，1962年版，第350页。

〔苏〕耶·马·茹科夫编：《远东国际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418页。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4卷、第12页。

府于 11 月 25 日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的建议，主张在中立区成立后 15 日内，日军撤回“满铁”附属地界内，中国军队撤至关内。日本也同意设中立区，但要求在中立区保留“剿匪权”。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12 月 8 日国联理事会决定放弃设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但却同意保留了日本在这一地区的所谓“剿匪权”。

12 月 15 日，日军参谋部在给关东军的电报中指出：“进攻锦州，事前要采取适宜的方法，其实施手段应与剿匪的名义相符” 1932 年 1 月，日军正是以“剿匪”为名，攻占了锦州和辽西。

以上，就是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以来，国际联盟在英法等大国操纵下采取的纵容态度和发挥的消极作用。

（二）李顿调查团及其报告书

国联理事会就日本武装侵入中国东北问题争论了 3 个月，作过多次决议，既不敢谴责日本，也不能制止日本扩大侵略，在中国代表的一再要求下，1931 年 12 月 10 日，国联理事会通过决议，组织调查团，到中国东北进行实地调查。调查团的任务只限研究中、日纠纷的背景，向国联提出报告，而无权干预两国的军事行动或建议双方直接交涉。为了避免在法律上强迫日本接受国联具有解决中、日纠纷的权力，决议条文也未具体说明调查团有义务或权利向国联提出解决两国纠纷的建议。很明显，这是大国对日本有意作出的让步。1932 年 1 月 21 日，国联调查团正式成立。调查团由英、美、法、德、意等 5 个帝国主义大国的代表组成。团长是曾任印度总督的英国人李顿爵士，故亦称李顿调查团。团员为美国前任菲律宾总督弗兰克洛斯·麦考益，法国前任安甫（越南）军司令官和法国殖民地防御委员会主席亨利·克劳德，德国前任东非总督恩利克·希尼，以及意大利前任南美各国公使马柯迪伯爵。根据理事会决议，中国派前外长顾维钧，日本派驻土耳其大使吉田伊三郎参加调查团的活动。

李顿调查团组成后，理应直接奔赴被侵略的中国东北现场，立即开展工作。可足，他们却首先历访英法美各国政府要员，领受意旨。2 月 3 日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及太平洋，2 月 29 日首先到达日本东京。调查团先后会见了日本天皇裕仁、首相犬养毅、外务大臣芳泽谦吉、陆军大臣荒木贞夫、海军大臣大角岑生等军政要人。为了领会日本的外交意图，调查团在东京的 10 天中，6 次与日本外务大臣芳泽谦吉详谈。调查团于 3 月 14 日才到达中国上海，4 月 21 日到达沈阳。这时，日本侵略者已完全占领和控制了中国东北，制造了伪满洲国，迫使李顿调查团承认既成事实。调查团到中国东北后，主要是从侵略者方面调查侵略的理由。在到沈阳后的 11 天中，调查团即有 6 天安排了 6 次对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的访问，足见是何等的重视。其次是与伪满洲国傀儡溥仪和汉奸张景惠等进行详谈。日本为了使调查团难以了解真相，裕仁天皇指派了日本前驻苏大使到关东军作顾问，以帮助应付外交上的细节。又派参谋部情报部欧洲科长渡久雄上校为李顿调查团的前站人员，对所到之处都事先安排。关东军将调查团任何时候要看的任何地方，都粉饰一新。“满洲国”监狱里的政治犯和能讲英语或法语的住院病人，都被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 年版，第 440 页。

送到乡下的拘留营去。被拘留的还有宪兵队从街头搜捕来的褴褛的乞丐、无业游民以及任何被认为在游行时可能敢于站出来高呼反日口号的人。仅哈尔滨一地就拘捕 1361 人。1 个月前，关东军司令部就已起草了对日本统治“歌功颂德”的“请愿书”，交给有名的中国人和俄国人，要他们签署后送交李顿。还教群众喊什么口号，穿什么衣服。调查团团员预定要会见的“满洲国”官员，应说些什么都经过仔细的演习。据溥仪笔供：“一九三一年，当国际调查团李顿等来东北见我之先，板垣征四郎预告我对他们应当如何说话。等李顿来的时候，板垣还有许多日人随行。我对李顿说满洲是自主，日本是不干涉的等等欺骗的话，为日本帝国主义当了欺骗的工具。”另据臧式毅笔供：“一九三二年夏当国际调查团到奉天时，日本军部则极端限制中国人与该团等单独会见。该团内有中国委员顾维钧者，入境后受日本军方之严重限制，每到一处则不令出旅馆，又不令与该团一同出门，尤不令与中国人会见。”东三省的爱国将领，社会贤达，24 个东北民众团体和学术团体，战斗在东北的抗日义勇军，以及上海、南京、北平、天津等地学生、市民等，纷纷走访、投书、致电调查团，要求其主持正义。东北的商人、银行家、教员、医生、警察、职工等各界人士，克服种种困难，通过各种途径，给调查团寄送书信文件 1500 余件，揭露日本侵略者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的种种罪行；指出“所谓满洲国者，完全为日本人之傀儡，为达到分割中国，实行并吞之阴谋”，“故中国绝对不承认为日本所造成之满洲伪国”。

李顿调查团在东北活动了一个半月，于 6 月 5 日回到北平。7 月 4 日由北平去东京，与日本政府商讨写报告书之事宜，20 日返回北平。9 月 4 日，调查团完成了报告书，各委员签字。

10 月 2 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中国外交部公布了调查团报告书节要。

10 月 13 日，中国外交部公布了李顿调查团报告书全文。文长 272 页，约 14.4 万字，除绪言外，计分十章。

《李顿报告书》对于“九·一八”事变的发生和伪满洲国的出现，作了具体陈述，承认了若干基本事实，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也作了一定的揭露。例如：

(1) 承认东三省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报告书指出：“东三省为中国之一部，此为中国及列国共认之事实”；“张作霖上将迭次宣布之独立，绝不含有渠个人或满洲人民情愿与中国分离之意义。……实则所有中国内战大致均系一种建立真正强健政府，以图统一全国之野心计划。故满洲虽迭经战事及独立时期，但仍为中国完整之一部。”

(2) 指出“九·一八”事变是日方有计划的军事行动。报告书称：“日方干事前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之战事。此计划于 9 月 18 日至 19 日之夜见诸实行，迅速证确。中国方面遵守上峰之训令，既无进攻日军之准备，在彼时或在当地亦无危害日人生命财产之计划。……至 9 月 18 日下午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第 639～640 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 年版，第 462 页。

陈觉：《九·一八事变后国难痛史资料》第 4 卷。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 年版，第 73、52 页。

10 时至 10 时半在路轨上或路轨旁发生炸裂之事虽无疑义，惟铁轨纵有破坏，实际上并未能阻止长春南下列车之准时到站，断不能引为军事行动之理由。故前节所述日军在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

(3) 指出伪满洲国是日本一手制造和控制的政权。报告书写道：“自 1931 年 9 月 18 日以后，在日本军事当局之行动中，不论在军事或民政方面，政治意味，特为浓厚。”“调查团认为满意者，即依各方所得一切证据，确信助成满洲国成立之原动力，虽有若干种，但其中两种，即一为日本军队之在场，一为日本文武官吏之活动；两者联合，发生之效力最大；依我等之判断，若无此两者，新国家不能成立。”“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在‘满洲国政府，中……国务总理及各部总长，虽均为华人，但在新国组织中实际上操有最大权力之各总务厅，其厅长，则均属日人。”“所有政权均操之于日人之手。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直是日人之工具而已。”

但《李顿报告书》的基本方面是袒护日本侵略，同时又试图与之分享瓜分利益，它露骨地表现出殖民主义者的偏见，作出了许多错误的结论，提出了一些荒谬的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建议。主要的有如下几点：

(1) 公然为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进行辩解。报告书称：“此次冲突事起，论者莫衷一是”；“日本屡称满洲为日本之生命线……日本对于满洲之特别关怀，实因满洲在军事上为形势要地故也。”赞颂日本侵略中周东北的所谓历史功绩，说：“若无日本之活动，满洲不能吸引如许巨额之人民”；“因最近 25 年来满洲日本事业之成功，而发生之自尊心理，皆构成日本‘特殊地位’要求之成分”；“日本人民常自诩满洲之经济发展，日人之力独多。”指责中国抵制日货运动“对于中日关系，在物质上，心理上，均有重要之影响”；“中国政府，对于日本所受之损害，负有责任。”报告书在肯定日方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后，紧接着又说：“本调查团之为此言，并不摒弃下列之假定，……即当时在场之军官或者系认为自卫而出此也。”这就从根本上混淆了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的原则区别，实际上是为日本侵略开脱罪责。

(2) 敌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鼓吹来自苏联的“共产主义威胁”，鼓动日本把中国东北建成反共的战争策源地。报告书把中国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的一次次“围剿”，号召抗日，诬蔑为“共产军队在江西湖南各部扰乱”，“共党战事所造成之扰攘”，“共产问题之在中国，实与较大之国家建设问题，具有关联”。报告书露骨地宣称：“俄国势力越出北满之危险，竟成为日本关切之问题。在北有俄国之共产主义，在南有国民党之反日宣传，两者联合大有可能，日本于是益觉于两者间置一与两者无关之满洲之为得策。日本之疑惧，益因最近数年来苏俄政府在外蒙所得之优越势力，以及共产主义之滋长于中国而随以俱增。”接着以唆使的口吻说：“日本之欲谋阻止满洲被利用为攻击日本之根据地，以及如在某种情形之下满洲边境被外国军队冲过时，日本欲有采取适当军事行动之能力，吾人均可承认”。

(3) 主张“门户开放”、“机会均等”，限制日本独霸中国东北；提出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 年版，第 137~138、185、186、189、206、214 页。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 年版，第 28、75、43、76、74、228、232、138 页。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 年版，第 36、39、69、250 页。

实行“国际共管”，以维护英美等国在东北的权益。报告书在第八章“在满洲之经济利益”中写道：“维持门户开放原则，似属必要，该项原则之维持……不仅在法律方面观察，应当如是；即就……实际情况而言，亦当如是。”报告书既不同意中国恢复1931年9月以前东北原状，也不承认日本“维持‘满洲国’”。结论是：“在政治上，及经济上，中国均需要列强之合作，而日本政府之友善态度及在满洲方面之中日经济合作，尤为可贵”。所以应实行“国际合作”，准许中国东北有“高度自治权”。报告书提出的办法是：建立“顾问会议”制度；“此项会议，可由中日两国政府之代表，暨代表当地人民之代表团两组组成之”；“顾问会议可得中立观察员之协助”；东北“自治政府行政长官得指派相当数额之外国顾问，其中日本人应占一重要之比例”；还要“以外国教练官之协助，组织特别宪警，为东三省境内之唯一武装实力”，其他一切中国或日本武装实力，“即应退出东三省境内”；在财政金融方面，“行政长官当就国际清理银行董事会提出之名单中，指派一外国人为东三省中央银行之总顾问。”至此，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在“国际合作”的名义下瓜分中国东北的阴谋已昭然若揭。

1932年11月21日，国联召开理事会，讨论《李顿调查团报告书》，12月6日召开全体大会进行讨论，英法等国都为日本的侵略行为辩护。

12月12日，国联又专门组织了一个有中小国家参加的19国委员会。1933年1月8日，19国委员会起草了有关《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案和说明书。这时，日本已侵占山海关并进犯热河省。为了遏止日本南进，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日本1票反对，通过了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声明，表示赞同报告书。中国代表投票赞成并声明努力执行大会的决议。日本代表松冈洋右因报告书不承认伪满洲国而退席。1933年3月28日，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联。

《李顿调查团报告书》一出笼，一方面受到汪精卫等国民党头面人物的公然称赞，胡说：“调查团报告书之观察，明白公允”，另一方面遭到中国人民的普遍反对。中国共产党在1932年10月5日发表的《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中指出：“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侵掠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国家最露骨，最无耻的文件。”“它最大胆的拥护日本帝国主义侵掠中国，并吞东三省，屠杀与奴役东三省三千万民众以至全中国的民众！”“国联调查团的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它不但想把满洲经过外国顾问制度，经过国际宪兵，经过公断法庭等等放在国联共管之下，而且正在企图把这种共管的制度推行到全中国。”告全国民众书号召“全中国工人与一切被压迫的民众”，“一致的起来撕破国联调查团这一污辱中国民族的报告书！”

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中指出：它是“最公开无耻地宣布了瓜分中国的新计划：它公开宣布日本及其他帝国主义，不仅应该占领满洲并且应该瓜分中国的全部”。通电

《国联调查团报告书》，神州国光社，1932年版，第244、248、255、254、253、258、263、262、263页。

《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第121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9~390页。

号召全国民众一致起来实行民族革命战争，完成中国民族的独立解放！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强调：“党必须使广大的劳苦群众清楚的了解：李顿报告书之后，在我们面前放着极大的新的瓜分中国的危险，日本帝国主义不仅在满洲、热河并上海及其他中国中心城市中的新的军事动作与进攻的危险。”同时指出：“国民党政府积极的参加了报告书的制定，他们已经完全接受国际调查团的报告。”这是无耻的出卖民族利益。决议提出：“只有吸收新的几千百万的群众参加革命的群众斗争，只有将一切群众斗争的形式（革命战争，游击运动，罢工，抵货，兵变等等）发展与联结起来才能击溃帝国主义强盗及其刽子手——国民党政府，才能够保护和扩大苏区，才能够阻滞帝国主义的反苏联战争。”

中国各民众救国团体，纷纷通电全国，称调查团报告书“显系抑弱扶强”，证明“依赖国联，极端错误”，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并指出，求救不如自救，求人不如求己，速与日本经济绝交，出兵讨伐叛逆。10月9日，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等15个国民党中委通电全国，指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之谬误，并要求国民党政府“应于政策上有坚决之转变，放弃不抵抗主义，及依赖国联谬想，速解人民束缚，切实与人民合作，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10月11日，国民党西南执行部、政委会致电国民党中央、国民党政府驳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并提出“今后惟有迅下坚决意志，本牺牲之精神，以为继续抵抗，而求失地恢复。”

日本毫不掩饰国联对它的支持。曾目睹国联大会的吉田茂说：“幸而由于英法大国的周旋和支持，在大会决议中写进不少我方主张”。直到1933年1月初，英国大使还会见了内田外务相，接着，国联秘书长德拉门（英国）与副秘书长杉村阳太郎草拟了一项试案，并将其内容透露给日本，其中对采用李顿报告书大大地加以限制，还删去了“否认满洲国”的字样。在李顿报告书中明确地提出：“基于日本在满洲的权益不可忽视这一事实，任何解决办法，如不承认这一点，不从日本与满洲的历史性联系的角度来考虑，就不能有满意的效果。”这表明国际联盟调查团是如何努力理解日本立场的。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认为国联的支持还很不够。

世界上不少主持正义的国家和人民，谴责李顿的报告书及其建议，认为它是要保证帝国主义列强联合起来镇压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是要把中国东北变成日本的殖民地和扩大武装侵略的基地。苏联政府揭穿了李顿调查团的真实目的。《真理报》写道，调查团极力“在日苏之间制造冲突……为帝国主义者反华和反苏方面的合作奠定基础。”一位美国资产阶级的史学家在总结国联长时间的会议时说，与会者们的努力“是在于劝告中国人从本

《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辑》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94、296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辑》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92~398页。

《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国闻周报》第9卷第41期，1932年10月17日。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128页。

〔苏〕C·维戈兹基等编：《外交史》第三卷下，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755页。

国领土上撤退自己的军队。”

由于国联和列强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更加膨胀起来。日本占领中国东北与退出国联，打破了凡尔赛——华盛顿体系所确立的帝国主义各国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均势，表明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个战争策源地已在亚洲形成。事实证明，国联的活动和《李顿调查团报告书》，未能制止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日本的侵华战争在迅速扩大，并准备进一步升级为全面侵华战争。

第三章 中国军民的抗日斗争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号召和领导抗日

一、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侵略，号召人民抵抗，推动国内抗日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灾难，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无比愤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条件下，立即引导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首先主张武装抵抗，号召全国人民坚决抗日，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宣言指出：“万宝山与朝鲜血迹未干，日本帝国主义又公开进兵中国，强暴占领奉天、安东、营口……其显明的目的显然是掠夺中国，压迫中国工农革命，使中国完全变成它的殖民地。”宣言谴责国民党和各派军阀，“高唱无抵抗主义，与和平镇静的忍耐外交，……出卖民族利益。”宣言号召：“全中国工农劳苦民众，……一致动员武装起来，给日本强盗与一切帝国主义以严重的回答”，“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驱逐帝国主义在华的一切陆海空军滚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进攻苏区与红军！”

同日，中共中央在《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这一次占据东三省，完全不是偶然的事，而是日本帝国主义在中国殖民地政策与中国国民党一贯投降帝国主义与勾结帝国主义政策的必然的结果”；“反帝的怒涛，现在正在向前呼啸着。他将冲破一切帝国主义的藩篱与城堡”；“党应该特别加紧反帝斗争，尤其是反日斗争的领导。以开展反帝的革命运动”。

“九·一八”事变的第二天，中共满洲省委立即召开了紧急会议，提出：（1）立刻动员全体党员到群众中宣传我党政策；（2）组织反帝大同盟；（3）以传单标语的形式，散发党的主张；（4）立即派代表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和到各地扩大宣传等六项决定。会后发表了《中共满洲省委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指出：“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将奉天、营口、安东、抚顺、辽阳、海城、铁岭、长春，还有许多别的大小城镇完全占领了”。“这一事件的发生不是偶然的！这一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为实现其‘大陆政策’、‘满蒙政策’所必然采取的行动”。“日本帝国主义者之所以能占据满洲，完全是国民党军阀投降帝国主义的结果”。宣言指出，只有工农兵劳苦群众自己的武装军队才是真正反对帝国主义的武装力量，只有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才能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宣言号召，工农兵劳苦群众开展英勇的斗争，罢工、罢课、罢市，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满洲，打倒日本帝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27~430页。

同上，第433~440页。

国主义，打倒投降卖国的国民党。

9月21日，中共满洲省委召开会议，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的经过和国民党不抵抗政策，会议作出了《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及目前党的紧急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占据满洲，是实现侵略中国的“大陆政策”预定步骤，是为了以满洲为据点积极进攻中国内地，使半殖民地的中国完全殖民地化。决议强调必须坚决地、公开地向广大群众宣传这一事件的政治意义，建立中朝劳苦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等组织，进行共同抗日斗争。会后，满洲省委把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情形和省委决定的策略及工作部署向中央作了详细的报告。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并通电全国。决议提出：“这严重的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积极殖民地政策之产物，是日本武装占领整个满洲及东蒙的企图的最露骨的表现，是将满洲更殖民地化，而作更积极的进攻苏联的军事根据地的实现。……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帝国主义与无耻出卖民族利益，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政策与武装占领作开路先锋。”决议还提出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动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地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无情的革命斗争上来。”“进行广大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暴行的运动。丝毫地不要害怕群众的民族主义热忱，相反的必须加紧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到反帝的斗争上去，同时坚决地反对一切国民党的武断宣传。向广大的群众指出：只有群众自己的力量能够战胜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求得民族的解放。”“估计着群众的仇恨和热忱，提出武装群众的口号；使这些武装群众团体变为游击队与工人自卫队。……使武装群众的口号很密切地与武装暴动口号的宣传密切的联系起来。”决议最后指出：“特别在满洲更应该加紧的组织群众的反帝运动，发动群众斗争（北宁路、中东路、哈尔滨等），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紧在北满军队中的工作，组织它的兵变与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严重打击。”

9月3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用暴力强占东三省以来，……积极巩固着它们的军事地位。在奉天、长春、吉林等主要城市内它们已经组织了它们自己的行政机关，实行对于这些占领区域统治权。同时它们公开宣布了要把东三省成为独立国家的企图。”宣言同时指出：“对于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侵略，全中国的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的民众都表示了无限的愤激与反抗。……反帝的斗争现在正象风起云涌般生长起来”。宣言相信：“这一斗争必然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以至一切帝国主义以致命的打击。”宣言再次号召：“全中国的民众，……只有充分准备民众自己的力量，自动的组织起来，实行罢工、罢课、罢市，示威游行，群众大会，武装工农学生，以扩大与巩固我们自己的力量。只有依靠工农兵、学生，以及一切劳苦群众自己的力量，才能打倒帝国主义”。

10月12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为反对帝国主义、国民党一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33~35页。

《东北抗日义勇军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51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2~448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49~453页。

致压迫与屠杀中国革命民众宣言》，再次强调：“在帝国主义国民党一致向我们进攻的条件下，我们的唯一出路，就是扩大与继续罢工、罢课与罢操，组织我们自己的力量，武装我们自己，……驱逐一切帝国主义的海陆空军滚出中国，……我们才有生路！”

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强占中国东三省后，继续用海陆空军占领上海嘉定各地，侵扰沿海沿长江各埠，用飞机大炮屠杀中国人民，焚烧中国房屋，在东北及淞沪各地，被害的不可数计，这种屠杀与摧残，现在仍在继续发展。”宣言表示：“现在中国苏维埃区域早已脱离帝国主义的羁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对日战争，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以求中华民族彻底的解放和独立。”最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红旗之下，一致起来积极的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来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真正的独立与解放。”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签署《关于动员对日宣战的训令》，称：“自从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三省进攻上海以来，苏维埃中央政府迭次宣言都指出日本帝国主义的目的，在将东三省完全殖民地化，……满洲傀儡政府已在东三省建立起来了，这是日本帝国主义最忠顺的走狗。上海的和平谈判，国际联盟的调查团，完全是帝国主义强盗进行瓜分中国的分赃会议和组织。”训令指出：“只有全中国工农劳苦群众，才是真正反帝国主义的力量，只有苏维埃与红军，才真能对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民族革命战争。”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群众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一致起来积极参加和进行革命战争，在白色统治各地要自动武装起来，组织民众抗日义勇军，……根本实现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彻底争得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另外，训令还指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各苏区军事委员会、各地军区指挥部、各县赤卫队部（即军事部）应对于全体红色战士实行宣战的动员”；“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与红军各级政治部应在红军和地方武装中实行政治的动员，要在红色战士中做对日宣战的广大宣传”；“各苏区各级苏维埃政府应立即实行对日宣战的群众动员，……动员工农劳动群众自愿到红军中去”，“准备与日帝国主义直接作战”，“动员拿体劳动群众都能自愿的担任参加革命战争的后方工作”。

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还发布了《为对日宣战告全世界无产阶级及被压迫民族通电》，希望苏联和全世界无产阶级及一切被压迫民族，“为反对我们的共同敌人——资本家帝国主义统治而战”。希望“援助我们这一艰难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要一切帝国主义滚出中国去，尤其是希望日本的工人、农民、士兵兄弟们和我们一致起来，推翻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454~456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179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82~186页。

本帝国主义在中国和日本的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受反革命军事“围剿”重压下的非执政党，从全民族的利益出发，对中国人民抗日的号召和领导是有力的。它深刻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野心，反复地批判了国民党政府对日不抵抗政策的卖国投降实质，号召全国人民起来武装反抗，救亡图存，并且直接领导了救亡运动和东北人民的抗日游击战争。当时中共中央处在王明“左”倾错误路线的统治下，忽视“九·一八”以后中日民族矛盾的上升和中间阶级的抗日民主要求。因此，在党的宣言、决议和实际工作中，存在着“左”的观点和“关门主义”的倾向，但在反对向帝国主义妥协、主张坚决实行武装反抗等基本方面，都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的抗日宣言、抗日号召，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临时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等，忠实地反映了中华民族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决不屈服的坚定意志，庄严地宣告了中国人民与日本帝国主义战斗到底的坚强决心。因此，它得到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热烈响应，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迅速发展。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之下，在东北，在全国，逐渐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抗日爱国浪潮。

二、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于部并领导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在及时地发表宣言，作出决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指出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的实质，号召人民拿起武器，用民族自卫战争驱逐日本侵略者出中国的同时，进行了大量的艰苦细致的工作，组织和领导人民的抗日斗争。

在中国东北大地上，首先兴起的力量是东北抗日义勇军。参加义勇军的成分，不仅有共产党人，有工人、农民、学生和知识分子，而且有东北军的爱国官兵、地方官吏和绅士。遍布东北各地的绿林队伍和民间团体“红枪会”、“大刀会”等也纷纷举起了抗日义旗。“义勇军”、“救国军”、“自卫军”等各种名称的抗日队伍发展之迅猛，参加阶层之广泛，是前所未有的。从义勇军兴起，到1932年夏季，仅半年多就发展到30余万人。

中共中央和中共满洲省委对抗日义勇军的兴起和发展，给予了领导和援助。

1931年12月，在东北巡视工作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著名工人运动领袖罗登贤就任满洲省委书记。从此以后，中共满洲省委一面创立党直接领导下的抗日游击队，一面采取切实步骤领导与援助各地抗日义勇军的斗争，促进其发展。东北各地党组织不仅发动群众支援和参加义勇军，而且派了许多共产党员和进步群众到义勇军中工作。辽西、辽东、吉林、龙江各地各部义勇军中，大部分都派进去了党团员和进步青年知识分子。著名的抗日将领、共产党员李延禄、周保中曾分别担任“国民救国军”王德林部的参谋长、总参议，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从1932年初开始，中共满洲省委陆续派省委军委书记杨林、杨靖宇到南满，中共大连市委书记童长荣到东满，省委军委书记赵尚志到巴彦、珠河，省委秘书长冯仲云到汤原，进行创建抗日武装的工作。1932年7月底，中共北平市委还派党员冯基平、进步青年李兆麟到了

西抗日救国军中开展工作。各党员负责干部赴各地区后，指导当地党组织，并同当地党的领导人一起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建立武装，从无到有，先后创立了磐石、海龙、延吉、和龙、琿春、汪清、安图、巴彦、汤原、饶河、珠河（今尚志县）、密山、宁安等十几支反日游击队。

这些有共产党人和进步群众参加的抗日义勇军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反日游击队，在“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精神鼓舞下，抗日热忱高昂，转战在白山黑水间，在斗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

第二节 东北军民的抗日斗争

“九·一八”事变后，处于国破家亡境地的东北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与影响之下，对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侵略展开了不屈不挠的斗争。白山黑水之间燃遍了民族自卫的抗日烽火，从城镇到农村到处发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怒吼。

在日军铁蹄践踏下的东北大地，义勇军、游击队、红枪会、大刀会、山林队等各种抗日武装犹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从此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抗日战争。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所指出的：“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者占领沈阳，几个月内，就把东三省占领了。国民党政府采取了不抵抗政策，但是东三省的人民，东三省的一部分爱国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或协助之下，违反国民党政府的意志，组织了东三省的抗日义勇军和抗日联军，从事英勇的游击战争。”

一、东北军部分官兵奋起抗日

（参见附图2）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出于民族义愤，拒绝执行当时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首先奋起抗战。

（一）马占山领导江桥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在侵略辽宁、吉林得手之后即进逼黑龙江省，形势非常危急，马占山受命代理省主席兼军事总指挥，奋起领导江桥抗战。

10月16日，日本侵略者首先利用汉奸张海鹏为前驱，向嫩江桥发起进攻。黑龙江省守军广大官兵出于义愤，不待上级命令，自动反击，阻止伪军北上，张部3个团也纷纷反正。日军见伪军进攻失败，就一面与汉奸合谋诱逼马占山投降，一面增调兵力亲自出战。

10月19日，马占山率李青山团经由哈尔滨到达省城齐齐哈尔任职，并领导江桥抗战。参加江桥抗战的部队，除马占山直属步兵第3旅等部队外，还有吴松林的骑兵第1旅，程志远的骑兵第2旅，苑崇谷的暂编旅，涂宝珍的卫队团，朴炳珊的炮兵第9团，以及辎重营、工兵营、保安第1大队、保安第2大队、东北宪兵第3大队，等等。其中，除卫队团和工兵营担负江桥第一线阵地防守外，其余各部均部署于纵深各阵地及待机位置。

江桥抗战从11月4日开始到19日结束，历时16天，分为江桥第一线战斗和三间房战斗两个阶段。

11月3日11时，日军铁甲车2列、士兵30余名开到江桥，并有5架飞机掩护修桥，守军为避免与日军冲突，便将少数守桥部队撤退到基本阵地。敌机向守军阵地投弹，守军有部分伤亡。黄昏，日军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渡过江桥，对守军阵地发起攻击。守军力避冲突，未予还击，日军始行退去。4日中午，日军1个连在飞机支援下向守军阵地左翼猛攻，并将大兴车站烧毁。至此，守军忍无可忍，奋勇自卫，将敌击退。18时，日军1个营的兵力

在飞机 7 架、铁甲车 4 列和数门火炮的掩护下，向守军卫队团阵地正面发起猛攻，双方展开激烈战斗。5 日，日军调整部署，把张海鹏伪军调到第一线。守军以步兵正面迎击，骑兵两翼包抄，激战至晚，将敌击退。6 日凌晨，敌增援部队到达，又大举进犯，上面飞机，下面大炮，晚间有探照灯指示炮兵射击。江桥守军浴血奋战，日军的滨本第 16 步兵团几乎被全歼，高波骑兵第 2 旅也伤亡惨重，江桥阵地被炸毁，守军也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6 日晚，马占山下令，守桥部队主力后撤至三间房阵地阻击敌人。

三间房南距江桥 25 公里，北距齐齐哈尔约 35 公里，是保卫齐齐哈尔的第二道防线。

10 月下旬，马占山已命令暂编步兵第 1 旅和骑兵第 1 旅布防，左翼由大兴以西起，沿三间房、大小新庄一带的村落构筑了防御阵地。江桥守军撤退后，马占山派步兵第 2 旅、第 3 旅各 1 个团在大兴接替骑兵旅的防地，并将该旅东调，掩护守军阵地左翼，以防江桥方面敌军从侧翼攻击。

11 月 7 日，七八架敌机来袭，守军因无高射炮，即以步枪齐射火力击落敌机 1 架。马占山亲临阵地视察，激励将士，进行部署，自此江桥抗战即进入第二阶段。

日军经过补充和休整后，12 日以 7000 余人在飞机和火炮的掩护下，向三间房阵地发起猛攻。守军各部官兵奋勇还击，敌我双方伤亡均重。日本政府急令增派援军。

16 日，日军以步、骑、炮兵 4000 余人在飞机和坦克的掩护下发起全线攻击，守军勇猛抵抗，两军陷于混战状态。日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18 日晨，日军骑、步、炮兵约 3 个团的兵力向三间房主阵地实施猛攻，并有飞机、坦克、重炮配合作战，对三间房一带形成包围态势。为了保存实力，马占山决定放弃全线阵地，当晚退到齐齐哈尔。19 日，又率全军 2 万余人退到海伦。

马占山领导的江桥抗战，是“九·一八”事变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和最激烈的战斗，得到全国各地的有力声援。它使日本侵略军遭到入侵东北以来第一次沉重打击，表现了中国人民不屈不挠的战斗意志。

（二）黄显声等指挥军警阻敌侵锦

日本侵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辽、吉、黑三省发展进攻。9 月下旬张学良下令在锦州建立的代行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和辽宁省政府职能的临时省行署，也成为日军的攻击目标之一。因此，日军在侵占吉、黑两省之后，便回师辽宁攻取锦州。

辽宁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和沈阳市警察局督察长熊飞，指挥新编的公安骑兵总队，并策动伪军旅长项青山、张海天等反正，10 月消灭了汉奸凌印清和日本特务仓冈繁太郎等组织的“东北民众自卫军”，11 月又消灭了张学成在日本关东军扶植下组织起来的“东三省自治军”。接着，又与张树森的骑兵第 3 旅、常经武的步兵第 20 旅及张廷枢的步兵第 12 旅，一起沿大凌河布防。12 月 22 日，日军出动 3 个旅的精锐部队，向辽西和锦州进犯。中国守军和公安骑兵总队曾在营（口）沟（帮子）线田庄台、北宁线白旗堡、大（虎山）通（辽）线白山等处，多次与敌人展开激战，在一定程度上迟滞了日军的进攻，延缓了锦州沦陷的时间。

（三）李杜、丁超等部在哈尔滨外围袭击日军

哈尔滨是东三省特区。1932年1月27日，日本侵略者令于琛澄部伪军，对哈尔滨上号、南岗、三棵树发起进攻，东北军李杜的第24旅，丁超的第20旅和冯占海的吉林卫队团等部队进行猛烈反击，打退了敌人的进攻。1月30日，东北军第22旅旅长赵毅率部在哈尔滨附近的双城，阻击日伪军，在十里铺附近，一举击溃伪军于琛澄部，俘敌700余名；当晚又在双城车站设伏，正值日军第3旅的先头部队乘火车2列，先后开进双城车站，下车集结准备部署对哈尔滨的进攻。设伏的第22旅，乘敌架枪、吃饭毫无戒备的有利时机，突然从三面发起攻击，以猛烈炮火和机枪火力，将敌压迫于站台上，并以刺刀、手榴弹与敌展开近战，日军措手不及，死伤惨重。

东北军爱国官兵的上述自发的抗战行动，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

二、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及抗日斗争

（参见附图3）

东北义勇军，是“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一部分东北军爱国官兵、山林队等为基础自发组织起来的名目繁多的各种抗日武装力量的总称。其人员成分极为复杂，爱国农民约占50%；曾充当东北军警官兵的约占25%；曾当过胡匪的约占20%；知识分子和工人、商人约占5%。此外，愤于日军入侵的一些绿林豪杰、地主武装也参加了这支抗日队伍。据不完全统计，参加武装抗日的人数达50余万，如果包括各阶层利用各种方式进行抗日的可达百万余。东北义勇军活动遍及东北全境，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东北义勇军的兴起和抗日斗争，发展很不平衡，没有统一的组织和指挥系统，番号不一而且不断变换。按地区分，可分为辽宁地区抗日义勇军，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黑龙江地区抗日义勇军等。

（一）辽宁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抗日义勇军，在辽宁地区兴起最早，发展很快，斗争也相当活跃。

在辽西1931年12月下旬，黄显声和熊飞组织了“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为“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这支抗日武装，是在他们带领由沈阳撤出的部分警察和公安队，向锦州且战且退途中，黄以原辽宁省警务处长名义发布命令，组织各县民团、警察队，收编胡匪，消灭张学成、凌印清汉奸武装，统一改编而成。总指挥部设于北票。下辖22路义勇军，每路人数不等，多者万余，少者一二千，共6万余人。在此期间，黄即和东北民众救国会联合行动，以后郑桂林、赵大中、于百恩、耿继周、赵殿良各部在绥中、北镇、黑山、新民、沈阳沿北宁路左右各树一帜，纷纷抗敌，四处主动出击，使日本侵略军昼夜不安，终日疲于奔命。

1932年1月3日锦州沦陷，中国正规军已陆续经山海关撤退到关内，通辽一带的骑兵第3旅也已退向热河方面。因而在1月3日13时，关东军司

令部即下达了如下命令，把主要攻击目标转向了义勇军方面：

“（1）第20师今晨已占领锦州……

（2）军要迅速恢复南满地区的治安。

（3）第20师要对关内及热河方面进行警戒，并迅速恢复辽西地区的治安。

（4）第2师要返回铁路沿线，负责维持奉天以南的治安。

（5）独立守备队除仍然负责南满铁路及巨流河（含）以东北宁线的守备外，还要负责维持铁岭以北的治安。

（7）混成第4旅和吉长警备队仍然继续执行原任务。

（8）关东军飞行队，派遣1个侦察中队去长春，主力在奉天（但第6飞行团第1中队在周水子），要随时协助各部队执行讨伐任务。

（9）军直辖部队位于奉天。

……”

日军第20师受领任务后，即命令混成第38旅骑兵第27团团长沙贺传太郎中校，于1月6日率骑兵百余名侵占锦西县城所在地江家屯。7日又有后续部队50余名到达。古贺被日本关东军吹嘘为战无不胜的“名将”，气焰十分嚣张，扬言要将这一带的义勇军一举荡平。9日晨，古贺命令给养队30人回锦州师部领取弹药给养，令一个排留守县城，古贺则亲率日军70多名向城西一带“扫荡”。东北义勇军刘存起（亮山）等部获得确切情报，遂在日军必经之路设伏。10时许，当日军骑兵洋洋自得地到达上坡子、龙王庙附近时，突然遭到袭击，被打得人仰马翻，古贺中弹而死，仅10余人逃入县城。下午，由锦州返回的给养队，行至钱塔子屯岭下时，亦受到义勇军及民众的阻击和围歼，这两次战斗，共毙敌60余名。据日本资料记载：“9日在锦西，骑兵第27团（欠第2连）与2000‘兵匪’交战，团长古贺传太郎中校以下12名战死，军官以下19名负伤；同日在红螺岬附近，第1运输监视队主力，辎重兵少尉松尾秀治以下26名（包括翻译1名）被全歼。”古贺之死，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极大震惊，哀叹：“这实在是满洲事变以来最大的悲惨事件。”

自1月上旬以来，日军出动步兵营、炮兵营、骑兵团、装甲车及飞行队，对新民、新立屯、大虎山、北镇、医巫闾山、锦州、锦西、兴城、绥中以及辽热边义县、凌原一带的抗日义勇军，进行了连续不断的“讨伐”；仅1月份里，在新民、大虎山、新立屯一带就进行了约20余次。在此期间，黄显声到北平与东北爱国人士组成的救国会领导人商讨抗日义勇军的整理问题（黄时任救国会常委），并以义勇军总指挥的身分报告了斗争情况。1月9日，救国会常委会通过了救国会的组织大纲及对义勇军工作方针。随后，救国会又派出大批政工和军事人员到东北各地组织义勇军。从此，义勇军的抗日斗争更加活跃。数月之间，只辽宁一省，义勇军就发展到近20万人。4月以后，经过整顿，将辽宁义勇军划分为5个军区：辽西为第1军区，包括沈阳、新民、法库、北镇、黑山、锦县、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彰武；辽南为第2军区，包括辽阳、海城、盖平、复县、营口、盘山、台安、辽中；辽东为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69~470页。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7年版，第474页。

〔日〕《协和》1932年第2期。

第3军区，包括本溪、凤城、庄河、岫岩、安东、宽甸、桓仁、通化、清原、新宾、安图、柳河、临江、长白、辑安、辉南、海龙、抚顺、抚松、金川；辽北为第4军区，包括铁岭、开原、昌图、梨树、东丰、怀德、西丰、双山；热边为第5军区，包括康平、通辽、辽源（今双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每军区设总指挥一名，并委任了52路司令和27个大队。编制均按三三制，路辖3团，团辖3营，营辖3连，编制与独立旅同。其人数不足一路者，则为支队。为加强联络，置备无线电台，分发各军区使用。辽西地区距北平较近，得到各方接济和政工人员协助也较方便。他们之中以郑桂林的第48路战绩较好，支持较久，但到1933年5月日军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以后，各部相继溃散。

在辽南有义勇军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部活动。李纯华原在北平张学良行营供职，“九·一八”事变后，回家乡海城县成立辽南义勇军。1932年2月，救国会派高鹏等10余人到李部工作。6月初，李纯华被任命为第2军区司令，下辖17路。

11月下旬，又改为“东北义勇军第2军团”，王化一为军团长，李纯华为代理军团长，人数发展到3万余人。这支抗日武装，以海城为中心，东到岫岩、凤城，南到营口、大石桥，西到台安、磐江，控制了这一带的交通要道和广大农村，并不断袭击敌人火车、兵站、机场，使日军惶惶不可终日。

邓铁梅，原名邓古儒，曾任凤城县公安局长、牡丹江警察分署署长等职。“九·一八”事变后，邓抱定“不能俯首甘当亡国奴”的决心，拜会省警务处长黄显声，在黄的赞同与支持下，从锦州回凤城县，联络近200名抗日志士，于1931年10月，成立东北民众自卫军，被推举为司令。由于邓铁梅在凤城、岫岩一带素著声望，响应者络绎不绝，不到1个月，即达一千七八百人，编成3个团、1个武术队（即大刀队）。同年11月22日（一说12月26日），邓铁梅指挥自卫军攻打凤城县城，捣毁了伪县公署、警察局，砸开监狱，放出100余名爱国志士，并全歼守城日伪军，缴获迫击炮2门、机枪3挺、步枪400余支。凤城大捷后，自卫军乘胜远征庄河县城，守城伪军闻风而逃。

1932年春，苗可秀与邓铁梅联系，后任东北民众自卫军总参议。同年8月，自卫军又打败伪军李寿山部。自卫军成立不到10个月，共进行大小战斗近100次，队伍发展到1.5万余人。辽南这个三角地带抗日武装的壮大，引起了日军的注意。12月中旬，日军以第2师主力和守备队及伪军组成岫岩、庄河两个讨伐队，疯狂进攻辽南各地。李纯华、邓铁梅、苗可秀等率部与敌人周旋战斗。

12月30日，“义勇军邓铁梅、刘景文两部在凤凰城黄花向土城子一带与敌激战，岫岩现未落敌手。日方近以义军活动甚力，多门第2师大部已调岫岩作战。南满路交通中断”。在敌人步步紧逼，形势极端严重的情况下，李纯华率骑兵突围，寻隙越辽西，1933年2月进入热河。邓铁梅所部，在敌人军事打击和政治诱逼下，除苗可秀率一部继续坚持斗争外，其余逐步瓦解。以后，邓铁梅不幸被敌人捕去杀害，苗可秀也被俘壮烈牺牲。

在辽东1932年4月21日，原驻桓仁县于芒山部第3团团团长唐聚五、第

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11号，1931年9月20日至1933年底。

2 团参谋长邓秀岩、桓仁县公安局局长张宗周、大队长郭景山和华北大学学生黄宇宙等人，在桓仁县誓师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在誓师大会上，唐聚五表示：“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不达到目的决不罢休！”说罢，唐用刀划破中指，血书“杀敌讨逆，救国爱民”八个大字。会后推举唐聚五为总司令，黄宇宙等为副总司令。下分 18 路军，以 14 个县的公安大队、警察队、民团、保甲兵和民众自发组织起来的大刀会为骨干，约计 10 余万人。活动区域遍及辽东十数县。8 月下旬，部队扩编到 27 路，活动区域扩大到 21 县，成为当时东北地区人数最多，活动区域最大的一支抗日武装。唐率部与日伪军进行多次战斗，攻击敌据点数十个，毙伤日伪军 100 余名。另外，李春润在新宾、王凤阁在辉南和柳河、唐玉振在宽甸、郭景珊在辑安和临江等地，分别与日伪军对抗，前后达 8 个月之久，各城市多次得而复失。

日军于 10 月由吉林、黑龙江抽调兵力，分 4 路向辽东地区发动进攻。西路由千金寨向新宾；南路由凤城攻宽甸、太平哨；北路由海龙向辉南、柳河；另一路沿鸭绿江溯江而上攻辑安、临江，并以大批飞机配合轰炸。到 10 月 20 日，日军主力已进入义勇军活动的腹地。

民众自卫军在日军大举进攻下，遭受严重损失，大部溃散，一部投敌。

11 月末，自卫军总部决定将残余部队化整为零，采取游击战术，逐步退入热河。12 月底，唐聚五率部队 1000 余人，退至热河凌源。其他将领除王凤阁外均先后进关，部队伤亡溃散，所余无几。1933 年，李春润偕弟李子荣再返辽东，战死于新宾。

在辽北、辽热边等地蒙古族、汉族人民也纷纷组织武装参加抗日。

1931 年 10 月，高文彬等 30 余人出关赴通辽，正式成立了辽北蒙边专员行署，改编包善一、韩色旺部，组成辽北蒙边义勇骑兵队，开展抗日斗争。此外，还有第 9 路军于德林部，第 14 路军张士林部，第 15 路军贾秉彝部，第 21 路军张殿良部，以及刘海泉、修子良、金山好、不服劲、长江好、杜红魁等绿林抗日武装。他们属于救国会第 4、第 5 两军区范围。

1932 年 6 月，熊飞被委任为第 4 军区司令，同时高文彬被委任为东北义勇军第 5 军区司令，统一了康平、通辽、瞻榆、开通、镇东、安广、洮南、突泉等 10 余县义勇军的编制，后来，又改为第 5 军团，由高文彬任军团长，下设 6 个梯队，由包善一、韩色旺、李胜、刘振玉、解国忱、刘海泉等分任各梯队司令。这支数万人的义勇军，活动于辽西、辽北的通辽、辽源、开鲁、彰武、康平一带，曾给予日军以沉重打击。如 1932 年春，在开鲁县的一次伏击战中，基本歼灭了一支 500 余人的日伪军，活捉日军上校松井清助，在归途中，松井犹图反抗，被义勇军战士击毙。同年 6 月，高文彬率部袭击通辽，7 月收复康平，引起敌人的重视。8 月，赵殿良等率部再次袭击沈阳，2500 多名义勇军与 5000 多名日伪军激战一夜，毙伤日伪军多人，破坏了航空处，烧毁了飞机库。11 月 19 日，日军步兵第 16 旅从新民、彰武一线经秀水河子进攻康平。高率部阻击敌人达 5 昼夜，而后转移至开鲁。在这次战斗中，高文彬被俘。部队一部分散失，一部分坚持斗争。1933 年 3 月，日军侵占热河。辽北蒙边的义勇军，在日伪军大力压迫下逐渐溃散。刘振玉、李胜等转移到张家口，接受冯玉祥指挥，继续从事抗日活动。

（二）吉林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吉林地区抗日义勇军的兴起比辽宁晚，但兵力集中，较有战斗力。主要有李杜、丁超等人组织的“吉林自卫军”；王德林等组织的“吉林国民救国军”；姜荣跃等组织的“吉西抗日军”和田霖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等。

1932年1月31日，李杜、丁超、冯占海、王之佑、邢占清、赵毅等在哈尔滨举行会议，决定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推举李杜为自卫军总司令，丁超为中东路护路军总司令，冯占海为自卫军副司令兼右路总指挥，邢占清为中路总指挥，赵毅力左路总指挥，王之佑为前敌总司令。吉林自卫军总兵力约1.5万余。同日，各主要将领联名发表抗日讨逆通电与告民众书，随即投入哈尔滨保卫战。31日，自卫军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双城堡车站。日军遭受严重打击后，关东军除调动第2师主力以外，一面命令驻齐齐哈尔的混成第4旅东进，一面命令在长春的混成第8旅北上增援，并有飞机、坦克、装甲车等配合，于2月2日逼近哈尔滨市南郊。日军增援部队到达双城后再次进攻，第22旅与敌激战后被迫撤退。2月3日，日军以优势兵力，多路猛攻哈尔滨；自卫军奋力抵抗，血肉相搏，激战数次，双方伤亡甚巨。自卫军因力量单薄，呼救无援，终难扭转战局，于2月5日晚全部撤离哈尔滨。

哈尔滨失陷后，李杜集中部队于依兰一带进行整顿；冯占海等率部退至松花江下游延寿、方正一带休整。两部积极组织和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参军参战，开展对伪军的政治工作，瓦解敌人，扩大义勇军的实力。同年6月，冯占海部改名为“吉林省抗日救国军”，编为12个旅和4个支队、3个团、1个营，共5万余人。冯占海任司令兼总指挥，宫长海任副总指挥，活动于阿城、方正、五常一带。两支义勇军机动灵活地作战，不断打击敌人。6月，救国军分兵两路袭击哈尔滨，伪军闻风而逃，救国军进抵香坊。同月下旬，救国军攻克榆树县城。7月连克五常、舒兰县城。此时，活动在舒兰地区的义勇军田霖部加入吉林救国军，壮大了救国军的力量，又新编了若干旅和支队。此时，冯占海部救国军加上所联系的抗日部队，总数已达7万余人。

这时日本侵略者为军事进攻和经济掠夺的需要，正在强修拉（拉法）滨（哈尔滨）铁路拉法段，冯占海闻讯后，急令第16旅田霖、第17旅陈玉清两部前往破坏。田、陈两部官兵携带自制的地雷、手榴弹等进至该地，炸毁敌兵车1辆，炸死日军40余人，并击退日军援兵。救国军连续进行3次爆炸，迫使日军中断了此项工程。

8月27日，冯部救国军在舒兰县境珠琦川召开了团以上干部120多人参加的军事会议，决定进攻吉林。9月12日，攻占吉林，歼敌数百，俘虏约500余人。与此同时，救国军还派出另一支部队佯攻长春，使日伪军受到很大威胁。日本关东军急调重兵解吉、长之围。9月19日，冯占海与宫长海等部队在农安三盛玉、伏龙泉一带会合，经研究决定，吉林抗日救国军分为两部分进行活动：在吉（林）敦（化）线及五常一带活动的部队，仍留在原地相机骚扰敌人；在吉长线活动的该军主力和总部人员，由冯占海亲自率领向热河转进，以便同关内联络，补充部队装备，以图再战。会后，冯占海命各部抽出一部分轻重武器和弹药，留给在原地坚持抗日的部队，然后率队向西进军，于11月到达热河，被委以东北义勇军第6军团番号，同时经国民政府北平军分会收编为第63军。

李杜等率自卫军总部退到依兰后，不久即遭到日伪军的猛烈进攻。李杜

指挥城内有限部队奋力抵抗，因城内军民伤亡严重，便率部撤出依兰向梨树镇一带转移。丁超心怀异志，拒绝与李杜同行，独向宝清一带撤退。

1932年5月17日，依兰陷落。至此，吉林抗日自卫军失掉了后方基地，所储存的被服、粮食、武器弹药以及兵器修械所、医院等全部落入敌手。吉林自卫军经过整顿，已控制了穆稜、宁安、密山、勃利等8个县的全境，力量虽有很大削弱，但以梨树镇为中心的抗日武装的存在，仍然威胁着日伪对吉林的统治。同年秋后，日伪军集结重兵“讨伐”该地区的抗日军。9月下旬，日军首先攻击驻勃利县的抗日自卫军徐国光旅。

12月下旬，日军第10师师长广濑寿助中将，指挥本师和第6师第14混成旅、第14师炮兵、装甲兵以及关东军飞行队，分3路向下江（指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武装发动总攻。抗日自卫军奋力抵抗，但无力长期坚守，李杜遂率部向密山县转移。1933年1月5日，日军攻占梨树镇。6日夜，侵占密山县城。9日，进抵宝清县城，利诱丁超投降。同日，李杜、邢占清、杨耀钧等率部3000余人，在虎林地区渡过乌苏里江，退入苏联境内。稍后，应占斌旅等余部也相继过境退入苏联。自卫军其他余部，如刘化南旅等，则转移到牡丹江西岸，潜伏在苇河、延寿等地林区活动。

战斗在吉东的“吉林国民救国军”，是由王德林领导的一支抗日武装。王德林的部队，从前是以破产农民为主要成分，被称之为“绿林”的武装队伍，有二三百人。后来被东北军张作相收编为第3旅第7团第3营。“九·一八”事变时，该营属延吉镇守使吉兴旅第63团第3营，王德林任营长。他对日军入侵、吉兴投敌十分愤慨，毅然于1931年11月在汪清率部起义，吸收延边一带义勇军、大刀会、红枪会等组成“国民救国军”，共约五六千人，活动于宁安、海林、汪清、延吉、和龙各县，中共党员李延禄、周保中先后担任救国军的重要职务，很多工人、农民、学生、士兵等前来参加，部队曾扩大到七八万人。从1932年初开始，三打敦化城，与日军争夺长图路的咽喉地带，歼敌400余人；接着又攻打额穆和蚊河，缴获敌轻重机枪28挺、各种枪支1600余支。3月，日军上田支队等部共数千人大军追击救国军，救国军诱敌深入，在镜泊湖地区经连续数次作战，歼敌250多人，缴获三八式步枪140余支。接着，又利用该地草高、路窄、干旱、风大的特点，进行火攻，使残敌无路可逃，大振了抗日义勇军的威风。

1932年冬，日军又抽调骑兵、炮兵和航空兵部队，加强对李杜、王德林等部的进攻。为了团结对敌，自卫军和救国军达成了联合抗日的协议，并建立了联合总司令部，丁超任总司令，李杜、王德林任副总司令，周保中任总参谋长，从而稳定了吉东地区的局势。

但是，到1933年初，日军占领中东铁路东线进而向吉东地区大举进攻时，李杜、丁超、王德林等部，由于内部矛盾重重，军事行动不统一，思想认识不一致，侵害群众利益，得不到人民拥护等原因，在日军进攻之下溃散了。随着丁超叛变投敌，李杜退往苏联，王德林等也撤退到苏联境内。吴义成留下来，被推举为代理救国军总司令，周保中仍任总参谋长，胡泽民任副总参谋长，并将溃散在宁安、东宁、敦化、额穆、安图等地的救国军部队编为1个游击军、4个路军。由李延禄任游击军司令，柴世荣、姚振山等人任各路司令，继续坚持抗日斗争。

此外，1931年10月成立的“吉西抗日军”，1932年2月成立的“吉林人民抗日自卫军”，以及“虎林炮手队”、“宁安大刀会”、“红枪会”、“抗日东亚安民队”、“抗日鲜人联合会”、“高丽革命军”等，都在抗日斗争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三）黑龙江地区的抗日义勇军

黑龙江省爱国官兵的抗日武装斗争，在整个东北的义勇军抗日历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闻名中外的江桥抗战，揭开了东北义勇军大规模武装抗日的序幕。在以后的几个月中，尽管由于马占山一度动摇妥协，使抗日斗争出现了曲折。但是广大爱国官兵和各阶层群众始终反对投降，坚持抗日，所以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力量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又重新集结起来，除马占山、苏炳文等部外，还有相当数量的“大刀会”、“红枪会”等民众组织的义勇军转战于吉、黑两省之间。

“东北民众自卫军”这支义勇军是以李海青部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李海青出身绿林，后被收编，因在三间房战斗和撤离省城战斗中有功而被提升为新编旅旅长。

1932年3月初，马占山在龙江就任伪职不久，李海青和张锡武不愿投敌，各率部冲出省城。张锡武部开往兰西、青冈等地进行抗日游击战。李海青率所部3000余人越过松花江南下，改称“东北民众自卫军”，自任总司令，公开树起抗日讨逆大旗，收复扶余，围攻农安。途中，农民、手工业者等各方人士纷纷前来参加，扶余县大小股“胡匪”也相继来投。旬月之间，李部迅速发展至一两万人（围攻农安时号称4万），并在敌人统治的中心腹地围攻县城，震撼了伪京长春。4月，李海青得知马占山反正重整义师，便率部渡过松花江北上，表示“唯马主席之命是从”。义军连克肇源、肇州等镇，前锋逼近肇东、对青山一带。5月下旬，日军松平支队开往肇东进攻李海青部主力，两军发生激战，李亲临前线指挥，腰部被炸伤。

26日，李率部退出肇东，至丰乐镇一带休整。

马占山反正再举抗日旗帜马占山自1932年2月起，出任伪黑龙江省省长，参加了日本策划的伪建国会议，并被委任为伪满洲国的军政部长。之后，他决定返回黑龙江省，并正式进入齐齐哈尔城。这时，张学良的密使来到他的身边。数日后，马占山要检阅自己的部下与巡视各地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民心的安定情况。4月2日凌晨1时，马占山密令卫队团骑兵1营、步兵1营乘车开出省垣。2时，马占山自带副官、卫士20余人乘汽车出城，直奔拜泉方面开去。在拜泉居数日，然后经克山、纳河等地，于4月7日到达黑河。随即重新组建黑龙江省军政两署的机构。鉴于日本侵略军疯狂地“讨伐”抗日武装，各地兴起的义勇军和各县的保卫团纷纷走上抗日疆场，马占山决定利用各县保卫团丁加以补充，同时以保卫团、义勇军组成一些新的部队，成立了黑龙江省抗日救国义勇军总司令部，马占山自兼总司令，统一指挥，下辖10余路军，共约6万余人。马占山先后扩建和新编的部队有：以卫队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1旅，以原步兵第3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步兵第3旅，以原炮兵团范崇谷部补充的步兵旅，补充骑兵第1旅，以原骑兵第1旅第2团为基础扩建的骑兵第4旅，新编骑兵第2旅，新编骑兵第3旅，新编独立旅才洪献部，新编独立旅张品三部。此外，还有布西甘南义勇军，克山克东

义勇军，德都义勇军，兰西望奎义勇军，绥化庆城义勇军，汤原通河义勇军，嫩江讷河义勇军，巴彦义勇军，绥滨义勇军，龙门义勇军，铁力义勇军，等等。

4 月间，马占山与李杜、丁超取得联系，商定了共同收复哈尔滨的作战计划，确定李杜所部负责肃清哈（尔滨）绥（化）路段的日军。马占山一部进攻哈尔滨，骑兵第 1 旅吴松林部协助李海青部截断南满铁路并向长春进攻。还计划派兵进攻龙江。黑吉两省义勇军的联合行动，以及李海青部的配合行动，使日伪极为恐慌。4 月 18、19 两日，从日本调来的第 10 师到达哈尔滨。该师除留一部分兵力担任警备哈尔滨市任务外，以其主力集中攻击吉林自卫军的中心区——依兰。5 月 16 日，日军先头部队攻入依兰，由于吉林自卫军退往梨树镇和富锦、同江一带，因而，黑吉两省义勇军联合攻哈计划未能实现。马占山率部向上集、庆城、巴彦等地移动，占领大青山一带作为长期的抗日根据地，以图对敌作战。日军第 14 师得知马占山部在庆城一带活动的消息后，于 6 月 30 日下令所属部队前往围歼。本庄繁也亲到绥化指挥作战。马占山率部在庆城一带，与优势之敌周旋。7 月 28 日，马率所部在十七井子地方与敌骑兵遭遇，战至夜晚，伤亡百人，敌弃尸 40 余具退走。少将参谋韩家麟等 20 余人被冲散，翌日晨，又被日军发觉包围，全部杀害。日军在尸体中见有一蓄短须身带马占山名章者，便认为马占山被击毙。这时，马率部进至海伦东山的罗圈甸子时，又遭数千敌兵阻击并陷入重围。经各部奋力突围，伤亡惨重。马占山等一行 100 余人脱险后，进入山林，继续北行。9 月 9 日，到达龙门县城。马占山再整旗鼓，率众向讷河前进，周势孤力单，不能扭转大局，便带领五六百人经甘南，往海拉尔投奔苏炳文；其余大部分人则绕道内蒙退入关内。

马占山所部溃败之后，活跃在黑龙江省的义勇军，还有李海青、邓文和朴炳珊等部。在呼伦贝尔的苏炳文，也正积极准备举起抗日旗帜。

苏炳文的实力仅有自己亲自带领的步兵第 2 旅、张殿九步兵第 1 旅的 1 个团，并联合朴炳珊旅和张竞渡、李振华（徐宝珍团旧部），约计 1.2 万余人。

1932 年 10 月 1 日，苏炳文率部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推举苏炳文为总司令，张殿九为副总司令，谢可为参谋长。主要活动于海拉尔、扎兰屯、呼兰等地，多次同日伪军作战，从而使黑龙江省的抗日武装斗争又出现了高涨的形势。

苏炳文举起抗日义旗，引起了敌人的重视，日军第 14 师首先组成了中山支队，于 10 月 3 日拂晓由龙江以北渡过嫩江，向位于富拉尔基的民众救国军进攻。苏炳文部 1.6 万余人沿雅绿河上游向碾子山、朱家岗、腰库勒等处推进，包围富拉尔基，在朱家岗、腰库勒与敌中山支队 2000 余名激战亘日，敌死伤甚重，向磨姑溪退却。11 月间，各路抗日部队定于 12 月初分兵 6 路对敌作战，因计划暴露，日军首先发起攻击，对抗日部队进行各个击破。敌人不断增兵，并有飞机、火炮配合，多路向民众救国军发起猛攻。救国军依托 3 道防线节节抵抗，双方都有较大伤亡。11 月 28 日，救国军刚进入碾子山第 3 道防线，日军步、骑兵即猛扑而来。日军平贺旅于 12 月 1 日，占领碾子山。

《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下，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720~721 页。

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九一八以来东北情报》“东北情况周报表”第 4 号，1932 年 11 月 11 日。

2日，进入札兰屯。3日，服部支队从札兰屯出发，向兴安岭快速追击救国军。民众救国军在前方的部队被隔断，海拉尔只有步兵第9团、卫队营和学生连，共2000余人，已不能阻止敌人大举进攻，遂破坏了博克图以南的铁桥和博克图山涧隧道及盘山路轨，以阻止敌人追赶。

12月4日，苏炳文、马占山等率4000余人退入苏联，其在前方的部队，由张玉挺、邵斌山等率领，穿越兴安岭经内蒙古草原进入热河。

东北抗日义勇军，是为保卫民族独立而战的民众抗日武装。它发扬了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斗争精神，激发了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有力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据日伪官方报告记载，自“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2月，日伪军战死人数为6541名，平均每月“讨伐”抗日力量出动1500次，阵亡官兵73人，日军尸体从中国东北经神户运回日本，每月平均50具。

东北抗日义勇军的失败，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难以完全避免的。其主要原因是，在强敌进攻的复杂环境下，缺乏坚强的政治领导，没有统一的军事指挥，未充分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东北抗日义勇军虽然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和失败，但它所建树的历史功绩和造成的积极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在中国共产党不屈不挠的推动和领导下，一个新的斗争高潮很快又到来了。

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战争

（参见附图4）

“九·一八”事变不久，中共中央多次发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声明，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战斗任务，并号召全国人民支持东北人民的抗日斗争，坚决同入侵之敌血战到底。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中共满洲省委对组织领导和发动抗日武装斗争作了部署。除了派出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抗日义勇军、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或推动反日斗争外，还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3年夏初，当东北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建立了磐石、东满、珠河、密山、宁安、汤原、饶河、巴彦等10余支抗日游击队，进行了极为艰苦的斗争。到1933年初，根据中共中央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中提出的坚持抗日统一战线，坚持广泛的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这些抗日武装又进一步发展，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

（一）磐石游击队（南满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共磐石中心县委即在西玻璃河套一带，广泛建立了“反日会”等抗日群众组织。

1932年春，在县委领导下，“反日会”组织了中朝农民联合反日示威暴动，扒铁路、割电线、烧枕木，并组织起一支专打汉奸狗腿子的7人“打狗队”。中共满洲省委派搞兵运工作的杨佐青（原名杨君武）参加领导，县委抓住日伪统治势力尚未完全控制磐石的大好时机，在大力发动群众抗日的基

基础上，积极扩大抗日武装，不到半个月，“打狗队”扩大到20多人。他们消灭汉奸特务，缴了地主武装“大排队”20多支枪，队伍发展到30多人，正式成立了“工农反日游击队”。接着，争取了一连伪军起义，进一步壮大了力量。同年9月，磐石工农游击队协同另一支起义部队攻克磐石县城。

11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代理书记杨靖宇到南满一带指导工作。杨原名马尚德，河南确山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组织秋收暴动，建立确山农民革命军，任总指挥。

1929年奉命到东北后，领导过工人运动。杨指导磐石游击队经过整顿和改编，发展到800多人，改名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由杨靖宇等担任领导。

1933年1~5月，这支游击队与敌人作战30余次，先后取得了大坑、砖庙子、玻璃河套、萝卜地等战斗的胜利，粉碎了敌人4次“讨伐”。在胜利形势推动下，驻烟筒山伪军第14团迫击炮连在共产党员曹国安等人的策动下起义，携带武器加入南满游击队序列，编为迫击炮大队。同年，与海龙游击队汇合，人数迅速增加到2000余人。这支队伍活动于磐石、永吉、桦甸、辉南、通化、柳河、海龙、东丰、西丰、伊通、双阳等县，成为南满地区抗日武装的骨干。

（二）东满游击队

东满主要指吉林省东部的延边地区，是朝鲜族聚居的地区，也是抗日武装斗争开展较早的地区。

1930年8月，中共满洲省委成立了东满特委。“九·一八”事变前后，中国共产党在东满地区的延吉北部、汪清西部、和龙南部一些山林农村中，建立起工农民主政权和红色游击队，开展了1931年秋收斗争和1932年的春荒斗争。1932年2月，满洲省委指示东满特委把建立抗日游击队，开展游击战争作为主要任务，到同年秋，全区各县已相继创建了延吉游击队，汪清游击队，和龙游击队，以及琿春游击队等。在此基础上，1933年1月，东满特委书记、老共产党员和领导骨干董长荣，将上述几支游击队合编为200多人80多支枪的东满游击队。王德泰任大队长，把各县游击队编为中队，每中队又编为2~3个小队，每队20人左右，采取“人歇枪不歇”的办法，轮流袭击敌人。这支队伍在图们江和雅河一带有很大影响，并建立了东满抗日游击根据地。随着斗争的开展，游击队很快发展到1000余人，游击区也扩大到图（们）佳（木斯）、敦（化）图（们）等铁路沿线，后来绥（芬河）宁（安）地区抗日武装100余人，也加入了东满游击队，力量进一步增强。

从1933年初开始，日伪军对东满游击队进行了多次“讨伐”。东满游击队紧紧依靠群众，同敌人进行了大小数百次战斗，粉碎敌人的进攻，使自己不断发展壮大。

1934年初，东满游击队已增至900余人，武器装备也有较大改善。

（三）珠河游击队（哈东游击队）

1933年初，中共满洲省委派赵尚志到哈东地区义勇军孙朝阳部工作。赵系热河省朝阳县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入黄埔军校五期学

习，因不满蒋介石提出的“整理党务”案，于翌年毅然退校返回东北。

1931年曾任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在孙朝阳部遭日军四面包围的危急情况下，身为马夫的赵尚志提议主动出击宾县并亲自带领队伍攻克了宾县县城，从而被提拔为参谋长。同年秋，孙部溃散后，赵尚志等7人携带机枪1挺、长短枪11支到了珠河。

10月，在珠河县委领导下，于珠河县（今尚志县）三股流成立了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全队共13人，赵尚志任队长。游击队与当地的山林队、大排队、红枪会等群众武装联合共同抗日，活动于哈尔滨东部一带山地，常常出奇制胜，队伍到年底扩大到70多人，赵尚志任队长，李福林任政委兼支书，下辖5个中队，还有1个少年队、1个机枪队、1个骑兵队。

1934年春，珠河游击队曾经攻克珠河5区珠河镇，大破3区黑龙宫，3次围攻宾州城，争取了部分伪军的反正。到6月下旬，队伍发展到400多人，改编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赵尚志任支队司令，张寿箴（李兆麟）任政治委员，下辖3个总队、1个骑兵队、1个教导队、1个少年队；在滨江（哈尔滨）、宾县、方正、延寿、珠河、苇河、五常、榆树、阿城、双城一带开展抗日斗争，并在珠河地区建立了抗日根据地，成为一支坚强的抗日力量。

（四）密山游击队

1932年，在中共密山县委领导下，富振声等将勃利、林口、密山等群众武装，合并组成密山游击队。

1933年初，王德林领导的抗日救国军溃散时，该军参谋长、共产党员李延禄，根据中共绥宁中心县委决定，以党秘密掌握的补充团为基础，改编为抗日救国游击军，李延禄为总司令，孟泾清为政治委员，下辖3个团、1个步兵营、1个骑兵营、1个游击支队和1个政治保安连，共约800人，这支部队政治基础好，发展比较迅速。

1933年上半年与日伪进行了磨刀石、团山子、八道河子、东京城等多次战斗，毙伤敌人甚多，迫使1000多名伪军反正。6月，游击队夜袭日军驻地杨木林子，敌惊慌失措，四处逃散，死伤百余。随后，李延禄奉命开辟新的游击区，率部向密山转移。

（五）宁安游击队

1932年4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周保中，到绥宁地区的中心宁安县组织领导抗日武装斗争。周原名奚李元，云南大理白族人，在北伐军中曾任团长、副师长。

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后由苏联学习回国。周到宁安地区后，即对自卫军、救国军开展工作。1933年5月，宁安党组织把李荆璞率领的“平南洋总队”改编为“宁安工农义务队”，李荆璞为大队长，于洪仁为大队副，下辖6个分队。

1934年2月，抗日义勇军大部溃散后，周保中领导王德林所属义勇军残部，汇同柴世荣等人所属各部，与宁安工农义务队一起，组成绥宁反日同盟军。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1934年5月20日，宁安县委又决定

组织宁安游击队，队长为白殿贞，主要活动于宁安县内。

（六）汤原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派出一批干部到松花江下游开展工作。1932年夏，省委秘书长冯仲云赴汤原，指导创建游击队。冯系江苏武进县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1930年受组织派遣到哈尔滨市工作，曾任中共江北区委宣传部长。10月上旬，中共汤原中心县委在反日同盟会的基础上，建立了汤原游击队。由于缺乏斗争经验，被土匪“荣好”缴了械。同年冬，汤原县委又在组织农民抗租斗争的基础上，第二次建立了汤原游击队。因警惕性不高，发生了兵变。汤原县委总结了两次建立武装失败的教训，1933年冬在县委书记夏云杰的领导下，第三次建立起了“汤原反日游击队”，戴洪宾任队长，夏云杰任政委。游击队不断向萝北的鸭蛋河、葛金河一带进攻，并收缴了汤原县内几处地方的武装，队伍由原来80多人很快发展到600余人。在党的工作和抗日斗争影响下，张传福率自卫团，冯治刚率矿警队都加入了汤原游击队，队伍扩大到2000多人，主要活动在汤原、萝北、通河、依兰、桦川、富锦等地区。

（七）饶河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饶河中心县委即领导人民群众开展各种形式的抗日救国活动。首先组织了救国会，1932年6月，又在此基础上，由崔石泉、金文亨建立了饶河反日游击队。同年冬，发展到40多人。到1933年初，进一步扩大到130多人。该队一方面配合陈东山、高玉山等救国自卫军的统一行动，另一方面积极独立地在乌苏里江沿岸开展活动。

1933年6月，陈东山、高玉山部救国军瓦解后，饶河游击队正式独立出来，在李学福（李葆满）、崔石泉、张文偕等人领导下，队伍越战越强，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讨伐”，创建了饶河、虎林一带广大的游击区。为了粉碎日伪军的冬季“围剿”，饶河游击队经过刻苦训练，成了一支快速行动的滑雪队，活跃在完达山脉东麓的雪原上，成为该地区唯一的一支抗日的中坚力量。

（八）巴彦游击队

1932年初，张平洋（张甲洲）、张文藻等在巴彦组织起一支抗日武装，称为巴彦反日游击队，张平洋任队长，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赵尚志到该部任参谋长。巴彦游击队建立不久，人数即达到700多人，主要活动于巴彦、呼兰、绥化、庆城（今庆安）、铁力、东兴一带，曾在呼兰附近切断滨北铁路，收复过巴彦、东兴等县城。同年底，因在东兴之战中受挫，游击队随即溃散。

除此之外，还有1932年秋建立的海伦游击队，同年冬建立的海龙游击队等，当时都积极开展了抗日游击活动，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

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东北抗日游击队，在开始时人数都不多，武器装备也都很差，物质条件极端困难。但是，这些游击队有明确的政治纲领，

有集中统一的领导，有良好的群众关系；战士大多数出身好，政治觉悟高，组织纪律性强，英勇善战。所以，他们能不断地发动袭击，给日寇以沉重打击，据伪满铁道机关统计，仅 1933 年 3 月至 10 月，抗日游击队就袭击伪铁路 659 次，破坏铁道 101 次，击毙日伪护路军 546 名。又据伪奉天省警察署统计：辽宁省内的抗日游击队，1934 年 6 月份袭击敌人 709 次，7 月份为 759 次，8 月份为 1 716 次，12 月份为 1706 次。在斗争中，各游击队不断发展壮大、游击区也不断扩大。不久，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即进入了一个新时期。

第三节 全国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民族矛盾日渐上升，国内阶级关系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抗日救国已成为全国各阶层人民的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毅然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最前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迅速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的热潮。

一、学生、工人和各界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抗日救亡运动中，爱国青年学生起了先锋作用；广大工人群众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坚定的斗争性；其他各界人民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开展斗争，都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一）各地学生的爱国行动

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东北一开始，全国各地大中城市的学生，立即行动起来，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上海、北平、南京、天津、杭州、太原、长沙、西安、开封、广州、福州、武汉、南昌等地的大中学生，即纷纷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游行，发表通电，进行抗日宣传，建立抗日团体；要求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民众，出兵抗日。9月20日，北京大学学生会向南京国民党政府发出代电说：“日本帝国主义，屡向我国挑衅，愿欲藉故出兵，强占满蒙，今果悍然不顾，大肆武力侵略……事机迫切，国亡无日，是而可忍，孰不可忍，为今之计，唯有速息内战一致抗日，并望我国民众实行武装，誓做政府后盾。”9月21日，在北平各校学习的东北籍学生3500余人：举行“东北学生抗日会”成立大会，组织了敢死队，决心与敌人拼争。9月25日，北京师大学生和教职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致电谴责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国家养兵，原为抵御外侮，我国兵额之多，冠于全球，而一逼外敌，辄取不抵抗政策，洵属奇耻。此次日本入寇东省，如入无人之境，辽吉既已沦陷，平津又受威胁，似此情势，尚能持不抵抗主义乎。”9月27日，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怒斥国民党政府的“无抵抗主义”、“向国联报告请求公判”等政策，是“软弱无效，坐以待毙的政策与行动”；呼吁“全国的工农兵学商联合起来”、“武装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勾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天津市中等以上学校学生也发出代电，要求“出兵御侮”。

9月下旬，全国各地学生代表汇集南京，使学生运动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9月28日，南京、上海两地学生5000余人，冒雨前往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因未得结果，随即转向外交部。得到的答复仍然是等待“国联”解决，并强迫学生返校复课。学生们忍无可忍，冲开警卫的阻拦，殴打了国民党外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3页。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8章，第4页。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9年版，第8章，第5~7页。

交部长王正廷。10月初，全国各地学生举行反日示威。上海的请愿学生首缠竹布，上书“督促政府立即出兵，良众速起共作后盾”。

11月，日本特务在天津制造暴乱，北平、天津两地学生为此宣布总罢课，偃代表到南京请愿，各地学生起而响应，赴京请愿学生达1万余人。11月26日，请愿学生在国民党政府门前示威竟日，强烈要求出兵抗日。第二天，蒋介石被迫出见学生。但他对爱国学生的抗日要求，采取了敷衍搪塞的态度。

11月下旬，日军进逼锦州，国民党政府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施肇基，向国联提出划锦州为中立区、中国军队退守山海关的建议。消息传来，全国哗然，群情激愤。各地学生请愿团即改为示威团赴南京示威。

12月5日，北京大学示威团300余人在南京街头示威，高呼“反对政府出卖东三省”、“被压迫民众团结起来”等口号，国民党政府指示军警实施镇压，打伤学生33人，逮捕185人，制造了“一二·五”事件。南京中央大学和各中等学校的学生，迅速组成了几千人的示威团，援救北大同学。他们突破军警的警戒线，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要求释放被捕学生。

12月6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召开紧急会议，通过了援助北大同学，反对划锦州为中立区等项决议。

12月7日，上海1.5万名学生举行示威，抗议国民党政府压迫学生爱国运动。12月9日，上海学生抗日联合会代表大会开会时，上海当局指示特务绑架了从南京到上海进行联络的北大学生，激起了学生们更大愤怒。当天下午，上海各校学生万余人，包围了国民党上海市政府，许多工人和店员也起来支援。第二天上午，上海市政府终于被迫释放了北大学生，交出了绑架学生的凶手。接着，上海学生组织了人民法庭，准备公审凶手，并票传上海市党部常务委员陶百川和公安局长陈希曾，吓得陶、陈全家逃匿。法庭又起草了通缉令，悬赏捉拿，并迫使国民党上海市长张群签字盖章，送到各报刊登，轰动了全上海。

12月11日，太原学生因山西省政府拒绝请愿抗日，他们捣毁了省政府。

12月17日，汇集在南京的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济南、苏州、安庆等地的学生及南京市的学生3万多人，奉行联合大示威。当示威队伍走到国民党中央日报社附近珍珠桥时，遭到大批警察和宪兵的袭击，当场有30多名学生被打死，100多名学生被打伤，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珍珠桥惨案”。这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更大愤慨，他们强烈抗议国民党政府的罪恶行径。1932年1月10日，上海近万人集会追悼珍珠桥死难烈士。会后，举行了轰动全市的抬棺大游行。以学生的爱国运动为先声，全国各界迅速形成了抗日救亡的群众运动。

（二）工人阶级的抗日活动

广大工人群众，在“九·一八”事变后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工人阶级高度的爱国热忱和坚定的斗争性。

1931年9月24日，上海市3.5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拒绝为日本船只装卸货物。接着，上海23家日商纱厂工人酝酿同盟总罢工，纷纷退厂，不替月本资本家做工。同时，成立了上海日商纱厂工人抗日救国会。上海各阶层人民自动抵制日货，举行反日示威，许多日本商号的店员与私人雇佣的佣工也都陆续离去。随着全国抗日形势的发展，上海80多万工人组织

了抗日救国会。各厂工人也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派代表去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发枪开赴东北抗日战场。9月26日，上海100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会上通过了对日宣战、武装群众、惩办失职失地官吏等决议案，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0月2日，上海150多个工会举行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纲领。会议决定发表《告世界工人书》，揭露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出兵侵略中国的罪行。同时，还通过了多项决议案：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出兵抗日”，给义勇军“颁发军械”，“从速救济日厂华工”，一致对日实行经济绝交，查缴日货及严惩奸商奸细等。

除上海外，其他各大城市也先后爆发了工人罢工、游行、抵制日货等斗争。9月底，北平邮电工人组织了抗日救国会和邮电工人工义勇军。

10月中旬，北平工界抗日救国会成立。他们发出通电，强烈要求政府出兵抗日，并作出了组织义勇军和募集爱国捐款等项决定，10月初，天津英商自来水厂工人举行反日罢工。广州工人纷纷走上街头，进行反日宣传，曾与警察发生冲突，夺取了警察枪支。香港的中国工人在“九·一八”后也不断地举行抗日示威，并多次与阻止示威的英国巡警作斗争。在首都南京，各工业界成立了义勇军和抗日救国会，发表了告世界工人书和抗日宣言。津浦铁路工人还组织了宣传列车，沿途宣讲日军侵华暴行，鼓动民众起来抗日。武汉、青岛、太原、芜湖、长沙、重庆、桂林、汕头以及许多偏远城市的工人，也纷纷以发表宣言，向政府请愿，征募爱国捐款，禁售日货等各种形式，开展抗日爱国运动。

东北的广大工人，直接处于国破家亡的境地，战斗在抗日救国斗争的最前线。9月19日，沈阳兵工厂的工人，砸开工厂粮栈的大门，动手分粮；有3万多名工人拒绝为日本侵略者制造屠杀中国人的武器，先后离厂出走。日军占领长春以后，申东路的铁路工人立即组织起来，将机车向北转移，阻碍日军运输。9月21日，哈尔滨成立了各界联合会，积极进行抗日活动。

11月，各界联合会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充敌；表采：东北“有3000余万民众，200余万健儿，各输其财，各捐其躯，誓与日本帝国主义者作最后决斗。宁教白山黑水尽化为赤血之区，不愿华胄倭奴同立于黄海之岸”。

（三）各界人民团体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日本武力侵占中国东北，广大学生和工人阶级掀起救亡运动的同时，全国各界人民亦纷纷组织各种抗日团体，组织和支援抗日义勇军，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有力的打击。

“九·一八”事变的第2天，东北国民外交协会会长，奉天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阎宝航、辽宁省商务会会长金哲忱、辽宁工会联合会会长卢广绩、辽宁省国民常识促进会会长车向忱、辽宁省农会会长高崇民等人，先后逃亡到北平。随后从东北逃出的各界人员和难民越来越多，9月27日，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王化一等500余人，聚集在西单旧刑部街12号奉天会馆；群情激愤，反对南京国民党政府先安内后攘外的不抵抗政策，遂决定成立“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作为民众自发的抗日领导组织，担负起领导东北人民

抗日救国之责，该会的宗旨是：“抵抗日本侵略，共谋收复失地，保护主权”。

当天，选举出执行委员 31 人，其中阎宝航、高崇民、卢广绩、车向忱、杜重远等 9 人被选为常委。常务委员会下设总务部、军事部、政治部。救国会成立以后，即以宣传工作和军事工作为中心广泛开展抗日救国活动，并派遣秘密出关工作的人员对各地群众和义勇军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

东北抗日救国会还组织了宣传队，沿津浦、平琢两线深入城镇和农村，广泛地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活动，并向国民党政府报告“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抗日活动情况。11月初，日本进一步扩大侵略，为了督促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组织赴京请愿团，到南京强烈要求蒋介石出见。11月11日，高崇民慷慨陈词，质问蒋介石：“中央在敌寇入侵以来，不发一兵，不作明确抗日表示，一味依赖国联，使敌寇得寸进尺，侵略无止境，中央何以对〔得〕起东北人民？”蒋介石无言以对，只好用“到必要的时候，中央一定抵抗”等话来搪塞敷衍。救国会创办的《救国旬刊》、《覆巢月刊》和《救国时报》等刊物，报道东北人民和东北抗日义勇军英勇抗日的战绩，揭露日军在东北的种种罪行，广泛宣传 and 动员民众起来抗日，收复失地。当时，人们的心情，正象后来广为流传的一首名为《松花江上》的歌词那样：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森林煤矿，
还有那满山遍野的大豆高粱。
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那里有我的同胞，
还有那衰老的爹娘，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九一八’‘九一八’，
从那个悲惨的时候，
脱离了我的家乡，
抛弃那无尽的宝藏，
流浪！流浪！整日价在关内流浪！
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故乡？
哪年，哪月，才能够收回我那无尽的宝藏？
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欢聚一堂！？”

这首凄婉不忍卒听的歌曲，催人泪下，使人悲愤。东北各地的青年学生，东北大学、东北中学和救国会所办的各种训练班（如学生军）中的东北籍学生，纷纷参加各抗日队伍。北平各大专学校及其他地方也都有不少青年学生出关投军。

北平各界人民 30 万人，于 9 月 28 日在太和门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 20 条决议案，强烈要求国民党政府即早对日宣战；立即宣布退出国联；实行征兵制；全国中等以上学校即行军事训练；要求全国组织抗日义勇军，组织募捐；要求全国各人尺团体，一律用国货；号召海外侨胞一致团结；呼吁停

《东北抗日义勇军史》上，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 年版，第 52 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 6 辑，中华书局，1960 年版，第 92~93 页。

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会后分3路出发游行。

南京市各界人民10万多人，于9月23日在公共体育场召开抗日救国大会。会场响起哀乐，哭声震天，会上讲演者挥泪激昂，提出：“南京市民众应走在最前线，杀到日本去。于是全场喊杀，杀，声闻数里”。

10月20日，赵欣伯卖国投敌就任伪沈阳市长后，北平市新闻记者公会出于对汉奸的痛恨，直接发电报给赵欣伯，对其进行了强烈谴责，南京新闻界为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对日作战，召开大会，通过决议，组成新闻界对日外交后援会。会后，通电国联和全国新闻界，揭露日军暴行。要求国联主持公道，号召全国新闻界同胞一致奋起，唤起民众，共赴国难，以挽危亡。

1932年2月4日，新闻记者联合会、江宁律师公会、中央研究院、世界学会、中央大学、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中央政治学校、中国科学社、中国工程师学会、合作学社等南京文化团体和教育机关，联合通电世界各国民众，宣布日军暴行，希望各国爱好和平的人民主持公道，谴责和制裁日本侵略罪行。

以鲁迅为旗手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文化团体，在粉碎国民党文化“围剿”的同时，对于推动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起了重要作用。左联通过发表文告、论文、杂文以及小说、戏剧、诗歌、摄影、歌曲等文艺作品，谴责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国民党的不抵抗政策，揭露和批判了救亡运动中各种反动和错误的流派，提出了革命文学的战斗使命，呼吁国际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声援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在左联出版的《文艺新闻》、《十字街头》、《文学月刊》等刊物上，不仅大量刊登抗日文学作品，而且发专刊和开辟专栏，来揭露敌人，宣传群众，动员群众，进行抗日斗争。同时，左联作家还亲自参加了各种群众性的政治活动，如参加上海反日大同盟举行的游行示威，到上海各大学讲演，有组织地上街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以及动员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武装斗争等。

上海妇女团体80余个2000余人召开大会，联合组成妇女救国大同盟。她们举办救护训练班，要求一般无家室之累者审愿报名，参加训练，并从医科大学请来专家进行指导；组织妇女救护队，开赴前方参加救护工作。南京妇女界代表人物吴木兰、王信芳、李志明、黎青等发起组织中华国民救国女子军，抱牺牲的决心，舍身救国，3天签名参加者达1300多人，以南京女子法政讲习所为筹备地点进行组织，分救护队、宣传队、决死队3部分，并开始征募训练。张学良夫人于凤至女士及于学忠夫人、张学铭夫人朱洛筠、沈能毅夫人、鲍毓麟夫人、沈祖同夫人等20余人，发起组织华北妇女救国会，支持抗战，并发表宣言：“所望中外人士，一致动员，发挥善念，赐予赞助。”

开封妇女组织困难共济会，均由各界知名人物的夫人发起并带头捐款资助义勇军抗日，与会者当时就捐款3000余元。著名的民主爱国人士何香凝发起组织的华侨青年救护队，直接参加了锦西前线的工作。

北平法源寺的僧人，中国佛教会等通令全国各省市佛教会转知各寺院僧侣，呼吁共赴国难，节约用费，犒劳前方将士。伊斯兰教清真教徒，发起组织伊斯兰学友会，并发表宣言表示抗日。

广大农民群众也广泛地开展了抗日救亡的斗争。在抗日义勇军中，农民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42页。

陈觉：《九一八后国难痛史资料》第3卷，东北问题研究会，1932年版，第12页。

占了主要成分。以分散的乡村为依托开展的群众性抗日游击战争，农民是游击战争的主要支持者。抗日游击战争之火所以能在广阔的山区和平原迅速发展，是与广大农民在人力和物力等各方面对抗日军进行了有力的支援分不开的。南京的农界成立了抗日救国会，组织了 28 队义勇团，并通电全国农界，以实际行动抗议日军侵略。江苏及全国各地农村也都广泛发动起来，投入抗日爱国运动。

二、民族资产阶级、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军政人员与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活动

在民族危亡的紧迫局势下，随着广大工人、学生及各界团体爱国运动的开展，上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态度也发生了变化。他们公开指责国民党政府“对日交涉不惜忍辱屈服，对于共产党势在必剿”的误国政策。《申报》等报刊，反映民族资产阶级的呼声，发表评论，要求国民党政府“改弦更张”，进行抗日。

（一）民族资产阶级的爱国行动

1931 年 9 月 21 日，北平各界反日救国大会通电全国，提出“对日实行不合作主义”、“不在日厂做工，不用日钞，不与日银行来往，不买日货，不坐日轮，不住日旅馆”等等。接着，上海、汉口、天津、南昌等城市的工商业者组织，相继表示对日经济绝交，查禁封闭日货，拒绝与日商买办往来，拒收日本钞票，捐献救国。各地的抵制日货机构分别规定：凡向日厂订购的货物一律取消；凡已经运到的日货均须缴交抵货机构封存处理；凡宣誓抵货以后仍然贩卖日货的则予严惩。北平市商会在抗日救国会做出决议之前，就将北平市各商所存日货一律封存，并声明绝对不贩售仇货及与日经济绝交，各商会均填表盖章。河北省各县商会代表在北平开会，通电全国，表示愿作政府后盾，共赴国难，请政府立即对日宣战。

这场抵制日货的运动，严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实力，据 1932 年 8 月 2 日《申报》的统计，1931 年 9 月，日本对华输出比上年同期减少 34.7%，10 月减少 59.7%，11 月减少 68%，12 月减少 63.8%；日本的在华商业地位由第 1 位降低为第 5 位。另据《生活周刊》1931 年 11 月 7 日记载：日本近因我国抗日运动激烈，在 10 月中旬日本停船之数量达 519 艘，总量为 308687 吨，预计至本年底，停船将达全日本总船舶吨量 60%。这就是说，日本全国船业受到半数以上的影响。日本在华航业几乎陷于停顿，在华厂商的营业也几乎处于停顿状态。

1931 年 10 月 2 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愤怒地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侵略东北各地的罪行；希望世界各国人民谴责日本侵略者，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接着，全国各地商会纷纷通电掀起了谴责日本侵略和声援东北义勇军抗日的爱国活动。黑龙江省黑河商会联合各人民团体，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强烈要求支持马占山抗日，制止伪满洲国的成立。汉口市商会筹资 1 万元汇寄前方，以实际行动支援抗日。湖北省全省商会联合会，联电南京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请即通令全国，举办救国军费，按人口每人 1 元计，汇集起来支援抗战。

（二）国民党左派及部分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的爱国行动

“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左派领导人宋庆龄、何香凝等，坚决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庆龄在1931年12月19日发表宣言称：“中国国民党早丧失其革命集团之地位，至今日已成为不可掩蔽之事实。”“自十六年宁汉分立，因蒋介石个人之独裁与军阀官僚之争长，党与民众，日益背道而驰，藉反共之名，行反动之实。”“五年以来内战政争，循环不已，党既分崩离析，遂不惜各自乞怜帝国主义，利用腐化势力，举北洋军阀官僚所不敢为者，一一悍然为之。”冯玉祥说：“‘九·一八’的祸首就是蒋介石，蒋要向大家认罪下野。”“我们要抗日，我们要收复失地，谁要阻止抗日，谁就是卖国贼。”在日本侵华的威胁面前，一部分有民族气节的国民党基层组织和军政人员激于民族义愤，也积极提出各项抗日主张，支持和声援东北抗日义勇军的抗战活动。国民党驻东京直属支部执行委员会，为日本侵略军侵占中国东北，于1931年9月20日，要求中央执行委员会“对日所提出之任何条件绝对不承认”，“彻底对日厉行经济绝交”，“作对日战争的准备”。国民党驻巴黎总部执委会致电南京称：“……国联对于东事解决，如不能使中国满意，中国应即向日本宣战。”国民党驻美总支部致电南京国民党政府：“马占山将军，孤军抗日，捷报传来，海外腾欢，请即增兵逐日出境，还我河山。溥仪复辟甘为傀儡，请明令讨伐，以彰国法”。国民党驻退罗万磅支部全体党员，致电黑龙江省主席云：“请强硬对敌，保守领土，本部同志，誓为后援”。国民党湖南省长沙市、长沙县支部，分别致电黑龙江代主席马占山，声援他率部抗战的爱国行动。国民党上海各区党员，分别致电慰问马占山等义勇军将领，如九区电称：“此次暴日侵占我辽吉后，犹复得寸进尺，炮击津沽·进寇黑垣，势非灭我国奴我民而不止，幸我前敌将士忠勇奋发，力拒仇讎，既扫辽、吉不抵抗之奇耻，更坚强我国家民族之力量，除电请中央令饬军队增援外，特电慰劳，望继续努力，以作国家干城，以慰举国渴望。”国民党中央军校，有40多名学生愤于日本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自动离校，到热河参加抗战。

（三）海外侨胞的声援与捐助

“九·一八”事变后，侨居国外的爱国华侨，与国内同胞一样，以满腔的爱国热情，决心为抗日救亡的神圣事业贡献自己的力量。他们不仅进行声援，而且捐赠资金和物资，甚至组织华侨义勇军直接参加抗日战斗。

当时，回国旅行华侨首先在南京组织起华侨救国大会，呼吁各方放弃内

《申报》1931年12月20日。

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8~29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南京国民政府档案。

《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滨江时报》1931年11月27日。

同上。

《滨江时报》1931年11月18日。

嫌，团结对敌，拯救祖国。随后，侨居国外的华侨团体纷纷声援国内抗战。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不愿逗留敌国，相继返回国内。东京工业大学、东京高师、士官学校的留日学生，联合组织中华民国留日学生会，召开各校代表会议，一致决议返回祖国，以示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抗议。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中国留学生近 300 人，同仇敌忾，全体退学，并发表宣言说：“同人等留学敌邦，仰教他人，深知谋我者不惠我，制人者常骄人，已觉留非其块，学难有成”。“窃念吾辈武学生，职在捍国，当此国家濒危之时，正吾辈拚弃生命杀敌救亡之日，何能缄默笔砚间，与敌人讲武纸上乎？”9 月 29 日，留日学生代表 200 余人，到中国驻日公使馆向公使蒋作宾请愿，提出下旗归国、断绝国交、对日宣战和发给归国学生船票等四项要求。10 月 1 日，公使馆允许发给留日学生归国船票 200 张，2000 多名留学生只好推举代表先行回国。自 9 月 19 日起两个月内，留学生及其他侨胞先后共约 7000 余人归国。留日学生回国后，派出代表，数度向国民党政府和教育部请愿，提出反对不抵抗主义，立即对日宣战，反对压迫民众的抗日救国运动，促进和平统一等主张，并组织宣传队，奔赴救亡第一线，深入农村，揭露日本的侵华阴谋，向农民进行宣传，唤醒民众，抵抗外侮。

在马来亚新加坡，陈嘉庚发起召开侨民大会，通过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和美国总统胡佛，要求“履行各种条约，维护世界和平”；号召“侨民鼓动志气，激励爱国”，抵制日货，开展反日宣传。爱国华侨巨商胡文虎，首捐 2.5 万元，支援国内灾民。他创办的《星洲日报》代收华侨捐款，先后汇回国内达 100 余万元。在菲律宾，马尼拉华侨商会代表全菲 10 万侨胞，拍电报给美国总统胡佛、国务卿史汀生和前菲岛总督福白斯，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真相，吁请他们“以伸公道而救世界，免遭野蛮战争之惨祸”。华侨还成立了中华民族武装自卫会菲律宾分会筹备会，准备组织武装自卫队，回国参战。在缅甸，成立了缅甸华侨抗日救国总会，表示要对国内抗日同胞给予精神与物质之协助；不久，该救国总会汇款银 4 万两，次年又汇国币 4 万元，捐赠给国内抗日。毛淡棉救国分会由汇丰银行汇银 1 万两。印尼苏门答腊最南端的鹿勿冻华侨书报社，汇款 1 万元。印度华侨总支部由汇丰银行汇银 1 万两，用作抗日军费。澳洲华侨总支部和雪梨华侨抗日救国会，汇英金 200 镑支援抗日。

旅欧各国华侨均组织了各种机构，声援国内抗日。在英国，由英国名流和中国旅英人士成立了中国人民之友社，以援助中国抵抗外敌。在法国巴黎，组成了中华民众救亡会筹委会，向留法的全体同胞通告，恳其团结襄助，合力救亡。比利时华侨惊闻日本出兵东三省，莫不愤慨万分。他们召开代表大会，组织旅比华侨反日救国总会，并通电国民党政府，“望对日宣战，留比华侨，整装待命”。该总会国际宣传部以英、法、德三国文字，向欧美各国宣传日本侵华野心。

在美洲，美国芝加哥的华侨团体与学生，联合组织抗日救国会，举行示威游行。华盛顿、纽约等地华侨发起组织全美洲反日大同盟，发表通电，声援国内抗战。旧金山华侨捐款 100 万元美金，汇到国内支援抗日。旅居美国的华侨团体，还集资购买飞机 31 架（其中军用飞机 25 架，商用飞机 6 架），

《申报》1931 年 10 月 22 日。

《华侨与抗日战争》，四川大学出版社，1988 年版，第 9~10 页。

捐赠给国内,用于对日作战。仅据 1932 年 10 月和 11 月两个月的不完全统计,美国华侨为支援东北义勇军救助东北难民的捐款总数约 14 万美元。加拿大魁北克的华侨救国会,汇到上海 4000 元,并以 1 600 元用于慰劳抗战将士。加拿大雷城抗日救国会,捐款 5000 元,电汇商务银行。加拿大火威林华侨救国会电汇 5000 元。巴拿马广东花县抗日会汇款 4500 元,并以其中 1 500 元为犒劳战士之用。井里文华侨义赈会汇款 1 万元。文能卡抗日救国会,电汇巴黎银行 15 万法郎。秘鲁华侨抗日筹恤会,汇美金 2 万元支持抗日。委内瑞拉、古巴等国的华侨,也都组织起各种团体,援助国内的抗日救亡运动。古巴华侨总支部汇款 2300 元,抗日会汇国币 5 万元。

另外,许多爱国青年侨胞自动组织义勇军,远渡重洋回国直接参加了抗日战争。

东南亚一带华侨曾组织援马抗日团、抗日铁血团等前往东北,直接参加抗日。据《抗日救国》杂志报道,新加坡抗日铁血团 200 多人赴东北参战,多牺牲在日寇炮火之下。接着,又有华侨青年救国团第一批 21 人北上抗日。美洲华侨航空救国义勇军团,推代表李玉聘到南京会见陈树人,决定捐助飞机 12 架,并派精于飞行术的侨胞 80 人,返回祖国驾机杀敌。

爱国侨胞在政治上及人力物力上对国内抗战的有力支援,极大地鼓舞了战斗在白山黑水间的抗日义勇军将士。他们为祖国所做的贡献,是永垂青史的。

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激起了全国各界人民的强烈反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推动下,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现了中华儿女同仇敌忾的民族精神和爱国热情,显示了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巨大力量,促进了全民族的觉醒。

第四章 “一·二八”淞沪抗战

第一节 日本制造“一·二八”事变，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战

一、日本蓄意制造“一·二八”事变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由于中国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造成日本侵略军轻而易举地实现了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并随之建立了东北各省伪政府，接着积极策划筹建以清废帝溥仪为傀儡的伪“满洲国”。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武装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国际上主持正义的国家、政府和人民，也纷纷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尽管如此，日本仍因其轻易地占领中国东北，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从1931年底起，先后在天津、青岛、汉口、福州、重庆、上海等中国内地和沿海城市制造一系列事件，以寻找新的侵略借口。

上海是中国的最大城市和经济中心，是首都南京的门户，也是英美在华利益最集中的地区。“九·一八”事变以后，上海的学生、工人和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他们集会示威，抵制日货，组织抗日义勇军，成立“上海民众反日救国联合会”，积极开展反对日本侵略的活动。这些正义之举，便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事件的借口。

1931年10月，日本海军派遣军舰4艘到上海示威，并开进长江，向江阴要塞扫射，接着又将部分军舰集结在汉口，举行陆战队武装演习。日本海军窜到上海挑衅的企图，正如日本进步学者所指出：“日本轻易地占领了‘满洲’一事，进一步煽起了它侵略中国的野心，特别是日本陆军在‘满洲’的‘辉煌’成功，及其取得了庞大的临时军费，深深地刺激了经常与陆军对立的日本海军，使得海军也企图在‘属于它的势力范围以内’的上海伺机蠢动。同时，上海当时的紧张局势，更加刺激了日本海军的这种野心。”

在此形势下，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满洲国”的压力，在上海建立桥头堡，直接威胁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取消人民的反日运动，并为将来进攻中国内地作准备，同时，也是作为考虑南进的战略性步骤，以试探美、英等国的反应和让步的限度，于是在上海制造事端，燃起了新的侵略战火。

日本侵犯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事前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周密的准备。

1932年1月5日，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之一的板垣征四郎上校，从中国东北飞回东京，向裕仁天皇和日军参谋部报告侵占东北的情况，随后参与制订在上海发动战争的计划，并从东京给日本驻上海公使馆陆军辅助武官田中隆吉少校发了如下电报：“满洲事变按预计发展，……请利用当前中日间紧张局面进行你策划之事变，使列强目光转向上海。”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编：《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123页。

〔美〕戴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603、608页。

根据田中隆吉在战后的供词，最清楚他说明了上海事变的真相：

“问：田中，社会上说，上海事变的点火的人，就是你呀……。”

田中：是的。

问：一语道破。那末，当时，有五个日莲宗的化缘和尚在化缘，而叫人在上海马路上向这些人袭击的，就是你吗？

田中：是的。是我。

问：那是怎么样的经过呢？

田中：那是……在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发生了满洲事变，到十一月中旬，大体上平定下来了。日本人想使满洲独立起来。可是，外国方面非常麻烦。于是，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上校打了一个电报给我：‘外国的目光很讨厌，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就是说打来电报，叫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这样，就送了二万日元来”。

田中隆吉在接到板垣征四郎的电报后，立即与日本特务川岛芳子（本名金壁辉）密谋，决定借反日情绪较强的上海三友实业社之手，杀死日莲宗和尚，制造事端，引发中日冲突。

1932年1月18日下午，在川岛芳子指使下，上海江湾路妙发寺日本日莲宗和尚天崎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来到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总厂外，观看厂内工人义勇军操练，并故意向义勇军投掷石子挑衅，引起冲突，发生“互殴”，事后日方声称有一名受伤和尚死于日本医院。

田中等人乘机竭力扩大事态。1月20日晨，田中指使日本宪兵上尉重藤千春指挥上海的“日本青年同志会”暴徒32人、袭击三友实业社，焚烧三友毛巾厂，砍伤用电话报警的守卫巡捕。接着又与急忙赶来的公共租界华籍巡捕发生冲突，戮伤巡捕3人。

当天下午，田中隆吉煽动上海日侨集会，并向日本驻上海领事馆及海军陆战队请愿，“吁请帝国陆海军立即增兵，并要求驻上海的帝国官府（总领事及海军陆战队）采取强硬手段。”会后沿街挑衅，捣毁中国商店，殴打行人。此种情形，和日本关东军假借黑龙江的日侨请愿，向北满进兵“保侨”的手法，如出一辙。

日本暴徒的挑衅，激起了上海全市工人和市民的极大愤怒。1月20日下午，上海各抗日团体纷纷发表抗日宣言，要求逮捕凶手，并保证以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21日，上海各大报纸均显著登载了日人放火烧毁三友毛巾厂的新闻报道。

日本暴徒滋事以后，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竟于21日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抗议，并提出四项无理要求：一、市长向总领事道歉；二、逮捕处罚凶手；三、赔偿医疗费用及抚慰金；四、取缔排日活动，解散上海抗日救国会及各种抗日团体。1月22日，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也发表声明，借口《民国日报》在报道20日日人暴行时，有“日浪人藉陆战队掩护”等语，要求中国方面反省（由此，《民国日报》于1月28日被公共租界工部局封闭停刊）。并声言，如不接受日方要求，将采取适当手段，以“保

日本佛教的一派。

〔日〕东京广播电台第十二频道报道部编：《证言·我的昭和史》第1卷，1969年版，第172~174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4页。

日浪人指无正业到处流浪的日本人。

护帝国权益”。同时，虹口一带的日本海军陆战队，举行武装示威，并派飞机在三友实业社上空盘旋；虹口公园附近的日军和北四川路一带的日本浪人，更是身藏武器，到处乱窜，随时准备挑起事端。

田中策动在上海进行疯狂挑衅的同时，日军也在积极进行武装进攻上海的准备。

随着上海局势的日益紧张，日本海军大量增兵上海。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陆续驶抵上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舰（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陆战队450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上海。

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也驶抵上海。

28日，又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0驱逐舰，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陆战队460余人抵沪。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3艘，飞机40余架，海军陆战队1830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随着日军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方态度更加强硬，并为挑起事变制造新的借口。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1月27日，村井仓松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最后通牒，限于28日18时以前，给予所提四项要求以满意答复，否则日方将采取必要的手段。

日本帝国主义的蛮横行径，更加激怒了上海人民，上海各抗日团体立即组织示威，到市政府请愿，要求国民党政府对日绝交，坚决反对市政府接受日本的无理要求。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疯狂挑衅，国民党政府授意上海市政府对日退让，以求通过妥协来息事宁人。1月23日，行政院长孙科致电上海市长吴铁城，称：“本日下午与汪、蒋两先生详商应付上海事件，金主我方应以保全上海经济中心为前提，对日方要求只有采取和缓态度，应即召集各界婉为解说，万不能发生冲突，致使沪市受暴力夺取。至不得已时，可设法使反日运动表面冷静，或使秘密化，不用任何团体名义，俾无所借口，请即秉此旨妥密进行为要。”上海市政府秉承国民党政府的旨意，执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处处迁就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本和尚“被殴”事件发生后，上海市政府立即命令市公安局限期缉拿凶手归案法办。1月27日，上海市长吴铁城令市公安局取消上海各界抗日救国会。但村井仓松坚持非下令将凡是有抗日字样的各种团体一律解散不可。上海市政府经电呈国民党中央当局请示后，于1月28日13时45分，在《为日僧被殴事件复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仓松函》中，全盘接受了日本的四项无理要求，甚至还不惜诬蔑上海抗日救国会：“来函所提关于取缔抗日运动一项，现查本市各界抗日救国委员会有越轨违法行为，业经令行政主管局将该会取消，以维法纪。关于此类之越轨违法行为，本市长仍当本法治精神令行取缔。至其他各抗日团体，并已令局予以取消。”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0～531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4页。

然而，蓄意在上海制造事端的日本帝国主义，并不以中国方面全部接受其无理要求为满足，28日20时30分，日本第1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又发出新的通牒：

“目下上海租界内外人心动摇，形势不稳，时刻恶化，工部局已经宣布戒严，而各国军队亦已严密戒备。帝国海（军）鉴于多数邦人住居闸北一带，为维持治安计，敷〔欲〕以兵力配备该处，以负保安之责。本司令希望中国方面应将闸北方面所有中国军队及其敌对设施从速撤退。”而且，在尚未得到中国方面答复前，日本驻上海的海军陆战队就于1月28日23时30分，按预定作战计划，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二、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抗击

“一·二八”事变爆发时，驻守在淞沪地区的中国军队，是蒋光鼐、蔡廷锴、戴戟统率的国民革命军第19路军。这是国民党军队中较有爱国思想的一支部队，它的前身是北伐战争时期的国民革命军第4军第10师（1925年，师长陈铭枢）、国民革命军第11军（1926年，军长陈铭枢），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统一和北伐战争的胜利立下了战功。以后这支军队被蒋介石利用，参加内战。1930年成立第19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师长蔡廷锴、戴戟，但实际上仍受陈铭枢节制。

1930年12月，蒋介石发动“围剿”中国工农红军的反共内战，第19路军亦调至江西“剿共”前线。“九·一八”事变后，在全国人民抗日爱国运动的影响和在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提出的“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枪口一致对外”的正义号召的推动下，第19路军全体官兵3万余人，曾在江西赣州“剿共”前线集体宣誓反对内战，团结抗日。1931年10月，由于陈铭枢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宁粤妥协，被任命为京沪卫戍司令长官，第19路军亦由江西赣州“剿共”前线调戍京沪地区，蒋光鼐任总指挥，蔡廷锴任军长，戴戟任淞沪警备司令。当时该军序列如下：

第19路军	总指挥	蒋光鼐
	军长	蔡廷锴
第60师	师长	沈光汉
第119旅	旅长	刘占雄
第120旅	旅长	邓志才
第61师	师长	毛维寿
第121旅	旅长	张励
第122旅	旅长	张炎
第78师	师长	区寿年
第155旅	旅长	黄固
第156旅	旅长	翁照垣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38页。

指蒋介石派与两广派的妥协。

每旅辖3个团，全军共3.3万余人。

调防京沪以后，第19路军深受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影响，全军上下更坚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之决心，随时准备抗击日本侵略军的进攻。

第19路军广大官兵虽具有坚定的抗日决心，但在组织上和物质上的准备都很不充分。当时国民党政府坚持不抵抗主义，没有任何抗日准备。第19路军因不是中央嫡系部队，备受排挤，从“九·一八”起，官兵连军饷都领不到。调戍京沪以后，情况生疏，对敌情知之甚少。直到“一·二八”事变爆发前两星期，才从日人的疯狂挑衅和日本海军源源增兵上海等活动中，判断日军对上海发动武装进攻不可避免，开始主动积极地进行战备。

1月23日，第19路军召开驻上海部队营长以上干部紧急军事会议。会上，蔡廷锴首先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他说：“日本人这几天处处都在向我们寻衅，处处都在压迫我们，商店被其捣毁，人民被其侮辱，并加派兵船及飞机军舰来沪，大有占据上海的企图。我最近同戴司令一再商量，觉得实在忍不下去，所以下了决心，就是决心去死。但死也要有死的方法，所以今天召集大家来研究。……兄弟只有决死的心肠，愿意同大家同生同死！”接着，戴戟叙述了最近日人挑衅的情况，表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成败何足计，生死何足论。我辈只有尽军人守土御侮的天职，与倭奴一决死战。”

蒋光鼐指出：“十九路军是很负名誉的军队，现恰驻扎在上海，此时真是十九路军生死存亡的关头，也可说是我们国家生死存亡的关头。到这种时期，我们军人只有根据着自己的人格责任、职守、声誉，来死力抵抗了！从物质方面说，我们当然远不如他，但我们有这种决死的精神，就是全部牺牲亦所不计。我们的死，可唤醒国魂，我们的血，可寒敌胆，一定可得到最后的胜利。”会议决定死守上海，并确定了防御部署以及一切必要的应变措施。与会人员一致决心保卫上海，矢志不渝。

当日下午7时，第19路军总指挥部向所属各部发出密令：

“（一）根据日方现派大批舰队来沪，有向我政府威逼取缔爱国运动，并有自由行动之企图。

（二）我军以守卫国土克尽军人天职之目的，应严密戒备，如日本军队确实向我驻地部队攻击时，应以全力扑灭之。

（三）第78师第156旅担任京沪铁道以北至吴淞宝山之线，扼要占领阵地；第155旅担任京沪铁道线（包括铁道）以南至虹桥、漕河泾之线，（南市龙华之团即在原地）扼要占领阵地。

吴淞要塞司令率原有部队固守该要塞，并切与附近要塞之友军确取联络。

铁道炮队及北站之宪兵营，归第78师第6团团长张君嵩指挥。

丹阳第60师之黄茂权团，限于24日开至南翔附近待命外，其余沈光汉师、毛维寿师为总预备队，在原地候命。

各区警察及保卫团受各该地军队高级指挥官指挥。

（四）总指挥部军部移驻真如，警备司令部仍暂驻龙华”。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页。

《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38页。

《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

1月24日，蔡廷锴等到达苏州，又召集驻苏州部队高级将领在花园饭店举行紧急会议。蔡廷锴在会上表明第19路军抗战决心，传达了于23日发出的密令，与会驻军将领，也一致表示要团结抗日。

两次会议以后，第19路军各部基本完成了部队部署的调整：第78师担负淞沪地区防御任务，所辖第155旅担负京沪铁路（含）以南之真如、虹桥、漕河泾、高昌庙地区防务（第3团驻真如，第2团驻北新泾、虹桥地区，第1团驻龙华、高昌庙地区）；第156旅担任京沪铁路以北之闸北、大场、吴淞、宝山地区防务（第6团驻闸北，第5团驻大场，并派1个连担任浏河警戒，1个营驻江湾附近，第4团驻吴淞、宝山）；师部位于真如。吴淞要塞部队（1个守备营）固守要塞。第60师第1团（即黄茂权团）调南翔待命，其余各团（位无锡、苏州、常州地区）和第61师（位南京、镇江地区）为总预备队。第19路军司令部位真如车站。淞沪地区阵地编成为：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真如、闸北、江湾、吴淞、室山之线为第一抵抗线；定七宝、南翔、嘉定、浏河为第二抵抗线。

1月23日，蔡廷锴电呈国民党政府：“据报：日本海军及陆战队强迫我接受不能忍受之条件，并闻将取断然处置。职等为国家人格计，如该寇来犯，决在上海附近抵抗，即使牺牲全军，亦非所顾！”向国民党当局表明了第19路军抗战的决心。同时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戴就联名发表《告十九路军全体官兵同志书》：

“日本帝国主义的兽行鬼态，在我面前已尽量暴露，夺我东三省，占我锦州，袭我热河，扰乱我平津、汉口、广州、福州，最近更在上海派来炮舰多只，封锁我海口，震动我京畿，杀人放火，烧我三友实业社，杀我警察，四顾神州，版图变色，皇皇五千余年之华胄，将沦为奴隶牛马万却不复之惨境，而〔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不自救，谁能救我！？……此次为振醒世界之视听，复活我们受辱的伟大民族之魂魄，保种保国，以死以主，自最高级官长以至伙夫，要须具有十二万分最后之决心与平素革命之勇气，不抵抗无以为人，不抵抗无以救国。认清楚此次与暴日拼命，迥非寻常之作战可比，意义丰富，价值无上。抛掷一头颅，即保障世界一分和平，挥洒一点血，即挽回一分国运……我们负京沪淞沪守土之责，决不叫仇日来损我一草一木！决定死守！……我们不要感觉我们物质敌不过人，我们要以伟大牺牲的精神来战胜一切，我们必定能操胜算我们必定能救中国。”

嗣后，蒋、蔡、戴又联名发表《告淞沪民众书》，概述了“九·一八”以来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为，并派遣大批军舰来沪作发动战争的准备情况，决心“宁为玉碎而荣死，不为瓦全而偷生。本总指挥、军长、司令愿与我亲爱的淞沪同胞，携手努力，维持必要之治安，作最后有秩序之决斗。绝不使日兵在中国土地及淞沪万国俱瞻的范围，扰及我安居，损及我一草一木。否则，军人殉国本分内事，此物此志，可以昭世界而信神明。”同时提出了军民合作共同抗日的七项措施。

这样，第19路军基本上完成了抵御日军进攻的思想准备和作战部署。

国民党政府唯恐第19路军与日军冲突，急忙加以阻挠。1月24日，蒋

李敖：《蒋介石研究》（3），华文出版社，1988年版，第32页。

《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143页。

《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144页。

介石指使何应钦、张静江劝说第 19 路军军长蔡廷锴。何应钦指出：“现在国力未充，百般均无准备，日敌虽有压迫，政府均拟以外交途径解决。上海敌方无理要求，要十九路军撤退三十公里，政府本应拒绝，但为保存国力起见，不得已忍辱负重，拟令本军于最短期间撤防南翔以西地区，重新布防。望兄遵照中央意旨，想兄也同意。”张静江也进行劝说：“第 19 路军素来军纪严明，革命战争有功。上海日军处处挑衅，如果不善于应付，大有一触即发之势。望你体念中央的意旨，最好澈退到后方南翔一带，以免与日军冲突。上海华洋杂处，如果战端一开，损失极大。倘能撤退，我可报告蒋总司令。”蔡廷锴对于他们的劝说，当即予以严正拒绝：“上海是我国领土，第十九路军是中国军队，有权驻兵上海，与日本帝国主义毫无关系，万一日军胆敢来犯，我军守土有责，决定迎头痛击。”为将第 19 路军撤离上海，以宪兵团接替其防务，“俾非战斗之宪兵团缓冲期间，可保中日两军不发生冲突。”1 月 27 日，蒋、汪饬令参谋总长朱培德、军政部长何应钦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京沪卫戍司令长官陈铭枢、淞沪警备司令戴就：“兹为力图避免彼我双方军队发生冲突起见，着派宪兵一团，即刻开往上海闸北一带，接替防务。归淞沪警备司令戴鼓指挥。以资缓冲。”27 日晚，何应钦、朱培德又 3 次急电第 19 路军：“着该军忍辱求全，避免冲突，万勿妄动，以免妨碍国防大计。”宪兵司令谷正伦接奉电今后，立即派宪兵第 6 团于 1 月 28 日赶到上海闸北接替第 19 路军第 78 师翁照垣旅之防务，但未待防务交接完毕，日军即于是晚发动事变，第 19 路军奋起抗击，淞沪抗战开始。“处此情形，原欲接替第十九路军维持闸北治安之宪兵第 6 团，被环境所逼，不得不变为第十九路军之援军，以抵抗日本之侵犯。”

三、淞沪抗战经过

（参见附图 5、6、7）

（一）日军进攻闸北，惨遭失败

日本海军第 1 遣外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发出要求中国方面撤退闸北驻军的通牒后，不待中国方面回复，即令停泊在上海的日本军舰上的海军陆战队登陆，列入上海陆战队指挥官属下，同时命令上海陆战队迅速按预定计划作好进攻准备。

1932 年 1 月 28 日 23 时 30 分，日本海军上海陆战队在指挥官鲛岛上校指挥下，以 20 余辆装甲车为前导，在炮兵支援下，向闸北宝山路、虬江路、广东路、宝兴路、横浜路、天通庵路、青云路等各路口中国守军阵地进攻。防守闸北的中国第 19 路军第 78 师第 156 旅，依照总部 23 日下达的密令第二

《蔡廷锴自传》，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 年版，第 275 页。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 年版，第 122 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426 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426~427 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 37 辑，中华书局，1963 年版，第 45 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427 页。

项之规定，当即奋起还击，前来接防的宪兵第6团一部亦奋起抵抗，双方展开激烈巷战。

第19路军总部在接到关于日军发动进攻的报告后，蒋光鼐、蔡廷锴、戴戟星夜赶至真如车站，设立临时指挥部，依照原定部署，命令后方部队迅速向上海推进。29日1时，蒋、蔡、戴联名向全国各界发出通电：

“暴日占我东三省，版图变色，国族垂亡，最近更在上海杀人放火，浪人四出，极世界卑劣凶暴之举动，无所不至。而炮舰纷来，陆战队全数登岸，竟于俭（二十八日）夜十二时在上海闸北公然侵我防线，向我挑衅，光鼐等分属军人，惟知正当防卫，捍患守土，是其天职，尺土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抵抗，虽牺牲至一人一弹，绝不退缩，以丧失中华民国军人之人格。此心此志，质天日而昭世界，炎黄祖宗在天之灵，实式凭之。”

上述通电，表明了第19路军对于日军进攻实行坚决自卫的决心。

天亮以后，日军在装甲车的掩护下，连续发起猛攻，日机也由航空母舰起飞，对闸北、南市一带狂轰滥炸，战火迅速漫延。守军第156旅所部，顽强抗击日军的进攻，以集束手榴弹对付日军的装甲车，组织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并在炮火掩护下适时向敌实施反击，打退日军的连续进攻。据日军自供：“战斗极为激烈”，“市街到处起火，火焰漫天，战场极为凄惨。”在北站及商务印书馆两处起大火后，日军趁机向北站猛攻，守军与日军激战1小时后退出北站。

29日17时，第156旅主力加入战斗，进行反击，夺回北站及天通庵车站，并乘胜追击，一度攻占日军上海陆战队司令部，迫使日军退至北四川路以东、靶子路以南地区。日军首次进攻以失败而告结束。

29日20时，日军通过英、法、美各国领事的斡旋，向第19路军提出停战要求。第19路军明知其为缓兵待援之计，只因本军也需调整部署，遂接受了日方要求，停战3天。

日军进攻闸北失败后，密切注视着事态发展的日本天皇裕仁，一反宫廷常例，未和首相推荐人西园寺商量，就于2月2日任命伏见宫博恭王为海军军令部总长，以便处理有关战事。

1月30日，佐世保第3特别陆战队在上海登陆。2月1日，横须贺第1特别陆战队亦开抵上海。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将长江一带原有海军及新增调的舰船编成第3舰队，由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任司令官，统一指挥进攻上海。

与此同时，第19路军也调整了部署，将原驻镇江以东的第60师调至南翔、真如一带，第61师调上海。原驻上海的第78师全部加入前线，增强防御。

2月2日，日本海军中央部批准上海日军“可采取积极行动”。2月3日，日军破坏停战协议，再度向闸北发动进攻，同时又以军舰20余艘、飞机10余架轰击吴淞炮台。中国守军在闸北地区击退了日军的新进攻，但伤亡较大，于3日晚调第60师第120旅接替闸北防务，宪兵第6团担任曹家渡、中山路警戒；第156旅撤离闸北，其第5团增援吴淞，第6团撤至金家角地区

《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39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休整。

2月4日，日军发动第一次总攻，以数千人分3路会攻闸北，数百人攻击八字桥，但在中国守军的顽强抗击下，日军承认“进展不易”，被迫于午后撤回原进攻出发阵地。同日11时，日军以军舰13艘、飞机24架猛烈轰击吴淞要塞。至13时，要塞炮6门被毁，炮台守备营被迫后撤，日军乘机在吴淞要塞登陆，但旋即被增援吴淞的第156旅击退。

5日，日军再次进攻闸北，守军顽强战斗，阵地失而复得。日“海军陆战队指挥官认为敌人的后方阵地很坚固，若不付出较大牺牲难以攻破，”于16时下令停止攻击，撤回原阵地。至此，日军发动的第一次总攻被粉碎。

日军总指挥盐泽幸一曾扬言上海一旦发生战事，4小时即可了事，但在第19路军的英勇抗击下，狂言化为泡影，盐泽幸一本人因指挥进攻失败，被撤职回国。对此，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曾评论说：

“在现代恐怕没有其他海军司令象盐泽上将（少将）这样在他被免去在上海的高级指挥权以前的几天里接二连三地犯这样多的错误了。这些错误全都由于他最初低估了敌方的士气和力量。他把整个战役建立在一种迷信上，似乎只要一挥动日本国旗就能使中国军队落荒前逃。”

“他在他的最后通牒被全盘接受之后发动战事，首先就违反了国际法。他以租界作为进攻中国人的基地，破坏了租界的传统的地位。他没有预先警告非战斗人员就轰炸一个人口稠密的城市，从而违背了国际惯例。而且他公开对华开战，自然是撕毁了一切国际和平条约。”

斯诺的评论，揭露了盐泽的骄傲和狂妄，同时也是对日本帝国主义践踏和平、发动侵略战争罪恶行径的谴责。

（二）日军进攻吴淞，又遭失败

盐泽幸一撤职回国以后，日军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并调植松炼磨少将为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同时，日本陆军中央部调派陆军第9师和混成第24旅增援上海作战。

早在日本人制造上海紧张局势之时，日本陆军中央部即已考虑向上海增派陆军，但遭日本海军拒绝。战争爆发以后，日本海军陆战队在中国第19路军的顽强抵抗下，进攻屡遭失败，不得不向陆军求援。1月31日，日本海相提出要求：“上海附近情况不容乐观，必要时希望陆军增援。”2月1日，日本陆军省予以承诺。2月2日，日本参谋部与军令部就上海方面指挥陆海军协同作战问题达成协议：“帝国陆海军在上海方面互相协作”，“必要时则击破当面之中国军。”同时命令第9师紧急动员，第12师临时组成混成旅。

2月5日，日本陆军中央部发令派遣第9师、上海派遣混成旅等，由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负责指挥。鉴于上海方面告急，决定先派遣混成旅从佐

〔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40页。

《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32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29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7年版，第329页。

世保搭乘日本海军第2舰队所属舰艇，到上海加入第3舰队序列。同时，日本海军也增派横须贺第2特别陆战队赴援上海。

野村吉三郎接任上海日军总指挥以后，决定改变进攻闸北的计划，以主力会攻吴淞，同时以一部兵力进攻江湾，企图从守军左翼突破。于是命令由日本国内启航增援上海的混成第24旅（即上海派遣混成旅）驶向吴淞口，准备攻击吴淞炮台，令新任上海陆战队指挥官植松少将指挥所部进攻吴淞，掩护混成第24旅登陆。

针对日军企图，第19路军亦相应调整部署，加强了左翼防守兵力。其具体部署是：第78师第156旅以第4、第5团坚守吴淞、室山，第6团担负大场至真如车站一线警戒；第155旅以第1、第2团集结真如附近，第3团担负北新泾至真如车站一线警戒。第61师第121、第122旅由南翔分别推进至大场、刘家行地区。第121旅以第1团担任江湾警戒；第122旅以第4团至罗店担任例河、川沙方面警戒；第60师守备闸北至江湾一线。第88师独立旅及宪兵第6团担任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一线守备。

吴淞是上海的门户，增援的日军欲顺利在长江口登陆进入上海，必须首先攻击压制或占领吴淞要塞地区。

增援上海的日军混成第24旅，于2月6日在佐世保集中启航，驶向吴淞口。为掩护该部登陆，上海陆战队在植松少将指挥下，从7日7时50分开始，集中全力进攻吴淞，日军先以飞机10架，沿淞沪铁路线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继以陆战队分由黄浦江、军工路水陆两路，至张华浜会合，于10时猛攻吴淞地区中国守军第156旅第4团阵地。同时集中军舰24艘、火炮30余门、飞机20余架，对蕴藻浜车站、吴淞镇、狮子林炮台实施轰击，配合地面进攻。守军浴血抗击，战至12时，将日军击退。

日军混成第24旅于7日14时许抵达吴淞，并在上海陆战队掩护下在吴淞铁路码头强行登陆。第19路军曾对登陆之敌实施炮火袭击，但效果不大。至18时，日军登陆完毕，在徐家宅附近集结，作进攻吴淞炮台的准备。

8日拂晓，日军混成第24旅分3路向张华浜、蕴藻浜、吴淞镇进攻。日海军司令部发言人于10时向美驻沪记者扬言：日军决在午前占领吴淞。至傍晚，日军攻击达10余次，均遭失败。23时许，日军向引翔港、杨树浦、狄思威路退却。日军在进攻吴淞的同时，以一部兵力在纪家桥偷渡，企图袭击守军后路，被守军发觉击退。

另以一部兵力向八字桥、江湾进攻，企图攻占江湾、大场，截断守军吴淞与闸北之间的联系，阴谋亦未得逞。

10日，中国守军第122旅第6团由刘家行进至杨家行，防守胡家庄沿蕴藻浜北岸至吴淞之线。请缨赴援的张治中第5军第87师第261旅于12日由南翔进至嘉定，并派1个团接替罗店第122旅第4团之防务。

11日，野村对西方记者宣称：“日军渡过蕴藻浜之日，即为日军行动终止之时。”“日军在吴淞踏平华军濠沟之日，为时不远，请诸君拭目相观，届时即可结束华东之抵抗。”

12日，日军混成第24旅为在蕴藻浜北岸夺取进攻吴淞的支撑点，两度在纪家桥附近架桥，均遭失败。12日晚，日军利用夜暗在纪家桥附近架桥成功。13日拂晓，日军在烟幕弹掩护下强渡蕴藻浜，在曹家桥附近突破守军防

线，第 19 路军急调第 60 师第 122 旅增援，将渡河日军包围。日军数次突围均遭失败，双方展开肉搏格斗。下元旅长急调一部日军救援。被围日军在其救援部队接应下拚力突围，但仅有少数突围后被救援部队收容后撤，大部被歼。同日，日军在江湾、闸北地区亦以一部兵力进攻。

14 日拂晓，日军再各以一部兵力分别进攻江湾、八字桥、青云路、天通庵路等处，均被守军击退。至此，日军已无力组织新的进攻，被迫原地固守待援，并在英、美、法、意等国公使出面调停下，再次处于休战状态。野村企图从几路包抄吴淞中国守军的计划，终被粉碎。

（三）日军进攻庙行、江湾，再遭失败

根据日本天皇敕令，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急令陆军第 9 师火速增援上海。13 日，该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与第一梯队抵达上海港。

16 日，该师全部在吴淞码头登陆。在沪日军改由植田统一指挥。此时，在沪日军已达 3 万余人，野炮近 70 门，飞机 60 余架，并有舰艇数十艘集中于吴淞口。其部署是：海军陆战队位于闸北、八字桥一线；第 9 师位于八字桥、江湾一线；混成第 24 旅位于张华浜、蕴藻浜一线。

18 日 9 时，植田通过英国公使兰浦森的斡旋，以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在法租界中日联谊社与第 19 路军代表范其务参议会见，要求第 19 路军撤退，当即遭范拒绝。于是，植田在当日下午向第 19 路军军长蔡廷锴发出最后通牒。内称：

“ 贵军应立即停止战斗行为；在 2 月 20 日午前 7 时前把现在的第一线撤退完了，并应在 2 月 20 日午后 5 时前，从下列地区撤退完了：在黄浦江西岸地区，从连接租界西端曹家渡镇、周家桥镇及蒲淞镇（又你北新泾镇）线以北撤退；在黄浦东岸地区，从连接烂泥渡及张家楼镇线以北撤退，各撤退至距离各租界边界线二十公里地区（包括狮子林炮台）以外。同时撤除在以上地区内的炮台等其他军事设施，并不得再设置……以上各条如不见实行，日军不得已将对贵军采取自由行动，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应由贵军负责。”

村井仓松也向上海市长吴铁城发出了同样的通牒。

第 19 路军收到日军的通牒后，立即召开了高级军官会议，与会者群情激愤，怒不可遏。据此，指挥部立即令前线部队集中炮火向日军阵地猛轰，作为对植田通牒的回答和警告。

此时，由张治中将军率领的第 5 军已全部赶到淞沪地区，归第 19 路军蒋光鼐统一指挥，参加对日作战。

第 5 军开抵淞沪后，增强了中国军队在这一地区的防御力量。第 19 路军重新调整部署，由第 5 军接替由江湾北端至吴淞西端之线的防务，并任命张治中为左翼军指挥官，全面负责左翼地区的作战指挥。由第 19 路军担负江湾及其以南至南市之线地段的防御，以蔡廷锴为右翼军指挥官，统一指挥右翼地区的作战，并限于 18 日拂晓前完成全部调整。其具体部署是：第 60、第 61、第 78 师（欠第 156 旅）和第 88 师独立旅、宪兵第 6 团为右翼军，防守南市、龙华、北新泾、真如、北站、八字桥、江湾（含）之线。主力位于真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146 页。

如、大场间，以迎击当面日军，并待机向引翔港方向出击。其中第 88 师独立旅、宪兵第 6 团防守南市、龙华、虹桥、北新泾（含）之线；第 78 师防守北新泾沿苏州河北岸至北站之线，主力位于真如附近；第 60 师防守北站、闸北、八字桥、江湾南端之线，主力位于中央，以迎击江湾当面之敌，相机向引翔港方向出击；第 61 师以一部兵力防守江湾镇，主力集结于大场镇西南一带，为右翼军预备队。第 87 师、第 88 师（欠独立旅）、第 78 师第 156 旅、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左翼军，防守江湾北端、庙行镇、蕴藻浜北岸、吴淞之线，主力位于大场镇、杨家行、刘家行之间，待机向殷行镇方向出击，歼敌于黄浦江畔。另以小部兵力配置于罗店、浏河、川沙等地，担任沿江岸警戒。其中第 88 师（欠 1 个团）防守江湾北端至周巷、蔡家宅之线，主力位于大场以北地区；第 87 师第 261 旅防守蕴藻浜北岸胡家宅至吴淞西侧之线，第 259 旅为师预备队，控制火烧场附近；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为军预备队，集结于刘家行以北之太平桥附近地区。第 19 路军总指挥部位于南翔。同时，张治中发表《告全军将士书》，对第 5 军进行动员，表示：“誓与我军将士共患难，同生死。深望我军将士，人抱必死之心，以救国家，以救民族。假如日军犹有一兵一卒留我国内，我们的责任即未完成；反之，我们如尚有一兵一卒，必与敌人拼命到底！”

植田谦吉预料到第 19 路军不会接受其最后通牒所提条件，因而不待答复即于 19 日 16 时下达了进攻命令，以主力攻击庙行、江湾一线，企图将该地守军消灭于苏州河以北地区，其具体部署是：吴淞支队监视吴淞炮台，并掩护师的右侧背；混成第 24 旅主力集结于赵家浜附近，向庙行镇方面攻击前进，准备攻击庙行镇附近中国守军阵地。右翼队在河浜桥东北大路附近及右手浜附近集结，向江湾赛马场南北线挺进，准备攻击江湾镇附近中国守军阵地；中央队主力在新公园附近集结，准备攻击江湾镇及雨伞店；左翼队守备青云路（含）以南地区；炮兵主力集结于沈家行附近支援步兵作战；预备队位于唐家滩附近。各部于 19 日夜开始行动，至 20 日拂晓前已进入进攻出发地线。

20 日 7 时 30 分，日军从正面向闸北至吴淞发起全线进攻，主攻方向为江湾、庙行，企图从中国守军阵地中央突破，尔后卷击吴淞、闸北。日军混成第 24 旅在飞机、重炮支援下，向庙行镇方向攻击，守军第 88 师部队奋勇抗击，战至 16 时，日军仍滞留于中心巷、金家宅、孟家宅地区无法前进；日军第 9 师右翼队和中央队在坦克及炮兵支援下，猛攻江湾镇，守军沉着应敌，战至 18 时，挫败了日军的进攻。入夜，日军调整部署，21 日再度进攻，仍无进展，且在守军火力杀伤下伤亡惨重。日军看到如此攻击损失太大，又无效果，只得以一部兵力监视守军阵地，停止攻击。

已遭到沉重打击又不甘心失败的植田，拼凑力量，调整部署，再次组织全线进攻，以求部分突破守军阵地，挽回败局。

22 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混成第 24 旅第一线部队乘晨雾于 6 时前突入庙行镇东端第 88 师第 264 旅第 527 团第 3 营阵地和麦家宅及其南侧坟地一带，守军第 88 师将全部预备队投入战斗，仍未能将其击退，且伤亡较大。日军突破一点后，乘机扩大战果，妄图动摇主线防御。在此十分危急的时刻，右翼军指挥官张治中，当机立断，亲率军预备队（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急赴

冯家宅第 88 师司令部指挥，除令第 88 师坚守阵地阻敌扩张外，令第 87 师第 259 旅向庙行镇正面增援，令第 261 旅以火力支援。具有坚定抗日决心和初步对日作战经验的第 19 路军指挥部，判断经过数日激战伤亡惨重、止步不前的植田，在来得到新的增援之前，他的所谓全线进攻和突破，是可以粉碎的。总指挥蒋光鼐于 9 时决心由江湾镇、庙行镇、蕴藻浜 3 个方向同时实施反突击，合围歼灭庙行镇之敌。令第 60 师在闸北至江湾间实施佯攻，以牵制日军；令第 19 路军预备队第 61 师第 122 旅（欠第 6 团）由小场庙、竹园墩向赵店宅攻击当面日军之侧背；令第 87 师第 259 旅加入庙行镇正面与第 88 师同时从正面实施攻击；令第 87 师第 261 旅以主力由蕴藻洪渡河向金穆宅进攻日军侧背。至 15 时左右，各部到达出击位置，即全线向日军展开反突击。

第 60 师由宝山路、天通庵路、中山路向日军实施佯攻，牵制日军；第 61 师第 122 旅（欠第 6 团）由大场镇西南向前开进，17 时即从小场庙、竹园墩地区与第 88 师部队协同向当面日军反击。

17 时 30 分，进占赵家宅西端地区，发现该敌军纵火焚烧房屋，有退却征候，第 122 旅即以一部追击，至 23 时占领孟家宅；第 87 师第 261 旅按命令南渡蕴藻洪侧击日军，先后攻占北孙宅、陆家桥、西港、南孙宅，与占领孟家宅之第 61 师部队相连接；第 87 师第 259 旅加入庙行镇正面战线后，与第 88 师待两翼反突击部队进到日军侧背后，即实施反击。至此进攻庙行镇的日军全部陷入反突击部队的包围之中。

植田谦吉得知混成第 24 旅被围后，急令师预备队（步兵第 7 团）及吴淞支队一部救援。日军混成第 24 旅在救援部队配合下，仓皇突围逃窜，第 19 路军反突击部队与日军展开白刃近战，战斗之惨烈为开战以来所未见。经数小时激战，日军大部侥幸乘夜间突围逃窜，一部被包围歼灭于金穆宅、大小麦家宅一带。由于进攻庙行方向的日军遭到第 19 路军反突击的沉重打击，陷入危境，使日军全线进攻破产。第 9 师对江湾地区的攻击，在守军的英勇抗击和反击下，只得虎头蛇尾，草草收场。据日方资料，此次战斗日军伤亡 800 余人，第 19 路军（包括第 5 军）伤亡达 1000 余人。

22 日夜，守军恢复原态势。第 88 师因伤亡过大，于 23 日撤至庙行镇西南一带休整，其防务由第 61 师 3 个团和第 88 师独立旅 1 个团及第 87 师第 259 旅接替。

第 19 路军的反突击，是一次组织与实施都很成功的战役行动，是第 19 路军指挥果断，作战英勇，官兵团结奋战的结果。中外报纸都一致认为庙行之役是淞沪抗战中战绩的最高峰。

日军于 22 日惨败后，一面请调援军准备再次总攻，一面调整部署进行局部进攻。2 月 25 日，日军改用重点进攻突破一点的战术，以第 9 师主力在飞机、炮兵支援下，分 3 路同时向江湾、小场庙、庙行猛攻。在小场庙正面，日军进攻兵力约 1 万人，并以 50 余门火炮支援，10 时许，日军突破金家塘阵地。12 时许，守军增援部队分 3 路反击，一路由江湾镇向敌左翼反击，一路由庙行镇向敌右翼反击，另一路从小场庙向敌正面反击，形成包围之势。血战至晚，日军受创突围败退，守军恢复原阵地。是夜，第 19 路军总指挥部决心于当夜全线出击，以歼灭大沈宅附近地区日军第 9 师主力。忽然接蒋介石电令：“第二次决战之期，约在艳（29 日）东（1 日）各日，我军后方援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 1 卷，中华书局，1981 年版，第 154 页。

队，全已运来前线，其他非到鱼（6日）日不能参加战斗。务望于此数日内，尽量节省前线兵力，抽调部队厚集各地区预备队约在总兵力二分之一以上之数，方得应战裕如，不致临时竭蹶。”蒋光鼐接此电令后，遂令停止实施出击。

26日拂晓，守军为改善防御态势和收缩兵力，主动放弃突出的江湾阵地，退守金家塘至竹园墩之线。27日下午，日军进占江湾镇。

（四）日军登陆占领浏河，第19路军退守第二防线

2月22日，在中日双方激战，日方久攻不下的情况下，野村吉三郎向日军统帅部发出急电：“目前最要紧的是利用具有相当实力的陆军迅速结束战局。现在，战局处于胶着状态，迟延一天就有贻误大局的危险。上海郊外敌人抵抗还相当顽强，此时，切盼迅速增援重兵。”日本陆军中央部鉴于第9师在上海的失败，同时顾及国内、国际的反战压力，认为必须迅速“解决上海事件”。2月2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陆相荒木贞夫关于增兵上海的提案，决定再调2个师，以最快的方法“解决上海事件”。日本陆军中央部于是决定动员和编组上海派遣军。

24日，下令组成上海派遣军司令部，以前陆相白川义则上将为司令官，指挥第11师、第14师迅速驰援上海日军，并指挥前已派遣到上海的第9师所辖的部队。此时日本上海派遣军的序列如下：

上海派遣军	司令官	白川义则上将
第9师	师长	植田谦吉中将
步兵第6旅	旅长	前原宏行少将
步兵第18旅	旅长	小野幸吉少将
第11师	师长	厚东笃太郎中将
步兵第10旅	旅长	稻垣孝照少将
步兵第22旅	旅长	山田健三少将
第14师	师长	松木直亮中将
		（3月6日~10日到达）
步兵第27旅	旅长	平松英雄少将
步兵第28旅	旅长	平贺贞藏少将
混成第24旅	旅长	下元熊弥少将
独立山炮团、野战重炮兵2个营等		

以上总兵力约10万人。

白川义则和厚东笃太郎首先率领第11师先遣部队，于29日7时抵达上海长江口停泊。白川在听取了原已在上海的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的情况汇报后，于当日上午10时下达了作战命令，其要点是：第9师夺取张家桥、夏马湾一线，在策应第11师登陆的同时，准备好下一步攻击大场镇附近之敌；第11师主力在七丫口附近登陆，然后应尽快袭击占领浏河镇，并准备攻击大场镇、真如镇方面之敌；海军第3舰队及海军飞机配合陆军作战。白川的作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62页。

日本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满洲事变》，朝日新闻社，东京1962年版，第133~134页。

战企图是以第 9 师在庙行镇方面继续实施正面进攻，以派遣军的主力第 11 师在浏河方面登陆，迂回守军侧背，截断京沪铁路，瓦解中国守军的抵抗。

在多次增兵以后，白川统率下的上海日军已达 7 万余人，飞机约 150 架（另有海军飞机 160 架）和海军第 1、第 3 舰队。此时，中国第 19 路军（包括第 5 军）总兵力只有 4 万余人，并已相对减弱，右翼军损失约 1/3，左翼军损失约 1/4，防守线绵延 50 余公里，武器损耗极大，仅正面防守就感兵力薄弱，而浏河地区为守军防御阵地的左侧后，对整个防御安危关系极大，日军如果在这里占领桥头堡，则左翼的中国军队，将会陷于腹背受敌的危险态势之下。守军亦曾拟增兵防守，但因兵力不足，迭次急电求援，蒋介石仅令“固守”、“加强戒备”，却迟迟不发兵增援。在这种情况下，第 19 路军无法兼顾正面与侧翼，只能集中兵力防守正面战线的真如至杨家行地段，以阻止日军从江湾方面的突破，对浏河方面，在七丫口、杨林口、浏河及小川沙一带约 20 公里的沿江防线，仅有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1 个连及少数义勇军担任警戒。

日军为掩护其主力第 11 师在浏河方面登陆，在庙行镇方面实施猛烈进攻，以便紧紧拖住第 19 路军主力，使其难以向第 11 师登陆方面转移。同时为了迷惑对方的注意力，又在多处实施佯攻，特别是在闸北八字桥、天通庵路等地展开频繁进攻。在天通庵路附近，双方激战持续达 8 小时之久，第 60 师不断派敢死队跃出战壕，短兵相接，迫使日军退向狄思威路。其他各处战斗，也甚为剧烈。闸北八字桥形成拉锯战，守军阵地三失三得，伤亡很大，日军伤亡也极为惨重，遗尸累累，团长林岷上校被击毙。

3 月 1 日 6 时 30 分，日军对淤沪地区发起全线攻击。日军首先以飞机、炮兵连续轰击守军阵地，时间持续 3 个半小时，然后步兵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发起攻击。第 9 师、混成第 24 旅和海军陆战队向庙行、江湾以西、闸北八字桥一线进行猛攻，同时以舰炮袭击狮子林、杨林口、七丫口等处。7 时许，又出动飞机轰炸大场镇。守军在优势日军总攻之下，虽阵地多次被日军突破，但仍顽强与敌反复争夺。日军第 9 师左翼队于午前攻至广东义地、麦王宅、陆家宅一线；至 14 时，又进占谈家宅、岭南桥和杨家楼东侧一线。其右翼队发起攻击后，遭到守军的严重杀伤，但至下午也先后占领竹园墩及广东义地两侧端地区，并进入周家宅、四车头一线，其中央队占领了二十三园北部，混成第 24 旅占领了戴家宅，并进入张家桥、朱家桥西端一线。

正当第 19 路军和第 5 军与日军胶着在整个正页战线顽强奋战之时，日军第 11 师从 3 月 1 日 6 时开始，分别从七丫口、杨林口和六浜口登陆。警戒浏河地区的中央军校教导总队 1 个连及少数义勇军，在登陆日军强大炮火和步兵攻击下，仍然以寡敌众，顽强抵抗。第 19 路军总部急调第 87 师第 261 旅驰援，但因缺乏运输工具，加之沿途遭日机轰炸，直至 18 时，才有 1 个团赶到浏河，但此时浏河已沦入敌手，日军正向嘉定方向急进。

浏河危急之时，第 19 路军无机动力可以增援，曾请求军政部速派两师兵力驰援浏河，但军政部署置之不理。浏河失陷。使守军侧面及后方均遭严重威胁，不得已于 3 月 1 日晚全军退守第二道防线（即黄渡、方泰、嘉定、太仓之线）。

第 19 路军的撤退是主动的有计划的行动，是向新防御地线的转移，始终保持着战斗的韧性。正如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所说：“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这次撤退并不是溃败。……和我谈过话的外国军事观察家全部称赞蔡将

军指挥这一有秩序的战略撤退很能干，在战术上也很正确。在所有能移动的大炮都撤走以后，部队才撤出前线。几乎没有发生抢劫和混乱。撤退进行得这样安静，掩护得这样巧妙，闸北的日本海军到天亮才发现敌人已经离开，他们整夜炮轰的已是空的战壕和工事。”

3月2日，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的电文：

“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斗，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人粹增援兵两师，而我以运输艰难，后援不继，自2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死伤，以致倾全力于正面战线。而日人以一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抽调，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至第二防线，从事抵御。本军决本弹尽卒尽之旨，不与暴日共戴一天。”

日军发现中国军队全线撤退后，于3月2日占领了闸北、大场、真如，3日进抵南翔。此时，白川根据3月1日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发出的“上海派遣军在给敌主力以重大打击后，应立即发表必要的声明，并将主力部队暂时撤回按照我方要求中国军队必须澈退的苏州河以北地区以内集结”的指示，同时根据国联将于3月3日在日内瓦召开大会的情况，为在国联开会前停止作战，乃令日军停止迫击，并于3月3日发表停战声明：“只要中国军队不采取敌对行动，我军将暂时原地不动，停止战斗行动。”3月3日，国联开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至此，淞沪战事乃告结束。

在日本发动的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不完全统计，中国第19路军与第5军的官兵牺牲4270余人，负伤约9830余人。市民被日军飞机大炮狂轰滥炸死亡6080余人，伤2000余人，失踪10400人，共计损失了16亿元的财产。

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战争一开始，日军就出动飞机，有目的地对上海商务印书馆、东方图书馆等文化部门进行滥炸，使中国最大的、历史最悠久的出版机构商务印书馆全部被烧毁。东方图书馆所收藏的数百万卷书籍资料，包括“涵芬楼”所藏的10多万册宋版、元版的珍贵古籍图书和清乾隆年间缮写的四库全书，先被炸毁焚烧，后又被日军劫掠，据当时新闻报道，日军以卡车抢运烧剩的书籍达7天之久。

在侵略上海的战争中，据日方资料：日军陆军战死620名，负伤1622名；海军战死149名，负伤700名。另外，4月29日为日本的“天长节”，上海日本军事当局为给日本天皇祝寿并显示军威，在上海虹口公园举行阅兵式，日本驻上海军政要员全部参加。朝鲜独立党党员尹奉吉向主席台投掷炸弹，日本上海派遣军司令官白川义则上将、第3舰队司令官野村吉三郎中将、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驻华公使重光葵、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被炸成

《斯诺在中国》，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45~46页。

《蒋光鼐将军》，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146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5~176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81页。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一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5、638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一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76页。

重伤，其中白川义则于5月26日死于医院。

四、全国各界对第19路军抗战的支援

淞沪抗战历时33天，中国第19路军之所以能以劣势装备，抵御住优势装备的日本陆海军的联合进攻，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这是与全国各界的积极支援分不开的。

（一）中国共产党和上海人民的支援

还在事变发生的前夕，中共中央即发出紧急通知和告全国民众书，指出“日本帝国主义者派遣大批的军队来上海，进行着各种挑衅，准备着血的屠杀劳苦群众，镇压革命运动，占领上海”。“我们现在是处在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号召工人和一切民众“自动武装起来，成立义勇军，组织纠查队”，“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淞沪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地下组织，通过工会、学生会和上海各界抗日团体，展开了支援第19路军抗战和直接参加抗战的工作。他们动员各界人民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情报队、救护队、担架队、通信队、运输队等，积极参加和支援前线作战，全国人民、海外爱国侨胞，也从各方面支援淞沪抗战。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上海人民特别是工人和青年学生，立即掀起参加义勇军的热潮。在事变发生后的二三天内，就有数千人登记参加义勇军。有的青年咬破手指写下血书，表示抗日的决心。他们参加义勇军后，有一部分就立刻调到前线去，配合第19路军作战，有的抢送伤员，递送情报，运送弹药物资。其中工人义勇军表现尤为英勇，他们甚至利用菜刀、斧头参加作战。工人组成的地雷队，在前线埋设大量地雷，杀伤不少日军，给敌人以很大威胁。沪东工人组织了一支约300余人的义勇军，在江湾附近协助第19路军阻击日军100余人的进攻，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上海学生组织的义勇军，积极参加了前线的作战和其他战勤工作，表现也十分勇敢。复旦大学学生组织的义勇军，在天通庵路的一次战斗中，曾经有200余人壮烈牺牲。

广大商人、市民组成的义勇军，在支援前线作战中也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上海商会会长王晓籁于2月5日到真如第19路军总指挥部，带去200余名童子军，交由第19路军指挥。这些童子军在作战期间，始终和部队在一起坚持工作，直到5月28日第19路军在苏州举行追悼会后，才解散回沪复学，其中多人在前线牺牲。东北冯庸大学和华北各大学的几百名学生，以及苏北人民组织的大刀队，均以杀敌报国之心，要求将牺牲和负伤战士的武器交与他们到前线杀敌，以后被分配在长江南岸守备和到青阳港第二线构筑防御工事。

义勇军是一支坚强的、有觉悟的人民武装，在数量上亦相当可观。据不完全统计，仅在第19路军中参加战勤工作的义勇军，就有2万余人，约占当时上海守军总兵力的一半。

上海人民除组织义勇军直接参加前线的工作以外，还积极参加支援前线的各种工作。兵工厂工人日夜赶制军火，供应前线。前线作战部队需要大量

的手榴弹，当第 19 路军请求国民党政府军政部调拨遭拒绝后，上海总工会动员募集了数万只空烟罐，赶制成“土炸弹”，运送前线使用。2 月初，日军进攻吴淞要塞，以飞机和舰艇轮番轰击，守军受到严重威胁，上海工人及时送来五六百块大钢板，供部队构筑掩蔽部，减少了伤亡。凡前线迫切需要的交通工具、通讯器材、建筑物资、医药用品等，均通过各种社会组织募集和供应。

上海的妇女也积极参加支援抗日的斗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妇女反日救国大同盟”，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在各区成立了 6 个分盟，积极领导支援前线的工作，广泛进行抗日宣传。闸北分盟的妇女和丝厂女工，勇敢地在枪林弹雨中，爬到前线，抬回受伤的士兵。女青年会和女工夜校的妇女们，不顾疲劳，日夜为前线部队赶制军服，有的 3 昼夜不曾睡眠。

遭受战祸的难民们，更是积极支援抗战。青壮年纷纷参加义勇军，或到前线参加作战，或在后方参加战勤工作，其他难民也踊跃为部队送水送饭。市郊农民都积极行动起来，帮助第 19 路军挖战壕、筑工事、侦察敌情，有的加入义勇军到前线参加作战。吴淞、真如等地的农民，筹集大批米面、蔬菜、鸡蛋等，慰劳前线部队。前线战士每天两顿伙食，也都由郊区人民分区炊制和运送。

与此同时，上海人民还开展了轰轰烈烈的罢工、罢市的反日斗争和宣传抗日救亡的运动。事变发生后的第二天，上海总工会下令总罢工，除水电、交通工人外，其他工人都参加了总罢工。在小沙渡、杨树浦等工人集中的地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和示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上海 54 家日本工厂的六七万中国工人在举行罢工后，全体自动退出工厂。沪西区的十几家日本工厂的中国工人，成立了沪西反日罢工委员会，组织武装纠察队，封锁日厂，检查日货，监视奸商，禁止把粮食等物资卖给日商和日本侵略军。沪东码头工人拒绝为日军卸运军火，驳船工人拒绝为日军运送军需，电讯和铁路工人破坏日军通讯联络和交通运输。耶松、瑞镕船厂工人坚决不修理日船，在日本商店、机关作事的中国店员、佣人，也纷纷告退。上海的商人积极进行罢市和募捐，要求国民党政府派兵增援第 19 路军作战。

上海市广大人民在 1 个多月的战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们积极支援抗战，利用各种方式进行对敌斗争，在斗争中涌现出许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汽车司机胡阿毛，被日军抓去，诱以重金，勒令他运送军火，但他“道经黄浦口，乃拨机横驭，望波直驰，烟沉浪飞，人车俱音，胡亦殉之。”人们从英雄事迹中受到激励，坚信“神州不死”。

（二）各界同胞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各界同胞也积极支援第 19 路军抗战。全国各地除积极声援外，爱国群众还组织义勇军，赶赴上海参战。各地运送大批物资到上海，支援抗战。广大群众写信、发电报、寄钱和衣物、食品等慰劳第 19 路军。

淞沪抗战得到了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上层爱国人士的热情支持。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进攻和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政策，引起

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促使国民党内部分裂。国民党左派和上层爱国人士不满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坚决主张对日抗战，积极支援全国爱国救亡运动。

淞沪抗战爆发后，上海军民捷报频传，冯玉祥称赞第19路军的将士们“抗日之先锋队也！”他大声疾呼：“政府应当尽量接济，并赶快派遣军队前往应战，以增强我方之战斗力，而予骄妄之敌以当头棒喝。”他迭次向蒋、汪陈述支援第19路军的意见，并联合主张抗日的国民党上层人士提出“请政府增兵案”，与李济深等为淞沪抗战问题致电国民党留沪中央执行委员：“请以最大之决心，共谋长期之抵抗。”他极力向各方呼吁，希望在军事、财力及道义上予以大力支援，以保证淞沪抗战能坚持下去，由此而打开中国抗战的新局面。他还恳切表示：“我虽有病，亦愿抬椽前方，指挥作战，遂我抗敌救国之志，以抒此心中不平之气也。”但是他的愿望未能实现。

宋庆龄、何香凝深为第19路军捍土卫国的爱国精神所感动，在战火纷飞中，亲临前线慰劳抗日将士。1月30日上午，她们同赴真如第19路军前线指挥部慰问。宋庆龄在炮声隆隆的阵地上对抗日健儿发表讲话：“你们抗战的枪声一打响，海内海外，男女老幼，都觉得出了一口气！亿万同胞声援你们，支持你们！”她在与蔡廷锴亲切交谈时，一再勉励第19路军将士奋勇杀敌。2月12日，宋庆龄赶到战斗甚为激烈的吴淞前线，向战士们致意。她鼓励翁照垣旅长：“守吴淞之功极伟，而尤望继续奋斗，不使中国有一寸土地入于敌人之手。”翁旅长当即代表所部官兵表示：决“以卫土之责，……使敌人无越雷池一步之机会。”在 frontline 巡视中，宋庆龄还手捧一枚炮弹，在战区的断垣残壁前留影，以表示她与第19路军一道抗战到底的决心。这一照片载入中华民族反击侵略者的光荣史册。

早在“九·一八”事变时，何香凝就对国民党政府的绝对不抵抗，深感耻辱和沉痛，遂取出自己的裙子，并写诗一首，一起送给蒋介石。诗称：

“在自称男儿，甘受敌人气，
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
吾济妇女们，愿往沙场死，
将我中帼裳，换你征衣去。”

淞沪抗战爆发后，何香凝在一次亲临前线慰问中，适逢大雪，看到广大官兵却只穿单、夹衣各一套，立即回沪发动捐制棉衣运动，5天之内就赶制全新棉服3万多套，运往前线，供将士们御寒。

宋庆龄、何香凝亲临前线，目睹抗日部队缺医少药，伤员得不到护理的境况，遂共同筹划，由杨佛杏等竭力相助，创办了“国民伤兵医院”，“为救护治疗此次为中国苦战之伤兵，并予以精神上之安慰与鼓励。”宋庆龄还缙衣缙裙，罩着白色护士服，亲自为伤员服务。

宋庆龄《在国民伤兵医院答记者访问》中说道：“对于抗日战争，当然

《冯玉祥日记》1932年1月29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13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蒋洪斌：《宋庆龄》，江苏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1页。

李华明等：《“一·二八”事变前后的宋庆龄》，上海《社会科学》1981年第4期。

宋庆龄、廖梦醒怀念何香凝文章，《回忆与怀念》，北京出版社，1982年版，第70、110页。

曾任孙中山的秘书，1932年参与筹备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任总干事。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

主张积极抵抗到底。”“人类惟有从奋斗中求生存”。她指出：日本侵略军叫嚷48小时消灭第19路军，“今十九路军于苦战一月以后，犹能继续抵抗，中国不特未因抵抗而亡，反因抵抗而益坚国民牺牲奋斗之志。”并以此批评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谓：“今之自命聪明不顾民意者，每以强弱成败，自文其不抵抗之过，不知惟真绝顶聪明之人，乃能从死中求生，险里求安。”

宋庆龄、何香凝等以投身于火热的抗日斗争，为挽救民族危亡呕心沥血的实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战斗勇气和胜利信心。

（三）海外华侨的支援

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爱国华侨也积极行动起来，从各方面全力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广大侨胞对第19路军英勇抗战，莫不热血沸腾，备受鼓舞。载着“遥听捷音，欣慰莫名”，“请坚持到底”、“决不后退”、“誓为后盾”的电报，从世界各地如雪片般飞回祖国。

越南堤岸市华侨报《群报》用特大号标题《蔡廷锴大胜日军》发出号外，并在报社门前燃放鞭炮，以示庆贺。侨胞们闻信，奔走相告，一时整个堤岸市鞭炮轰鸣，群情振奋。美国旧金山、芝加哥等地的“唐人街上之灯龙，竟作大踏步之舞，而中国锣鼓声、呼喊声，震耳欲聋。”菲律宾华侨致电蔡廷锴，盛赞第19路军“杀敌致果，震动全球，淞沪之战，开民国以来未有之光荣。”美洲一位侨领称第19路军“在淞沪抗日，血战月余，其一种为国家民族奋斗之精神，确为我全国同胞所敬仰。”美洲华侨为表彰第19路军，特赠送蔡廷锴一块金匾，上面题刻“精神救国”四个大字。中国致公党“即尽力勉励侨胞，捐款输将，并鼓励沪上党员投身行武，所贯彻捍卫国土保护主权之本旨。”

海外侨胞不但在精神上鼓励第19路军，而且从资金和物力上支援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海外侨胞立即采取各种形式，积极进行募捐，支援祖国抗日。淞沪抗战爆发后的第4天（即2月2日），第19路军便收到了第一笔华侨捐款，足见侨胞报国之心切，爱国之情深。在马来亚新加坡，华侨组织救济上海伤兵难民筹賑委员会，设立宣传股、演讲队、劝募队等，积极筹募，不及两月，募集款项即达100万元，后因淞沪停战协定签订，乃将捐款半数汇往上海賑济战区难民，半数则汇往东北接济抗日义勇军。在美国芝加哥，著名艺术舞蹈明星刘科伦女士在抗日会义务表演，筹款数千元汇助第19路军。旧金山等地华侨举行游艺募捐大会，男子每人捐助薪资一月。马尼拉中学的华侨学生，节省零用，日蓄一仙，汇寄上海慰劳第19路军。国民党元老黄兴之女黄澄华，出售自己的首饰，所得之资，全部捐献给祖国抗日之用，并表示：“倘外侮日亟，余将回国服务，虽死不辞。”华侨捐款不仅速度快，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4页。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1966年版，第55页。

《申报》1932年2月6日。

《中国致公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致公党》，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9页。

沈立新：《海外华侨与淞沪抗战》，《学术月刊》1985年第9期。

而且数额巨大。美国旧金山华商周崧及其中兴公司职工共捐 12 万元。2 月 16 日，旧金山华侨开展援助第 19 路军大募捐，当天就筹得美金 25 万元。到 20 日，据旧金山广东银行经理公布，该地华侨已电汇美金 100 万元捐助第 19 路军。以李清泉为主席的菲律宾华侨国难后援会，在 2 月份先后两批汇回华侨捐款 10 万元和 15 万元。李清泉还倡议：“各商家永久抽捐，店员按月抽薪十分之一”支援祖国抗日。据统计，菲律宾华侨在淞沪抗战期间共捐款 250 万元。

爱国侨领和知名人士不仅捐献巨款，而且还利用其地位和影响，积极动员和组织广大侨胞开展抗日捐献活动。陈嘉庚向华侨筹募巨款汇往上海，支援第 19 路军抗战。新加坡的另一位巨商林义顺，“一·二八”战事发生时，适在上海养病，翌日他一连向新加坡发出 10 份电报，呼吁华侨奋起救国。胡文虎不待救援会成立，就电汇 1 万元交上海申报馆转交第 19 路军，作为救护伤员之用。2 月下旬又汇去 1 万元。时值何香凝正在上海组织救护队，因经费困难，特致函胡文虎请求援助，他又汇去 1 万元与大量药品。后来蔡廷锴题词：“永安堂主人胡文虎君，热心救国，仁术济人……本军在沪抗日，胡君援助最力，急难同仇，令人感奋”。

据第 19 路军司令部统计，仅捐款一项，在该军总收捐款 1068 万元中，即有 3/4 为华侨捐款。

同时，侨胞还捐献大量军用物资，运往上海。旧金山女侨胞组织针织团体赶织绒衣，寄赠第 19 路军将士。美国、加拿大等国侨胞，购买了大量钢盔，运回国内赠送第 19 路军。第 19 路军缺乏飞机和汽车，菲律宾华侨就捐购了 15 架飞机，马尼拉粤侨出入口帮工界联合会和马尼拉粤侨工商联合会捐赠了两辆载重汽车。

华侨积极支援淞沪抗战，还表现在踊跃归国参战。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纷纷汇集至中国驻日公使馆，要求回国，公使馆“办公至深夜，极为忙碌。”仅 2 月 7 日，就有约 200 名留学生搭乘由横滨出航的法国轮船回国。在新加坡，同德书报社开设救伤训练班，培育救护人员回国服务，受训者达 200 余人；另有西医数人，亦自愿回国服务。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 50 名中国留学生，于 2 月 4 日急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准其离校回国从戎”。淞沪抗战爆发不久，一支由约 200 名华侨组成的抗日救国义勇军就迅速开赴上海，编为华侨义勇军第一总队，吴越任总队长。2 月 1 日，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

“国难发生，迄今四月，国联失其效用，公约等于废纸。强寇得寸进尺，鲸吞蚕食，祸不转瞬。我数千年伟大之民族，行将沦于异族而不复矣。言念及此，惨痛何极。……今者日人进逼沪读，京沪道上，满布杀机，神京震动，国已不国，捐躯报国，正此其时。越等九死余生，何所眷恋，终朝饮位，但痛祖国之沦亡耳。爱誓续前盟，共赴国难。勒马悬崖，挽狂澜于既倒；挥戈盘箭，挑落日于黄昏。小不丧军人之人格，大不失中华之尺土，有死而已，他无所愿。惟奋臂当车，实深望海内外侨胞之助。”

华侨义勇军在淞沪抗战中建立了卓越的战绩。据载，“华侨义勇军与上

《申报》1932 年 2 月 26 日。

《南洋情报》第 1 卷第 6 期。

《申报》1932 年 2 月 6 日。

《申报》1932 年 2 月 2 日。

海市民义勇军，是各种义勇军之成绩最佳、最勇敢、最有功勋者。尤其是华侨义勇军，在火线上共同作战，在后方不断的挖掘战壕，所受的苦痛亦最多……”许多华侨志士在淞沪抗战中奋勇杀敌，以身殉国。归侨飞行员、军政部航空第6队副队长黄毓荃，在淞沪抗战的空战中，英勇善战，先后击落日机多架，立下赫赫战功。在2月5日的空战中，不幸遭数架日机的围攻，壮烈牺牲，时年28岁。这是中国空军抵御外侮英勇献身的第一人。黄毓荃把自己的满腔热血撒在祖国的碧空蓝天，其英名永垂青史。

淞沪抗战期间，各地华侨还积极进行“国民外交”活动，赢得了各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正义之战的同情和各方面的支持。在旧金山，“有多数美飞行家及机关枪枪手，愿来中国服役”。菲律宾总督摩菲氏的大弟，曾以私人身分组织航空队，准备到中自协助作战，登报数日，报名飞行员已达50名，后因上海停战，始作罢论。蔡廷锴还接到美国人士愿为中国服务的函件数百封。

海外侨胞支持和援助第19路军抗战，在淞沪抗战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

《华声报》1985年9月15日。

《大公报》1932年2月27日。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国民党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在内外夹攻的情况下辞职下野后，仍操纵着军政大权，以退为进，伺机出山。

12月22~29日，国民党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政府，由林森担任国民党政府主席，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同时推选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国民党政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常委。

孙科上任后，国民党内部仍一片混乱。广州的国民政府虽然宣布取消，但又成立了西南政务委员会和西南执行部，仍与南京政府处于对立地位。蒋、汪、胡三巨头表面上是“团结”起来了，但实际上各怀鬼胎。加上财政危机的威胁，以及棘手的对日外交，孙科在蒋介石设置的陷阱中，难以支撑，乃于1932年1月9日赶赴上海，吁请汪精卫及蒋介石、胡汉民入京主持一切。1932年1月21日，汪、蒋相继返回南京。

24日，孙科宣布辞职，蒋、汪以中來政治会议常委，主持国务。

28日，中央政治会议推举汪精卫为行政院长。是夜，“一·二八”事变爆发。

29日，中央政治会议任命蒋介石等为军事委员，3月6日，任命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18日，蒋介石

就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总揽军事大权。至此，蒋、汪“合作政府”乃告形成，汪精卫主持政务，应付对日外交；蒋介石主持军事，负责全力“剿共”。

蒋、汪执政后，极力反对对日绝交。1月23日，国民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绝口不谈如何对抗日本的侵略，却继续攻击孙科政府主张对日“积极抵抗”及“和平绝交”的政策。对此，原外交部长陈友仁于25日在上海说：“余敢正告国人，蒋氏此种消极政策，如更进一步，难保其不接受日人之要求。”后来的事实发展果如所言。

1月28日晚，日军按预定计划，在上海点燃战火，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全国人民为之振奋，坚决要求政府领导抗日。1月30日，国民政府宣布迁都洛阳。1月31日，汪精卫在开封联欢社作报告，他说：“我们并不主张对日绝交，因为日本对我所用手段已经超过绝交，超过宣战，已是不断的进攻与占领了。仅对日绝交，是不能发生何等作用的。不主张对日宣战，因为此次日本对我虽无宣战之名，而有宣战之实，这种事实，是破坏万国联盟公约……中国此时应联合签约各国，以制裁日本，用不着宣战的。”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铁道部官邸正式发表“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主张，他说：“以土广民众之中国，对富国强兵之日本，纵使有一二城镇，不幸而落彼手中，而中国之内，人人皆抵抗，处处皆抵抗，日本虽有二三百万精兵，亦不能遍布也。”“至于外交方面，中国此次有十分理由，可要求国际联盟华盛顿九国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签字各国出而干涉，中国既

《国闻周报》第9卷第6期，1932年2月1日。

《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有此理由，在外交上决不可放弃。”

4月10日，汪精卫在国难会议大会补充报告中说：“政府对于外交，决在一最低限度下办理，在最低限度以上，则纵国人不谅，但求问心无愧，亦当办理，否则无论如何，决不为暴力屈服。因政府如签丧权辱国条约而亡国，不如不签而亡较有复兴之可能，故政府于此，亦可和亦可战，即能在最低限度以上可解决，即可和，否则即可战。”

对于“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汪精卫具体解释说：“现在国民政府并没有签定丧权辱国的条约，所以同时并行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抵抗，外交上交涉，冀不失领土，不丧主权。在最低限度以下时，我们决不让步，在最低限度以上时，亦不固作强硬。这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最低限度以上，我们忍受，即是交涉；最低限度以下，我们拒绝，即是抵抗。”

在这里，汪精卫反复强调了以“最低限度”为分界线的两面政策，表明国民党政府已决心接受一种不平等条约，但这种不平等条约的最低限度如何，并没有严格的规定。这就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付诸行动时，提供了极大的伸缩性。

在“一面抵抗”时，汪精卫说：“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汪精卫在这寥寥数语中，即道出中国不具备起码的抵抗条件，不能抵抗的原因和他的“一面抵抗”的根据。因此，“政府为避免战祸计，已不恤一再迁就日本之要求，始则对于民众抗日之言论行动稍涉激烈者，均予禁止，继再晓谕各种民众团体活动，取消抗日名义，以杜强邻之借口。”十分明显，汪精卫极力主张对日退让，他的所谓“抵抗”，是十分有限的，其目的只是想先“抵抗”一阵子，尔后同“强敌”订约，这样既可应付全国舆论，又可避免违背“攘外必先安内”之政策。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对日方针的实质，只不过是把国民党政府一直推行的妥协依赖外交变换一种说法而已。

此时，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提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对国联与九国公约国先与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悉其最大限度。”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防线与最大限度，此限度至少不要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也。如果超此限度，退让至不能忍受之防线时，即与之决战，虽至战败而亡，亦所不借。必具此决心与精神，而后方可言交涉。”

由此可见，蒋介石也只是主张通过一定的抵抗，实现与日本的“交涉”，达最终与日妥协结束淞沪战争之目的，与汪精卫“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实质上是一致的。因此，第19路军奋起抵抗后，国民党政府对淞沪抗战采取了两面政策，一方面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及应付全国舆论，采取了一

《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国闻周报》第9卷第15期，1932年4月18日。

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3年版，第229页。

《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国府宣言》1932年1月30日，《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1页。

些表示抵抗的措施；另一方面为谋求对日妥协，实现与日本的交涉，尽快结束淞沪战争，又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暗中阻挠和破坏淞沪抗战。

国民党政府采取的“抵抗”措施有：

第一、迁都洛阳。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和中央党部决定将首都临时迁往河南省的古都洛阳。同日，国民党政府主席林森和行政院长汪精卫联合发表《国民政府移驻洛阳办公宣言》，谓：“兹者政府为完全自由行使职权，不受暴力胁迫起见，已决定移驻洛阳办公……”同时表示要“督励军警，从事自卫，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军政部长何应钦留京负京沪治安之责，外交部长罗文干负外交之责。不久，国民党中央又决定外交由汪精卫负全责，军事由军事委员会负全责。

第二、组织军事委员会。1月29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组织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冯玉祥、张学良、阎锡山、李宗仁等为委员，主持对日军事。

第三、制定“全国防卫计划”。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长期性、全国性”的“抗日作战计划”，经过连续两天的会议，决定了划分为4个防卫区和1个预备区的“全国防卫计划”。

第四、组调第5军增援淞沪抗战。淞沪抗战爆发后，淞沪警备司令戴戡电呈国民党中央：“除督率所部誓死抵抗外，敬祈迅赐电调京沪、沪杭两路友军来沪增援。”社会各界和全国人民，也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调兵增援上海。在此形势下，蒋介石指令军政部调集京沪、沪杭两路的第87、第88师及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导总队合编为第5军，任命张治中为第5军军长兼第87师师长，统率所部赴沪“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

第五、为应付全国要求抗日的舆论，国民党在四届二中全会的施政报告中提出：“切实施行军事委员会所定全国防卫计划”，“全国军队，应以国防为主目的，剿匪为副目的，同时并当积极改进，务适于国防之用。”

综上所述，说明国民党政府处理“一·二八”事变比处理“九·一八”事变前进了一步。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日军侵略上海，损害了蒋介石集团的利益。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和金融中心，也是蒋介石集团统治的要害地区，日军进攻上海，不仅使蒋介石集团经济利益受到极大损害，而且也威胁到“首都及长江上下游各重要市镇”的安全，日蒋矛盾加深。

（二）为全国抗战呼声所迫。淞沪抗战爆发后，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迅速高涨，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给第19路军抗战以积极的支援，国民党左派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力主抗日并热情支持第19路军抗战，而且国民党一些右派人物也主张抵抗。为缓和国内矛盾，应付国内舆论，争取国际同情，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作出一些抵抗的姿态，采取了一些具体措施。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并无抗战的决心，高喊所谓“抵抗”，也多是停留在口头上，很少见之于实际行动；有的则是见之于计划和

《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1932年2月22日。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540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58页。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153页。

文书，摆摆样子，然后束之高阁。如蒋介石主持制定的“全国防卫计划”，就未能发挥任何作用，仅仅是一纸空文。

蒋、汪和国民党政府在高喊“抵抗”的同时，却念念不忘与日本的“交涉”，为了实现这一“交涉”，甚至不惜以釜底抽薪的手段，来破坏第19路军抗战。

第19路军孤军奋战，请求增援。国民党军中一些爱国将领，纷纷请缨支援第19路军抗战。对此，国民党政府除派张治中率第5军赴沪参战外，其余一概置之不理。军政部更是通令各部队：“第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须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非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有些名义上是派出的支援部队，但强调种种困难，根本不令其开赴前线。2月7日，冯玉祥向何应钦询问派援军的情况，何答：“（一）熊（式辉）来电，江西军队不能调；（二）梁（梁冠英，该部驻长江北岸江都一带）的军队也不能调；（三）南京的军队作留守用的，亦不能调赴前线……”

即使是第5军，原先也是不准备调其增援的。当第261旅旅长宋希濂于1月30日面见何应钦，请求开往上海参战时，何声色俱厉他说：“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叫他们撤离上海他们不撤，反而同日军打起来了，破坏中央的整个政策（按：即对外妥协、对内用兵、对人民压迫的政策），弄得很难处理，你们还来要求开往上海参战吗？这是不行的。”但以后还是派出了第5军，其原因除了为了遮国人耳目外，蒋介石也想以该部牵制第19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

国民党政府不但不调兵增援，反而下令不准海军、空军配合第19路军作战，密令海军：

“准日海军司令来函，‘此次行动，并非交战，如中国海军不攻击日舰，日舰亦不攻击中国军舰，以维友谊’等情，凡我舰队，应守镇静。”因此，日军运输舰搁浅于白龙港3日之久，中国海军不去轰击，以“维持友谊”。当十九路军与日军血战时，海军部次长李世甲竟与日军司令野村，同坐汽车参观各处战壕，万目睽睽，毫无忌惮。2月5日，何应钦以特急电令蒋光鼐、蔡廷锴，原配属第19路军之航空队，“除对日机加以抵抗外，即对日海军决不抛掷炸弹！”2月12日，何应钦又严令第19路军：“如日兵舰或军队未向我攻击时，不许发弹射击，避免南市糜烂为要。”这样，长江口和黄浦江内的日本海军舰只即可任意行动，日机可在战地自由飞翔，以支援其地面陆军作战。

第19路军在淞沪前线孤军苦战，为国家为民族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和沉重的消耗，他们理应得到政府优先的财力物力支助和武器弹药、军需物资的供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冯玉祥日记》1932年2月7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94页。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0页。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何应钦致吴铁城、蒋光鼐、蔡廷锴密电，1932年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机关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29册。

应补充。然而实际情况恰恰相反，最有发言权的蒋光鼐、蔡廷锴、戴戟说：

“国民政府借口国难严重税收减少而停止发饷（实际上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从未欠发），截至一九三二年五月底，军政部欠发第十九路军的军饷达八个月六百余万元之巨。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外同胞捐给第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七百余万元之数（当时第十九路军曾编印《征信录》一种分发海内外捐献者）。我军向军政部请领欠饷时，军政部竟说捐款应归公有，欠饷应在捐款中扣除，所余之数应上缴。”

第19路军淞沪对日抗战，苦战月余，最终被迫撤退，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国民党政府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和对日妥协、不抵抗政策所致。当时，全国有200余万军队，但“可调之兵”大部分被蒋介石用来打内战了，以致造成京畿地区抵御外侮的防务单薄。淞沪战争爆发后，蒋、汪国民党政府不肯调派正在“剿共”的嫡系精锐部队支援上海。对此，国民党军参谋次长黄慕松曾解释说，蒋介石的决策是：“沪战在外交上应视为局部问题，不能扩大；在军事上‘剿赤’部队不能调用。”在整个淞沪抗战期间，除第5军抵沪英勇参加作战外，再无其他援军抵沪参战，国民党政府任凭第19路军孤军苦战，而不给予应有的增援、接济和补充，坐视其损耗、削弱，最后被迫撤退。震惊中外的淞沪抗战终被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及对日妥协政策所断送。

二、《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

“一·二八”事变发生以后，国民党政府虽然口头上宣布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政策，但实际上主要是谋求对日妥协，因此，在军事上阻挠和破坏第19路军抗战的同时，在外交上采取依赖国联和英、美、法各国的调停。

1月29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发表《对淞沪事变宣言》，指出日军进攻上海，“显系再行违背国际公约、凯洛格非战公约、九国条约以及国际决议案之暴举。”“应请以上签约国家采取有效行动，履行其条约上神圣之义务……”30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国联及九国公约签字国驻华公使照会，再次指出日本侵略上海，“实属违反国际公法、凯洛格非战公约及国联盟约，并蔑视国联行政院迭次决议，而对于华盛顿九国公约，尤属直接侵犯。”“日本违反华府会议九国公约，危害中国主权与独立暨领土与行政之完整，贵国政府为该公约之首创者，（签约国）相应紧急照请贵公使，迅电贵国政府，本其在该公约上之神圣责任，速采有效之手段，严正制止日本在中国领土内之一切军事行动，以及违反该公约之一切其他行为，俾该公约之尊严与远东之和平均得维持。”同时，外交部还电令中国驻国联代表颜惠庆向国联行政院提出紧急通牒，敦促国联实行盟约第10条暨第15条，对日予以切实制裁。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迭与各国驻京公使接洽，并电邀英、美诸使到南京会商解决中日事件。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123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0年版，第47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3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434页。

帝国主义列强在上海有着重大的经济利益，英国在华投资约 80%，法国的约 90%，意大利的约 70%，美国的约 60% 以上都在上海。日军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各帝国主义的利益，自然引起了西方列强的不安和反对。它们为了维护自身的权益，对日本在上海的扩张行动，都迅速作出了反应。1 月 31 日，英国派两艘巡洋舰赴上海。同日，美国也调巡洋舰和运载步兵的运输船各一艘去上海，以表示它们对上海问题的关切。

淞沪战争爆发后的第 2 天，驻上海的英、美领事即出面调停。1 月 31 日，英、美领事提议：日军退入租界，华军由现驻防地退出 2000 米，由中立国家军队移入缓冲地区代为巡逻。英、美领事，不区别侵略者和被侵略者，并宽容地让侵略者仅退入租界。实际上当时日军被中国守军反击后，已退至北四川路以东和靶子路以南租界附近。而对正义自卫的反侵略者，却苛刻地要他们从现驻地后撤两公里。这无异于助纣为虐，为侵略者张目。然而，日本侵略者并不因此而满足，2 月 2 日，日方通告对英美提议不能接受。

2 月 2 日，英、美、法、意、德五国先后照会中、日两国：“案奉本国政府电训，转致贵国政府关于列国提议停止冲突，（一）双方根据下列条件，立即停止各种暴力行为。（二）两国间此后不再有动员或准备任何敌对行为。（三）在沪中、日作战人员，退出彼此接触地点。（四）设立中立区域，分离双方作战人员，以保护公共租界，该项区域由中立国军警驻防，各种办法，由领事团拟定。（五）两国一经接受该项条件后，不先提出要求或保留，即根据非战公约及十二月九日国联决议案之精神，在中立国观察者或参与者协助之下，迅速进行商议，以解决一切悬案之争议……”这一提案，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列强趁火打劫，企图把日本帝国主义未能夺去的中国的神圣领土上海，变为国际帝国主义共管的“中立区”。抱定对日妥协的国民党政府对于这一损害中国领土主权的提议，表示完全同意。2 月 4 日，外交部在复英、美等国的牒文中说：“对于贵国政府所通知之提议，特行接受。”然而，日本却提出在沪、汉、津、粤、青岛等大商埠周围，各划一不驻兵区，宽 15~20 英里，以此对抗英、美等国共管上海的计划。

国民党政府不顾第 19 路军在作战中取得的胜利，急于谋求妥协性的停战谈判。2 月 8 日，何应钦致电在沪之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宋子文、张静江、张群、孔祥熙及吴铁城：“此次淞沪事件，弟曾迭电商酌适可而止，盖期早得收束……请兄等商在沪诸外委，从速设法，先求停止战争，至于整个问题，则待外交正式之解决，庶不至益加糜烂而不可收拾也。”

与此同时，蒋介石在浦口召见何应钦、罗文干、陈铭枢等指示：“十九路军保持十余日胜利，趁此收手，避免再战为妥。应即进行停战，转入外交途径，具体由公侠（陈仪）达天（王俊）办理之。”于是，何应钦即指派军政部次长陈仪、陆军步兵学校校长王俊，于 2 月 13 日抵沪与美英日等领事磋商，并直接与上海日军当局洽商停战事宜。在谈判中，由于日本态度强硬，坚持要中国军队先撤，谈判于 2 月 18 日破裂。16 日，国联各会员国向日本政府发出呼吁，要求日本政府注意盟约第 10 条，“凡有违反该条而致侵害任

《国闻周报》第 9 卷第 7 期，1932 年 2 月 22 日。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 1981 年版，第 524~525 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文史资料选辑》第 37 辑，中华书局，1963 年，第 47~48 页。

何国联会员国领土之完整，及变更其政治独立者，国联会员国均不应认为有效。”这是国联第一次单独对日本，而不是同时对中日双方都发出呼吁。国联恐怕此举引起日本的反感，国联理事会主席（法国外交部长）保罗一庞古声明，这个呼吁不是对日本的谴责。实际上也正是如此，侵略者不是受到谴责，而是得到纵容。当日，植田发出强硬横蛮的最后通牒。国联决定将上海问题提交于3月3日召开之大会讨论。

在此情况下，日本内阁考虑，过早刺激列国，将使日本在国际上更加孤立。当前日本国策的重点在满蒙方面，因此在战况有利的情况下，要迅速结束战争，而不宜导致中日全面战争。2月23日，日本内阁决定：“将战线限制在上海附近。”

2月25日，中国军队粉碎了植田的总攻计划，迫使日本不得不同意停战谈判。2月28日，经英、美、法三国公使接洽，英国东方舰队司令克莱邀请顾维钧和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与日本方面的野村吉三郎、松冈洋右（日本犬养首相和芳泽外相的特派使节），在英“康特号”旗舰上会晤，对停战问题作私人谈话。结果商定五点：（一）双方同时撤兵。（二）日本不再要求吴淞等炮台永久不设军备。（三）中日合组委员会，邀中立国视察员参加监视双方撤兵。（四）撤退区域由中国继续行使警察与行政权。（五）华军撤真如、日军退一月廿八日以前原防后，华军退南翔，日军登轮。如双方请示后均同意，即由双方外交、军事正式代表开会订定。对这一提议，中国代表正式表示接受。

29日，国联行政院建议在上海组织圆桌会议，解决上海问题。但此时日军在上海作战中并未占有优势，日本不愿以战败者身份签字，所以在白川上将率第11师抵达上海后，再次发起全线进攻。3月1日，日军第11师在浏河登陆，中国军队被迫退守第二道防线。3日，日军进抵嘉定、南翔一带后，白川才根据日军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的电示，下令停止战斗，并发表停战声明。

3月3日，国联召开大会，进一步开展对上海停战工作，中国代表颜惠庆在会议上要求国联大会“就权力所及，先使在中国领土内的一切敌对行为停止，并使侵犯的军队撤退，然后就行政院决议案的范围，并本盟约的精神，以和平的方法，解决中、日间一切争端。”4日，国联大会决议：“大会于申述行政院2月29日所议决之提议，并声明不妨害提议中所包含之其他方法之后：（一）请中、日政府，立即采取必要之方法，使两方军事当局所发停战之命令，得以有效。（二）请求在上海有特别利益关系之列强，以前项办法实行之状态报告大会。（三）劝告中、日代表：以上述列强文武官宪之协助，开始磋商，订立办法；此项办法，须确定停止敌对行为，并规定日军之撤退；务请上述列强，随时以磋商情形，向大会报告。”5日，“美国政府暗示已经训令上海该国军事长官，通力合作。”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6页。

〔日〕国际政治学会：《走向太平洋战争之路别卷·资料编》，朝日新闻社，东京1963年版，第192页。

《民国档案》1985年第2期，第20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36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388页。

3月11日，国联举行大会，根据中国政府1月29日对国联提出之关于适用盟约第10条、第15条之申请及国联2月19日之决议，决定组织19个会员之委员会，以大会主席为该委员会之主席。由该委员会从速报告关于停止战事、缔结协定及规定日军撤退等各事项。

3月14日，国联调查团抵达上海。同日，郭泰祺与重光葵在英公使邀请下，再作非正式会晤，英、美、法公使和意大利代办在座，讨论停战协议草案。24日，中日双方举行正式会议。出席会谈的中方代表有：外交部次长郭泰祺、淞沪警备司令戴戟中将、第19路军参谋长黄强中将。日方代表有：驻华公使重光葵、第9师师长植田谦吉中将、上海派遣军参谋长田代皖一郎少将、第3舰队参谋长鸠田繁太郎少将。英国公使兰普森、美国公使詹森、意大利代办齐亚诺及法国公使韦礼德之代表出席会谈。在谈判中，日方对日军撤退的时间、区域和中国驻军区域问题上，一再无理纠缠。其后又经过多次会谈，均无结果。4月9日，中国方面决定将停战问题提交国联19会员委员会解决。4月30日，国联大会通过了中日停战协定决议草案，并建议双方恢复停顿中之谈判，以早日完成停战协定。在英公使及国联19会员委员会斡旋下，停战会议重开。5月5日，中日双方代表在上海英国领事馆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即《中日上海停战及日方撤军协定》）。

《上海停战协定》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条中国及日本当局，既经下令停战，兹双方协定，自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五月五日起，确定停战。双方军队尽其力之所及，在上海周围停止一切及各种敌对行为。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

第二条中国军队在本协定所涉及区域内之常态恢复，未经决定办法以前，留驻其现在地位。……

第三条日本军队撤退至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一如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事变之前。但鉴于须待容纳之日本军队人数，有若干部队，可暂时驻扎于上述区域之毗连地方。……

第四条为证明双方之撤退起见，设立共同委员会，列入与会友邦代表为委员。该委员会并协助布置撤退之日本军队与接管之中国警察间移交事宜，以便日本军队撤退时，中国警察立即接管。

第五条本协定自签字之日起，发生效力。”

协定之第二、第三、第四条，均有附件。“附件第一号”规定了中国军队驻扎之具体地点。“附件第二号”规定了日本军队驻扎和可以使用之地区。“附件第三号”规定了“共同委员会”之组成。中国代表对于中国军队留驻其现在地位一点，声明“双方了解本协定内，对于中国军队在其领土内之调动，并不含有任何永久之限制”。对于“中国警察立即接管”一点，声明由中国自动设置特别警察队接管。除协议正文外，会议记录中还有对中国最致命的所谓三项谅解：一是中国政府同意取缔全国的抗日运动；二是第19路军换防，调离上海；三是中国同意在浦东和苏州河南部，以及龙华对岸之若干地区不驻扎中国军队。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九·一八事变》，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31～632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2～543页。

《上海停战协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退让的产物。国民党政府不敢追究日本进犯上海的侵略罪责，并由其赔偿损失，反而使中国丧失了在上海及其周围的驻军权，并让日本帝国主义在上海的势力空前扩张。根据协定的内容，中国实际上承认日本帝国主义军队可以长期自驻吴淞、闸北、江湾及引翔港等地，而中国军队却不能在上海周围驻扎设防。且所谓“常态恢复”、“毗连地点”之规定，日军均可以任意借口加以解释。协定还在“共同委员会”的名义下，把从长江沿岸福山至太仓、安亭及自鹤江起直到苏州河止的广大地区，划给了日本及美、英、法、意等帝国主义共管。协定第一条中“关于停战情形遇有疑问发生时由与会友邦代表查明之”的规定，表面上好象对中日双方不偏不倚，但实际上却规定了在中国领土上实行的停战发生疑问时，中国方面竟无权调查、无权参与处理，露骨地出卖了国家主权。会议所达成的三项谅解，以后证明都变成了事实。此外，在淞沪战争期间，日本利用国际视线集中于上海的时机，推出了其一手制造的伪“满洲国”，部分地达到了原定之目的。

三、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的斗争

国民党政府对日屈膝退让，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还在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致函国联请求干涉，以及英、美驻华领事提出中国守军由现驻防地退出2000米的时候，中共中央于1月31日发表了《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指出：“一切帝国主义者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助手，将租界给日本帝国主义作军事根据地来轰炸杀戮上海的劳苦群众”，号召“举行总同盟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反对国民党出卖上海！”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在《对日战争宣言》中，以铁的事实揭露了国民党政府对外妥协投降、对内镇压人民爱国运动的行径。指出国民党政府“接连的将东三省和淞沪各地奉送于日本帝国主义……现更以和平谈判，实行出卖整个中国，促进各帝国主义迅速瓜分中国。对于全国反日反帝的革命运动，则尽其压迫之所能……他们不但不能而且早已不愿真正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民族革命战争。”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坚决否认这项卖国协定，号召全国人民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保卫中国的主权及领土完整。

从国民党政府对日乞求和平、进行停战谈判开始，全国人民即一致反对。特别是上海广大人民群众，他们在1个多月的时间内，与第19路军并肩作战。第19路军被迫撤退以后，他们仍然继续着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反对国民党政府妥协投降的斗争。当停战协定草案在国联大会通过时，上海人民更是群情激愤。5月2日，上海各团体抗日联合会通电全国，坚决反对出卖上海的停战协定。上海各团体还紧急召开会议，发动罢工、罢课、罢市，组织游行示威，反对国民党政府撤兵。3日晨，上海抗日救国团体代表40余人，拥入郭泰祺住宅，痛殴经手谈判的郭泰祺，以为对外投降者的警告，并迫使国民党当局释放了被捕代表。

上海停战协定签订以后，全国舆论沸腾，纷纷谴责国民党政府。民众团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55～57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77页。

体联合会通电坚决反对这项屈辱协定，称它“限制华军，破坏主权完整”，“局部停战，适中敌人诡计”，“屈辱妥协，丧失国际同情”，“对外屈辱，对内造成战祸”等等，甚至国民党的立法委员也向汪精卫提出质疑，认为背后还有出卖主权的密约。

力主抗日的冯玉祥将军病卧徐州，当他得知蒋、汪政府已决定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停战协定后，认为这是丧权辱国，“丧权辱国之事我必反对！坚决的反对！即或病愈，亦不到南京去！”5月6日，国民党粤方中委萧佛成、李宗仁、陈济棠反对《上海停战协定》，通电反对汪精卫、蒋介石。陈友仁批评《协定》：“胜利属于日方。”5月21日，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以《上海停战协定》未送立法院审议即擅行签订，要求国民党中央监委弹劾行政院长汪精卫。

对于上海停战协定，蒋介石在5月7日发表的《为淞沪停战撤兵协定签字告全国将士电》中竟宣称：“此次协定成立，实依照国联之决议，关于协定内容，我方所始终坚持者，为限于日军撤退，不得附带政治性质之条件，此点已完全办到。”对于日本侵占东北、制造伪“满洲国”这一极其严峻的问题的解决，则谓：“惟中日之根本问题全在东北土地之得失与主权之存亡，故我政府仍本向来一贯之方针，以交涉与抵抗并行，期得最后之解决”。汪精卫也大谈什么上海停战是“平等的停战”，“毫无对日屈辱之意”，是“外交的胜利”。5月9日，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五九”国耻纪念会上辩解道：“此次协定完全为停战撤兵，无政治性质，东北问题并不因此而停止交涉”。“今后吾人对外交仍抱一面交涉一面抵抗之态度，决不屈服。”

这样，由“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外交方针所造成的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被汪精卫美化为对日外交成功的样板。对此，上海各团体联合会于24日通电指出：“我全国民众，誓死抗日，而汪精卫誓死媚日，竟至敢冒不韪，居之不疑。”对其“即加卖国之名，岂得为过。”向汪精卫发出了警告。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使中国人民又蒙受了新的耻辱。而协定墨迹未干，蒋介石却于5月21日亲自兼任豫鄂皖3省剿共总司令，准备纠集重兵向革命根据地发动第4次军事“围剿”。对“违令”抗日的第19路军，蒋介石先加以“整肃”，然后实行肢解，令其所部3个师分别调往武汉、南昌和安徽。但第19路军官兵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没有服从分割肢解的命令，蒋介石不得已才改命该军调往福建“剿共”。对参加淞沪抗战的第5军，蒋介石也于5月7日下令复员。

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日本陆海军除一部调回日本国内外，陆军主力第14师奉日本参谋总长的急令，迅速调往中国东北，列入日本关东军的序列，对中国东北的抗日军民进行“讨伐”。日本侵略者用停战协定取得战略主动，以便将日军投向新的方向，扩大侵华战争。对上海的进攻掩护了伪“满洲国”的出笼，在上海的停战，又加强了对东北的进攻。

北平《实权日报》1932年5月6日。

《冯玉祥日记》1932年3月18日，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9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45页。

《国闻周报》第9卷第19期，1932年5月16日。

《申报》1932年5月25日。

《上海停战协定》的签订，标志着淞沪战役的正式结束。在抗战中，中国第19路军和第5军的广大官兵表现出了高度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英勇牺牲精神。上海广大群众和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影响下，给予第19路军抗战以巨大的支援。中国军民在淞沪抗战中不畏强暴和顽强战斗的意志以及所取得的部分胜利，在中国的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

淞沪抗战虽然由于国民党政府的阻挠破坏及对日妥协而导致失败，但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正如宋庆龄所指出：“人皆以中国此次战争为失败，实则中国在精神上完全胜利，日本所得者仅物质之胜利而已。得精神胜利之人民，必日益奋进于伟大光荣之域，得物质胜利者，只日增其侵略与帝国主义之野心，终于自取覆亡而已。”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也评论说：“对中国人来说，这次军事失利却是一次惊人的精神上的胜利。”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出版，1966年版，第55页。

《斯诺文集》第1卷，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20页。

第一编 小结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利用蒋介石的绝对不抵抗政策，乘虚而入，以3个多师的兵力，在短短4个多月里，侵占了3倍于日本领土的中国东北全境。随后，日本帝国主义又挑起“一·二八”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驻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奋起抵抗达1月之久，使日本侵略军受到重大打击。在英、美、法、意等国的调停下，国民党政府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屈辱的《上海停战协定》。当国际视听集于上海的时候，1932年3月，日本在中国东北一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同年9月15日，日本宣布正式予以承认，并签订了《日满议定书》及其密约，把东三省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

日本发动这场战争是蓄谋已久的，是由其基本国策和帝国主义制度等决定的。

日本的基本国策是积极向大陆扩张的所谓“大陆政策”，也就是以武力征服朝鲜、中国、亚洲乃至世界的政策。明治维新以前是大陆政策的酝酿时期；从明治维新到中日甲午战争，是大陆政策的系统形成时期。经过日俄战争，日本进入了近代帝国主义时代。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英、法、俄同德、奥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在欧洲战场厮杀，无暇东顾之机，夺取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还以“委任统治地”名义，接管了德国在太平洋占领的一些岛屿，成为公认的“帝国主义暴发户”。1915年日本政府向当时的中国总统袁世凯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使“大陆政策”得到进一步发展。1927年6月27日至7月7日，日本内阁首相兼外相田中义一主持召开“东方会议”，确定了《对华政策纲领》，这标志着日本的“大陆政策”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根据该会议精神拟成的《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所谓《田中奏折》，为日本推行“大陆政策”提出了具体步骤，成为日本法西斯征服满蒙，独占中国，称霸世界的总战略。

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资本主义各国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使得资本主义世界的各种矛盾空前尖锐。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的规律，加剧了它们之间争夺霸权，即重新瓜分殖民地的斗争。在世界经济危机中，日本法西斯乘机崛起，疯狂扩军备战，并向中国发动武装侵略，力求使日本摆脱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的困境。战争开始阶段，日本帝国主义之所以能够顺利得逞，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一是日本侵略者经过精心策划，周密准备，突然发动了战争；二是蒋介石提出“攘外应先安内”方针，采取绝对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执行了蒋介石的命令，致使处于优势的东北军不战而退；三是英美法等帝国主义为国内经济危机所困扰，又想借日本占领中国东北牵制苏联，因而对日本采取了两面政策；四是苏联忙于国内建设，极力避免同日本发生冲突，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了中立立场和不干涉态度，并谋求缔结苏日互不侵犯条约。日本侵华战争的胜利，使法西斯军部在国内的政治地位有所提高，也使日本财阀获得了高额的利润，财阀转向支持法西斯而抛弃了政党，使日本法西斯的势力更加膨胀。在侵略战争的推动下，日本渡过了经济的萧条，进入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这就刺激了日本的扩军备战和进一步加强军事工业，加快建立战争经济体系，逐渐形成以军事工业为中心的经济高涨局面。日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在迅速增长着。对中国东北的占领和掠夺，更加快了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步伐。它把这块刚刚掠夺到手的中国领土，迅速变成了南下进攻中国腹地和南洋，北上进攻苏联的最大的战略基地。因

此，“九·一八”事变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亚洲的范围。它不仅是日本法西斯侵略中国的开始，也是向世界争霸对手进攻的开始，从而揭开第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序幕。然而，对如此重大的世界性事件，国联和列强却采取了纵容侵略者，压制和损害被侵略者的姑息养奸的绥靖政策，不仅未给侵略者以任何实际的惩罚和制裁，而且对日本最野蛮的侵略罪行给予默认。日本法西斯摸到了底蕴，受到了鼓舞，为便于为所欲为自由活动，索性于1933年3月27日宣布退出国联，摆脱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的束缚。这就打破了原有的势力均衡，等于破坏了所有的国际协定，宣布了国际联盟的软弱无力。从此，一个好战的、侵略成性的日本帝国主义势力，在东方无阻挡地急剧滋长着，成为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早的战争策源地，成为重新瓜分世界的罪魁祸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华民族面临存亡的危机，全国人民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和人民的利益，在反对国民党政府反动军事“围剿”的极端艰苦的斗争条件下，首先主张武装抗日，并引导工农红军和人民群众，把国内革命斗争与抵抗日本侵略的反帝爱国运动结合起来，同时号召全国人民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坚决把日本侵略者驱逐出中国。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和东北各民族各阶层人民组成的东北义勇军，违抗国民党政府绝对不抵抗的命令，奋起抗战，给日本侵略者以有力打击。当东北各地义勇军的抗日武装斗争从一度高涨转向低潮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却在斗争中不断壮大，逐渐成为东北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核心力量，使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进入发展的新时期。在此期间，驻上海地区的国民党军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的对日不抵抗政策，奋起保卫淞沪，也给侵略者以沉重打击。

这些为保卫中华民族独立而战的抗日武装，打响了反法西斯战争的第一枪，挫伤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捍卫了中华民族的尊严，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斗志，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反响，从而得到了全国和国际正义力量的重视和声援。

第二编 救亡高潮 (1933.1~1937.7.6)

第五章 日本扩大侵略，中国军民进行长城、察哈尔抗战

第一节 日本侵华的新步骤及中国国民党政府的内外政策

一、日本扩大侵华战争的新步骤

全面灭亡中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既定国策。但由于日本受其国力、军力和国际等条件的限制，只能一步一步地实现其政治野心。“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陆军当局在侵华作战的基本点中明确提出：“因对苏必须严加警戒，所以对华作战必须极力缩小规模，以最少兵力尽速达到作战目的。”“要始终把战争限制在华北、华中或华南一个方面，这是根本方针。”“只在一方面作战不能消灭中国的武力，因此应只占领必要地区。如此持续下去给中国方面以痛苦，用此方法使中国不得不向我方屈服。”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热河、冀东便成为其窥伺的目标。1932年1月日军占领锦州后，曾企周乘机侵占热河，只因当时忙于对付东北抗日义勇军，制造“一·二八”事变，拚凑伪满洲国，应付国际联盟调查团的调查，而未能付诸实施。1932年下半年以后，形势有了新的变化，日本又将侵犯热河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在日本国内，犬养毅内阁加速经济军事化，使日本的经济迅速向战争经济转变，出现了一批与军事工业、殖民地经营及军部势力紧密勾结的新财阀，旧财阀的军事化倾向也大大加强。从而更加激发了日本帝国主义向外扩张的欲望，也更加激化了日本国内的阶级矛盾。

1932年5月15日军部少数人制造“五·一五”事件，枪杀了首相犬养毅。22日，组成了在军部指导下的斋藤实联合内阁。它标志着日本式“政党内阁”的结束和军部法西斯体制正在形成。在国际上，“九·一八”事变后，社会主义苏联从道义上支持中国。美、英、法等帝国主义国家，为了各自的利益，对日本侵略中国采取两面态度：一方面对日本企图独占中国市场不满，另一方面又期待日本反苏、反共。

1933年1月30日，德国希特勒上台，建立法西斯专政，标志着战争策源地开始在欧洲心脏的形成。美、英、法等国的绥靖态度和德国纳粹的上台，助长了日本扩大侵略的气焰。在中国内部，“九·一八”的炮声，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怒涛，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已成为全民的呼声。但是蒋介石及其南京政府却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坚持对外不抵抗和对内进行反革命内战，给日本扩大侵略以可乘之机。与此同时，中国东北风起云涌的抗日斗争遭到日本关东军的疯狂镇压。到1932年底，几支较大的抗日义勇军均遭挫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关东军认为：可以“调头把圣战指向热河省了”。

日本这次扩大侵略的主要企图是：侵占热河，逼迫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75年版，第101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9页。

长城沿线为伪满洲国的边界线，并在长城以南制造一个非武装地带，以扩大占领区，巩固其对东北三省的殖民统治，为全面入侵华北以至全中国打开方便之门。在侵略步骤上，采取两步走的方针：第一步，以军事进攻为主，政治谋略为辅，武装侵占热河和长城各口，同时对华北进行策反工作。

1933年2月10日，关东军在侵热计划中讲得很明白：“攻占热河的目的，在于使热河省真正成为满洲国的领域，并为消灭……华北张学良势力，创造条件”。第二步，在以谋略为主，争取不战而取华北不成的情况下，改取“迫和为主，内部策动为从”的方针，派兵入侵关内，威胁平、津，逼迫中国政府订立城下之盟，在长城以南建立非武装区，为进一步南侵打开缺口。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关东军就开始对当时统治热河的东北军将领汤玉麟进行诱降工作。

1932年4月4日，关东军在《对热河政策》中规定：“暂以支持汤玉麟，使之从速服从满洲国的统治为首要措施，其次，使之改革省政。”为诱降汤玉麟，日本驻沈阳特务机关，早在“九·一八”之后就保护汤玉麟的家属离沈阳经大连到天津。伪满洲国成立时，日本又任命汤玉麟为伪参议府副议长。此后，日军除利用汉奸、汤的盟兄张景惠和张海鹏等继续派人到热河劝降外，还派与汤相识的日本浪人高原化装到承德进行活动。这年冬天，日军又以伪满名义通知汤玉麟派代表到北票开会。汤派省政府公安管理处长张舜卿参加了会议。会上日方向张提出三点要求，即：汤派代表长驻长春；将铁路由北票延伸至承德；日军在承德设置无线电台。张舜卿将日方要求同时电告张学良和汤玉麟。张复电张舜卿，令其断然拒绝。日军见诱降不成，便决定对热河发动武装进攻。

1932年7月2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指出：热河是威胁到建设“满洲国”的一大祸根。因此，“无论关东军情况如何，应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攻占热河省，从根本上解决满洲问题”。7月25日，日军参谋次长复电关东军参谋长：“如果用外交手段已无效果，则以必要兵力，尽量直冲平津地方”。

日本关东军在对汤玉麟进行政治诱降的同时，并未放松军事进攻的准备。

1932年7月21日，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在给日军参谋部的电报中提出：“占领热河迟早是要进行的”，“目前的方针是静观事态发展，秘密进行各种准备”。据此，日本从多方面进行了准备：

一是大造舆论，鼓吹侵热“合法”论。日本刚上台的首相斋藤实、外相内田康哉和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都一再宣称：“热河为满洲国之一部”，“满洲国的国境系万里长城”。“所谓热河问题，纯粹为满洲国之内部问题”，“其在该省内捣乱治安者，为满洲国之不逞分子，其侵入省内者为侵略者”。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24页。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85年东京版，第788页。

高原在返回途中行至朝阳附近，被汤玉麟部爱国官兵数人跟踪杀死。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491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89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7年东京版，第490页。

“根据日满议定书规定，对满洲国领域内之治安，两国有共同维持之责任。”

日本报纸、杂志也连篇累牍地指责张学良操纵义勇军，危害伪满洲国的安全，并扬言要进行“惩罚”。

二是调兵遣将，扩编伪军。关东军在“九·一八”事变前只有1个师，“九·一八”事变时增至3个师，到“九·一八”事变后的1932年，又先后从日本国内和上海调入第6、第14师，第10师主力，第20师司令部，以及混成第8、第38旅和第1、第4骑兵旅等部，使关东军总兵力达到6个师，4个混成旅，2个骑兵旅，1个飞行队，约10万人。同年6月6日，还发布了关东军司令部扩大编制的命令。8月更换了关东军司令官和正副参谋长，司令官为武藤信义，正、副参谋长分别由小矶国昭和冈村宁次担任。同时积极编组伪军。伪满初期共有伪军14万人，主要是由投降的东北地方军组成。为侵犯热河，日军在辽（宁）西和吉（林）西地区组织了王道布的骑兵军，刘桂堂的护国游击军，程国瑞、李际春的暂编第1、第2军等伪军。

三是密谋策划，频繁挑衅。1932年7月3日，东京日军参谋部次长真崎甚三郎到锦州与关东军将领策划进攻热河。7月17日，驻义县日军300人以石本权三郎被义勇军拘捕为借口，向辽热边境的朝阳寺进攻。23日，日军飞机数架飞至热河平泉、凌源、承德一带侦察，并散发传单。8月19日，日军一度占领南岭车站，炸毁南岭铁桥，并不断派飞机到热河上空挑衅。与此相配合，日军还派奉天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到天津设立特务机关，策动“原华北各军阀将领，使其相机进行反蒋”降日。至此，日军扩大侵略的一切准备就绪，只等有利时机的到来。

二、国民党政府继续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在日本紧锣密鼓地准备采取侵华新步骤的情况下，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是动员全国民众积极准备抗日，而是顽固推行对内用兵、对外妥协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1932年3月14日，还在淞沪抗战期间，蒋介石就提出：“倭寇深入，赤匪猖獗，吾人攘外，必须安内。”6月9日，《上海停战协定》签订刚一个月，蒋介石就在庐山召集赣、湘、鄂、豫、皖“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把“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定为国民党处理对外对内关系的基本国策。并提出了“标本兼施”的“剿共”方针和第4次“围剿”计划。6月28日，蒋介石在汉口成立“剿共”总部，并自任总司令，准备调集63万兵力，拨出3500万元巨款，对革命根据地进行第4次“围剿”。8月3日，正当日军不断向热河挑衅之际，蒋介石在汉口宣称，限6个月内肃清鄂、湘、赣、豫、皖五省红军。12月14日，日军进攻榆关前夕，蒋介石还在内政会议上说：“要想攘外，必先安内”。“今天我们可以说：日本不配做我们的敌人。我们当前的敌人还是赤匪。如果我们在内部把赤匪的祸乱消除了，对日是没有

〔日〕外务省情报部：《满洲事变及上海事件关系公表集》，1934年东京版。

〔日〕桑田悦等编著：《简明日本战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9年中文版，第55～56页。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文版，第18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战争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4页。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40页。

问题的。” 1933年1月27日，蒋介石置榆关失守于不顾，前往江西南昌指挥第四次“围剿”中央红军的战争。4月6日，当长城抗战激烈进行的时候，蒋介石在南昌电告各“剿共”将领说：“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决无以御外侮。”“本总司令来赣督剿，实示有我无匪之决心，如我剿匪各将领，若复以北上抗日请命，而无意剿匪者，当以贪生怕死视之”。“如再有贪生怕死、侈言抗日、不知廉耻者，立斩无赦。”4月7日，蒋介石再次鼓吹“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东三省热河失掉了，自然在号称统一的政府之下失掉，我们应该要负责任，不过我们站在革命的立场说，却没有多大关系。”“无论外面怎样批评谤毁，我们总是以先清内匪为唯一要务，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本末颠倒，先后倒置。”5月8日，正值日军开始大规模向关内进攻之际，蒋介石却在江西崇仁总指挥部对中路军军官大讲什么：“如果不先安内而要求攘外，在战略上理论上说，都是居于必败之地”，“不仅是不能救国，而且适足以速国家之亡。”他还说：当前的任务“第一个乃是剿匪来安内，第二个才是抗日来攘外。”

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遭到国内国际进步舆论的一致谴责和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于1933年1月17日发表宣言。宣布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愿在“停止进攻苏维埃区域”、“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和“武装民众”三个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在这个宣言的影响下，全国广大工人、农民、学生、商人和各民众团体、爱国人士、海外华侨，都纷纷要求国民党政府及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将领蔡廷锴、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傅作义、徐永昌等分电蒋介石，请缨抗日。胡汉民在香港发表对时局意见，指出：“榆关守否为华北存亡所关，中国安危所系。”“今日只问抗日方面有何进展，如旁及其他，不但无意思，亦且无意义。”著名爱国人士宋庆龄亦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以全国军队的80%以上开赴抗日前线、人民应全部武装、人民的民权应立即恢复和停止对苏维埃区进攻等四项抗日要求。政治学者王造时主张将“攘外必先安内”改为“安内必先攘外”，指出：“只有决心抗日，只有积极抗日，才是唯一出路，才是唯一安内的办法。”北京大学教授丁文江，也在《独立评论》杂志上发表《假如我是蒋介石》的文章，呼吁“立刻与共产党商量休战”，“预备积极抵抗日本”。不仅如此，世界舆论也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不满。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从日内瓦回电称：各国代表都认为，中国无力抵抗，各国亦无能为力，唯一一面陈诉于国联，一面“尽力抵抗，以示我决心，而壮国联之气”。在国联报告书被通过后，顾维钧等在给南京政府的另一封电报中说：“报告书的通过达到了我国向国联呼吁的主要目标，并给我方以行动之自由。但如

《蒋总统全集》第1册，台北版，第606页。匪、赤匪——系对中共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诬称。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5~36页。

蒋介石对高级将领的训词，1933年4月7日。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1981年版，第37~38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45页。

天津《大公报》1933年1月6日。

《独立评论》第35期，1933年1月5日。

罗文干致张学良电，1933年1月1日，《革命文献》，第38辑，台北版。

我国不决心依靠自己行动来坚决捍卫我领土，则其价值即将消失，而历时十七个月之外交努力亦将完全付之流水。”

在国内外强大的舆论压力面前，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并没有动摇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根本政策，但在手法上又不得不表示出一种抗日的姿态。他们在不妨碍“安内”和对日妥协的前提下，被迫采取了一些措施。

从1932年7月7日到榆关失守前，面对日本的不断挑衅，蒋介石曾三次电令张学良，派3~5个旅到热河加强防守，要求“在榆关驻重兵”。

12月25日再电张学良，决走密备中央军6个师随时北运增援。并且说：“倭寇北犯侵热，其期不远”，“今日之事，惟有决战，可以挽救民心，虽败犹可图存，否则必为民族千古之罪人。”蒋介石的话说得很动听，但只是为了应付一下门面，他在另一封电报中却说：不这样做，“又使国人误为不抵抗也”。榆关失守后的1933年1月17日，张学良曾致电蒋介石，要求调中央军即日“开赴热东一带，以增强实力，而备万一。否则战端一起，深恐局部稍有不支，全局大受影响，事机迫切，间不容发，职部军队实不足分配”。对此，蒋介石竟批复：“北方军事已圭权托付吾兄……成败存亡，听之而已。”

到2月14日，日军进攻热河前夕，蒋介石还在宋子文的电报上批复：“未开战以前，中央军不如缓上”。拖到2月28日热河形势告急的时候，蒋介石才下令中央军增援部队北上。到最后，原定北援的6个师中只落实了第2、第25、第83和第44师4个师。直到3月15日，日军猛犯长城各口时，始组成以东北军、西北军、晋军等地方部队为主的战斗序列，共约25万人。而此时蒋介石用于南方5省“剿共”的兵力，却达到60万人以上。

国民党在华北的最高军事指挥机构原是北平绥靖公署，张学良为绥靖公署主任。1932年8月17日，国民党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委会北平军分会，并由蒋介石兼任军分会委员长。蒋介石又让张学良以北平军分会副委员长的身份代行委员长的职权，使张感恩于蒋。1933年1月，榆关失守后，张学良到南京开会时，曾要求蒋介石北上，指挥反攻作战。蒋不得已，派陆军大学校长杨杰率20余人于当月20日赴北平协助张进行指挥。1月24日，热河危机加深，宋哲元、冯治安、张自忠、刘汝明、商震、庞炳勋等华北军将领致电蒋介石，请他北上指挥作战。蒋满口答应：“必北上与共生死也”。然而不到3天，他却南下江西指挥“剿共”战争去了。2月5日至13日，当“倭寇攻热在即”之际，蒋介石先后4次分别致电张学良和宋子文，决定并催促张作相赴热坐镇指挥。2月19日，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由张学良和张作相分别统率，保卫热河。3月1日，蒋又致电宋子文，告以“热河战事，惟有汉兄（张学良）亲出督师，方可如计奏效。”结果，张作相直到热河失陷前几天才赶到承德设司令部，为时晚矣！张学良还未成行，热河已失。3月3日，北大教授丁文江等致电蒋介石，再次催其北上。电称：“热河危急，决非汉卿（张学良）所能支持，不战再失一省，对内对外，中央必

《顾维钧回忆录》第2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78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66页。

张学良为热河危急要求筹定大计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5日，国民党总统府机要档案。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5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85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07页。

难逃责。非公即日飞来指挥挽救，政府将无以自决于天下。”3月4日，热河沦陷，全国震怒，蒋介石才急派何应钦、黄绍竑等于5日赶赴北平，与张学良会商应付办法。3月6日，蒋介石亦被迫离开“剿共”前线北上，以其亲信何应钦代行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之职，主持华北军事，并联络阎锡山等出兵长城，应付抗战。同时在保定设委员长行营，由何成浚代蒋坐镇华北。3月26日，长城抗战正紧之时，蒋介石却已在南京与刚刚回国的汪精卫会谈，几经周折，蒋答应给汪以处理外交的权力。并于5月3日在北平成立以黄郛为委员长的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负责对日外交。至此，北平有了两套班子：应付抗战，有何应钦按照蒋介石的旨意指挥的北平军分会系统；对日交涉，靠汪精卫直接指挥黄郛的北平政务整委会系统。

军费问题是进行长城抗战的一个大问题。1933年1月5日，张学良致电蒋介石，称：“目前最切要者即粮秣一项，幸前经宋部长汇借五十万元，业已用尽，现时急需汇二三百万元不敷支应，务恳迅赐筹拨四五百万元，俾济急需。”为解决经费给养问题，宋子文曾于2月11日到北平，与平、津银行财团商谈财政问题。14日，宋子文在给蒋介石的电报中承认：“前线队伍确万分困苦，汉卿确亦无法支持，弟与金融家正在商量三个月计划，以安军心。”并向各将领表示“予以财政物质上尽所有之援助”，同时“已组织热河后援会”。宋子文讲得很好，但兑现不多。据国民党历史档案记载，汤玉麟为粮晌和服装等问题，曾多次电请南京政府解决。辽、吉、黑民众后援会会长朱庆澜和热河民众团体也连续发函吁请。直到3月1日国民党政府实业、财政、内政三部才开会讨论。决定呈请行政院通令各省市府“鼓励粮食商人或商会将粮食运往热河销售，并由政府设法协助保护。实际上，在三部联合讨论这种办法时，热河已大部沦陷。待三部会函呈报行政院时，热河已丢失半个月了。这种筹集抗日经费的难处与蒋介石一次就批拨几千万元“剿共”经费之容易，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台北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118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73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594~595页。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资料。

第二节 榆关战斗与热河弃守

一、长城、察哈尔抗战的序幕——榆关战斗

(一) 榆关战斗前的态势

榆关即山海关，位于万里长城东端，北依燕山，南临渤海，地势险要，扼辽、冀之咽喉，为平津之屏障，素有“天下第一关”之称，自古即为军事重地。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中国，逼迫清政府于次年签订了不平等的辛丑条约。规定英、美、日、法等11国有权在秦皇岛、山海关等战略要地驻兵。自此，日本就在秦榆两地驻军。至“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在榆关驻有宪兵分遣所和步兵守备队，分别隶属于天津的日本宪兵队和中国驻屯军。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更加重视并准备攫取这个门户枢纽。这首先是日本侵略热河的需要。日军占领榆关，既可用少数兵力掩护其攻热部队的侧背安全，又可佯示攻略滦东，窥视平津，牵制中国兵力于冀东平原，以利攻热作战。其次，日军占领榆关是为了切断关内与关外的联系，并取得入侵关内的跳板，为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造成有利的战略态势。

为图谋榆关，日本利用辛丑条约所给予的驻兵权，步步进逼。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开始在榆关增兵，特别是1932年初日军夺取锦州后，关东军又以第8师进占兴城、绥中等地，以致榆关震动，一日数惊。日本情报人员则利用日本驻军和侨民作掩护，在榆关不断进行刺探军事情报和捣乱活动。关东军的步步进逼，驻榆日军的捣乱和天津驻屯军的不断骚扰，使榆关形成了“前有重兵压境，中有心腹之患，后有掖背之痛”的军事形势。当时榆关虽驻有东北军独立第9旅何柱国部一个团，但在中国“最高统帅部仍以排除万难，避免冲突为方针的思想指导下”，处于不战、不和、不守状态，对榆关前线未作有力部署。

1932年下半年日本驻榆关守备队经过多次换防，兵力增至300人以上，并附有少数炮兵和工兵，队长为落合正次郎。在秦榆海面，有日本军舰10艘以上；榆关正面，北宁铁路锦州至绥中地区驻有关东军第8师第4旅，另有骑兵第3旅一部和第8炮兵团，并配有飞行队第1中队，装甲列车3列，坦克10余辆，总兵力约4000人。

从1932年5月开始，日军曾多次挑起事端，制造侵略的借口。5月初，日本宪兵队挑起“义勇军事件”，强迫临榆县长将曾当过义勇军的土匪赵国思交给日方，被中国方面拒绝。

10月1日，日军守备队又挑起伪满警察闯入东罗城，强登“天下第一关”城墙，造成双方死亡士兵各1名的事件，准备起事。经何柱国与落合正次郎反复交涉，达成事出误会，对死亡日籍伪警及中方阵亡军士，互相抚恤的协议，此事暂告解决。12月8日，关东军再次挑起装甲列车炮击榆关守军司令部及公安局附近的事件，并诡称是遭中国哨兵射击而引起的。为此，何柱国于9、10日先后与日军守备队、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的代表会谈。结果，“我

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1章第1节。

落合正次郎系日本上将落合的儿子，曾充任日本士官学校中华学生队战术教官，熟悉中国情况，认识不少东北军高级将领。

方忍辱，与之以（何柱国）私人名义签定对榆关地方驻军，允取缔排日抗日行为”之协议。至此，炮击事件告一段落。在此期间，日军还通过落合两次向何柱国策反，企图不战而下秦榆，均被何柱国婉言拒绝。日本见诱降何柱国不成，决定制造借口侵占榆关。

面对日军的步步进逼和挑衅，国民党北平军分会于1932年7月命令设置临永警备司令部，任命东北军独立第9旅旅长何柱国兼任司令。管辖临榆、抚宁、昌黎、卢龙、迁安5县和都山设治局；统率步兵第9、第20旅，骑兵第3旅，炮兵第7旅第15团之山炮营及工兵第7营等部队，共约2万人。司令部驻榆关城。此时，榆关前线主力仍为东北军独立步兵第9旅。由于蒋介石实行不抵抗政策和张学良在和战之间摇摆不定，临永警备司令部成立后，虽着手进行滦榆地区防御体系和交通、通讯建设及河川、海岸、物资等调查，但因当地人力物力缺乏，工程进展缓慢。

（二）榆关战斗经过及失利原因和影响

1933年1月1日23时左右，日军守备队长落合经过阴谋策划，在榆关宪兵分遣队和守备队派出所前面，制造了手榴弹爆炸事件。事发后，落合一面派人向何柱国提出抗议，一口咬定系何部所为；一面借机指挥部队向南关和车站进攻，并电关东军和天津驻屯军司令官请援。当晚来攻日军均被中国守军击退。为对付日军的进攻，临永警备司令部立即命令榆关守军步兵第9旅之第626团火速出动，封锁城关四门；第625团以主力位于九门口、石门寨一线，掩护榆关左侧翼；第627团主力位于海阳、秦皇岛一线，掩护榆关右侧翼。令驻抚宁的骑兵第3旅、滦县的步兵第20旅等部，准备待命行动。

2日凌晨1时许，日方向中方提出四项条件，即：（一）南关归日方警戒；（二）撤退南关驻军；（三）撤退南关警察及保安队；（四）撤退城上守兵，并限即时答复。中国方面言称：“俟天明调查真相后，再开始交涉。”3时，日方通知说：“本事件无须调查”，并要求将前所提之第四项条件改为：“将南门开放，门里及城墙上均须归日军警戒。”迫令中方立即承认，“否则即以武力夺取南关。”中方坚决拒绝，当即按原计划配置部队。此时，日军将南关外中国警察缴械，并监视南关公安分局长，双方处于对峙状态。

2日9时，日军守备队30余人用木梯攀登南关城墙，被中国守军击退。10时许，由前卫开来的日步炮兵3000余人，在飞机、火炮和坦克支援下，企图从南门突破。中国守军沉着应战，至17时许，日军不支而去。傍晚，关东军命令步兵第4旅旅长铃木“一并指挥随着事发而准备出动的各部队及由步兵第16旅增派的部队，与山海关守备队协力夺取该地”。

3日10时，日军增援部队加入战斗，在飞机、军舰和坦克的掩护下，向东南城角和南门附近发起重点进攻。中国守军以步机枪、迫击炮和手榴弹顽强抗击。经过激烈争夺，双方互有胜负。至14时，日军发起总攻，炮火更加

临永警备司令部：《榆关抗日战役经过详报》。

日本从中国归国者联络会、新读书社编：《侵略—日本战犯的自由》，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06~108页。

张学良关于山海关事件致宋子文、何应钦、罗文干电，1933年1月3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65页。

猛烈，城内多处起火，东南城角、南门、西南水门均有激战。南门守兵悉数战死，日军坦克趁势闯入。安德馨营长率两个班奋勇堵击。厮杀之中，砍死敌数十人，后因头部中弹，英勇牺牲。同时，东南城角和东北城角亦陷敌手。团长石世安曾多次组织反击，均未奏效，乃率余部于15时由西水门向石河西岸之线撤退。至此，榆关遂被日军占领。4日，日军又攻占五里台，10日，再占九门口。

榆关之战，中国守军第9旅以一团之众不足2000人，与日本陆海空相配合的强敌3000余人激战3日，官兵伤亡过半，人民群众死伤近4000人，毁于炮火的房屋500户以上。

榆关战斗中国守军失利不在于作战不力，而主要是由于国民党政府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临永警备司令部在《榆关抗日战役经过详报》中写道：“自九一八后，迄榆关事变，……榆关驻军无日不在受日军威胁挑衅之中，向乏和战方针之指示，处兹危疑震撼之中，陷于不战、不和、不走之状态。”“一年之余，纠纷时起，与日应付交涉，煞费苦心。盖我如委屈求全，彼则欲望无穷；我如漫为激动，实坠彼谋，穷思年余之内，……经过困难情形，殊难缕指。”这个报告以曲折的语言导出了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恶果。从战场指挥来看，北平军分会的消极防御方针和被动挨打的部署，也是造成失败的重要原因。

尽管榆关战斗只有3天，但在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却占有一定的地位。它是国民党军在华北地区第一次违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以武力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表现了中国爱国官兵守土抗战的精神；它打击了日军不可一世的侵略气焰，振奋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它打响了长城察哈尔抗战的第一枪，揭开了华北抗战的序幕。

二、热河弃守，张学良被迫下野

（参见附图8）

（一）榆关失守后的形势

日军攻占榆关正值国际联盟开会，引起与会各国的反响。美国反对日本扩大战争的行为，苏联也表示不满。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感到“因为牵涉到国际联盟总部，不便对热河实行讨伐”。于是，一面由外相内田向美、英、法、俄、意5国驻日大使声明，事态“不再扩大”，一面加紧侵热准备，等待国联开会结果。日方除了继续制造侵热舆论外，还积极调动军队，进行侵热军事部署。至1933年2月，侵热兵力计有：关东军第6师所属第11、第36旅，骑兵第4旅，第8师所属第4、第16旅，混成第14旅，及关东军铁道、兵站、飞行部队，海军第2遣外舰队，共4万余人；另有伪军张海鹏、刘桂堂、程国瑞、于芒江、李寿山、丁强等部。

为进犯热河，日本关东军于1933年1月28日发出关于作战准备的命令。2月10日，又召集有关各兵团主任会议，宣布进攻计划。2月17日，正式下达进攻命令。这些计划和命令所提出的侵热作战方针是：首先进攻热河东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9页。

北部，把中国军队牵制于热河北部；接着向热河南部进兵，把热河与河北隔断；然后将热境的中国军队压向西面或西南面而聚歼之。具体部署是：第6师以主力由通辽出发，向开鲁、下洼、赤峰及林西、多伦方向进攻，以一部兵力从朝阳寺向建平、赤峰方向进攻。第8师以主力由北票等地出发，占领承德及古北口，“扫荡”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并占领罗文峪、马兰峪等关口。混成第33旅集结于沈阳附近，随时准备开进。关东军飞行队以主力协助第8师，以一部支援第6师作战。海军第2遣外舰队担任山海关、秦皇岛方面的戒备。独立守备队和第10、第14师，分别担任辽、吉、黑方面的守备任务。

日军占领榆关，并步步进逼，准备把战火引向热河的行动，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关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舆论的压力，先后派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等到北平。2月12日，宋子文对北平新闻记者发表谈话表示：“热河为中国整个之一部分，正如广东、江苏省然，攻击热河，不啻攻击首都。日本若实行攻击，则吾人将以全国之力对付之。”18日，宋子文偕张学良到热河视察。在欢迎会上，宋对热河守军说：“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令敌方占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张学良要求大家誓守热河，雪“九·一八”之耻。汤玉麟亦指天划地发誓“矢志守土”。同日，27名华北军将领由张学良领衔从承德发出通电：“时至今日，我实忍无可忍，惟有武力自卫，舍身奋斗，以为救亡图存之计”，呼吁全国一致支援。报纸一时广为宣传，人们曾以为热河从此有望。

根据日军既占榆关，图热益急的情况，北平军分会制订了热河防御计划。其作战方针是：“华北军以捍卫疆土收复失地之目的，务需确保冀热，巩固平津，以为将来进出辽河流域之根据。集中主力于冀、热东部及平津、察南一带，对由河北沿海登陆及自热河方面侵入之敌，预期各个击破之，并乘机东进，向辽西平原转取攻势。”此时，华北军已编成8个军团和1个预备军团。其中直接担任热河防守任务的有第4军团万福麟部所属第53军6个师，第5军团汤玉麟部所属第55军1个师，4个旅，第6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41军3个旅和第63军及挺进军等，共约8万人。对热防御作战的部署是：除第1军团确保津塘、第2军团确保滦东、第3军团确保冀北、第7军团确保察东、第8军团及预备军团集中于北平附近外，在热河境内划凌南、凌源、平泉到承德的公路以南为第1集团军防区；以北为第2集团军防区。前者主要由万福麟率第4军团6个师担任，后者由张作相、汤玉麟分别率第5、第6军团担任。海军以主力担任青岛以北海面警戒；航空队临时分配之。

（二）热河沦陷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71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72~73页。

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85年版，第66页。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99页。

天津《大公报》1933年2月19日。

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华北抗日战纪》第1卷第2章第3节。

日本政府为摆脱国联对其扩大侵略战争的束缚，于1933年2月20日决定了“退出国际联盟的方针。”2月24日，当国联大会以42票赞成、1票反对、1票弃权的绝对多数，通过了日本认为对自己不利的“大会报告书”后，日本政府便于27日正式宣布退出国联。几乎在此同时，日本发动了侵略中国热河战争。2月23日，日本领事上村向中国外交部面交备忘录，要求中国军队撤出热河，否则“难保战局不及于华北方面”。中国政府当即予以拒绝。就在日本施展外交策略的同一天，日军第6、第8师等部及伪军数万人，在飞机、坦克支援下，分三路开始向热河发动总攻：北路指向开鲁、赤峰；中路指向北票、朝阳；南路指向凌南、凌源，以夺取承德为主要作战目标。中国驻热河境内的军队也分三路应战。

开鲁——赤峰方向：日军第6师约万人在伪满军刘桂堂等部配合下，分别向开鲁至朝阳寺一线进犯，然后西取赤峰、全宁等地。中国守军以第5、第6军团共10个旅约5万人迎击日军。23日晨，日军逐次从集结地出发，向预定目标攻击前进。汤玉麟所部驻开鲁的崔兴武第7骑兵旅，刚一接战即向林东溃退（3月上旬投敌）。日军第6师及伪军各一部于24日占开鲁，26日占兴隆地和下洼。第6师主力亦于25~28日，先后到达兴隆地、下洼、朝阳寺集结待命。28日，日军第6师一部向赤峰攻击前进，3月1日抵达赤峰附近。2日拂晓，日军向赤峰发动进攻，孙殿英所部第117旅进行抵抗。战至次日深夜，该旅向化家沟门、猴头沟撤退，日军随即占领赤峰。第6师其他各部亦相继抵达赤峰。4日以后，分兵南进北上。6日占领粮捕府，10日占全宁（乌丹）和围场附近阵地。尔后，主力返回赤峰待命。

朝阳——承德方向：日军第8师及伪军丁强等部由义县向北票、朝阳、凌源方向进犯。中国守军第4、第5军团各一部共3个师、1个旅迎击日军。日军第8师以步兵第4旅为先遣队于2月22日占领北票后，开始向朝阳进攻。汤玉麟所部驻朝阳的第107旅，因原团长邵本良煽动旧部投日，以致稍战即退，日军于25日占领朝阳。3月1日，日军又以步兵第16旅为挺进队，分乘100多辆汽车从朝阳出发，沿着朝阳——凌源——平泉公路前进。当日下午，万福麟所部第130师于叶柏寿附近阻击日军。在日军猛烈攻击下，该部被迫向平泉撤退。2日，日军在迫击中占领凌源后，继续向平泉推进。第130师到平泉与第129师会合后，准备阻击日军前进。但由于万福麟的第4军团已全线动摇，该部也随之向喜峰口撤退。3日下午，日军一部乘汽车向承德追击。汤玉麟闻讯惊慌失措，假说去前线督战，征集大批汽车，满载财宝、鸦片，向天津租界输送。本人亦于4日晨率部离开承德，向滦平逃跑。当日11时50分，日军先头部队128人兵不血刃地侵占了承德。

绥中——凌源方向：日军混成第14旅，于2月27日进至热境白石嘴边门地区，并向驻守在沙帽山附近的万福麟部进攻。守军第119、第108师，利用有利地形进行抗击。战至28日10时，开始全线退却。日军主力继续向凌源方向进犯，3月2日进占凌源。然后转锋南下，一部沿凌源——冷口公路急进，另一部沿章营子——乾沟镇——界岭口前进。万福麟所部第116师在喇嘛洞以北高地与进攻日军进行激战后撤退。日军于3月4日和5日分别占领冷口和茶棚。6日，该部日军向喜峰口方向进攻，其占领冷口和界岭口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81~82页。—250—
罗立干为日领事上村面交《节略》致蒋介石电，1933年2月23日，总统府机要档案。

的任务，由新参战的混成第 33 旅担任。

（三）张学良被迫下野

原来国民党政府曾吹嘘：“热河为北方屏障，且多天险，政府已有准备，至少可守三个月。”结果从日军开始攻热到承德失守，前后不过 10 余天，8 万大军仓惶败走，19.21 万平方公里的锦绣河山沦陷敌手。造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国民党政府死抱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不放。蒋介石对日军进攻热河，虽然没有象“九·一八”那样下达不抵抗命令，还作过一些抵抗的表示，但那只不过是装演门面的。日本侵占东三省后，继续图谋热河已不是什么秘密。但蒋介石并未采取有力措施，只是把华北抗战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蒋介石不调“围剿”红军的几十万部队北上抗日，却乘机企图诱使两广军队参加内战，并派内政部长黄绍竑到广州游说未成。于是以两广部队不参加“剿共”为借口，只调了未参加“剿共”的 3 个师北上应付。但在北上途中，热河已被日军完全占领。在日军进攻热河之际，蒋介石正在江西南昌指挥中央军对中央红军进行第四次“围剿”。由此可见，热河沦陷，蒋介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诚如宋庆龄在热河失陷后所指出的：“对于这种卖国行为谁负责任？是蒋介石政府。为什么？这个政府用它的主要军队打中国的人民；它任用叛逆的将领，还坚决不肯撤换他们；并且它不肯武装人民，不肯组织义勇军来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战争。”又说：“蒋介石政府所宣传的对日本的‘长期抵抗’，已经不能再遮掩他们的背叛、怯懦与不抵抗了。”当然，热河省主席兼驻军司令汤玉麟和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张学良，对热河沦陷也有自己的责任。因此，受到谴责是理所当然的。

热河沦陷后，举国一致谴责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及张学良。3 月 7 日，南京政府监察院高一涵等 6 名委员，对失职者提出弹劾案。蒋介石为平息众怒，防火烧身，又把失地的责任完全推给张学良。张学良被迫于 3 月 8 日向国民党政府引咎辞职。3 月 9 日，蒋介石借宋子文约张学良到保定车站蒋的专车上会晤。蒋安抚张学良，劝他辞职，待机再起。就这样，张学良便作了蒋介石的替罪羊，于 11 日正式通电下野。

12 日，国民党政府发布准张学良辞职及派何应钦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的命令。张学良于当日飞沪，所留东北军改编为 4 个军，由于学忠、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分别任军长，归北平军分会指挥。蒋介石既转嫁了热河弃守的主要责任，又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东北军的直接控制。

中国现代史资料编委会：《从“九一八”到“七七”国民党的投降政策与人民的抗战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版，第 11 页。

宋庆龄：《为新中国奋斗》，人民出版社，1952 年版，第 56～57 页。

第三节 长城抗战及其失败

一、热河沦陷后的中日两军态势

在热河、河北之交的长城沿线的古北口、喜峰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隘口，是热河通往河北和平津的咽喉，地形险要，易守难攻。1933年2月10日，日本关东军在下达进攻热河的命令时，就要求所部不失时机地占领界岭口、冷口、喜峰口、古北口、罗文峪、马兰峪等长城主要隘口。同年3月4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分兵向长城各口推进。参战兵力共有两个师、两个混成旅和飞行队等，共约8万人，另有伪满军数万人配合。其战斗序列如下：

关东军司令官 武藤信义上将 参谋长 小矶国昭中将

第6师师长 板本政右卫门中将

步兵第11旅 旅长松田国三少将

步兵第36旅 旅长高田美名少将

骑兵第4旅旅长 茂木谦之助少将

师直属队

第8师师长 西义一中将

步兵第4旅旅长 铃木美通少将

步兵第16旅旅长 川原侃少将

骑兵第3旅旅长 饭田固真少将

师直属队

混成第33旅旅长 中村馨少将

混成第14旅旅长 服部兵次郎少将

关东军飞行队队长 牧野正迫上校

伪满军张海鹏、刘桂堂、李寿山、程国瑞、邵本良、丁强等部

日军侵犯长城的部署是：以第8师主力、混成第14旅、混成第33旅、骑兵第4旅，在伪军张海鹏等部配合下，分别由承德、凌源、绥中等地向古北口、喜峰口、义院口等处进犯。日军指挥官为关东军司令官武藤信义。至1933年3月上旬，各路日军已先后抵达长城各主要关口附近，与中国由热河退至宽城以南地区的第4军团、古北口地区的第6军团等部形成对峙。

何应钦代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后，以黄绍竑为参谋长，秉承蒋介石“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既定政策，沿长城线布防，企图阻止日军前进。为此调整了战斗序列和部署。至1933年3月15日，编成滦东长城战斗序列如下：

总司令：蒋介石 由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代理

第1军团 总指挥 于学忠

第51军军长 于学忠（兼） 步兵第111师（董英斌），第113师（李振唐），第114师（陈贵群），第118师（杜绳武），骑兵第1师（张诚德），炮6旅

第2军团 总指挥 商震

第32军军长 商震（兼） 步兵第84师（高桂滋），第139师（黄光华），第141师（高鸿文），第143师（李杏村），骑兵第4师（郭希鹏）

第57军军长 何柱国 步兵第109师（何柱国），第115师（姚东藩），第120师（常经武），骑3师（王奇峰）

第3军团 总指挥 宋哲元

第 29 军军长 宋哲元(兼) 步兵第 37 师(冯治安),第 38 师(张自忠),暂 2 师(刘汝明)

第 40 军军长 庞炳勋 步兵第 39 师(庞炳勋),骑 5 师(李福和)

第 4 军团 总指挥 万福麟

第 53 军军长万福麟(兼)步兵 106 师(沈克),第 108 师(杨正治),第 110 师(何立中),第 116 师(纓澄流),第 119 师(孙德荃),第 129 师(周福成),第 130 师(朱鸿勋),骑 2 师(黄显声),炮 7 旅

第 6 军团 总指挥 张作相

第 63 军军长 冯占海 步兵第 91 师(3 个旅),该军为义勇军改编

第 41 军军长 孙殿英 步兵第 117 旅(丁练庭),第 118 旅(刘月亭),第 119 旅(邢顶筹)。该军 5 月中编为第 9 军团

第 7 军团 总指挥 傅作义

第 59 军军长 傅作义(兼) 步兵 3 个旅

骑兵第 1 军军长 赵承绶 骑兵两个旅

第 8 军团 总指挥 杨杰

第 17 军军长 徐庭瑶 步兵第 2 师(黄杰),第 25 师(关麟征),第 83 师(刘勘),骑 1 旅

第 26 军军长 萧之楚 步兵第 44 师(萧之楚),独 4 旅

第 67 军军长 王以哲 第 107 师(张政仿),第 112 师(张廷枢),第 117 师(翁照垣),炮 8 旅

5 月 15 日后,第 8 军团撤销,第 26 军交第 2 军团,第 67 军交第 4 军团,第 17 军由军分会直辖。

以上合计 7 个军团,13 个军(含骑兵军 1),36 个师(含骑兵师 6),15 个旅(含骑兵旅 2,炮兵旅 3),及各军师直属部队,共约 25 万人。其部署是:以第 1 军团于学忠部所属第 51 军防守天津、大沽及警备津浦铁路;以第 2 军团商震部所属第 32 军、第 57 军担任滦河以东和冷口附近的防务;以第 4 军团万福麟部所属第 53 军在原驻地整理,并以 3 个师协助第 57 军固守冷口以东长城要隘;以第 3 军团宋哲元部所属第 29 军和第 40 军负责喜峰口、马兰峪方向之防御;以第 8 军团杨杰部所属第 17 军、第 26 军和第 67 军,担任古北口方面作战;以第 6 军团张作相部所属第 41 军和第 7 军团傅作义部所属第 59 军及骑兵第 1 军,担任察东的防务。原由退入热河的义勇军改编的第 6 军团第 63 军冯占海部大部被裁减和整编;原第 5 军团汤玉麟部于热河溃败后,残部退至察东沽源一带。

二、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的鏖战

(参见附图 9、10)

热河弃守后,日军继续向长城东段各口及其附近的冀东和察东进犯,中国以地方军为主的华北部队对日军进行了不同程度的抵抗。在历时 80 余天(1933 年 3 月 5 日至 5 月 25 日)的奋战中,大体可分为三个阶段: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 年版,第 584~585 页。

《抗战胜利四十周年论文集》(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6 年版,第 584~585 页。

（一）长城东段各隘口的争夺战

第1阶段自3月5日开始，退至长城附近的东北部队在华北部队的支援下，于主要关口与进攻的日军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直至3月底。

冷口、界岭口战斗

在冷口方向，担任防御任务的是第32军商震所部。商震派第139师到第一线作战，其余两个师和军部驻在远离长城线的开平。

1933年3月4日，日军混成第14旅先遣队侵入冷口。3月6日，第139师反攻并收复了冷口。接着该师调整部署，加强了冷口北部的防御阵地。3月19日以后，日军再次猛攻冷口北部139师阵地。该师与敌苦战，并不时组织反击。经过反复争夺，终将日军逐至口外10余公里的马道沟、肖家营子一带地区，并对峙至月底。

界岭口为第4军团第116师缪澄流部防地。1933年3月12日，日军混成第33旅由绥中进到界岭口附近后，即准备向界岭口进攻。

16日拂晓，日军开始攻击。守军第116师稍事抵抗后即后撤，日军迫至长城内郭家厂、石家沟一带，尔后退守界岭口。

17日，第116师组织反击，占领了界岭口两侧长城上的敌楼，并从正面逼近敌人。日军混成第33旅于24日拂晓复攻界岭口，守军再度后撤，日军又进到郭家厂和468高地一线，然后再退回长城沿线。此后，两军处于相持状态。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

喜峰口、罗文峪，系平东通往热东的交通孔道，群峰耸立，地形险要。按照北平军分会的部署，第29军宋哲元部担任城岭子口，经董家口、喜峰口、罗文峪至马兰峪之线的防御任务。该部令第37师以三屯营为中心，防守城岭子至潘家口一线；令第38师以遵化为中心，防守龙井关至马兰峪一线；令暂编第2师由玉田向平安镇及东新庄镇集结待命。1933年3月9日下午，第29军先头部队刚到喜峰口，日军混成第14旅一部追击万福麟部至此，并占领了口门。

——第29军立即以一个团投入战斗，才暂时稳住了口上的战局。

3月10日晨，第29军主力先后到达滦阳城（今迁西西北）。此时，防守喜峰口的万福麟部正在日军混成第14旅主力压迫下后撤。第29军立即接防喜峰口，并阻击进犯的日军。10至11日，第29军与进攻喜峰口两侧阵地的日军展开肉搏战，几处高地，失而复得，来回拉锯，争夺激烈。由于该军士兵手持大刀与日军短兵相接，胶成一团，使日军的飞机、人炮无法发挥作用。双方伤亡惨重。日军混成第14旅首次遇到劲敌，遂以一部确保喜峰口，主力则集中在长城北侧待机。

11日夜，第29军决定乘日军疲惫之际，采取迂回夜袭战术打击敌人。于是，令赵登禹旅长（带伤）率两个团为一路，从左翼出潘家口，绕至敌右侧背，攻击喜峰口西侧高地之日军；令佟泽光旅长率另外两个团为另一路，从右翼经软门关出董家口，绕攻敌左侧背，攻击喜峰口东侧高地之日军；令王治邦旅长担任正面防御，待左右两路打响后，即从正面出击。当夜，赵旅官兵身背大刀，在夜暗中踏雪前进。

12日拂晓，分别抵达北山土、三家子日军骑兵阵地和蔡家峪、白台子炮

兵阵地。官兵们趁日军熟睡之机，手持大刀猛砍、猛杀，并将日军阵地的火饱和辎重、粮秣，炸毁、烧尽。驻老婆山日军闻讯后，立即赶来救援。于是双方在夜暗中混战。这时，从右翼出击的佟泽光旅赶来增援；担任正面策应任务的王治邦旅也开始猛攻喜峰口东北高地。在赵、佟二旅合击下，终于将日军击退。夜袭部队由原路胜利返回。此战毙伤日军六七百人，打死日军植田支队长，破坏野炮 18 门；29 军亦伤亡副团长以下军官 14 人。日军受到这次打击后，暂时停止了对喜峰口附近的攻击。此后，除增调鲶江、嵯峨两支部队于 18 日黄昏攻击并占领潘家口外，主要是把守潘家口、喜峰口、铁门关、董家口等关口，与第 29 军对峙。

日军在喜峰口受挫后，急调第 8 师步兵第 4 旅和骑兵第 3 旅各一部，在部分伪军协同下，向罗文峪发动进攻，企图威胁第 29 军喜峰口阵地的左后方。防守该处的是第 29 军暂编第 2 师刘汝明部。3 月 16 日拂晓，日军企图夺取罗文峪之三岔口高地，守军以一个团跑步绕出黄崖口，截击敌人，将其击退。

17 日 8 时，日军在飞机和炮兵支援下，大举进攻罗文峪、山渣峪和沙宝峪。守军诱敌迫近，肉搏冲锋，战斗竟日，日军向鹰手营子退去。18 日晨，日军再次猛攻上述阵地。守军依托城墙、碉楼，顽强抵抗。日军在猛烈炮火支援下，反复向守军冲击，战士们待日军接近时，抽出大刀，跃出阵地与敌肉搏，战至傍晚，将其击退。是夜，守军以一个团由沙室峪绕攻日军侧背；另一个团由左翼绕攻其后；正面守军也全线出击。战至天明，日军撤至梅花峪、古山子一带。至此，罗文峪北 5 公里内，已无敌踪。

喜峰口、罗文峪战斗，打出了中国军队的威风，“振奋了全国的人心”，“大刀队的威名几乎把现代化的精良火器都掩盖了”。日本报纸也评论说，日军这次失败丧尽了“皇军名誉”。

古北口附近的战斗

古北口是由承德到北平最近的关口，为平北之门户，地势险要，易守难攻。1933 年 3 月 4 日，日军占领承德后，即以第 8 师主力向占北口方向追击。东北军王以哲部第 107 师，在古北口外的老虎山和黄土梁一带，与追击日军激战两昼夜后于 3 月 9 日撤至关内。王以哲急调第 112 师沿长城以北布防，并准备与中央军第 17 军共同防御占北口。此时尾追第 107 师的日军已进抵长城附近。第 17 军第 25 师关麟征部于 3 月 10 日 4 时抵达古北口。王以哲即令第 112 师防守占北口长城第 1 线；令第 25 师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并向前延伸，是为第 2 道防线。第 25 师受领任务后，即以第 73 旅占领古北口南城东西两侧高地及龙儿峪阵地，并加紧构筑工事。

10 日 15 时，第 25 师刚部署完毕，日军第 8 师一部即在炮火掩护下，作宽正面的试探性进攻，数小时后退回原线。第 25 师连夜调整部署，令第 73 旅加强龙儿峪之线，令第 75 旅（欠一个团）集结于古北口东北地域，准备迎击日军的大规模进攻。

11 日拂晓，日军第 8 师主力，在炮兵火力掩护下，开始向守军发起进攻。防守古北口正面的第 112 师未尽力抵抗即放弃了第 1 线阵地，日军迅速占领古北关口，并乘胜向守军第 25 师右翼龙儿峪阵地包围攻击。驻守该地的第

《文史资料选辑》第 14 辑，中华书局，1961 年版，第 8 页。

南京国民政府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资料。

73 旅伤亡严重，联络中断。师长关麟征指挥第 75 旅主力驰援该团，将敌击退，并恢复了联系。

12 日晨 5 时许，日军在飞机和火炮支援下，对守军阵地再次发起攻击。主力指向龙儿峪阵地，并以大部兵力向右翼延伸包围，战况更为激烈。战至 15 时，守军大部不支，被迫后撤。12 日夜，撤下的第 25 师部队重新整理后，在南天门及其左右占领阵地。13 日，第 17 军令第 25 师撤至密云整补，其防务由第 2 师接替。日军占领古北口后，未再进行追击。

长城抗战第一阶段 20 多天的作战，不仅给目空一切的日本侵略者以沉重打击，而且鼓舞了中国的士气、民心。但由于此时蒋介石国民党的总方针是“攘外必先安内”，“剿共”重于抗日。他们把长城抗战不过只是当作应付舆论，争取和谈妥协的权宜之计。到 3 月底，不仅未采取发展胜利的措施，相反，经蒋汪南京会商后，开始筹划对日谈判，导致长城战局向不利方面转化。

（二）长城东段南侧的作战

1933 年 3 月底至 5 月初为战役第 2 阶段。日军进攻长城受阻后，改取侧后包抄战术。在长城东段南侧的滦东和南天门交替发动进攻，威胁中国守军的侧背。同时，配合板垣征四郎在平津地区的策反工作。

3 月 27 日，日本关东军发布第 491 号命令，决定“军主力重新转向积极作战”，越过长城线，向滦东地区进攻。其部署：令第 6 师主力向冷口附近守军第 32 军商震部进攻；令独立守备队之岩田支队进攻石门寨附近之第 57 军何柱国部；令混成第 33 旅向界岭口第 53 军杨正治部攻击；令第 8 师一部佯攻古北口和喜峰口；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上述作战。3 月 31 日晨 4 时，日军砂田部队和岩田支队在伪靖安军的配合下，由九门口、义院口向石门寨进犯。4 月 1 日，日军占领石门寨。守军何柱国部退守海阳、秦皇岛。4 月 6 日，何应钦调第 67 军王以哲部由平北东进，支援滦东国民党军作战。4 月 9 日，日军第 6 师主力在混成第 14、第 33 旅各一部配合下，连续猛攻冷口。至 11 日，商震部防线被突破，全军退至滦河右岸，日军占领建昌营和迁安。由于冷口失陷，冷口两侧的中国守军腹背受到威胁，被迫后撤。4 月 11 日～14 日，在日军分路猛烈进攻下，驻守界岭口之第 53 军杨正治部和驻守喜峰口的宋哲元部，以及何柱国部和王以哲部，均先后奉命向滦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至 17 日，全部占领了滦东地区。

日军越过长城，占领滦东，威胁开滦煤矿，英国曾向日本提出警告。日本天皇唯恐越过长城线引起国际纠纷，于 4 月 19 日责成参谋副团长真崎甚三郎令关东军撤出滦东。4 月 20 日，关东军密令第 6 师于 21 日前逐次从滦东撤回长城线，但仍“要保持威胁华北反抗势力的态势”。日军入侵滦东的目的除了迂回中国守军侧背，突破长城线外，就是策应华北的“谋略”工作。早在关东军开始进攻热河时，沈阳特务机关长板垣征四郎即奉东京参谋部密令，担任华北策动国民党政府内变的工作。板垣奉命到天津后，立即组织了特务机关，直接受东京参谋部指挥。在热河、长城抗战期间，板垣曾先后策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 2 卷，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 93 页。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 2 卷，中华书局，1982 年版，第 99 页。

动段棋瑞、吴佩孚和孙传芳等老军阀，都未得手。最后才选定了早年任过湖南督军的张敬尧以及郝鹏举、石友三等人。张特别受到板垣的赏识，并得到银元30万。4月18日，板垣密电关东军称：张敬尧准备4月21日在北平起事，请关东军加紧向南进攻，以策应张之内变。就在日本军方大喊大叫从滦东撤军表示不再越过长城线的同时，关东军为配合板垣的策反行动，命令第8师采取一切手段“对古北口以南地区之敌进行攻击”。4月20日夜，日军第8师攻占了甫天门左侧制高点八道楼子。中国守军第2师曾组织几次反攻，均未奏效。

23日至25日，日军利用八道楼子瞰制的有利条件，以陆空协同向南天门阵地中央据点421高地数次发动猛攻，均被第2师击退。由于连日苦战，第2师伤亡严重，其防御阵地由第83师接替。26日拂晓，日军在飞机、火炮支援下，继续向421主阵地猛攻。第83师战至下午，因伤亡过大，遂将该主阵地放弃。

28日5时，日军乘势再向南天门右侧高地进攻。第83师激战竟日后，即奉命向新开岭转移，南天门乃被日军完全占领。为策应古北口之战，中国方面曾以北上的中央军第26军萧之楚部（由第44师扩编而成），于4月27日向兴隆出击，后因新开岭战斗告急而撤出。与此同时，日军还纠集伪军刘桂堂、李寿山、崔兴武等部万余人，进犯察东多伦。守军骑兵第1军赵承绶部被迫于4月28日退往沽源。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对日作战甚为消极。3月24日，蒋介石在北平对华北高级将领说：“只能以现有的兵力，尽力抵抗，调兵增援是无法办到的。”

随后，他在南昌“剿共”总部的一次讲演中又说：“如果我们以现在所有的部队，统统加到长城一带阵线上去求决战，这一决战下来，当然是我们失败！”

为拒绝增兵长城制造理论根据。4月上、中旬，第17军在古北口以南与日军对峙期间，各师曾自发组织别动队，迂回敌后袭击敌人。何应钦得知后，竟责备了有关师长。4月26日，何应钦召开北平军分会会议，讨论滦东日军撤走后的防务，决定“不轻易推进”，并决定整饬河北省境内的义勇军，实际上是要取消义勇军，限制人民的抗日活动。

4月下旬，板垣征四郎向东京总部上报张敬尧准备于4月21日发难后，又相继上报了张作相定于4月26~27日联络滦东的东北军起事，张廷枢、孙殿英、冯占海等，也将在几天内行动。可是时过半月，板垣的计划都落了空，不久张敬尧也被人暗杀了。东京参谋部和关东军看到板垣策反无望，决定再次扩大战事。

（三）长城以南冀东的作战

战役第3阶段起于1933年5月上旬，止于当月25日。5月2日，关东军参谋长小矶国昭在东京与参谋部、陆军省制定了沿长城作战，“以迫和为主，内变策动为从”的关内作战方案，经天皇批准后带回长春。据此，关东军司令官于5月3日下达入侵关内的作战命令，决定给中国守军以所谓“致

〔日〕参谋部：《清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99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2页。

蒋介石在南昌“剿共”总部的讲演，1933年4月12日。

命打击，挫折其挑战意志”。令第8师继续在西线实行攻击，直至石匣镇附近，特别要“尽力消灭中央军”；令第6师以一部占领永平（卢龙）、迁安一带，控制滦东，以主力向迁安以北地区进攻；令第14师和独立守备队各抽一部兵力组成一个支队加强第6师；令混成第14旅攻击当面中国守军；令关东军飞行队协助以上作战。5月6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方案》提出：这次用兵的目的是继续使用武力，压迫华北当局屈服或造成华北军队的分裂。至于夺取平津的事，应该继续让天津特务机关去进行“内部策动”。假如内变不能如期得手，关东军应在有利条件和时机下，从速和中国当局订立一个停战协定。

根据关东军司令官的命令，日军第6、第8师于5月上旬再次越过长城从东、西两线向关内冀东地区发动大规模进攻。5月7日，东线日军第6师所属各部，分别从山海关、石门寨、抬头营、建昌营等地出发，在飞机、坦克、火炮掩护下，分数路向4月下旬日军撤出滦东后返回该地区的中国守军发动攻击：一路沿平榆公路西攻抚宁；一路由界岭口附近向五达营前进；一路由建昌营直扑迁安。中国守军对日军的总攻，缺乏充分准备和有力措施。5月9日，日军凭借优势火力，占领了抚宁、迁安、卢龙等地，然后集结于建昌营、吴庄附近地区，准备渡过滦河西进。中国守军何柱国、王以哲部西撤，滦东再次失陷。5月12日，日军第6师及混成第14旅分别渡过滦河后，即以主力向丰润追击；以一部向遵化前进；以伪军5000人攻滦县。13日，第4军团总指挥万福麟令何柱国、王以哲部向唐山、丰润以西之线撤退。日军跟踪追击。15日，何应钦令万福麟、何柱国、王以哲部撤至宁河、宝坻一线；宋哲元部撤至三河、平谷以东地区。当日，日军得到中国守军向西撤退的情报后，即令第8师“不要迟疑，继续攻击”；令第6师占领丰润、遵化后，迫使中国守军西退。17日，日军又决定“扫荡”密云、平谷、蓟运河以东的中国军队。由于中国守军节节撤退，进攻滦西的日军如入无人之地。至22日，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日军第6师全部推进到蓟运河一线。

当日军第6师在滦东、滦西对中国守军发动进攻的同时，在西线的日军第8师主力亦于5月10日向新开岭地区的中国守军第17军发动攻击。该军第83师和第2师轮番与日军激战。至13日，第17军奉命经密云向怀柔和顺义以西之线撤退。日军尾追其后，于19日占领密云城。正当日军向怀柔、顺义追击的时候，中国守军第59军傅作义部，由昌平侧击怀柔、顺义两地区的日军未果，乃退守该两县以北地区。

日军为了以更苛刻的条件逼迫北平当局与之缔结城下之盟，于5月20日决定加紧追击中国守军。

22日，中国守军奉命退至平津城郊组织防御。至23、24日，日军第6、第8师各一部突破三河、宁河防线，陷香河、怀柔、宁河后，进逼通县、顺义，对北平形成了三面包围之势。北平城内一片混乱。华北军事当局也准备南逃保定。此时，日本政府认为停战的有利时机已到，遂提出举行谈判，国民党政府心甘展辱妥协，接受日方条件，于5月25日开始停战，两军对峙于平津与平榆大道之间。据日本参谋部统计：连同热河作战在内共死伤日军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第1982年版，第102~103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4~515页。

2400人。其中关内作战死163人，伤838人。

三、长城抗战的影响与教训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国民党军队在华北所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作出了重大牺牲。据第17、第29、第32、第53、第67五个军的统计，伤亡就达18325人。长城抗战虽然最后失败了，但它在全中国乃至世界人民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长城抗战前段的一些胜利说明，中国爱国军队在全国人民要求抗日的呼声下，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的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不可轻视。在长城抗战中，中国军队的武器远不如日军。如第29军开往前线1.5万人，所携武器中汉阳造步枪和毛瑟枪各占1/3，还有一些是土造枪，步枪没有刺刀，士兵背的是大刀，全军仅有野炮、山炮10几门，重机枪不过百挺，轻机枪每连只有两挺。但他们敢以劣势武器同日军搏斗，以“夜战近战策略，使敌之大炮（及）一切武器无所逞其能”，终于取得了胜利，给不可一世的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1933年3月19日天津《益世报》评论说：“在此以前，许多领袖们，文的领袖们，武的领袖们，都要我们相信，中国目前要想反对日本，恢复失地，是件绝对不可能的事。喜峰口一般英雄，又证明这个不可能实为可能。……喜峰口几次胜仗，又证明收复失地，不是能不能做的问题，是肯不肯做的问题；不是有没有科学器械的问题，是有没有忠勇的问题。”北平《世界日报》在3月22日的社评中也指出喜峰口之战说明：“中国陆军之战斗力，中国民族之自卫力，于十九路军之后，又得到新的有力证明。”

长城抗战最后失败并非偶然。热河失陷、长城危急，全国上下所表现出来的愤怒情绪，迫使蒋介石不得不采取一些应付措施，但他并没有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主义的总方针。所以，当日军进攻长城受挫后，他不是乘势收复失地，而是散布“调兵增援无法办到”，全力抗战“当然我们失败”的论调，迫不及待地与汪精卫密商，作出对内加紧“剿共”，对日谋求停战的决策；并且匆匆跑到江西指挥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宣称“我们的敌人不是倭寇而是土匪（对红军诬称）”，“剿共”第一，抗日第二，谁“再以北上抗日请命”，就“立斩无赦”；对长城苦战的官兵则给以打击。4月下旬，第17军还在南天门与日军苦战，蒋介石却密电何应钦：“连日苦战不停，……殊属不宜，似应相当隔离，俾便得暂整理。”随后，何应钦下令南天门守军撤至九松山一带。正是由于蒋介石的这条不抵抗路线，导致了长城抗战的失败。

长城抗战的事实再一次说明，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她有抵御外来侵略的光荣传统。在民族危机日益严重的关头，不仅广大人民群众，就连国民

关东军参谋本部作战机密日志，关东军作命令第473号。

〔日〕参谋部：《满洲事变作战经过概要》第2卷，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14～115页。

国民党军史研究编纂会编：《抗战胜利40周年论文集》（上），台北1986年版，第565页。

宋哲元招待报界报告克敌详情演词，1933年3月20日。

蒋介石致黄绍坎何应钦密电，1933年5月6日。

党内也有许多爱国官兵，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惜抛头颅，洒热血，这是能够战胜强敌的力量所在。但是人民群众和国民党爱国军队的抗日热情和行动，却受到国民党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扼杀。蒋介石集团所实行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抵抗政策不改变，抗日救国、不丧失领土主权，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第四节 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

一、国民党政府屈辱求和

早在日军向长城东段各口进攻初期，蒋介石为了集中全力实现“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计划，就开始同汪精卫密谋与日妥协。4月11日，正当日军大举进犯滦东之际，蒋介石就想通过调停实现停战，拟委任在上海的前外交部长、老亲日派黄郛主持华北政务，特电邀黄到南昌晤谈。黄于18日复电说：考虑结果，委实不能轻决，但平津存亡，间不容发。

19日，黄郛、张群、陈仪在上海与日本陆军助理武官根本博开始接触。与此相呼应，何应钦也在北平约请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往访英国驻华公使兰浦森，希望英、美出面调停。兰浦森以“一·二八”调停曾引起中国人“误解”为由，主张谨慎从事。后何应钦请示蒋介石、汪精卫。汪复电表示：感激各国调停上海抗战；同意谈判只限于军事，不涉及东三省等政治问题；派外交部次长刘崇杰为中国官方代表。兰浦森把这些意见报告伦敦，又告美驻华公使詹森转报华盛顿，并与日本驻华代办中山详一会谈。4月26日，刘崇杰在北平会晤英使兰浦森，指望友邦自动出来调停。兰答：各国劝阻日军行动一事，目前恐怕很难办到。5月13日，刘崇杰由北平上电蒋介石，谈及英、美和国联对日军威胁平津，均持消极态度。尽管如此，南京政府仍不死心。5月21日，刘崇杰又去拜会英使兰浦森，再次希望他出来调停。兰浦森要求中国把停战办法用书面提出来，再电伦敦向东京军部商洽，结果又落了空。

指望第三国调停不成，蒋汪便抛弃所谓“不与日本直接谈判”的誓言，乘日军滦东撤兵之机，暗中密谋与日本直接谈判。在4月19日黄郛与日本武官根本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军政部次长陈仪于4月27日向根本博转达了何应钦关于中日停战谈判的意见。根本博暗示滦东撤军是中国商请停战的好机会，并提出只要中国军队解除对兴隆日军的包围，并从南天门撤至开平、玉田、顺义一线，停战就有希望。29日，何应钦通过陈仪答复根本博：可以进行停战接洽，并同意日方提出的条件。但关东军却电告根本博说：南天门是日军战斗所得，不能作为停战条件。如果中国军队能够自动撤至密云、平谷、玉田、滦河右岸，日军可以缓和攻势。日军得寸进尺，给接洽造成了新的障碍。

此时，已在华北窥视许久的天津特务机关头目板垣征四郎和驻北平陆军助理武官永津佐比重，看清了南京政府的致命弱点，乃坚决反对停战。板垣于4月30日以抗议的口吻致电关东军司令部称：现在风传日本将与国民政府妥协，以致反中央的活动受到极大影响。5月2日，永津密电关东军说：华北中国军队派别分歧，军心不稳。只要全力攻下密云，并派飞机到北平、通州一带示威，中国军队就会被迫撤退。关东军接到报告后，决定接受永津条陈，并请东京参谋部修改行动计划。东京参谋部于5月6日命令关东军在长城地区对中国军队反复进行彻底打击，造成华北当局“实质性的屈服或分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4月22日。

刘崇杰致罗文于电，1933年4月25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刘崇杰致蒋介石电，1933年5月13日，引自蒋介石致黄郛电，1933年5月15日。

裂”。随即开始了关东军对中国关内新的侵略行动。

正当永津、板垣阻止停战谈判，日军准备进犯关内时，汪精卫和黄郭到南昌行营与蒋介石密商，决定5月3日设置以亲日派黄郭为委员长的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以打破谈判僵局。由于黄郭在上海与东京方面派来的人进行了秘密接洽，得知日本欢迎他出面办理华北交涉的底蕴，因而欣然受命。5月6日，日武官根本博在上海晤见黄郭。以华军在“前线仍时有局部之挑战行动”为借口，向黄示意“关东军决心再次出击”。黄即电陈仪称：“前线步骤参差，致因局部而牵涉全线，引敌并进，将无止境。”瞩陈密告汪精卫“严密注意，妥为纠正”。5月7日，黄郭与根本博会晤，探询关东军的真意。5月11日，何应钦、黄绍竑密电汪精卫，要求由黄郭或陈仪与日方商谈，“在双方默契之下，以整理战线为言，指定某一战线为双方同时撤退地区。”同时密电黄郭，要求其在上海与日方接洽，“寻得和平途径”。5月12日，黄郭再次询问根本博：如中国军队愿意：

自新开岭撤退到密云，日军是否不再追击？关东军电告根本博说：决无进至平津之意，但务盼华军能撤至日军守备区域炮程不及之地点为要。同日，黄郭电何应钦等，报告连日在沪与日方接洽情形，推测日军必进至密云，建议“大胆下一决心，用极速度撤至密云后方约二十里炮程不及之地如牛栏山一带从事整理”，则“对外之运用较为便利”。“若能就近再与永津接洽，更可不失时机”。5月14

日，黄郭第三次面见根本博，转告何应钦同意18日前将部队撤至密云、平谷、玉田、蓟县、唐山一线，并要日方保证停止进逼。黄郭在上海与日达成口头妥协后，于5月15日从上海到南京，准备北上与日方正式会谈。

在黄郭北上途中，何应钦根据黄郭12日的建议，于15、16两日指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在北平连续三次与永津武官晤谈。第一次，熊斌表示中国可退至顺义，但不撤出密云；第二次，永津要中国军队撤至芦台、宝坻；第三次，熊斌让步，表示同意永津的要求，只是希望日军不要追击。永津看破中国军心不稳，立刻电告关东军迅速攻取密云等县，施加更大的压力。当黄郭抵达北平时，日军连连得手，已不满足于在上海的谈判要求，准备提出更苛刻的停战条件。

5月17日，东京参谋部下达了《停战善后处理方案》，提出了“利用华北方面的战局正有利进展的状况，因势利导，使敌人不得已提议停战”的方针，规定了停战谈判的条件、地点和对手等项。18日，又下达了《指导华北方面停战要领》，指定关东军为签订停战协定的当事人；令永津在关东军指导下担任接洽停战的任务；并对日军追击范围和中国军队撤退线作了规定。日军为了造成有利的谈判形势，逼迫国民党政府求和，乃加紧向中国守军进攻。21日陷香河，其前锋已到离北平东面通县只有7公里的地方，北平危急。是日午夜，汪精卫致电北平当局，表示“我军应付方案，政府实难遥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64年东京版，第515页。

黄郭致陈仪电，1933年5月6日。

何应钦、黄绍竑致汪精卫电，何应钦致黄郭电，1933年5月11日。

黄郭复张群、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5月12日。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6页。

制”，授权何应钦、黄绍竑、黄郛“便宜处置”。据此，何应钦准备经良乡南逃保定。黄郛也打算随何南下。其实，当时日军也看到自己的“军事行动已经到达极限”，“较中国军队远为劣势的关东军，战斗力殆已用尽，因此，必须乘胜于最短时间内导致停战。唯恐中国军队以反击的余裕。”而且，作战目的已经达到。5月22日，武藤根据东京的指示电告永津武官，令他接洽停战。其停战条件为：（一）中国军队从速撤至延庆、顺义、室坨、宁河、芦台线之西、之南，此后不得越线前进。（二）中国军队照线退却，日军不迫击。（三）日方如确认第一项实行后，自动撤退到长城线。并嘱咐永津不必坚持中国派军使阵前求和。

5月22日晚11时，日本海军武官藤原喜代间约黄郛到丁香胡同藤原宿舍会谈。正面对危急局势一筹莫展的黄郛，立即携其秘书李择一前往与永津会谈。至次晨4时半，黄郛完全接受了日方所开列的四项条件和三步停战办法。永津提出的四项条件比武藤提出的三项条款更为苛刻，增加了“今后不准有一切之挑战行为”及阵前求和等内容。三步办法是：（一）中国派军使到密云日军司令部申请停战；（二）签订停战备忘录；（三）正式签订停战协定。这些条件和办法显然是对中国不利，特别是“申请”停战就意味着请降。但国民党政府为了停战，已顾不上这些。

23日，何应钦、黄绍竑、张群决定按照日方要求，先派军分会参谋徐燕谋（徐祖诒）前往密云接洽停战。同时将日方条件电告蒋介石和汪精卫。汪精卫立即回电称：“弟决同负责，请坚决进行为要。”24日，蒋介石回电说：“事已至此，委曲求全，原非得已，中正自当负责。唯停战而形诸文字，总以为不妥。”同日，南京国防会议也决定：“与对方商洽停战，以不用文字规定为原则。如万不得已，只可作为军事协定，不涉政治，其条件须经中央核准”。汪精卫将此决定电告何、黄（郛），并说明“此为中央自负责任。”

二、缔结塘沽城下之盟

5月25日，按照日方提出的三步屈辱停战办法，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前往密云日本关东军第8师司令部请求停战，即所谓“阵前求和”。日军第8师师长西义一让徐燕谋签订请求停战的所谓《觉书》（即备忘录）。《觉书》列出5条：（一）对于徐燕谋的停战申请受诺之。（二）贵军应撤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坨、林亭口、宁河、芦台以西、以南之线，此后不再越该线，亦不得有挑战之行为。（三）日军为认识对方诚意，得随时派遣飞机及必要人员，视察中国军之撤退情况，中国应予以保护及便利。（四）上列各款确立后，由关东军司令与北平军分会代委员长各派全权代表在北宁路某一地点会合，提出正式委任状，经相互承认后订立停战协定。（五）迄至成文协定成立，以中国军不挑战为限，日本军不向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电，1933年5月21日。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37页。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电，1933年5月23日。

蒋介石致何应钦、黄绍竑、黄郛电，1933年5月24日。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4日。

中国军撤退线追击。对上述条款，徐燕谋仅对第三项提出异议，认为含有侮辱之意。日方只是答应另立“觉书”时，将“派遣人员”改为“用其他方法”了事，显然原意未变。徐燕谋在这份文件上签字后，于当日返回北平。

何应钦、黄郛、黄绍竑根据徐燕谋的报告，决定派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临时以北平军分会总参议衔，为正式谈判代表；同时让黄绍坎赴庐山向蒋介石作报告。5月28日，何应钦、黄郛电告汪精卫说：已派熊斌担任停战协议代表，准备30日在塘沽开始谈判。

29日，汪精卫复电表示支持，并说：“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两兄为难。”29日晚，黄绍竑抵庐山，向蒋介石和汪精卫、孙科等人详细说明一切。

30日，蒋介石电告何应钦、黄郛：“季宽（黄绍竑）兄昨夜复赶到牯岭，面报兄等之孤诣苦心，众意均已谅解。”同日，何应钦、黄郛电蒋介石，告以经与日方交换意见的协定内容，蒋当即复电表示“欣慰”，指示何、黄“照常办理，放手进行”。汪精卫亦连发三电致何、黄，表示支持。

5月30日，中、日双方代表到塘沽举行停战谈判。中方首席代表为参谋本部厅长熊斌，代表有：铁道部政务次长钱宗泽、北平军分会高级参谋徐燕谋、军分会顾问雷寿荣、李择一及华北第一军团参谋处长张熙光；日方首席代表为关东军副参谋长冈村宁次，代表有：关东军参谋喜多诚一、炮兵参谋远藤三郎、步兵参谋藤本铁雄、师参谋河野悦次郎、骑兵参谋冈部英一、公使馆武官永津佐比重。当日16时举行预备会议，双方交换全权证书，约定次日上午举行正式会谈。

31日9时半，停战谈判正式举行。日方首席代表冈村宁次首先提出停战协定草案，并说明这是关东军的最后案，一字不容更改，要求中国代表在一个半小时内（即11时前）作允诺与否的答复。中方首席代表熊斌阅读草案后，提出书面的《中国军代表停战协定意见书》，内容有四点：（一）为恢复远东和平，改善中、日两国之关系，商讨停战协定，互以至诚相晤，互相谅解，共同排除前途之障碍，冀能达成所共同之目的。（二）中国军队已退回约定之线，再向后撤以表示中国军之诚意，今后在尽可能之范围内，互相避免中、日双方之冲突。（三）希望贵国军了解上述事实。为表示诚意起见，尽早恢复战区之原状，以奠定和平之基础。（四）贵国军基于以上之了解，敝军以后在该区域内，如发现妨碍治安之武装组织，必须由中国军予以处理时，希望贵军勿因此而起误会。冈村竟然表示，中方对日方所提停战协定草案，只能回答“诺”与“否”，一切声明必须等待停战协定签字以后再行商议。双方相持到10时50分，离日方要求的最后时限只有10分钟时，中国代表被迫在一字不容修改的日方提案上签了字。这个丧权辱国的《塘沽停战协定》的全文是：

关东军司令官元帥武藤信义，于昭和八年五月二十五日，在密云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派军使，该分会参谋徐燕谋，正式接受停战提议。依此，关东军司令官元帥武藤信义，关于停战协定，委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49～650页。

汪精卫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29日。

蒋介石致何应钦、黄郛电，1933年5月30日。

张篷舟：《近五十年的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9～150页。

任全权于该军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陆军少将冈村宁次，在塘沽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所委任停战全权华北中国军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陆军中将熊斌，缔结左列之停战协定：

一、中国军，即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之地区。尔后不越该线而前进，又不行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

二、日本军为确认第一项之实行情形，随时用飞机及其他方法，以行视察，中国方面对之应加保护及与以各种便利。

三、日本军，如确认第一项所示规定，中国军业已遵守时，即不再越该线追击。且自动归还于长城之线。

四、长城线以南，及第一项所示之线以北、以东地域内之治安维持，以中国警察机关任之。

右述警察机关不可用刺戟日本感情之武力团体。

五、本协定盖印之后，发生效力，以此为证据，两代表应行记名盖印。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昭和八年五月三十一日

中国方面代表北平分会总参议 熊斌

日本方面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 冈村宁次

31日14时，中、日代表继续开会，讨论熊斌上午所提之《意见书》。冈村表示“断难照办”，喜多表示反对。中方代表费尽口舌，日方始同意增加一个备忘录作为附件，内容是：“万一撤兵地域，有妨碍治安之武力团体发生，而以警察力不能镇压之时，双方协议之后，再行处置。”另外，日方向中方口头表示希望四项：（一）丰宁西南面之骑兵第2师，望即撤去；（二）平、津附近之40个师，望即调往南方；（三）白河附近堑壕及其他军事设备，望即撤去；（四）彻底取缔排日。熊斌口头允诺前三项，第四项允代转达。当晚，中国代表返北平向何应钦、黄郛报告。

签订《塘沽协定》后，国民党政府急急忙忙出来进行辩解。熊斌发表书面谈话，强调停战协定“完全属于军事范围”，但对双方达成的4项口头协议，特别是“彻底取缔”排日的政治要求，却秘而不宣。汪精卫于协定签字当天由庐山返回南京，发表谈话称：“河北停战谈判，限于军事，不涉政治”，否认塘沽协定丧失华北许多主权的事实；胡说军事失败是由于现有国力不够，士兵虽能“悲壮惨烈”，但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失败乃必然”。

汪精卫的书面谈话发表后，国民党中央控制的报纸都以此腔调为《塘沽协定》唱赞歌。6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32次临时会议，通过议案追认《塘沽协定》。6月5日，蒋介石在日记中美化《塘沽协定》说：“协定成立，停战政策得告一段落，人民暂可安息；国际形势，当有进步。对内对外，得此整顿准备之余豫，其足为复兴之基乎！”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940~941页。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第941页。

《中日塘沽会谈记录》，1933年5月31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档案。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台北1981年版，第656页。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9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15页。

三、国内外舆论抨击《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继袁世凯承认“二十一条”之后最严重的一次卖国条约。即使从字面上看，协定通篇充满战胜者对于战败者之气势和口吻，诸如“挑战”、“扰乱”、“施行视察”、“不再追击”等词语，显然都是对中国人民的肆意侮辱，是中华民族所不能容忍的。而就其实际内容来讲，则更具有损害中国主权的险恶用心。例如：第一条规定，中国军队从此条规定之线撤退后，“不得超过该线前进”，这就等于说中国永远不能越过该线，收复热河和东北三省失地；第二条规定，日本“可用飞机及其他方法视察”中国军队撤退以后的情形，这就可以作为日军今后随意越过该线，进攻华北、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借口；第三条“规定日军回到大致长城线”，这就表明，既承认了日军强占热河的事实，又承认了长城线为伪“满洲国”的国界，并为日军屯驻、出入长城各口埋下了伏笔；第四条规定要在长城以南非武装区内任用亲日警察，这就意味着日本对该区的实际占领，中国不能在非武装区驻军。凡此种种表明：协定虽然没有承认伪满洲国、划长城为界和涉及政治问题的词句，但实质上长城变成了新的政治分界线，非武装区变成了丧失主权区，使日军达到了划长城为界，并在长城以南建立新控制区的目的，为日军进一步向华北扩张打开了方便之门。至于达成的四项口头密约，更证明南京政府对主权的出卖。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外交官“均欣欣然”，喜形于色，也就不足为怪了！

《塘沽协定》的签订，遭到举国一致的反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于6月1日和10日，两次发表谴责宣言。宣布绝不承认《塘沽协定》，号召全国民众起来，以罢工、罢课、罢市、示威和组织自己的队伍，来反对与阻止《协定》任何一条的执行。6月1日，福州市各界举行游行大示威，反对南京当局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印尼雅加达华侨也致电汪精卫说：“公等可下野，亡国协定万不承认。”不仅如此，即使是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要员和高级将领亦对协定持反对态度。5月25、28日，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冯玉祥等分别通电反对妥协。指出：“我与暴日不共戴天，妥协苟成，无异圈牢待牢，等一死耳”。“目下平津被围，察绥危殆，此时言和，等于投降”。5月31日，国民党政府驻国联代表顾维钧、郭泰祺、施肇基致电外交部，指出即使签订停战协定，日军以我“不能遵守”，随时可以进攻，“结果平、津仍不能保”。6月2日，国民党西南政务委员会在致国联等的电报中指出：停战协定“必须反对，……实际上已无异于投降条约”，“果予实行，必为今后流血之总因”。

社会舆论也猛烈抨击国民党政府签订《塘沽协定》。《大公报》于6月1日发表《中日停战协定痛言》社评。在揭露了《塘沽协定》丧权辱国的性质之后，对国民党政府沉痛进言：“吾人以为政府与国民，时至今日，尽可不必讳言屈辱，勿再饰词自欺，而当痛快承认失败，并求如何利用此次惨酷

中央统战部、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上册，档案出版社，1984年版，第114~117页。

蒋光鼐、蔡廷锴反对与日妥协通电，1933年5月25日。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7页。

西南政务委员会力反对停战协定致国联、九国公约签字国及苏联政府电，1933年6月2日。

之教训，以谋求国家民族之复兴，”同日，《国闻周报》在《停战与华北前途》的署名文章中指出：如果说那些以大刀、石头及血肉之躯英勇与日寇拼杀的抗日官兵值得后人永世颂扬的话，那么南京政府、尤其是蒋汪二人，实是出卖中国领土主权、出卖流血牺牲的爱国官兵、出卖爱国民众的千古罪人。这是公正的历史结论。

战后许多外国学者对《塘沽协定》亦持批判态度。日本著名史学家井上清在《日本近代史》一书中评论说：“协定中承认满洲的既成事实，在长城线以南的河北省东北部设立广大的非武装地区，对中国来讲，是卖国的协定。”美国记者戴维·贝尔加米尼认为：“根据协定的规定，热河事实上割让给日本，更可耻的是把长城以南以山海关、北京、天津为三角顶的 5000 平方英里人口稠密的三角地带划为‘非军事区’。在这个地区内，中国人没有任何权利（只有办理民政的苦差事；而日本人则享有一切权利，但不担负任何义务和责任。”美国女学者多罗西·博格在 30 年后重提这段史实，引用毕逊的话说，此协定等于授给了“日本以后侵略华北的特许状。”

《塘沽协定》签订以后，中、日双方还于 7 月上旬和 11 月上旬，先后分别就非武装区处理、铁路通车和停战善后事宜等问题在大连和北平举行了会谈。结果又是日方拿出方案强加于中方，中方只好忍气吞声接受，最后达成了《停战协定善后处理会谈》。这个《善后处理会谈》，实际上是《塘沽协定》的继续与发展，它进一步暴露了日本攫取华北的侵略野心和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

〔日〕井上清、铃木正四著：《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 年版，第 576 页。

〔美〕戴·贝尔加米尼：《日本天皇的阴谋》上册，商务印书馆，1984 年中文版，第 699 页。

〔美〕多罗西·博格：《1933~1938 年的美国与远东危机》，马萨诸塞州剑桥，1964 年版，第 37 页。

第五节 察哈尔抗战和福建事变

一、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

“九·一八”事变后，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尖锐的形势下，国民党中的爱国之士不满意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希望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有的甚至主张放弃反共立场，与共产党合作，共同抗日。冯玉祥就是这方面的一个代表。

（一）抗日同盟军的酝酿

1930年10月，冯玉祥讨蒋失败后，便到山西汾阳峪道河村隐居读书，准备东山再起。通过一段学习，冯对共产主义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共产党增加了好感，希望听听共产党人关于救国救民的意见。“九·一八”事变前夕，冯玉祥与中共北方组织建立了联系。随后，中共派肖明到峪道河面晤冯玉祥，商讨中国革命有关问题。冯玉祥表示愿在中共帮助与合作下，举旗抗日。冯还同意在他保存下来的骨干力量——汾阳军校中发展共产党员，因此共产党人便成了该校的核心力量。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怀着强烈的爱国热情和政治上谋出路的愿望，毅然前往京、沪等地。他一方面向全国各界呼吁抗日，表示“誓死与全国同胞共赴国难，粉身碎骨，义无反顾”；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召开的四届一中全会、军事委员会和“国难会议”上，连续提出许多救国提案。但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多方阻挠下，这些提案均成泡影。冯玉祥在报国无门的情况下，抑郁不申，于3月24日前往泰山重新隐居。

冯玉祥由山西迁居泰山后，继续加强同两广方面、冯的旧部及共产党的联系，进一步学习进步著作，探寻抗日救国之路。1932年秋，中共北方组织通过王梓木等人，劝说冯要以实际行动发动民众抗日。这时，适逢冯的旧部宋哲元出任察哈尔省政府主席，察省地处抗日前线，又是过去西北军活动的地盘，冯玉祥决心在宋的掩护下，开展抗日活动。1932年10月9日，冯玉祥由泰山抵达张家口，宋哲元等相迎于几十里之外。11月，中共北方组织代表肖明赴张家口与冯玉祥交换组织抗日力量的意见，冯希望共产党派干部到张帮助筹组抗日大计。

1932年底至1933年初，热河、华北局势急剧恶化，察哈尔省受到日本侵略者的严重威胁。冯玉祥决心在共产党的帮助下，集合各方抗日力量，组织抗日同盟军，相机发动察省抗战。

此时，中共在冀、察沿平绥铁路线的各县建立了基层组织。在一些学校中建立了党的支部和革命群众组织，在华北的国民党军特别是西北军中，党的工作也有相当基础。中共党员张克侠、韩麟符、席传忠、赵彦卿等，长期在原西北军工作，对推动这些部队抗日，作了艰苦的努力。冯玉祥到张家口后，中共北方组织应冯玉祥之邀，于1932年12月至1933年1月，先后派张慕陶（张金刃）、武止戈（胡之康）、吴化之（吴畴、吴大龙）、张存实（张振亚）、宣侠父（南京政府高级军事参议身份）、许权中等到张家口，负责

冯玉祥复孔祥熙并告全国国民之梗电，1931年9月23日，《马电诠释》。

领导推动抗日同盟军的工作。

1933年5月，中共河北省委为加强抗日同盟军的组织发动工作，成立了以柯庆施为书记的前线工作委员会（简称前委），具体领导张家口地区和同盟军中的工作。与此同时，中共北方组织还从陕西、北平等地抽调许多党的干部如谢子长、刘仁、闫红彦等到同盟军中工作。这一时期，大约有300名共产党员协助冯玉祥筹建抗日同盟军：有的负责起草抗日同盟军纲领等文件；有的负责联络党所影响的武装力量向张家口集中；有的经外蒙赵苏，试图取得苏联援助；有的帮助冯召集旧部和组织抗日武装。

冯玉祥为了争取各方面的支援，于1933年1月7日致电两广的胡汉民、陈济棠、邹鲁、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呼吁：“现在已至最后之生死关头，非速图抵抗，不足以挽兹垂亡之局。”指出：“惟兹事体大，非群策群力，不能有所成就”，“应互相提携之”。随后，又请徐谦往访胡汉民、李济深，说明冯不顾蒋介石的压制，决心依靠各方支援，特别是西南方面的支援，以便发动民众和旧部抗日。3月21日，再派高兴亚去平、津拜见朱庆澜，请予经济上的帮助，联络吉鸿昌、石友三举义，找苏联驻天津总领事支援。

冯玉祥的抗日准备活动，遭到了蒋介石的阻拦，蒋企图用劝导和诱骗的方法，使冯离开察哈尔。1933年1月25日，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义，电请冯玉祥去南京。冯复电以“近感风寒”予以拒绝，并提出12项抗日救国主张，作为最后的呼吁。随后，蒋介石又派王法勤等赴张家口敦促冯进京，并以监察院院长、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等职相许。但冯不为所动，表示：“蒋介石如决心抗日，当然可以合作，根本谈不到作官问题。”并说：“谁要是亲日妥协，谁就是我的敌人，决无合作之可能。”3月上旬，蒋介石再派黄少谷到张家口，促其速往南京。冯说：“华北局势更紧，不但本人不应南下，蒋及中央委员皆应北上，现寇已深入，非坐谈抗日之时，只有大家上前线一拚。”3月中旬，蒋介石由江西到保定期间，曾先后派李烈钧、马伯援请冯往保定会晤。冯以信相答，提出5条意见，即：不可与日妥协；补充前方饷、械、弹药；抚恤伤亡官兵；请蒋亲率大军收复失地；政治刷新，与民更始。3月24日，孙科再电约冯到保定晤蒋。冯于次日复电说：函复蒋的意见，“如蒙采纳实行，则不独赴保，即任何驱使，亦不敢辞。”3月29日，蒋介石复派黄绍竑、熊斌，汪精卫派王懋功赴张劝冯进京。冯对他们说：“蒋若不认识过去之罪，痛改前非，与民更始，谁敢往南京去！”数日后，国民党中央又电促冯氏南下，冯对周围的人表示：“宁为抗战而死，也不愿离开此地。”蒋介石见诱冯之计不成，便施造谣中伤之法。但冯没有屈服，仍积极准备武装抗日。

冯玉祥为了组织武装抗日，于1933年3月电调驻山西汾阳军校学员到

冯玉祥致邹鲁等要求共同抵抗暴日电，1933年1月7日。

冯玉祥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电，1933年1月25日。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14辑，中华书局，1961年版，第114~115页。

《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1日。

冯玉祥复孙科电，1933年3月25日。

《冯玉祥日记》，1933年3月29日。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530页。

察。4月末该校3000余人抵张家口，随即扩编成师，师长支应进，所属3个团长均系共产党员，是为冯的基本队伍，拨归佟麟阁指挥。致力于抗日反蒋的原西北军将领方振武，经冯玉祥派人联络后，于3月上旬从上海赶到山西介休，与旧部共组抗日救国军。4月上旬方振武率部从介休出发，开到河北邯郸后，由于何应钦不拨给火车，遂徒步北上，于5月20日进入张家口。从东北、热河退入察省的抗日部队李忠义、邓文、黄守中等部，蒙古自卫军德穆楚克栋鲁普等部，以及察哈尔地方武装张砺生部，他们都表示服从冯的指挥，愿意与冯合作。冯玉祥在联络友军的同时，并着手建立基本队伍。此时，冯的旧部吉鸿昌、高树勋、孙良诚、张凌云等，先后抵张家口。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他们各自收编和装备了一部分抗日武装。此外，北平、天津及华北各地一部分爱国青年和学生，也赶来参加同盟军。这些部队虽然政治主张、原来的指挥系统不同，但都一致拥护冯玉祥出山，领导他们抗日。共产党的组织促成了这些武装的大集合。经冯玉祥同意，中共还组建了第18师，由许权中任师长，并在同盟军第2、第5、第16、第18师等部中，建立了抗日救国会、政治工作委员会和宣传队等组织。

冯玉祥准备抗日的行动，得到了察哈尔民众和全国各方面的支持。察省广大民众强烈要求武装起来，保卫乡土。1933年5月初，察哈尔各县代表在省府开会，推举汉、蒙民族代表乔嗜冰等4人到北平向军分会请愿，要求派兵抗日，收复失地。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当局先后致电冯玉祥表示支持；上海、北平、天津等城市及各地抗日救亡团体也纷纷电冯，促请早日实现抗日。5月7日，冯玉祥分别函复各地，并于9日在《大公报》上公开答复各民众团体，重申他抗日救亡的志愿和决心。

（二）抗日同盟军的正式成立

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与发动，组建抗日同盟军的条件业已成熟。在盘踞多伦的日伪军南侵，沽源不守的形势下，冯玉祥于1933年5月24日主持召开了有中共代表参加的各方军事首领会议，决定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26日，在张家口举行全省民众御侮救亡大会，正式宣布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一致公推冯玉祥为同盟军总司令。冯于当天向全国发表了就职通电，通电指出：

“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得寸进丈，直以灭我国家，奴我民族，为其绝无变更之目的。握政府大权者，以不抵抗而弃三省，以假抵抗而失热河，以不彻底局部抵抗而受挫于漱沪平津。即就此次北方战争而言，全国陆军用之于抗日者不及十分之一，海空军则根本未出动；全国收入用之于抗日者不及二十分之一，民众捐助尚被封锁挪用。要之，政府殆始终无抗日决心，始终未尝制定并实行整个作战计划。且因部队待遇不平，饥军实难作战。中间虽有几部忠勇卫国武士，自动奋战，获得一时局部胜利，终以后援不继而挫折。选者，长城前线不守，敌军迫攻平津，公言将取张垣。不但冀察垂危，黄河以北悉将不保。当局不作整军反攻之图，转为妥协苟安之计。方以忍辱负重自欺，以安定民心欺人。前此前敌抗日将士所流之血，后方民众为抗日所流之汗，俱将成毫无价值之牺牲。一时之苟安难期，他日之祸害愈深。国亡种奴，危机迫切。玉祥僻居张垣，数月以来，平津沪粤，及各省市民众团体，

信使频至，文电星驰，责以大义，勉以抗日。玉祥深念御侮救国，为每一民众所共有之自由，及应尽之神圣义务。自审才短力微，不敢避死偷生，谨依各地民众之责望，于民国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民众一分子之资格，在察省前线，出任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率领志同道合之战士及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争取中国之独立自由。有一分力量，尽一分力量，有十分力量，尽十分力量，大义所在，死而后已。凡真正抗日者，国民之友，亦我之友。凡不抗日或假抗日者，国民之敌，亦我之敌。所望全国民众，一致奋起，共驱强寇，保障民族生存，恢复领土完整。谨布腹心，敬祈赐予指导及援助。”

随后，冯玉祥先后公布了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的组成人员和编制序列。总司令为冯玉祥，总参谋长为邱山宁。下辖：方振武的抗日救国军所属两个军4个师，吉鸿昌的第2军4个师，佟麟阁的第1军4个师，阮玄武的第5军两个师，张凌云的第6军两个师，李忠义的第16军3个师，黄守中的第18军5个师，邓文的第5路军4个师，孙良诚的骑兵挺进军两个军，张砺生的察哈尔自卫军3个师，蒙古军3个军，以及同盟军直属部队，共约10万人。

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成立，使全国人民的抗战精神为之振奋。北平、天津、上海、河北、山东、广州、武汉等地抗日团体和爱国人士，纷纷致电冯玉祥，声援同盟军。

1933年5月29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常委肖佛成、邓泽如、李宗仁、邹鲁等联名通电，对冯玉祥“总领抗日之师，誓还我河山”的壮举，表示坚决支持，并充当“后盾”。5月31日，以张作相领衔的东北军50多位将领公开通电响应，称赞冯玉祥的抗日宣言“词严义正，足发好谋”。表示“谨率数十万健儿，……誓真抗日，重奠山河”。6月20日，东南5省民众抗日救国会会在贺电中盛赞冯玉祥誓师抗日为“起九死之国魂，系千钧于一发，无待还我河山，功已不在禹下。”为支援同盟军，朱庆澜从上海汇款4万元，广东、广西方面各汇款10万元。在全国民众的支持和鼓舞下，同盟军将领纷纷表示抗日决心。佟麟阁、吉鸿昌等13名将领联合通电，表示“愿在我公领导之下，团结民众，武装民众，矢誓以满腔热血洒疆场，保我山河，复我失地。”方振武发表通电，痛责蒋、汪政府与日妥协，“阳借停战之名，阴行卖国之实”。他挥泪陈词：“振武头可断，骨可折，对此辱国丧权之外交，一息尚存，决不承认。惟有率我武装同志，誓死杀贼，争中国之人格，救民族之危亡。”他们的这些豪言壮语表达了抗日同盟军抗日救国的战斗意志和爱国主义精神。

二、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抗日斗争

《国闻周报》第10卷第22期。

赵谨三：《察哈尔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7~101页。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6页。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1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3页。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参见附图 11)

(一) 加紧准备出师抗日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军继续扩大对察东的侵略。日军骑兵第 4 旅和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在侵占多伦、沽源等地后，准备分两路侵犯张家口：一路由多伦西侵宝昌、康保，再南下张北，逼向张家口；一路由沽源进犯独石口、赤城，继而西侵张北，钳击张家口。6 月 1 日，日军开始轰炸独石口，4 日陷宝昌，8 日占康保，张北危急，张家口震动，冯玉祥急调第 6、第 16 军和自卫军等部驰赴张北防御。方振武调抗日救国军一部到独石口应战。冯玉祥令张凌云为龙关、赤城警备司令，率兵一旅北上，与方部协防独石口，以稳定察哈尔的局势。

冯玉祥针对同盟军成份复杂、装备不一、素质差异大等特点，加速整训部队。在政治工作方面，冯玉祥除同意在部队中建立抗日组织，并通过《民众日报》等报纸宣传抗日，加强思想教育外，还“轮流召集驻张部队讲演，每日排四五小时。”每次一提及东北三省与热河，广大官兵“都愤慨激昂，甘心拼命杀敌”。在军训方面，冯玉祥每天巡视部队，组织操练，除调各地方武装到张家口操练外，还对各部队进行了调整编制、补充械弹、筹发给养、安抚伤兵等工作。经过整训，使疲惫之师焕发了精神。

冯玉祥还实行了若干改革措施和其他抗日准备工作。规定全省最高权力机关为“察哈尔民众御侮救亡大会”，同盟军的一切行动，施政方针，都由大会作出决议。为了求得军民协力抗日，还筹组召开“民众抗日同盟军军民代表大会”，由各县民众代表与军事将领参加，共同讨论军民抗日各项事宜。抗日同盟军的一切行动与措施，都以民众的名义出现。为此，冯玉祥于 5 月 26 日改组了察哈尔省政府，委任佟麟阁代理察省主席兼民政厅长，张允荣为财政厅长，吉鸿昌为警备司令兼警察处长、公安局长，省府其他机构未作变动。5 月 27 日，在张家口召开了工人、士兵、学生；市民共 3000 人参加的民众大会，决定成立张家口市“察哈尔民众抗日御侮救亡大会”，选举 10 名代表负责筹备工作。同日，冯玉祥颁布了三项革新政治令：（一）免除苛捐杂税；（二）释放政治犯；（三）停止党费由公市支付。冯玉祥还颁布了严惩贪污令，批准了创办《抗日前线》、《民众日报》和《国民日报》，以加强抗日宣传。

1933 年 6 月 15 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召开了抗日同盟军第一次军民大会。到会代表有冯玉祥、吉鸿昌、方振武等 61 人，中共党员宣侠父和张慕陶也参加了大会。会期 5 天，通过了民众抗日同盟军纲领决议案，确定了同盟军的性质、纲领和任务。明确了“同盟军为革命军民之联合战线，以外抗暴日，内除国贼为宗旨”，“否认一切卖国协定，并反对任何方式之妥协”，“誓以武力收复失地”，“主张对日断绝国交”，“联合世界反帝国主义共同奋斗，以完成中国之独立自由”，“实现抗日救国的民众政权”；取消苛捐杂税，改善工农、贫民、士兵生活；释放爱国政治犯，“保障抗日民众集会结

《大公报》1933 年 6 月 8 日。

《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23 期，1933 年 6 月 12 日。

社言论出版武装之自由”。同时，还通过了军事问题、财政政策、军队政治工作与协助民众运动和军委会组织大纲等决议案。大会根据军委会组织法，决定组织抗日同盟军军事委员会，作为代表大会闭会期间的最高领导机关，负责处理同盟军的军事、政治、财政、外交等重大事务。会议选举军事委员 35 人，候补军事委员 29 人。尔后，由军事委员会互推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宣侠父、张慕陶等 11 人组成常务委员会，徐惟烈任秘书长，冯玉祥为常务委员会主席兼总司令。

至此，同盟军抗日准备基本就绪，察省出现了抗日救国的大好形势。但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却对此坐卧不安，责令北平军分会取缔同盟军又找不到借口。于是大肆造谣诽谤，攻击冯玉祥“勾结共产党”，“勾结苏俄”，“别有他图”，甚至诬称冯“名为抗日，实为联日”等等。但冯不为蒋、汪的攻击所动，针对他们的诬蔑，先后采取了三项措施：第一，适当调整同盟军工作方针，放弃内外一样红的“胡萝卜”方针，采取“内红外不红”的“西瓜”方针。第二，通电全国，逐条批驳南京、北平方面的攻击、郑重声明，他“只知反对屈辱妥协，抗日到底。此心此志，有如皎月”。第三，请各报记者到现地采访报道，让全国了解察省真相。6 月 14 日，冯玉祥对上海《时事新报》记者说：“中日双方所商停战协定，其范围仅限于河北及平津，察哈尔从此益陷于一发千钧之境，本人乃当仁不让，起而自卫。”他表示：“我决不离开张家口，等着敌人到来，我要和他拚个你死我活，我如离开此地；我就是怕死。”这些话真实地反映了冯玉祥抗日的一片赤诚之心。

（二）进行察东战役

同盟军军事委员会成立后，即针对察东四县失陷，日伪军可能进攻张家口的形势，组织了收复察东的战役。为打好这一仗，冯玉祥调集方振武的救国军、吉鸿昌的第 2 军、邓文的第 5 路军、张凌云的第 6 军、李忠义的第 16 军等部组成北路军，以方振武为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为前敌总指挥，统一指挥作战。北路军分成左右两路，分别由吉鸿昌和方振武兼总指挥，于 1933 年 6 月 21 日开赴张北附近待命。共产党员掌握的第 2、第 5 师均为这次北征的主力。原在张北的察哈尔自卫军张砺生部及其他地方武装亦配合行动。

6 月 22 日，张砺生部首战康保，经 3 小时战斗，守敌崔兴武部向东逃窜，同盟军收复康保。23 日，同盟军兵分两路：左路军吉鸿昌、邓文、张凌云、张砺生部进击宝昌；右路军李忠义部直趋沽源。

沽源伪军刘桂堂部于 26 日通电反正，使伪军张海鹏之一部陷于孤立，同盟军击退该部，收复沽源。7 月 1 日，左路军在宝昌外围痛击伪军张海鹏、崔兴武等部。伪军遭打击后东逃多伦，宝昌又告收复。同盟军完全收复察东三县后，又乘胜发起多伦战斗。

多伦为察东重镇。它既是冀、热、察、蒙之间的交通枢纽，又是塞外商业中心和军事要地，日本把它视为攻掠察绥两省的战略据点。多伦城由日军骑兵第 4 旅和伪军一部固守，城外筑有八挂炮台 32 座，及内外交通壕和电网

河北省政协文史会：《冯玉祥与抗日同盟军》，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196~203 页。

《国闻周报》第 10 卷第 24 期。

《时事新报》1933 年 6 月 21 日。

等工事。根据敌情、地形，7月4日，吉鸿昌在大榆树沟主持军事会议，决定集中4个师，采取先发制人的方针，一举攻克多伦。其部署：以张凌云部为左路，以李忠义部为中路，以刘桂堂部为右路，以吉鸿昌、邓文部为总预备队。会后，各路部队向多伦外围地域集结。7日23时，同盟军分路向多伦发动进攻。日伪军凭借工事与火力，拚命顽抗，攻城部队奋勇冲击。经过两天三夜激战，至10日晚，吉鸿昌见久攻不下，乃亲率敢死队，赤膊匍匐前进，连续三次指挥登城，均未奏效，伤亡200余人。

11日拂晓，同盟军又数度攻城，突遭日机轰炸，伤亡甚重，乃暂退原阵地待机。为扰乱敌人后方，吉鸿昌暗派副官率士兵40余人，化装成伪军潜入城内。12日晨1时，吉鸿昌利用夜暗再次组织猛攻。当攻城部队接近城垣时，潜入城内的部队立即鸣枪响应。敌闻变大乱，同盟军乘势从北、西、南三门攻入城内。经3小时巷战，日伪军残部从东门逃窜。至此，失守72天的多伦遂告收复，察东四县全归同盟军之手，成为“九·一八”以来中国军队首次从日伪军手中收复失地之举。在察东战役中同盟军共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自己伤亡1600余人。

抗日同盟军北征的胜利，给全国民众带来希望。各地抗日组织、爱国团体和爱国人士（将领），或函电交驰，纷纷祝捷；或捐钱捐物，支援前线；或强烈要求蒋介石授冯以重任，供给粮弹，收复东北四省。7月14日上海各团体救国联合会致电冯玉祥和吉鸿昌，称赞说：“政府之所不敢为者，而公等为之。政府之所不能克者，而公等克之。尽筹硕划，岂惟大快人心，直使今后之欲为石敬瑭、秦桧者，将有所畏惧，而不敢逞行其私。”7月16、17日，李烈钧、程潜、蒋光鼐、蔡廷锴、李宗仁、李济深、陈铭枢等先后电贺冯玉祥克服多伦。电文说：“捷音传来，逦迤欣慰。激已死之人心，伸大义于天下。”表示“从种种方面设法策应”。7月26日，天津《益世报》在《再论察局》一文中指出：从“九·一八”起，“我们只有失陷领土的故事，并没有什么人做过收复失地的工作”；现在“有之，吉鸿昌收复多伦为第一次。”切望“当局勿功秦桧而罪武穆”。在捐款方面，各省当局和各民众团体共捐近40万元。海外13华侨团体亦发出通电，吁请旅居国外的爱国侨胞给同盟军以军晌支援。为把抗日爱国斗争从察哈尔扩展到热河和东三省，冯玉祥决心“自率十万饥疲之士，进而为规复（东北）四省之谋，一息尚存，此志不懈。”7月27日，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以冯玉祥为委员长的“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委员由同盟军高级将领担任，并发出成立通电。电文称：“慨日东北覆亡，普天同愤”，“相率中原豪杰，还我河山”，“职责所在，全力赴之。”

三、冯玉祥出走与同盟军失败

（一）冯玉祥被迫出走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64页。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70~77页。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0页。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2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81页。

同全国人民的意志和愿望相反，蒋汪政府出于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的需要，竟千方百计破坏抗日同盟军，企图压垮冯玉祥。还在同盟军进攻多伦前夕（7月3日），全力忙于“剿共”的蒋介石即从江西致电汪精卫，称冯玉祥“为共产荧惑”，“实行赤化组织”，“赤色旗帜日益鲜明”，要求行政院“速筹军事之彻底办法。”7月6日，何应钦向南京报告集结优势兵力进攻察哈尔的方案，拟任命庞炳勋为“察哈尔剿匪总司令”，并令庞率领第10军、冯钦哉率领第7军、万福麟率领第119师、徐庭瑶率领第25师、何遂率领第55军一部以及冯占海部，于13日前，分别到下花园、涿鹿、沙城、怀来和独石口、龙关等地集结待命。7月12日，多伦收复的消息传到南京后，汪精卫立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极力贬低同盟军攻克多伦的壮举，称多伦“非取之日本军队之手，乃取之伪军之手，此等傀儡，何足一击”。并决定增派宋哲元、王以哲、傅作义等部入察。至7月底，国民党入察部队已达16个整师，共15万余人，已形成大军压境之势，准备由庞炳勋指挥，分三路进攻张家口。在何应钦加紧进行攻察部署的同时，日军两个旅及伪军张海鹏部共2万余人，齐向察哈尔边境移动，准备进攻多伦等地。为了增加同盟军的财经困难，国民党政府以贪污罪将曾给冯玉祥捐款接济的朱庆澜调回南京办理交待。蒋军还封锁察省对外交通，使张家口等地的粮食、弹药接济断绝。

在日蒋进逼，战争处于一触即发之际，冯玉祥立即通电全国和西南当局，说明因抗日而“获罪于政府”，请各方主持正义，这个呼吁立即得到全国各方的响应。7月17日，国民党西南政委会电请北方各省当局各将领，“均应仗义直言，解此纠纷”，并劝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等，“应以国家为前提，以民意向背，不宜为个人所利用，为乱命所操持”。国民党中委李济深、陈铭枢、胡汉民、陈济棠、白崇禧等，以强硬态度致电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指责当局派重兵入察，要求“速停入察之师”，“若仍一意冥顽，抑内媚外”，“我西南为党国生存计，为民族前途计，决取断然处置。”

7月24日，天津《民风报》在社评中指出：“蒋介石……倒行逆施，谋以武力解决冯玉祥之抗日力量，则其卖国罪恶更浮于吴三桂多倍。”认为爱国民众要“行使国家主人翁之天职，锄去此中国之李完用。”即使在国民党军队中，也有不少人不愿对冯玉祥用兵，宋哲元固不待言，冯钦哉也表示“我不能接受这个任务”，庞炳勋虽跃跃欲试，但他的旅长陈春荣却说：“冯是抗日的，先不必说别的，就是在人格上也不能打他。”

在各方面舆论和西南实力派的压力下，蒋介石、汪精卫未敢立即言战，但仍坚持其取消政策。7月，蒋汪发出俭（28日）电，继续对冯玉祥进行造谣诬蔑，并提出最后通牒四项迫其接受：“（一）勿擅立各种军政名义，致使察省脱离中央，妨害统一政令，浸假成为第二傀儡政府；（二）勿妨害中央边防计划，致外强中干，沦察省为热河之续；（三）勿滥收散军土匪，重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9页。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2~13页。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14页。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第540、595页。

劳民力负担，且为地方秩序之患；（四）勿引用“共匪”头目，煽扬赤焰，贻华北之无穷之祸。”接着，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世（31日）电，答复蒋汪俭电，陈述兴师以来抗日经过，驳斥所谓“抗命”、“割据”、“赤化”等诬蔑。指出：“胜虽不足言功，但胜亦何至获罪”，“此真千古奇闻”。“祥屡次宣言，一则抗日到底，一则枪口决不对内。如中央严禁抗日，抗日既无异于反抗政府，则不但军事可以收束，即科我应得之罪，亦所甘心。”同日，他在日记中悲愤地写道：“哀哉，同盟军！抗日何辜？竟而得罪蒋氏政府，致遭腹背之敌，更受轰炸之苦。”

在蒋汪大军压境准备进攻张家口的时候，日伪军两万余人也开始大举进攻多伦。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派遣兰衣社特务，利用同盟军成份复杂、政治态度不一的弱点，进行分化瓦解。包刚、冯占海、张人杰、李忠义等先后被收买，魏宗普、邓文等先后被暗杀，造成同盟军内部的思想混乱和动摇。这时，中共同盟军前委日益背离中共北方组织根据周恩来在抗日同盟军酝酿初期指示的与冯玉祥等爱国将领合作的方针，执行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提出了一些不利于内部团结的口号，并公开反对冯玉祥的“里红外不红”的西瓜策略，使冯感到苦恼和疑虑。加之，同盟军的外援也被切断，原与两广方面约定的响应抗日，按月接济同盟军10万元的计划也落空了。面对此种困境，冯玉祥于8月3、4日曾两次召开同盟军军政人员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冯玉祥最后不顾不同意见，决定取消同盟军名义，离察出走。他在会上表示，如引起内战，将使日军坐收渔人之利，希望宋哲元回察，同盟军名义虽不在，但可借宋的掩护，保存一部分力量。经过顾孟余、黄郛来往于北平、南京、江西交涉和宋哲元在冯玉祥与北平之间的斡旋，8月3日，何应钦秉蒋汪旨意，发表解决察事谈话，同意宋哲元返察。8月5日，冯玉祥发电宣布自即日起“忍痛收束军事”，欢迎宋哲元返察，接收一切，并表示“抗日雪耻之念，愈挫愈坚。一息尚存，此志不渝”。6日，宋哲元发表5日签署的复职通电。同日，冯玉祥通电全国，宣布交还察省政权，称：“顷原任察省主席宋哲元昨已抵察，兹自本日起，即将察省一切军政事宜，统交由宋主席负责办理矣。”7日，宋哲元部冯治安师接防张家口。9日，宋哲元派秦德纯接收察省军政各机关。当天，冯玉祥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辞去同盟军总司令职务。

11日，冯在日记中写道：这次离察“一为体谅明轩之苦衷，一为将来重整旗鼓，再作抗日讨贼之计”。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张家口，再上泰山隐居。

（二）同盟军的奋战与失败

由于冯玉祥出走，抗日同盟军发生严重分裂。在南京国民党政府的高压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28页。

赵谨三：《察哈尔抗日实录》第3编，上海军学社，1933年版，第31页。

《冯玉祥日记》，1933年7月31日。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5页。

《国闻周报》第10卷第32期，1933年8月14日。

《冯玉祥日记》，1933年8月11日。

和重金收买下，同盟军大部分被宋哲元部收编或瓦解，只有方振武、吉鸿昌和中共掌握的部队共1,5万人未受大的波动。为了坚持斗争，方、吉二部和中共前委掌握的第2、第5、第16、第18师及党政军机关一同转移到张北一带。方振武、吉鸿昌到张北后，表示“既以抗日为起源，必以抗日为归宿。”

8月16日，方振武发表通电，宣布就任代理同盟军总司令职。8月24日，中共前委也在张北二泉井村召开扩大会议，成立了以柯庆施、吉鸿昌、张慕陶、宣侠父、许权中等7人为常委的军事委员会，任命吉鸿昌为北路总指挥。会议根据临时中央及河北省委关于集中力量创造红军和新苏区的指示，对同盟军的行动提出了向东、向南、向西发展三个方案，经过分析比较，决定向南发展，依托保定以西的太行山、依靠河北中部农民运动与党组织的良好基础，创建抗日根据地。方振武不同意前委南下路线，遂率部东进至独石口地区。

方振武、吉鸿昌继续高举同盟军抗日旗帜的行动，激起了国民党政府的恼恨。蒋介石、何应钦急令宋哲元、庞炳勋、闫锡山等部，进攻、堵截同盟军，陷方、吉二部于东西南三面包围之中。为了使日伪军从北面围攻同盟军，何应钦于9月8日派殷同和日军勾结，商议夹击同盟军的办法。中共前委所部和吉鸿昌部为实现南进计划，在南进路线受阻的情况下曾两次西出商都，绕道南下，均遭闫锡山、傅作义部堵截：被迫折而向东，于9月9日到达独石口及其附近与方振武部会合。9月10日，方振武邀请吉鸿昌到赤城举行了云州会议。会议决定打起“讨贼联军”的旗帜，并推方振武为总司令。由于对当时敌情估计失当，会议作出了打进北平过中秋的错误决定。中共前委决定暂随方、吉二部出山，再图南下冀中。于是将其掌握的部队分成两部分：一部随方振武部，在长城线以西，经云州沿白河向东南发展；一部随吉鸿昌部，在长城线以东，绕道丰宁，经四海，向南推进。讨贼军在南进途中遭到蒋军和日伪军的跟踪追击。指战员们不顾危险奋勇进击，于9月中下旬先后收复丰宁、怀柔、密云等县城，并进占顺义县之高丽营及板桥村。与此同时，中共前委所部与吉鸿昌部曾几次出山，试图南下越过平绥线，均遭蒋军拦截，被迫退回山中。10月上旬，中共前委所部、吉鸿昌部、方振武部会合于大小汤山地区后，遭到日伪蒋大军的四面包围和夹击。经过连日苦战，部队伤亡惨重，最后仅剩四五百人，且弹尽粮绝。在此情况下，方振武、吉鸿昌接受北平慈善团体的调停建议，于10月16日下午离开部队。尔后，方、吉二人由商震部护送赴北平。途中先后寻机下车，方振武秘密他往，吉鸿昌辗转到天津。所余各部均被蒋军缴械。至此，名震一时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日、蒋军夹击之下，最后失败。

同盟军失败后，冯玉祥继续与共产党合作，进行抗日反蒋斗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吉鸿昌则在天津从事抗日活动，于1934年11月9日被国民党政府逮捕，24日在北平就义。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崛起，是冯玉祥等爱国官兵响应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号召，举起武装抗日旗帜，进行联合抗日的一次伟大尝试，得到了全国主张抗日的各派政治势力及广大民众的支持和称赞。蒋日的压迫和联合进攻，是同盟军遭受失败的根本原因；同盟军一些将领的动摇和中共前委后期

《察哈尔抗日同盟军档案资料》，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

《晨报》1933年10月17日；《国闻周报》第10卷第42期，1933年10月23日。

工作的错误，也是失败的原因之一。尽管如此，但其将近半年的英勇奋战，打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进一步暴露了蒋介石破坏抗日的卖国行径，鼓舞了全国民众的爱国热忱，推动了北方各省以至全国的革命斗争，同时，也对尔后的抗日斗争，提供了经验教训。

四、福建事变

热河沦陷，长城弃守，《塘沽协定》签定，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被扼杀，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对蒋介石国民党政府推行“攘外必先安内”反动政策的无比愤慨；抗日救亡运动再次高涨。1933年冬，以第19路军为骨干，联合第三党等抗日反蒋势力，在福州发动了著名的福建事变。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第19路军被蒋介石从上海调往福建去同工农红军作战。广大官兵对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对内用兵政策，日益不满。

1933年1月1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在停止进攻苏区等条件下，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作战协定的宣言，第19路军将领受到触动。9月22日，第19路军派陈公培携带蒋光鼐的亲笔信，到苏区与红军联系。彭德怀给蒋、蔡写了回信，对其愿与红军合作抗日的态度表示欢迎。

10月，陈铭枢在香港与李济深、陈友仁 and 第三党领袖黄琪翔等酝酿在福建起事的计划。10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同福建省政府及第19路军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以共同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11月20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以“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为旗帜，在福建公开宣布反蒋抗日。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在政治上提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和卖国残民的南京政府”；

在经济上主张“实现关税自主”，“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在军事上撤销绥靖公署，成立了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蔡廷锴兼任总司令。下辖第19路军总指挥部的5个军和两个空军大队及其他部队。此外，还与中国共产党进行了初步合作，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共产党先后派张云逸、潘汉年为驻闽代表，同福建人民政府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联系。

蒋介石国民党对福建人民政府采取了迅速扑灭的方针。

1933年底，蒋介石自任“讨逆军”总司令，从“剿共”前线抽调5个军、12个师”约15万人，分三路向福建进攻。日、美、英等帝国主义军舰也配合国民党海军封锁福建沿海。更为阴险的是蒋介石派人潜入福建，用重金和官职收买等手段，从内部瓦解第19路军。在蒋介石内诱外攻下，沈光汉、毛维寿、张炎、区寿年等跟随蔡廷锴多年的将领，相继叛变，福州、厦门、泉州、漳州等城市接连被蒋军攻占，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等逃往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35页。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7期，1933年11月27日。

同上。

《申报》月刊，1934年第3卷第2期。

香港。至 1934 年 1 月，历时 53 天的福建人民政府遂告失败。

福建事变虽然失败，但仍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在民族危急关头，他们坚决反对蒋介石的对日不抵抗主义，毅然同其决裂，表明了鲜明的民族立场和爱国主义精神。他们在国民党内首先举起抗日反蒋的义旗，为后来西安事变的发动提供了历史借鉴。蔡廷锴等人失败后，到香港继续同共产党保持联系，参加抗日反蒋工作，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第六章 日本加紧蚕食华北、内蒙，中华民族危机加深

第一节 日本策动华北自治和内蒙独立

华北地区当时包括 5 省（冀、鲁、晋、绥、察）2 市（北平、天津），面积 1018947 平方公里，约占全国的 1/11；耕地面积 316132000 亩，占全国耕地面积的 1/4；人口 7620 余万人，超过日本全国人口（当时约 7000 万），约占全国人口 1/6。

华北地区物产丰富。小麦产量占全国 1/3，棉花产量仅晋、冀、鲁 3 省即占全国 46%。有较多的工矿企业，纺织厂占全国 1/5，面粉厂占全国 2/5，产煤量为全国 45%，产盐量为全国 20%。交通条件较好，这里有中国最早修建的几条铁路，总长度占全国 1/2，公路长度占全国 1/6。此外，还有绵长的海岸线，有天津、青岛、秦皇岛、烟台、威海等优良海港。这些有利的条件，使华北地区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

一、日本僵略华北的早期策划

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开始，直到 1933 年 3 月 31 日《塘沽协定》签字，日本军国主义在武装攻占中国东北并巩固其统治的同时，也加紧了在华北地区的侵略活动，酝酿制定其对华北的侵略政策。

早在 1931 年 4 月，日本侵略中国东北的重要策划者之一石原莞尔在《为解决满蒙问题的战争计划大纲（对美战争计划大纲）》中，就提出必要的时候要进行关内的作战，其占领范围“依据情况区别决定，然首先可以预定为华中以北。”当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大部分地区后，陆军部于 1931 年 11 月 16 日起草《对苏中两国作战计划大纲》，其作战指导方针第一条要求“确实占领北满……此外，扫荡沿海州及华北方面的敌军”。还计划“向华北方面（平津及山东方面）派遣 4 个师，迅速平定平津一带，根据情况，以后使之对南京军作战”。

1932 年 1 月 28 日，日军对中国最大城市上海发起进攻。参谋部同时设计，在对华全面战争之时，将从四个方面对华作战，即：第一，满洲方面，第二，华北和山东方面，第三，长江方面，第四，福建方面。此时，日军以攻占东北为第一要务，未敢旁骛。

1932 年 8 月 27 日，日本内阁会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看时局处理方针案》，该案针对“九·一八”事变后的中国局势，将所谓“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并列提出，该案供认，日本此时最需要的是巩固东北的占领，要使列国消除对日本“对于中国本部政策的不必要的疑虑和担心”，以避免列强实行干涉。在这里，对华北的侵略计划包含于“中国本部”之中，尚未单独分立。此后，日本就迅速加快了独立的对华北侵略政策的制定。

《华北事变资料选编》，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90～493 页。

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 年版，第 71 页。

〔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 年版，第 322 页。

〔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 年版，第 333 页。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 年版，第 5 页。

1932年8月，石原莞尔在《经略满蒙之我见》中提出：“山西的煤，河北的铁，河南、山东以南的棉”应该为日本所用，同时还强调，日本不能只满足于“满洲国”的“开发”，还必须实行“开发中国本部首先是实现开发华北的方策”。

1932年5月，日本法西斯军人发动政变，枪杀了首相犬养毅，结束了日本历史上的政党内阁，建立了由军部、政党、官僚联合控制政权的“中间内阁”，军国主义强硬对外路线得到加强。日军于1933年1月制造山海关事件，进犯热河，开始侵入关内，兵锋直逼华北。板垣等还制定计划，欲收买华北的反蒋派军政要员，力图以此排挤蒋介石在华北的势力，然后建立由日方操纵的华北傀儡政权，名称为“华北联治政府”。据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调查记载，到1933年5月，板垣为执行此计划已耗资300万元，这项费用均从日本陆军省机密费中开支。5月6日，参谋部向日本驻北平、天津等特务机关下达了《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提出在华北的方针是“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实行强压，以此为基调实施相对应的对华北的方策，使现华北军政官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并迫使满华国境附近的中国军队撤退，确保该方面的安定”。还规定其要领在于：“于华北、华中、华南各方面，分别进行促使其更加分立之方案。”考虑到对东北的占领尚未巩固，东北的抗日武装力量尚有“22万之众”，日军需要以较大兵力进行“讨伐肃正”。另外，日本正在建立和巩固伪满洲国傀儡政权，而用于热河等地的日军在作战中消耗较大，急需休整补充。所以，尽管制订了上述初步的方针和要领，也未能进行更大规模的作战行动。

二、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和实施

《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对华北进一步实施大规模扩张。这种扩张是以武力威胁为后盾，从政治、经济、外交等领域多方面展开的，这是日本推行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基本特征。

（一）各种侵略华北方案的出笼

1933年7月6日，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该大纲提出对华北问题的两点：“（一）虽然我们暂时容忍华北政权保持为南京政府的一部分，我们应当压迫它去实现塘沽协定的意义。排除对日货的抵制与抗日运动，保持并延伸这一形势的发展。（二）我们必须使华北政权压制国民党在华北的抗日活动，并使国民党逐渐减少力量，最后迫使其解体。”1933年9月25日，日本海军方面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将中国分作华北、华中、华南三大部分而制定对策，其中作为一个独立问题明确使用了“对华北方策”的说法。所订出的三条方策，其基本精神是要使

角田顺：《石原莞尔资料·国防论策》，原书房，1971年版，第107~109页。

〔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67—568页。

〔日〕《现代史资料》7，美铃书房，1985年版，第511—515页。

〔日〕《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74年版，第335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战犯审讯记录（IMTFE）文件三 147页C。

华北地区“通过履行停战协定，根绝抗日排货及其他反日运动，消除党部势力等，使华北的空气转向亲日”，并“逐渐在实际上独立于中央政权的政令之外，恢复同日满两国的依存关系”。日本陆军也于10月2日提出《帝国国策》，其中要求在华北设立“缓冲地带”，“培养适应于分离倾向的亲日分子并促使其组织化”。同月25日，经五相会议讨论确定了《对华方策》（绝密），认为在塘沽协定之后，日本应该努力促使和助成“华北地区形势好转”，应该经常以“严肃态度认真对待”，使“放弃反日政策，根绝排日运动”。11月30日，日本陆军省在对内阁制定的《帝国外交政策》提出的最后修正案中，主张“支持中国大陆上之分治运动，驱逐国民政府势力于华北之外。”这样，日本政府和军部经过反复协商和讨论，一致提出了在华北“根绝排日”、“削弱国民党的势力”和与中央政权“分离”的宗旨。

（二）天羽声明——日本独占华北的宣言

经过上述酝酿，日本分离华北的政策逐渐形成。

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在定期接见记者的招待会上发表谈话，其后被称为《天羽声明》，其要点如下：

“日本为了满洲事变和满洲国问题，于去年三月，不得已通告退出了国际联盟。”“关于东亚问题，日本的立场和使命，也许和其他各国的立场和使命有所不同。”

“如果中国采取利用其他国家排斥日本、违反东亚和平的措施，或者采取以夷制夷的排外政策，日本就不得不加以反对。”

“各国也应该考虑到由满洲事变，上海事变所产生的特殊情况，如果对于中国想采取共同行动，即使在名义上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必然带有政治意义。”“提供武器、军用飞机，派遣军事教官，提供政治借款等等，最后显然要导致离间中国和日本以及其他各国的关系，产生违反维持远东和平与秩序的结果。因此，日本不能对此置之不理”。

“天羽声明”拒绝国际社会对其制造“九·一八”事变的谴责，公开宣布中国为其势力范围，反对各国对中国的哪怕是“财政的或技术的援助”，这正如当时世界舆论所评论的那样，这是“日本的东洋门罗主义宣言”。它理所当然地引起中国人民及世界人民的谴责和愤怒。天羽英二在3天之后重新进行了辩解，几天以后外务大臣广田弘毅也作了重新解释，说什么“日本没有侵犯中国的独立和权益的意图。日本始终希望要保全中国，维护中国的统一和繁荣”。但同时又宣布“日本对于采取任何形式违反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的行动，不能置之不理。”日本对东亚有着“密切的关心”等。

日本策划分离华北阴谋的重要人物、日本关东军沈阳特务机关长土肥原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9页。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12页。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会出版社，1973年版，第148~149页。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1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24页。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76~77页。

同上，第78~79页

贤二，在《天羽声明》出笼的第2天即4月18日，假借“华北人民爱国协会”的名义，向日本陆军参谋部提交了《挽救华北的政策》的机密文件。该文说：“为避免在远东爆发大战及争取东亚的和平，目前最迫切的需要便是建立一个新的华北政权。”1934年12月7日，日本陆、海、外三省官员经过协商，制定了《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规定日本在华北的基本宗旨是“形成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能达及的情势”，其政治上应努力达到的目标是“伸张我方权益和形成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不论华北政权的主要班底由何人组成，均不能无视在华北的日满华特殊关系”。同时，还制定了“关于伸张商权的方策”，强调其经济上的目的是：“在实业界及其他普通民间广寻对象，以促进国民经济的提携，培养隔绝排日的普遍气氛，而使日满华之间的经济特殊关系置于以政治等方面的理由无论怎样也难于动摇的地位”。

根据当时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记录，日本所希望的结果大约有四种：（1）华北五省独立；（2）华北五省自主；（3）河北省中心自治地带；（4）局外中立裁兵地区设立。各种方案的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那就是要“自治”、“亲日”。

1935年1月4日，关东军召开大连会议，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特务机关长土肥原等均参加，会议历时两天，中心议题是塘沽协定签定后的对伪满和对华北的方针，决定要在华北扶植能够“忠实贯彻日本要求的诚实的政权”，“始终企图整个问题之解决，在未达到最后目的之前，则用侧击旁敲办法，逐步前进”。

（三）广田的伪善外交与国民党政府的妥协

为了实现侵吞华北进而独霸中国的既定国策，日本兼用政治、军事手段，以武力威逼与外交诱惑相结合，企图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就范。在日本军部与关东军着手分离华北的同时，1935年1月22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议会上作外交演说，提出了对外关系中要推行所谓“不威胁、不侵略原则”。

立刻得到蒋介石政府的响应。1月29日，蒋介石邀请日本驻华公使武官铃木美通到南京会谈。他对铃木说：“无论如何，中日两国有关提携之必要，愿中日两国以互相之精神努力进行”。中国的排日运动，“至当极力取缔，但完全消灭，尚须相当之时日”。此时，载于1934年12月《外交评论》杂志的国民党官方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之检讨》，正好发表。该文系由蒋介石口述，陈布雷笔记，用法律学者徐道邻的名义，竞相转载于各报纸，文中宣称：“一般有理解的中国人，都知道日本人终究不能作我们的敌人，我们中国也究竟须有与日本携手之必要。”1935年2月14日，蒋介石在庐山接见日本《朝日新闻》记者时说：“中日两国不仅在东亚大局上看

东京国际军事法庭裁判记录第1763—A号。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3页。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24页。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新版，第62～63页。

《申报月刊》第4卷第2号，第123页。

《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82页。

《外交周报》第3卷第6期，第9页。

来有提携之必要，即为世界大局设想，亦非提携不可”，“中国不但无排日之行动与思想，亦无排日之必要。”接着，汪精卫以行政院长的身份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发表“对日关系书”，大谈中日提携的必要和应促其实现，他说：“广田的演说和我们素来的主张大致吻合，……。日华两国有此共识，只要双方共同努力，两国关系改善的局面就能走上正轨，我们将为此而感到欣慰。”

为了摸清日本对“亲善”、“提携”的意向，蒋介石与汪精卫商定，由国际法庭法官王宠惠乘返海牙任所之便，取道日本，与日本当局交换意见。王宠惠于1935年2月19日抵日本后，先后会见广日外相，访晤冈田首相，并会见陆相林銑十郎，海相大角岑生，外务次官重光葵等要人，一再表白：中日提携系属大道，希望两国努力扫除障碍。他趁此机会“与贵国朝野各士会见，一面就中日外交关系及经济提携对策等听取日方真意，一面使贵国朝野人士彻底明悉中国当局所持之意见”。为了表示对中日“亲善”、“提携”的诚意，2月27日，蒋介石、汪精卫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严禁排日运动命令。同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通告各报纸、通讯社，禁止刊载排日和抵制日货的消息。

日本政府看到中日“亲善”、“提携”的谋略得到响应，遂进一步加以诱导。同年3月7日，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偕参赞有野晤访汪精卫，表示感谢中国方面有诚意取缔排日，中日关系渐上常规，不胜庆幸。晤谈后有吉明在发表谈话中说：“前者蒋介石氏即发表中日问题正常化之声明，国民政府亦复努力取缔排日，致中日关系，已有急速好转之机运。”次日，日本外务省亦表示大体满意。5月8日，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向国民党政府外交部转达日本将驻华公使升格为大使的决定。5月17日，中日使节升格的决定由双方同时发表。中国驻日本大使为现任驻日公使蒋作宾，日本驻中国大使为现任驻华公使有吉明。

在日本政府伪善外交掩蔽之下，日本军部及其在华特务机关却积极策划着进一步分离华北的计划。在大连会议后，土肥原到青岛、上海、南京等地，遍访国民党有关要人，于3月下旬返回长春，提出报告。关东军据此于3月30日决定了“对华政策”，提出“对于华北——（一）依据塘沽协定暨附带协议事项伸张日本既得权，引导华北政权绝对服从。（二）为使将来以民众为对象、在经济上造成不可分离的密切关系，即须迅速促进棉、铁等产业的开发和交易。”

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与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共同协商策动“华北自治”。同年8月，陆军次官桥本虎之助发给侵华日军各部参谋长及驻华武官一份文件，强调其华北政策的主要内容是在“反共”和“自治”的名义下，在华北五省建立“同帝国有实质亲善关系”的脱离南京中央政府的傀儡政权。曾任关东军参谋并主持内蒙特务机关工作的田中隆吉，在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页。

《日本外交史》第19卷，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87页。

《政治周刊》第2卷第8期，第21页。

《政治周刊》第2卷第11期，1935年3月。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社译印，1977年版，第33页。

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史研究的课题》，〔日〕《历史学研究》第511号，1982年版。

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说：“华北的自治运动，始于1935年4月，其目的之一是为了建立……统一的华北自治政权”，使“南京政权统辖之下的华北五省脱离南京，成为自治地区，将满洲国西南方的中国置于日本领导之下。”

（四）多田骏声明——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代表作

1935年9月24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新任司令官多田骏少将就华北问题在记者招待会上发表谈话，被称为《多田声明》。多田强调“逐渐使华北明朗化，这是形成日满华共存的基础。”同时宣布了三条要则：“（一）把反满抗日分子彻底地驱逐出华北；（二）华北经济圈独立（要救济华北的民众，只有使华北财政脱离南京政府的管辖）；（三）通过华北五省的军事合作，防止赤化。”多田上述声明在报纸刊出之后，舆论界立即哗然，中国官方也提出了抗议。

10月7日，蒋作宾大使访问日本广田外相时指出：对于多田谈话“中国方面官民皆感到惊诧。”

日本方面对中国的抗议置之不理。同年10月4日，日本外、陆、海三相经过协商，再度确认日本分离华北政策，强调要“采用缓急得宜的方法，使中国方面（中央及地方政权）调整其与帝国及满洲国的关系，其作法是：第一，“使中方彻底取缔排日的言论和行动”；第二，“至少在与满洲国毗连的华北地区，在经济上和文化上与满洲国进行有效合作”；第三“排除赤化威胁”。此后，就上述问题关东军、军部和政府拟定了各种文件，10月还在大连、天津、上海等地召开以关东军为主的在华官员会议。

多田声明所宣布的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特点是：第一，公开宣布的完整的方案；第二，范围上着眼点在于整个华北；第三，强调政治上的“分离”、“自治”以及日本的“指导”；第四，在经济上正式提出了“华北经济圈”的说法。多田声明完整集中地概括了日本在这一时期的目的，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分离华北的侵略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制定不单是军方的作用，而是日本统治阶级意志和权益的集中体现。法西斯军人桥本欣五郎曾说：“华北问题是日本为了向大陆发展迟早要解决的问题”。近卫文鹰更露骨他说：中国对华北“自己没有开发之力而将此天赋资源放弃不顾，这可以说是对上天的冒渎，日本为了表露友谊而对其进行开发”。1935年和1936年间，日本在华北地区大规模展开多种形式的侵略活动，制造了各种大小的阴谋事变，正是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必然产物。

三、日本分离内蒙的侵略政策

《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86~87页。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年，第56~57页。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1年版，第217页。

〔日〕《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03~304页。

《日本历史》28，岩波书店，1981年版，第145页。

江口圭一：《十五年战争小史》，青木书店，1986年版，第101页。

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内蒙古东部地区相继陷入日军铁蹄之下，部分蒙古族上层分子依靠日军的支持和指挥，在通辽一带大搞“复兴蒙古民族，实行自治”，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粉饰门面，掩遮其卖身投敌的叛国行径。日本在华北的扩张充分地利用了该地区的民族矛盾，操纵部分上层叛国分子，策动所谓的内蒙独立运动，推行对内蒙的侵略扩张。

1933 年 7 月 16 日，关东军参谋部炮制了《暂行蒙古人指导要案》，其核心是要促成西部内蒙古及外蒙古“转向亲满亲日”，提出“在西部内蒙古要排除苏中两国势力的影响，促进自治政权建立，并指导外蒙古逐渐脱离苏联的羁绊，朝亲日、满的趋向转化。”1933 年 10 月，关东军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起草了《关于建设蒙古国的意见》。其中对于“蒙古国”的疆域，松室孝良提出两个方案，第一案包括长城外城以北的锡林郭勒盟、察哈尔八旗（含内务部农场）、乌兰察布盟、伊克昭盟、归化城土默特部；第二案在第一案的基础上，增加长城内城以北的察哈尔省口北道、山西省雁门道，还提出建立“蒙古国”的准备时间为三年，以便集中和培养“人才”，甚至还对“蒙古国国家组织大纲”、“国号”、“元首”、“首都”等，都作了细致的说明。

1934 年 1 月，日本陆军部在《对察施策》中提出，“对察哈尔省，要根据昭和八年（1933 年）7 月 16 日决定的我军既定方针进行工作”，强调“本施策的目标在于锡林郭勒盟和察东”，“将来根据形势的变迁，更使施策范围向西扩张”。2 月，改任日本关东军驻齐齐哈尔特务机关长的松室孝良，在《满洲国接邻地方占领地统治案》中，对所谓“蒙古自治国”的统治区域、政治机构、行政区域、治安维持方法，以及警备军的编成使用、财政经济等，都作了更为具体的规定。

日军在绥远、察哈尔等地区的扩张，是其对华北侵略政策的构成部分，但它的目的与手法同在华北等地区的作法有所不同，其方案纲领显示有作为独立计划的特征。日军对于内蒙中西部的插手，是在 1935 年前后大规模开展的。

1935 年 7 月 25 日关东军参谋部进一步制定《对内蒙措施要领》，该文件总结了“九·一八”事变以来日军侵略的经验，规定其今后的方针是：“为了有利于对苏作战，以及为准备作战所需要的各种平时工作，并以巩固满洲国的国防以便于加强统治为目的，关东军首先设法扩大和加强了内蒙的亲日满地区，内蒙应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脱离中央而独立。”同时，还就控制内蒙地区的军事、文化、交通和经济等各领域作了细致的规定。军事方面强调组建由日本军官作指导官的仆从军，文化方面要借助宗教与教育力量，进行奴化教育，交通方面要以军事为目标全面规划，“以利于关东军将来的工作”，经济上则特别强调要由伪满洲国加以指导，展开物物交换贸易，但尽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下卷，《文书》第 102 页。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 年版，第 449～462 页。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 年版，第 468 页。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 年版，第 472～485 页。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 年版，第 492 页。

量“使之养成使用满洲国货币的习惯”。

日军在内蒙古推行的分离政策与以河北为中心的分离华北工作，其基本着眼点都是要使这些地区与南京中央政府脱钩，都要成为日本的卫星国、仆从国。对于内蒙更要求其对于日军和伪满洲国具有最大限度的依附性，并要担负日军对付苏联和外蒙古的战略任务。

1936年1月，关东军参谋部又对上述要领进行了修订补充，进而制订更为具体的《对蒙（西北）施策要领》，规定其方针仍是：“关东军基于帝国陆军的形势判断对策为作好对苏作战准备，应当采取必要的对外蒙古的怀柔措施以及促进其反苏分离的气氛，同时为了有助于对华工作的进展，且巩固满洲的统治和国防基础的目的，要从实质上强化德王统制下的内蒙古军政府，同时使其势力逐渐向中国西部地方扩大，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最终要使内蒙同中央分离而独立”，同时确定，其施策的重点地区目前仍是绥远，其后将向外蒙古及青海、新疆、西藏扩大”。对此，陆军省为通盘考虑对华战略、兼顾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实施，遂制定《对内蒙施策实施要领》，对关东军制定的计划略加调整，将绥远南部及宁夏方面划归中国驻屯军担任。该月13日，陆军省的《第一次华北处理要纲》曾提出“内蒙工作其范围应大致限定在长城线以北，且暂不波及东部绥远四蒙旗的地域”，力图突出分离华北的中心地位。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版，第493～496页。

〔日〕《现代史资料》8，第540页。

〔日〕《现代史资料》8，第350页。

第二节 日本对华北主权的逐步攫取

日本对华北的侵略活动，在 1933 年“榆关战役”之后逐渐加强，伴随其分离华北政策的酝酿和形成，日益加剧了对华北主权的攫取。在中国方面，由于执政的国民党以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基本着眼点，仇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的革命运动，实行“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将中国共产党视为心腹之患和主要敌人，将“剿共”放在第一位，而对日本的侵略，则采取一再妥协退让的政策，并压制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因而不能形成抵御日本侵略势力的有效力量，以致日军在华北的侵略行动一再得手。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

一、张北事件、察东事件与《秦土协定》

察哈尔省为宋哲元第 29 军驻防地区，察哈尔省的张家口、张北两城，乃华北重镇，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日军在其“华北政策”以及“内蒙工作”的方案中，都十分重视这一地区，其矛头常首先指向张北、张家口等要地。

（一）张北事件

日军制造的张北事件，共有两次。

1934 年 10 月 27 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外交书记生他田克己等一行 8 人，以前往内蒙“旅行”为名，未经报告中国有关方面，即出发前往多伦。到达张北南门时，企图立即穿行而过，守门卫兵及保安队索查证件，盘查约 40 分钟后放行。10 月 29 日，日本驻张家口代理领事桥本正康，向驻军第 132 师提出抗议。30 日，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向宋哲元提出强烈抗议。

11 月 25 日，宋哲元令第 132 师师长赵登禹向日军道歉，并于 29 日将直接责任者连长免职后，日军才暂告罢休。

1935 年 6 月 5 日，日本关东军驻阿巴嘎特务机关的 4 名军人，奉该特务机关长盛岛角芳的派遣，以“旅行”为名前往张家口，潜入察哈尔境内偷绘地图。当其乘卡车由多伦去张家口，途经察省张北县城南门时，因无护照，被哨兵暂时扣留，但宋哲元怕触怒日方，下令放行。第二天上午，驻军将 4 名日本军人“礼送出境”。然而，日本驻张家口领事馆却诬称日方人员在张北受到“非法监禁”，在向关东军司令部报告的同时，于 6 月 11 日由领事桥本正康和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出面，向国民党察哈尔省政府民政厅长、第 29 军副军长秦德纯提出抗议，并提出向日方道歉、处罚责任者和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等三条无理要求。松井还宣称：“五天之内得不到答复时，我军将采取自由行动。”这就是第 2 次张北事件。

（二）察东事件

1935 年 1 月，日军曾制造了第 1 次察东事件。1 月 18 日，关东军司令部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 年版，第 94 页。

发表声明，诬称驻守热察边区的宋哲元部有碍行政，曾限该部于上年 12 月 31 日撤退而未履行，故决定要以武力驱逐宋军。1 月 19 日，日本驻华公使馆武官高桥坦向第 29 军军长兼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提出警告，胡说独石口到沽源一带中国军队所驻守地方，属热河省丰宁县境，要求中国军队迅速撤出，否则将采取“断然态度”。宋哲元根据何应钦的指示，于 20 日派察省民政厅长秦德纯面晤关东军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源之助，表示愿意让步取得和解。但日军于 1 月 22 日以步炮兵 1000 余人，伪军 2000 余人，向长梁、乌泥河、独石口一带发起进攻，日机配合日军的地面攻击，连日轰炸独石口、东栅子等地。2 月 2 日，中日双方代表在大滩达成协议。2 月 4 日，北平军分会公布了“大滩口约”。议定日军即返固原防，二十九军亦不进入石头城子、南石柱、东栅子（长城东侧之村落）之线及其以东之地域。

日军通过制造这次察东事件，削弱了中国政府对沽源县长城以东地区的控制。5 月，日军更把察东沽源县的小厂、石头城子、乌泥河、北石柱、长梁、断水梁等地，划为“热河丰宁县第六区”，设置“国境警察队。”并以日本军官名字改变地名，如长梁改称林田堡（日军队长林田）、乌泥河改称松田堡（日军队长松田）。

6 月，日军再次制造了第 2 次察东事件。

11 日，热河日伪军在察东发动新的军事进攻，热河伪军进犯东栅子。12 日，伪满国境警察队进犯小厂。第 29 军所部在上述地点进行了抵抗。然而，日方却硬说：“6 月 11 日丰宁县日本人参事官一行，将进入东（北）栅子（独石口北约八公里的伪满洲国境内）时，遭到独石口宋哲元部队的步枪射击面返回。”还说 12 日，宋军又向小厂的国境警察射击。关东军立即以此为借口，电令土肥原少将，要在“最短时间内使守军撤退到黄河以南。”而日本陆军部认为，将宋军逼过黄河，恐有过份刺激，影响平津地区之虞，遂于 13 日电令土肥原，暂时放弃了迫宋哲元撤过黄河的决定。

（三）秦土协定

对于张北、察东事件，何应钦唯恐事态扩大，指示察省当局，要求对日方“斟酌情势办理”。6 月 13 日，日方负责交涉张北事件的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到北平，与日本使馆武官高桥但密谋。此时，日本关东军又派土肥原为全权代表来天津参与交涉，松井邀察省交涉代表民政厅长秦德纯同赴天津。6 月 16 日，日方又提出道歉、撤职和惩办第 132 师参谋长、军法处长等 4 项要求。17 日，关东军将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召到长春仔细密谋，最后决定：以平津地区为重，将上述事件发生后的问题作为地方性问题而加以解决，要求中国将在“满洲国”境内和多伦附近的军队向张家口方面撤退，由宋哲元就各类事件向日方谢罪，处分直接责任者，中方保证将来不再发生类似事件等。由于土肥原等人在平津大肆活动，要求罢免宋哲元，国民党政府于 6 月 19 日下令免去宋哲元察哈尔省主席职务，改由宋的副手秦德纯代理。6 月 23 日，土肥原偕同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及驻张家口特务机关长松井，由天

天津《益世报》1935 年 5 月 5 日。

〔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史》1，第 74 页。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 107 页。

津市长程克陪同，到达北平府右街秦德纯住所，提出宋哲元军撤退，向日方道歉并处罚责任者等 5 条苛刻要求。关东军为配合上肥原谈判，调兵 4000 余人在古北口、南天门等长城一线进行实弹演习。在此情况下，国民党政府再度妥协，于 26 日晚复电同意签署协定。27 日上午，中方代表秦德纯、察省官员陈觉生和雷寿荣与日方代表上肥原、高桥坦签署了协定，其主要内容是：

“一、从日中亲善的角度，为了将来日本方面在察哈尔省内的合法行动不受阻挠，向察哈尔当局提出以下要求：

(1) 将驻于昌平和延庆一线的延长线之东，并经独石口之北、龙门西北和张家口之北、至张北之南这一线以北的宋（哲元）部队，调至西南地区。

(2) 解散排日机构。

(3) [对日] 表示遗憾，并处罚负责人。

(4) 从六月二十三日起，在两星期内完成以上各点。

(5) 制止山东移民通过察哈尔省。

二、此外，作为要求事项的解释：

(1) 必须承认日满的对蒙工作，援助特务机关的活动，并且停止移民，停止对蒙古人的压迫。

(2) 对日满经济发展和交通开发工作予以协助，例如对张家口——多伦之间，以及其他满洲国——华北之间的汽车和铁路交通，加以援助。

(3) 必须对日本人的旅行予以方便，并协助进行各种调查。

(4) [从日本] 招聘军事及政治顾问。

(5) 必须援助日本建立各种军事设备(如机场设备和无线电的设置等)。

(6) 中国军队撤退地区的治安，应根据停战区所使用的方法予以维持。”

这就是所谓《秦德纯土肥原协定》，又称《察哈尔协定》，日军据此实际控制了察省北部地区。

二、河北事件与《何梅协定》

(一) 河北事件

日军在华北进行侵略扩张，基本手段是制造阴谋事件，以此为借口，进行讹作，劫夺权益。在河北方面利用的借口和制造的阴谋事件主要有：孙永勤事件和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等。

孙永勤系河北兴隆县黄花川人，自幼习武。当日军侵占热河后，在家乡组建“民众军”，发动了抗日武装斗争，打击日伪势力，从而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1934 年 2 月，中共冀东特委派特委委员王平陆会见孙永勤，民众军从此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冀东特委选派了一部分优秀党员加入这支队伍，经过整编，改名为“抗日救国军”，孙任军长，下辖 4 个纵队，队伍发展到 5000 余人。救国军击退了日伪多次“围剿”，在一年多时间内，拔除日伪据点、消灭日伪军，战绩卓著。

1935 年 2 月，救国军在日伪协剿之下，被迫转移到河北遵化县境内。5

〔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美铃书房，1982 年版，第 491 页。

月，在茅山地区遭 5000 余日军包围和国民党军的协同“会剿”，孙身患重病，仍坚持指挥抵抗，不幸中弹牺牲，余部突围撤到长城外。日军镇压了这支人民武装的反抗斗争，接着又借口孙军进入非武装区，得到国民党地方政府的庇护等大作文章，对中国政府横施压逼，这就是孙永勤事件。

胡恩溥、白逾桓被暗杀事件。胡恩溥系天津亲日的《国权报》社社长，住日租界寿街北洋饭店。

1935 年 5 月 2 日晚，有人潜入其住宅，向胡连击数枪后逃逸。日租界巡捕闻声赶到，未获凶手，将胡送至租界盐谷医院，因伤重毙命。白逾桓系天津亲日报社《振报》社长，住日租界须磨街 22 号。5 月 3 日凌晨 4 时许，有人潜入住屋，连击 3 枪，当日本警署人员赶到现场时，白已身死。胡、白死后，两家汉奸报纸即告停刊。胡、白二人均系亲日派人物，经常往来于伪满地区及日本，二人所办报纸受日本驻天津军事机构资助，并为日本侵华政策作宣传辩护。胡、白二人在戒备森严的日租界被杀，日本即借机说这是中国排日运动的表现，向中国施加压力，要求将平津等地区纳入“非武装区”。但是当时许多人认为并指出日本驻军参谋长酒井隆上校是事件的操纵者。在国民党政府方面，孔祥熙财政部长会见美国大使詹森说：“亲日记者被杀害，应该说是日本为设置（侵略）口实所为。”

（二）何梅协定

日本为利用上述事件来压迫中国政府，1935 年 5 月 29 日，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偕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一同到北平军计会代委员长何应钦住所北平居仁堂，会见了何应钦及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秘书长俞家骥，第一次以口头形式提出了日本的通告和要求。基本内容有：

“第一，由于中国官宪方面的责任，发生了对付满洲国的阴谋，中国方面给予长城附近的中国义勇军援助，还有实行对日恐怖等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其发动的根据地在北平和天津。如此看来，日本军队已经需要再度越过长城线而进行新的发展，北平、天津两地也应在实际上包括进停战区域。”

“第二，明恩溥、白逾桓被暗杀，是践踏在天津订立的交换公文，是对日本的挑衅行为，今后如有类似事件发生，日本将依据条约所规定的权力，采取自卫上听必要的行动。”

同时又提出如下具体要求：

“1. 中国宪兵第三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政治训练处和与事件有关系的国民党部及排日团体从平津撤退，罢免这些团体的负责人员。

2. 罢免于学忠河北省主席职。

3. 希望事项：驻平津地区的第 51 军（于学忠军）及中央军移驻保定以南，禁上平津地区党部及蓝衣社和其他秘密团体所策动的反满抗日活动。”

5 月 30 日，驻天津日军将装甲车、小炮及机关枪队在河北省政府主席办公楼前的路上展开，飞机在平津两市上空低飞盘旋，对于学忠施加压力。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 年版，第 18 页。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1979 年版，第 18 页。

原著者注：1902 年 7 月 12 日订立，包含镇压治罪权。

张篷舟：《近五年中国与日本》第 2 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51 ~ 52 页。

6月4日，酒井、高桥再次到居仁堂访何应钦，询问对日方要求的执行情况。何应钦答复说，已处理者已有罢免蒋孝先等3人，解散宪兵第3团特务处等7项。但酒井等变本加利，当即又提出将于学忠免职，从天津撤走国民党河北省党部，调走北平的宪兵第3团，解散抗日团体及调走驻天津的第51军等5条更为苛刻的要求。七月7日，关东军调兵至古北口、山海关等长城一线，炫耀武力，显示其向平津推进的态势。6月9日，酒井、高桥第3次晤见何应钦，步步紧逼。国民党当局一味妥协，当日，何应钦以口头形式答复酒井和高桥等谓：“日方所希望之点，截止昨日为止，已完全办到：1.于学忠、张廷谔已他调。2.军分会政训处已结束，宪兵第3团已他调。3.河北省党部已移保定，天津市党部已停止工作，4.日方认为有碍两国国交之团体（如励志社、军事杂志社）已结束。5.第51军已决定他调”。然而，对于国民党当局这些让步，酒井等仍然表示不满，又提出除已办诸事之外，还须办理以下四点：“1.河北省内，一切党部完全取消。2.第51军撤退，并将全部离开河北日期告知日方。3.窜2师、第25师他调。4.排日行为之禁止。”酒井等人还将日方要求的缮写件一份交中国方面。上述要求限中国于12日午前答复，并一再声称，中央军调离河北系日军军部之决意，绝无让步可言。对于如此无理的压逼，国民党竟再度让步。6月10日，何应钦会见高桥，根据国民党中央的训令，以口头形式，答应了日方全部要求。同日，国民党政府发布《敦睦邻邦令》称：“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在此前的6月6日，国民党政府已令于学忠率第51军经保定退避陕西，再以孙永勤入境问题令遵化县县长何孝怡辞职，宪兵第3团调走。6月10日停止了国民党部在平津两市的活动。中央军关麟征部第25师开始移驻洛阳，黄杰部第2师移驻豫皖。对于中央军南撤，当时有人就写了一首诗：“忽闻协定说班师，十万儿郎涕泪时；忍辱不堪回首望，城楼不见汉家旗。”

日本侵略者对于国民党当局的一再退让和全部承诺仍不满足，又催逼中方用文书形式答复，以便作为凭据。6月11日，高桥突然携带一份由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签署的“备忘录”到北平军分会，要中国方面照抄一份，并由何应钦签章后送交梅津，该备忘录全文如下：

梅津致何应钦备忘录

“一、中国方面对于日本军曾经承认实行之事项如下：
（一）于学忠及张廷谔一派之罢免；
（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非之罢免；
（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
（四）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社之解散；
（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之取缔，并不容许其存在；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07~408页。

张篷舟：《近五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1~52页。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07~408页。

(六) 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
(七) 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
(八) 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

(九) 中国内一般排外排日之禁止。

二、关于以上诸项之实行，并承认下记附带事项：

(一) 与日本方面约定之事项，完全须在约定之期限内实行，更有使中、日关系不良之人员及机关，勿使重新进入。

(二) 任命省市等职员时，希望容纳日本方面之希望，选用不使中、日关系成为不良之人物。

(三) 关于约定事项之实施，日本方面采取监视及纠察手段。

以上为备忘起见，特以笔记送达。

此致

何应钦阁下

昭和十年六月九日

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

梅津备忘录的第一部分，把何应钦在6月4日、9日、10日的3次答复内容全部记录文中，要求何签署以形成正式协定。6月15日，经南京国防会议决定：“此事始终口头交涉，且酒井隆参谋长、高桥坦武官一再声明，由中国自动办理。现中国均已自动办理，且必能如期办妥，是日方意见已完全达到，实无文字规定之必要。我方难以照办，应请日方原谅。”但日方仍蛮横进逼，于6月21日、7月1日由高桥连续登门将拟好的一个要何应钦具名的通告交何应钦，文稿全文是：“六月九日由酒井隆参谋长所提出之约定事项，并关于实施此等事项之附带事项，均承诺之。并拟自动的使其实现，特此通告。”何应钦在得到汪精卫的批准后，按该文稿复函，全文如下：“敬启者，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待此通知。此致，梅津司令官阁下。何应钦，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七月六日。”

至此，由梅津备忘录和何应钦复函实际达成协议，史称《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的形成；使日本攫取了河北省和平津两市的大部主权。有吉大使则声明说：“期望中日两国国交之圆满不仅限于一地，应将全华排日风潮为之一扫。”日方毫不掩饰侵吞全中国的意图，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三、“华北自治”事件

日本炮制“华北自治运动”，制造了各种大大小小的“自治”事件，对中国华北地区主权进行粗暴的践踏和肆无忌惮的侵夺，在这些事件当中，关东军和中国驻屯军是主要的策划与执行者，中国方面曾对日本驻军的侵略行动表示抗议，要求日本政府约束其驻军的行动。日本军方则公然宣称：“本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19~1020页。

《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4年版，第416页。

同上，第424页。

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3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2年版、第1020页。

天津《益世报》1935年6月29日。

问题为关于停战协定内属于军司令官之统帅事项，而非外交事项，故不可移于外交交涉，想应由驻在军部当局处理之也。”完全是实力外交，跋扈之至。其主要的事件有：

（一）丰台事件

丰台事件是由汉奸白坚武在日军的指挥和配合下，在北平西南部丰台发动的武装暴动。白坚武是河北交河县人，曾任吴佩孚的政务厅长，1926年，北伐军击溃吴佩孚军队，白东渡日本，成了汉奸。1933年在沈阳组织“正义社”，1935年在土肥原支持下，纠集汉奸石友三、李瑞清等拼凑“华北正义自治军”，白任总司令，日本浪人樽崎一良为顾问，拟在北平暴动，组建“自治政府”，成立“华北国”。

为此，白收买北平军分会所属铁甲车大队的第5中队长沈锡之与第6中队长段春泽，段被委任为“华北正义自治军”第2路总指挥。铁甲车队原属张学良东北军，张下野后归隶北平军分会，下辖6个中队，分驻南口、西直门、长辛店等北平四郊，第5、第6两中队驻丰台，曹耀章任大队长。白还派汉奸李瑞清先行收买大队附邹立敬，邹不愿当汉奸，虚与委蛇，向曹耀章密报，曹随即密报北平军分会何应钦。北平宪兵司令邵文凯等设计逮捕了活动于铁甲车队策划叛乱的汉奸李瑞清。

白坚武和石友三等人见事情败露，遂决定提前发动叛乱。1935年6月27日夜，白坚武率60余名匪徒，伪装成日本人（内有一部分日本人）由天津乘快车在丰台车站下车，引起了乘警的注意。曹耀章得知驻丰台的铁甲车中队情况有异，亦向上作了报告。平津卫戍司令王树常立即采取措施，令全城紧急戒严，所属缪澂流部用麻袋盛土封堵永定门缺口，加强东交民巷警戒。

在丰台站下车的日本浪人会同段春泽的第6中队，于28日凌晨向北平开进。段逆一伙到达永定门，缺口已堵，车队无法前进，日本人命令向城内西长安街北平军分会所在地发炮，企图以爆炸声通知东交民巷的便衣队出来响应，但炮弹被士兵卸去引信，均未爆炸。便衣队在东交民巷受到四周军警的包围，无法行动，此时天将拂晓，城外叛军不敢拖延，听从日本人命令退回黄村。段春泽见大势已去，率300余人逃往香河县。该县长赵钟璞已经接到了王树常密令，设计抓捕了段春泽等3名头目，其余部下立即自行散去。段等被解往北平，经审讯后枪决。第5中队长沈锡之等叛乱时没有直接参加，但也没有听从命令截击叛乱，遂被扣押。日本顾问松井兼之及几名日本浪人也一同落网，其后由日本领事馆引渡回天津。据“日方史书记载，丰台事变中直接参加叛乱的日本人有15人。在天津坐镇指挥的白坚武等在日军的保护之下从塘沽乘轮船逃往东北。

（二）香河事件

丰台事件不久，又发生了香河汉奸叛乱，其导火线是香河县的税收问题。1935年8月13日，香河县政府颁发布告，宣布从9月10日开始，每亩土地

北平《晨报》1935年6月2日。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2页。

再增加附税 1 角 2 分，连同以前增加的 5 分 1 厘，每亩地每年共附加 1 角 7 分 1 厘。这对土地贫瘠，连年天灾的香河地区农民来说，无疑是一沉重的负担。布告贴出后，民众怨声载道。那些土地较多的乡绅地主们更为不满，城南柴庄的武宜亭，城北领子村的安厚斋等，想借民心波动之机，鼓动抗税不缴。武宜亭有土地 100 余亩，北洋军阀时代曾任过河北省议员，其子武真华在日本留过学。父子二人是仰仗日本势力、横行乡里的汉奸劣绅。

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得知武宜亭等要闹事的消息，甚为高兴，他们认为这是“华北的有识之士从心底里产生出的华北自治的迫切愿望。”香河县地处平津之间，又与“非武装区”相连，战略地位重要。在此策动“自治”，既可直接影响平津两市及河北全省，又能使国民党方面难以武力干涉。把香河抗税闹事纳入“分离华北”阴谋的轨道，还能通过武宜亭等人搞一个“民众倡导自治”的先例。10 月上旬，曾任伪满军事顾问的日本驻天津特务机关长大迫通贞，在北平对武宜亭、安厚斋亲自指点，面授机宜。武、安等返回香河，武真华与两个日本浪人胜见、福田霞也同时赶回柴庄。一面联络乡绅地主，一面派人到各村串联煽动。

18 日，武宜亭与两个日本浪人到大地主胡承武家，召集所谓“国民自救会”，决定 20 日以请愿抗捐为名到县府闹事，“要求县长收回成命”，“要求自治”。20 日晨，约 2000 余被鼓动起来的民众聚集到县城门口，武宜亭到场指挥。县府已经获悉武宜亭等人将举行叛乱，见状急忙关闭城门，只让其派 3 名代表入城交涉。此时，两名日本浪人带领部分胁队者，撞开城门涌入城内，经该县警察鸣枪弹压，又将城门关闭，受骗民众大部散去。翌日，河北省主席商震，由附近的三河县调“非武装区”保安队第 1 总队第 7 中队前往香河。日本使馆借口有日本人参加，便从北平派出宪兵 20 余名，由分队长大木带领，分乘汽车 2 辆，开赴香河蓄意扩大事态。当日下午，日本宪兵到达县城西门，汽车穿城而过，武宜亭等暴乱队伍，随之蜂拥而进，占领县政府各机关，接管县城四门的警戒。6 月 22 日，武宜亭等扩凑了一个“县自治会”，主持县政，并派人四处张贴和散发由武署名的“香河县人民自救自决宣言国民党政府对日本有计划煽动的香河乡民暴乱，既不愿放任不管，又怕采取措施会触怒日方，遂于 10 月 23 日命令商震“妥为处置”，“万勿任其扩大”，“于外交中得一根本解决办法”。商震所派代行县长职的省参议刘耀东到达香河后，23 日 19 时，武以个人名义宴请刘参议及日本“代表”西村。刘不知这是一席难吃的鸿门宴，如约前往。席间，西村向刘索阅省府委任状，刘从身上取出递过，西村根本不看即将其撕毁。刘耀东提出抗议，武宜亭同伙一拥而上，将刘打得大呼救命，刘的随从 3 人拔枪登楼，武等一齐开枪，随从杨文治身中 5 弹，当即倒地。其余 2 人亦受伤，其后一人重伤在医院死去。刘本人被扣押监禁。随后，武等率众挖掘战壕，准备凭武力顽抗。

商震于 24 日晚从北平赶到天津，次日会晤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和参谋长酒井隆，以及日本驻榆关特务机关长竹下晴义等人，但未能解决。各国驻平人员纷纷表示对事态的关注。6 月 24 日，日本陆军省召开非正式军事参议官会议，川岛陆相、桥本次官、杉山参谋总长等均参加，讨论了所谓“华北农民运动的情势”。会后，陆军省发言人说，香河事件，将来无发展之可

〔日〕《现代史资料》8，《日中战争》1，第 129 页。

《北京日报》1935 年 10 月 27 日。

能、“可望依华方当局之手使之平息。”基于日本“民众倡导自治”的隐讳策略，事态扩大对日本好处不多。中国驻屯军及驻华特务机构，经过一番强同夺理的纠缠后，才与商震达成协议，放弃对武宜亭的支持。这伙叛逆一失去主子撑腰，立即如乌兽散，武宜亭于6月27日晚逃进天津日租界，其余亦各寻出路。驻通县的保安第1总队第7中队于28日早6时开入城内，维持治安。这样，一场由日本扶植的“自治”闹剧匆匆收场。据日方宪兵队调查材料，有6名日本人参加了这次叛乱，整个事件受到了伪满驻天津特务机关的操纵。

（三）冀东防共自治政府

冀东泛指河北东部平津一线东北的大片地区，包括唐山、秦皇岛等重要城市及22个县城，面积约3.8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00余万。日本的关东军虎踞于前，驻屯军狼顾在后，到塘沽协定签署，这里大部分被划入所谓非军事区，实际上已成为日军的囊中物。

1933年9月，国民党政府批准将冀东22县划为两个区，在唐山和通县分别设立滦榆、蓟密两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由陶尚铭、殷汝耕分任公署专员。陶不讨好日本，为日方所排斥，不得不于1935年7月27日辞职，转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参议。殷汝耕由日本推荐改任滦榆区行政督察专员，遗职由苏玉琦继任，冀东大权实际上全部握于殷一人之手。殷汝耕系浙江平阳人，早年曾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娶了日本妻子。其后虽然归国，实际却是一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日本学者评论他是：“自认为只有依赖日本才有安身之本，任何时候都是心甘情愿地投靠日本。”殷曾参与1932年《松沪停战协走》和1933年《塘沽协定》谈判，为日方尽了犬马之劳，深得土肥原等日本军政要员的青睐。殷在任专员时竭力巴结日本，纵容日方走私，完全成了日方在冀东得力的看家犬。

8月4日，滦县车站保安队长刘佐周被人暗杀，日本一宪兵亦被流弹击伤。日方认为是离任的陶所策划，一方面向中国提出抗议，同时还以商谈为名，约见已去北平的陶尚铭，并将陶扣留两周之久。这就是“滦东车站事件”。

土肥原致力于华北“自治”，在拉拢宋哲元遭受挫折后，即着眼于冀东，企图利用殷汝耕树立一个“自治”典范，打开一个缺口，以实现其分离华北的政策。照土肥原的盘算，以此促动，“说不定宋哲元也会屈服”。决定让殷公开打出其叛国“自治”的旗号。

1935年11月23日，殷汝耕在天津与土肥原密谋后，当晚召集停战区各保安队总队长开会，决定宣布停战地区自治。24日，殷汝耕返回通县，当夜发表“自治宣言”，25日便在通县宣布建立“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殷如此尽心尽力，连上肥原的助手专田盛寿都感到：“大大出乎我们的意料。”

殷汝耕宣布“自治”的消息，给了国民党政府以巨大冲击。为防止事态

天津《益世报》1935年10月25日。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233页。

《日本外交史》19，第238页。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43页。

的扩展，国民党政府于11月26日宣布撤销北平军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北平办事长官，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通缉殷逆，撤销滦榆、蓟密两区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但冀东地处“非武装区”，有日军庇护，南京政府没有能力惩罚他，蒋介石也说：“要讨伐他，就一定会直接和日本冲突；我们现在力量不够，不得不暂时容忍。”

在日军卵翼之下，这个伪自治委员会在一个月之后，改称“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改组后的自治政府制定了组织大纲14条，设委员9人，殷汝耕为政务长官，“总揽全区军政事宜”。1936年4月，该傀儡政权第二号人物，政府秘书长兼外交处处长池宗墨，作为专使率10余名官员访问伪满洲国，其目的是公开表示“为与邻邦敦睦友谊，并专诚答谢关东军”。池宗墨一行每到一处，肉麻地吹捧伪“满洲国”为王道乐土，保证要以日满“王道乐土精神，灌输于我冀东二十二县”。5月，伪“满洲国”官员回访冀东，互相安抚。殷逆不但为日本看护冀东这块殖民地，还配合日本的侵华政策，频繁以通电、谈话，甚至以飞机播撒传单等方式，向宋哲元、阎锡山等国民党华北大员施加压力，要求他们跟着冀东实行“自治”。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了日本推行分离华北政策的得力工具。

四、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日本将国民党政军两方面的势力逼出平津等河北中心区之后，立即着手扶植“自治”傀儡。日本曾拉拢诱使华北各势力代表人物，如于学忠、孙传芳、吴佩孚以及阎锡山等人，均遭抵制或公开拒绝。其后，日本分析宋哲元拥有很大的政治军事力量，又同南京政府有矛盾，是一个理想的对象，遂展开了对宋的“工作”。

日本最初设想要达到的目标是土肥原所拟定的“高强度方案”，建立“华北共同防共委员会”，其主要内容有：“（1）自治领域为华北五省，推宋哲元为委员长，委员会中聘日本人为顾问；（2）由最高委员会主持五省军事，截留五省关税、盐税、统税分配给五省；（3）向确立日满华三国的合作经济圈迈进，即：开发矿藏资源，振兴棉花栽培，脱离国民政府的白银国有令，通货与日本建立连锁制等；（4）扑灭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宣扬东洋主义。”

土肥原还企图在国民党的五全大会召开期间达到这一目标，在五全大会闭幕时公开宣布自治消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日本在军事上对中国施加巨大压力。1935年11月13日，日本关东军调一个旅的兵力在山海关等处摆出推进姿势，海军亦调兵到青岛。

日本侵入华北，触动了国民党和蒋政权的根本利益，国民党内反对对日妥协的势力在增长。英美等国在华北亦有巨大的利权关系，它们也不愿看到日本独霸华北。因此，蒋开始以较为强硬的态度向日方谈判。为力求主动，不允许宋哲元等地方将领进行对日交涉，同年11月20日蒋电告宋说：“中央必当以实力为兄等后盾，决不令兄独为其难。”又电告河北省主席商震：

《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82年版，第85页。

《冀东日报》1936年4月24日。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原书房，第65页，注释。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4页。

“如平津自由行动降敌求全，则中央决无迁就依违之可能，当下最后之决心。”同时，蒋调集部分军队至京沪、陇海等线，还命令河南方面赶造船只，以防不测。对于宋哲元来说，尽管同国民党蒋介石有不少矛盾，却绝不甘心作日本的傀儡。但迫于日方的压力，又幻想借外力保障其在华北的地位，所以，宋没有完全拒绝日本的拉拢。

11月20日，日本大使在南京会见蒋介石时说：中国方面对华北“如果采取压迫或武力镇压等办法，势必引起纠纷事态和破坏治安，进而还会严重影响与该地有密切关系之日本及满洲国，特别作为负责满洲国安全之关东军，决不会对此默视不问。”蒋答：“作为中国，对引起反国家主权完整，破坏行政统一等之自治制度，绝对不能容许。”还说：“今天和贵大使会见，本拟商谈有关中日邦交改善问题，而首先谈起属于内政问题之华北自治运动等，甚感遗憾。”但同时，蒋又表示，对于华北的特殊情况，自己也特别有所认识，决心近期废除军事分会，另派能胜任同日方接触的高级官员，以打开调整事态的途径。日本方面看到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后中国民众抗日气氛的高涨，顾虑到强力施行华北高度自治方案会引起英、美等国的强烈反应，且有可能迫蒋调兵北上。经过11月18日召开的三相会议，日方决定暂缓11月20日就要宣布的强硬计划，对华北的举措视有吉与蒋会谈的结果而定，自治内容可以采取“轻度自治”，“以渐进方式工作”。

11月30日，蒋介石与行政院五院长制定“华北自治办法”六条：“（一）实行共同防共；（二）关于币制改革，在华北方面可作适当修改；（三）考虑关内外人民关系密切，对两地的经济关系予以方便；（四）在财政方面给华北政权以相当支配权；（五）给予就地合理解决对外悬案权；（六）根据民意录用人才，实行理想的政治。”并派何应钦、熊式辉、陈仪、殷同等立即北上与宋哲元共商处理华北问题。当日晚，何应钦从南京去北平。行前，先派陈仪、殷同到天津拜访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多田骏，到北平拜访土肥原和日本驻北平武官高桥坦，在征得日方同意后，何于12月3日晚进入北平。4日晨，何与宋等举行会议，讨论解决华北时局的办法，宋哲元表示愿在何应钦领导下努力解决华北问题。但是，在日本军方警告他不要在背离日本方面走得太远后，5日晨，宋哲元忽然宣布到西山“休息”，并发表书面谈话称：“此后一切困难问题，当悉听命何部长负责处理”。宋去西山后，留下秦德纯、萧振瀛与何应钦周旋，会谈实际成为僵局。12月5日，15架日本飞机在北平上空低空盘旋，并投下殷汝耕要求宋哲元响应自治的传单。据此情况，何应钦与秦、萧等商定，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由宋哲元任委员长兼绥靖主任。6日晨，萧振瀛赴天津，向土肥原和多田骏通报这一方案，征得了日本同意。8日，何应钦在电请国民党中央照准后，即召集陈仪、熊式辉、萧振瀛等会商冀察政务委员会的组织。

日本肆无忌惮地分裂华北和国民党政府的一再妥协退让，遭到全中国人

《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1），第715页。

《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10~311页。

秦郁彦：《日中战争史》，第64页。

张篷舟：《近五十年中国与日本》第2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24页。

《国闻周报》卷12第48期，1935年12月9日。

民的反对。

1935年8月1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在著名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中指出：“最近以来，汉奸卖国贼等在‘中日亲善’、‘中日合作，和‘大亚细亚’等口号之下所作的降日卖国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未有之奇闻！”“同胞们起来！为祖国主命而战！为民族生存而战！为国家独立而战！为领土完整而战！为人权自由而战！”11月13日，中共中央又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呼吁全中国的民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吞并全中国。”

北平、天津、上海各大城市和河北省各地群众团体、爱国学生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反对“假自治之名，行叛国之实”。北平教育界以联署的方式发表声明，反对“自治”，“要求政府用全国力量，维持国家的领土及行政的完整”。冀东的昌平、香河、玉田、三河、顺义、宁河、平谷、乐亭、临榆、抚宁、卢龙等11县的县长也相继发表声明，决不附逆。冀东旅平同乡会通电全国，要求政府“查抄殷逆浙江省永嘉县原籍家产，一面坐以重罪，以为媚人叛国者戒。”

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激怒了广大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北平爆发了“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运动持续到12月16日，原定12月16日举行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大会，只好延至12月18日举行。其大会开得十分短小，据报道，“晨起，外交部街及东单牌楼一带，加紧戒备，军警林立，……开会时间，事前并未发表，开会时，仅到有少数来宾，及该会职员与新闻记者等30余人”，开会仅20余分钟就宣布散会。

冀察政务委员会是国民党政府对日妥协政策的产物，是一个在名义上主权还属于中国的半自治地方政府。委员会的委员中间，有相当一部分是日方授意或征得了日方认可的亲日分子，如王克敏、王揖唐、高凌霄、李廷玉、贾德耀、冷家骥等，他们中有的还是汉奸分子。委员会下设经济、外交、交通等“特种委员会”，多为亲日分子所把持，并设有日本人顾问。委员会在行政上与南京政府保留半独立关系，而经济上，南京政府的关税、盐税、统税和铁路收入等完全被截留，与日本保持“特殊关系”，通过日本所设“兴中公司”等殖民机构实行“经济提携”，满足日本对华北各种资源的需求。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日本于1936年1月制定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要求将自治的范围扩大到华北五省，并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大体上可以信任的时候”，让宋与殷汝耕“合流”，尽快实行完全的“自治”。日军参谋部也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在明朗化方面总是进了一步”，它将“成为华北五省政治上脱离南京政府而独立的阶梯。”

然而，在全中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运动的压力下，宋哲元对日态度也日益明确。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488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6、567页。

《国闻周报》卷12第47期，1935年12月2日。

《中央日报》1935年12月10日。

《国闻周报》卷12第50期，1935年12月23日。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349页。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第128、133页。

1936年5月，他提出要“力保主权”的口号，释放被抓捕的爱国学生，在各学校开展军训，在军队进行爱国抗日宣传，在委员会同南京政府的大政关系方面，尽量执行南京政府指令。

1937年2月，宋甚至不顾日本的反对，派秦德纯代表他参加南京的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公开宣布“冀察外交今后将严格遵守中央政府的政策”，连经济领域过去对日最为妥协的状况，也开始改变，宋遵照南京政府意旨，停止了津石铁路、塘沽建港等项目的对日谈判，中止或改变了龙烟铁矿等项目的筹建上马。在土地管理等方面，亦抵制了日本的贪得无厌的要求。这些在一定程度上挫败了日军吞并华北的阴谋。

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和坚决斗争，曾迫使日本对其侵略华北的政策作了微小调整。如1936年8月11日的《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特别是1937年2月20日制定《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强调注意不要“造成激发中国民众的排日抗日感情。”其侵华的根本决策虽没有改变，却不得不采取更带欺骗和伪善的策略。

五、伪“蒙古军政府”的成立

日本对热、察等内蒙地区主权的攫取，采用了类似平津等地的手法，十分注意扶植傀儡政权，首先拉拢的是李守信。李系热河土默特旗蒙古族人，出身土匪，后投靠张作霖，因功逐渐升迁，任张学良东北军骑兵团长。

1931年冬季部驻防开鲁，曾与日本驻通辽的特务机关长田中玖暗中勾结。1933年初，李部击落一架日本低空侦察飞机，李守信亲自将飞行员和电台等送往长春。此事博得日本关东军司令官和参谋长的赏识，送他手提式机枪15挺，步枪25支，现款3万元。随后，李欢迎日军进入开鲁城，并协助日军占领林西，破日军委派为“热河游击司令”。从此，充当“关东军的谋略部队。”日军也认为由于李的投靠而“理出了推进内蒙古工作的头绪。”

1933年4月28日，李守信按照日军的指令侵入与热河邻近的察哈尔地区，以多伦为中心建立了“察东特别区”，李任行政长官兼军长。日军认为，单靠李守信还不足以策动内蒙的“独立”，又着手扶植第二个傀儡，即锡林郭勒盟副盟长兼苏尼特右旗“札萨克”亲王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德王是察哈尔部正白旗人，生于1902年，1908年世袭苏尼特右旗札萨克多罗社棱郡王。

1919年德王开始主持全旗政务。他从年轻时起，就抱有掌握内蒙统治大权的政治野心。

1930年冬，驻张家口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等，即以游历为名，到苏尼特旗进行拉拢德王的活动。

1931年夏德王到北平时，盛岛等请他到扶桑馆吃饭并进一步煽动他独立。“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拉拢蒙古王公加入伪满，实行“满蒙联

《传记文学》第23卷第1期，第8页。

《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57页。

〔日〕土肥原贤二刊行会：《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译本，第121页。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73年版，第274页。

合”。1932年，日本陆军派遣特务笹目来苏尼特旗，在德王的掩护下，冒充喇嘛，长期潜伏进行活动。同年，德王前往北平，串联当时住北平的蒙古王公等上层分子，组织了一个“蒙古王公代表团”，到南京活动。他们要求改组蒙藏委员会，反对当时由南京政府所委派的委员长石青阳，另用蒙藏人担任委员长，为蒋介石所拒绝。返回北平之后，继续以该代表团为基础，结成松散的社会政治团体，到处奔走串联，酝酿实现“内蒙古高度自治”。

1933年6月，爱国将领冯玉祥、吉鸿昌等在张家口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委任德王为蒙古军第1军长。但德王推辞不就，却前往百灵庙召集西蒙古部分王公，于7月26日举行第一次“自治”会议，通电国民党政府，要求在西蒙实行“高度自治”。9月28日，又在百灵庙召开第二次“自治”会议，并通过“内蒙自治政府组织大纲”。国民党政府顾虑日本在背后插手，为避免事态扩大，遂同意成立“蒙古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简称蒙政会），以乌盟盟长云端旺楚克（即云王）为委员长，伊盟盟长沙克都尔札布（即沙王）和索特那木拉布坦（即索王）为副委员长，由德王担任秘书长。1934年4月23日在百灵庙举行了成立大会，因云王、索王均已年迈，不愿到职视事，“蒙政会”实权遂落入德王手中。

德王在此时暗中通敌，尚未公开叛国，仍与蒋介石拉关系，领取国民党政府的财政资助。1934年底得到一次性蒙政会建设费12万元，经常费则每月3万元。还得到军政部拨发步枪、手枪300余支，轻重机枪20余挺，迫击炮数门，载重汽车4辆，大小无线电机10台等物资，这些经费和武器等，奠定了蒙政会的物质基础，增加了德王个人的活动资本。

德王要求的“高度自治”与日本策划的“内蒙独立”十分合拍。1934年初，日本特务笹目由苏尼特旗德王府动身回国，不久再回德王府，并在该旗设立特务组织“善邻协会”的分支机构，以办理卫生、文化事业为掩护进行特务活动。

1934年夏，长期在内蒙地区活动的日本大特务盛岛角芳，也潜来百灵庙与德王晤谈，并答应送给德王步枪2000支。同年10月，日本关东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亲自出马，来苏尼特右旗进一步拉拢德王，德王也就“干脆进一步与日本人勾搭起来了。”

1935年1月，日军制造察东事件，“这一事件事实上具有援助德王内蒙自治工作的意义。”当月，德王派其心腹宝贵廷带着他给伪满察东警备司令李守信和关东军驻多伦特务机关长植田的密信，潜赴多伦。在植田和李守信的帮助下，从内蒙东部招兵买马，成立了1个团，由宝贵廷任团长，暂在李部属下进行秘密训练。接着关东军派突浦为苏尼特右旗特务机关长，在该旗架设电台，并与德王商定保密办法，突浦化名石田三雄，以“善邻协会”理事名义为掩护。从此，德王与日本的勾结有了正式固定的联络渠道。不久，日本关东军蒙事处第2科长石本寅三与参谋田中隆吉等，来到苏尼特右旗会见德王。会晤中，田中拿着写有“满洲国”和“蒙古国”的一张纸对德王说：“我们日本已经帮助满人建立了‘满洲国’，现在还要帮助你们建立‘蒙古国’，今后日、满、蒙可以共同合作”。1935年6~7月间，日本连续制造

《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中华书局出版，1979年版，第20页。

《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23页。

《文史资料选辑》第63辑，第21页。

了张北事件和河北事件，在加紧分离华北的同时，也加快策动内蒙独立。日本关东军专派小野寺少校给德王赠送飞机1架。日本“满铁”总裁也同时派员给德王送来整套的电影、照像和放映机。8月，关东军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借渡边上校、田中隆吉参谋等，亲自飞往内蒙，与德王密谋建立“蒙古国”的问题。

1935年12月，正当华北危急之际，德王应日本关东军邀请，赴伪满“新京”（长春）与关东军司令官南次郎、参谋长西尾寿造、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等会谈，商定先在内蒙西部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立独立的“蒙古国”。为解决经费和武器问题，关东军送给德王日币50万元和步枪5000支。德王由长春返回苏尼特右旗后，确定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此时，关东军“期望一举推进内蒙工作，使李守信占据口北六县，代替中国保安队，使此地区成为内蒙自治政府的基地。”12月，李守信伪蒙军在日军支持下，侵占察东的张北、室昌、康保、尚义、沽源、商都、化德、崇礼等8县，并控制了察东的正兰、镶白、正白、镶黄、太仆寺等8旗，在张北建立了李守信的伪司令部和日本特务机关。德王随即在察东成立“察哈尔盟公署”，任命其亲信卓特巴札普为盟长，达密林苏龙为副盟长。1936年2月1日，在张北举行了“察哈尔盟公署”成立典礼，察哈尔部的蒙人8旗遂为德王控制。

“察盟公署”虽成立，毕竟是地方政权，仅能指挥所属旗县。为成立统一机构，以号令其他各盟。

1936年2月12日，德王在他的王府举行了“蒙古军总司令部”成立典礼。日本关东军参谋长西尾寿造，乘专机到会祝贺。会后制定了组织大纲，决定由德王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4月24日，在关东军的操纵下，由德王出面，在锡盟乌珠穆沁右旗索王府召开了所谓第一次“内蒙古王公全体大会”，抛出“以内外蒙古和青海为一体建立蒙古国案”，“蒙古国体案”和“蒙古军政府组织大纲”等文件。

同年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云王为主席，索王、沙王为副主席，德王任总裁，总裁掌握军政大权，实行独裁制，李守信兼参谋部长，村谷彦治郎、山内、稻茨、山本信亲、崛并德五郎等日本人分别任主任顾问及军事、财政、外交、教育等顾问。会场上悬挂蓝地红黄白条旗作为军政府旗帜，正式使用成吉思汗年号纪元731年，日本方面派宋代表关东军副参谋长今村、参谋田中隆吉、化德特务机关长田中玖及日本顾问村谷彦治郎等与会。其后，关东军和伪满洲国每月补助该伪政府30万元经费，并编成一支1.3万人的内蒙人军队。这样，德王终于正式投靠了日本，当了傀儡和蒙奸。

伪蒙古军政府建立之后，日本欲将其与伪满和伪冀东政权更紧密地纠集在一起，由关东军参谋田中隆吉建议德王应和“满洲国”缔结协定，于是德王借同李守信等人乘飞机到伪满新京访问日本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伪满洲国总理大臣张景惠等人，又拜谒伪康德皇帝溥仪，行三跪九叩之礼，溥仪在关东军授意下封德王为“武德亲王”，并授予“钦任状”。德王与伪满外交部缔结了所谓“蒙满协定”。此后，德王又根据田中隆吉的指示，派伪外交署署长陶克陶与冀东伪政权殷汝耕会商，缔结了所谓“蒙冀协定”。这

《土肥原秘录》，中华书局，1980年中译本，第131页。

〔日〕《现代史资料》8，第612页。

样，日本用刺刀扶植起来的关内外的三个傀儡，就被其主子拴在一起，充当日本侵华的走卒。

第三节 日本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对华北的经济们报调查

日本在侵占和掠夺东北大批的资源财富后，并未感到满足，正如战犯重光葵战后所供认，日本在夺取了东北之后立即从经济资源着眼转向华北进行扩张。

为了对华北实施经济掠夺，日本首先进行经济情报方面的刺探和搜集，满铁是领头的执行机构。早在 1933 年 11 月，满铁就制定了《华北经济调整计划》和《对华北经济调查机关设立案》，准备在天津、青岛、上海等地设立满铁经济调查会的分会，在北平、山海关或滦县、张家口、太原、济南、烟台、南京、汉口、香港及广州设立派驻机构。其调查目标有开滦煤矿、井陘煤矿、山西矿业、山东煤矿等矿产资源，冀东地区工业及整个华北地区经济资源（包括棉、麻、羊毛、面粉、烟草、木材、药品等）以及交通状况，还计划摸清伪“满”对华北的贸易及关税，各国在华北的利权及投资等问题。

1934 年 3 月和 6 月，满铁两次派理事十河信二到中国“考察”。在其“考察”基础上，十河提出了一份对中国、特别是对华北实行经济扩张的实施方案。其要点是，由满铁在华北设立运输公司，或与中国“合办”运输公司，经营中国国有铁路的普通业务，另设对华投资公司，负责与中国交涉促进两国贸易及开展金融业务。这就是后来组建兴中公司的基本指导思想。同时还计划将北宁线（北平——沈阳）延长至山西，以便于山西煤炭外运。

1934 年 10 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制定了《华北重要资源调查之方针及要领》，其中提出：要“助长帝国发展对华经济，使战时我国国际资源易于补充，同时扶植和增强帝国在华北的经济势力并促成日、满、华北经济圈”。将对华北资源的掠夺提高到战略地位，还规定了对华北调查事项及其细目。

为达上述目的，日本作了一系列的组织准备。满铁根据军部要求，在满铁经济会内增设了第六部，下设综合班与基础调查班，专门负责收集和调查华北的经济情报。又在满铁总务部内新设东亚科，在天津设事务所，在察绥两省设调查所，扩张满铁在华北的地盘。驻天津的日本驻屯军设置了经济科和经济顾问部，大藏省增设了“东亚经济调查科”，等等。这些组织在日本政府和军部的支持下，对华北地区经济资源、政治制度、社会人情及风俗习惯等方面进行无孔不入的侵略性调查。这种调查本身，就是对华主权的粗暴践踏。

1935 年，随着其分离华北政策的形成，日本在华北的非法调查亦加紧进行。7 月 7 日，以满铁总务部东亚科长内海治为团长的华北事业经济调查团一行 7 人，由长春抵达天津。该团预定在平、津、冀、晋、察、鲁、绥等地，有计划地搜集贸易、金融、纺织、农业、铁路、矿山、制铁等方面的情报。同时，为加强统一协调，满铁对华北的经济调查被纳入天津的日本驻屯军司令部的总体计划之下。其大规模的调查活动自 1935 年 10 月至 1937 年 1 月，时间长达一年之久，先后动用 380 余人，耗资 54 万日元。其调查手段，多是

重光葵：《日本侵华内幕》，解放军出版社，1987 年中译本，第 64 页。

〔日〕近代日本研究会：《东亚与日本》，山川出版社，1980 年版，第 161~162 页。

在各地日军的武力支持下，采取收买、诱骗或恐吓等各种间谍式作法，收集大量的第一手的资料数据。对华北的煤、铁、石油等矿业资源，电气事业与制造业的原料及其发展前景，铁路的运输能力与港湾关系，港口与运河水运等诸方面，都进行了详细的调查，整理出了85册调查报告书。例如，矿业班先后调查了华北的金、煤、铅、铜、铬等26种矿藏，159家矿山的各方面数据。满铁在天津设立的事务所，伙同日军特务机关对华北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和测量。其调查的主要活动有：对伪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辖滦县、乐亭等13县进行了详细调查，写出了《冀东地区13县实态调查报告书（绝密）》，数量达14本。同时，向济南、张家口、太原等日军特务机关派遣金融财政方面的人员，参与对各地财政经济的调查及阴谋活动，还通过在各地的驻员搜集政治、经济、交通、文化等各种情报。

日本通过满铁、驻军等各种组织以公开的和隐蔽的，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对华北经济情报的攫取，具有范围广、规模大、具体细致而密级甚高的特点。依据上述调查，为日本军部和政府制定新的侵略政策提出了建议和参考，例如会田勉写出《华北大观》，声称：华北对于日本真可谓是“生命线”，不仅“政治上要稳定，经济上也应协作开发。”兴中公司这一类侵略机构，也是在满铁调查基础上，以满铁人士十河信二为首组建的殖民机构。

二、对华北的经济掠夺

（一）经济掠夺计划

近代以来日本的对外战争，始终以领土扩张和经济掠夺作为主要目的。日本推行其华北扩张政策更是如此，其各种纲领方案，几乎都强调了华北的“军需资源”对于日本的重要性与迫切性。1935年7月，中国驻屯军制定《关于华北新政权产生之相应经济开发指导案》，提出“应利用一切机会，促进对交通、资源及金融等方面的投资”。7月2日，日本关东军、“满铁”和伪满财政部、实业部在长春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掠夺华北资源的具体大纲，其主要内容有：

“（一）为开发华北工业、商业、矿业等，特设立大投资公司作总括的投资。该公司为纯粹的金融机关，满铁、东拓当然参加，同时广泛地纠合日本内地的资本。（二）以该公司为母体，依产业不同设立各事业公司。各事业公司作为中日合办，日本方面现金出资，中国方面现物出资，而对现在营业中的合办公司，予以改组扩充。（三）考虑到华北资源及产业的现状，公司的工作首先从矿产业、交通业、贸易及棉花栽培入手。（四）矿业中最重要的是煤，因此以山东矿业公司为煤矿公司的母体而从事发展。（五）交通是经济开发的基础，维持治安的动脉，所以全力以赴开发察哈尔、山西及其他未开发的地区，方法是扩充东方旅行社，考虑在中国领土内敷设铁路。（六）九·一八事变后，以满洲、蒙古为背景的华北贸易日趋衰落。今后应当努力

浅田乔二编：《日本帝国主义下的中国》，乐游书房，1981年版，第25页。

会出勉：《华北大观》，早稻田出版部，1937年版，第314页。

满铁调查部：《中国经济开发方策及调查资料（中国·立案调查书类·编1卷之2）》1937年，第97页。

复活各该地贸易，谋求天津及其他贸易都市的繁荣。（七）以满铁公司在山东的棉花栽培为基础，逐渐发展到使日本的棉花能够自给。”

7月17日，关东军在其长春的司令部召开会议，进一步策划掠夺华北经济资源的具体办法，副参谋长板垣征四郎和各参谋以及土肥原、仪我晴义、花谷正筹各地特务机关长，驻华大使馆武官高桥坦、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等均出席，会议决定了以下五项：

“（一）建立中、日、‘满’三国经济合作的常设机关。（二）开发范围暂以河北省为中心，逐渐向其他各省发展，（三）为了金融流通顺利，第一步应先开发矿业、棉业等经济资源。（四）满铁应与各种商业公司密切联络与合作，并促各界有力者奋起。（五）为注视华北当局的动向，关东军与平津驻军应密切合作，今后应不断召开会议，以资联络。”

为使掠夺华北经济资源计划更加完善，关东军在会后又与满铁公司反复进行磋商，满铁公司主张，在对华北经济进行基本调查的基础上，确定各项计划，并设立港湾委员会、交通委员会、华北经济调查委员会，经协商，双方意见趋向一致，都主张先利交通，然后开展其它各种事业。其要点如下：

（一）铁路建设计划：满铁想尽快在华北建成的路线，第一是沧石铁路，第二是彰（安阳）济（南）铁路，其目的在联络平汉与津浦二线，使其横断华北。（二）海港建设计划：第一想利用青岛与秦皇岛原有海港，以运销山西和绥远的煤，察哈尔的铁以及山东的棉花，第二想开设大沽港，使其能容八千吨以上的巨轮出入，成为冀、晋、绥、察各省资源的最大吞吐港；扩建塘沽港，使之能容三千吨位的船舶自由出入。（三）开发农业经济计划，在华北各处设立农事试验场，并向天津及其他各地派遣若干农业指导员，确保农产品购销，保障日本所需的棉花、羊毛等类产品等。

（二）掠夺华北资源

日本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目的，是为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及更大范围的扩张和进攻英、美、苏的战争作准备。矿产是日本掠夺的重点。华北煤矿储量居全国之首，质量亦为上乘，多为炼焦用煤及无烟煤；铁矿不但储量丰富且品位很高，含铁量达50%以上，宜于直接冶铁。“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在华的掠夺性投资发展极快，其重点在于华北。以1936年为例，日本在华矿业投资支配资产额为2090.7万元，其中华北2078.9万元，占99%，在华北矿业投资中，又主要集中于煤、铁、金矿各业，投资额达1976.9万元。投资方式中，合办投资额量大，达1318.4万元，约占67%，其次是贷款，为338.5万元，约占17%，直接投资只占16%左右。在矿业中，煤炭又占主要地位。1936年日本向中国煤业投资总额达2108.7万元，其中华北地区为1853.2万元，占近88%。在合资矿业中，日方占有统治地位，在一些煤、铁等重要行业的中日合办公司中，日方自不待言占有垄断地位。同欧美相比，1936年日本在华北等关内地区投资达3484.6万美元，超过了历来在华经济

《华北中日“经济提携”》，《申报月刊》第4卷第3号。

《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复刻版，第208~210页。

〔日〕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208~210页。

势力最大的英国。日本对煤铁等矿，采取盗匪式的直接夺取，如“柳江煤矿”年产量在25万吨左右，被“日本泰记公司”仰仗关东军的势力，以半抢半买的形式霸占。

棉花是日本掠夺的又一重点。日本国内很少种植棉花，其纺织业所需棉花的98%依靠进口。中国华北各省均适于种植棉花，产量很大。1933年仅从天津出口的棉花，价值即达1980余万元。日本自侵入华北即开始夺取华北的棉花产地，日本驻天津领事馆在天津设立所谓“华北农场试验所”，在南开八里台设场植棉，并利用汉奸转手，以中国人名义偷买中国土地。冀东伪政权更划定通县、丰润、玉田、迁安、滦县、香河、遵化、抚宁、昌黎等县的几万顷土地，为日本“兴中公司”试验植棉的农场。于是“华北棉花公司”、“通县棉花试验所”、“东亚棉花协会”等掠夺华北棉花的组织纷纷建立。同时，6家日本纱商也成立了“棉花协会”和“棉花交易所”，以便控制华北的棉花产地和棉花市场。“兴中公司”则拟定华北种棉的5年计划，企图独霸华北的棉产。

棉纺业也是日本垄断的重点。“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日本向华北侵略扩张的战略需要，以及华北棉花得天独厚，量大质优，因而，贪婪的日本财阀将纺织资本急剧转向华北。日本以收买、吞并或新设厂的办法，排斥华资企业。自1935年至1937年间，天津原有7家较大的华资公司被日资吞并4家，占天津纱锭总数70%以上。到1937年初，日本在天津纺织厂已有10家，纱锭177000枚，织机数千架，而华资只有5家，纱锭71000枚，织机310架。华北的另一个纺织业中心青岛更为日资所统治。从整个华北的纺织业看，日本的扩张是十分惊人的，1932年华北纺织业集中地河北、山东两省，纺织锭数华商有374980锭，占50.63%，日资365580锭，占49.37%，到1936年，华商纺织下降至242456锭，仅占26.02%，而日商纺织猛升至689202锭，占73.98%。按计划，日本还将新设若干厂房和织机，其规模将赶上中国最大的纺织中心上海。

日本对华北其他物资的掠夺，亦不遗余力。如对渤海湾头白河两岸著名的长芦盐，日本政府决定由其专卖局统制进口。冀东地区丰富的高矾粘土，是炼铝和生产耐火材料的重要原料。兴中公司和日军特务机关与冀东伪政权相勾结，最后将59处矿区攫为己有。此外，还积极掠夺内蒙的羊毛等物资。

（三）控制华北交通命脉

交通运输业的控制也是日本侵略者十分重视的。在铁路方面，1936年日资向华北铁路投资的贷款，本息累计达8733.25万元。除上述修筑沧石、彰济铁路外，还打算修筑连结东北、华北和西北的蒙古铁路。在海港方面，日本不但充分利用了原有青岛、秦皇岛等口岸，还计划扩建塘沽等港口。在航

吴承明：《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人民出版社，1955年版，第158页。

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东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18页。

陈真等：《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三联书店，1958年版，第533页。

高村直助：《近代日本的棉业与中国》，第220页。

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原书房，1974年版，第494~496页。

《外交评论》第6卷第2期。

空业方面，1936年6月，日本曾在天津李明庄强行占地13333.4亩，修建了大机场，用作华北航运中心。10月，日本逼迫宋哲元与日驻天津总领事堀内干城签订了《中日华北航空协定》，合办“惠通航空公司”，资本为450万元，日方投资250万元。公司总部设在天津，董事会7人，日本占4人，航线5条：北京——锦州、天津——大连、天津——张家口、北京——沈阳、天津——热河。各线均与日满航线联结。从此，日本逐渐掌握了华北地区的陆、海、空交通命脉。

（四）建立经济掠夺机构——兴中公司

日本为实施经济侵略，兴办名目繁多的公司，并渗透到华北所有的工商业。在天津设立的几家大公司有“中日实业公司”、“输入联合会”、“满津贸易公司”、“兴发祥公司”（此公司后并入“兴中公司”）等。还利用旧官僚，组织“东亚经济协会”、“华北经济委员会”、“东亚通惠贸易公司”、“河北经济协会”等等，从事各种搜刮。其中，规模最大、掠夺最多的要数“兴中公司”。

兴中公司筹建于1935年初，8月2日由日本政府批准，于该年12月20日在大连正式召开了成立大会。兴中公司是日本分离华北政策的直接产物，是日本实施经济侵略大肆掠夺华北资源的重要机关。兴中公司成立时，名义资本为1000万日元，由“满铁”承担70%，其余招中日商股。其总公司设大连，分设子公司于天津、上海、东京。其营业目的，名义上规定为中、日、“满”之间相互贸易及关于中、“满”小企业的投资及斡旋介绍等业务，实际上是无所不包、无所不入，经济掠夺不择手段。如兴中公司收买了天津市新公司，于1936年8月20日创立“中日合办天津电业股份有限公司”，在海河建成3万千瓦的大型发电站，垄断了天津地区的电力供应。1936年以后兴中公司又合并了山海关、秦皇岛、昌黎、滦县、唐山、芦台、通县等7家电灯公司，创设了冀东电业股份公司。随后还收买了北平电力公司、北平华商电灯公司的股票。其成立后的10个月，资本额便由1000万日元猛增至1亿日元。该公司一方面是满铁的子公司，它在华北的活动，是满铁势力在华北的扩大。但兴中公司在财务上接受日本大藏省的监督，其章程、董事人权以及对华通商政策需经日本外务省指导。这又充分说明，兴中公司是一个日本的国策公司，它推行日本的经济侵略政策，是日本在华北的经济代行机构。兴中公司以这种满铁子公司与国家国策公司的一身二任的形式，不但联结了日本的军部与财阀，而且勾通了日本作为宗主国与海外殖民地的联系。通过兴中公司这条巨大的吸血管，吮吸华北的富源，从经济上全面地推行其侵略华北的政策。

三、“自主币制”、走私与特别关税

金融财政领域，也是日本对华经济掠夺的另一个重要侧面。

东亚研究所：《日本的对华投资》上，第556～559页。

依田熏家：《日中战争史资料》（占领地统治·1），1975年版，第414页。

《银行周报》卷20第40期。

（一）“自主币制”

30年代初期，资本主义各国竞相寻找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出路。英、日等国先后放弃金本位制，实行货币贬值政策，筑起保护性的货币壁垒，以此向海外倾销商品，并防止外国商品侵入。1934年5月，美国政府通过《白银法案》，抬高银价，在国内外大量收购白银，从此向银币国家倾销商品。中国当时是最大的用银国，由于美国收购白银，中国的银币便象潮水一样涌入美国市场，从而造成国内严重的通货不足，带来经济萎缩。南京政府曾于1934年10月设置银输出税和平衡税等项目，力图阻止白银外流，但没有效果，财政情况日见险恶。

中国政府迫于财政危机而筹划币制改革，并向各国借款。英国在华的投资大大超过美国，英国为了维护本国的利益，便积极帮助南京政府进行币制改革。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李滋罗斯(Fred-erick Leith-Ross)为英国首席顾问来到中国。李滋罗斯考虑到当时英国和日本之间的特殊关系，曾多次征询日方意见，并于1935年6月启程离开伦敦后，取道加拿大先到日本访问，试图争取日方对于援华的协调。

日本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的态度，取决于日本总的对华战略。削弱中国是日本的既定方针，因此，对于中国的币制改革，日本蛮横地加以反对。当李滋罗斯来华之际，日本外务省玩弄外交手法，宣称：“日本是稳定东亚的力量，稳定东亚应以日本为中心而加以遂行。”在此前提之下，日本表示“尊重英国的正当权益”。明白地警告英国，不要侵犯日本在东亚的霸主地位。

李滋罗斯访问日本之后，认为已经得到了日本的谅解。于1935年9月21日抵达上海，经过同南京财政要员的协商，英国政府宣布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期限35年，年息5分，以作为财政整顿和实行新币制的准备金。经过一系列准备，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于11月3日正式宣布中国开始币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废止银本位制，采用纸币流通制；以中央、中国、交通（后来加上中国农民）银行所发行的纸币为法币；各种公私款项只许用法币结算支付；禁止白银流通，白银收归国有；现有流通白银及银币可按规定换领法币，以后又规定与英镑美元等外币的汇价，由指定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这次币制改革实现了以四大家族为中心的官僚资本对全国金融财政的统制，国民党政府可以通过大量发行纸币，加重财政赤字，从人民手中汲取财富。但是，币制改革使中国货币得到统一，在客观上加强了全国各地的经济联系，有利于金融稳定 and 经济发展。

币制改革纯属中国的内政问题，日本军部、政府各方面却纷纷发表声明，并采取反对和阻止活动。

1935年11月8日，日本驻华使馆武官矶谷廉介要求日本政府明确表示实行阻挠币制改革的方针，必要时不惜使用武力。9日，日本外务省发表谈话，指责中国币制改革事先未与日方“协议”并取得合作，同时对英国对华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122页。

杨荫溥：《民国财政史》，中国财经出版社，1985年版，第76页。

《满洲报》1935年11月11日。

借款表示“始终持反对之态度”。同日，日本驻华武官高桥坦对宋哲元威胁说：“白银国有与现银集中上海，是陷华北经济于绝境，并阻碍日本利益。如贵方不能自动防止，则日本将以实力期其实现。”

配合其外交方面的声明，日本加紧在华北各地实行所谓“自主”货币制度，以对抗和破坏国民党政府的市制改革。其主要方案曾议定出：“1、全票方案，2、满洲国国币方案，3、华北统一银行券方案”，等几种方案。1935年12月8日，曾策划伪满币制方案的伪满财政部总务司长星野直树，在《中国币制改革与我国策的确立》一文中声称：“中国此次币制改革虽在政治上引起了国内和国际重大危机，但在技术上却不得不承认它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他向关东军建议，日方表面上与法市保持联系，但应进行“华北自主币制”。随后，日本陆军省拟定了《华北币制改革指导要领》，其基本方针是：“华北币制在形式上虽需要使之同中国一般市制建立相当的联系，但应迅速排除来自华中、华南方面实质的支配关系，并进而吸收利用其资金”，把以中国新币制为基准的“一种日金汇兑本位”作为本位货币。1935年12月10日，华北日军制订了《华北自主币制施行计划纲领案》，提出在华北设立新的金融中枢，使之与华中、华南金融相分离；建立“华北公库”为唯一通货发行机关并驱逐法币，由华北自治政权与民间银行、钱庄集资1亿元，首先发行额1.33亿元；由银钱业和商界的亲日分子任公库首脑，顾问及科级职员由日本人担任。1936年2月22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部提出了上项计划纲领的修正案，对华北币制独立作了进一步的规定，如货币取10进位，计纸币5种，铜币4种，共9种；华北公库理事会由理事长（总裁）、理事（副总裁）、各分库理事会代表，银钱业公会和商会代表等组成；在冀察经济委员会下设公库准备委员会。当冀察政务委员会建立之后，由日军松室孝良少将胁迫，迫使冀察政务委员会于1936年5月由河北省银行在法币之外印发纸币。

1937年3月，伪冀东银行也发行若干面额的纸币及辅币。日本的“自主”币制活动，虽然没有完全得到推行，但亦严重地干扰了中国的币制改革与经济发展，为其对华北实行经济掠夺起到重要的配合作用。

（二）白银走私与武装走私

从日本进行的白银走私问题，可以更清楚地看出日本蓄意破坏中国金融财政的险恶用心。在市制改革之前，日本一直在唆使日本及朝鲜浪人在华北各地掀起挤兑银元的风潮。

1935年4月14日至5月25日，天津的中央、中国、交通等银行兑出白银达1682103元，北平的交通银行自1935年6月6日至29日这20余天内兑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1840—1945）》（下），第308页。

〔日〕古屋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73页。

〔日〕《现代史资料》8，美铃书房，1982年，第124页。

〔日〕野泽丰：《中国的币制改革与国防关系》，东京大学出版会，1981年版，第251页。

同上，第284~285页。

出 1629600 元，使库存银元降到最低点。而这些银元几乎全部落到伪满及日本手中。其挤兑的主要办法是，用中国、交通、河北等三行的 1150 元钞票购兑中国银元 1000 元，之后运到关外售与日本人专设的收购中国银元的机构。用其他钞票也可以购兑中国银元，其价格是，以日本银行钞 2050 元，或朝鲜金票 1400 元，或满洲洋票 1300 元购买中国三行钞票 1000 元，再以之购兑中国银元偷运关外。就这样，有限的中国银元就被日本人用无限的纸币套购而去。此举既可以毫不费力地塞满日本的腰包，又可以削弱中国的金融财政，这就是日本使劲地破坏中国币制改革的要害所在。

1935 年 5 月 22 日，河北省政府在给南京国民党当局的呈文中说，每日密送到关（山海关）的白银约十五六万元，北平、天津各居五分之二。以此而计，中方每月外流白银约 400 万元。仅 1935 年四五月间，秦皇岛海关缉拿到的走私白银总额达 177900 元之多。其余未能缉获的，其数目更是惊人。金融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由于日本所策划的阴谋，平、津两地库存白银几乎被汇兑一空，中国银根吃紧，同时又纸币贬值。带来物价上涨，工商业停滞，经济崩溃。这正是日本所希望发生的混乱局面，它便于日本进一步在中国翻云复雨，巧取豪夺，策划自治，吞并领土。

除上述白银走私外，日本还进行了一系列令人发指的武装走私活动，对华北经济造成了巨大破坏。这种走私活动随着其在华北的政治军事扩张加剧，从隐蔽的小规模的，发展到公开的集团性的武装走私。

“走私”一词的本来含义是秘密输售货物，逃避交纳合法捐税。而日本所进行的走私，是以其军事力量和不平等条约为背景，对中国实行强迫的、公开的、大规模的、不平等的商品输售活动，其实质无异于强制掠夺。当时在长城一线，满载各种商品的马车几十辆为一队，连同其武装护卫数百人一伙，从伪“满洲国”通过长城各缺口浩浩荡荡进入华北。1935 年 8 月到 1936 年 4 月，自冀东远往天津的走私物品有：人造丝 89617 包（4033745 公斤），卷烟纸 6171 包（1183836 公斤），布匹 12131 包，白糖 479296 包（43136640 公斤），杂货 11052 包；其中 1936 年 4 月 19 日起一周内由天津运出的私货就有人造丝 1862 包（830790 公斤），白糖 41171 包（3705390 公斤），卷烟纸 245 包（15239 公斤）等。

这些武装走私队以武力抗拒中方的陆海缉私人员，而日本政府与军部更以外交手段保护走私，并对中国施加外交压力，横加勒索。日本方面还以“协助缉私”为名，派出宪兵警察非法进驻北平、天津、唐山、滦县、昌黎等站，“检查”来往客人，严重干扰中国方面的正常缉私业务，侵犯中国的主权。当时，处于伪满和冀东之间的“中国方面的税收机关，其职能处于停止状态。”

日本在华北走私，使中国的民族工商业遭受严重打击，其中受害最大的是制糖业与人造丝业，以糖业来说，1935 年一般市价白糖每担 22 元，红糖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交通银行档案。

《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 2 辑第 30 册。

《于学忠转报华北白银走私情形呈行政院文》，《民国档案》1987 年第 4 期。

千家驹：《中国经济的挣扎》、（《中国国民经济》）。

《银行周报》卷 20 第 20 期。

上村伸一：《日本外交史》19，第 243 页。

每担 18 元，然而私货却只要 12 元或 10 元左右。因此津浦、陇海两路遂全为私糖所侵夺。上海糖商 60 余家，因私糖盛行而受之损失已达 1000 万元以上，广东糖因华北私货充斥，在 5 月初就停止装运，并一半停工，到中甸以后，广东糖厂一竟因私货压迫及原料不足而全部歇业。至于人造丝业，1934 年上海人造丝匹头厂家有 21 家，丝织机 2 万部，因私货倾销影响，1935 年已仅余六七家，织机三四千部。其他如纺织业、面粉业、卷烟业、火柴业等，无一不受到走私的危害。尤其是华北工业的中心区天津各厂不是关门倒闭就是被日商所收买。总之民族工业没有一样不受私货打击。

(三) 冀东特别关税

日本还公开以不平等的法定手段，保护其输出商品免征或减征关税，冀东特别关税就是一例。日本在冀东订立相当于关税 1/4 以下的低税率的“输入税”，变相承认日方利用南大寺、北戴河、留守营、昌黎、秦皇岛等地进行不平等贸易。1936 年 2 月，冀东伪政权颁发所谓《沿海输入货物登陆查验暂行规则》和《查验费征收细则》，规定在登岸时只缴纳一笔远低于中国海关关税的查验费（亦称特别关税）后，即可合法运往各地。

伪冀东特别关税与中国关税之比较

货 物	冀东特别关税（元）	中国关税（元）
砂糖 135 斤/包	4 ~ 5	9.8
方糖 100 斤/箱	6 ~ 10	20
人造丝 100 磅/包	20 ~ 40	120
干贝 100 斤/包	15 ~ 20	40

（注：其他货物所缴特别关税额约为中国关税的 1/4）

在冀东伪政权特别关税的庇护下，走私货物大量涌入中国市场，据日文资料记载：“以往在高关税桎梏下的输入品，以人造丝、砂糖为主，现在能一起向天津输送。因之天津的人货量以惊人的数额上升，人造丝、砂糖犹如洪水一般。估计 3 月下半月的入货量是：砂糖五六万包，人造丝六七万包。这些优良廉价的日本货冲破冀东关税堤坝，如同怒涛涌入中国各地，现已南下运至上海方面，以致给中国市场一大冲击，遂成为最近哄动一时的问题。”

日本还把《塘沽协定》所规定的非武装区延伸到海上。日本海军否认按国际惯例中方所应有的 3 海里之内的领海权，蛮横禁止中国海关缉私船只的通行，完全剥夺了中国海关缉私权力。中国无论在陆上和海上都无法行使主权，而日本走私集团则恣意妄行，旁若无人，甚至常以 200 吨位以上的大船满载货物往来于大连和冀东海岸。

日本的武装走私使中国遭受了巨大财政损失。据南京政府向日本政府所提出的抗议书中指出：“综计自上年（1935 年）8 月至本年（1936 年）4 月中国海关税收（指华北各关而言）因日鲜浪人走私所受的损失共在 2500 万元，

〔日〕《现代史资料》8，第 153 ~ 154 页。

而本年（1936）4月起私货运入更加突飞猛进，仅一个月期间关税损失共达800万元之巨”。关税是中国政府的主要财政收入，约占税收总额的70%左右，而进口税收又是关税中最主要的项目。关税收入的大幅度减少，极大地加剧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加重了中国人民的税收负担。中国的国力进一步被日本削弱。

日本的野蛮走私及不平等贸易遭受中国和各国的抗议，在强大舆论压力之下，经过中方反复交涉，日本在其“特殊贸易”的规模上，表面曾有所收敛，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放弃破坏中国财政金融这一经济战略方针。从经济上掠夺和控制中国，以弥补日本资源和国力不足，这是日本侵华政策的根本目的之一，也是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并使战争不断升级的基本原因之一。

第七章 救亡运动高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处于危难之际，中国共产党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成全国共同抗战，进行了长期不懈和艰巨复杂的斗争。

一、“八一宣言”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侵略路线的确立

（一）“八一宣言”的发表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在蒋介石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中共领导的苏区疯狂“围剿”的情况下，中共中央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呼吁团结抗日的宣言。1933年1月17日，中国共产党又发表了关于在三个条件下与任何武装部队订立停战协定的宣言。

1934年4月10日，中共中央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中，即号召一切真正愿意反对帝国主义的不甘做亡国奴的中国人，不分政治倾向，不分职业与性别，都联合在反日统一战线之内。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又以“中国民族武装自卫委员会筹备会”的名义，发表《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提出抗日救国的六大纲领。但由于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占统治地位，无视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因而存在着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虽提出过一些正确的主张，也不能切实执行。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错误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发展了“九·一八”后在三个条件下和国民党中愿意合作抗日的部分订立抗日协定的政策，成为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政策。

1935年7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根据德、日、意法西斯势力猖獗，新的世界战争危险日益严重，国际工人运动受到残酷镇压的实际情况，决定改变以往对社会民主党的策略，实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反帝统一战线政策。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出席了大会。会上，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作了《法西斯主义的进攻与共产国际为工人阶级的反法西斯主义的统一而斗争的任务》的报告。报告中提出了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各民主阶级反法西斯人民战线的策略方针，并赞成中国共产党的倡议，“联合中国境内所有那些愿意为救国救民而真正斗争的有组织的队伍，来建立一个反对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

在会议期间，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代表多次发言，阐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中共代表王明、康生、吴玉章等，根据大会精神，起草了“八一宣言”，以中国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名义，于1935年10月1日在法国巴黎出版的《救国报》上发表。宣言的主要内容有：

第一，正确地分析国内形势，指出中华民族正处在亡国灭种大祸迫在眉睫的生死关头。宣言指出，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4省之后又入侵华北各省，

《季米特洛夫选集》，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第102页。

《救国报》以后改为《救国时报》。

不到4年，差不多半壁山河已经被日寇占领和侵袭了。《田中奏折》所预定的完全灭亡我国的毒计，正在实行着，长此下去，中国这个5千年古国将完全变成被征服地，4万万同胞将会变成亡国奴。宣言还指出，在这民族生死存亡的关头，蒋介石集团坚持卖国的“不抵抗”和“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正因为如此，日寇才能得寸进尺，才使中国出现半壁山河被侵占的悲惨局面。宣言庄严宣布：要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抗议国民党蒋介石集团的卖国罪行。抗日救国是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成为中华民族每个同胞的神圣天职。

第二，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号召一切不愿当亡国奴的同胞，一切爱国的军官和士兵，一切愿意参加抗日救国事业的党派和团体（包括国民党在内），一切关心祖国的华侨和国内一切被压迫的少数民族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抗日救国的斗争。宣言指出：“无论各党派间在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号召：“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有专门技能的供献专门技能”，为抗日救国而战。宣言提出“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组成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

第三，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其内容是：（一）抗日救国，收复失地；（二）救灾治水，安定民生；（三）没收日寇财产作为抗经费；（四）没收汉奸卖国贼财产、粮食、土地，交给贫苦同胞和抗日战士享用；（五）废除苛捐杂税，整理财政金融，发展工农商业；（六）提高工资；（七）实行民主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八）实行免费教育，安置失业青年；（九）实行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政策，保护侨胞在国内外生命、财产、居住和营业的自由；（十）联合一切反对帝国主义的民众（日本国内劳苦民众，高丽、台湾等民族）作友军，联合一切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民族和国家作同盟，与一切对中国民众反日解放战争守善意中立的民族和国家建立友谊关系。

“八一宣言”具有许多新的特点：（1）不再局限于过去的下层统一战线或工农兵学商的联合，而是扩大为各党各派各军各界各个民族的联合，也包括国民党在内。提出：“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不管他们与红军之间在对内问题上有何分歧，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2）不再局限于过去与国民党某些军政人员订立协定、停止冲突、互相联合上，进而提出建立“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等。并为国防政府提出了十条施政方针。（3）宣言虽然仍把蒋介石排除在统一战线以外，但却一再呼吁各党派停止内战，为抗日救国的事业而奋斗。宣言提出各界立即进行协商、谈判，召集各界的代表大会，讨论抗日救国的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3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6、488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487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36页。

实际工作。

“八一宣言”的发表得到国内各界的热烈拥护。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认为这个宣言很重要，提得很及时，中共所表示的态度深得人心。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右任，看到“八一宣言”内心很激动，曾和何香凝、柳亚子等交换意见，都表示衷心赞同宣言所提出的各项主张。“八一宣言”在全国各个爱国阶层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国运动的兴起，使蒋介石对内用兵对日妥协政策陷于更加孤立的地位。

（二）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

1935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胜利到达陕北。这时正值抗日救亡运动进入高潮。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东北三省和热河省之后，又步步进逼，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进而变全中国为其殖民地。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正在发生新的变动。为了制定党在新形势下的政策，中共中央从12月17日起，在陕北瓦窑堡举行政治局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张浩、邓发、凯丰、李维汉、杨尚昆、郭洪涛等。会议深入分析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相应调整了各项具体政策。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变化，”“日本帝国主义并吞东北四省之后，现在又并吞了整个华北，而且正准备并吞全中国，把全中国从各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变为日本的殖民地，这是国前时局的基本特点。”“中国政治生活中的各阶级、阶层，政党及武装势力，重新改变了与正在改变着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民族革命战线与民族反革命战线是在重新改组中。因此，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我们的任务，是在不但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的基本力量而且要团结一切可能的反日同盟者，是在使全国人民有力出力，有钱出钱，有枪出枪，有知识出知识，不使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参加到反日的战线上去。这就是党的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总路线。”《决议》指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最广泛的与最高的形式，就是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组织。”“它应该有最广泛的行动纲领”，即“十大政纲”。《决议》指出：“为了使民族统一战线得到更加广大的与强有力的基础，苏维埃工农共和国及其中央政府宣告：把自己改变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决议》具体明确了对知识分子、华侨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富农及白军官兵筹各项政策，强调“所有这些政策的改变是为了一个基本的目的：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求得中华民族的自由解放与独立，争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

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地阐明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05、609、610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611~616页。

策。毛泽东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阐述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毛泽东指出：“目前中国的和世界的反革命力量暂时还是大于革命力量”，而且“由于中国政治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了革命发展的不平衡”，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的长期性和残酷性。为了战胜强大的敌人，加速革命的发展，就需要“招收广大的人马，好把敌人包围而消灭之”。中国目前的基本特点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中国变为它独占的殖民地。在这种亡国灭种的民族危机面前，工农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是坚决抗日的，他们已经起来进行着轰轰烈烈的抗日救国斗争。问题是民族资产阶级是否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毛泽东分析了民族资产阶级，指出：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复杂的问题。它是一个具有革命性和妥协性的阶级。它“同地主阶级、买办阶级不是同一的东西，他们之间是有分别的，民族资产阶级没有地主阶级那样多的封建性，没有买办阶级那样多的买办性”。因此，在革命斗争的某些阶段，他们中间的一部分是有参加斗争可能的，其另一部分则有由动摇而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的形势下，民族资产阶级已经有了抗日救国的活动，这就说明民族资产阶级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任务就是把红军的活动和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一切活动汇合起来，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毛泽东同时指出，在整个地分析中国地主资产阶级在大震动中的姿态时，还有一个方面应该指出，那就是：即使在地主买办阶级营垒中也不是完全统一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根据毛泽东这一科学分析，在日本帝国主义要独占中国的条件下，英、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即蒋介石集团；就有可能抗日和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就为实行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二，提出了对民族资产阶级又团结又斗争的基本政策。鉴于民族资产阶级已有可能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因此，在政治上必须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即让他们参加人民政权的管理工作，团结他们共同进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同时又对他们的动摇性进行适当的批评或斗争。在经济上，则采取保护民族工商业的政策。毛泽东指出：在民主革命的时代“并不废除非帝国主义的、非封建主义的私有财产，并不没收民族资产阶级的工商业，而且还鼓励这些工商业的发展。任何民族资本家，只要他不赞助帝国主义和中国卖国贼，我们就要保护他”。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虽然是有冲突的，但是，“在民主革命阶段，劳资间的斗争是有限度的。人民共和国的劳动法保护工人的利益，却并不反对民族资本家发财，并不反对民族工商业的发展，因为这种发展不利于帝国主义，而有利于中国人民。”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8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0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1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37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同上。

第三，批判了关门主义错误，并告诫全党不要重复第一次国共合作时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坚持无产阶级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毛泽东深刻地分析了党内关门主义的实质、危害及其根源，强调关门主义是当前党内的主要危险。他指出，“关门主义的策略则是孤家寡人的策略。关门主义‘为渊驱鱼，为丛驱雀’，把‘千千万万’和‘浩浩荡荡’都赶到敌人那一边去，只博得敌人的喝采。关门主义在实际上是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忠顺的奴仆。”他提出，中国共产党不但在现在充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起人，而且在将来的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必然要成为坚强的台柱。要加强党的建设，发展党的组织，培养党的干部，克服“左”倾错误。

瓦窑堡会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国内政治形势，抓住了时局发展的关键，正确地解决了遵义会议尚来不及解决和还不可能完全解决的党的策略路线问题，全面地规定了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策略方针。瓦窑堡会议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奠定了理论基础。瓦窑堡会议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全党范围内卓有成效地开展起来。

二、积极开展各阶层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

（一）继续组织和领导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

瓦窑堡会议后，中国共产党采取下层和上层相结合的方式，进一步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广泛地利用党办的半公开、公开刊物和左派刊物，出版小册子等，宣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理论和政策。着重向全国人民指出：只有继续开展全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扩大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加强中国共产党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领导作用，极大的巩固苏维埃与红军，同一切丧权辱国及削弱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言论行动进行坚决的斗争，才能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

中国共产党根据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形势，积极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抗日救国运动。中共中央决定由刘少奇负责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领导和组织抗日救亡运动，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华北地区是抗日救国运动的前哨，中共北方局领导和组织群众开展抵制日货，反对走私，举行政治示威游行、请愿、罢课及部分罢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同时，在全国许多城市组织各界救国团体。在上海组织建立了上海妇女救国会、上海文化界救国会，上海各大学教授救国会、大中学学生救国会等。在华北组织了华北各界救国会，平津及其他各地学生救国会及民族解放先锋队。

中共中央在组织领导抗日救亡运动中，重视了争取有影响的爱国民主人士的工作。毛泽东、周恩来在瓦窑堡会议以后，先后给蔡元培、许德珩、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杜斌丞等写信，表示支持他们的爱国活动，宣传和解释党的政治主张，提出今后工作的希望。毛泽东在写给许德市等的信中说：“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而奋斗，为中华民主共和国而奋斗，这是全国人民的旗帜，也就是我们与你们共同的旗帜！”毛泽东代表中央写信给爱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145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84页。

国民主人士的同时，派出代表做联络工作，给他们送去党的文件，解释和传达党的方针政策，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中共中央和各地方党组织及广大党员对爱国民主人士做了许多工作，领导和推动他们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为抗日救国而斗争。

（二）对东北军、西北军的工作

东北军前身为奉系军阀张作霖所统辖的部队，1928年改编为东北边防军。1931年“九·一八”事变时，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退入关内，遭国人谴责。热河沦陷后，张替蒋受过被迫辞职，去欧洲考察。

1934年初，蒋介石为使东北军“剿共”，电召张回国。张学良回国就任“西北剿匪副司令”后，要求部属“同心同德，奋勇直前，完成‘剿共’之重任，建树统一之功勋。然后回师北上抗日，收复东北，返回老家去。”但是，事与愿违，从1935年9月到11月间，在劳山、榆林桥、直罗镇战役中，东北军三战三败，损失兵力近三个师，第109师师长牛元峰、第110师师长何立中和参谋长范骝洲等被击毙，近万名东北军被红军俘虏。如此沉重的打击，在东北军历史上是罕见的。蒋介石不仅不予补充，反而宣布撤销被歼灭的第109、第110师的番号，并对张学良加以申斥，这对张学良的思想震动很大。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等21名红军将领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蒋介石打内战及排斥东北军的种种毒计，提出：“打红军是东北军的出路吗？进攻苏区是东北军的出路吗？不是的，这不但不是你们的出路，而且是你们的绝路。”“东北军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强盗，是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所以抗日反蒋是你们唯一的出路。”“只要东北军揭起抗日反卖国贼的义旗，那在东北军内就可以军心团结，上下一致，使东北军成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军。”最后提出请东北军派代表与红军共同协商。此信对张学良确定联共抗日的政策发生很大作用，他曾深有感触地对人讲：救国之路，只有“一条共产党的道路。”与此同时，红军对于被俘的东北军，生活上给予优待，政治上给予教育，留去自由，去者发给路费，使他们深受感动，愿与红军合作抗日。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家乡被日本侵占，他们的父老兄弟姐妹当着亡国奴，因此，普遍要求抗日收复东北失地。他们对蒋介石的歧视、威逼及其先安内后攘外政策日益不满，拥护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政策。

1936年1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周恩来为了直接和张学良等东北军高级将领接触，谈判联合抗日问题，让在榆林桥战役被俘的与张学良关系比较密切的团长高福源（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回东北军。高先见到第67军军长王以哲，随后见到张学良，转达了中共中央愿和东北军联合抗日的诚意，沟通了和东北军高级将领的关系。

1936年2月25日，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苏区政府贸易总局局长钱之光抵洛川与王以哲首先会谈，达成合作抗日的口头协定，主要内容是：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37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6页。

（一）互不侵犯；（二）建立交通和通商；（三）供应第 67 军所需粮秣等。张学良于 3 月 4 日飞抵洛川会见李克农时说：“我是来做大买卖的，搞的是‘整销’，不是‘零售’”。意思是“为了联共抗日，他把整个东北军和本人的命运，全部豁出去了。”。他除同意达成的口头协议外，还希望会见中共主要领导人，就联合抗日问题直接会谈。3 月 16 日，李克农到晋西石楼红军前线指挥部向中共中央汇报洛川会谈情况，中共中央决定派周恩来、李克农为全权代表与张会谈，4 月 6 日，由毛泽东、彭德怀密电张学良、王以哲，告以行期，提出会谈的主要问题，内容如下：“一、停止一切内战，全国军队不分红白，一致抗日救国问题；二、全国红军集中河北抵御日帝迈进问题；三、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具体步骤及其政纲问题；四、联合苏联及先派代表赴莫斯科问题；五、贵我双方订立互不侵犯及经济通商初步协定问题。”

4 月 8 日，周恩来、李克农一行抵肤施（延安）东北之川口。因为风雪交加，电讯中断，张学良 9 日才自己驾飞机，带着王以哲、刘鼎飞到肤施。当日晚 8 时，周恩来等人进城，与张学良彻夜长谈。张学良直率地对周恩来说：“我自欧洲归国以后，一心拥护蒋介石的独裁统治，相信法西斯挽救中国。可是经过几年的实际观察和周围朋友对我的谈话劝告，特别是李克农先生和刘鼎先生对时局透彻的分析，我认为我的这种想法是错误的。”此时，张学良对执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完全动摇了。但张学良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既然要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力量参加，那么，蒋介石也应当包括在内”。张学良说：“我同蒋介石的接触很多，关系也很密切。据我了解，只要我们认真争取，是可以把他团结到抗日阵线里来的。”周恩来对张提出的不能反蒋表示理解。双方约定：张学良在里面劝，共产党在外面逼，内外夹攻，“把蒋介石扭转过来”。双方还就抗日战争的形势和前途，停止内战，红军的战略方向，联合苏联，红军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等事项进行了友好坦率的商谈。4 月 10 日清晨 4 时，会谈结束。临别前，张学良赠送《申报》60 周年纪念大地图一册给周恩来，说：“共同保卫中国”。这次会谈对促使张学良走上联共抗日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全面合作关系的确立。

为加强对东北军的工作，中共中央成立了东北军工作委员会。1936 年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指出：“由于东北军现在所处的特殊的政治的地位（亡国奴的地位），由于红军对于东北军的革命的影响，东北军有极大可能转变为抗日的革命的军队。”“争取东北军走上抗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因此，我们在东北军的工作目标，第一，不是瓦解东北军，分裂东北军，而是给东北军以彻底的抗日的纲领，使东北军在这一纲领的周围团结起来，成为坚强的抗日的武装力量；第二，也不是把东北军变为红军，来拥护共产党的基本政纲，而是要使东北军变为红军的友

钱之光：《洛川会谈前后》，《中共党史资料》第 10 辑。

《解放日报》1979 年 2 月 18 日。

西安事变史领导小组：《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年版，第 28 页。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 55 页。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 年版，第 56 页。

军，把共产党所提出的关于抗日救国的纲领变为他们自己的纲领。”关键是要使东北军脱离“蒋介石的控制与影响，公开起来反对蒋介石丧权辱国的一切无耻行为，拒绝执行蒋介石进攻苏区与红军的命令。”指示还指出：“凡是东北军驻扎的地区，争取东北军工作，就是那里的党的中心的工作。”

周恩来和张学良谈判以后，中共中央派以叶剑英为首的军事代表驻西安，帮助东北军进行抗日教育，举办了王曲军官训练团。又委派刘鼎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常驻西安，加强与张学良的联系。与此同时，西北特支联合爱国民主人士组织了“西北抗日救国联合会”，又组织了以张学良为会长的有不少共产党员参加的“东北抗日救亡总会”，广泛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张学良派人到广西联络李宗仁、白崇禧和山东韩复榘，河北宋哲元，四川刘湘，云南龙云，山西阎锡山，新疆盛世才等部，说明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

中国共产党与杨虎城西北军的联合，在1935年以前，主要是中共地方组织和共产党员（个人）与杨共事。但自“八一宣言”发表后，杨就积极与中共中央联系，中共组织也运用各种关系和渠道，加强对杨的争取工作。杨虎城是陕西蒲城人，出身贫苦农民，早年参加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称帝时，杨参加陕西护国军，与袁作战；1922年以后，结识进步人士杜斌丞、共产党人魏野畴等人，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他一直走进步道路，不少共产党员在杨部工作，魏野畴就担任过杨部的政治部主任。

1931年他任陕西省主席时，任命共产党员南汉袁为省府秘书长。“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对日本侵略异常愤慨。

1933年，日本帝国主义占领热河省，他向蒋介石要求将17路军全部开赴华北抗日。当冯玉祥在察哈尔组织抗日同盟军时，杨虎城不仅声援，而且资助枪支、弹药。

1936年绥东抗战，杨虎城又多次请缨杀敌，一次再次的爱国要求，都被蒋介石拒绝，引起了极大的不满。

1935年11月，毛泽东写信给杨虎城，提出西北大联合的主张，希望杨和中共的关系继续保持并发扬光大。中共中央派徐海东部政委汪锋把信送给杨虎城。汪锋到达杨部后，三次和杨会谈，沟通了中共中央和杨虎城的关系。

1936年4月，由杨虎城资助去德国留学的王炳南回国后，被派到杨部做联络工作。经过多方面的工作，1936年5月，双方谈判就互不侵犯，互派代表，建立交通电讯联系，帮助红军运送物资，红军帮助改造17路军等问题达成协议。从此以后，17路军在陕北宜川至郿县（今富县）一线的部队和红军之间，已呈休战状态，未再发生实际上的冲突，只是在蒋介石的威逼下，杨虎城部以打假仗的办法向红军射击，来应付特务的监视。为了加快西北大联合的步伐，毛泽东于1936年8月13日在《致杨虎城》的信中说：“先生同意联合战线，盛情可感。”“良以先生在理在势在历史均有参加抗日战线之可能，故敝方坚持联合政策，不以先生之迟疑态度而稍变自己之方针。”“全国各派联合抗日渐次成熟，而先生反持冷静态度——若秘密之联系，暗中之准备，皆所不取，甚非敝方同志所望于先生者也。兹派张文彬同志奉诚拜谒，望确实表示先生之意向，以便敝方作全盘之策划。先生如以诚意参加联合战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3～34页。

同上，第35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38页。

线，则先生之一切顾虑与困难，敝方均愿代为设计，务使先生及贵军全部立于无损有益之地位。”张文彬作为中共驻杨虎城部的联络代表，被杨委任为少校秘书，从此双方的联系得到了加强。中共与杨虎城的合作也比较牢固地建立起来了。

为了实现西北大联合，1936年10月，王炳南在上海经杜重远写信介绍会见张学良，做沟通张学良和杨虎城关系的工作。此后，张、杨消除了误会，增强了团结。经过中共党员和进步人士的工作，在东北军中提出“和杨联共”的口号，两军关系逐步改善。最后，张、杨两将军推诚相见，倾吐真言，成为挚友。

1936年10月26日，毛泽东等40多名红军将领写信给国民党蒋总司令及西北的将领，提出只要贵党政府决心抗战，红军“誓与你们合作到底。”“……西北数十万健儿终会手携手的联合起来。”

（三）对华北及其它地方实力派的工作

1936年初，刘少奇由陕北到天津负责领导党的北方局和正在蓬勃发展的华北抗日运动。北方局彻底改变“左”的关门主义，采取大刀阔斧的工作方法，通过各种方式，同华北及其他地方实力派、社会名流、爱国团体进行联络，大力争取第29军和宋哲元等倾向抗日。华北抗日救亡运动取得了伟大的成就，成为全国抗日运动的先进地区。

第29军负责平、津一带防务，是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前哨。

1935年8月，宋任平津卫戍司令，11月，任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在“一二·九”运动中，群众提出“打倒卖国贼宋哲元”、“打倒冀察政务委员会”等口号，北方局对宋哲元及冀察政务委员会作了分析之后，认为冀察政务委员会虽然是适应日本要求建立起来的代理机构，但在全国救亡运动高潮的形势下，宋哲元还是动摇的，不甘愿卖国当汉奸，还有转向抗日的可能。因此，指出这些口号的错误，并把它改为“拥护宋委员长抗日”的口号，从此以后，群众的救国活动取得了宋哲元的支持。

1936年8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名义给宋哲元写信，阐明国难当头的危机形势，对他表示的抗日愿望和改变对群众救国运动态度表示赞赏，希望29军和红军建立联合战线，并代表中共中央申明：“然弟等甚望先生能干艰难困苦之中坚持初志，弟等及全国人民必不让先生独当其难，誓竭尽全力以为后援。”为了促进联合，毛泽东派张经武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去宋哲元处做联络工作。1937年春，29军办学兵队，中共党组织利用这个机会，派遣党员参加受训，并给学兵队讲课，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经过对29军不断的团结争取工作，29军抗日热情日益高涨。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非常注意做山西阎锡山地方实力派的统战工作，把在山西尽早建立国共合作关系放在突出的位置。当时，阎锡山处在与日本帝国主义、蒋介石、中共多方的复杂矛盾中。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00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50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0~41页。

日本进攻绥东，威胁到他的生存。蒋介石派 10 个师进入山西不走，并派特务策动阎军内部搞“河东独立”，企图取而代之。阎锡山则打算利用共产党巩固与发展他的力量。中共中央正确地分析了阎锡山的处境，决定对其加强争取工作。

1936 年 5 月 25 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先生如能与敝方联合一致，抗日反蒋，则敝方同志甚愿与晋军立于共同战线”。信中通知阎锡山，红军俘虏的晋军第 66 师第 392 团团团长郭登瀛以下官兵及武器弹药全部送回，并派彭雪枫、周小舟作为中共中央代表到太原向阎锡山陈述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这时，山西自强救国同志会中的左派进步青年宋助文等，响应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号召，倡议组织一个抗日救亡团体，取名“抗日救国会”。阎锡山认为建立一个群众性的团体，能壮大自己的声势，表示赞成组织民众救国，但不同意组织“抗日救国会”。他定名为“牺牲救国同盟会”，并于 1936 年 9 月 18 日正式成立，亲自担任会长。中共地下党员杜任之、刘岱峰等为委员。

阎锡山在 1936 年秋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和新的干部训练机构军政训练委员会，派专人到北平邀请共产党人薄一波等回山西。中共北方局派川薄一波为书记，由杨献珍、董天知、韩钧、周仲英等 5 同志组成专门进行上层统一战线工作的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他们于 1936 年 10 月到太原，很快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并达成了 3 条协议，即宣传共产党的主张不受限制，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在用人方面给予方便并保证安全。阎锡山同意这些条件后，薄一波以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办公室秘书的名义任牺盟会常委秘书，主持日常工作。随后，即接办了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大力发展组织，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在中共山西省委配合下，利用统一战线这种形式，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但开展了山西的抗日局面，而且对于逼蒋走上团结抗日道路也发挥了作用。

毛泽东在 1936 年 8 月 14 日致傅作义的信中指出：“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中共中央、毛泽东同时派出代表到西北、华北、广东、广西、四川等地，向国民党地方实力派转达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谈判双方联合的事宜。西南地方实力派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曾提出反蒋抗日口号，并派代表联络东北军张学良，派钱寿康与中共中央商谈联合事宜。毛泽东在 1936 年 9 月 22 日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的信中指出：“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而蒋介石现在还在进行内战，“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更”，望能“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对于他们提出的建立抗日救国协定的建议，毛泽东在信中答复说：“实属绝对必要。”从此，中国共产党与李宗仁、白崇禧部建立了联系。

（四）争取国民党爱国民主人士和爱国将领的工作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34 页。

自强救国同志会，简称同志会，是阎锡山所属各群众团体的核心组织，成立于 1936 年 5 月。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43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0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71 页。

中国共产党为联合国民党爱国人士和爱国将领，逼蒋抗日，做了大量的工作。毛泽东 1936 年仅写给他们的信函即达 70 余封，最多的一天写信 9 封。

毛泽东在 1936 年 9 月 18 日致宋庆龄的信中，对她在 1927 年后仍一直坚持孙中山先生的旗帜，真诚和共产党合作，与蒋介石的反动政策进行斗争，表示敬仰，希望她能在国难当头的严重时刻发挥更大作用。毛泽东在信中指出：“目前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之呼声虽已普及全国，然而统率大兵之蒋氏及国民党中央迄今尚无彻底悔祸之心。这种违反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三民主义与三大政策之行为，实为国民党大多数党员所不应容许而应立起纠正才是。因此，我想到要唤醒国民党中枢诸负责人员，觉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迅速改变其错误政策，是尚有赖于先生利用国民党中委之资格作具体实际之活动。”毛泽东写信给关心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何香凝，赞扬她的革命行动，希望她能促进国共合作。毛泽东 1936 年 12 月 5 日致信抗日将领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希望“先生登高一呼，众山齐应，今日停战，明日红军与西北‘剿共’各军立可开进于绥远战场。”宋庆龄、何香凝等对促进国共第二次合作起了重大作用。冯玉祥在敦促蒋介石抗日方面也做了有成效的工作。

1935 年 7 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创办了《大众日报》，提出“联合战线、武装抗日”的口号，严厉谴责南京政府的卖国独裁政策。毛泽东在 1936 年 9 月 22 日亲笔致信蒋光鼐、蔡廷锴，并派人送去中国共产党 8 月 25 日致国民党书和《关于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毛泽东在信中赞扬他们的爱国行动，希望他们推动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毛泽东在 1936 年 9 月 22 日还写信致国民党中有影响的人物，北京大学、中央研究院之学术领袖蔡元培，恳切希望他能运用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力促蒋介石等团结抗日，蔡深受毛泽东来信的感动，努力督促国民党中央走向团结抗日的道路。毛泽东 1936 年 9 月 8 日致国民党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的信，引用《三国演义》的“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话，提出与邵联合。邵力子以后对促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的实现，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对在内战中多次交战过的对手朱绍良、王均等人，中国共产党人也不计旧怨，多方联络。

对爱国将领邓宝珊的工作早有深厚基础。1927 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后，邓宝珊即掩护和援助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并任用共产党员葛雾云、杨嘉瑞等人为秘书长、副官。

1932 年邓宝珊在兰州任甘肃行署主任期间，不少中共地下工作的党员来到兰州建立了特别支部。1935 年，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后，邓宝珊积极拥护宣言关于“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主张，曾奔走晋、冀、鲁 3 省，会晤了阎锡山、宋哲元、韩复榘等人，敦促他们同仇敌忾，抗击日寇。1935 年 11 月，毛泽东派汪锋携带他写给杨虎城、杜斌丞、邓宝珊的亲笔信到西安，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61 页。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第 91 页。

《救国时报》1936 年 7 月 25 日。

进行工作。邓当时恰不在西安，他得消息后，曾准备亲自来西安见汪锋，因汪锋已回瓦窑堡，终未见成，但已足见其对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意见的热忱。

中国共产党还对四川的刘文辉，云南的龙云，山东的韩复榘等做了大量工作，这些都对促进国共联合作了重要的准备。

三、逼蒋抗日方针的提出与实施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华北地区步步紧逼，侵略气焰更加嚣张。

1936年5月，日本向华北增派大量军队，进一步控制华北地区各军事要地及铁路沿线。日本还派遣特务、浪人等，故意在中国各地制造事端，以配合其在华北的军事侵略活动。与此同时，日本已制定了周密的全面侵华战争的作战计划。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重局势，中国人民都忧心如焚，广大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以至民族资产阶级，都要求抗日救国。甚至一些开明地主和大资产阶级、地方军阀，都因遇到了存亡的问题而不同程度地改变着对日的态度。国民党政府中的亲英、美派，也由于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对日本的政策开始出现部分的变化。

这时，中国共产党通过组织、发动中国人民抗日救亡以及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实践，认识到“只有全中国各党各派的共同奋斗，全中国人民及武装部队的总动员，我们才能给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以致命的打击，而取得中国民族的彻底解放”。在当时，争取蒋介石集团停止内战共同合作抗战，尤为重要。蒋介石是国民党的领袖，是国民党中英、美派的代表，掌握着国民党政府的军政大权，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活动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要实现全国全民族的抗战，如果不促使蒋介石国民党政府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是无法达到目的的。共产党前一阶段所提出的“抗日反蒋”口号，已不适当当时形势发展的需要，并且也无法为国民党中央各方面人士所接受。因此，中国共产党考虑到国民党中央英、美派集团对于日本态度有转变的实际可能性，为了促进蒋介石进一步转向抗战，实现全民族的抗战，决定将“抗日反蒋”的口号改为“逼蒋抗日”。

1936年1月29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和人民外交委员王稼祥与红色中华社记者谈话时宣布：“中国苏维埃政府当然可以在抗日战线上和他携手。”这是中共中央领导人明确表示与蒋介石合作抗日的态度。

1936年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的通电。指出：“国难当头，双方决战，不论胜负属谁，都是中国国防力量的损失，而为日本帝国主义所称快。”“为了促进蒋介石氏及其部下爱国军人们的最后觉悟……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以此行动向南京政府、全国海陆空军、全国人民表示诚意，我们愿意在一个月内在所有一切进攻抗日红军的武装队伍，实行停战议和，以达到停战抗日的目的。”这是中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1页。

《救国时报》1936年1月29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23~24页。

国共产党放弃反蒋口号，直接公开地向国民党提出建立抗日联合战线的建议，在全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1936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致中国国民党书中提出：“本党不得不向贵党再一次大声疾呼，立即停止内战，组织全国的抗日统一战线，发动神圣的民族自卫战争，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保卫及恢复中国的领土主权，拯救全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中国共产党向一切中国国民党人宣言：假如你们真正这样干的时候，我们坚决的赞助你们，我们愿意同你们结成一个坚固的革命的统一战线，如象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第一次中国大革命时两党结成反对民族压迫与封建压迫的伟大的统一战线一样，因为这是今日救亡图存的唯一正确的道路。”1936年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日本帝国主义继续进攻，全国民族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条件下，国民党中央军全部或其大部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我们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一方面继续揭破他们的每一退让、妥协，丧权辱国的言论与行动，另一方面要向他们提议与要求建立抗日的统一战线，订立抗日的协定。我们正在通知他们，共产党中央立刻准备派代表出去，或接受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代表到苏区来，以便进行谈判。9月17日，中共中央决定将“人民共和国”改为“民主共和国”。至此，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对国民党政策的转变，即由“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

为了实现“逼蒋抗日”的方针，逼迫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走上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道路，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中共中央加速中国工农红军向实现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巩固和扩大抗日的基地，积极准备直接对日作战；进一步领导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动员和组织广大群众，进入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行列；进一步加强对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地方实力派的统一战线工作；在与国民党初步接触的基础上，进一步就两党合作进行谈判。

继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在莫斯科与国民党中央代表邓文仪进行初步会谈后，在国内，国共双方也开始了接触。

1936年1月，国民党政府方面由宋子文主持，指示曾养甫、湛小岑等与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周小舟、吕振羽在南京进行谈判。在此后数次谈判中，双方就所提条件展开激烈的争论，没有结果。

国共之间的接触，还通过上海方面的国共两党代表同时进行。1936年1月，陈立夫的代表曾养甫与上海中共组织代表张子华等接触，转达了南京政府希望与共产党中央谈判的要求。2月间，张子华等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瓦窑堡向中央报告了上述情况。8月31日，周恩来给曾养甫的复信表示：“亟愿与贵方负责代表进行具体谈判。”9月1日，又给陈立夫、陈果夫复信：“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以后，中共中央派周小舟多次去南京同曾养甫会谈合作问题。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派特使董健吾进入陕北苏区，直接和中共中央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74、81页。

同上，第84页。

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120页。

同上，第121页。

取得联系。3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集中各方意见，提出“与南京谈判之意见”，表示“愿与南京当局开始具体实际之谈判”。董健吾于3月5日带着中共中央向南京方面提出的条件离开瓦窑堡回上海。

国共之间长达一年的初步接触，虽然没有取得具体成果，但对以后国共两党之间的正式谈判，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张闻天、毛泽东、彭德怀致博古电，1936年3月4日。

第二节 中国工农红军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历史转变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吞并整个中国的步伐，中国处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中国工农红军为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壮大抗日武装力量，争取早日对日作战，开始加速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

一、红一方面军的东征

1935年10月，红1方面军主力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胜利完成长征，使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革命的大本营在接近抗日前线的大西北建立起来。这是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日本帝国主义加紧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严重威胁着中华民族生存。中日民族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各阶级、各政治集团的政治态度都发生了新的重要变化。中国已处在政治形势大变动的前夜。如何巩固和扩大陕甘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抗日武装力量，推动各种抗日和革命的力量汇合起来，组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革命战线，已成为开展全国抗日局面的关键。

当时中共中央、红一方面军及其所在的陕甘苏区，还面临着一些实际困难，红一方面军的实力只有万余人。苏区的面积狭小，人口稀少，物资缺乏，红军给养困难，扩军不易。苏区周围都有国民党军的包围：在南面、西面，有国民党的东北军、西北军和宁夏军阀的步、骑兵共10多个师，蒋介石的一部分“中央军”也正在向西（安）兰（州）公路两侧集中；在北面，有原驻守在陕北的国民党军2个师和新从山西调来的阎锡山部5个旅。这些国民党军，正在加紧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和政治破坏，并积极准备新的军事围攻。因此，红军向南、向西或向北发展都比较困难。东面的山西省最接近抗日前线，国民党军兵力虽多，但较分散，有利于革命力量的发展。

为了适应国内外形势的变化，发展革命力量，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接受了毛泽东的关于军事战略的主张，即红军应利用当前蓬勃发展的抗日形势，积极向山西发展，在发展中求得苏区的巩固，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提出，党在目前形势下的战略方针是：在以坚决的民族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总任务之下，必须“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1936年应“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猛烈扩大红军”。在此方针下，红一方面军的行动部署，应放在打通抗日路线和巩固扩大现有苏区这两个任务的基础上，并以前者为中心任务。据此，红军行动和苏区发展应以山西和绥远为主要方向。决议还提出了红一方面军渡黄河东征的任务。

1936年2月18日，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政治委员毛泽东下达了东征作战的命令，规定第一步作战任务为：东渡黄河，占领吕梁山脉各县，在东岸造成临时作战根据地。红一方面军东征部队是：第1军团第2师、第4师、第1师，第15军团第81师、第75师、第78师。

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为实现抗日，渡河东征。但是山西阎锡山竟动员其全部武装力量拦阻红军的抗日去路，于是红军在汾河河谷地区击败阎锡山所部，占领同蒲铁路，准备开向冀察对日直接作战。2月23日，蒋介石下令调洛阳、徐州、浦口等地重兵约10个师，协助阎锡山堵截红军东征抗日，又下令东北军、西北军及陕、甘其他国民党部队进扰红军陕甘革命根据地，

企图重演 1933 年围歼积极抗日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的故技。在大规模内战迫在眉睫的形势下，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为了保存力量，以利于迅速进行抗日战争，虽在山西取得了许多胜利，仍决定将人民抗日先锋军撤回黄河西岸。

在红一方面军东征期间，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3 月 20~27 日在晋西地区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传达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分析了当前的形势，讨论了战略方针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共产党在目前战争中，要把革命战争与民族战争联系起来，争取迅速对日作战。当前华北形势变化急剧，是最大的世界喷火口之一，日、美、英、苏联、国民党、共产党六个势力的矛盾集中于华北。华北 5 省有占中国 1/4 的 1 亿人口，它已名存实亡，对全国危险比其他地方更甚。华北是全国对日作战的首要战场，争取对日作战，政治上是必要的，军事上是可能的。我们到山西来，因有了清醒的估计，民众会全力帮助我们，这是证明了的。华北广大群众具有极高的革命热情，与日军首先在华北作战，这是为着组织群众，为着组织友军，扩大红军，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我们要在山西、河北建立根据地，开展抗日游击战争，越打，红军就越大。要准备在山西、河北、绥远 3 省作战，这是战役的跳跃，应当估计是必要的。以发展求巩固。现在只有发展才能求得巩固。会议经过讨论决定“争取迅速对日作战为党与红军的重要任务”，“以发展求巩固”为全党全军的战略方针，党和红军当前的方针是经营山西，“在此种方针下，向河北、河南、绥远三省境内作战的跳跃是许可的。”还决定要在“陕甘及华北 5 省发展游击战争”，以及提高红军干部的政治、军事水平，加强政治工作等。晋西会议发展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进一步明确了红军对日作战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和战略任务，它对加速红军对日作战的思想、组织和物质准备，以及尔后实施战略展开和对日军的胜利作战，都具有重要意义。

红一方面军的东征，迫使“进剿”陕北的晋绥军撤回山西，使陕北苏区得以恢复和发展。在此期间，红军扩充新兵约 8000 人，筹款 30 余万元，并在山西 20 多个县开展了群众工作，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扩大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治影响，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二、红一方面军的西征

1936 年 5 月 5 日，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反蒋”口号，并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在全国范围、首先在陕甘晋停止内战，双方互派代表磋商抗日救亡具体办法。”但是，蒋介石却无视这一倡议，不顾日寇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仍企图以武力消灭中国工农红军，并着手成立晋陕绥宁 4 省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任总指挥，调集 16 个师另 3 个旅，准备对陕甘苏区发动新的“进剿”。

中共中央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确定党在今后的政治任务是：保卫西北，扩大和巩固西北抗日根据地，扩大红军，努力争取西北抗日力量大联合，进而推动全国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的建立，实现全国性的对日抗战。

为了实现上述任务，中共中央军委于 5 月 18 日决定：以红 1 方面军第 1、

第 15 军团和第 81 师、骑兵团等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进行西征，打击坚持反共的马鸿逵、马鸿宾部，在陕甘宁 3 省边境地区创造新根据地；以红 29 军主力、红 30 军和陕北地方部队，在东线坚持游击战争，钳制西渡的蒋、阎军以及陕北和渭北国民党军的进攻，保卫陕甘苏区老根据地；红 28 军准备出陕南，会同在当地的红 74 师，在鄂豫陕 3 省边区开展斗争，策应野战军西征。

1936 年 5 月 20 日前后，西方野战军分两路相继从延长、延川地区西进，至 6 月中旬占领陕甘宁 3 省边境的广大地区。随后，继续西征，经过定边、盐池、豫旺等地区的作战，到 7 月底，在两个多月作战中，给反共军以沉重打击，并开辟了纵横 200 余公里的新根据地，新组建了两个骑兵团，发展了地方武装，征集了大量资材，为随后 3 大主力红军会师，开展新局面，创造了有利条件。

在西方野战军西征的同时，东线红军在中共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疲惫和消耗了进攻之国民党军，使其先肃清东线红军，再向西寻红军主力作战的企图归于破灭。与此同时，对东北军、西北军等国民党军队的统战工作也有了新的开展。这些对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

三、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准备对日作战

（参见附图 12）

1936 年秋，红一方面军已经胜利结束西征，主力在豫旺堡、豫旺县城及其附近地区休整，新开辟的陕甘宁边革命根据地与原陕甘苏区联成了一片；红二、红四方面军先头已进抵甘肃南部的哈达铺地区，形成了三个方面军逐渐靠拢的有利局面。

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8 月 10 日举行扩大会议，讨论了国内外形势，并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把开展统一战线工作放在党和红军三大战略任务的首位，确定以蒋介石政府为统战谈判的主要对手，继续进行谈判，同时对国民党各地实力派分别进行统战谈判，并大力开展群众抗日运动，以推动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道路。

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中共中央决心乘蒋介石处理“两广事变”暂时无力北顾之际，联合东北军发展西北抗日局面，经同张学良等协商后，于 8 月 12 日提出了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其要点是：红军 3 个方面军在甘肃北部会师，尔后以 1 个方面军保卫陕甘宁苏区，以两个方面军过黄河，占领宁夏后，红军和东北军各出一部，组成抗日联军先锋军，向绥远挺进，直接抵抗日军和伪蒙军的进攻，以此将全国抗日运动推向更高的阶段。

然而，蒋介石此时仍处心积虑于消灭红军。为了阻止红军 3 个方面军会合，调第 1、第 37、第 3、第 41 军等部，准备协同青海马步芳部和东北军 1 部进攻红四方面军；令第 25、第 49、第 51、第 140 师以及第 3 军、东北军、西北军和川军各 1 部，向陕甘边境南部地区推进，围堵红二方面军；令宁夏马鸿逵部向中宁以南推进，何柱国部、马鸿宾部向北推进，以夹击清水河以西的红一方面军主力。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了贯彻已定的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于 9 月 14 日决定相机打击反共军。红一方面军主力于 9 月 16 日在固原以北的七营地区

歼灭进犯之敌骑兵第6师两个团的大部，红1军团特别支队于18日派1个团占领了界石铺；红二方面军于进占徽县、两当后，即向宝鸡方向前进。与此同时，红四方面军北上，同红一方面军会合。从9月30日起，分5个纵队，相继由岷县、漳县等地向通渭、庄浪、会宁前进。同时，红一方面军相继接应红四方面军北进。

10月9日，红军总部及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一方面军部队会师。红二方面军于10月4日由两当、徽县、成县、康县地区开始北移，至22日，红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之第2师会师。至此，3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结束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3大主力红军会师，对于开展新局面，促进全国抗日战争的实现，有着十分重大的意义。

为了争取红军早日实现对日作战，中共中央根据变化的情况，于11月8日提出了新的战略计划，其主要内容是：3个方面军继续在现地作战，引诱国民党军北进宁夏。12月上旬后，红一、红二方面军组成南路军，逐次南下，占领镇原、正宁、洛川，继续向濒临黄河的韩城、宜川、延长地区发展。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北路军，在宁夏省灵武、盐池地区待机，在绥东抗战爆发后，即沿安边、横山进至黄河沿岸的神木、府谷地区。南北两路到达黄河沿岸，即迅速筹集船只，准备再渡黄河进入山西，寻求直接对日作战。

11月中旬，3个方面军均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

此时，国民党军第37军正准备西渡黄河，参加“追剿”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同红军有统战关系的东北军王以哲部，经过劝阻，前进缓慢；第3军进占同心城后，也停止前进；唯有胡宗南之第1军行动积极，分3路向豫旺县进攻。

中共中央军委根据敌憎及前敌总指挥部的建议，于11月14日至16日接连下达指示，着重指出：“敌既继续向我进攻，目前中心是打破敌之进攻，然后才能开展局面，才有利统一战线。否则敌以我为可欺，不但局面不能开展，与南京之统一战线也是不可能的。”因此，红军主力“应即在豫旺县城以东，向山城堡速上靠近，集结全力，准备打第一仗”。19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决定求歼胡宗南之第1军第78师。21日，红军对进占山城堡之第78师发起攻击。当日黄昏，该师一部开始向北撤退。红军乘机一举攻入山城堡，接着转入追击，将溃乱之敌大部压迫于山城堡西北谷中，至22日，将其大部歼灭。

这一仗，红军歼来犯之敌1个多旅，给蒋介石嫡系主力胡宗南部以沉重的打击，迫使该部全线退至大水坑、萌城及其以西地区，从而停止了国民党军的进攻。山城堡战役的胜利，是中共中央军委正确决策和3大主力红军团结战斗的成果。它大振了红军的声威，对促进逼蒋抗日方针的实现起了积极的作用。

1936年夏秋，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为贯彻逼蒋抗日的方针和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领导全军战胜了国民党军30多个师的围追堵截，实现了3大主力红军会师和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这对挫败蒋介石的进攻，稳定陕甘宁根据地的局面，增强红军团结，发展革命力量，促进国内和平的实现，都具有重要意义。正如中共中央、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中央

革命军事委员会联合发出“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所指出的：

“全国主力红军的会合与进入抗日前进阵地，在中国与日本抗争的国际火线上，在全国国内政治关系上，将要起一个决定的作用了。”“我们即刻就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了，这就是抗日民族革命战争的新阶段，就是创造全国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与民主共和国的阶段。我们要在这个新阶段中，树立全国人民的模范，树立抗日战线的模范，争取一切国民党军队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通抗日前进道路，扩大抗日根据地，巩固抗日根据地，为保卫西北而战，为保卫华北而战，为保卫全国而战，为收复失地而战，为联合工农商学兵，为联合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战。”

第三节 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涨

一、“一二·九”运动

1935年，以华北事变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对华侵略的深入，使中国的民族危机日益加深。中国面临着沦为日本帝国主义殖民地的严重危险。

在这民族危亡的时刻，北平的爱国学生深感“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他们满腔怒火，首先发出抗日救亡的怒吼。中共中央北方局积极支持和领导了学生的爱国运动。1935年夏，外患猖獗，黄河又泛滥成灾，难民流离失所。中共北平市工作委员会根据北方局和河北省委发动群众救灾的指示，通过北平民族武装自卫会，于9月间发动成立了北平大中学校水灾救济会，带领学生开展救济募捐和宣传活动，团结广大学生，以合法活动开展抗日救亡斗争。此时，河北省委将中共北平市工委改为中共北平临时市委，并派省委特派员李常青兼任书记，他与彭涛、周小舟等人，积极领导发动北平学生的抗日救亡运动，在水灾救济会的基础上，于11月18日成立了领导学生爱国运动的统一组织北平大中学生会，彭涛任党团书记。

12月3日，北平学联召开代表大会，决定联合北平各大中学校进行请愿示威，反对“华北自治”和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12月6日，在学联的发动下，平津15个大中学校联合发出通电，反对“防共自治”，呼吁政府动员抵抗日本的侵略。经过深入发动，北平学联决定于12月9日发动全市学生进行反对“华北自治”、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反对日本侵略的大请愿。

12月9日，被长期压抑的抗日怒火，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北平各大中学校的爱国学生6000余人涌上街头，奔向新华门，向国民党政府军政部长何应钦请愿。愤怒的学生振臂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5省自治！”“打倒汉奸卖国贼！”“立即停止内战！”这呼声划破了笼罩在古城上空的乌云，喊出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心声，请愿群众代表向国民党政府提出6项要求：（1）反对华北自治及其类似组织；（2）反对一切中日间的秘密交涉，立即公布应付目前危机的外交政策；（3）保障人民言论、集会、出版自由；（4）停止内战，立刻准备对外的自卫战争；（5）不得任意逮捕人民；（6）立即释放被捕学生。当天，学生的游行队伍经西单时，遇到国民党军警的阻拦和野蛮镇压，100余人受伤，30余人被捕，但爱国学生并没有因此而被吓倒，国民党当局的镇压反而激发了学生们的坚强斗志。第2天，北平学联决定各校学生举行总罢课，积极酝酿和准备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抗日救亡怒潮，席卷了整个北平城。

12月14日报载，国民党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打算于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共北平党组织决定在这一天举行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

12月16日清晨，北平各校学生从四面八方涌向天桥，在天桥举行了3万多人的市民大会。大会通过了组织民众，共同抗敌，誓死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等决议案。会后举行数万人的示威游行，国民党政府再次调动军警镇压，被大刀砍伤、刺伤及被棍棒打伤的有400多人，被捕30余人。

北平爱国学生“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立即得到全国各地的广泛响应，掀起了全国抗日救亡的热潮。天津爱国学生12月18日举

行示威游行，19日起实行罢课。上海爱国学生和文化、教育各界以及广大工人、群众，于12月24日举行全市示威游行。南京、杭州、武汉、广州、开封、济南、太原等城市，爱国学生纷纷举行示威游行、请愿和罢课，支持北平学生的爱国斗争。“一二·九”运动的消息，传到世界各地，海外侨胞深感振奋，立即向国内各校学生组织发出电函，赞扬学生的革命精神，誓为学生们的后盾。

“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号召下发生的，共产党给学生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毛泽东于1939年12月9日在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4周年大会上的讲演中指出：“毫无疑问。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这样，才使一二·九运动发生，并使之在全国各阶层开展起来，形成了全民族救亡运动的巨大政治力量。青年学生好比是一二·九运动的柴火，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差用火一点。点火的人是谁呢？就是共产党。”毛泽东还指出：一二·九运动，“轰动了全国。它配合着红军的北上抗日行动，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使抗日运动成为全国的运动，所以，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

二、全国抗日救亡运动进一步高涨

在“一二·九”、“一二·一六”示威游行后，学生运动面临“向何处去”这个急待解决的问题。

12月20日，中国共产党通过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同胞宣言》，号召青年学生“把反日救国运动扩大起来！到工人中去，到农民中去，到商民中去，到军队中去！唤起他们救国的觉悟，推动他们建立救国的组织。进一步建立各地各界救亡大会和全国救亡大会，实行全民抗日救国大联合，和实行全国各界同胞武装扩日的共同战斗！”《宣言》给学生运动指出了正确的发展方向；1935年12月26日，在北平成立了平津学生联合会。随后，平津学联组织了南下扩大宣传团，并组成以彭涛为党团书记的扩大宣传团党团，领导全团的工作。扩大宣传团下设4个团，共约500人。1936年1月初，4个团的学生出发，他们冒着刺骨的严寒，沿途每到一处，都召开大会进行演讲，张贴和散发传单，唱救亡歌曲，演出《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戏剧，对当地农民和中小学师生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帮助他们组织抗日救国会等义国团体。

宣传团员们在斗争中深感团结起来的必要，要求建立一个永久性的战斗团体，并提出组织“民族解放先锋队”。

1936年2月1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在北平师范大学举行成立大会，通过了“成立宣言”。民先队在救亡运动中迅速发展，到当年暑假，北平民先队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毛泽东：《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1939年12月9日。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9，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6年版，第597页。

员已发展到 1200 多人。后来，全国各地有 30 多个城市建立了民先队；在法国巴黎、日本东京以及缅甸等地也有了民先队组织。1937 年 2 月 6 日，在中共中央北方局领导下，召开了民先队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立了全国总队部，由李昌任总队长。

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是抗日救国的先进青年的群众性组织，它在抗日救亡运动中产生，肩负着民族解放的使命，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了广大的爱国青年，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它实际上已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抗日爱国青年的纽带。从此以后，大批革命学生不断地深入农村，参加各种抗日斗争，团结、影响和教育广大爱国青年参加抗日救亡，走上知识分子与广大工农相结合的正确道路。

在平津学生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农村进行抗日救亡宣传的前后，上海、济南、杭州、武汉等地的学生也组织了宣传团，深入农村扩大宣传。抗日救亡运动的蓬勃发展，引起了反动当局的惊恐，国民党政府于 1936 年 2 月 20 日颁布了《维持治安紧急办法》，竭力镇压爱国学生的救亡运动。随之，各地爱国学生遭到了残酷打击和迫害，救亡运动在严重的白色恐怖之下进入低潮。

在学生运动处于严重困难的时刻，中共中央北方局加强了对救亡运动的领导，于 4 月间派林枫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李葆华任中共北平市委书记。北平市委先后建立了工委、农委、文委、学委和 5 个区委。1936 年五六月间，对党员和民先队骨干分子进行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教育，加强了对区委和各党支部的领导，多数大学和部分中学建立了党支部，学生党员发展到 4 百多人。

在“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推动下，参加抗日救亡的各界各派的联合，迅速向全国规模发展。继 1936 年 1 月华北学生联合会、上海各界救国会成立后，各地先后成立了各界救国会。1 月 29 日，西北工农商学兵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在瓦窑堡召开，到会苏区和白区代表共 140 余人，决定在西北各省开展广大的抗日救国运动，普遍组织各界抗日救国联合会。5 月 31 日至 6 月 1 日，在上海召开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主要领导人有：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沈钧儒、沙千里等全国知名人士。大会通过《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大会宣言》、《抗日救国初步政治纲领》等文件，作为各党各派共同抗日的纲领草案。大会选举宋庆龄、何香凝、马相伯、邹韬奋、胡愈之等 40 人为执行委员，沈钧儒、章乃器等 14 人为常务委员。救国会是以爱国知识分子和共产党员为骨干，接受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的、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抗日救国阵线组织。

1936 年 7 月 15 日，沈钧儒、章乃器、陶行知、邹韬奋联名发表了《团结御侮的几个基本条件与最低要求》，要求国民党联合红军共同抗日，指出先安内后攘外的方针对敌人有利，表示坚决站在救亡阵线的立场，为中华民族解放运动的胜利而奋斗。他们的主张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1936 年 8 月，南京各界救国会成立，简称“南救”。接着，在香港成立救国会华南区总部，简称“南总”。其他各地，包括海外华侨，也纷纷建立救国会。随着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和抗日救亡团体的成立，救亡刊物大批涌现。据不完全统计，全国救亡刊物达千余种。邹韬奋主编的《大众生活》，每期发售达 15 万份以上。

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使国民党当局十分恐惧，遂于 11 月 23 日凌晨逮

捕了全国救国会领袖沈钧儒、章乃器、邹韬奋、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王造时等7人，史称“七君子事件”。这一事件震动了全国，各方面人士纷纷向国民党政府提出抗议，开展了声势浩大的营救运动。6月下旬，宋庆龄、何香凝以及胡愈之等16人，发起“救国入狱运动”，并发表宣言。提出如爱国有罪，愿与沈钧儒等同受处罚；如爱国无罪，则与他们同享自由。7月5日，宋庆龄等亲往苏州，到关押“七君子”的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请求入狱。由于沈钧儒等7人的坚决斗争和全国人民的声援，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党政府被迫于7月31日释放了“七君子”。

在推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中，文化界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的领导下，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中国左翼文化界总同盟（简称“文总”）等左翼文化团体，积极投入文化战线的抗日救亡运动。“九·一八”事变后的第3天，“左联”领导人鲁迅在《答文化新闻社问》中，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反动面目。接着，“左联”发表了《告国际无产阶级及劳动大众的文化组织书》，抗议日本的侵略，呼吁国际社会的支援，号召全国人民奋起抗日。“左联”出版《萌芽》、《前哨》、《北斗》、《文化月报》等刊物，宣传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从事马克思主义论著和外国进步文艺的翻译介绍。爱国文艺工作者创作了一大批抗日文艺作品，如阳翰笙的小说《义勇军》、肖红的小说《生死场》、萧军的小说《八月的乡村》、文芜的小说《咆哮了的许家屯》、田汉的剧作《乱钟》、蒲风的诗《我迎着风狂和雨暴》、陈鲤庭、崔鬼的活报剧《放下你的鞭子》、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工》、聂耳的《大路歌》、孙慎的《救亡进行曲》、麦新的《大刀进行曲》等，都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下的悲惨遭遇，教育人民奋起抵抗，不当亡国奴。尤其是由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曾传遍祖国各地，以其强烈的感染力，激励全中国人民起来抗争：

起来！

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
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
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

起来！起来！起来！

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

前进！前进！前进！

在华北事变后，不同阶层和派别的文艺工作者，纷纷表示要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联合起来。为了建立文艺战线的抗日统一战线、1936年初，“左联”自动解散。

10月1日，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等21位文艺界新旧各派领导人，在共同签署的《文艺界同人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中，明确提出：“在文学上，我们不强求其相同，但在抗日救国上，我们应团结一致以求行动之更有力”。“为民族利益计，我们又甚盼民族解放的文学或爱国文学在全国各处风起云涌，以鼓励民气”。《宣言》的发表，促进了文艺战线抗日民族

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使文化界的团结和战斗力进一步增强。10月19日，鲁迅不幸因病逝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发了唁电，高度赞扬鲁迅的丰功伟绩。

22日，宋庆龄、蔡元培、沈钧儒等著名人士参加了上海数万群众为悼念鲁迅的送葬。队伍行进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高唱救亡歌曲。这次送葬实际上成为学习鲁迅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动员人们献身抗日斗争的救亡示威大游行。

三、绥远军民抗日和全国援绥运动

（参见附图13）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满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及庙滩，王英部驻尚义，伪蒙古军第7师驻百灵庙，并抽调伪满骑兵5000人由热河东部开驻察北多伦、平定堡地区，企图集中兵力侵占绥远。

1936年6月，日本派其关东军参谋长板垣征四郎，“访问”绥远。绥远省政府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在省政府接见了板垣。板垣征四郎对傅恭维一番后，即要傅“改善”日、华关系，并说大日本帝国将给予全力支持。傅正告板垣说：华北是中国的领土，绝不许任何人出来搞一个独立局面。内蒙和绥远都是中国的领土，不许任何人来分割独立，也不许任何人来侵占蹂躏。板垣的离间阴谋未能得逞，第2天扫兴而去。

1936年8月7日，伪蒙军李守信部约两万人进犯绥东陶林。10日，日军由热河开抵张北。8月14日，毛泽东致函傅作义，指出：“逆者李守信卓什海向绥进迫，德王不啻溥仪，蒙古傀儡国之出演，咄咄逼人。日本帝国主义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先生北方领袖，爱国宁肯后人？保卫绥远，保卫西北，保卫华北，先生之责，亦红军及全国人民之责也。今之大计，退则亡，抗则存；自相煎艾则亡，举国奋战则存。”他还指出，“近日红军渐次集中，力量加厚，先生如能毅然抗战，弟等决为后援。”毛泽东还希望能互派代表，速定抗日救亡大计。傅作义得此信后，更加坚定抗日救亡的决心。

15日，伪军进犯集宁，遭到傅作义部的坚决反击。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后，直迫绥远省会归绥。

傅作义侦得上述情况后，决心奋起抗击侵略者。他对各界人士发表谈话，表示伪蒙军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指挥下，妄图进犯绥蒙边疆，我们自应不计任何牺牲，坚决进行反击。同时，傅作义密召骑兵第1师师长彭毓斌、步兵第218旅旅长董其武到绥面授机宜，任彭毓斌为前方总指挥、董其武为副总指挥，秘密快速集结兵力。

1936年11月15日晨，日伪军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中国守军阵地猛烈攻击，守军英勇抗击，军民戮力同心，战斗情绪高涨。

《从九一八到七七事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691页。
卓什海即卓特巴札普，当时任伪蒙古军副司令。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43页。

16~18日，日伪军连续猛攻，均未得逞。

当战斗激烈进行时，傅作义亲往集宁前线指挥，令董其武亲率所部，突袭日伪军。

11月19日晨2时，董指挥3个步兵团、1个骑兵团及炮兵营等部，围歼日伪军。敌仓卒应战，激战至拂晓，狼狈溃退。红格尔图战役自11月13日开始至19日结束，战斗7昼夜，打退了日伪军的进攻，摧毁了田中隆吉和王英的指挥所，缴获大量军用物资。王英连自己乘坐的马车也未及带走。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深恐华军捣毁其伪政权，除派王英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并令伪蒙军第7师在百灵庙构筑工事，积极备战。决定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另外，还拟抽调伪满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傅作义得知敌人的企图，决定在敌伪发动进犯前，以远距离奔袭战术，先发制人，出敌不意，将百灵庙收复，以毁其巢穴，破坏其狂妄计划，保卫国土。傅在归绥新城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决定，集中3个骑兵团、3个步兵团及炮兵、装甲车分队一部，由骑兵第2师师长孙长胜、步兵第211旅旅长孙兰峰，分别任前敌正副总指挥，进行收复百灵庙的战役。会后，各参战部队即向百灵庙以南35公里的二分子镇附近集结。11月23日夜，各部队官兵斗志昂扬，冒着-20以下的气温和没膝的积雪，开进至敌军阵地前沿，于24日零时开始攻击。由于傅部行动秘密，日伪军事前毫无察觉，听见枪声大作，才慌乱进行抵抗。正当进攻部队向纵深突击时，日本特务机关长胜岛角芳亲自拔刀督战，并向女儿山阵地增加轻重机枪10余挺，以猛烈火力，阻止突击部队前进。前敌总指挥部为争取拂晓前歼灭该敌，避免天明后敌地面和空中增援赶到，即令山炮营向前推进，集中火力摧毁女儿山敌机枪阵地，装甲车掩护步兵攻击前进。敌阵地不久即被摧毁，装甲车及步兵由东南土山口冲入，骑兵团亦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并将敌后路切断。此时，伪蒙军官兵20余人，在战场起义，调转枪口向日军指挥官射击。胜岛角芳和伪蒙军师长穆克登室见大势已去，慌忙乘汽车逃窜。攻击部队乘敌混乱，展开分割包围。激战至24日上午，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共毙敌300余人，其中日军20余人，伤敌600余人，俘敌400余人，缴获大量武器装备。

12月3日，日伪军集中4000余人反攻百灵庙被击溃，毙伤日伪军500余人，俘敌200余人，并击毙其副司令雷中田。12月9日，收复日伪军进犯百灵庙的根据地大庙，至此，百灵庙战役全部结束。12月17日，匪首王英部所属安华亭、王子修两旅长率部反正。

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各报纸纷纷刊发号外。人心振奋，万众欢腾，各地人民发起了援绥抗日运动。国内外向绥远前方抗日将士祝贺与慰问的电信，如雪片飞来。北平、上海、天津、西安、武汉等大城市的人民团体代表，携带慰问品和捐款，到前方慰劳军队。南京救国会，推动国民政府中的上层人士如孙科、张继等发起援绥抗日运动，于是在南京召开了各界人士参加的援绥大会，大会通过成立“首都各界援绥后援会。”这次大会使南京的救国运动出现了新高潮。

11月21日，红军领袖毛泽东、朱德在发给傅作义将军的贺电中说：“足下孤军抗日，迭获胜利，日伪军不能越雷池一步，消息传来，全国欢腾，足

下之英勇抗战，为中华民族争一口气，为中国军人争一口气”。中国共产党还派包括南汉宸在内的代表团等，赴绥慰问。全国各界给前线部队捐赠的慰问金共 200 余万元。

第四节 国民党内部的分化

一、国民党内抗日反蒋势力的兴起和英、美派同亲日派矛盾的激化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日益加强，蒋介石顽固推行对外妥协、对内用兵的错误政策，使中国面临存亡的危机，国民党内部和军队内部分化出一部分爱国人士和要求抗战的爱国将领，他们积极主张抗日，要求蒋介石更改错误政策。

1932年，以蒋光鼐、蔡廷锴为首的第19路军，不顾国民党对日不抵抗的政策，毅然进行了英勇的上海抗战。

1933年5月，冯玉祥、方振武等爱国将领，激于民族义愤和政府的屈辱退让，毅然组织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奋起抗日。同年11月，第19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反对蒋、汪“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他们与国民党的爱国民主人士陈铭枢、李济深以及第三党黄琪翔等人联合，于11月20日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反蒋抗日。上述爱国抗日的行动，虽然都遭到国民党的破坏和镇压，但抗日反蒋的势力在进一步发展。

1935年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冯玉祥首先表示响应，提出联俄联共抗日的主张。1935年9月，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冯玉祥公开质问何应钦：“为什么不立即发动对日作战？还要等些什么？”冯玉祥还积极从事抗日救国工作。毛泽东1936年12月5日在写给冯玉祥的信中，高度赞扬了他的抗日精神。信中说：“从报纸从广播从沪宁友人得悉先生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虽没有和先生见面，等于见了一样。”“在亡国惨祸面前，不分党派信仰将同遭浩劫，因此合作救亡是天经地义。”“目前急务似无急于停止内战。”冯玉祥在积极从事抗日救国活动中，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6年6月1日，国民党广东实力派陈济棠和广西实力派李宗仁，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决议呈请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抗日，并以“冬（2日）电”致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称：

“日人侵我愈亟，一面作大规模之走私，一面增兵平津，经济侵略，武力侵略，同时迈进。瞻念前途，殷忧曷极。属部属会等，以为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切冀中枢毅然决然，从事抗战，用以至诚，吁请钧府钧部，领导全国，矢抵抗之决心，争最后之一着。国家不亡，公理不诬，则奋起景从者，必不仅属部属会也。时不我待，惟实利图之，迫切陈词，伫候明教。”

6月4日，国民党西南将领数十人，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再度发出“支电”表示拥护“冬电”内容，并成立军事委员会和抗日救国军，表示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两广事变”使全国震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中央政府负责人，就“两广事变”发表谈话指出：“关于西南出兵北上抗日的行动，是直接对于日本大举进攻华北的一个回答。这一行动说明什么，说明全中国四万万同胞以及广大白军部队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91页。

《李宗仁回忆录》，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68~469页。

是不愿做亡国奴，而决然地发动抗日的民族战争了。”“苏维埃政府对于西南这次出兵抗日的行动，表示热烈欢迎。苏维埃中央政府郑重声明，愿意与西南以及一切愿意抗日的武装部队立即进行紧急谈判，来共同商讨抗日作战大计，成立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正式进行对日作战。”但是，蒋介石一面派军队准备讨伐，一面派人入粤收买陈济棠的部下，终于以武力威胁和分化利诱手段将其瓦解。

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严重危及英、美帝国主义在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加深了日本与英、美之间的矛盾。

1936年之后，日本不仅在青岛投资远远超过英、美，而且在英、美势力比较集中的天津，其投资额也超过了英、美。因此，日本与英、美之间因争夺华北地区的经济利益而发生的利害冲突，使英、美对日态度逐渐有所改变。在国民党内，长期存在着以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陈立夫四大家族为代表的英、美派和以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英、美与日本之间的矛盾日益激化，也就影响国民党政府的对日政策，促使英、美派及亲日派之间的对立分化。

1935年6月，国民党政府颁布“邦交敦睦令”，遭到全国人民反对。国民党内的英、美派分子利用人民群众对媚日外交的愤怒情绪，提出了异议，并乘机组织反对亲日派的活动，迫使汪精卫提出辞职。由于蒋介石的“慰留”，汪虽又复职，但两派之间的斗争仍在继续发展。

1935年11月间，亲日派头子汪精卫被刺伤。同年12月，蒋介石取代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换上了英、美派的人选，亲日派在国民党政府中的地位大大下降。英、美派的势力和影响在扩大。这一切推动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开始改变其对日政策。正如毛泽东同志所分析，“中日矛盾变动了国内的阶级关系，使资产阶级甚至军阀都遇到了存亡的问题，在他们及其政党内部逐渐地发生了改变政治态度的过程。”

二、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民族资产阶级抗日倾向不断增长，国民党内各派系在对日问题上进一步分化的情况下，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在南京举行。到会中委103人，代表405人。阎锡山、冯玉祥经蒋介石邀请与会；两广的陈济棠、李宗仁等，经考试院长戴传贤前往商请派代表参加。

会上，由孙科、张继分别代表中央执、监委员会作会务报告，蒋介石先后作政治、外交报告，何应钦作军事报告。蒋介石在关于对外关系的讲演中称：“苟国际演变不斩绝我国生存民族复兴之路，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决不轻言牺牲”。这表明，国民党当局对于中日妥协仍抱有一定幻想，没有完全放弃这方面的努力。但蒋介石又声称，“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著到了和平绝望的时期与牺牲的最后关头，则“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并将“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

《红色中华》1936年6月13日。

《革命文献》第76辑，第250~251页。

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这些又反映了国民党同日本帝国主义矛盾的加深以及对日政策的一些变化。

大会接受了蒋介石提出的外交方针，并“授权政府，在不违背方针之下，政府应有进退伸缩之全权，以应此非常时期外交之需要”。五全大会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仍坚持了敌视态度，宣称坚持“铲绝残余之赤匪”的反共方针。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南京国民政府的人事有了较大的变动。1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通过改组行政院。改组后行政院所属各部、会、署的主要官员为：内政部长蒋作宾，外交部长张群，财政部长孔祥熙，军政部长何应钦。任命阎锡山、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程潜为总参谋长。

国民党五全大会后，中日之间长期进行的外交谈判，也发生了新的动向。日本政府从1935年11月开始，向中国方面提出了“广田三原则”，即：（一）中国取缔一切抗日运动；（二）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三）中日“满”共同防共。

1936年1月，“广田三原则”被作为“帝国政府经过慎重审议”，“确定的对华方针”，在日本议会上提出。对此，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群，先后同日驻中国大使有吉明、有田八郎和川越茂进行了长达一年之久的谈判。由于中方态度渐趋强硬，遂使谈判僵持而无结果。

1936年7月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对五全大会确定的外交方针，又作了进一步的解释，蒋介石在讲话中表示，“假如有人强迫我们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会议宣言中，也明确指出：“遇到领土主权被侵害之事实发生，如用尽政治方法无效，危及国家民族之根本生存时，则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国民党五全大会的召开及其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和人事变动表明：国民党对日妥协的外交政策，已开始发生某些变化；在国民党内部，蒋介石和汪精卫的矛盾进一步发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亲英、美势力得到了加强。

同上。

同上。

《革命文献》第69辑，台北1976年版，第300页。

第五节 西安事变

一、张学良、杨虎城实行兵谏逼蒋抗日

1936年夏，日本的侵略更加疯狂，中国的抗日救亡怒潮席卷各地。但是，蒋介石不顾华北和全国危亡的局势，仍竭尽全力贯彻其“安内”的反动政策。他花了4个多月处理了两广事件之后，便席不暇暖地于10月22日飞到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蒋介石调集嫡系精锐部队260个团约30余万大军，以蒋鼎文为西北“剿总”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由军政部次长陈诚驻前方督剿，并扩大西安、兰州机场，增设能容100架轰炸机的地勤设备，准备对中央红军进行第6次“围剿”。在蒋介石看来，以30万国民党军对付3万红军，不要3个月，便可大功告成。至于张学良和杨虎城部，虽说有密谋联合红军发动全国抗战的迹象，也曾发生过张学良派兵围抄国民党陕西省党部的事件，但是，只要自己坐镇西安，逼着张、杨执行“剿共”计划，谅他们是不敢不服从“委座”的。

10月27日，蒋介石以领袖身份到王曲军官训练团去训话，以解决“士气”问题。他在训词中强调：“我们革命军人还要分清敌人的远近，事情的缓急。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为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为害尚缓。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是要予以制裁的。”蒋介石的训话，不仅未达到他的本愿，反而引起大部分军官的不满。

为给西北大举“剿共”作准备，蒋介石于王曲训话后，又到洛阳、太原、济南等地进行了一系列的部署。同时，蒋介石又命令傅作义军迅速使绥东战争结束，“以免共产党借题发挥，影响中央剿共决策”，扑灭了绥东抗日烈火。

张学良对蒋介石阻止人民抗日救亡的做法十分愤慨，他曾趁在洛阳向蒋祝寿之机，单独会见蒋，要求释放爱国七君子，领导抗日救亡。蒋大发雷霆，蛮横他说：“我就是革命，我就是政府，只有我可以代表整个国家、整个民族，反对我，就是反对政府，就是奸党暴徒。”尽管如此，张还是耐心设法争取蒋抗日。11月27日，张致电蒋介石请缨授绥，力陈“绕室徬徨，至深焦悚！每念家仇国难丛集一身，早想拼此一腔热血，洒向疆场，为个人赎一份之前愆，为国家尽一份之天职”，希望“调派东北军全部或一部，克日北上助战”，“一鼓而挫敌气”。这一肝胆照人的请求，同样遭到拒绝。

12月4日，蒋介石在洛阳等地完成了“剿共”的部署后再度飞往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作为“剿共”的临时行辕。蒋介石在临潼分别召见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谈话，要他们听从命令，彻底“剿共”。蒋介石宣称：“剿共已达最后五分钟成功的阶段”，并威胁说，如果反对“剿共”的命令，就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98页。

樊真：《抗日战争中的傅作义》，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2页。

应德田：《张学良与西安事变》，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85页。

张学良：《请缨抗敌书》，西安《解放日报》1936年12月15日。

〔日〕古层奎二：《蒋总统秘录》第10册，台北中央日报译印，1977年版，第151页。

要严加处置。然后向张、杨摊牌，提出两个方案逼迫张、杨抉择。第一个方案是：服从“剿共”命令，将东北军和 17 路军全部开到陕甘前线，进攻陕北苏区，对红军作战，“中央军”在后面接应督战；第二个方案是：如不愿“剿共”，就由“中央军”去“剿共”，把东北军调福建，17 路军调安徽，让出陕甘，让“中央军”“剿共”。显然，这两个方案都是张、杨无法接受的。第一，内战不能再打，这是张、杨和全体东北军和 17 路军将领下了决心的。第二，调离陕甘，即等于拆散东北军、17 路军和红军三位一体的联合，无异于自取灭亡。而且，他们已和红军达成了共同抗日的协议，广大官兵也不会与红军作战。蒋介石这两个方案把张、杨逼上了梁山。正如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对张学良将军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你的责任就是剿共，不许到绥远抗战。若要不然，就把你换掉。’以后召集西安会议……准备以蒋鼎文代替张学良的。这样就逼出来一个西安事变。”

为了争取最后一线希望，张学良仍按照他们商定的对策行事。张、杨的对策是：（一）除抗日作战外，两军驻地决不分开；（二）下决心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善说”无效，再“逼蒋抗日”。12 月 7 日，张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再次向蒋哭谏，希望以至诚来感动和谏服蒋介石停“剿”抗日。张学良痛切陈述共产党的政策是从民族抗日利益出发，红军问题可用政治方法解决；当前形势只有对外，才能安内，一旦抗日，即能统一。他还说明现在部队抗日情绪高涨，不可压制，并表示他对蒋一片忠心，所以才敢在是非、全局问题上誓死力争。蒋介石又听到张的抗日议论，并涉及部队情绪，勃然大怒，骂张是年轻无知，受了共产党的迷惑。两人争论长达 3 小时。

最后，蒋介石拍桌喊道：“你现在就是拿枪把我打死，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学良的“善说”一再遭蒋的训斥。当晚，张、杨苦思一番，决心置生死毁誉于度外，不顾一切实行“兵谏”，走“逼蒋抗日”的最后一条。当即进行如下部署：东北军负责捉蒋，西北军负责拘禁西安城内蒋系军政要员，解除蒋系部队武装，封锁机场，扣留飞机。

12 月 9 日，西安 1 万余名学生，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冒着严寒举行示威游行。警察竟开枪射击，打伤学生。被激怒的学生整队前往华清池，向蒋介石请愿停“剿”抗日。游行队伍高呼“停止内战，一致抗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蒋介石命张学良前往制止，并说：“对于那些青年，除了用枪打是没有办法的。”张驱车赶至坝桥，学生痛哭流涕向他请愿。张学良被学生慷慨激昂的陈词所感动，增强了他逼蒋抗日的勇气，他激动他说：“你们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很好！……我和你们的心是一样的，几天以后，我张学良一定用事实告诉你们。我说的话一定算数，我可以拿我的头作保证！”同日晚，张学良向蒋介石反映学生们的要求，并再次陈述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蒋根本不予考虑，就怒斥张学良：“你到底是代表学生还是代表我？你是站在学生的立

《周恩来选集》上卷，第 192~193 页。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 年版，第 105 页。

《张学良在市民大会讲演词》，《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 123 页。

张化东著：《华清池捉蒋回忆》，《西安事变资料》第 2 辑，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第 177 页。

场还是站在国家大员的立场？”。

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凌晨5时，按照张、杨事先商定的部署，东北军骑兵师师长白凤翔、张学良卫兵营营长孙铭九等，率领部队到临潼捉拿了闻讯潜逃到山腰草丛中躲藏的蒋介石。同时，在西安城内由赵寿山、孔从周等指挥17路军警备2旅和炮兵团、教导团等，解除了中央宪兵第2团、省公安局和西安城内“中央军”各部队的武装，控制了机场、车站、邮局等要点，在西京招待所里逮捕了蒋介石系的军政要员陈诚、朱绍良、卫立煌、蒋鼎文等10多人。

12月13日，张、杨及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联名通电全国，指出捉蒋的动机在于东北沦亡，国难当头，理应“发动全国之整个抗战”，但蒋介石“弃绝民众，误国咎深”，“因对介公为最后之净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并提出了8项政治主张：“（1）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2）停止一切内战。（3）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4）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5）开放民众爱国运动。（6）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7）确实遵行总理遗嘱。（8）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张、杨分任委员会正、副主任。实行了如下军政措施：组织抗日援绥军，集结待命；调动军队，准备迎击南京政府的“讨伐”；成立以高崇民为首的“设计委员会”，研讨重大政治问题；改组陕西省政府，任杜斌丞为省府秘书长；解散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成立以王炳南为主任的“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释放西安政治犯；接收《西京日报》，改名《解放日报》，积极宣传抗日。

西安事变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它的发动是由多种因素促成的。第一，西安事变的发动是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成果，是中国共产党联合张、杨逼蒋抗日方针的产物。第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逼进，民族危亡的加深，使得张学良同蒋介石内战政策的矛盾尖锐化。在劝蒋抗日失败的情况下，张、杨从民族利益和自身利益出发，迫不得已以极特殊的兵谏形式逼迫蒋介石改变政策。第三，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中国人民，特别是西北人民、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运动推动的结果。东北军、17路军、红军三位一体的西北大联合计划也对西安事变的发生产生重大影响。从1936年春天起，张学良、杨虎城与中国共产党达成了一系列友好协定。西北大联合的计划一直在秘密执行，这一计划是以发展民族战争为主要出发点的，是要用西北的统一战线促成全国的统一战线。虽然，西安事变是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自己发动的，中国共产党在事前并不知道，但事变的发动“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因此，它确与西北大联合计划的影响有密切关系。

西安事变的发生，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其强烈的震动。全国人民和各派爱国力量无不欢欣鼓舞。事件发生后，西安“30万民众欢腾鼓舞拥护民族解放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页。

《西安事变档案史料选编》，档案出版社，1938年版，第3、4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111页。

运动。”短短3天内，仅山西、湖南、贵州、四川、广西5省的民众团体和救亡组织，发到西安响应张、杨通电的电报就有1000余件。西安事变的当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等18个救亡团体发表通电，拥护张、杨“八大主张”。西北各界救国联合会致电全国武装部队和各党各派，号召加强团结，共赴国难，救亡图存，公开批评了国民党政府的误国政策。

西安事变使国民党统治集团陷入混乱。1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走“讨伐”张学良“叛变”。

为邀请中共中央派员共商大计，12月12日，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吾等为中华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计，不顾一切，今已将蒋等扣留，迫其释放爱国分子，改组联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见，速复。为了对付南京的军事威胁，12月14日，张、杨调东北57军和105师到渭南一带，第51军和67军警戒兰州至咸阳一带，17路军警戒兰田、商城、蒲城、大荔一带，准备迎击南京方面的进攻。

二、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和努力

西安事变爆发后，各国和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由于立场、观点和利益的不同，对事变采取不同的态度，提出不同的主张，从而呈现出一种极为错综复杂而又紧张的局势。

在国际上，日本帝国主义极端仇视西安事变，极力挑拨南京政府和西安方面的关系，并伺机对中国采取新的侵略行动。日本陆军省在12月14日的“西安事变对策纲要”中提出：“南京政权和其他各地政权，非但不改变以往的政策，反而更加激化了抗日反日思潮，将使帝国侨民的安全与在华利益受到侵害。倘若此种事态出现，则应毫不犹豫地行使自卫权。”“稍微看一下张学良的起兵声明便知，恐将招致对日空气之恶化，……因此，在此形势下，要做好准备，以便不失时机地采取自主之手段。”

12月19日，日本有田外相对中国驻日大使许世英称：“中央（政府）如在抗日容共之条件下与张妥协，日本决强硬反对。”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在枢密院会议报告：“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英、美帝国主义由于自身利益所系，从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出发，支持事变的和平解决。

12月17日，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致英驻华大使休格森的电文中称：“我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能得到保障的话。……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

“我将要求美国、日本、意大利和法国政府加入所提议的行动。”12月23日，英国外交部致电休格森称，意、法、美等国已同意进行上述的合作。苏联虽支持和平解决事变，但对事变的性质目的作出了错误的判断。12月14日，苏联《真理报》社论《在中国发生的事件》中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

《西北文化日报》1936年12月13日。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周恩来年谱》，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2页。

〔日〕《现代史资料》8，第608页。

《党史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7页。

《党史研究资料》1988年第2期，第26页。

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因为他们正在千方百计地为日本帝国主义奴化中国效劳。”12月17日，该报评论员在《国际评论》中说：“张学良叛变纯系日本在中国制造的又一起挑拨事件，其目的乃是阻止中国的统一，破坏日益高涨的人民抗日运动。”同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向中国驻苏大使蒋廷黻说：“自张学良让出东北后，苏联与彼即无关系。在莫斯科虽有中国共产党如王明等，然苏联政府不与彼辈发生关系。”

南京政府内部两大派泾渭分明：以宋美龄、宋子文为代表的英、美派竭力要求和谈，却苦于无军权凭借，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恃手中军力，乘机导演“戏中戏”。何应钦于当天晚上就在自己家中召集重要会议，戴季陶、居正、叶楚傖等在会上表示：张学良“劫持统帅”，为“维护纪纲”，应立即“出兵讨伐”。而冯玉祥、孙科、李烈钧等则认为应弄清情况，说服对方，以保蒋安全，如立即出兵，必引起内战。当日晚，国民党中央召开常委临时会议及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决定：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军队由何应钦负责。16日，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他下令调集部队“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部署第28、第36、第79师、教导总队等沿陇海路西进，并把全国空军主力集中于洛阳机场，准备轰炸西安。17日电请在欧洲养病的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回国，以便替代蒋介石。但宋子文、宋美龄、孔祥熙等反对“马上讨伐”。宋美龄召集黄埔军校学生代表说：“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遵加断定。遇事镇定，勿尚感情，”主张迅速与西安方面联系以确保蒋之安全。各地方实力派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有的支持、有的反对，局势十分混乱、紧张。

中国共产党面对何应钦的“出兵讨伐”，全国人民和爱国正义人士的呼声，张、杨对中国共产党的重托与厚望，意识到历史已把这付关系民族兴亡的重担放到了自己的肩上，形势迫切要求中共中央独立自主地迅速作出正确的决策。

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共中央立即紧急商讨对策。根据张学良以及在西安的刘鼎等人来电的分析，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一致肯定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决定采取有效步骤，予以全力支持，并复电张学良，提议即将东北军主力调集西安、平凉一线，第17路军主力调集西安、潼关一线，表示红军决不进占寸土，另告恩来拟到张处协商大计。与此同时，军委主席团向全军宣布加紧准备，待命行动。12月13日，毛泽东、周恩来复电张学良：目前西北任务应“重兵置于潼关、凤翔、平凉，潼关尤要”；“号召西安及西北民众起来拥护义举，对全国亦然”；“胡、曾、关等军向南压迫时，红军决从其侧后配合兄部坚决消灭之”；“恩来拟来西安与兄协商尔后大计，拟请派飞机赴延安来接”。当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张闻天在会议上的发言中指出，张学良这次行动是开始揭破民族妥协派的行动，向着全国性的抗日方向发展。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但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尽量争取南京正统，联合非蒋系队伍，把抗日作为最高旗帜，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

苏联《真理报》1936年12月12日、17日。

《党史资料通讯》总第41期，第28页。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文献和研究》（1986年汇编本），人民出版社，第132页。

《党的文献》1988年第3期，第2~3页。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对西安事变的方针，毛泽东根据对内战与抗日两种前途的分析和会议讨论的意见，进一步确定与完善了中共中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中共中央指出：西安事变的性质，“是中国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也是国民党中的实力派之一部，不满意南京政府的对日政策，要求立刻停止‘剿共’，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并接受了共产党抗日主张的结果。”它的意义乃“是为了要抗日救国而产生的，是要以西北的抗日统一战线去推动全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开始。”中共中央清楚地指出了事变发展的两种前途，一是“使内战爆发”，“这一前途，是日德意国际侵略阵线，特别是日本及中国亲日派所欢迎的”；一是结束内战，实现一致抗日，“这一前途，是国际和平阵线，全国人民，全国一切愿意抗日救国的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所竭诚拥护并要使之实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就是为实现第二种前途而努力，“坚持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日的组织者与领导者的立场，反对新的内战，主张南京与西安间在团结抗日的基础上，和平解决。”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

“蒋介石在此次被幽，完全是因为蒋氏不肯接受抗日主张，不肯放弃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所致。”“贵党果欲援救蒋氏，则决非调集大军讨伐张、杨所能奏效，……为国家民族计，为蒋氏个人计，贵党必须毅然决然立刻实行下列处置：（一）召集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决定对日抗战，组织国防政府、抗日联军；（二）将讨伐张、杨与进攻红军的中央军，全部增援晋绥前线，承认红军、东北军及十七路军的抗日要求；（三）停止一切内战，一致抗战；（四）开放人民抗日救国运动，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民主权利，释放一切政治犯及上海爱国领袖；（五）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大政策。本党相信，如贵党能实现上项全国人民的迫切要求，不但国家民族从此得救，即蒋氏的安全自由当亦不成问题。”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再次就西安事变向国民党政府发出通电，强调“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建议：“（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敦促南京政府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停止正在发动的内战。

12月21日，毛泽东又电告在南京的谈判代表潘汉年，要他向陈立夫提出下列要求：吸收抗日运动的领袖人物加入南京政府，排斥亲日派；停止军事行动，承认西安的地位；停止“剿共”政策，并与红军联合抗日；保障民主权利，与同情中国抗日运动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在上述条件有相当保证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0～111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1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文件选编》（中册），档案出版社。1985年版，第322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114页。

时，劝告西安恢复蒋介石的自由，并赞助他团结全国一致对日。同时，又电告周恩来派人到国民党在西北的黄埔系高级将领处，揭露何应钦与日本勾结害蒋的阴谋，以及红军愿与谈判，恢复蒋介石自由的条件。

中共中央在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指导下，对于蒋介石个人的处置问题上则有个发展过程。开始时，苏区有人要求把蒋介石“交付给人民审判”。在12月13日，中共中央召开的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也有人主张“审蒋”。

12月15日，红军领导人在致国民党和南京政府的电中也提出：“罢免蒋氏，支付国人裁判。”但是，中共中央根据事变的发展，特别是何应钦等想借机发动内战，取蒋而代之，必须修正“审蒋”提法，以击破亲日派的阴谋，压迫和争取亲英美派接受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建议。而且当周恩来于17日到西安了解各方面情况后，首先提出“保蒋安全”的方针。次日，即电中共中央：“为缓和蒋系进兵，使我集中，分化南京内部，推广全国运动，在策略上答应保蒋安全是可以的，但声明如南京进兵挑起内战，则蒋安全无望。”中共中央同意周恩来的意见，并已反映在12月18日致国民党中央的电文中。

在此期间，共产国际从接到中共中央12月12日报告起，直至12月15日未作出任何表示。

16日发来一电，因电码差错无从译出。

18日，中共中央又发电给共产国际请“即检查重发”，延至20日才算收到16日季米特洛夫总书记的来电，内称：针对你们的来电，建议你们采取如下立场：一、张学良的行动，无论其动机如何，客观上只能有损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力量的团结，并鼓励日本的侵略。二、既然事变已经发生，中国共产党应考虑以上情况，并坚决主张在以下基础上和平解决事变。1、通过吸收抗日运动的若干代表及拥护中国完整、独立的人士参加政府的方式改组政府；2、保证中国人民的民主权利；3、停止围剿红军的政策，并在反对日本侵略的斗争中与红军合作；4、同那些同情中国人民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进攻中国的国家合作。由此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在责难西安事变的同时，提出了和平解决事变的一些有参考价值的措施。但是，早在共产国际来电以前，中共中央从事变一开始就抓住了事件的本质，肯定了它进步和积极的意义，立即采取了支持事变和平解决的重大和有力措施，并根据事件的发展情况，修正和充实了原定决策。

在短短的几天中，中共中央就根据既定的“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制订和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一整套正确方针和政策，这不但说明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的伟大政治胸怀，而且也充分证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的成熟。

三、蒋介石接受六项条件，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1936年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乘张学良所派专机抵达西安。他们按照中共中央和平解决事变的方针，运用既坚持原则又灵活机动的斗争艺术，进行了紧张的谈判斗争。在周恩来出发前，中共中央对西安的具体情况还不十分清楚，很多问题需要等周恩来到达西安进一步弄清

情况后才能作出决断。对蒋介石的处置以及各种在保安难以估计到的复杂问题，都要由周恩来到达西安后相机处理。

在周恩来到达西安前，张学良早在等着周的到来。

12日他们虽然把蒋介石扣起来了，但对下一步该怎么办，并没有明确的计划和统一的认识，许多事情都想等周恩来到来后共同商议。周恩来一到，张学良就把他安置住在自己的公馆里。周恩来当晚同张学良的谈话一直进行到深夜。张学良先叙述蒋介石在被扣后的表现，南京的动态和各方面的反映。当时，最迫切需要处理的关键问题，是如何处置蒋介石。张学良说：据他个人看，争取蒋抗日，现在最有可能。只要蒋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应该放蒋。

周恩来对张的看法表示同意。他肯定张学良的爱国热忱后指出：从各方面考虑，对蒋介石的处置极需慎重。周恩来分析了对蒋介石的不同处置方法可以导致西安事变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前途：如果能说服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就会使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争取一个好的前途；如果宣布他的罪状，交付人民审判，最后把他杀掉，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给日本帝国主义造成进一步灭亡中国的便利条件，这就使中国的前途更坏。历史的责任，要求我们争取中国走一个更好的前途。这就要力争说服蒋介石，只要他答应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条件，就释放他回去。蒋介石实际统治着中国的大部分地区，迫使他走上抗日的道路，还拥护他做全国抗日的领袖，有利于发动全面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周恩来提出这样明确的意见，加强了张学良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心。

周恩来对张学良提出决定西安事变发展前途的关键性决策后，又与杨虎城进行会谈。周恩来希望他从大局出发，逼蒋抗日。杨虎城表示：“共产党置党派历史深仇于不顾，以民族利益为重，对蒋介石以德报怨，令人钦佩。我是追随张副司令的、现在更愿意倾听和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既然张副司令同中共意见一致，我无不乐从。”中共代表团还对张、杨所部将领与中下层军官做了大量工作。这样，各方面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

12月20日上午，宋子文由蒋介石的顾阿、澳大利亚人端纳陪同，乘飞机来到西安。但宋子文顾虑会被何应钦抓把柄，不敢单独同周会面，就由郭增恺去见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他：这次事变，中共并未参与，对事变主张和平解决，希望宋子文认清大势，权衡利害，劝说蒋介石改变政策，为国家做贡献。并说：“只要蒋先生抗日，共产党当全力以赴，并号召全国拥护国民政府，结成抗日统一战线”。郭增恺向宋子文转达了周恩来的意见，宋子文对中国共产党的态度十分赞赏。第2天，他飞回南京报告。

12月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致电周恩来，主张争取蒋介石、陈诚等与之开诚谈判。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又在军事上作了以红军主力协同东北军、西北军，准备迎击“讨逆军”进攻的周密部署。

当时“讨逆军”总司令为何应钦，所属东路集团军由刘峙指挥的近10个师组成，其中5个师已进到潼关、华县，从东面直迫西安；西路集团军由顾祝同指挥的10个师组成，拟由大水坑、甜水堡、同心城、靖远等地向天水、

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30~331页。

罗瑞卿、吕正操、王炳南著：《西安事变与周恩来同志》，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8页。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4页。

陇西集中，尔后经宝鸡、凤翔协攻西安。

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经以周恩来为首的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反复磋商，于12月21日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在西安以东地区同刘峙决战；以一部兵力抗击和钳制西路顾祝同军。

1936年12月23日，双方开始正式谈判。蒋方由宋子文出席，西安方面由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3人出席。谈判一开始，先由周恩来提出中共和红军的6项主张：（一）停战，中央军撤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以上6项，要蒋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对日。宋子文听后，表示个人同意，承认转达给蒋。

12月24日，谈判继续进行，蒋方由宋子文、宋美龄两人出席，西安方面仍由张、杨、周3人出席。宋美龄明确表示赞成停止内战，她说：“我等皆为黄帝裔胄，断不应自相残杀，凡内政问题，皆应在政治上求解决，不应擅用武力”。她和宋子文对谈及的一些问题也都作了明确的承诺，这些承诺，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作了汇报：

“子、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丑、撤兵及调胡宗南等中央军离西北，两宋负绝对责任。蒋鼎文已携蒋手令停战撤兵（现前线已退）。寅、蒋允许归后释放爱国领袖，我们可先发表，宋负责释放。卯、目前苏维埃、红军仍旧。两宋担保蒋确停止剿共，并可经张手接济（宋担保我与张商定多少即给多少）。三个月后抗战发动，红军再改番号，统一指挥；联合行动。辰、宋表示不开国民代表大会，先开国民党会，开放政权，然后再召集各党各派救国会议。蒋表示三个月后改组国民党。巳、宋答应一切政治犯分批释放，与孙夫人商办法。午、抗战发动，共产党公开。未、外交政策：联俄，与英、美、法联络。申、蒋回后发表通电自责，辞行政院长。酉、宋表示要我们为他抗日反亲日派后盾，并派专人驻沪与他秘密接洽。”

12月24日晚，周恩来、博古在致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明了蒋介石的六项承诺：

“今日蒋答复张：子、下令东路军退出潼关以东，中央军决离开西北。丑、委托孔、宋为行政院正副院长，责孔宋与张商组府名单，蒋决令何应钦出洋，朱绍良及中央人员离开陕甘。寅、蒋允回京后释爱国七领袖。卯、联红容共。蒋主张为对外，现在红军、苏区仍不变，经过张暗中接济红军，俟抗战起，再联合行动，改番号。辰、蒋意开国民大会。巳、他主张联俄联英美。”

12月24日，双方最后达成了6项协议：（1）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2）释放上海爱国领袖和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1页。

《西安事变简史》，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86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2~73页。

周恩来、博古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1936年12月24日。

的自由权利；（3）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4）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5）与同情中国抗日的国家建立合作关系；（6）其他具体的救国办法。24日晚，周恩来会见了蒋介石。周恩来先对蒋说：“蒋先生，我们有10年没见面了，你显得比从前苍老些。”蒋点点头，叹口气，然后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回答：“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连我们红军也可以听蒋先生的指挥。”周恩来向蒋介石阐述了中共的政策和西安方面的意图后指出：坚持内战，自速其亡。接着，据周恩来25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说：蒋作了三点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注：指周恩来）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

至此，历时14天的西安事变，由于中共中央的正确决策及中共代表团（对外界用“红军代表团”名义）卓有成效的努力，由于全国全国人民和国内外一切主张团结抗日的人们的强烈要求，也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讨逆军”进攻的充分准备，终于获得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共同抗日，提供了必要的前提。另外，国民党比较痛快地接受联共抗日等6项主张，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张、杨两将军即因领导和解决了西安事变，“大有功于抗日事业”，而成为“千古功臣”。

在蒋介石承诺“决不打内战了，我一定要抗日”之后，“西北大联合”的三方同意释放蒋介石。在许多问题未妥善处理之前，张学良就急急忙忙亲自乘飞机送蒋回南京。周恩来得到消息，乘汽车赶往机场，飞机已经起飞，周恩来以后叹息他说：“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看坏了，现在他不但要‘摆队送天霸’，而且还要‘负荆请罪，啊！’”张学良去南京给自己带来严重后果。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重大的意义：

第一，表明中华民族已能在政治生活的惊涛骇浪中把握自己的命运，为救亡图存，自己起来解决国内团结问题。美国友人斯诺认为，事件和平解决是：“中国得了利，日本失了利。”

第二，结束了10年内战。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了时局转换的枢纽；在新形势下的国内的合作形成了，全国的抗日战争发动了。”“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件大事，从此建立了两党重新合作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所以说，没有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要迅速形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是难以想象的。

第三，奠定了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的基础。由于国共两党逐步走向团结，为全国抗日战争的展开和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铺平了道路。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57～160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3页。

《周恩来同志在纪念西安事变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西安事变资料选辑》，第24页。

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3页。

斯诺：《西行漫记》，第392页。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986页。

同上，第334页。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布第二次国共合作的酝酿阶段已告完成，它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一页。

第六节 国共两党合作抗日局面的初步形成

一、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提出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西安事变后，国内战争基本上停止了。国民党于1937年2月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讨论新形势下国共关系和对日关系问题。

为了推动第二次国共合作早日形成，中共中央于1937年2月10日发出了《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指出：

“西安问题和平解决，举国庆幸，从此和平统一团结御侮之方针得以实现，实为国家民族之福。当此日寇猖狂，中华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本党深望贵党三中全会，本此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贵党三中全会果能毅然决然确定此国策，则本党为着表示团结御侮之诚意，愿给贵党三中全会以如下之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工农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这是中共中央正式公开向国民党中央提出的两党合作的基本条件，得到了全国人民和国民党大多数党员的赞同，有利于国民党内部抗日派反对亲日派的斗争，成为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谈判的政治基础。

二、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转变其内外政策

西安事变谈判时，蒋介石、宋子文允诺先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解决准备抗战及开放政权等问题。1937年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上，抗日派与亲日派之间的斗争非常激烈。

国民党左派宋庆龄是从1927年7月以后第一次出席国民党的中央全会。她在会上发表演说，批评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她说：“令人万分遗憾的是，直到今天，政府中仍有个别人士不了解救国必先结束内战的道理。在今天居然还可以听到‘抗日必先剿共’的老调，这是多么荒谬！我们要先打断一只手臂之后再去抗日吗？我们已经有了十年的内战经验，在这期间，国力都耗费在内争上面，日本军阀将我们的土地一块块地割去，使我们的国家受到蹂躏。每一个中国爱国志士现在都庆幸政府在这些痛苦经验之后已开始了解，救国必须停止内争，而且必须运用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全部力量，以保卫中国国家的完整。”

在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上，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孙科、石敬亭、李烈钧、经亨颐等14人向全会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制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指出：“总理于民国十三年改组本党确立联俄联共与扶助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135页。

《宋庆龄选集》，中华书局印行，第101页。

农工三大政策后，革命阵容为之一新，革命进展一日千里。不幸十六年以后，内争突起，阵容分崩；三大政策，摧毁无遗。革命旋归失败，外侮接踵而来。尤其最近五年间，失地几及六省，亡国迫于眉睫。”提案接着指出：“近半年来迭次接中国共产党致我党中央委员会书函通电，屡次提议国共合作，联合抗日，足证团结御侮已成国人一致之要求。……我党更应乘此机会恢复总理三大政策以救党国于危亡，以竟革命之功业。”杨虎城、于学忠提出关于西安方面的8项主张的提案，李宗仁等9人提出关于迅速组织民众、训练民众、武装民众以为抗战动员之基础的提案。冯玉祥等16人提出促进救国大议案。汪精卫则提出一项“剿共”政治决议草案，受到全会许多国民党元老的抨击，他们批评汪的主张不但使外侮日甚，内忧日亟，而且将使国民党本身在全国人民面前信用扫地，为党为国，均系有害。因此，除少数亲日派分子为汪精卫辩护外，全会许多代表均表示反对，结果，该决议案未获通过。

会议经过激烈争论，虽然没有确定的抗日方针，没有批评过去的错误政策，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但是在对内对外政策上都作了某些调整和改变，实际上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条件。会议通过的《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中的四条，“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在对内政策上，承认“整个民族之利害，终将超出一切个人一切团体利害之上”，“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将原来对共产党采取的武装“围剿”方针改为“和平统一”的方针，因此，基本上确定了停止内战和国共合作的原则。

22日，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承认在一定的条件下开放言论自由，释放政治犯，集中人才。会后，蒋介石密令所属，以后不再使用“赤匪”和“共匪”等字样。在对外政策上表示：“如果让步超过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战之一途。”正如毛泽东指出：“国民党的三中全会，由于其内部有亲日派的存在，没有表示它的政策的明确和彻底的转变，没有具体地解决问题。然而由于人民的逼迫和国民党内部的变动，国民党不能不开始转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这即是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向着和平、民主和抗日的方向转变，而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在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派竭力挑拨内战与分裂，力图阻挠和破坏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时候，由于中国共产党的促进和各方爱国人士与全国人民的努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新局面终于初步形成，使中国走上全国性武装抗战过渡时期的新阶段，这对得寸进尺的日本侵略者来说，无疑是一个沉重打击！

《救国时报》1937年4月15日。

同上。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94页。

《国闻周报》第14卷第8册。

同上。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35页。

第八章 日本对东北的殖民统治与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第一节 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的殖民统治，主要是通过操纵伪满傀儡政权，在政治上实行法西斯统治，在军事上实行残酷镇压，在经济上实行疯狂掠夺，在文化上实行奴化教育，以达到把该地区变成任它奴役和宰割的殖民地的目的。

一、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东北地区主要以伪满洲国的名义进行殖民统治。其主要手法是：在形式上给伪满披上“独立国家”的外衣；在内部则实行严格的操纵和控制，使伪满政权成为它在东北实行法西斯专政的工具。日本的这种统治政策，主要由关东军具体实施。

（一）对伪满政权的政策

从关东军到日本政府对如何操纵和控制伪满政权早有主张。1932年3月10日，也就是伪满政权建立后的第二天，关东军司令官就与溥仪签订了一个密约，规定伪满参议府的参议和“中央及地方各官署之官吏”都要任用日本人，而其“保荐”与“解职”均由关东军司令官决定。3月12日，日本内阁作出两项决定：一为《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规定“为了贯彻帝国关于满蒙的政策，必须迅速设置统治机关”和“治安维持机关”，“尤其要让日本人成为这些机关的领导骨干”；二为《满蒙新国家成立后对外关系处理纲要》，规定：“为了在外交上和内政上掌握实权，最初应尽可能使之采用少数日本人作官吏或顾问，并逐步地加以充实。”4月11日，日本内阁又作出《关于帝国对满蒙新国家的具体援助和指导问题》的决议，要求伪满必须聘请有权威的日本顾问作为财经问题和一般政治问题的最高指导者。

为了实现对伪满政权的控制，关东军参谋长桥本虎之助于1932年6月拟制了一个所谓《指导满洲国纲要（草案）》，提出了一套统治的政策和办法。桥本在《纲要》中把“支持满洲国并使之发展成为适应我国国策的独立国家”作为日本的基本指导方针。据此，桥本提出：“为实行帝国对满洲国的国策，不特别设立文治机关，专使关东军担当其任；实施中，努力保持新国家为一独立国的体面，而在满洲国名义下通过日本人系统的官吏，特别是通过总务长官以求实现。”桥本还提出：“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设置驻满政治指导机关，由关东军司令官指导满洲国政府”；同时，“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使领事等为其下属，掌管外交事务”；“关东军司令官仍然保留关于满洲国日系高级人事的决定权。”关东军的这个方案后来被日本政府所采纳。1933年8月8日，日本内阁正式下达了《满洲国指导方针纲要》。这个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4页。

〔日〕《现代史资料7·满洲事变》，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495页。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版，第640~641页。

《纲要》与桥本方案所不同的只是形式上的改变，即把“适应”日本国策的“独立国家”改为“与大日本帝国有着不可分的关系的独立国家”。这个《纲要》由 14 个项目组成，明确规定了对伪满洲国的国体、军队、经济、财政等各方面的控制政策，是日本帝国主义控制伪满洲国的纲领。关于控制伪满的体制与机构，《纲要》规定：“对满洲国的指导，在现行体制下，在关东军司令官兼帝国驻满大使的内部统辖下，主要通过日籍官吏实际进行。”“为便于其统制，使之维持以总务厅长为中心的现行体制。”这些规定从体制上确立了关东军司令官及日本官吏在伪满政权中的主宰地位。1934 年 12 月 10 日，南次郎被任命为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大使后，提出了一个《关于对满政策的意见》，进一步从经济、政治、文化诸方面阐述了日本关东军控制伪满政权的基本政策，并特别强调“在实际执行时要以关东军为中枢实行一元化统制”。

1936 年 9 月 18 日，关东军司令部炮制了一篇题为《满洲国的根本理念和协和会的本质》的文章，把关东军太上皇和伪满傀儡的关系更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了。该文第三项专门论述了《天皇、军司令官和皇帝之间的关系》。文章写道：“满洲国皇帝基于天意，即天皇之圣意而即位，因此，必须为皇道联邦的中心——天皇服务，以天皇之圣意为己心，以此作为即位的条件。”文章把溥仪与天皇的关系规定为“宛如月亮凭借着太阳的光芒而散发光辉一样”。文章威胁说：如果溥仪“不以天皇之圣意为己意时”，“则将立即丧失其地位”。文章还就日本天皇的“圣意”如何体现和执行解释说：“关东军司令官作为天皇的代理人，必须是皇帝的师傅和监护人。”文章的这些论调，毫不掩饰他说明溥仪只有甘当奴才，对关东军司令官百依百顺，才能保住皇帝的宝座。从中不难看出日本侵略者的太上皇面貌和伪满政权的傀儡性质。

（二）加强对伪满政权的实际控制

一是调整在东北的统治机构。“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侵略机构存在着“四头政治”分立的局面，即：关东厅、关东军司令部、领事馆和满铁，分别隶属于日本内阁和陆军、外务、拓务等省。伪满政权建立后，为了加强对它的控制，日本侵略者力谋在满机关的统一。

1934 年 9 月 14 日，日本内阁决定将在满机构改为“两位一体制”，即由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满全权大使，废除关东厅，在驻满大使馆下设关东局，赋予驻满大使对满铁、电报公司、关东州和铁路附属地，以行政监督权。在关东州设州知事。在日本内阁设对满事务局，由陆军大臣兼局长。通过改组，统一了日本在东北的多头政治，实现了以关东军为中心的军事法西斯殖民统治。为了加强对伪满的实际控制，在关东军司令部内还专门设立了办事机构——第四科。

二是向伪满政权派遣官吏或顾问充作骨干，日本对伪满政权各级机构的具体操纵与控制，主要是通过派遣日本官吏和顾问实施。在伪满初期，关东军规定，伪满中央政府官吏限额为 600 人，其中日本官吏占 20%。但一些重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 年版，第 589～590 页。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 年版，第 908～911 页。

要部门日本官吏所占的比例远远超过此限。例如：伪总务厅、国都建设局，日满官吏比例为 7：3；伪财政部、实业部，日满官吏比例为 6：4。到 1935 年 5 月，日本人官吏增加到 3000 人，如果算上准官吏，则达到 6000 人。在伪中央一级机构中，日满官吏的比例已超过 1：1，象伪国道局日本人官吏竟达 90%。在地方机构中，日本人官吏人数也成倍增加。

三是在伪满皇帝溥仪身旁派驻常任代表。常任代表的任务是指导并支配溥仪按照日本的腔调演傀儡戏。关东军先后担任这一职务的有上角利一、中岛比多吉、石凡志都磨、吉冈安直等人。其中任职最长的是吉冈安直（1934～1945，由中校升为中将）。此人“九·一八”事变前就在天津与溥仪相识，后回日本任职又与在日本留学的溥仪的弟弟溥杰交往。吉冈对溥仪的支配作用，正如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一书中所追述的：“吉冈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在伪皇宫内除吉冈外，还有约 1/10 的职员是日本人。日本职员都身居宫内要职，操纵宫内大权，就连溥仪的诏书和敕语也由通晓汉文的日本职员包办。溥仪的任务只是每天按照日本人的意旨，在各种文书上画大大小小的“可”字。

四是利用总务厅、次长制和火曜会控制伪满政府。根据伪满《国务院官制》规定，总务厅系伪国务院的一个下属机构，负责处理伪总理直接掌握的“部内的机密人事、主计及需用有关的事项”。但关东军却在伪满中央机构中“推行总务厅中心主义，强化总务厅的人事统制权。”1937 年，日本人又在总务厅下设内务、外务、兴安三个局，企图以总务厅为中心，谋求伪国务院的集中统一。这样，属伪国务院管辖的总务厅，实际控制着伪国务院；属伪国务总理领导的日本人总务厅长，却事事凌驾于伪总理之上。于是，总务厅便成了关东军第四科的对口机构，两者构成了伪满统治机构的真正中枢。关东军司令官是伪满洲国的太上皇，总务厅长则成了伪国务院的实际总理。关东军还在伪国务院各部实行次长制，由日本人充当各部次长。次长本是各部大臣的助手，却称霸于相关部门，各部大臣都得听命于本部的日本人次长。按照惯例，伪国务总理每周主持一次审议重要国务的国务院会议，但这只是形式。真正的“内阁会议”是每周星期二由日本人总务厅长主持的、各部日本人次长参加的火曜会。这个会议虽不是立法机关，但可以决定伪满洲国的一切重大问题。会议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只是拿到伪国务院会议和参议府走走过场，有时甚至连过场也不走就付诸实施。

关东军对省和省以下伪满地方机构的控制，其手法与中央机构大同小异。

二、日本在东北的暴力统治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略者对东北人民实行野蛮的屠杀和镇压。

溥仪：《我的前半生》，群众出版社，1979 年版，第 354 页。

〔日〕《现代史资料 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 年版，第 920 页。— 421 —

1932年关东军在《形势判断》中就赤裸裸地宣称：“要使满洲三千万民众不为中国本部和苏联的蛊惑所动，使其相信新国家（即伪满洲国）的永久性，而不敢有所蠢动，……须继续实行帝国的威力压迫。”在这个法西斯的“威力压迫”方针下，关东军假手伪满政权，在东北推行所谓“治本”即加强殖民统治与“治标”即加紧军事讨伐相结合的政策，不断强化暴力统治。

（一）建立暴力统治机构

日本在东北除保持一支庞大的关东军外，还设有关东军宪兵队。原来关东军宪兵队只有一个队，约200人，1935年增加到5个队，约1000人。在屠杀和镇压人民的暴行中，宪兵队处于元凶和主脑地位。甲级战犯东条英机就曾任过关东军宪兵司令官。除宪兵队外，关东军还设有遍及全东北的间谍特务网。其总部设在哈尔滨，正式名称是关东军情报部。在东北各地，如长春、沈阳、大连、锦州、承德、牡丹江、东安（密山）、佳木斯、间岛（延边地区）、黑河、兴安、齐齐哈尔、海拉尔，都设有关东军情报部的支部。

在关东军的控制下，伪满政权建立了庞大的暴力机构——军、警、宪、特。初期的伪满军，主要是由投降日军的东北军所组成。日军对伪军的控制主要是通过顾问团进行。

1933年8月9日，日本陆军省制定了《满洲国陆军指导纲要》，要求将伪满军置于日军指挥官的掌握之下，兵力控制在6万人左右，兵种只限于步兵和骑兵。

1934年到1941年，伪满军不过8万人左右，而日本人军官和职员则由1800人增加到8000人，占伪军总数的1/10，使伪军变成了完全由日军直接控制的附庸军队。在日本军事顾问的控制下，伪满军从1934年10月开始在吉林建立宪兵训练处，1935年设立宪兵司令部，辖6个宪兵队，1937年3月，又将各宪兵队改编为宪兵总团，约2000人。

除伪满军和宪兵外，日本关东军还在伪满建立了庞大的警察队伍和警察机构。伪满政府设有警察总局，省设有警察厅，县设有警务局，局下设警务署，辖警察分驻所或派出所。另外，还有专门由日本警察组成的特殊警察队。日伪警察，大多数为保安警察。在保安警察中又分为普通警察和高等警察。有的警察机构还设有特高部门，以迫害和镇压抗日团体和进步人士为主要任务。与伪满警察机构并行的是伪满特务中心保安局。它在业务上受关东军参谋长直接指挥，在机构上是关东军司令部第二科的分支，其主要任务是进行所谓“秘密战”。这是一个与关东军宪兵队保持密切联系的秘密特务组织，设有庞大的地下组织网。这种地下组织网，称之为特谍班即特别侦察班，有总班长、班长，均由日本人担任。该组织在各地还设有秘密据点和秘密监狱，专门从事刺探抗日情报和侦破抗日地下组织与进步力量的活动。

（二）实施暴力统治手段种种

1. 残酷的“三光”政策。

日本关东军，不断以“治安肃正”为名，进行残酷的军事“讨伐”，对一些“讨伐”区实施烧光、杀光、抢光的“三光”政策，制造了许多骇人听闻的惨案和暴行。震惊中外的平顶山惨案，就是突出的一例。平顶山位于辽宁抚顺市区以南，共有400多户人家，800多间房子，住有3000多矿工及其家属和贫苦农民。1932年9月15日夜，抗日义勇军袭击了日本霸占经营的抚顺煤矿，杀死了杨柏堡矿矿长渡边宽一，带走了大把头郑辅臣。16日晨5时，驻抚顺日本守备队从沈阳附近应援返防后，于11时乘汽车赶到并包围了平顶山村，准备对手无寸铁的群众进行报复。日军在川上精一守备队长的指挥下，以给老百姓照相为名，把全村男女老幼统统赶到村南的一块洼地里。洼地周围的汽车上、山坡上，摆着几挺用黑布盖着的伪装成照相机的机关枪。当全村群众被赶到洼地惊魂未定的时候，突然间，机枪、步枪从四面八方扫射过来。顷刻之间，在场的男女老幼一个个都倒在血泊之中。屠杀持续了一个多小时，凡是中弹朱死的，又用刺刀挨个捅了一遍，连哭喊着的孩子，快要分娩的孕妇和七八旬的老翁也无一幸免。为了焚尸灭迹，日军还放火烧毁了村庄。第二天又用二三十桶汽油焚烧尸体，并用炸药炸塌山崖，掩盖尸骨，种上树木，毁灭罪证。在这次惨案中，日军共烧毁民房800余间，屠杀群众3000多人，其中2/3是妇女和儿童。随后，日军又在平顶山附近的栗家沟屠杀群众130余人，在千金堡焚毁民房1000多间，杀害群众五六十人。除平顶山惨案外，日军于1933~1936年间，还在东北地区制造了安东（今丹东）南岗头村、依兰土龙山、舒兰老黑沟村、辽宁清原镇、吉林通化和柳河白家堡子等暴行。仅1934年春，日军在土龙山附近就血洗了12个村庄，残杀群众1000余人，烧毁房屋1000余间，粮食35万余公斤。

1936年夏，日军在通化一带山区“讨伐”中，又屠杀无辜农民1.3万余人，烧毁民房2700多间。这些事例足以说明日本侵略者是何等的野蛮和凶残。

2. 建立“集团部落”

日军在进行军事“讨伐”、实行“三光”政策的同时，还大搞所谓“治本”措施。从1932年9月起，在伪满各级成立清乡委员会。1933年2月，公布了《暂行枪炮取缔规则》，规定如有藏枪不交者，一经查出，立即处死。同年12月，伪满政府颁发了《暂行保甲法》24条，实行一家犯法，九家连坐。1934年2月，又公布了《户口调查规程》，对人民群众进行严格控制。还规定，在铁路两侧沿线500米以内，不准种植高粱、玉米等高秆作物，以利镇压抗日武装。

1935年日伪在推行保甲特别工作的49个县中，共建伪保51个，伪甲8387个，伪自卫团5408个，计1050190人。

更为毒辣的是日军在东北农村推行“集团部落”制。所谓“集团部落”，就是日伪用烧房、枪杀等手段，强迫分散居住的农民群众到指定的地点，组成由日伪军警直接控制下的大村落。农民称它为“归大屯”，俗称“人圈”。日伪推行“集团部落”制的目的是：妄图切断人民群众与抗日武装的联系及对抗日武装的物质支援；同时，通过“集团部落”严格控制广大群众，防止抗日武装力量的扩大。每个“集团部落”一般规定为100户至200户，占地

约4万至9万平方米。“部落”四周挖有深沟，沟旁修筑土墙，沟外再围设铁丝网，四角修有炮楼，安插警察、特务监视，每个部落只设一个出入口，进出要出示证件，并进行搜身检查。据原伪满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供认：“实行所谓‘匪民分离’政策，在南起宽甸、北至抚远长达1000余公里，广及39个县（旗）以及热河沿长城一带的广大地区划分‘无住地带’和‘集团部落’地带，把500万以上农民赶入‘集团部落’，‘集团部落’的总数达14000个”。在建立“集团部落”中，日军强迫农民离开世代居住的土地和家园，迁到指定“部落”，然后将原村庄烧光，使之变成无人区。

1934年至1936年，伪通化县因日伪制造“集团部落”而损失民房1.4万间，废弃耕地33万亩。1936年10月，伪柳河县将全县散居民房统统烧毁，1.2万户农民被赶出了家园。

1937年1月至9月，伪奉天省和东安省，因“集团部落”而逃亡人数达11.3万余人。在“集团部落”中央，日伪设有军警派出所和村公所。它不仅监视群众的一言一行，还胁迫群众参加反动组织“协助会”，并到处抓人、打人、杀人，随意闯入民宅，强奸和轮奸妇女。它还对群众出入“部落”横加限制，禁止进入或运送物资到抗日武装活动地区，即使种地也不能离“部落”太远，致使远处耕地大片荒芜。由于“集团部落”环境条件恶劣，造成大批群众病、冻、饿死。据伪满警察部门调查，1936年仅通化、金川和柳河三县“集团部落”传染病患者就有7025人，其中死亡595人。1937年，抚顺县冻、饿、病死和被日军杀害者占全县人口的30%以上。整个东北因“集团部落”而受害者达500万人，约占东北当时全部人口的1/6。每个“集团部落”都有一部被日伪烧杀抢掠的血泪史。

3. 法西斯白色恐怖

1932年9月11日，伪满政权公布了《治安警察法》，禁止结社、集会和发表议论。

1933年9月10日，公布了《惩治叛徒法》，以后，又相继公布了《治安维持法》、《思想矫正法》、《时局特别法》等一系列伪法令，规定罪行有50多种，甚至说一句“我是中国人”，就是思想犯，“政治犯”；吃一口大米，也成了“经济犯”。日伪依据这些法令，赋予宪兵警察以无限特权，肆意迫害和屠杀东北人民。自1934年至1937年4年间，日伪在东北搞了三次所谓“大检举”，成千上万的爱国志士和无辜群众被军警宪特逮捕和杀害。1935年，日伪以“国事犯”、“思想犯”等罪名，在伪安东省以教育界为中心，先后逮捕省、县教育厅、局长等500余人。至当年冬，有40余人被刑讯致死，其余的人下落不明。

1936年，在沈阳市因频繁“大检举”而遭日伪逮捕、杀害的爱国志士和居民，竟达19623名。

1937年4月15日，日伪军警对以哈尔滨为中心的中共满洲地下组织进行大逮捕。到当年10月，共逮捕482人，其中85人被杀害。日本侵略者还在东北各地遍设监狱和“矫正院”，关押和残害抗日志士和无辜群众。据不

日本战犯古海忠之笔供，中央档案馆馆藏资料。

伪满治安部思想战研室：《各地治安调查报告书》，1942年7月。

中央档案馆等：《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档案资料选编——东北历次大惨案》，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18页。

完全统计，1934年东北各地设有监狱189所，仅辽宁一省就有50所，至于各种名目的看守所和拘留所，更是不计其数。

（三）灭绝人性的细菌战实验

“九·一八”事变后不久，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就决定由石井四郎主持，在中国东北建立细菌战实验所。

1932年到1933年，石井曾在黑龙江肇东县满河和五常县背阴河车站附近开始细菌战研究工作。1935年至1936年间，日本军部根据日皇裕仁的密令，在东北建立了两支秘密细菌部队：一个是由石井主持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后改称“第731部队”；另一个是由若松主持的“关东军兽疫预防部”，后改称“第100部队”。

第731部队驻在哈尔滨市南部平房一带，占地30多平方公里，对外严格保密，仅修建四方楼细菌实验工厂就将参加施工的3000多名中国劳工全部秘密杀害。这支部队拥有细菌专家、科技人员3000余名，并有自己专用的航空队，在安达车站附近设有特种靶场，还在海拉尔、孙吴、牡丹江、林口建立了4个支队。第100部队设在长春以南10公里之孟家屯，也拥有大量房屋、特种设备和大片土地。这两支部队都分别配有由关东军和各兵团指挥的支队，负责在战争中实际使用各种细菌武器。第731部队设有8个部，主要负责实验和生产细菌武器。该部队培养的细菌有：鼠疫、霍乱、坏疽、炭疽、伤寒、副伤寒及其他细菌。第100部队主要是培养鼻疽、炭疽热和牛瘟等疫病的细菌。他们在实验中不仅使用动物，而且用活人进行实验。仅731部队，就设有可容三四百人的秘密监狱。该部还专门培育与繁殖散布细菌的寄生虫和制造散布细菌的特种武器，并拥有规模庞大的生产设备。用这些设备，在一个生产周期内，即能生产不下3万万亿微生物，每月能培制出300公斤鼠疫菌及数千万只专门用作传播细菌的跳蚤。

最残忍的是莫过于用活人进行细菌试验。这一计划是由关东司令官正式批准的。而惨遭细菌战部队实验的活人就是中国的抗日爱国志士、无辜群众和苏联、蒙古、朝鲜人。为了掩盖罪行，他们把这些人称为“原木”，即任意宰割的意思。这些所谓“原木”，都由日本宪兵队进行“特殊运输”，每年大约五六百人。日军用活人进行实验的名目繁多，手段极其残忍。最常见的有菌液注射实验、染菌饮食实验、毒气实验、冻伤治疗实验、真空环境实验和火焰喷射器杀伤力实验等。凡是接受以上种种残酷实验的人，要是经过治疗痊愈起来，他就不免要再受接二连三的实验，一直到折腾死为止。惨死者的尸体经过解剖，就被投入焚尸炉里烧掉。原第731部队细菌生产部长川岛清在伯力军事法庭上供认：“为了研究各种治疗方法，对已传染的人加以治疗，给他们饭吃，等身体恢复时，又对他们作另一种试验。无论如何，从来没有一个人活着走出这个杀人工厂的。”日军不仅用大量病菌在活人身上进行实验，而且在实验对象已经发病但尚未死亡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活体解剖。更有甚者，残暴的日军为了搞到健康新鲜的标本，竟把一个12岁的健康男孩活活地解剖了。据原第731部队一个队员揭露说：有一天，一个中国少年被严刑拷打后送到了解剖室。几个日本军医一齐扑过去，扒光他的衣服，

把他按倒在手术台上，用扣带将4肢紧紧扣住。然后强行消毒，注射麻醉剂。待这个小孩失去知觉后，日本军医就将他的腹部划开，按肠、胰腺、肝、肾、胃的顺序取出各种内脏。接着，又将小孩的脑袋锯开，取出大脑。然后，将这些东西分别投入装有福尔马林溶液的大容器中。最后手术台上，只剩下少年的四肢和一具空壳身躯。一个年幼的生命就这样惨死在日本人的屠刀下了。川岛清还在伯力军事法庭供认：“731部队驻平房5年时间内，通过这个工厂，因染受致命细菌而被消灭的至少有3000人”。

日本侵略者不仅大规模地对活人进行细菌实验，制造鼠疫、霍乱、炭疽等细菌武器，而且公然违反国际法，在侵华战争中大量使用细菌武器，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严重的灾难。日军在侵华战争中所进行的细菌战和细菌实验，危害极大，贻患无穷。单就东北地区来说，在辽阳、本溪、洮南、东丰、双城、新民、白城子、哈尔滨、泰来、抚顺、农安等地，就发现有撒播过细菌的迹象，造成一些地方传染病流行。

三、日本对东北经济的统制与掠夺

（一）操纵东北的经济命脉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通过各种手段控制了东北的铁路、通讯、金融、贸易等经济命脉。铁路交通主要由满铁所控制。“九·一八”事变以前，满铁只霸占了南满（长春至大连）铁路和安（东）奉（天）、大（连）抚（顺）等支线，以及大连港。“九·一八”以后，在关东军“极力支持和协助”下，满铁又先后夺取了沈（阳）海（龙）、奉（天）山（海关）、吉（林）长（春）、四（平）挑（南）、呼（兰）海（伦）等铁路的路权和部分新铁路的修筑权。伪满洲国成立后，关东军司令官与满铁总裁签订了所谓《关于铁路、港湾、河川委托经营及新设等之协定》，将伪满的铁路、港湾、河川全部委托给满铁经营。1933年2月9日，关东军又迫使伪满与满铁签署了《满洲国铁道借款及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松花江水运事业委托经营细目契约》、《敦化、图们江铁道外二铁道建造借款及委托经营契约》等。这样，满铁就“名正言顺”地夺取了除中苏合办的中东（满洲里至绥芬河）铁路以外的东北所有铁路的经营权。

1935年3月23日，日伪与苏联正式签订了关于让受中东铁路的协定。日伪方面以1.7亿元的代价，获得了全长1700多公里的中东铁路及其附属财产。同年末，满铁派出2135人接管了中东铁路的全部业务。至此，东北铁路交通就完全置于满铁的垄断之下了。

日军对东北的金融机构进行了武装占领。“九·一八”以前，日本在东北的银行（总行、支行、办事处）共有58处，名义资本3.1亿多元，实缴资本1.3亿多元。除日本银行外，还有苏联、英国、美国、法国等国的银行。从外国投资情况看，日本占72%强，英、美等国将近28%。中国自身在东北也拥有庞大的金融机构网。东三省官银号、边业银行、吉林永衡官银号和黑龙江省官银号，号称“四行号”，是东北金融界中的决定力量。除“四行号”外，还有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以及其他新设的普通银行。“九·一八”后，关东军占领了这些金融机构，美其名曰“实力保护与监视”。

1932年6月6日，日本指令伪满通过了《满洲中央银行法》等法令。接

着于 6 月 15 日任命了伪满中央银行主要头目，并先后成立了伪中央银行及其总、分、支行 128 个，吞并了原来东北的四大金融机关，垄断了东北的金融市场。

日本也不放松对东北通讯权的夺取。日本认为：“把握满洲国的通讯权，在推行我国的国策上是绝对必要的”。1932 年 7 月 23 日，关东军正式提出所谓《对满洲国的通信政策》。政策规定“帝国将校参与满洲国电信电话公司的创设与经营，以贯彻帝国的政策和军事上的要求”，并强调将“公司的实权把握在日本方面的手中”。

1933 年 3 月 26 日，日本与伪满签订了《关于设立日满合办通讯公司的协定》，9 月 1 日，满洲电讯电话股份公司（简称电电）正式成立。从此，东北地区 110 多个电话局和 2 万多用户均为该公司控制。

1935 年日伪接管中东铁路时，电电公司又夺取了沿线的通讯设施。至此，东北的通信事业完全为日本所垄断。

此外，日本对作为国家经济门户的海关亦不放过。

1932 年 6 月 26 日，首先攫取了占东北关税收入 1/3 的大连海关。接着，又相继夺取了滨江、营口、安东、琿春、延吉五个海关。到 1933 年 1 月，包括大黑河海关在内的东北海关，全部夺到了手。关东军还以各种借口侵占工厂和矿山。至 1932 年 9 月，日军先后占领的工矿有奉天纺纱厂和复州、八道壕、西安（辽源）等煤矿，并夺取了东北、内蒙古的 38 处地方重要矿产的开采权。

（二）实行经济统制与资源掠夺

1. 日本的经济统制政策

1931 年底至 1932 年初，关东军与满铁分别成立了“关东军统治部”（后称特务部）和满铁经济调查会。这两个组织密切配合，给关东军起着经济参谋部的作用。

1933 年 3 月 1 日，由伪满政府公布了所谓《满洲国经济建设纲要》。这个《纲要》是关东军统治部和满铁经调会用一年半时间炮制的。《纲要》由 10 部分组成，包括交通、农业、工矿、金融、商业和私人经济等各个方面。

《纲要》提出了对重要经济部门加以国家统制和把重点放在同该国（日本）的协调上等 4 项基本原则。其目的是在所谓“日满共存”、“日满一体”的幌子下，使伪满洲国彻底沦为日本的经济附庸。《纲要》还规定了实行经济统制的方法：一、具有国防或公共、公益性质的重要事业，原则上实行国营或交由特殊公司经营；二、其他产业及资源等各种经济事项听任民间自由经营。同年 8 月 8 日，日本内阁会议进一步作出决议，凡属有关军需部门和重要经济部门，都实行统制，由“国营或特殊公司经营”。

1934 年 6 月 28 日，伪满政府发表《对一般企业的声明》，宣布对重要产业通过特殊公司制度进行统制。所谓重要产业是指：“国防上重要产业，公共公益事业和一般产业的基础产业，即交通、通讯、钢铁、轻金属、金、

满铁经调会：《满洲通讯事业方策》（极秘），第 1 页。

满铁经调会：《满洲通讯事业方策》（极密），第 3~4 页。

煤炭、石油、汽车、硫酸、碱、采木等产业。” 1937年5月1日，为进一步强化经济统制，日伪政府又公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随着日本侵略战争的扩大，经济统制的范围与种类也日趋扩大。

在日伪的经济统制政策中，特殊公司制度占有重要地位。所谓特殊公司，就是日伪官方，或日本资本家与伪满政府，或日本资本家单独出资经营的企业，它带有官方或半官方的性质，独立地从事重要资源的开发或基础产业的经营。这种特殊公司，都是垄断某一行业的大企业，在日本榨取中国东北的经济中起着特殊的作用。1933年3月1日伪满《经济建设纲要》颁布后，这种以日本资本为主体的特殊公司纷纷建立，逐步垄断了东北的经济。

1936年日本在东北的投资总额达30亿日元，比1930年的16亿日元增加了近一倍。以满铁为例，它不仅垄断了东北的铁路交通，还把侵略矛头伸向各个经济领域。至1937年底，属于满铁系统的公司已达80家，实缴资本2.4亿多元。此外还有许多“附带企业”，计：农牧场23个，种养殖场6个，造林所30个，造园所4个，另有满铁辅导义勇开拓团，铁路自警村，以及伐木业等。在伪满初期建立的特殊公司中，大部分均有满铁的投资。

1932年到1937年间，满铁在东北的投资占日本在中国东北投资的56%；如再加上满铁子公司（即所谓准满铁）部分则达68%。

2. 对工业资源的掠夺

日本对东北工业资源的掠夺是多方面的，但其重点是掠夺战略物资，特别是钢铁、煤炭和液体燃料等等。

“九·一八”前，日本生铁进口主要靠当时的英属印度及马来亚等地区，中国东北所占的比重很小。

1931年以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的生铁数量大幅度增加。据伪满统计，1931年为24.2万吨，占日本进口总数的61%；1932年为32.2万吨，占进口的73%；1933年为45.3万吨，占进口的71%；1934年为40.9万吨，占进口的67%。日本对东北生铁和钢的掠夺，主要集中在属于满铁的鞍山制铁所和属于财阀大仓系统的本溪钢铁厂。他们所掠夺的生铁，除了在东北就地制造军火外，很大一部分被运到日本国内八幡等地制造杀人武器。

日本对东北煤炭的掠夺在“九·一八”以前就处于垄断地位。“九·一八”以后，掠夺进一步升级。除满铁外，1934年成立了“满洲煤炭股分公司”（简称满炭）。1936年又成立了“炭业统制委员会”，以关东军参谋长为委员长，伪满政府、满铁、满炭的代表为委员，开始有计划地掠夺。日本掠夺东北煤炭，主要通过满铁和满炭两大公司进行。前者统辖抚顺等28处煤矿，后者管理阜新、西安、鹤岗等12处煤矿。“九·一八”后，日本从东北掠夺煤炭逐年增加：1932年为703万多吨，1933年为885万余吨，1934年为1055万多吨，1935年为1127万余吨，1936年为1214万多吨，1937年达1266万余吨。在日本进口煤中，东北煤占60~70%。特别是抚顺煤，日本称它为“工业煤绝好典型”，完全用于重点地区和部门，但其价格却低于日本煤的好几倍。

日本对中国东北石油资源的掠夺是全面性的，其中包括天然石油、页岩

〔日〕满洲国史纪纂刊行会：《满洲国史》总论，第385页。

伪满国务院总务厅统计资料。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01、第305页。

油和人造石油。在这些资源中掠夺最为突出的是抚顺的页岩油。“九·一八”后，通过不断扩建页岩油厂逐步提高了生产能力。

1931年生产粗油6.3万吨，1935年增至14万多吨，1936年计划达到30万吨左右。

此外，日本还通过“满洲盐业股分公司”垄断了东北的盐业生产，仅1937年运往日本的海盐即达55.5万吨。

3. 对农业资源的掠夺

日本对东北农业资源的掠夺，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进行移民侵略；二是大量掠夺农产品。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的1915年，日本就开始向其霸占的旅大地区即“关东州”移民。“九·一八”后，日本为确保其经济掠夺，并扩大侵略势力，同时也为了缓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开始掀起向中国东北移民的热潮。

1932年初，日本拓务省拟定了《满洲移民计划大纲》，确定了移民侵略方针。同年6月，日本议会通过了《移住适用地调查费》等法案；8月又通过了《第一次五百满洲移民费追加预算》，拨出了用于移民的经费。由日本退役军人组成的第一批武装移民团429人，于1933年3月到达佳木斯附近的永丰镇。这种武装移民到1936年7月为止，共移来5次，2900户，7296人。

为给移民霸占土地创造条件，日伪从1936年起开始实施为期8年的所谓地籍整理计划。准备投入550万人员和6000余万元经费，对全东北130万平方公里中的72万平方公里的田野和3000万宗民地进行所谓整理。

1936年8月，日本新成立的广田内阁更把移民侵略列为七大国策之一，日伪也把它吹捧为伪满的三大国策之一。日本当局除了组织“海外拓务委员会”、“满洲移民协会”、“满洲拓殖股分公司”等移民机构外，还拟定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草案，确定了《日本移民土地使用整备纲要》。新的移民计划，以20年移民100万户为目标。从1937年起每5年为一期，第一期10万户，第二期20万户，第三期30万户，第四期40万户。

100万户移民准备霸占土地1000万町步（约合9.918亿亩），占全东北可耕面积的1/3。日本移民按其性质分为五类：一是由政府直接组织的集团开拓移民；二是由民间组织的集合移民；三是由青少年组成的义勇队移民；四是分散移民；五是铁路自警村移民。这些移民有目的地分布在三个地带：（一）所谓开拓第一线地带，主要是东北边境与苏联接壤地区，目的在于为关东军直接充实兵源或作为兵站据点。此类移民约占40%。（二）所谓开拓第二线地带，即长白山、哈尔巴岭、老爷岭、小兴安岭、大兴安岭为环形的内侧及松辽平原周边的外侧地区。其目的是为了切断抗日联军和东北人民之间的联系，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这部分移民约占50%。（三）所谓开拓第三线地带，是指铁路沿线、重要城镇周围和重要河川沿岸，以加强经济掠夺为主要目的。这些移民约占10%。日本在实行移民的过程中，规定每户移民给田10~15町步（约合991.8~1487.7亩）。这些土地绝大部分是用极低廉的价格或其他非正常手段收买或霸占的。那些被剥夺土地而未离开原地的农民，都沦为日本移民或伪移民公司的佃户，受其奴役和剥削。

日本对东北农业的掠夺，除了移民霸占土地外，还大量掠夺农产品，特别是大豆和玉米等。“九·一八”事变前5年，东北平均每年向日本输出大

〔日〕《现代史资料11·满洲事变（续）》美铃书房，1972年第949~950页。每町步约合99.18亩。

豆三品(大豆、豆饼、豆油)163万吨,占大豆三品总输出的40%。“九·一八”以后,日本垄断资本“三井物产”和“三菱商事”等,以压低价格等手段掠夺东北粮食,运到日本和世界各地牟取暴利。1934年东北运往日本的玉米价值290多万元,占总输出的58%。1936年至1937年,东北每年平均向日本输出大豆三品132万吨,占总输出的46%。

此外,日本还在东北诱骗人民种植鸦片,毒害广大群众。据1940年日本《满洲国年鉴》记载,单法律许可种植鸦片的面积,1933年为94.1万公顷,1937年增加到103万公顷。鸦片产量,仅热河种烟老区1936年即达815万两。官营鸦片零售所,在沈阳一处就有730多家。鸦片销售量,1933年为120万两,1937年就增到1230万两。鸦片收入,1933年是550万元,1937年则达到4780万元。吸鸦片上瘾者登记人数,1933年为56804人,1937年达到811005人,增加了14倍。

(三) 奴役劳动与残酷压榨

为推行经济掠夺计划,日本在东北实行极其野蛮的劳工政策。“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专门成立了管理劳工的部门,并在北平、天津先后成立了骗招关内劳工的公司。据不完全统计,1931年到1937年间,仅从关内骗招到东北的劳工即达3108533人。除骗招外,日本还采取摊派、强征和抓捕等手段,搜刮劳力,以满足经济掠夺扩大的需要。这些劳工至少有1/4是在关东军的刺刀下担负沉重的劳役。但最多的还是为战争服务的所谓重要产业,几乎占半数以上。其中矿工最多,最高年达534000人。

这些劳工被抓到工厂、矿山和施工单位以后,受尽虐待和折磨。他们劳动时间最长,工资待遇最低。据1935年大连、沈阳、长春等城市调查,同样工种的工人,中国工人的工资不及日本工人的1/3,有的不及1/6。如果日本工人平均工资为100,则同工种中国工人平均工资所占的比率是:机械工人占32.2%,化学工业工人占22.4%,印染工人占15.6%,饮食业工人占24.5%。超时、过量的劳动,恶劣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造成疾病流行,事故不断,成批的工人无辜致死。死了之后就被扔进厂矿附近的山沟里;有些人还未死掉,也被活活地抛入乱尸坑。这样久而久之,便形成了许多日本残害中国劳工的“万人坑”。仅在鸡西、鹤岗、辽源、抚顺、阜新、北票等煤矿和鞍山、本溪南芬、弓长岭等铁矿以及丰满东山、大石桥虎石沟、金县龙王庙、石人、河龙、拉古哨等地,就发现50多处“万人坑”,掩埋着60多万具被残害的中国劳工的尸骨。如抚顺煤矿,自1906年到1945年,日本从该矿掠夺优质煤2亿多吨,残害矿工近30万人,平均每抢走700吨煤,就有1个中国矿工被夺去了生命。更令人发指的是,关东军为了准备进攻苏联,每年驱使成千上万的人,在关东军工兵部队指挥下,修筑军事设施和军事工程。待工程竣工后,唯恐泄漏军事秘密,遂将这部分劳工秘密杀害。据不完全统计,仅7项工程,就有近3万中国劳工被秘密处死。

四、日本在东北的文化统治与奴化教育

(一) 法西斯文化专制政策的实施

1932年伪满洲国一成立，就在伪政府中建立了思想文化统治的中枢——资政局弘法处，由日本法西斯分子笠木良明具体领导。1933年废除资政局，在伪国务院总务厅内设情报处。该处把打击和瓦解抗日力量作为主要任务之一，并控制伪国家的新闻、出版、广播等宣传舆论阵地。1937年，日本人将情报处扩大为弘报处，统辖文化宣传的一切方面。此外，在伪满政府一些部和伪警察机构里，还有名目繁多的宣传和思想检查组织及文化警察、特务等。在关东军司令部里，也设有从事战争宣传和殖民思想统治的机构——报道部和调查部。它和弘报处一起成了伪满宣传文化统治的核心。

日伪当局对一切文化宣传事业实行集中垄断。1932年建立了伪“满洲国通讯社”，着手垄断东北新闻机构和事业。1935年又建立“弘报协会”，把报道、言论和经营三方面统一起来，实行所谓“官制统治”。1937年再次强化新闻通讯机构，建立了《康德新闻》（汉文）、《满洲日日新闻》（日文）和《满洲新闻》（日文）三大报社，垄断了整个东北报纸的发行。东北的广播事业、出版事业和电影事业，也分别先后为日本人建立的满洲电信电话股份公司、满洲图书股份公司和满洲电影股份公司（简称满映）所垄断。文艺部门的文化、戏剧、音乐、美术、舞蹈等，亦按弘报处制定的《艺文指导纲要》进行统治，各种文艺团体均由日本人所把持。

日本侵略者在实行殖民思想文化的同时，加紧摧残中国的民族思想文化。1932年溥仪一就任执政，就通令不准在东北挂中国地图，不准使用“中华”字样，不准使用中国教材，等等。

1932年10月，伪满公布了《出版法》，禁止一切带有民族意识的书刊。据伪文教部记载，1932年3~7月，在东北焚书650余万册。此后，查禁书刊种类年年增加。据1940年伪《满洲年鉴》记载，1934年到1937年间，查禁杂志2315种，扣押13664份；查禁普通出版物3508种，扣押434852册。与此相反，日本宣扬法西斯思想的出版物进口，却由1936年的58.7万余册，增至1937年的380万册。电影也是一样，1936年禁演中国电影178部，而日本电影进口却由1936年的154部猛增到1937年的232部。

（二）殖民地奴化教育的推行

日本侵略者实行愚民政策，对教育一再进行限制。从伪满财政支出看，军事治安经费占30%乃至40%以上，而文教经费仅占1%，多时也只占2~3%。“九·一八”以前，东北有小学1300余所，学生74.7万余人，教师2.4万余人。“九·一八”以后，许多小学关闭，学生降到50万人，教师减至万余人。以后，日本改用“文治”笼络人心，小学增至800所，学生达200多万人，但儿童失学率仍在70%以上。“九·一八”前，东北有中学194所，学生3.8万余人，教师2400人；“九·一八”后，恢复很慢，到1937年仅有中学173所，学生3.3万余人，教师1600人。大专院校“九·一八”前约有30所，“九·一八”后，几乎全部被查封、关闭。到1933年开课的只有两所，1935年5所，1937年10所。作为愚民政策的另一个方面，就是在数量有限的学校中，大力推行奴化教育，以培养为它效劳的顺民和御用知识分子。从“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日伪教育政策的重点是废除中国原有的教学秩序、内容和教材，代之以日伪设置的课程与教材，并竭力散布殖民主义思想。随后，又实行所谓新学制，其任务是：“为养成忠良国民，即以

建国精神为基础，陶冶人格，涵养德性。”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人训练成日本的“忠良”

奴才。在这种教育制度下，特别强调殖民主义的政治与思想教育。各学校不仅把政治课列为主课，而且在语文、历史、地理等课程中，也塞满了反动的政治内容。

在新学制中，日伪当局还提出所谓日语化。把日语列为国语，要求人人会说，伪政府一切正式文件均用日文。还规定升学、就业，都要看日语资格。日本甚至准备用日文拼音文字代替汉字，企图毁灭汉语和汉字。

日伪实行新学制的再一个特征就是教育职业化。它废除了中国的初、高中6年制，改为分科的4年制。其目的在于为日本培养更多的经过奴化训练的下级技术管理人员，以便从事农工商的管理与掠夺。

（三）封建意识和宗教迷信的利用

日本殖民主义者力图通过宗教迷信和封建意识，摧毁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

1934年溥仪当上皇帝后，就被召到日本去拜谒天皇。日本大肆宣扬伪满“建国”是“沐浴日本天皇的皇恩”，“顺天之意”而建立的。溥仪从日本回国后发表一个《训民诏书》，胡说他与日本天皇“精神如体”，要东北人民作日本的顺民。以后，日本又耍新花招，决定在长春建立一个所谓“建国神庙”。由溥仪第二次“访问”日本，把日本的“天照大神”捧回来，当做“建国神”供在建国神庙里。表示满洲不是源于清始祖，而是同日本一样始于“天照大神”，满洲“国民”也就是日本国民的一部分，理应接受日本的统治。

还规定，由日伪头目领头，天天向“建国神庙”行礼，一般中国群众也要这样做。如有对神庙“不敬罪”者，依据伪《保安法》，判处1~7年徒刑。除在伪首都搞“建国神庙”外，日伪还在东北各地搞了不少日本“神社”，给中国人民套上新的精神枷锁。此外，日本还利用佛教、喇嘛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对东北进行控制，使各宗教信仰徒成为日本的顺民。

第二节 东北人民革命军的建立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

在风起云涌的东北抗日义勇军遭受挫折之后，中国共产党继续以自己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骨干，联合各抗日武装，坚持和发展东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1933年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纠正了1932年北方会议对东北的“左”倾政策，提出了在当时东北特殊环境下，实行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指示信对当时东北的斗争形势和遍布东北各地的各类抗日武装作了比较客观的分析以后，指出：党领导的游击队“是一切游击队伍中最先进最革命最大战斗力的队伍”，只有进一步发展这支队伍，才能动员千百万群众同日本侵略者作斗争，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指示信着重指出：为使抗日游击运动及一切革命群众活动取得胜利，满洲党组织必须“尽可能的造成全民族的反帝统一战线，来聚集和联合一切可能的，虽然是不可靠的动摇的力量，共同的与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斗争”。在统一战线中要“坚持和保存自己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夺取和保证无产阶级在这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为此，指示信改变了过去建立红军、“创造北方新苏区”的“左”的口号，提出在东北要“建立选举的民众政权”和“民众革命军”的任务。指示信最后指出：党在“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巩固和发展是满洲群众斗争胜利的保障”。尽管“一·二六”指示信还保留一些“左”倾观点和政策，但它所提出的建立反日武装统一战线的策略是符合当时东北的实际的，对中共满洲各级组织领导东北人民开展抗日武装斗争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中共满洲省委接到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以后，于当年5月在哈尔滨召开省委扩大会议。一致表示接受这个指示，并速派巡视员到各地传达贯彻。省委还于5月15日和7月1日、分别作出《关于执行反帝统一战线与争取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决议》和《关于省委五月十五日接受中央来信中几个模糊的错误问题》的补充决议，要求满洲各地党组织停止土地革命，取消已建立的苏维埃和红军游击队，“建立选举的民众政府”和“以最好的游击队为基础建立人民革命军”。省委扩大会议以后，各地党组织和抗日游击队贯彻中央“一·二六”指示信提出的新的策略方针，积极开展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自1933年9月到1936年2月，先后建立了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至第6军，把东北人民抗日游击战争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巩固与扩大了游击区，动摇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

一、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的建立与南满游击区的扩大

（一）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成立，南满游击区迅速扩展

中共满洲省委特别重视南满游击队的建设，在接到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后，于1933年7月1日发出《给盘石中心县委及南满赤色游击队的信》，要求将中国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目前军队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457、460、468页。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72页。

的编制稍稍再向前发展时（一倍左右），立刻编制成为一师。”根据省委指示，南满游击队于9月18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第1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杨靖宇，下辖两个团。

同年10月，刚刚建立不久的独立师就遇到日军第10师等部及伪军1.2万人的大“围剿”。独立师采取避实就虚，不固守一地的方针，以第1团留在盘石地区坚持斗争；师部率第3团南渡辉发河，到东边道开辟新的游击区。

东边道当时泛指东北东南部山区的宽甸、桓仁、兴京（今新宾）、通化、辑安（今集安）、临江、长白、抚松、蒙江（今靖宇）、辉南、金川、柳河、海龙、东丰、西安（今辽源）、清原等16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抗日武装有几十股，约六七千至一万人，其中属中共直接领导的有南满第1游击大队。

10月27日，杨靖宇率部南渡辉发河，与南满第1游击大队汇合，在蒙江、桦甸、辉南、柳河、清原、通化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1月24日，杨靖宇采取声东击西战术，绕过伪军邵本良部重兵把守的凉水河子，一举攻克柳河县重镇三源浦；接着，又把邵部从凉水河子诱出，并乘虚袭击了凉水河子；尔后，再放出攻打柳河柞木台子的空气，迫使邵部急忙西调增援，而独立师却趁机奔袭了东边道北部重镇八道江（今浑江市）。独立师连战获胜，声威大振。南满地区的其他抗日武装纷纷表示愿意接受独立师的领导。

1934年2月下旬，独立师在临江三岔子附近，召开了有17支抗日武装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决定成立江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推杨靖宇为总指挥。会议还决定，除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独立师所属部队外，其余参加会议的抗日军编成第1至第8八个支队，共5000余人。到会的各抗日军一致同意，东北人民革命军的斗争纲领就是抗日联合军的斗争纲领。这是中共领导的抗日武装与其它抗日武装联合抗战的开始，给敌以震动。日关东军惊呼：“匪贼渐次结成‘联合战线’，……战术巧妙，不避讨伐，不受宣抚，在各地有较大的活动。”

独立师在几个月的艰苦转战中，由于得到其它抗日武装的配合，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伐”。活动地区由三五县扩及20余县，攻入和收复大小城镇16座，全师也发展到1600余人。此外，南满游击区还有农民自卫队员1000余名，青年义勇军600~700名，反日会会员6000余名。

（二）人民革命军第1军正式建立，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开展

为推动南满地区抗日斗争的发展，中共南满组织于1934年11月上旬在临江四道二岔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确定目前“全党的中心任务是千百倍地加强我们的革命的群众工作，用一切的力量来扩大巩固人民革命军，最大限度地扩大反日游击战争”。会议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由杨靖宇、李东光、宋铁岩等6人组成中共南满临时特委，李东光代理书记。会议还通过了杨靖宇关于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两个师的提议，并于11月7日正式宣布成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朴翰宗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及1个教导团和3个游击大队。

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45~46页。

《关东军公报》第207期，1935年。

孙继英等：《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0页。

第1军成立后，仍进行分区作战。第1师和第2师分别以龙岗山脉和辉发河南的蒙江、金川、抚松等地为后方根据地，开展游击活动；军部则在上述区域南北转战，指挥作战。12月间，第1师师长兼政委李红光，利用鸭绿江封冻之机，率部袭击了朝鲜境内的罗山日军据点，缴获大量枪支弹药和军用物资。

1935年1月11日，杨靖宇率军部在红土崖东15公里处设伏，歼灭伪靖安军1个骑兵连，并以缴获的数十匹战马装备了教导团。在战斗中，军参谋长朴翰宗不幸牺牲。3月22日，杨靖宇指挥军骑兵教导团，利用内线关系，化装成伪军开入临江红土崖镇，一枪未放，俘敌40名，缴获全部枪支，4月下旬，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西越柳河至通化间铁路，再次进至兴京、桓仁一带，先后在兴京之东昌台、桓仁之样子沟、歪脖望等地与日伪军激战，发展了游击区。5月末，杨靖宇率军部东返临江，留下第1师继续坚持斗争。第1师师长李红光在桓仁县样子沟与日军交战中，身负重伤后光荣牺牲。继任师长韩浩，不久也在一次战斗中为国捐躯。之后，任命程斌（后叛变）为第1师师长。活跃在濛江、抚松、桦甸一带的第2师和南满游击第1、第2大队，于4月中旬袭击了日军据守的桦甸老金厂金矿和抚松县万良镇。4月以后，又转战在辉发河两岸的盘石、东丰、西丰和桦甸、抚松、濛江等地域，有力地配合了军部和第1师的南进作战。

1935年6月，第1军根据中共南满特委的指示，以第1师挺进辑安，开辟新区；以第2师坚持盘石地区的斗争；军部率教导团在第1、第2师活动地区进行机动作战。8月20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在柳河黑石头沟伏击一支300余人的“讨伐”队，毙伤俘敌70余人，并迫使伪军50余人反正。9月21日，杨靖宇又指挥军直部队在金川寒葱岭袭击伪军邵本良部，截获弹药和被服一批。10月，杨靖宇率第1军一部返回蒙江根据地时，在那儿轰与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的远征先遣队会师，从而沟通了南满与东满的联系。至此，第1军已发展到近5000人（含地方武装），南满抗日游击根据地得到进一步巩固与扩大。

第1军在频繁进行游击战争的同时，还非常重视根据地建设，特别是金川河里后方根据地的建设。金川河里地处龙岗山脉中段的哈尼河上游山区，即今吉林省柳河、通化、浑江交界地带。这里地势复杂，多深山巨林，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第1军成立后即在此建立军的后方根据地，先后建立了临时医院、修械所、被服厂和物资仓库。根据省委1934年发表的《关于农民委员会与民众政府》的指示精神，根据地还陆续建立了反日会等群众组织。在河里根据地的影响下，到1935年10月，南满各游击区已建立300个农民委员会、15个乡政府和56个区政府。同年11月，还在辉南石头河子召开南满特区民众代表大会，成立了南满特区人民革命政府。在斗争中创建的南满游击根据地，已成为东北抗日武装斗争的一个重要基地。

二、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的编成与东满游击区的发展

（一）人民革命军第2军独立师组成并转战东满各地

东满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各族人民开展抗日斗争较早、较活跃的地区，也是日军推行“治安肃正计划”的重点地区之一。

1933年夏，中共东满特委根据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指示东满游击队与其他抗日武装订立协定，加强联合作战。以东满游击队为主体的联合部队，先后进行了攻打八道沟和夺取东宁城等战斗，歼灭日伪军200余人。

1933年冬至1934年春，东满游击队以避敌主力，择敌弱点，伺机袭击的战术，又先后粉碎了日伪军数千人的冬、春季“讨伐”。

1934年3月21日，在汪清县十里坪反“讨伐”中，中共东满特委书记童长荣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年仅27岁。童长荣在担任特委书记两年多时间里，积极领导东满人民进行反日斗争，创建了东满各县抗日游击队，为发展东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贡献。

1934年3月，根据满洲省委的指示，东满延吉、和龙、汪清、琿春4县游击队合编成人民革命军第2军第1独立师，朱镇（后叛变）任师长，王德泰任政治委员，下辖4个团。独立师成立后，即“采取积极进攻的策略”，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第2团、独立团（1934年夏组成）向安图方向发展；第3、第4团到汪清、宁安、东宁等地活动；第1团仍在原地坚持斗争。随后，独立师各团联合其他抗日武装，在各地艰苦转战：4月初战安图车厂子，5月激战东宁二道沟，6月夺取汪清大甸子，8月猛攻安图城，连战连胜，共歼灭日伪军450多人，缴枪160多支，并促使伪军约300人反正。

1934年9月至1935年1月，日军集中主力及伪靖安军、警备旅共3万余人，以通化、哈东、东满和绥宁等四区为重点，发动为期4个月的秋冬季大“讨伐”。第2军独立师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一面将游击区里的群众疏散到深山密林和敌人统治区去，一面将部队分成三路转移：一路到宁安镜泊湖南湖头；一路到敦化、安图之间；一路至大梨树沟。独立师各部在反“讨伐”中，采取伏击、袭击和截击等战术手段，寻机打击敌人。

1935年1月，日伪军分四路围攻安图车厂子游击根据地。独立师以少部兵力牵制伪军，集中主力伏击日军，取得毙伤日军40余人的胜利，自己仅伤亡四五人。4月，独立师一部突然包围了琿春县大荒沟伪军一个连，迫使伪连长率全连82人，携枪85支反正。4月末，独立师主力在安图境内伏击由延吉运送给养返回的伪警备旅一个营，毙伤伪连长以下官兵50余名，缴获军需品一批。经过40余天战斗，独立师终于粉碎了日军的秋冬季大“讨伐”，并发展到1000余人。

（二）人民革命军第2军编成，东满游击区进一步扩大

1935年2月末，在中共满洲省委巡视员、原哈尔滨市委书记魏拯民参加下，中共东满特委于汪清县大荒崴召开党、团特委联席会议，改组了党、团特委领导机构，选举魏拯民为党的特委书记，周树东为团的特委书记。3月下旬，东满特委又在汪清腰营沟召开第2军独立师政委联席会议，研究如何贯彻大荒崴会议决议，加强人民革命军建设的问题。这两次会议是在东满党组织和第2军独立师面临严重困难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统战工作和反“民生团”斗争中的“左”倾错误，确立了新的工作方针和任务，为东满党和军队摆脱困境，发展抗日游击战争指明了方向。

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第2军独立师于1935年5月30日正式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共1200余人。

第2军成立后，根据腰营沟会议的决定，加强了对东满地区的抗日救国军和反日山林队的争取、团结工作。

1935年6月，第2军发表了《为成立东满抗日联合军指挥部致反日部队的信》，提出了建立抗日联合军的四项主张：第一，不投降，不卖国，抗日到底，收复失地；第二，不分什么部队，不分党派，不分民族，不问宗教信仰，团结起来共同抗日救国；第三，没收日本及其走狗的财产，充作抗日战费；第四，允许民众言论、出版、结社、集会、武装自由，联合民众共同抗日救国。通过争取工作，在东满地区活动的数千名其他抗日武装中，与第2军关系密切的有11支武装，共1500余人，关系较为密切的有8支武装，约数百人。这些武装已能做到，“凡是我们有事叫他们来，他们能来。他们叫我们去，我们也去，实际上已经能在我们号召领导之下统一行动”。

为了扩大游击区，打通与人民革命军友邻各军的联系，第2军除以部分兵力坚持安图、汪清原地斗争外，主力分三路向外线发展：第1路由第1团团长安凤学和政委周树东率领，于1935年4月末向敦化、额穆、蛟河、舒兰一带前进。他们先后取得了敦化沙河掌、额穆青沟子、敦额交界处的威虎岭等战斗的胜利。特别是5月2日在京（长春）图（们）铁路哈尔滨巴岭伏击日伪202次国际列车，俘日伪军政人员13名，歼灭押车日军一部。日伪报刊哀叹，此次列车被颠覆是“京图线开车以来发生的最大惨事”。由于情况变化，该路未能与活动在哈东地区的人民革命军第3军联系上。第2路由军参谋长刘汉兴率领，于6月间向宁安、穆稜、东宁一带进军。他们在东宁县老黑山附近歼灭伪靖安军一个连后。又取得了东宁县太平沟、宁安县山东屯等战斗的胜利。不久，即与周保中率领的反日联合军第5军一部会合，并以宁安为中心，共同开展游击战争。第3路由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率领，于8月向抚松、桦甸、濛江一带西征。该路于10月间在濛江那儿轰与人民革命军第1军会师，并举行了两军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就两军联合作战等问题作出了相应的决议。第2军部队与第1、第5军部队会师并协同作战，具有重要的意义，它标志着各军联合抗日局面的开始出现。留在老区坚持斗争的第2军部队，于8月29日联合反日友军攻克安图县城，有力地配合了远征部队的行动。

第2军的节节胜利，使日军大为震惊。自1935年9月开始，日军从长春、热河抽调部队对东满游击区进行疯狂的“讨伐”，致使游击区人口减少，面积缩小，并被分割成东西两半，给各部队相互协同和统一指挥带来困难。为摆脱困境，争取主动，第2军军长王德泰率第2军一部，于1936年1月中旬来到镜泊湖北头第5军军部，与该军军长周保中等共同召开了两军特别党委会议，讨论了两军的整顿、发展和配合作战等问题。决定第2军军部率第1师转战安图、敦化、额穆、桦甸、抚松地区；第2师大部仍与第5军一起行动，小部在汪清、珲春一带坚持斗争。还决定将第2军由原成立时的4个团扩编成两个师，6个团。第1师师长、政委分别由王德泰、李学忠兼任；第2师师长史忠恒因病未到职，由刘汉兴代理，政委王润成。通过这次会议，实

《冯康报告之二——义勇军工作》，1935年12月20日。

伪《协和》第9卷，第148号，第7、8页，1936年6月15日。

现了东满、吉东地区党组织和军队之间的联络，为以后各军协调动作，联合对敌创造了有利条件。

三、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成立与北满哈东游击区的扩展

（一）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并转战哈（尔滨）东各地

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发展形势的影响和推动下，珠河（今尚志）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经过贯彻中共中央“一·二六”指示信之后，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1934年底，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已发展到450余人，并与10多支其他抗日武装建立了反日联合军司令部。游击区也由1个县（珠河）扩展到6个县，并先后取得了宾县三岔河、五常县五常堡和宾县、延寿毗连的肖田地等战斗的胜利。为适应抗日形势发展的需要，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东北反日游击队哈东支队于1935年1月28日，在珠河铁道南三股流，扩编成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下辖1个师，3个团及军直属队共500余人。

第3军编成后，以团为单位分别活动于珠河东北部和中东铁路南北的方正、延寿、宾县、阿城、五常、双城一带。

1935年2月，日伪军调集1000余人分路向珠河、宾县、延寿、方正游击区大举进攻。第3军各团就地与敌周旋，先后在小亮珠河、孟家店、一面坡和延寿中和镇等地，给敌以一定程度的打击，3月初，赵尚志率部抵达方正县大罗勒密，与在该地活动的依兰县土龙山农民抗日武装谢文东部及吉林自卫军李华堂部会合。经过协商，以第3军为核心；共同组成了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公举赵尚志为总指挥，李华堂为副总指挥，谢文东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同时，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的名义签发了布告，号召“一切反日队伍联合在一起，民众与武装队伍结成共同战线”，一致抗日。联合军在总指挥部统一指挥下，分四路围攻方正县城，打开伪警署，火烧日住宅，在占领县城12小时后主动撤离。4月，赵尚志率联合军东征牡丹江沿岸，途中曾先后攻克小罗勒密、半截街、新开道和老五团等敌军据点，5月初，部队到达三道通地区，与李延禄率领的第4军西进部队会师。后因情况变化，赵尚志决定留下一部继续在依兰、方正、延寿游击区活动，自己率军部返回珠河游击根据地。

（二）第3军主力北上汤原，西征巴木通，开辟新的游击区

珠河地区第3军的成立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直接威胁着日军在北满的统治中心哈尔滨市。1935年7月下旬，日军继春季“讨伐”受挫之后，又发动了夏季大“讨伐”。这次“讨伐”以双（城）、阿（城）、珠（河）、宾（县）、五（常）、延（寿）六县的日军和伪警察为主力，对第3军中东铁路南、北两块中心游击根据地进行重点“讨伐”。在日伪“讨伐队”的摧残下，根据地遭到严重破坏。路南被烧的地区几乎成为空城，路北游击区被毁的也有2/3以上。为摆脱困难局面，中共珠河中心县委于9月10日决定留

《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东北反日联合军总指挥部布告》，1935年3月。

部分兵力坚持老区斗争，主力在赵尚志率领下向松花江下游的延寿、方正、依兰、勃利、通河、汤原等地转移，开辟新的游击区域。并沟通友军的联络。转移前，第3军已由3个团扩编为7个团，共750余人，其中贫农占75%，青年占60%，党团员占60%左右。

10月，赵尚志率军主力在方正大罗勒密地区与第4军李延禄部以及谢文东部、李华堂部会师，并协同打击敌人。走后取得攻克刁翎镇、伏击敌商船、智取二道河子等战斗的胜利。11月，赵尚志在勃利西青山里召开第3军干部会议，作出了把东北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改为东北抗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和渡松花江北上汤原，以小兴安岭为依托，扩大江北抗日游击区，以及加强同其他抗日武装的统战工作等项决定。会后，赵尚志率领第3军主力跨越已经封冻的松花江，经通河、依兰于12月到达汤原县境，和夏云杰领导的汤原游击总队会合，共同筹建汤旺河沟里游击根据地。

1936年4月初，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从汤旺河沟里出发。向松花江北岸的通河、巴彦、木兰、东兴、庆城、铁力、海伦等地西征。西征途中，首战江北敌之重要军事据点舒乐河街，歼灭日伪军100余人，缴枪300多支。当部队行至依兰县巴兰河谷时，又与一支敌军激战，缴了伪警察一个营和伪军一个连的枪，并击毙一名日本指挥官。同年夏，第3军西征部队顺利抵达木兰县蒙古山地区，并以蒙古山为基地，东向通河，西向巴彦一带开展游击活动。在这些地区，西征部队先后破坏了一些“集团部落”，缴了一些伪警察署（所）和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袭击并烧毁了伪军的一些兵营和哨所，还收编了40多支义勇军小部队，使巴木通一带成为新的抗日游击区。第3军西征的胜利惊动了日军，同年秋，日军从哈尔滨和佳木斯抽调重兵，部署于滨北铁路沿线，妄图消灭赵尚志率领的西征部队。赵尚志立即改变原定向庆城、海伦继续西进的计划，率领部队巧妙地迂回穿插，终于突破敌人封锁，顺利地回到了汤原后方游击根据地。

在赵尚志率第3军主力远征期间，留在珠河老游击区的第2、第3团，在日伪军反复“讨伐”、处境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游击战争。

1935年11月15日，在铁道北活动的第2团50余人，被日伪军500余人包围在春秋岭。经1天顽强奋战，击毙敌机枪队长谷清一上尉以下30多人，第2团仅剩10余人。在众寡悬殊的情况下，团长王惠同负伤后被俘。政委赵一曼（女），在指挥部突围中身负重伤，转到另一处养伤时，遭敌逮捕，被送到哈尔滨伪省警务厅关押、审讯。赵一曼曾留学苏联，归国后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九·一八”后，先后在沈阳、哈尔滨从事工运工作。1935年秋被任命为珠河铁道北区区委书记兼第3军第2团政委。负伤被捕后，敌人曾以残暴和卑鄙的手段进行过多次的拷讯和软化，但赵一曼始终表现出了一个共产党人视死如归，大义凛然的浩然正气。敌人见从她口中得不到任何情况，遂于1936年8月2日将赵一曼杀害于珠河小北门外。第2团在春秋岭战斗中突围出来的人员，转移到铁道南与第3团汇合后，即在珠河县委和第3军留守处的领导下，继续铁道南、北的斗争，配合主力部队远征。直到1936年夏，全部留守人员，才在县委负责人冯仲云、张兰生等率领下，分批转移到汤原地区与第3军会合。

第3军部队在北上西征期间，由1个师发展到9个师，基本队伍1500人，加上收编的队伍共有6000余人。活动地区遍及松花江两岸20余县。除在汤原县汤旺河沟里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后方根据地外，还在通河县的大小古

洞河、依兰县的巴兰河谷、木兰县的蒙古山和方正县的大罗勒密山里，建立起4处带有根据地性质的后方密营，保证了部队的休整训练、伤病员治疗及物资的储藏和供应。

四、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的组建与北满汤（原）萝（北）游击区的发展

（一）汤原反日游击队的重建与活动

1933年6月，中共汤原中心县委根据中共“一·二六”指示和满洲省委指示精神，派戴鸿宾等到义勇军开展工作。至8月初，他们建立起了一支有1500余人的东北民众义勇军。8月14日，民众义勇军未经县委同意就进攻汤原城，结果遭受严重挫折。县委总结这次行动的教训，于11月间重建了一支在党直接领导下的、以戴鸿宾为中队长的汤原抗日游击队。游击队成立后，进行了七马架和葫芦脖子等战斗，并收缴了一些反动地主武装的枪支。

为打开局面，汤原中心县委决定在位于汤原北部、群众斗争基础较好的太平川一带，建立抗日游击根据地。

1934年6月，汤原反日游击队袭击了太平川伪警察署，并在西太平川召开群众大会，宣传党的抗日政策。9月初，汤原太平川伪自卫团长张传福率部反正，被编成一个队，由张任队长。随后，汤原反日游击队又连续袭击伪军获胜，全队发展到五六百人。当年秋，根据满洲省委指示，汤原反日游击队在亮子河扩编成汤原反日游击总队，总队长戴鸿宾，政治委员夏云杰，辖3个中队。

汤原反日游击总队编成后，按照东北人民革命军暂行条例草案精神，进行了以纠正极端民主化、增强团结和纪律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整顿。整顿后，游击队立即投入了反“讨伐”斗争。1934年冬，日伪军警500余人“讨伐”汤原游击根据地，并以伪地方武装封锁各山边沟口要道。游击总队避敌锋芒，转移到萝北等地活动，待敌疲惫时，又返回汤原一带袭击疲惫之敌。经过十余次大小战斗，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冬季“讨伐”。此后，由于游击总队政委夏云杰负伤离队休养，政治工作一度削弱，部队中曾出现纪律涣散和军事行动停顿等现象。经满洲省委发出指示信并派特派员白江绪前往帮助整顿，加强了党的领导之后，游击总队又发展到700余人，游击区也得到巩固与扩大。

（二）人民革命军第6军编成与汤（原）萝（北）游击区的扩展

1935年12月，北满各抗日部队会师汤原，大大加强了汤原地区的抗日力量。先期到达汤原的人民革命军第3军军长赵尚志，为把汤原游击总队扩编成人民革命军第6军做了大量工作，并选派该军第1师政治部主任张寿箴到第6军代理政治部主任。为解决扩编后枪弹不足问题，后期抵汤的抗日同盟军第4军同第3军一起，将两挺机枪和100多支步枪及3万发子弹全部送给了即将扩编的汤原游击总队，1936年1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6军以汤原游击总队为基础正式编成，军长夏云杰，参谋长冯治纲，代理政治部主任张寿箴，下辖4个团及军直属队，共1000余人。

第6军编成后积极在汤原地区开展游击活动。1936年四五月间，第6军司令部拟制了袭击鹤岗的作战计划。5月22日，该军分两路进攻鹤岗：参谋长冯治纲指挥部分兵力牵制鹤岗日军骑兵连，阻敌增援；军长夏云杰率主力直捣鹤岗矿务局。傍晚，各部开始向鹤岗攻击。由于日伪军毫无戒备，加之又有内线策应，夏云杰指挥部队迅速解除了伪矿山警察队的武装，并击毙了企图顽抗的伪矿警队长和日本官员多人。与此同时，冯治纲指挥部队顽强抗击日军骑兵连的反扑，并炸毁矿山东南面的吊桥及车库，配合主力歼敌。经一夜奋战，第6军部队于黎明前满载武器弹药等战利品，顺利返回汤原根据地。

在此之前，第3军和第6军还共同商定筹建汤旺河沟里后方根据地，并组织了两军后方留守处，由第6军代政治部主任张寿箴兼留守处主任，统一领导建立根据地的工作。张寿箴受领任务后，首先率领队伍消灭了盘踞在岔巴旗和老钱柜一带的敌人，尔后开始根据地的建设工作。他们先后建立了医院、仓库、被服厂、小型兵工厂和军事干部学校，还建立了一些密营，从而使汤旺河根据地真正成了第3军和第6军的后方基地。

五、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的组成与吉东密（山）勃（利）穆（稷）游击区的扩大

（一）抗日救国游击军北上密山，开辟新区

1933年初，抗日救国游击军司令李延禄，在汪清县听了中央“一·二六”指示信关于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精神传达后，决定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群众基础较好、回旋余地较大的密山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联络更多的抗日武装。5月初，李延禄率军400余人从宁安卧龙屯北上，于6月下旬到达密山平阳镇附近的大石头河子地区。李延禄在同中共吉东特委职工部长吴赤峰及密山县委取得联系以后，便于7月下旬在郝家屯召开了反日山林队联席会议。到会的十多支抗日武装负责人一致同意建立统一的指挥机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平时分散独立活动，战时统一指挥、联合行动，并公推李延禄为总负责人。人民反日革命军组成后，抗日救国游击军番号取消，但部队编制未变。

1933年9月初，反日革命军准备联合攻打密山平阳镇，因走漏消息，连遭敌人袭击，第2团和骑兵营要求重返宁安老区，经军部同意，约有300余人南返宁安。军部和第1团不足百人继续留在密山坚持斗争。9月中旬，李延禄得到驻密山城伪骑兵第4旅已调往饶河一带、城内兵力空虚的情报，立即决定联合各抗日武装，攻打密山县城。各抗日武装在李延禄的指挥下，以少数兵力佯攻县城西南的半截河、平阳镇，集中主力猛攻密山县城，全歼伪警备队，缴获长短枪130多支，子弹万余发，及大量布匹、棉花和粮食等物资。这次胜利，不仅解决了部队过冬物资问题，而且鼓舞了部队斗志，扩大了人民反日革命军的影响。

（二）抗日同盟军第4军的建立与活动地区的扩大

1934年9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吴平（杨松）以中共满洲省委巡

视员的身份，到吉东巡视工作。9月25日，在吴平参加下，中共密山县委于哈达河沟里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将县委1934年3月20日重建的密山游击队与李延禄领导的东北人民反日革命军合并，组成东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部，任命李延禄为总司令，并抽调县委部分领导干部到该军工作。同年12月，吴平巡视宁安后，在牡丹江筹建了吉东特委，吴平任特委书记，在吉东特委统一部署下，将新组建的抗日同盟军正式定名为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何忠国，下辖1个师，3个团及军直属队，共231人。

第4军成立后，建立和健全了党的各级组织，军部建立党委会，朴凤南任党委书记，党团员较多的第2团和卫队连分别成立了党支部和党小组，战士中普遍建立了反日会组织。

1934年冬，日伪军集中兵力对密山游击区进行“讨伐”。第4军根据中共满洲省委的指示，于12月间撤出敌人重点“讨伐”的密山穆棱河北山区，转移到勃（利）密（山）穆（棱）边境山林地带，一面发动群众，一面袭击敌人。自1934年12月至1935年1月末，在勃、密、穆山区边沿地带组织抗日救国会47个，发展会员300余人。人民群众纷纷参军，参战，支援第4军打破了敌人的冬季“讨伐”。

1935年春，第4军以团为单位进行分散游击活动。1~6月，各团先后取得袭击勃利方家沟、攻打依兰阁凤楼和突袭林密铁路滴道车站等战斗的胜利，歼灭日伪军警一部，缴获战马100多匹，全军发展到800余人。9月，根据中共吉东特委指示，饶河游击大队改编为抗日同盟军第4军第4团，全团250人。继第4团之后，又将第4军初建时联络并达成改编协议的一些反日山林队分别编入第4军。至此，第4军发展到7个团，两个独立旅，共2000余人。活动地区也扩展到穆棱、林口、密山、勃利、宝清、依兰、方正、虎林、饶河等9县县境。

根据省委巡视员吴平关于应重视抗日游击根据地建设的意见，李延禄于1935年6月，率军部到方正县大罗勒密山区创建游击根据地。该部抵达目的地后，一面派干部深入陈家亮子和前五家子等村屯发动群众，建立反日会、妇女会、儿童团、自卫队等组织，开展抗日活动；一面组织力量，在陈家亮子南山和红石砬子修建军部密营和被服厂。同时通过统战关系，凭借伪商会的掩护，在大罗勒密镇上开设了一家药房和一个邮政代办所，负责第4军与外界的联络和采购军需物资、订阅报刊、传寄文件。此外，还通过独立第5旅旅长等人的关系，与当地伪警备旅旅长暗中签订了“互不作战”的协议。同年冬，日军“讨伐”依兰、方正地区时，大罗勒密镇上的统战关系全被破坏，但陈家亮子和红石砬子秘营却在群众的保护下，仍发挥着后方基地的作用。

1935年秋，李延禄在方正三家子屯一带与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第1团会合。经过协商，两部决定联合谢文东、李华堂部共同行动。在李延禄指挥下，9月7日，联军首战松花江岸的洼洪，歼灭伪军一部。

26日，联军又攻南刁翎镇，迫使伪守备队一个营反正。29日，联军再克林口，缴获近百匹战马和一批粮食、弹药。战后，联军返回各自的游击区。

六、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的建成与吉东绥宁游击区的扩、

（一）绥（芬河）宁（安）反日同盟军的成立与活动

1934年2月，周保中率领的边区军一部同李荆璞率领的宁安工农反日义勇队，会合于宁安县的平日坡。2月16日，由周保中出面，以周、李两部为基础，吸收救国军柴世荣、王毓峰、傅显明等部参加，在宁安东南乡组成了绥宁反日同盟军办事处，周保中任办事处主任。为加强反日同盟军中的骨干力量，中共宁安县委决定并于1934年5月10日正式组成宁安反日游击队，队长白殿贞。

绥宁反日同盟军成立后，于1934年3月20日首战新官地获胜。4、5月间，同盟军袭击宁安卧龙屯、进攻小城子、突袭东京城，连战告捷。6月份，同盟军偷袭石头河子车站附近之敌，一弹未发即将伪军一个连缴械。反日同盟军的节节胜利，扩大了该军在宁安地区的政治影响。很多义勇军和山林队表示拥护或接受同盟军的主张和领导，甚至要求配合同盟军作战，从而把联合抗日的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反日同盟军的迅速发展，也使敌人大为震惊。驻宁安地区日军迅速调集兵力，向同盟军发动猖狂进攻。为避敌锐气，反日同盟军决定暂时分兵：将大部兵力派往东满地区活动，只留小部兵力坚持宁安地区斗争。6月中旬，周保中率领同盟军主力，开赴东满地区，途中曾联合各抗日武装会攻绥芬河大甸子达7昼夜，虽未达到攻克目的，却鼓舞了当地军民的抗日热情。与此同时，李荆璞率领同盟军一部，到西北山、石头河子一带开展游击活动，打破了日伪军的多次进攻。

1934年9月到1935年1月，日军集中第6师和伪靖安军、警备旅等部共3万人，把绥宁地区作为四个“讨伐”重点之一。在“讨伐”中，日军采取军事进攻、政治诱降、经济封锁等手段，进行所谓总体“讨伐”战。同盟军针对日军进攻的特点，在各反日友军的配合下，采用避敌锋芒，化整为零和攻敌虚弱，化零为整的战术，先后取得岔沟、二道河子、猴石和狼窝等战斗的胜利。

1935年1月，为进一步打破敌人的“讨伐”，同盟军将联合部队分成四个部分进行游击战：一部到宁安以东，一部去宁安西北山，一部返镜泊湖南湖头，一部回东满。各部在分散转移过程中，不断给尾追、堵截的敌人以打击。东返部队6天打了7仗，毙伤日伪军一部；西去部队在转移中毙伤日伪军150余人。

（二）第5军的编成与绥宁游击区的扩展

1935年1月，为进一步落实中央“一·二六”指示信精神，尽快实现宁安地区反日武装的统一编制和指挥，中共吉东特委、宁安县委和绥宁反日同盟军党委共同决定，将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并于2月10日发表成立宣言，由周保中任军长，柴世荣任副军长，张建东任参谋长，胡仁任政治部主任，辖两个师，7个团，共936人。

第5军编成后，主要是以八道河子为根据地，在宁安境内活动。至5月上旬，先后取得百门子、庙岭、二道河子和葡萄沟等战斗的胜利，打破了敌人的春季“讨伐”。

1935年5月，为开辟新的游击区，第5军党委决定：以军部和少数部队留守宁安根据地坚持斗争，以军主力编成东西两个派遣队执行开辟新区的任

务。东部派遣队由军政治部主任胡仁带领，于 1935 年 5 月中旬进至穆稜、勃利和林口县境后，即在该地区开展游击活动。到 1936 年初，东部派遣队先后取得了林口、四合屯、亮子河等战斗的胜利，并用缴获的枪支，帮助穆稜县组建了 two 支游击队，同时还将一支配合该派遣队行动的山林队编成第 5 军第 8 团。西部派遣队由副军长柴世荣率领，于 1935 年 7 月末 8 月初到达额穆地区。尔后分头活动：一部活动于黄泥河子、威虎岭和敦化附近；另一部活动于宁安与额穆之间，与军部保持联系。西部派遣队在额穆地区活动期间，曾与日伪军多次作战，特别是额穆东青沟子战斗，全歼日军一个小队。留守宁安的军部及其所属各部，在粉碎敌人“讨伐”中，曾在三道河子、长岭子和东南山与伪军警激战，共歼敌 100 余人，缴枪 100 多支，机枪两挺，子弹两万多发，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开辟新区的行动。

（三）第 5、第 2 两军联合作战

1935 年七八月间，东满地区人民革命军第 2 军第 2 师主力来到宁安，配合第 5 军开展游击战争。经与第 5 军商定，该师由第 5 军直接指挥，后第 5 军又派陈翰章代理该师师长，主要活动在宁安、额穆、敦化一带。是年冬，日军对绥宁地区进行冬季大“讨伐”。第 2 军第 2 师和第 5 军第 1 师，在第 5 军军长周保中直接指挥下，转战于宁安、额穆、敦化地区，不断取得胜利。11 月下旬，第 2、第 5 军联军以一部兵力向敦化以东之敌实施佯攻，以主力夺取官地，打击通沟岗子的日军。12 月 7 日凌晨 4 时，联军主力一举攻克官地据点，毙、俘敌 180 余人。尔后，联军威逼伪警官给通沟岗子日军守备队打电话诱称：“共产军袭击官地被击退，有再进攻的模样，请速增援！”通沟岗子驻有日军 100 多人，接伪警官电话后，即以大部兵力向官地驰援。当日军通过通沟岗子东面联军埋伏地段时，突然遭到猛烈射击。日军一部就地抵抗，大部企图退回通沟岗子。但是退路已被联军另一部封锁，日军陷入四面包围之中。激战从 7 时持续到 9 时 30 分，除 10 余名日军逃脱外，其余全部被歼，驻通沟岗子 40 余名伪军也全部投降。此战共缴获轻重机枪 10 挺，步枪 160 多支。1936 年 1 月 5 日和 8 日，第 2、第 5 军联军又在黑石屯和额穆索两次战斗中，歼灭日伪军 200 余人，缴获大批军用物资。经过两个多月的作战，联军共歼灭日伪军警 1500 余人，缴获各种枪 700 多支，冲破了日伪军的冬季大“讨伐”。

第 5 军在反“讨伐”斗争中，由于重视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因而得到群众的拥护和支援。据敌伪资料不完全统计，仅宁安长岭子和勃海两甲群众，就给第 5 军支援物资共 76 项，其中面粉 5975 斤，食盐 2408 斤，大米 10 担，伪币 1680 元。不仅如此，广大群众甚至一些爱国的保、甲长还冒着危险，承担伤、病员和反日战士的隐藏、治疗及进城为部队购买紧缺物资等工作。

1935 年冬，日伪当局以通反日同盟军的罪名，将东京城区 22 名甲长中的 19 人逮捕，全遭毒刑，其中 2 人被枪杀。

1936 年初，第 5 军根据部队在历次战斗中减员和新成份增加等情况，对全军进行了全面整顿。经过整顿，全军总人数由刚组建时的 986 人减少到 630

人，但基本队伍却由原来的 300 人增加到 500 多人，其中党团员占 25%。由于部队素质进一步提高，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打下了基础。

自 1933 年秋到 1936 年春两年半的时间里，东北人民革命军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贯彻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实行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推动了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蓬勃发展，歼灭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敌人的频繁“讨伐”。据日伪警察部门统计，1934 至 1935 两年中，抗日武装共出动 52545 次，达 2684059 人次。日军伤亡人数，据当时日本报刊记载，仅 1935 年就达到 54766 人。连关东军也不得不承认：在对付抗日武装方面，“如果按兵力和时间计算（同占领时相比），确实要付出十倍的努力，还不能充分达到目的”。日军战史也记载：“在广大地区进行的治安肃正作战，按使用兵力和时间计算，所付出的努力远比正规战为大，即使如此，还很难得到良好的成果。”随着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反“讨伐”作战的胜利，东北人民革命军发展到 6 个军共 6000 余人，抗日游击区也扩展到南满、东满、吉东和北满 40 余县，为进一步发展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更沉重地打击日本侵略者创造了有利条件。

伪满治安部：《满洲国警察史》，第 821 页，

岩波讲座：《世界历史 28·现代 5》，岩波书店，1971 年东京版，第 280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1），朝云新闻社，1983 年增印，第 13 页。

第三节 东北抗日联军组成，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参见附图 14）

随着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

1935年6月3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以下简称“六三”指示信）及其它指导性文件。

“六三”指示信的主导思想与随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中共中央名义发表的“八一宣言”的精神是一致的。它们都是在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一策略转变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八一宣言”号召在全国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组成全国统一的抗日联军、统一的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和全国的国防政府；“六三”指示信提出了在东北地区扩大反日游击运动和实行以党领导的游击队为中心，普遍地与各种反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以及成立抗日联军一类组织，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等问题。同年秋冬之际，中共东北各地组织普遍贯彻了“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精神，对东北全民反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

1935年10月25日，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

1936年初，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编制系统暂行条例草案》和《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2月10日，再以杨靖宇等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指出：“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我们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上述文件的发表，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

1936年2月至1937年10月，东北人民革命军及其它抗日武装先后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至第11军。随着抗日联军队伍的发展壮大，东北抗日游击战争开始进入高潮阶段。但是就在这个时候（1936年1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却撤销了中共满洲省委，将抗联各军分属于新成立的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南满省委和吉东省委领导。致使正在成长壮大中的东北抗日联军缺乏统一的领导核心和统一的指挥机构，而仍处于分散独立作战状态，这不能不对全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东北抗日武装力量的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使日本侵略者在东北的殖民统治受到严重威胁。

1936年4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和伪满洲国军政部制定了一个所谓《三年治安肃正计划》，企图在三年内彻底消灭东北抗日联军。伪满各省和各军管区、警备区以至各县，都按照这个计划分别作出年度和阶段“讨伐”计划。日伪军在进行频繁“讨伐”的同时，还加紧推行各种殖民统治措施，给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东北人

1934年下半年以后，由于中共中央上海执行局遭破坏，苏区中共中央和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中共满洲省委与中共中央的联系中断。共产国际决定，从1935年夏起，由中共驻国际代表团直接领导中共满洲省委和东北各地抗日武装力量。

东北抗日联军史料编写组：《东北抗日联军史料》（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68～169页。

民支援下的东北抗日联军，不仅没有被消灭，反而在反“讨伐”中不断成长壮大，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和游击根据地，也随之不断发展与扩大。

一、中共南满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组成，东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达到高潮

（一）东北抗联第1、第2军和第1路军编成，中共南满省委成立

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1936年春，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和东北地区抗日斗争形势发展的需要，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统一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同年7月，中共南满第二次代表会上正式宣布），杨靖宇任军长兼政治委员，安光勋（后叛变）任参谋长，宋铁岩任政治部主任，下辖两个师，5个团和1个教导团，约3000人，序列如下：

第1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 程 斌
参 谋 长 李敏焕
政 治 部 主 任 胡国臣
第2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 曹国安
参 谋 长 李希敏
政 治 部 主 任 全 光

军直教导团

抗联第1军编成前后，正值日伪军开始推行《治安肃正三年计划》与对“东边道进行独立大讨伐”之时。第1军决定，以第2师留在金川老区坚持内线斗争，军长杨靖宇率军部和第1师到外线去打击敌人。

1936年初，杨靖宇率军主力转战于通化、辑安（今集安）、兴京（今新宾）、桓仁等地，取得了痛歼伪军“东边道讨伐司令”邵本良部的重大胜利。2月27日，杨靖宇指挥军部教导团袭击了伪军邵本良部驻通化热水河子的一个团，歼敌60多人，缴枪50多支。随后继续南下，邵本良图谋报复，从4月12日开始，纠集1000余人日夜追击，妄图一口吞掉第1军军部。杨靖宇决心采用疲劳战术，诱敌深入，敌疲我打，歼其一部。于是转锋西向，出辑安，牵着邵本良伪军在通化、桓仁、兴京、宽甸等地兜圈子，历时18天，拖得敌人疲惫不堪。4月30日，杨靖宇率军部教导团与第1师会合后，进至本溪县赛马集山区，在梨树甸子的夹砬子沟，利用狭窄山路设伏，布成口袋阵。当邵本良带领伪军钻进“口袋”时，伏击部队齐向敌群冲杀，经4小时激战，歼灭邵部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机枪4挺，长短枪100余支。邵本良被击伤后，带领残部逃脱。此后，杨靖宇又指挥所部在通化四道江附近，袭击了由沈阳伤愈返回八道江的邵本良及其率领的运输车队，击毙日本指导官英俊志雄，毙伤俘敌50余名，缴获一批枪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邵本良再次化装逃脱，但已失去了日本主子的信任，以后被日籍医生毒死在沈阳陆军医院。第1军外线部队痛歼伪军邵本良部的胜利，鼓舞了在金川地区坚持内线斗争的部队。经过内线和外线相互配合斗争，终于打破了日伪军的春季大“讨伐”。在反“讨伐”中，第1军不仅扩大了游击区，而且部队也得到发展。当年5月，在辽宁兴京一带新建了第3师，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辖两个团。第3师成立后，即以兴京、清原为中心开展游击活动。同月，第1军外线部队返回金川地区休整。此时全军已发展到6000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 1936年3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按照“八一宣言”的精神和《统一军队建制宣言》的要求，在安图县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军长王德泰，政治委员魏拯民，参谋长刘汉兴，政治部主任李学忠，下辖3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团，共2000余人，序列如下：

- 第1师 师 长 安奉学
政治委员 周树东
参 谋 长 朴得范
政治部主任 吕伯歧
- 第2师 师 长 史忠恒（陈翰章代）
政治委员 王润成
参 谋 长 陈翰章
- 第3师 师长兼政治委员 曹亚范
军直教导团

同抗联第1军一样，抗联第2军成立之时，适逢日伪军对东满疯狂“讨伐”之际。为破坏敌人的企图，扩大游击区，第2军决定兵分两路开展游击活动：一路由王德泰、魏拯民率领第1、第3师西进安图、抚松、桦甸、濛江、长白等县，发展长白山游击区，并与第1军相呼应；另一路由王润成、陈翰章率领第2师北上宁安、敦化、额穆一带，与第5军共同活动，西进部队为了迷惑敌人，自奶头山出发后，先向西北开进，于1936年4月间进入敦化、桦甸县境。以围点打援再攻城的战术，先派少数兵力围攻桦甸东部重镇大蒲柴河据点，而将主力埋伏于敦化至大蒲柴河之间公路的寒葱岭。在此歼灭从敦化来援之敌200余人后，又乘胜将大蒲柴河攻克。然后，部队折向西南，于5月间到达抚松县境，又连续与日伪军进行了10余次战斗，均获得胜利。北上部队在安图县境与第5军会合后，分成三部分活动：一部在穆稜地区中东铁路两侧活动；一部向额穆以西分散游击；一部返回汪清、琿春老区坚持斗争。北上部队在转战中，先后在宁安的团山子、镜泊湖的南湖头和敦化的小荒沟等地，共歼灭日伪军300余人。经过3个多月的机动作战，第2军西进、北上部队打破了敌人的春季“讨伐”，完成了开辟安图、抚松、濛江、临江、长白等县和重建宁安镜泊湖南湖头游击根据地的任务，全军发展到5000余人，尤其是第3师又扩建了第3、第9两个团。

抗联第1路军组成和中共南满省委建立 1936年7月，中共东满特委书记兼人民革命军第2军政委魏拯民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归国后，即率部来到南满游击区，同杨靖宇一起召开了中共东、南满特委和第1、第2军主要领导干部联席会议，即金川河里会议。会上，魏拯民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和中共驻国际代表团关于撤销满洲省委、以游击区建立省委及编成“路”军的指示，讨论了抗联第1、第2军的任务和党的工作问题。会议决定将抗联第1、第2军合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建立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总司令部。第1路军下辖第1、第2两个军，共6个师，即第1军的第1、第2、第3师，第2军的第1、第2、第3师改称第4、第5、第6师。第1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副总司令王德泰，政治部主任魏拯民。会议还决定将中共南满特委和东满特委合并组成中共南满省委，统一领导第1路军和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斗争。由魏拯民任省委书记，杨靖宇、王德泰等11人为委员。会议还研究确定了第1路军的活动方针和任务。决定以第1军军部率第1、第3师执行西征辽西、热河的任务，求得同关内红军

部队特别是同中共中央取得联系；以第2军军部率第4、第6师在原第1军游击区内，协同第2师坚持斗争。并开辟长白山游击根据地，以牵制敌人，策应西征；第5师仍留在东满和绥宁地区，配合第5军行动。

（二）第1路军西征东战，东南满抗日游击战争进入高潮

第1军西征辽西、热河根据金川河里会议的决定，为配合红军北上抗日，打通与中共中央和关内人民抗日武装的联系，改变东北抗日联军独立作战的局面，开辟新的抗日游击区，抗联第1路军第1军，奉命于1936年6月和11月先后组织了两次西征。6月28日，由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率领第1师主力自和尚帽子一带出发。计划从本溪、凤城之间插入辽阳附近，越过南满铁路和辽河，直抵辽西、热河地区。经过数日连续夜行军，西征部队迅速抵达岫岩北部山区。日军发觉第1军的西征意图后，立即从沈阳、辽阳、海城等地调集重兵，跟踪追击，四面包围，第1师部队前进受阻。为了争取主动，该部于7月15日回师摩天岭，设伏于各主要峰道，勒马待机。中午时分，当尾追的驻连山关日本守备队进入大榆树沟后，西征部队突然发起攻击，当场击毙日军队长今田上尉以下30余人。

下午又与追兵激战数次，再消灭敌人数十名，摩天岭战斗后，第1军西征部队被迫陆续回师，途中屡遭敌之尾追和截击，部队伤亡较大，军政治部主任宋铁岩于途中病亡。

10月，西征部队返回宽甸地区休整。同年11月，第1路军总部吸取第1军第1师西征的经验教训，决定将第1军第3师全部改为骑兵，乘敌人集中兵力讨伐第1军活动地区和辽河封冻之机，从北路再次西征。

11月下旬，第3师部队在师长王仁斋、政委周建华率领下，从兴京县境出发，冲破敌人的重重封锁，过清原，越铁岭。横跨南满铁路，于12月下旬抵达辽河东岸。不料此时辽河尚未封冻，又找不到渡船，部队被阻于东岸。在敌迫兵将至的情况下，第3师部队只好绕道回师，折返清原。途中部队遭到很大损失，师长、政委先后牺牲。至此，第1军西征任务暂告停止。第1军两次西征取得了摩天岭等战斗的胜利，扩大了抗联活动区域和政治影响，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但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又远离游击区，缺少群众配合，在敌重兵追堵下，不得不半途折返。它说明，在抗联力量比较弱小的情况下，企图长时间脱离老游击区行军作战，并且要越过敌重兵云集的地区是困难的，因而遭受重大挫折是不可避免的。

第2军转战南满东满 为策应第1军主力西征，王德泰和魏拯民率第1路军第2军军部和第4、第6师及第1军第2师，在抚松、临江、长白等地开展游击战争。1936年8月至12月，第2、第4、第6师密切配合，先后取得攻打抚松县城、进攻安图东清沟和伏击长白七道沟等战斗的胜利，击毙敌第2军管区日军上校石川隆吉和中校河村。在大碱场突围和七道沟伏击战中，军政治部主任李学忠和第2师师长曹国安先后壮烈牺牲。当年底，第2军一部于抚松小汤河村宿营时，突遭伪军600余人包围。王德泰军长沉着指挥，采取正面反击与侧后迂回相结合的战术，终将进攻的伪军打退。这次战斗虽然毙伤敌70余人，但部队受到重大损失，第1路军副总司令兼第2军军长王德泰不幸牺牲。王德泰是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的创始人之一，为坚持和发展东南满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作出了贡献。王德泰牺牲后，魏拯民继续指挥

第2军第4、第6师和第1军第2师在长白山区坚持游击战争。1937年1~4月，第4、第6师在抚松、长白、临江、安图等地袭击、伏击敌人。仅长白、临江六道沟、安图大沙河三次战斗，即歼灭日伪军340余人，缴机枪3挺，长短枪230多支。在大沙河战斗中，第4师政委周树东不幸阵亡。五六月间，魏拯民指挥军部和第2、第4师各一部，利用打入敌营的人员作内应，一举攻克临江县庙岭据点，歼灭伪军1个营，缴获迫击炮1门，轻、重机枪4挺，步枪100多支，以及大批弹药、给养。6月下旬，敌从朝鲜境内调来日军第19师约2000人，企图“围剿”长白县境的第2军。第2军以第4、第6师为主，第2师一部配合，设伏于长白县十三道沟间山峰，利用居高临下的有利地形，与来敌展开激战，歼其一部。

抗联第1路军从编成至1937年7月初近一年时间里，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近百次，歼灭日伪军数千人，游击区扩展到十几个县，部队发展到1万余人，政治影响不断扩大，严重威胁着日本在东满和南满的殖民统治，日军惊呼抗联是满洲“治安之癌”。

二、中共吉东省委建立，东北抗联第4、第5、第7军编成，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进入新阶段

（一）东北抗联第5、第4、第7军先后编成，中共吉东省委建立

吉东系指松花江右岸，乌苏里江左岸，牡丹江流域和中东铁路东段道北、道南20余县。活动在这一地区的人民革命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统一军队建制的指示和中共吉东特委的要求，从1936年春开始陆续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5、第4、第7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 1936年2月，活跃在绥宁地区的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副军长柴世荣，参谋长张建东，政治部主任胡仁，辖两个师，7个团和1个教导队，约3000人，建制如下：

第1师	师	长	李荆璞		
	副	师	长 姜振荣		
	参	谋	长 张镇华		
	政	治	部	主	任 关书范（后叛变）
第2师	师	长	傅显明		
	参	谋	长 陈翰章		
	政	治	部	主	任 李光林

军教导队

1937年以后，第5军又增编第3师，师长李文彬，政治部主任王效明，辖3个团。

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 1936年3月，活跃在密山、勃利、穆棱和虎（林）饶（河）地区的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军长李延禄（1936年李奉调入关，由李延平代理，1937年正式接任军长），参谋长胡伦，政治部主任黄玉清，辖3个师，7个团，1600余人，建制如下：

第 1 师 师 长 李延平（兼）
政治部主任 黄玉清（兼）
第 2 师 师 长 郑鲁岩
参 谋 长 崔石泉
政治部主任 崔荣华
第 3 师 师 长 李天柱
政治部主任 邓化南

1936 年 7 月，第 4 军又将在富锦南部山区活动的原自卫军第 2 旅余部编为第 4 师，师长刘振国，政治部主任朴德山。11 月，上级决定在第 4 军第 2 师的基础上成立抗联第 7 军。于是第 4 军又以原第 5 团为基础，组建了新的第 2 师，师长李天柱；以原第 3 师第 7 团为基础，成立了第 3 师，师长官显庭。此时，全军已达 2100 余人。

东北抗日联军第 7 军第 7 军的前身是 1933 年 6 月成立的饶河反日游击队。1934 年 2 月，该游击队改为饶河民众反日游击大队。1935 年 9 月，编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4 军为第 4 团。1936 年 3 月，扩编成第 4 军第 2 师。同年 11 月，为适应虎林、饶河地区抗日游击战争发展的需要，中共吉东组织决定将该师扩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7 军，陈荣久任军长，崔石泉任参谋长，下辖 3 个师，3 个团，共 700 余人，序列如下：

第 1 师 师 长 陈荣久（兼）
第 2 师 师 长 李学福
参 谋 长 金 铎
第 3 师 师 长 景乐亭
参 谋 长 阎敬山
政治部主任 金铁宇

中共吉东省委成立 1936 年中共吉东特委遭敌破坏后，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先后成立了中共下江特委、道北特委和道南特委，分别领导吉东十余县党的工作。随着吉东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联各军的成立，中共吉东组织于 1937 年 3 月 10 日在依兰县四道河子（现为林口县）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在上述三个特委的基础上，成立中共吉东省委，负责领导整个吉东地区的抗日斗争和抗联各军。省委由宋一夫、周保中等 8 名委员组成，宋一夫为书记。会议还对今后抗日救亡运动和游击战争的策略作出了相应的决议，提出在“坚守实力不损条件下，尽可能推展进攻的活动。”

（二）吉东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步入新阶段

抗联第 5 军主力转战中东铁路南北，取得大盘道、前刁翎、依兰战斗的重大胜利为了打击敌人，发展抗日力量，抗联第 5 军成立后，即决定军部率 3 个团留在宁安老区坚持斗争，军主力第 1、第 2 师开往日伪统治比较薄弱的中东铁路东段南北地区，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 年 2 月，军主力从宁安地区出发，向中东路以北的穆棱、密山、依兰方向转移，第 2 师为先遣队，第 1 师主力跟进。2 月下旬，由额穆地区向镜泊湖方向转移的第 1 师部队，进至东京城莲华泡地区时，突然遭到驻东京

城日军和伪军一部的围攻。师长李荆璞指挥部队与敌激战，毙伤日军林田中校以下官兵 90 余人后，突出重围。3 月间，第 2 师师长傅显明率师主力北进至密儿县黄泥子时，被一支日伪军包围，在突围中傅显明师长壮烈牺牲，由王光宇接任师长，继续指挥部队北上。随后，军主力向道北转移过程中，又多次与日伪军警激战，颠覆敌火车一列，击毙日军少校以下官兵 30 多名，缴获步枪 200 多支，轻机枪 4 挺。

10 月，军主力第 1、第 2 师相继进到中东铁路以北林口地区。

为策应和掩护军主力北移而留在宁安老区的部队，在周保中指挥下，先后取得宁安三道河子、卧龙屯和烟筒沟等战斗的胜利。9 月初，为摆脱敌人进攻，周保中率军部及第 5 军和第 2 军第 2 师各一部，从宁安西区向道北转移。转移途中于 9 月 24 日在宁安泉眼头召开第 2、第 5 军干部会议，决定在宁安地区建立第 5 军留守处，以第 5 军政治部主任张中华任主任，领导第 2 军第 2 师和第 5 军留守部队，坚持中东路以南老区的游击战争。

10 月，第 5 军军部亦到达道北林口地区，并在头道河子建立了军部临时办事处。此后，军部和第 1 师以刁翎为中心，活动于牡丹江下游地区；第 2 师则活动于依兰以东、宝清和富锦地区。在此期间，第 5 军还和松花江下游的抗联第 3、第 4、第 6、第 7 军及其它抗日武装沟通了联系。在相互协同作战中，多次挫败日伪军进攻，拔除许多敌军据点。

1937 年春，第 5 军军部和第 1、第 2 师先后集结于以刁翎游击根据地为中心的牡丹江下游地区，开展较大规模的游击战，进行了大盘道、前刁翎和依兰几次较大的战斗。1 月下旬，日军驻后刁翎步兵 300 多人，强征当地居民爬犁（亦称雪橇）200 多张，准备撤往林口。第 5 军闻讯后，决定在大盘道北面设伏，歼灭这股敌人，第 5 军伏击部队于 1 月 28 日晨 4 时进入预伏地域。13 时，当日军乘坐爬犁闯入伏击圈时，预伏部队立即开火，激战至 16 时，终将 360 余名日军消灭，缴获全部物资和武器弹药。大盘道战斗的胜利，曾使驻刁翎的日伪军一度不敢出扰。2 月 1 日，第 5 军又乘驻刁翎日伪军恐慌动摇之机，以军部和第 2 师主力夜袭前刁翎屯，歼灭伪军一个营。3 月中旬，活动在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联第 3、第 4、第 5、第 8 和第 9 军各一部，决定联合攻打依兰县城，推举周保中为总指挥。

19 日，联军各部分别进入依兰县城周围阵地。

20 日凌晨 2 时发起攻击。在城里伪军内部地下工作人员策应下，联军一部首先从城西北门突破。接着，其他各部分别从东、西、南门攻入。激战至晨 6 时许，城区大部被联军攻占。与此同时，联军另一部在新卡伦西北地域，重创了从双河镇驰援依兰的 400 多名日军。7 时，联军在向城西、城南撤退中，诱敌出击，又歼其一部。依兰战斗，共消灭日军 300 余名，伪军数十名，缴获轻机枪 10 挺，步枪 320 多支，弹药和其它军用物资一部。联军伤亡 80 余人。

1937 年 3 月，在中共吉东组织召开扩大会议并成立吉东省委的同时，第 5 军也健全了各级党组织，加强了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军设军党委，书记周保中，师设党委或工作委员会，团及军直属单位和军部各处设特支，连设支部，连以下设小组。部队思想政治工作以连队党支部为核心进行。为了筹办该军及下江地区第 3、第 8、第 9 等军的军需给养，1937 年还先后成立了牡丹江、依东和下江等办事处。吉东党组织扩大会议后，第 5 军调整了军事行动部署：军部率第 1 师以勃利、依兰、方正为中心，进出中东铁路沿线，并

恢复原绥宁游击区的工作；第2师主力继续在松花江下游依东、桦川、富锦、宝清、同江等地开展游击活动，建立后方基地，并与第4、第7军取得联系；第2师第5团，坚持原地活动，保持同第3、第6军的联系。5月，为与南满第1路军沟通联络，第5军又将配属该军的第2军第2师第5团扩编成独立旅，执行南进联络任务。随后各部按计划行动。五六月间，军直和第1、第2师先后分别在三道通江、桦树底子和土龙山等地与日伪军警激战，取得多次胜利。7月，驻宁安三道河伪森林警察大队长李文彬率部150人，击毙日本指导官后携械反正，被编成第5军警卫旅，李文彬任旅长。

抗联第4军开辟富锦、宝清新游击区，协同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刚刚编成的抗联第4军，根据中共勃利县委召开的第4军和第3军第4师联席会议精神，决定东征富锦、宝清，打破敌人的“讨伐”，开辟新的游击区。

1936年6月20日，第4军代军长李延平率军部和第7团及第3军第4师主力向富锦、宝清地区东征；第4军政治部主任黄玉清率第1团仍留勃利老区活动。李延平率部进到富锦以后，一面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一面打击日伪军和反动地主武装。经过几个月的工作和战斗，第4军在宝清、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并在宝清李金围子西南的大叶子沟沟里修建了密营和被服厂。与此同时，抗联第4军第1师一部还参加了第3军远征铁力、海伦。在近5个月中，进行大小战斗10余次，歼灭日伪军300余人。

1937年春，第4军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指示，在第3军的帮助下进行了整顿，部队数量虽未增加，但质量有了提高，为迎接新的战斗任务作了准备。

抗联第7军扩大虎（林）饶（河）游击根据地，开辟同（江）富（锦）新游击区抗联第7军成立后，曾与抗联第3、第4、第5军密切配合，积极打击敌人。

1937年3月，陈荣久军长率领150余人，在饶河县西北大顶山北部天津班进行统战工作时，被日伪军300多人包围。陈军长指挥部队英勇奋战，毙伤日军饶河参事官大穗久雄以下40余人，伪军几十人。部队虽然突出重围，但损失严重，军长陈荣久英勇牺牲。陈荣久是抗联第7军创建人之一，在扩大抗日队伍，指挥部队对日作战方面成绩显著，被誉为“魁武将军”。陈军长牺牲后，第7军在暴马顶子召开军中共代表会议，决定由崔石泉任军党委书记、代理军长。原第1、第2师合并为第1师，李学福任师长；原第5团扩编为第2师，邹其昌任师长，云鹤英任政治部主任；原第3师景乐亭仍任师长，李一平任政治部主任。会议还决定加强党的领导，在部队中反对不良倾向，开展反奸细斗争，并加强各反日山林队的工作。

第7军在军党代会后，从各方面加强工作。经过小南河各民众武装团体、山林队联席会议以后，各山林队和红枪会相继投奔或接受第7军的领导。第7军收编了数支山林队，并经过思想组织整顿，战斗力有了加强。

1937年4月下旬，崔石泉率第7军一部配合其它抗日武装共300余人，分四路攻击西林子警察署和伪军据点，缴获一批武器弹药和其它军需物资，解决了收编部队的补给问题。尔后，第7军兵分两路：一路由崔石泉率领军部和第2师及收编部队在虎饶地区活动；另一路由李学福率领第1师和第3师到同江、富锦一带游击。崔石泉率队在虎林地区活动期间，积极联合当地山林队，成立了虎饶反日游击指挥部，并收编了部分抗日武装。李学福率部进入同江、富锦之后，时而化整为零发动群众，时而化零为整打击敌人。5

月 15 日，李学福所率部队在二龙山第三牌附近与 500 余日伪军遭遇，毙敌 50 余人，并接应伪军一部反正。6 月间，该部由富锦进抵二道林子时，又与日军 900 余人遭遇。经一天激战，毙敌 150 余人后安全转移。第 7 军在当地人民群众和山林队配合下，经过几个月的连续作战，不仅打破了日伪军的“讨伐”，而且在战斗中壮大了自己，全军发展到 880 余人，扩大了虎、饶老游击区，开辟了富、同新游击区。

三、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东北抗联第 3、第 6 军编成，北满地区抗日游击战争的高涨

（一）东北抗联第 3、第 6 军编成，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1936 年 1 月下旬，会师汤原的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3 军、东北抗日同盟军第 4 军和汤原抗日游击总队以及东北民众军、救国军等各军领导人赵尚志、李延禄、夏云杰、张寿箴、谢文东、李华堂、冯治纲等，在汤原吉兴沟举行了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八一宣言”和“六三”指示信的精神，决定组织东北反日联合临时政府，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推选赵尚志为总司令，张寿箴为总政治部主任，李华堂为副总司令。会议还通过了《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军政扩大会议决议》。会后，谢文东、李华堂部与第 3 军分开活动，第 4 军于 2 月上旬返回延寿、方正地区。这次会议上成立的“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不能包括一、二、五、七军”，它实际上是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在统一指挥北满军事行动，统筹安排给养，培养和调配干部方面起了重要作用。

根据汤原吉兴沟会议精神，为贯彻“八一宣言”和军队统一建制的原则，中共领导的北满各抗日武装先后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 1936 年 8 月 1 日，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3 军为基础，正式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 3 军，军长赵尚志，政治部主任冯仲云，辖 10 个师，共 6000 人，建制如下：

第 1 师	师 长	刘海涛
	政治部主任	李熙山
第 2 师	师 长	关化新
	政治部主任	吴兴才
第 3 师	师 长	张连科
	政治部主任	吴景才
第 4 师	师 长	郝贵林
	政治部主任	
第 5 师	师 长	景永安
	政治部主任	蔡近葵
第 6 师	师 长	张光迪
	政治部主任	兰志渊（后叛变）
第 7 师	师 长	于海云（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	张 德

第 8 师 师 长 考凤林（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

第 9 师 师 长 李振远

政治部主任 雷 炎

政治保安师师 长 常有钩

东北抗日联军第 6 军 1936 年 9 月，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6 军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 6 军，夏云杰为军长，张寿箴代理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辖 7 个团。1937 年 2 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对第 6 军进行整编，任命戴鸿宾为军长，兰志渊（后叛变）为政治部主任，冯治纲为参谋长，并将 7 个团扩编成 4 个师 12 个团，建制如下：

第 1 师 师 长 马德山

政治部主任 徐光海

第 2 师 师 长 张传福（陈绍宾代）

政治部主任 张兴德

第 3 师 师 长 周云峰（后叛变）

政治部主任 周云峰（兼）

第 4 师 师 长 戴鸿宾（兼）

政治部主任 吴玉光

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成立 随着北满地区抗联第 3、第 6 军和其他抗日武装的不断壮大及游击区的不断扩展，给北满地区的党组织提出了加强统一领导的要求。为适应这一新的形势，中共珠河、汤原中心县委和第 3、第 6 军党委，于 1936 年 9 月 18 日在汤原县帽儿山北坡召开联席会议（简称珠汤联席会议）。会上讨论了政治、军事、组织等重大问题，并根据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决定，成立了中共北满临时省委，选举赵尚志、冯仲云、张寿箴等 15 人为执行委员，赵尚志为执委会主席。省委常委由 3 人组成，冯仲云任书记。会议还要求第 3、第 6 军相互配合，突破日军以宾（县）、木（兰）、通（河）、汤（原）、依（兰）5 县为中心的秋季大“讨伐”，开辟以龙江腹地为中心的新的游击区域。

（二）北满地区抗联各军抗日游击战争蓬勃发展

抗联第 3 军驰骋在松花江两岸广大地区，游击区扩展到北满 30 余县 抗联第 3 军编成后，军部率第 5、第 6、第 7、第 9 师，在松花江北岸的汤原、通河、木兰、巴彦、东兴、铁力、庆城（庆安）、绥棱、海伦、通北、龙门、奇克（逊克）、佛山（保兴）等县活动；第 1、第 2、第 3、第 8 师，活动于松花江南岸的宾县、延寿、珠河、方正、林口、苇河、五常、阿城、双城县境；第 4 师和以后成立的第 10 师，在牡丹江东北的依兰、桦川、勃利、宝清、富锦、绥滨、萝北、密山、虎林、饶河等县游击。

1936 年冬，北满日伪根据关东军《治安肃正纲要》的规定，动员伪三江省全部军事力量，进行冬季大“讨伐”，妄图聚歼该地区的抗联第 3 军和其它抗日部队。据此，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根据敌强我弱的特点，“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略战术”，“避开敌人大部队的正

面进攻，迂回到敌人防守薄弱的地区去打击敌人，开辟新的游击区域”，以粉碎敌人的企图。按照这一精神，第3军决定以主力西征小兴安岭一带的铁力、海伦、龙门，然后插入黑嫩平原，开展游击战争。第3军参加西征的部队有第1、第2、第3、第6、第9师主力和第5军第1师、第4军第1师一部。这些部队经过艰苦转战，于11月以前先后到达铁力地区。同年11月，第3军军长赵尚志又亲率一支500余人的骑兵部队（由军直部队和第1、第5师各一部混合编成），从汤原出发西征。西征部队采取声东击西战术，巧妙地摆脱了敌人，于12月间抵达铁力地区，同先期到达该地的各部会合。此时，日军已侦知第3军的意图，组织了一支近千人的“讨伐”队，乘坐马爬犁，对西征部队前堵后追。赵尚志决定率军部和第5、第6师各一部由铁力转向西北前进，把敌人引进深山，寻机歼灭之。一天，第3军部队进到通北县附近一个叫“冰趟子”的狭窄山沟，赵尚志决心利用山沟两侧的山林设伏，歼灭尾追之敌。经两日部署准备之后，日军700多人果然闯入预设阵地。第3军伏击部队立即对敌展开包围攻击，经过反复争夺，共歼灭日军300余人，其余敌人仓惶退去。冰趟子战斗后，赵尚志留下第6师一部在海伦、铁力一带坚持斗争，自己率军部和第1师一部继续北上，挺进通北、龙门。北进途中，远征部队又在龙门附近的炭窑设伏，一举歼灭日军町田少校以下21人。龙门战斗后，日军在空中用飞机追踪轰炸，在地面调步兵加紧堵截，远征部队伤亡较大。部队到达逊河附近露营时，仅剩百余人。由于过度疲劳和麻痹大意，夹遭敌人包围、袭击，又损失过半。余部在赵尚志率领下，忍饥挨饿，杀战马当食，以橡籽充饥，历尽千辛万苦，行程1000余公里，于1937年春末返回汤原后方根据地。

在第3军主力西征期间，留守汤原地区的第1、第5师和军直各一部，分头出击，策应军主力西征。军直和第1师留守部队先后袭击林口、金满沟和小道沟之日伪军，并协同第5军攻占了依兰县城。第5师一部于1936年12月1日曾攻克伪国境线上军事重镇佛山（今保兴）县城，震动了萝北和绥滨的敌人。

自1936年9月到1937年4月，抗联第3军部队驰骋北满几十县，纵横数千里，与日伪军作战100余次，毙伤俘敌1000余人，攻占城镇20多座，打破了日军以汤原等五县为中心的大“讨伐”，开辟了铁力、海伦等新游击区，为开展黑嫩平原的游击战争创造了条件。

抗联第6军转战下江各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第6军刚刚编成，便在第3军协同下，以汤原为根据地，开辟依兰、桦川、富锦新游击区。

1936年秋，根据北满临时省委第一、第二次常委会议决定，第6军主力在军长夏云杰和参谋长冯志纲率领下，从汤原出发，越过松花江，进到依兰、桦川等县开展游击活动。经过几个月艰苦征战，入冬以后，南下部队返回了汤原游击根据地。同年11月23日，第6军一部在汤原西北部活动时，遭敌袭击，军长夏云杰身负重伤，不幸牺牲。夏云杰是抗联第6军的创始人，对建立汤原抗日游击根据地，开展松花江下游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做出了重大贡献。夏云杰牺牲后，第6军于1937年2月，在集贤县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共北满临时省委的提名，决定由戴鸿宾继任军长，兰志渊任政治部主

任，并在原 7 个团的基础上，将部队扩编成 4 个师 12 个团。4 月间，又增编了第 5 师，师长刘振声，政治部主任高玉声，辖 4 个团。正当第 6 军进行扩编之时，日伪军集中 3000 余人开始了对该军的春季“讨伐”。为避免损失，第 6 军决定以师为单位向外线转移，军部及第 4 师留在汤原地区坚持斗争。各部在转移中，冲破敌军的堵截，先后取得了火龙沟、夹信子、暖泉子、葫芦信子和三道乌隆等战斗的胜利，并在桦川、富锦一带开辟了新的游击区。与此同时，留在汤原老区坚持斗争的部队，在冯志纲的率领下，取得了夜袭汤原县城的胜利。5 月 18 日夜，第 6 军留守部队在汤原抗日救国会会员的接应下，首先从汤原城东北角突入城内。尔后分三路向纵深发展：一路直插伪县公署，并阻击日军守备队的反扑；一路解除北门伪警察武装，并以部分兵力控制退路；一路打开监狱和仓库，解救被关押的同胞，获取军用物资。拂晓以前攻城部队顺利撤出，并打退了日军的反扑和尾追。此战全歼城内伪警察和伪守备队，击毙日本参事官，俘伪副县长以下数十人，缴迫击炮 3 门，轻机枪 3 挺，步枪 60 余支，救出被关押的干部和群众 70 余人。这一胜利轰动了北满，鼓舞了下江军民，沉重打击了日伪军。

第 3、第 6 军抗日游击战争的开展，巩固与扩大了北满游击根据地，使松花江沿岸 10 余县联成一片，在根据地内普遍建立了抗日救国会、妇女会、儿童团以及农民自卫武装。仅依兰、汤原两县就有抗日救国会会员 35 万人，珠河县有农民自卫队员 6000 余人，各项工作实际上都在救国会的领导之下进行。

1936 年三四月间，在汤原还召开了工、农、商、学、兵代表会议，成立了下江人民政府，使根据地建设日趋完善。

四、东北抗日联军第 8、第 9、第 10、第 11 军的建立

东北抗日联军除了上述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 7 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部队，在抗日胜利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 1936 年夏至 1937 年秋，先后加入了抗联的行列。这些抗日武装力量，尽管与中共直接领导的 7 个军不同，但他们在抗日这个根本问题上是一致的，并且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为加强这些部队的建设，中共还向这些新建的军派出了党代表（政治委员）和政治工作干部。但由于这些部队成份比较复杂，而共产党的领导和政治工作在这些部队中又比较薄弱，以致有的部队的改编只是形式和名称的改变。在胜利的形势下，他们能够同共产党站在一起打击日本侵略者；当遇到艰苦困难特别是挫折时，往往经不起考验，甚至发生怀疑、动摇，以至走向反面。

东北抗日联军第 8 军

1934 年 3 月，依兰县土龙山农民反日暴动后，以谢文东、景振卿为首组成民众救国军。同年 10 月，民众救国军失败，余部在东北人民革命军第 3 军帮助下重整队伍。1936 年 9 月，该部在抗联第 5 军党委直接指导下，改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 8 军。军长谢文东（后叛变），政治部主任刘曙华，副军长滕松柏（后叛变），参谋长于光世。部队由原来的 4 个团扩编成两个师，后来又扩成 6 个师，约 2000 人。该军编成后，在依兰、方正、延寿、勃利等地开展游击活动，配合活动于上述地区的抗联各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 9 军

1932年8月，原吉林自卫军李杜部营长李华堂在自卫军失败后，于小土城子收编地方武装组成“中国自卫军吉林混成旅第二支队”。

1934年末，该支队在日伪军“讨伐”中受到重大损失，仅剩五六十人。后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的帮助下，重新整编了队伍。

1937年1月，继抗联第8军成立之后，该支队根据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的决定，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军长李华堂（后叛变），参谋长李向阳，所属部队编成3个师，8个团，共800余人，后发展到2000余人。第9军开始在汤原汤旺河沟里一带活动，后由于日伪军的压迫而移到松花江南岸，转战于依兰、方正、勃利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

该军的前身是宋德林山林队余部汪雅臣为首的反日山林队“双龙”队。

1936年初，中共珠河中心县委将“双龙”队收编，改为东北人民革命军第8军，汪雅臣任军长，王维宇任参谋长。1936年冬，中共北满临时省委决定将该军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军长汪雅臣，政治部主任王维宇，副军长齐云禄（后叛变），辖10多个团，1000余人。该军在五常、苇河、舒兰一带活动，曾配合抗联第3军作战。

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

该军的前身是1933年6月依兰县驼腰岭金矿起义工人组成的反日山林队“明山队”，队长祁宝堂（祁致中）。

1936年5月，在人民革命军第3军和中共勃利县委的帮助下，将“明山”队正式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独立师，祁致中任师长，富振声任政治部主任，辖7个团1个游击队共400余人，后改编成3个旅9个团，约800人，主要在勃利、富锦、桦川一带活动。

1937年6月，中共北满临时省委扩大会议曾作出将该独立师扩编成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的决定，因当时缺乏领导干部而未编成。直到同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1军才在富锦正式编成，军长祁致中，政治部主任金正国，参谋长白云峰（后投敌）。辖1个师，3个旅，9个团，1500余人。第11军编成后，主要活动于依兰、桦川、富锦、集贤一带。

1936年2月到1937年7月，是东北抗日联军迅速发展也是东北抗日游击战争达到高潮的时期。到1937年秋，东北抗日联军已建成11个军，共3万余人，并开辟了东南满、吉东、北满三大游击区，游击区扩展到70余县。东北抗联在北起小兴安岭山麓，南至长白山、鸭绿江畔，西起辽河，东到乌苏里江的广大地区内，纵横驰骋，同日伪军警作战数千次，挫败和打破了敌人上百次“讨伐”，歼了大量日伪军，粉碎了日军消灭抗联、摧毁抗日游击根据地的企图，威胁着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牵制了大量侵华兵力，推动了关内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推迟了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进程，鼓舞了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等欧非国家人民反对德、意法西斯侵略与干涉的斗争。东北抗联消灭敌人的数字，据周保中当时概算，1931年到1937年期间，共歼敌103500人。日本陆军省公布的1931年到1935年期间日军伤亡是：战死4200人，伤、病者171300人。关东军头目从本庄繁到植田谦吉都曾为日军的重大“牺牲”感到“最为遗憾”。日军更为苦恼的是虽然付出了“很大牺牲，但治安没有好转”，抗日部队“日益发展活跃”，使日军日夜不得安宁。据日伪统计，1932年到1937年6年中，抗日部队共出动131423次，达21058011人次。若按年计算，1932年共出动377万多人次，1937年

则增加到 1035 万多人。再以月计算，1936 年 7 月一个月就出动 20 万人次，日军死伤达 900 余人。伪满洲国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无可奈何地承认：“根据我的观察，对于能不能预计在短期内把满洲国治安恢复到平静时期这一问题，很遗憾，我只能回答一个否字。”

东北抗日联军和抗日游击战争所以能如此迅速发展，除了国内国际等客观因素外，从主观指导上讲，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这支部队确立了为全民族的解放利益而战的思想，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因而大得民心，拥军、支军已成为广大群众的行动。连日本关东军参谋部也不得不承认：民众对抗日部队的“认识是极为良好的”，这也是“从来在讨伐上得不到效果的最大原因”。其次，执行了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不分党派，不分信仰，不分籍贯、队头，不记旧宿怨，只要抗战，大家都联合起来”的原则下，争取和团结一切抗日武装力量，共同抗日，从而推动了抗日武装和抗日游击战争的迅猛发展。第三，各地中共组织把工作重点逐步转向农村，组织、发动群众，建立各种群众抗日组织和游击根据地，给游击战争的发展提供了群众基础和后方基地。第四，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不死守一地，不打硬仗，而是采取机动灵活的游击战战略战术。诸如：避敌锋芒，击敌弱点；声东击西，内外线结合；诱敌深入，寻机制敌等等，有效地打破了优势敌人的“讨伐”，保存和发展了抗日武装力量。

五、朝鲜、日本人民支持和参加中国东北的抗日斗争

日本帝国主义是中、朝、日人民的共同敌人，在中国人民反对日本法西斯侵占中国东北的斗争中，得到了朝鲜人民和日本人民的同情和支援，许多朝鲜优秀儿女和日本革命者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一）朝鲜人民积极参加东北抗日运动，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

早在“九·一八”事变前，就有许多不堪忍受日本残暴殖民统治的朝鲜人民，纷纷渡过鸭绿江、图们江来到中国东北地区，有的就已在本国或中国东北边境参加了反日斗争。“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反对共同的敌人，在中国东北境内的朝鲜人民，纷纷参加东北的抗日群众运动和抗日游击队，与中国人民并肩战斗，共同打击敌人。在这些队伍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金日成等所创建和领导的抗日游击队。这支部队在中朝两国人民亲密团结和合作下，到处打击敌人，不断壮大自己。

1934 年至 1935 年间，他们并与日伪军进行大小战斗 1 600 多次，给予日本侵略者以沉重的打击。另据日本所发表的数字，从 1931 年 9 月到 1936 年 7 月，这支部队同日伪军作战 23928 次，毙伤日伪军警 4321 人，俘虏日伪军警 18114 人，缴获武器 3179 件。对推动中国东北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朝

伪满治安部编：《满洲国警察史》，第 321 页。

1936 年伪联华社长春电讯。

《世界历史 20·现代 5》，第 280 页。

关东军参谋部：《关于昭和十年秋季治安肃正工作概况》，1935 年 12 月。

鲜人民的反日斗争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中国东北的武装斗争中，许多朝鲜的优秀儿女用鲜血和生命支援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们在战斗中同中国兄弟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战友。这种为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而团结战斗的友情，在杨靖宇所写的一首《中韩民众联合抗日歌》中，已充分地表达出来了。这首歌词写道：

热血沸腾，杀声冲天，民族联合钟，壮夫断臂，争先恐后，共夺万年灯！
旌旗以至，势同破竹，虏焰自息影。阵容强化，战线巩固，优点早造定。联合呀！中韩民众！本赤诚，互相间。誓杀到敌人大本营！勇冲锋！

中朝两个被压迫民族在长期反对共同敌人日本侵略者的斗争中，用鲜血和生命凝成的战斗友谊是牢不可破的。中朝人民正是凭着这种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打败了共同的敌人，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二）日本人民和关东军士兵的反战活动

“九·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两个月，日本共产党就号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奋战展开斗争”。“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机关报《赤旗》，就立即揭露日本侵略计划的反动实质，并号召全党“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不要染指中国”。在日本共产党的领导下，日本工人、农民相继开展大规模的反战斗争。各阶层人民先后走上街头，集会讲演，散发传单，强烈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东北的罪行。日本无产阶级还呼吁世界无产阶级起来开展反战斗争。为了加强反战斗争，日本共产党于1932年7月成立了中央军事部，9月创办了面向士兵的机关报《士兵之友》，在军营和军舰上进行发展基层组织的活动。日本无产者、工人活动家片山潜发起的世界反战大会，于1932年8月17日至29日在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举行。来自25个国家的不同政党和劳动团体的2244名代表出席了会议。片山潜参加大会并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他历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的罪行，热情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和广大群众以游击战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在1935年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后，野坂参三和山本悬藏联名发表了《给日本共产主义者的信》，指出现在日本斗争的主要敌人是“法西斯军部”，“日本共产党当前的任务是把全体劳动人民统一起来，反对军部、反动和战争。”

在中国东北抗日战场上，许多日本士兵目睹日本法西斯的种种暴行，激起了正义感和自责心，推动着反战运动在关东军内部发展。有的拒绝将枪口对准中国人民，有的暗地援助抗日力量，有的想尽办法投奔到抗日队伍中去。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就是一个杰出的代表。为了反对日本侵略，支援中国人民，伊田助男在1933年日军肇刚村一旅对吉东马家大屯一带游击队进行“讨伐”期间，将10万发子弹用卡车运送到嘎牙河下游大肚子川沟一片隐蔽的森林里，准备送给反日游击队。由于未找到游击队，

姜念东等：《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56页。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1卷，商务印书馆，1959年中文版，第142页。

〔日〕井上清等：《日本近代史》下册，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第595页。

伊田最后遗书自尽。该遗书写道：

亲爱的中国游击队同志们：

我看到你们撒在山沟里的宣传品，知道你们是共产党的游击队。你们是爱国主义者，也是国际主义者。我很想和你们会面，同去打倒共同的敌人；但我被法西斯的恶兽包围着，走投无路。我决心自杀了。我把我运来的十万发子弹赠送贵军。它藏在北面的松林里，请你们瞄准日本法西斯军射击。我虽身死，但革命精神长存。祝神圣的共产主义事业早日成功！

关东军间岛日本辎重队

日本共产党员伊田助男

1933年3月30日

游击队员们看过这份遗书后，无不敬佩伊田助男崇高的国际主义精神，表示要狠狠打击日本侵略者。后来，这件事一直传到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上，受到与会代表的一致赞扬。

伊田助男事件轰动了日本关东军。事后，日本特务机关在肇刚村一旅进行大搜捕，并将该旅调往延吉解散，所部官兵被送到各地“矫正思想”。但是醒悟了的日本士兵，并不因为日本当局的镇压而停止反战活动，类似伊田助男的人和事仍不时出现。这些事例表明，许多日本士兵是不愿为日本法西斯卖命的。

第九章 国共两党进行全国抗战的准备

第一节 中国共产党为实现全国抗战而奋斗

一、中国共产党迎接全国抗战的思想、理论、组织和干部准备

（一）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

为适应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后的新形势，规定党在新阶段的任务，1937年3月27日至31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这是全国抗战爆发前夜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会议分析和讨论了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和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形势以及党在这个阶段的新任务。会议指出，国民党开始转变，但还没有彻底转变，党的任务是促使国民党进一步转变，并在抗日运动中发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用。会议批判了张国焘分裂党分裂红军的严重错误。通过了《关于张国焘同志的错误的决定》。决定指出，张国焘的错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退却路线与军阀主义”，“是反党反中央的路线”。还指出四方面军过去的错误，应由张国焘负最主要的责任，四方面军的干部，是中央的干部，对他们的艰苦奋斗英勇奋战，表示深切的敬意。通过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增强了全党全军的团结统一。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发表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而斗争。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和《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中央宣传部宣传大纲。一九三七年四月三日）。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指出以下主要内容：

（1）由于国内外形势的变动，由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的初步胜利，全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的目的已经实现了，中国革命形势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党的工作的中心一环，应该是抗日的民主运动的发展。（2）当日本帝国主义侵袭，民族存亡千钧一发之际，中日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国内矛盾降到了次要和服从的地位。要求全党同志在任何曲折变化的形势下，紧紧抓住这一基本矛盾，作为自己一切行动的基点。在民族矛盾是主要矛盾的前提下，中国内部的矛盾依然存在着，有时还会相当尖锐，中国共产党的原则是使这些矛盾能够得到适当的解决，要使这种解决不但不削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须使之增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力量。

（3）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就把彻底解放中华民族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中的最主要任务，并且从没有放弃在这一民族解放运动中力争自己政治领导的责任。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资产阶级存在着严重的软弱性和不彻底性。民族解放运动只有得到无产阶级的政治领导才有彻底胜利的可能。（4）新的形势要求全党同志迅速地彻底地转变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与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

（5）肃清“左”的关门主义与冒险主义，同一切投降主义与尾巴主义的倾向作斗争。

为了争取千百万群众参加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并为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精神，进一步动员全党和全国人民为巩固和平、争取民主、

实现抗战而斗争，1937年5月2日至14日，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全国代表会议（当时称为苏区代表会议），出席代表220余人。会上，张闻天致题为《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开幕词，毛泽东作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朱德、刘少奇分别作了《红军在新阶段的任务》和《争取全国民主统一与党在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的发言。

毛泽东在报告和结论中，着重全面阐述了下面两个问题：

第一，在新阶段，党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争取民主，是目前发展阶段中革命任务的中心一环。

毛泽东指出：从“一二·九”运动到国民党三中全会，是中国革命新时期的第一阶段。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后，中国革命的新时期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同第一阶段一样，第二阶段也是走上全国性对日武装抗战的过渡阶段，党在新阶段的主要任务是“‘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这样三位一体”的任务。在第一阶段的“革命基本任务是争取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以便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共产党在此阶段内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号召，经过西安事变和国民党三中全会，这一号召是基本上实现了，国内和平已经取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初步形成，争取和平的阶段已经过去，新任务是巩固和平。“我们说和平取得了，并不是说和平巩固了，相反，我们说它是不巩固的。和平实现与和平巩固是两件事。”只有国内和平，才能实行抗战。国民党政策开始有了转变，但没有实现彻底转变。要使国民党的政策彻底转变，国内和平才能得到巩固。因此，今后全党全国人民必须经过更大的努力，逼使国民党彻底改变错误政策，克服可能发生的波折，为巩固和平而斗争。

实现和平、民主、抗战三大任务，争取民主是中心环节。“目前阶段里中心和本质的东西，是民主和自由。”“对于抗日任务，民主也是新阶段中最本质的东西，为民主即是抗日。”对日抗战的政治上、军事上、经济上、教育上的国防准备，都是必需的条件，都是不可一刻延缓的。而争取政治上的民主自由，则为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抗战需要全国的和平与团结，没有民主自由，便不能巩固已经取得的和平，不能增强国内的团结。抗战需要人民的动员，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抗战的前途就会蹈袭阿比西尼亚的覆辙，就会失败。中国真正的坚实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及其任务的完成，没有民主是不行的。

要实现争取民主的任务，中国必须实行下列两方面的民主改革。第一方面，改革政治，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的制度，建立各党各派各阶级合作的民主政体。为此，要发展民主运动，要求国民党召开民主国会，选举真正的民主政府，规定民主宪法。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巩固国内和平，停止国内的武装冲突，增强国内的团结，以便举国一致抗御外敌。可能有这种情况发生，不待我们改革完毕，日本帝国主义的进攻就到来了，因此，为着随时能够抵抗日本的进攻并彻底战胜之，我们必须迅速地进行改革，并准备在抗战过程中进到彻底改革的程度。第二方面，实行言论、集会、结社的自由。没有这种自由，就不能实现政治制度的民主改革，就不能动员人民进入抗战，取得保卫祖国和收复失地的胜利。

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准备大举进攻中国，抗战是全国人民的任务。巩固和平、争取民主都是为了准备抗战和实现抗战，争取抗战的胜利，是为了使处

于次要地位的国内矛盾得到适当的解决，以便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第二，着重指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重要性。

毛泽东指出：“使无产阶级跟随资产阶级呢，还是使资产阶级跟随无产阶级呢？这个中国革命领导责任的问题，乃是革命成败的关键”。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已经证明：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资产阶级已经不能担任，只能由无产阶级来担任。并且只有充分发扬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坚持性和彻底性，才能克服资产阶级的先天的动摇性和不彻底性，而使革命不致于流产。依现实情况看来，离开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不能建立，和平民主抗战的目的就不能实现，祖国就不能保卫，统一的民主共和国就不能成功。在今天，由于以国民党为代表的资产阶级还带有很多的被动性和保守性，这种情况，加重了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责任。抗日救国的总参谋部的职务，共产党是责无旁贷和义不容辞的。

为了实现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政治领导，毛泽东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总结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提出了正确的原则：（1）要根据历史发展的行程，适时提出基本政治口号和为实现这一基本口号的具体行动口号。（2）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应该提起自己的无限积极性和忠诚，成为实现这些具体口号的模范。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民主共和国的一切任务而奋斗时，共产党员应该作到最有远见，最富于牺牲精神，最坚定，而又最能虚心体会情况，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3）在不失掉确定的政治目标的原则上，建立与同盟者的正确关系，发展和巩固这个同盟。

（4）共产党队伍的发展，思想的统一性，纪律的严格性。

毛泽东在报告中还提出：中国共产党为了担负起抗日的领导责任，必须造就大批的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的干部。

毛泽东提出：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和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1）使红军适应抗日战争的情况，应立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2）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3）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4）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

最后，毛泽东号召全党加强团结，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

会议讨论和批准了毛泽东的报告以及遵义会议以来党的政治路线，通过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目前阶段的任务》，批准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苏维埃政府改为民主政府。这样，中国革命就在事实上由国内革命战争转到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准备对日抗战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还在延安召开了党的白区代表会议。刘少奇在会上作了《关于白区的党和群众工作》的报告，主要论述了党的群众工作应当由停止内战、争取和平，转变为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并说明了党与群众的关系、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的联系以及党的工作转变等问题。会议总结了党在白区工作中的经验教训，批判了“左”倾关门主义的错误，阐述了党在白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和斗争策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以及白区代表会议，为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全国性抗日战争的兴起，作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对推动和指导陕甘宁边区、红军的抗战准备，对进一步动员和争取千百万群众加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起了巨大的作用。

（二）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矛盾论》的发表

为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胜利肩负起即将到来的领导全民族抗日战争的艰巨任务，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以后，特别重视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提高干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水平，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武装全党，克服党内的“左”倾和右倾错误，清除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影响，统一认识，以便使党能够在国共合作的复杂环境下正确地解决各种问题，引导抗日战争走向胜利。为达到这个目的，毛泽东在红军长征胜利后，利用比较稳定的时机，以极大的努力进行了理论方面的研究，先后写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等极为重要的理论著作。

1936年12月，毛泽东撰写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光辉著作，并首先在抗日红军大学进行演讲。在这篇著作中，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深刻地总结了1927年至1936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系统地批判了“左”倾机会主义那种完全不顾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规律，照抄照搬书本上的个别词句和外国经验，使中国革命几乎陷入绝境的严重错误，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革命战争中不仅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既是毛泽东对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武装斗争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中国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军事纲领。它科学地阐明了无产阶级的战争观，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提出了指导这个战争的一整套军事原则，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科学。它不仅是一部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著作，同时也是一部包含着十分丰富的唯物论辩证法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著作。它对中国共产党制定抗日战争的军事路线和军事战略有着极大的指导作用。

1937年7月和8月，毛泽东又先后撰写了《实践论》和《矛盾论》这两篇杰出的哲学著作，亲自到抗日军事政治大学进行讲授。《实践论》和《矛盾论》总结了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全面深刻地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即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彻底地批判了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明确地指出中国共产党内“左”倾冒险主义和右倾投降主义在政治、军事及组织上的错误，归根到底都是由于在思想上违背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原则。“两论”全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丰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宝库。

《实践论》和《矛盾论》极大地提高了广大共产党员和革命干部的马克

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和思想水平，增强了识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识别正确和错误路线的能力，巩固了全党在思想上的统一，为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转变，为实现全国抗战和争取抗战胜利，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

（三）加强干部队伍建设，创办学校，大量培养干部

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中国正处于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前夜，形势的发展需要大批的干部。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和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内已经涌现出大批的干部和群众领袖。但是，这对于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日战争来说，却远远不够。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瓦窑堡会议作出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中明确指出：“必须大数量的培养干部。党要有成千成万的新干部，一批又一批地送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毛泽东也及时提出：“提高老干部的程度，创造许多的新干部，这是大红军大战争面前的迫切任务。”1937年5月7日，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报告中指出：“指导伟大的革命，要有伟大的党，要有许多最好的干部”。“我们的党组织要向全国发展，要自觉地造就成万数的干部，要有几百个最好的群众领袖。这些干部和领袖懂得马克思列宁主义，有政治远见，有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能独立解决问题，在困难中不动摇，忠心耿耿地为民族、为阶级、为党而工作。”

1936年毛泽东在给抗日红军大学的指示中指出：“要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争取抗战胜利，就必须大大增加抗战力量，改变敌我力量强弱的对比，才能达到这个目的。增加抗战力量的工作和方法很多，然而其中最好最有效的方法是办学校，培养抗日干部。”据此，中国共产党除加强干部的在职教育外，付出极大精力，创办学校，培养训练干部。

1. 创办中共中央党校

1933年3月13日，中共中央于江西瑞金成立了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

1934年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开始长征，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大部分学员分配了工作，留下的学员与干部同红军大学等院校合并组成干部团（陈赓任团长，宋任穷任政委），编入中央军委第3纵队。1935年11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进抵瓦窑堡，学校恢复建制，正式定名为中共中央党校，校长董必武。1935年12月初开始招生，第一期主要是训练陕北干部，学习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第二期主要是传达学习中共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1936年2月，党校学员和部分教员随主力红军东征，学校暂停招生。5月继续招生。

1936年6月，党校迁至保安，设1个高级班和8个普通班。还增加了白区工作班和白军工作班，专门培训统战工作的干部。同年10月，党校迁到定边，同红四方面军党校合并，学校的规模有了进一步的扩大。

1937年2月，中共中央党校迁至延安。5月，罗迈（李维汉）接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学校按学员的学习重点，分别编为红四方面军干部班、老干

《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55页。

《毛泽东对抗大的指示》，《八路军军政杂志》第10卷第4期，第35页。

部班、少数民族班、白区学运干部班、抗大转学干部班等 13 个班。

至 1937 年 7 月初，中共中央党校在到达陕北的短短 1 年多时间里，克服种种困难，以战斗的姿态培养了近 1000 名学员。

2. “抗大”的建立和发展

“抗大”的前身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的中国工农红军大学。长征时，红军大学编入中共中央军委干部团随军到达陕北。1936 年 2 月，干部团部分教职学员同陕北红军干部学校合并，在陕北安定建立了新的红军干部学校。为提高红军干部特别是中高级干部的思想水平和领导艺术，中共中央决定以工农红军学校为基础，建立红军大学，定名为“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

1936 年 5 月 14 日，毛泽东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的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强调指出，应利用全面抗战开始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领导到连排基层干部，进入红军大学，并要求各部队党委必须把选送干部入学作为一项战略任务，保质保量地把优秀干部选送到学校培养训练。

1936 年 6 月 1 日，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出席大会并讲了话。毛泽东指出，创办抗日红军大学，是为准备迎接民族革命战争的到来。

“第一次大革命时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了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任务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着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毛泽东的讲话阐明了创办抗日红军大学的目的、意义，规定了抗日红军大学的教育任务。

抗日红军大学第一期招收学员 1063 人，共分三个科。一科主要为军团以上干部，二科为营、连干部，三科为班、排干部和部分红军老战士。林彪任校长，毛泽东兼任政治委员，并亲自授课。第一期学员于 1936 年 12 月底毕业，分赴红军主力部队及全国各地，担负起“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政治，实现对日抗战”的新任务。

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1937 年 1 月，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除继续培养红军干部外，又把培养革命知识青年作为“抗大”的一项重要任务。校部由保安迁至延安，林彪任校长，刘伯承任副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同时成立“抗大”教育委员会，毛泽东非常关怀“抗大”的建设和教育工作，亲自担任教育委员会主席，直接领导学校的教育与建设工作。毛泽东亲自确定了“抗大”“坚定的政治方向，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并经常和中央及军委其他领导人亲临学校演讲和授课。

“抗大”通过轮训部队干部和大量吸收从国民党区域来的青年学生入校学习，培养了大批治党治军人才。到 1937 年 7 月初，“抗大”共培训了军事、政治干部 3800 余人。另外，还举办了供给学校、卫生学校、摩托学校等，培

《群众》第 4 卷第 14 期。

1939 年 5 月 26 日，毛泽东在为抗大成立三周年而作的《被敌人反对是好事而不是坏事》一文中进一步指出：“抗大的教育方针是：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训了一批专业人才。

中国共产党通过举办学校，培养了大批军事、政治人才，为迎接全国抗战的到来，作好了干部上的初步准备。

自从瓦窑堡会议确定“为扩大与巩固共产党而斗争”的方针后，党的组织有了明显的扩大。到1937年上半年，党员已发展到4万余人。党的白区工作也有了新的发展，各地遭到破坏的领导机关陆续开始恢复和建立。

二、中国工农红军进行对日作战的直接准备

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长征后，即开始实行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红军遵照中共中央关于新形势下把国内革命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猛烈扩大红军，发展和巩固陕甘苏区，打通抗日路线的军事战略方针，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发展了根据地，扩大了红军，为直接对日作战准名了力量。

为加强红军的对日抗战准备工作，1937年3月6日，洛甫、毛泽东在《关于国内和平实现后的形势和任务的指示》中指出：“红军应利用时机加强内部政治上的与军事上的训练力量，加强党在红军中的堡垒作用。重新教育干部、使他们能够负担新形势下的新任务。严整军风纪，学习群众工作，使红军成为抗日军队中的模范。”

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中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之下，红军的任务是：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应即改组为国民革命军，并将军事的政治的文化的教育提高一步，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

在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领导下，中国工农红军抓紧加强自身建设，为实现早日直接对日作战，积极地进行了准备。

（一）大力开展政治工作，加强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

新时期的新情况、新任务和中国共产党实行的新政策，在红军部分人员中引起了一些新问题。一部分人对同国民党重新合作不理解，特别是对红军和根据地的改名以及停止土地革命等政策措施存在怀疑和抵触情绪；另有少数人产生若干松懈麻痹情绪，忘记了国共两党的阶级差别，失去了对国民党应有的警惕，以致逐步减弱了必须巩固共产党领导的观念，甚至滋长了某些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等错误思想。这两种思想情绪的存在，都不利于党和红军顺利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变。

为使红军的广大指战员认清国内和平实现后抗日的新形势，理解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自觉地为实现党和红军的伟大历史任务而奋斗，工农红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陆续发出的指示和宣传教育材料，对广大指战员进行了以统一战线的新政策为中心内容的思想教育。

在教育中，各部队根据《中央关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之意义及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宣传解释大纲》、《国民党三中全会后我们的任务》（宣传大纲）、《中央委员会告全党同志书》、《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

任务》等文件，针对一些同志所产生的疑虑，着重解决：革命根据地改名为特区，实行普选的民主制度，但特区的整个领导还在共产党手里；红军改称为国民革命军，服装改了，但本质不会改变，它仍然是在共产党绝对领导之下的为人民谋利益的军队，而且可以取得更多更好的发展我们力量的机会；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但革命根据地内已经分过的土地并不收回给地主；在新形势下，要保障中国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加强红军的政治工作，保障与巩固部队中的工农成份，保存与发扬红军固有之特长及传统，使红军成为抗日武装力量团聚的核心；在和平统一后，红军的任务更繁重，要保持高度政治警觉性，忠实于民族解放的利益，忠实于劳苦人民的利益，忠实于共产党的路线与方针。

在开展政治思想教育中，各部队采取了组织干部讨论会、开展宣传鼓动等多种形式。为使教育进一步深入，许多部队相继召开了党代表会议，分析部队的思想状况，研究并制定加强党的领导，加强时事政策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等措施，并对部队党的基层组织普遍进行了整顿，健全了党的生活，严格了组织纪律。经过以上教育和工作，红军广大指战员的思想政治觉悟有了很大提高。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领导者，红军永远是党绝对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共产党、红军和根据地政府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政治上、组织上的独立性；红军改编以后仍然必须保持和发扬长期斗争的光荣传统，成为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军队。同时，通过清除张国焘错误路线的影响，全军的团结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二）加强军事训练和文化教育，掀起群众性的练兵热潮

为使红军适合抗日战争的情况，并把红军造成抗日战争中的模范兵团，红军各部队在大力进行政治整训的同时，积极进行军事整训和开展文化教育。

1936年12月7日，红军总政治部在《关于在党的新任务面前红军政治工作的任务》（草案）中明确规定：为着保证红军完成新时期的政治军事任务，红军必须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与训练。1937年2月，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发布训令，在要求各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事、政治训练的同时，对新老战士、排连长和团以上干部的训练，分别提出了具体要求。同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在《关于红五月工作的决定》中，又对部队军事、政治训练作了进一步的要求，并拟定了推动部队训练的措施，规定：各方面军要分别举行“五卅”运动大会，进行以刺杀、投弹、实弹射击为内容的军事比赛，以演讲“目前政治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及测验政治课为内容的政治比赛，以及文化娱乐体育比赛，以全面检查、考核训练效果，为全面开展群众性的练兵运动规定了明确的方针、内容和方法。

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的指示精神，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红军各部队立即以教育训练为中心，有计划地进行军事、政治、文化的教育训练。在军事训练方面，红军各部队通过举办教导团、教导队和各种轮训班，轮训基层干部、班长及参谋人员等，提高基层干部的组织指挥能力和参谋业务工作能力。各部队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以战术、技术为主要内容的军事训练，普遍开展以射击、刺杀、投弹为主的练兵活动，并组织野外操练和演习，加强战术演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时结合军事训练，严格养成

教育，建立和健全了部队的正规生活。各部队进行了扫盲教育，使许多战士学习了语文、算术和自然常识，提高了部队的文化素质。各部队还广泛地开展了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各方面军或军分别召开运动会，活跃了部队生活，增强了指战员体质，促进了政治、军事、文化训练。

（三）发动群众，扩大红军，清剿土匪，巩固后方

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在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的同时，要求大力扩大和巩固党所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保证红军成为将来抗日政府和抗日军队中的台柱子。中共中央军委在 1936 年 12 月又提出要求，要利用一切机会扩大红军。各部队响应中央军委的号召，普遍把扩大红军作为重要工作，积极动员贫苦农民青年参加红军，陕甘宁省在半个月就扩军 700 人。到 1937 年 7 月初，在陕甘宁地区的主力红军和地方红军总数已发展到 7.4 万余人，拥有各种枪 4 万余支（挺）。

针对根据地年残存土匪活动猖獗、危害后方的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将整个陕甘宁苏区划分为 5 个区域，组织红军第 27、第 29、第 30 军和独立师各一部以及各独立团、独立营、保安队等，在广大群众的支援配合下，分区清剿残存在根据地的土匪。经过多次剿匪作战，特别是 1937 年 5 月、6 月有计划的清剿，将原有的 43 股土匪大部肃清，共消灭、打散、驱逐土匪 2100 余人，基本消除了根据地内的匪患，为巩固后方秩序，保证红军出师抗日创造了有利条件。

此外，红军各部队还进行了组织调整工作。中共中央军委对红军的编制、序列进行了初步的调整，并酝酿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方案。

中国工农红军从思想、组织和军事训练等各方面的积极准备，为实现由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早日出师抗日，提供了可靠的保证。

三、陕甘宁苏区积极创建抗日、民主模范区

（一）陕甘苏区的发展

陕甘苏区是在陕甘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基础上汇合发展而成的。1927 年大革命失败以后，根据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精神，以刘志丹、谢子长等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发动和领导了清涧起义、渭华起义、旬邑起义和武装暴动，组织游击队，创建革命根据地。到 1934 年下半年，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发动的第一次军事“围剿”，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 26 军和第 27 军，开辟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块革命根据地。

1935 年 2 月，成立了党的西北工作委员会和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陕甘边和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党组织和红军、游击队。至 6 月，粉碎了陕甘宁晋 4 省国民党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解放了安定、延长、延川、安塞、靖边、保安 6 座县城，把陕甘边和陕北两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北起长城，南至淳、耀，西接环江，东临黄河共 20 多个县的广大地区的陕甘革命根据地，拥有正规红军 5000 余人，游击队 4000 余人。

刘志丹、谢子长等领导的西北党和红军所创建的陕甘苏区，成为土地革

命战争时期南方各省红军长征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唯一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为中国革命和革命战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月，红25军长征到达陕北，与西北红军会合，组成以徐海东为军团长、刘志丹为副军团长、程子华为政治委员的红15军团。1935年10月，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到达陕北。毛泽东纠正了陕北肃反中的错误，并亲自指挥了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的军事“围剿”，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为了统一和加强中国西北各省的领导，1935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决定将原陕甘边、陕北两个苏区和新发展的苏区统一起来，划分为陕北省、陕甘省和关中、神府两个特区，统一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的领导之下，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到1937年初，陕甘宁苏区面积约1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200万。从此，陕甘宁苏区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中心根据地，也成为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

（二）改名陕甘宁边区，积极建设抗日、民主模范区

1935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所通过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和毛泽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提出了人民共和国的口号，并决定将苏维埃工农共和国改为苏维埃人民共和国。随后，于1936年8月致国民党信中，改用了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同年9月，中共中央在《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中宣布：“民主共和国在全中国建立、依据普选的国会实行召集之时，红色区域即将成为它的一个组成部分，红色区域人民将选派代表参加国会，并将在红色区域内完成同样的民主制度。”1937年2月10日，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将“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的指导。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决定，将苏维埃政策及其工作方式、方法转变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召开专门会议，具体讨论把苏维埃工农民主政府改为特区政府的问题。5月12日，西北办事处会议正式通过了《陕甘宁边区议会及行政组织纲要》和《陕甘宁边区选举条例》，确立了民主共和国的议会民主的政治制度，并开始使用“陕甘宁特区”的名称。

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国共产党于1937年5月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规定了党在新阶段的“巩固和平”、“争取民主”、“实现抗战”的三位一体的新任务，并规定在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统一的民主共和国而斗争的总任务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是：根据地改为全国的一个组成部分，实行新条件下的民主制度，重新编制保安部队，肃清汉奸和捣乱分子，造成抗日和民主的模范区；在此区域内实行必要的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的生活状况；实行必要的文化建设。对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机关报《新中华报》（该报自陕甘宁边区政府成立后成为陕甘宁边区政府机关报）为会议的开幕发表社论指出：“会议在全苏区共产党党员前面，提出了如下的紧急任务：为民主共和国而奋斗中间，苏区的党应当如何的努力建设一民主模范区于西北，如何的努力于实现苏区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文化教育的提高，如何的为建设一般的模范区而奋斗，如何的加紧锻炼我们抗日的武装力量，使之成为抗

日战争中模范的民族战斗队伍。一切这些任务，都着重的放在苏区党每一个党员肩上。这些任务的执行，概括的说，就是要全部工作的精力，目前阶段上应当放在民主运动上面，使这一民主运动和改善群众生活、抗战的准备与教育密切地联系起来。”随后，陕甘宁边区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把边区造成抗日的、民主的模范根据地，作为边区工作的总方针。从此，陕甘宁边区进入了一个建设时期。边区的建设主要是着重从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进行的。

政治方面：建立民主政治，实施普选。陕甘宁边区曾是中国政治上落后的地区之一，由于数千年封建专制主义的统治，向来缺乏民主传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边区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创造了陕甘苏区，推翻了压在他们头上的旧政权，建立起自己的新政权——苏维埃政府，实行了多方面的民主改革。民主政治的曙光，第一次照到了黄土高原这一偏僻的地区。

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不断扩大和国内阶级关系的变化，为了团结全民族共同对敌，中国共产党在特区实行了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停止没收地主的土地，恢复了抗日的地主、资本家、富农、僧侣的公民权，在特区内实施普遍的彻底的抗日民主制度。为实现这种转变并创造陕甘宁边区成为抗日的民主的模范地区，依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陕甘宁边区在1937年4月制定出了第一个选举条例，并在广泛动员的基础上，破天荒地于1937年5月开始，实行了乡、区、县人民普选运动，使各级政府民主选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奠定了抗日民主政权的群众基础。

边区的普选是根据彻底的民主原则并采取了真正的民主方式进行的：

第一，真正贯彻了普遍、直接、平等、无记名投票的选举原则。边区的选举是普遍的，边区选举条例规定，除了汉奸卖国贼、依法被剥夺公民权的罪犯外，“凡居住边区境内的人民，年满十六岁，不分阶级、党派、职业、男女、宗教民族、财产和文化程度的差别，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边区的选举是直接的，各级参议员及政府行政领导，均由选民直接选举产生。边区的选举是完全平等的，任何一个选民，都只能有一票选举权，其效力相同，同时在选举的人数比例上，没有差别。选举中男女平等，民族平等。为了使选民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进行无拘无束的选举，边区采取无记名投票的办法。在投票的方式上，边区也有许多创造，如识字多的人采取写票法，识字不多的人采用画圈法、画杠法、画点法，不识字的人则采取投豆法、燃香烙洞法；对于因路远、离不开生产岗位或年老有病而不能赴会的人，又特地采用背箱法，即由选举委员会成员背上箱子挨户送票收票。各种投票方式，都因时因地因人因习惯而异，灵活运用。由于采取了民主选举的原则，全体选民中70%以上都热烈地参加了选举运动。

第二，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各抗日政党，各抗日群众团体，可提出候选名单及竞选政纲，进行竞选活动，在不妨害选举秩序下不得加以干涉或阻止。”同时，对于那些没有参加任何党派或群众团体的人，还规定一定数量的选民的联署。在选举活动中，候选人为了争取当选，他们要向人民介绍自己的履历、工作情况和施政主张，以便于人民了解、判断。为了切实保障人民提候选人和投票的自由，边区选举条例规定：凡以威胁利诱等舞弊手段妨碍选举自由者，公民有权向司法机关

告发，将其提交法院依法惩处。选举条例还规定：一切选举费用，均由边区政府财政厅支付。这不仅从法律上，而且也从物质上切实保障了人民的自由选举权利。

第三，通过选举，认真实行了对政府工作的检查改进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更新。边区实行参议会民主制，各级参议会是各级行政区域的最高权力机关，各级行政领导由同级参议会选举产生，参议会有罢免行政领导的权力。边区参议会不仅是代表边区各党派、各阶级利益的民意机关，而且也是边区人民管理自己政治的最高权力机关。人民有权监督、检查政府的工作，提出批评和改进意见，罢免一切渎职或不称职的人员。在边区各级选举会议中，政府负责人都到会报告政府工作，有的报告还印成小册子，或公诸报端。报告要求简明具体，实事求是，既说明做了哪些工作，也要检讨存在的缺点错误及其原因，进行自我批评。政府报告工作时，选民均能倾心细听，报告以后，即展开质问、讨论、批评、建议。在这些普选运动中，蟠龙一、三乡的工作受到选民的严厉批评，延安北一区的工作报告，则得到选民的热烈称赞。另外，在各级选举会议中，一般均有提案，选民听取政府工作报告，并提出和通过许多有关优待抗属、发展经济、推行教育、改善人民生活、锄奸剿匪等提案。据统计，有2/3以上的乡的选民大会都提出并热烈地讨论了具体的提案。

陕甘宁边区普选的实施，充分体现了边区人民的民主权利。边区的政府来自人民，属于人民，由人民当家作主，而边区人民也只有在这样的政权领导下才能真正获得当家作主的权力。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建立民主政治，进一步巩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了边区各阶层的团结，充分发挥了人民抗战和参加各项建设事业的积极性，使边区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

经济方面：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陕甘宁边区是一个地广、人稀、生产落后的地区，人民生活异常贫困。土地革命时期，广大人民虽然分得了土地，生活有所改善，但在长期的战争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下，根据地经济遭到很大破坏。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陕甘宁边区才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的道路。

为了建立巩固的模范的抗日根据地，恢复和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以便积蓄力量，支持抗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边区政府和人民积极进行了恢复和发展生产的经济建设。边区政府在实行保障农民既得利益的土地政策的同时，坚决执行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适当地调整了边区内各阶级的关系和土地政策。1937年4月2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公布了关于处置回苏区豪绅地主的办法，规定：“在已分配了土地区域，地主豪绅回来，可在原区乡分配他以和农民一样多的土地和房屋。但已没收了土地不许还原，已经取消了租债，不许再索取。”“在没有分配土地的统一战线区域，地主豪绅的土地停止没收。”5月，又在政治上恢复了地主、富农、资本家、僧侣的公民权。这些规定宣布后，许多在土地革命时期离开边区的地主、富农和资本家纷纷返回边区，参加了边区的生产建设。

1937年4月，边区政府制订了恢复和发展生产、活跃商业贸易、发展交通运输的《陕甘宁特区经济建设计划草案》，提出“我们要用一切力量将特

区创造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域，使它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核心。”6月29日，又公布了《陕甘宁边区经济建设实施计划》，要求发展水利，开垦荒地，改良土地，增加粮食，发展畜牧业，培养农业干部等。

为了发展生产，边区政府采取了多方面的措施。在农业方面，鼓励大量垦荒，除发动现有农民加垦外，规定地主豪绅回家的，外籍士兵志愿在此落业的，外籍逃荒来的，皆给予足够的土地，一经垦熟，即永为所有。实行农贷，帮助农民解决耕牛、农具、种子的困难。由政府开办水利，以利农耕，改良土地。同时，发动群众组织互助社，以调剂劳动力，动员妇女、儿童参加生产，以增加生产力，奖励劳动英雄，以提高群众的劳动热忱。在畜牧业方面，从外地购入良种，以改良畜种，并加强畜病防治。在工矿业方面，废除苛捐杂税，帮助手工业恢复生产，欢迎资本家投资开发矿产。在商业方面，保护正当商人利益，并大力发展合作社运动。维修和开辟公路，发展交通，以利物资流通。同时，为适应党政军机关人员的需要，还着手建立和扩大公营经济。在财政上休养民生，最大限度地减少人民的负担，借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经济，政府根据需要与可能，仅向人民征收一定的税收和救国公粮。

1937年仅收救国公粮13000石，占全年农业实际收获的1.24%。除烟、酒、盐税外，其余一律豁免。

通过上述有力措施，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得到迅速的恢复和发展。1936年的耕地面积为8431000亩，1937年扩大到8626000亩。1936年的粮食收获1034301石，1937年增加到1116381石。1937年工矿增加30%，商店增加60%，汽车路、大车路增加90%，牛、羊数增长迅速，手工业亦大为发展。

在边区政府“休养生息”的财政政策和生产发展的号召下，人民的生活迅速得到改善，为边区进一步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经济、支援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文化教育方面：开展群众文化运动，实行国防教育。陕甘宁边区在以前文化教育事业十分落后，最明显地表现在识字的人稀少，一般的县份，识字的人还不到2%。苏区时期，由于“围剿”与反“围剿”战争频繁，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国内和平基本实现以后，中共中央对边区的文化建设和教育事业的发展十分重视，把在边区进行必要的文化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并使之与国防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成为一切为着民族革命战争、自由和解放，为着民主政治的争取和巩固而教育的群众运动。

1937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西北办事处文化教育建设委员会颁布了《关于群众的文化教育建设草案》，提出：“目前党的中心任务是争取全国一致的抗日战争和全国一致的民主政治。首先在自己直接领导的陕甘宁特区建立民主抗日的模范，他的主要工作之一是把广大的群众从文盲中解放出来，普遍的进行普及教育，使每个特区人民都有受教育的机会，扫除一切教育上的垄断和畸形发展，普及教育是目前的中心口号之一。”同时提出了实施民众教育的纲领：“（一）实施民族解放和民主政治为民众教育的中心内容。（二）在一定时期内（大约若干年）普及最低限度（规定课程标准）的教育于四十岁以下的成年和青年男女，及十四岁以下七岁以上的男女儿童。（三）动员广大的男女群众无论识字与不识字的自动的参加教育工作，从工作中创造教育干部，从学生中创造他们自己的领袖。同时需要迅速的建设大规模的程度较高的学校以训练专门替教育服务的人员。（四）实行优待小学教员，不断的提高小学教员的文化政治水平，使之成为乡村中文化教育

的支柱。（五）小学校免收学费书籍费，中等以上的学校免收学膳等费，使学生不致因生活问题妨碍学习，同时使已在社会服务的人员得已暂时抛弃谋生职业学习更高的学问。”边区政府还确定了教育方针：（一）以民族解放运动为教育的根本内容，党的主义和宗教的信条不列入普通教育科目，任个人信仰自由及在大学研究，以实现不分党派不分阶级不分宗教的统的教育。（二）消灭文盲提高大众文化政治水平是教育的中心标准。（三）取消区分劳心劳力双轨制的教育制度，一切人民不分男女、不分阶级，给予受教育的均等机会。

为了号召和推动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西北青年救国会提出了普及教育突击年的标语口号：“提高苏区青年儿童的文化水平！”“克服苏区人民的文化落后！”“实行国难教育！”“提高我们政治上、国防技术上、生产上的知识！”“提高文化水平才能了解抗日救国的道理！”“争取苏区文化成为全国的模范！”等等。

在中共中央及边区政府的直接领导和号召下，陕甘宁边区的群众文化运动迅速地开展起来。

首先是学校教育大大发展。许多干部学校培养出大批干部人才，同时增加了许多中小学校，吸收了更多的青年、儿童到学校学习。以小学教育发展为例：边区成立以前，仅有学校 120 所，1937 年春季，小学增至 320 所，学生为 5000 人；到 1937 年秋季，小学增加到 545 所，学生增加到 10396 人。

其次在社会教育方面，采取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开展群众性的扫盲运动。一切不能脱离生产的青年和成人，可以参加为他们设立的识字组、夜校、半日校和冬学等，还设立巡回补习学校到各地巡回扫盲。由于人民群众积极参加，扫盲运动发展迅猛，1937 年原定设立冬学 400 所，招收学生 6000 人，结果达到 600 所，10000 人。随着群众文化运动的开展，陕甘宁边区开始逐渐摆脱文化落后的状态。

与此同时，陕甘宁边区还在中共中央的直接领导下，进行了巩固政权的建设和军事方面的建设。

陕甘宁边区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领导抗日战争的政治中心，是红军出师抗日的出发点和总后方，通过边区政府和军民的努力建设，使边区日益成为中国抗战、团结、进步的旗帜，成为模范的抗日根据地。

第二节 国民党政府的抗战准备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的严酷现实，全国人民的爱国热情空前高涨，在全国抗日救亡运动和有识之士的推动下，国民党政府在坚持推行“攘外必先安内”既定国策的同时，迫于各方面的压力，也不得不对抗战准备进行某些筹划。但是，这些都停留在计划及口头上，绝大部分未能付诸实施。

日本侵略的步步紧逼，1935年华北危机的日益加深，严重威胁和动摇了国民党政府的统治地位。国民党及其政府的内部分化趋于明显，越来越多的人开始主张对日抗战；一些国民党将领及有识之士，“憬悟于亡国之可怕与民意之不可侮”，不满国民党政府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有的毅然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联合抗日，有的要求北上抗日，不愿参加“剿共”，“各将士皆屡求北上抗日，故无剿赤斗志”。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关字建立抗日民族统

一战线提出和全国人民要求抗日救亡、共赴国难的呼声，以及英、美开始逐渐改变其过去对日所采取的纵容态度，使国民党对日政策开始发生若干变化，初步投入一定的力量，进行一些抗战准备。但国民党政府并未放弃其“安内”政策，仍然用主要精力“剿共”。直至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被迫改弦更张，基本上停止了内战，开始筹划全国抗战，加快了抗战准备的进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以后全国抗战创造了有利条件。但这些准备很不充分，特别是由于其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严重阻碍和破坏了全民族抗战准备的进行，消耗了国力，削弱了抗日的中坚力量，加深了中华民族的灾难，在日本帝国主义加快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步伐的情况下，难以在短时期内从根本上扭转被动的局面，这无疑增加了中国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曲折性。

一、整理军务加强国防

（一）成立国防决策机构

1936年7月10日至14日，国民党在南京召开的五届二中全会上决定成立国防会议。《国防会议条例》规定：“为整理全国国防特设置国防会议，讨论国防方针及关于国防重要问题。”蒋介石任国防会议议长，会员有阎锡山、冯玉祥等32人。1937年3月，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决定成立国防委员会。《国防委员会条例》规定：“国防委员会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对于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其责任。”同时规定：“国防委员会为便利决议之执行，得直接秘密指导国民政府之军事及行政各高级机关，并督促其完成”。国防委员会设正、副主席各一人，以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副主席兼任之。国防会议和国防委员会的设立，表明了国民党政府从国防决策机构方面开始初步调整。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0，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5年版，第80页。

蒋介石1933年3月23日致何应钦、黄绍竑电。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光明日报社，1985年版，第415~416页。

《民国档案》，1985年第1期，第58页。

（二）拟定国防作战计划，确立国防区域和划分战场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的《1935年度防卫计划大纲》，在上年度国防计划大纲的基础上，进一步划分了国防区域、阵地线和兵力部署，将全国划分为三道防卫区域：第一线有察冀晋绥区、山东区、江浙区、福建区、粤桂区；第二线有察冀区、山东区、河南区、安徽区、江西区、湖南区；第三线有晋绥区、宁夏区、甘肃区、陕西区、湖北区、四川区、云南区。该年度防卫计划大纲还根据对日采取消极和积极两种不同作战态势，分为甲、乙两案，分别拟定了未来抗日作战的战略方针。《1936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又进一步将全国划分为4个大区：（1）抗战区：察、绥、冀、晋、鲁、豫、江、浙、闽、粤；（2）警备区：皖、赣、湘、桂；（3）绥靖区：付、陕、川、宁；（4）预备区：陕、川、鄂、湘、桂、赣、云、新、青、藏、康。并以军事委员会为最高统帅机关，设冀察、晋绥、山东、江浙、福建、粤桂6个国防军总指挥部，1个预备军总指挥部（由陕、甘、川、鄂、湘、赣、云、贵8省组成）。

1936年，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规定了预定战场的阵地设置。（1）北正面：甲、山东区，包括潍河阵地，鲁南阵地，鲁西阵地。乙、冀察区，包括平津张据点，沧保阵地，德石阵地。丙、河南区，包括豫北阵地，归兰阵地，汴郑阵地，巩洛阵地。丁、徐海区，包括海州阵地，运河阵地，徐州阵地，蚌埠阵地，淮阴阵地。（2）晋绥侧面：甲、山西区，包括晋东阵地，晋北阵地。乙、绥远区，包括绥东阵地，绥北阵地。（3）东正面：甲、江苏区，包括京沪阵地，南通据点，首都阵地。乙、浙江区，包括沪杭阵地，宁波阵地，温台据点。（4）南海岸：甲、福建区，包括龙延阵地，闽厦据点。乙、广东区，包括潮汕据点，雷琼据点，广惠据点。（5）警备区：甲、陕甘宁青区。乙、湘鄂赣皖区。丙、广西区。丁、滇黔区。戊、川康区。

1936年底，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又拟订《1937年度国防作战计划》，1937年3月修订完毕。

此外，1935年3月，军事委员会防空委员会也拟定了防空作战计划，准备以七·五厘米高射炮营担任南京与各战略要地的防空任务，在全国各省、市、县成立防护团及防空协会，在各省会及各重要地区设置防空情报所或分所，以构成全国防空情报监视网，并将全国划分为9个防空区：苏浙皖、河南、赣闽、晋绥、冀察、湘鄂、粤桂、陕甘、川滇黔。

（三）整建陆海空军

1. 整理陆军

30年代初，国民党政府的军队是由若干个新军阀集团的松散联盟所组成。这些新军阀集团各自拥有一支以个人为中心的私人军队，有相对固定的地盘，割据一方，自成体系，军队的编制、武器装备、教育训练各不相同。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

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79年版，第129~138页。

全国除新疆、西康、西藏外，计有 180 个师、又 94 个旅、40 余个独立团。为适应对日作战的需要，必须加以整理。同时，蒋介石也一直企图借整理军队之机，削弱地方异己力量，发展中央嫡系势力。

1935 年 1 月，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事整理会议，布置整军工作。3 月，在武昌成立陆军整理处，任命陈诚为处长，负责全国陆军的整顿和训练。1936 年国民党政府开始第 1 期整编陆军 10 个师，称为“调整师”。到年底，共整编了 20 个调整师。随后，又决定在以后 2 年各调整 20 个师，连同 1936 年度已调整的 20 个师，共 60 个师，“以作国防军之基干”。此外，还决定同期整理 60 个师，称为整理师，补充装备，使各师单位编制划一，“作为预备部队，及守护地方之用”。至 1937 年 7 月国民党政府对陆军实际调整、整理共 85 个师又 9 个独立旅，此外已适用调整编制但尚未充实的有 5 个师。

同时，国民党政府还对特种兵进行了整建。

1937 年上半年，共编装甲兵 1 个团、炮兵 4 个旅又 20 个独立团、铁道兵 1 个团、装甲汽车兵 1 个团、通讯兵 2 个团、工兵 2 个团。

迄全国抗战爆发，国民党政府陆军已整理与未整理部队共计步兵 182 个师又 46 个独立旅，骑兵 9 个师又 6 个独立旅，加上特种部队，共约 170 余万人，预定使用于第一线作战者，计步兵 80 个师又 9 个独立旅，骑兵 9 个师，炮兵 2 个旅又 16 个团。

2. 扩建空军

随着国民党政府对全国抗战筹划的开始，空军建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加强。

1934 年以前，国民党政府原有空军 8 个中队。1935 年增编了 6 个中队，1936 年又增编了 17 个中队（其中包括归顺国民党政府中央的广东空军共 10 个中队）。至 1936 年底，国民党政府空军增至 31 个中队，编成 9 个大队（即 3 个轰炸机大队，3 个驱逐机大队，2 个侦察机大队，1 个攻击机大队，共辖 26 个中队）和 5 个直属中队，此外尚有 4 个运输机队。总计全国空军共有各类飞机 600 余架。全国有飞机场 262 个，飞机修理厂 6 个（分设于南京、南昌、洛阳、广州、杭州和重庆）。至 1937 年春，中央航空学校和航空机械学校已培养飞行员、机械师各 700 余名。

1936 年与意大利合办南昌飞机制造厂。

1937 年 2 月，又与德国合资兴建萍乡中国航空器材有限公司。

1937 年 5 月，将全国划分为 6 个空军区，先后在南昌、南京成立第 3、第 1 空军区司令部。

3. 海军建设

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建设中，以海军建材最少，“为经费所限制，未能作大量之建设。”

1934 年海军部曾有 1 个为期 5 年造舰 50 艘的计划，呈送军事委员会，但未能付诸实施。至 1937 年上半年，中国海军虽有 3 个舰队，大、小舰艇 100 余艘，但总计不过 6 万吨。且各舰艇都是旧式的，威力很小，仅能在沿岸或江河一带协助陆上战斗或担任警备。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 1981 年版，第 375～376 页。

秦孝仪：《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3），台北 1981 年版，第 380 页。

（四）修筑国防工事

在全国人民的压力和爱国人士的推动下，蒋介石和国民党政府不得不对国防建设进行一些筹划。

1935年，虎门要塞改归军政部直辖，经过整理，71门火炮分别修配齐全。

1936年3月，对镇海要塞进行了调整。为增强各要塞火力，国民党政府向德国订购了一批要塞重炮，先后装置在江阴、镇江、南京、武汉各要塞。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共有南京、镇江、江阴、宁波、虎门、马尾、厦门、南通、连云港等9个要塞区整建完毕，拥有炮台41座，各种要塞炮273门。

国民党政府按照国防区域、作战计划以及战场划分构筑国防工事是从1935年开始的。当年底开始投入较多的力量从事国防工事的构筑。国防工事按其坚固程度分为三种：永久性工事系用钢筋水泥构筑而成；半永久性工事系用铁轨、枕木构筑而成；临时性工事则由简易材料临时构筑。

1936年春季前后，国防工事构筑大部展开。主要是在按敌情设想的下列地区构筑阵地：

（1）山东区：潍河、鲁南、鲁西。（2）冀察区：北平、天津、张家口、沧县、保定、德县、石家庄。（3）河南区：豫北、归德、兰封、开封、郑州、巩县、洛阳。（4）徐海区：海州、运河、徐州、蚌埠、淮阴。（5）山西区：晋东、晋北。（6）绥远区：绥东、绥北。（7）浙江区：沪杭线、宁波、温州、台州、京杭。（8）江苏区：京沪线、南通、南京。（9）福建区：龙岩、延平、福州、厦门。（10）广东区：潮州、汕头、雷州、琼州、广州、惠州。

上述战场的工事构筑，又分为若干道防线，如京沪间分为濠沪阵地、吴福阵地和锡澄阵地三道防线。至1937年上半年，江苏、浙江、山东、河南、山西、绥远、冀察各区第一期国防工事基本完成。其中规模较大的有濠沪、吴福、锡澄、乍平嘉、乍溆甬、宁镇、鲁南、豫北、豫东、沧保德石、娘子关雁门关内长城等阵地工事。

另外，武汉地区的国防工事，也于1935年夏开工，从北面的武胜关，南部的城陵矶，东至田家镇，构筑东向的武汉外围国防工事，断断续续构筑了两年之久，至1937年上半年，仍未竣工。

国民党政府修筑的国防工事和整建的要塞，大部分在不同程度上为尔后的抗战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五）实行征兵制度，推行国民军训

1935年11月，国民党“五大”通过了《请改良兵役制度，实行征兵案》和《应速行全国征兵制》案。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明令实行“兵役法”。当年底，首批征集新兵5万名入营训练。

与征兵制相关的是建立师管区。

1936年3月1日，国民党政府军政部划分全国为60个师管区、10个预备师管区，每一师管区配置一个调整师为主，一个整理师为从。

1936年，先在苏、浙、皖、赣、豫、鄂6省设立了12个师管区（各辖4个团管区）。1937年春，又在湘、鄂、赣、豫、苏、闽6省设立8个师管区，在川、黔、陕、甘、桂、滇、鲁、冀、晋、绥、宁等省设立19个师管区筹备处。师管区的基本任务是：现役兵之征集补充，各兵役召集教育，动员计划实施等。

在实行兵役法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对壮丁和学生推行了国民军训。

壮丁训练：1936年，国民党政府发布《壮丁训练实施纲要》，并予实施。同时订立《县军训教育官遴选办法》，由中央统一训练各县军训教官，分配各省任用。计第一期至第四期共训练县军训教官968人。至1936年底，壮丁训练完毕者达50余万，正在训练者约100万余人。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所谓壮丁，绝大多数是强抽和抓捕来的，难以收到应有的训练效果。

学生军训：1935年国民党政府对大、中学生全面推行集中军训制度，每期3个月，授以预备役军士和候补军官教育。首先实行学生军训的有苏、浙、皖、闽、赣、鄂、鲁、晋、冀、滇等省和京、沪、青3市，尔后逐渐推行到全国。到1936年底，全国高中及同等学校受训合格为预备役军士者有17490人，专科以上学校受训合格为候补军官者有888人。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受军训的高中学生约224000人，专科以上学生64340人。

在西安事变前，国民党整建陆空军等军事准备，在很大程度上是为“剿共”服务的。

1937年度，国民党政府拨出普通军费和国防建设专款共6.34亿元。其中空军建设费7000万元，陆军建设费约1.2亿元，海军建设费228万余元。这是自“九·一八”以来第一笔不用于内战而用于抗战的巨款。然而此时距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因此所能进行和完成的军事准备是极其有限的。

二、加强重工业和交通建设

（一）国防经济建设的筹划

1935年12月4日，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通过了《确定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大纲案》。内称：“值此国际风云，益趋险恶，设战事一旦爆发，海洋交通隔绝，外货来源阻断，举凡吾人平日衣食住行之所需，将立呈极度之恐慌。届时即无强敌之侵入，我亦将因社会经济之混乱而自行溃亡也。……应速具勇往果断之决心，采取最进步最有效之方式，迅速作适当之准备，调整原有生产组织，统制社会经济行动，使国民经济，得为有组织有计划之活动。”

该案确立了国民经济建设实施计划原则八条。并在第3条中规定：“国民经济之建设，应以整个民族为目标，在目前国际情况下，尤应审度各地交通地理之形势，凡基本工业之创办，重大工程之建筑，均须择国防后方之安全地带而设置之。”

1935年7月，蒋介石提出：“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线，以洛阳、襄樊、荆宜、常德为最后之线，而以川黔陕三省为中心，甘

滇为后方。据此，1935年资源委员会在拟定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时，提出了在湘、鄂、赣三省建立后方战略基地的设想，“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区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个主要经济中心。”

国民党政府确立配合国防的经济建设方针，对抗日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二）经济资源调查和工业建设计划

为调查研究全国各种资源状况和国内外政治、经济、军事形势，并提出相应计划，1932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成立国防设计委员会，隶属于国民党政府参谋本部。该委员会经过几年的工作，调查了全国矿产、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财政经济等方面的基本情况，并对化学工业及轻工业有关部分作了分业调查，拟定了统制计划。

1935年4月，国防设计委员会与兵工署资源司合并改称为资源委员会，隶属军事委员会。主要任务是从事资源的调查研究、开发和动员。但实际上注重进行重工业建设。

当年，资源委员会拟定了三年重工业建设计划。内容如下：

- （1）统制钨锑，同时建设钨铁厂，年产钨铁2000吨。
- （2）建设湘潭和马鞍山炼铁厂，年产30万吨。
- （3）开发宁乡和茶陵铁矿，年产30万吨。
- （4）开发大冶、阳新和彭县铜矿，同时建设炼铜厂，年产3.600吨。
- （5）开发水口山和贵县铅锌矿，年产5000吨。
- （6）开发高坑、天河、谭家山和禹县煤矿，年产150万吨。
- （7）建设煤炼油厂，同时开发延长、巴县和达县石油矿，年产2500万加仑。
- （8）建设氮气厂，年产硫酸钡5万吨，同时制造硫酸和硝酸。
- （9）建设飞机发动机厂、原动力机厂和工具机厂。
- （10）建设电机厂、电线厂、电话厂和电子管厂。

1936年度，国民党政府拨款1000万元，1937年度又拨款2000万元，作为建设重工业的经费。同时军事委员会批准统制钨锑矿出口贸易，所得盈利充作建设费用。于是，资源委员会便开始着手工业建设。在1936年至1937年上半年一年多时间内，先后设立了中央钢铁厂、茶陵铁矿、江西钨铁厂、彭县铅矿、阳新大冶铜矿、中央机器制造厂、中央电工器材厂、中央无线电电机制造厂、中央电瓷制造厂、高坑煤矿、湘潭煤矿、天河煤矿、四川油矿、灵乡铁矿、中央炼铜厂、重庆临时炼铜厂、水口山铅锌矿、云南锡矿、青海金矿及龙溪河水电厂等21家企业。同时从国防考虑，这些厂矿均分布在湖南、湖北、江西、云南、四川、青海等省。资源委员会所拟定的重工业三年建设计划中筹设的厂矿大部分已经动工兴建。这一计划的拟定以及部分实施，对中国工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47页。

经济部：《西南西北工业建设计划》（1938），重庆市档案馆藏档案。

《文史资料选辑》第15辑，中国文史出版社，第29页。

（三）交通建设

为了适应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国民党政府比较重视交通建设，取得的进展也较为显著。

1935年，国民党政府提出为流畅货运，要“尽量发展各县各省区间之道路交通、改进水陆货运，力谋货物流通之便利。”规定“交通运输之建设应使其适合经济建设及国际形势之需要，”进一步整理旧路，修筑新路，并对各主要铁路增设防空设施。国民党“五大”还通过了《请兴筑滇省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以应国防需要而辟经济泉源案》，指出：在此“中日战祸一触即发之际，沿江沿海随时有被封锁之虞。交通系国防至巨，为适应国防需要……确有及时兴筑通江通海通缅铁道之必要。”至1937年上半年，交通建设有了较大进展。

铁路：中部南北大干线粤汉路于1936年4月28日株（洲）韶（关）段通车后，全线贯通。广九线也于1937年7月中旬接轨投入使用；东西大干线陇海路的展筑工程到1937年上半年，宝鸡以东至连云港共1075公里通车；华东干线浙赣路于1936年通车至南昌，迄1937年夏，南昌至株洲段通车；西部南北干线同蒲铁路于1935年9月通车，平绥、陇海两路从此勾通；东南的苏嘉路于1936年7月通车。同时，钱塘江铁路大桥也基本建成。此外，已经建成的铁路还有杭甬铁路、淮南铁路、江南铁路等。1936年国民党政府还提出了“铁路五年计划”，拟定在5年（1936~1941）内兴建铁路8500公里，其中湘黔、贵南等铁路已开始动工兴建。至1937年上半年，中国的铁路已建13000公里。

公路：到1937年上半年，全国已有公路109500公里，其中各省联络公路有29000公里，互通公路达3万余公里；已铺路面者有43521公里，土路65979公里。建成或正在兴建的主要干线有京沪、京闽、沪桂、京鲁、京黔、京川、京陕、洛韶、汴粤、绥新、绥晋、西兰、西汉、甘新、川滇、湘黔等主要公路。

三、寻求外国援助

（一）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战略

1934年7月，蒋介石在对庐山军官训练团发表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演说中讲道：

张其昀：《中国国民党党史概要》第2册、台北1979年版，第757、762页。

罗家伦：《革命文献》，第75辑。

资料来源：张公权：《十年来中国的铁道建设》：《抗战前十年之中国》，龙田出版社，台北1980年6月印影初版，第271~27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79年版，第94~95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4~105页。

资料来源：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综合月刊社，1973年版，第296~297页；蒋纬国：《抗日御侮》第1卷，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1年版，第93~94页；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5年版，第105~106页。

“ 现在的问题，不是简单的中日问题，而是整个东亚的问题，也就是所谓太平洋的问题，日本人所争夺的整个太平洋的霸权，这就不是日本和中国两个国家的问题，而是日本和世界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中国是世界各国共同的殖民地的缘故，所以日本要求独吞中国，就先要征服世界，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也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独霸东亚。现在日本虽然具备了一切军事的条件，可以侵略中国，并且可以和任何一个强国并仗，但决没有力量可以战胜列强，可以压倒世界一切，来实现他侵略的野心。……

“ ……日本的军事准备，不是对我们中国，……他虽然天天在……侵略我们中国，但他军事上的真正目标，不是在我们中国。……他早已认定；非要把与太平洋有关系的几个强有力的国家统统征服之后，才能达到独吞中国，独霸东亚的目的。所以他现在陆军的目标是苏联，海军的目标是英美。日本为要并吞我们中国，而先须征服罗俄罗斯，吃下美国，击破英国，才能达到他的目的。这是他们早已决定的国策……我们中国军人，要明了这个国际大势，明白了现在东亚的情形，就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我们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复兴民族。 ”

蒋介石外交战略的中心思想，是依赖和依附世界大国。他为给充当大国的附庸寻找理论根据，竟不顾日本《田中奏折》所规定的“ 惟欲先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 的既定的侵略计划，并以错误的大前提，得出日本一天不能征服世界，就一天不能灭亡中国的荒谬结论，认为世界列强是不会让他们的中国殖民地为日本所独占的。因此，认为中国可以很大胆，很安心，相信一定有方法和力量，可以来抵抗日本，这明显是指依赖国际的方法和力量。因此，国民党政府外交政策的基本点是，在继续奉行对日妥协退让政策的同时，向西方寻求援助，并利用日本与欧美帝国主义列强的矛盾及在华利益的冲突，牵制日本，试图以此延缓或避免日本的全面侵华，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

（二）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1933 年夏，继热河省的沦陷，长城抗战也因得不到有力支持而最终失败，日军兵临平、津城下，国民党政府被迫签订屈辱的《塘沽协定》。此时，国民党政府仍希望以《塘沽协定》为契机，在北方，不惜以牺牲东北和华北为代价，稳住日本，停止它的南侵步伐，以拖延时日；在南方，加速“ 剿共 ” 战争，以期在短期内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同时，利用全国人民要求迅速增强国力的心理，向西方求援，以借帝国主义的经济援助，加强统治实力。于是，国民党政府宣布“ 整个国策 ” 是“ 治标莫急于剿灭赤共，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 ”，将抗日完全抛置脑后，忙于寻求欧美列强的经济援助。

为了谋求美国的经济援助，1933 年 5 月 6 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一行抵达华盛顿，于 8 日和美国总统罗斯福举行会谈。随后，宋子文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 5000 万美元的棉麦借款合同，并同意加入美元集团。国民党政府用这笔借款，购买美国急欲倾销的棉麦，实际上帮助了美国克服经济危机，打击了中国的农业生产，从中也部分解决了“ 剿共 ” 的军费。

华北事变后，英、美帝国主义对华问题态度渐趋积极，国民党政府的对外政策也开始着重于努力寻求外援，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

1936年4月7日，中国银行董事陈光甫一行抵达美国，与美国政府官员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谈判。5月中旬，“中美白银协定”正式签订，使法币与美元联系起来，从而缓解了国民党政府和美国政府在中国币制改革方面的矛盾。白银协定签订后，美国政府决定收购中国白银，并允诺提供美元外汇来稳定中国币值。这样，国民党政府便通过向美售银，换得大量的美元外汇。同时，中美经济联系的加强，扩大了美国的对华投资。1936年，美国在华投资从1934年的2.7亿美元上升到3.4亿余美元。但是，白银协定的签订，使美国通过购买白银牢牢地控制了中国的经济命脉。

国民党政府的币制改革获得了英国的支持后，继续谋求英国对华投资和贷款。

1937年春，孔祥熙率代表团以出席英王加冕典礼的名义赴英，与英国方面进行磋商。7月底至8月初，中英在伦敦达成了各项借款协定：广（州）梅（县）铁路贷款协定（300万英镑）、浦（口）襄（阳）铁路贷款协定（400万英镑）、整理内债借款协定（2000万英镑）。此外，还草签了梅（县）贵（溪）、三（水）梧（州）铁路借款协定（共800万英镑）。

国民党政府在谋求英、美提供财政援助的同时，还大量从欧洲其他国家借款。

1934年8月23日，德国代表与国民党政府达成一个贸易协定，即中国以原料换取德国的工业品。1936年4月8日，中德在柏林签署《易货协定之补充贸易合同》，德国政府将向中国提供一笔达1亿金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以此购买德国工业品或其他产品，并向德国提供农产品和矿产原料。协定签订后，国民党政府主要队德国购买武器和军用工业物资。到1936年10月，德国交付给国民党政府价值1000万马克的武器装备（包括已在运华途中、，其中有钢盔、反坦克炮弹、探照灯、海岸炮、水雷、高射炮、榴弹炮等。这样，国民党政府在外汇拮据的情况下获得了部分急需的军事工业品。

在此期间，国民党政府还与德国工业集团达成了数笔铁路信贷。其中有1934年3月与德国沃尔夫公司达成玉山—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价值800万元法市的材料贷款；1936年2月，由中国银行等与沃尔夫公司签署萍乡—南昌铁路工程协议，德方提供1000万元法市的材料贷款；1936年11月，铁道部为湘黔铁路工程和平汉路整理工程，与德国爱森钢铁公司等达成了价值为4000万元法市的材料借款。

1935年12月，国民党政府任命张嘉璈为铁道部长，利用他在西方金融、经济界的影响，与欧洲各国进行铁路投资谈判。张除与德国达成协定外，还分别与荷兰、比利时、英国、捷克、法国的一些银行达成铁路借款协定，签订的铁路借款共达31932370英镑。

1937年上半年孔祥熙访欧期间，还与一些国家达成了新的借款协定。其中有：与荷兰孟德宋公司达成中央银行信用借款1000万荷币；与瑞士银行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1000万瑞士法郎、财政部充实法币外汇准备借款5000万瑞士法郎；与法国银行团分别达成中央银行调整金融借款2亿法

郎、政府购置军用飞机信贷 1.2 亿法郎；在捷克与司各达公司达成购买机器、工业材料借款 1000 万镑。后因全国抗战爆发，成约大部未能实现。

国民党政府在外患日甚的历史条件下，加强与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联系，客观上加强了国民党政府与日本抗衡的经济实力。宋子文在谈到英国决定对华贷款时指出：虽然这些贷款不能公开用于预算项目（指直接弥补增加军费而导致的赤字），但却有助于中国当局的“预算”局势。大批外汇的获得，不仅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而且直接充实了法市的外汇保证，使统一的市制得到巩固，有利于调整战时经济。多笔铁路贷款合同的签订，加速了对国防具有重大意义的铁路建设。一批军火与国防工业设备的进口，使军队装备有了一定的改善。这些，在客观上增强了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的能力。

国民党政府多方争取外援的努力，虽然增加了对急需军用物资的购买力，暂时巩固了法币的地位，有利于抗战。但是主要方面是以维护其经济利益和政治统治为出发点的。英美等国向国民党政府提供的种种财政经济“援助”，是以强化其在华特殊利益，争夺有利投资场所和倾销商品为直接目的，往往以中国方面付出重大代价为前提。随着国民党政府与英美等国经济联系的加强，中国的财政金融进一步受到外国的控制，经济主权和利益进一步受到损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国民党政府寻求外援加强了英美帝国主义的经济渗透，使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性质更为加深。

（三）改善中苏关系

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对苏联远东地区也构成威胁。鉴于中苏在这方面的共同利害关系，1932 年 2 月 26 日，中国出席日内瓦裁军会议的代表颜惠庆，向苏联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递交信函，建议讨论中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苏联代表欣然同意。同年 12 月 12 日，颜惠庆与李维诺夫在日内瓦交换中苏复交照会，宣布中苏复交。

1934 年 3 月，蒋介石派参谋本部次长杨杰率中国军事代表团访苏，这是两国军界在复交后的首次接触。同月，颜惠庆在莫斯科向苏方表示，倘若发生日苏战争，中国将支援苏联。1934 年 9 月，苏联决定加入国联，中国给予热烈欢迎。

1934 年 10 月中旬，蒋介石派清华大学教授蒋廷黻访苏，秘密探讨建立中苏对日同盟的可能性。临行前，孔祥熙告诉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蒋介石请蒋教授协助”增进中苏关系。1934 年 10 月 16 日，蒋廷黻同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斯托莫尼雅科夫举行会晤，就中苏关系问题交换了意见。蒋向苏联保证，中国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站在日本方面来反对苏联，在一定条件下还将和苏联一起反对进犯之敌，并希望以培养相互了解和信任的方式，达成某种攻守同盟的默契，两国通过非官方性质的秘密形式，摸清了对方的态度，明确了合作的前提，并决定以外交以外的秘密商谈方式谋求一致，实现合作。

《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财政报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英）《外交与企业：1933~1937 年英国对华政策》，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1975 年版，第 170 页。

《蒋廷黻回忆录》，传记文学出版社，台北 1979 年版，第 153 页。

1935年2月，国民党政府决定派长期逗留在国内的颜惠庆回任驻苏大使，并派蒋介石的侍从秘书邓文仪任驻苏大使馆武官，以增进友谊。2月19日，又批准艺术大师梅兰芳接受苏文化协会邀请，赴苏演出。3月23日，苏联和日本、伪满签订中东铁路买卖协定。这是苏联政府无视中国主权的行为，国民党政府应向苏进行严正交涉，但为保持中苏问的关系，并没有作出强烈反对的表示。

苏联在推进中苏合作方面也起着关键的作用。由于国际法西斯势力的迅猛膨胀，希特勒德国和日本的密切勾结形成了东西方的战争策源地，直接威胁苏联的安全，苏联在改善中苏关系方面亦持积极态度。

1935年5月，随着所谓“满蒙边界纠纷”的加剧，蒋介石指示颜惠庆向苏表示，一旦日苏战争爆发，苏联将可以得到中国军队的支持。苏对此极为重视，对中苏关系置于新基础上感到高兴，并指示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寻求一切可能的方法同蒋介石合作。5月9日，鲍格莫洛夫提出加强中苏事务性联系的建议，继而又要求举行两国的商约谈判，并暗示其具有一定的政治意义。

1935年10月18日，广田三原则刚刚传到中国。19日，蒋介石就与鲍格莫洛夫进行秘密会谈。蒋介石提出，由于中苏两国受到来自同一方面的威胁，他是赞成改善中苏关系的，尽管他本人不反对签定贸易协定和互不侵犯条约，但它只是形式上的，关键在于中苏能否签订一个确实保障两国及远东和平的协定，它具有“实质性的意义。”

为了打消苏联政府的疑虑，详细说明蒋介石的意图，孔祥熙又会晤鲍格莫洛夫，说明日本人欲在华北制造一个与蒋对立的傀儡政权，故可排除蒋日合作的可能；日苏战争即将发生，中苏军事合作可以相互支援。孔进而直接了当地对苏大使称：中国政府在迫不得已进行武装抗日的时候，在海上获取任何军需物资都很困难，是否可以经由新疆从苏联获得军需物资。

10月25日，国民党政府又成立了以立法院长孙科为主席的中苏文化友好协会，进一步作出对苏友好的姿态。

1935年底，蒋介石派陈立夫偕张冲秘密取道欧洲，准备赴苏同苏联首脑“商谈对日军事同盟”，后因未能取得斯大林关于就秘密军事同盟进行交涉的允诺，遂令陈立夫“返国与苏联大使鲍格莫洛夫在京交涉。”

苏联方面鉴于蒋介石的某些诚意，于1935年12月14日指令鲍格莫洛夫，苏联同意就蒋介石所提出的协定同中国方面进行具体商讨。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想通过汪精卫寻求德国的合作，但根本得不到答复。在此情况下，只有加强对苏合作，于是，1936年10月，蒋介石特派蒋廷黻接替颜惠庆出任驻苏大使，以便进一步寻求中苏合作的方式。但是，苏联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意缔结中苏共同安全条约。按照李维诺夫的意见，苏联对中国的支持应该和西方国家对中国的支持处于同等的程度，在这方面，苏联既不应走在西方国家前面，也不要落在他们后面太远。为了贷款给中国以购买苏联的军事装备，李维诺夫表示苏联愿意与中国缔结一项互不侵犯条约。

1937年4月，立法院长孙科与鲍格莫洛夫会谈，详细讨论苏联援华方式，苏以战争贷款的方式提供军事装备，贷款利率优惠，但必须以不发动内战为

陈立夫：《抗日战争准备工作之回忆》，载（台）《近代中国》，1977年第2号，第20页。

《蒋廷黻回忆录》，（台）传记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196页。

担保。孙科告之国共和谈进展，请予宽虑。

1937年6月，苏联倡议国民党政府召集包括苏、美、英、法、日、荷等国的国际会议，起草太平洋地区性集体安全条约，如遭拒绝，苏联则准备与中国单独签订一项共同安全条约。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宠惠曾与苏大使磋商该项议案，但毫无进展。

苏联以武器贷款的军事援华方针，对国民党政府走向抗日具有促进作用。同时，中苏关系的改善，也为中国抗日战争创造了一个较为有利的国际环境。

程天放：《中俄关系史》，华盛顿1957年版，第211页
(苏)维戈斯基：《外交史》第3卷，第896页。

第十章 日本法西斯发动全面侵华战争的准备

第一节 日本法西斯体制的确立

一、“二·二六”事件与军部法西斯化

日本法西斯在 1929 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导致的社会危机中推动日本发动 1931 年的侵华战争，使日本暂时摆脱了危机。以此为契机，法西斯“军部势力”和“民间势力”互相勾结，借助战争煽动民众情绪，冲击“政党政治”，转移国内矛盾，使法西斯运动在日本全国得到广泛迅速的发展。下层法西斯团体不断制造暴力恐怖事件，频繁地策划武装政变，在社会基层煽起法西斯狂潮，扩大法西斯的影响，“自下而上”地推进法西斯化。上层法西斯分子，利用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极力庇护、纵容下层法西斯分子的活动，并直接间接地参与法西斯的阴谋策划和行动，“自上而下”地推波助澜。由于日本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在 1932 年暗杀日本首相犬养毅后，给政党政治以严重的打击，从此政党内阁结束，使新组成的斋藤内阁成为向法西斯亲军内阁过渡的桥梁。

法西斯“军部势力”在打垮政党政治势力后，军部势力内部矛盾上升。主要由军部幕僚组成的统制派，主张通过上层合法的稳健的方式，推行政治、经济方面的“改革”，逐步取消宪法、议会、党派及其他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建立天皇制军部法西斯的独裁统治。主要由少壮派军官组成的皇道派，则主张以武装政变的急进方式，打倒元老、重臣、官僚、政党、财阀等特权阶层，在“皇道精神”的指导下，建立一君万民的“皇道国家”和军部的法西斯独裁统治。由此可见，统制派与皇道派在拥戴天皇和建立军部法西斯政权上，目标完全是一致的，只是实现军部法西斯独裁的方法和手段不同。

由于军部内部矛盾逐渐激化，在军部掌有实权的以永田铁山为骨干的统制派，策划从军部中央清除皇道派，压制少壮派军官的政治活动，企图在军部的一元化统制下，建立法西斯的独裁统治。1934 年 10 月，陆军省新闻班公布了《国防之本义及其强化的提倡》的小册子，这是统制派改造国家构想的“蓝图”。

1934 年 11 月，发生了皇道派的少壮军官因策划军事政变而被捕，后因证据不足而不予起诉的士官学校事件。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捏造的事件，两派对立更为严重。

1935 年 7 月，反对天皇机关说的真崎甚三郎被罢免了教育总监职务。皇道派认为这是统制派核心人物军务局长永田铁山策划的，便散发了攻击永田铁山的秘密文件。在此影响下，皇道派相泽三郎中校，于 8 月 13 日在陆军省局长室砍死永田铁山。这次相泽事件，及以后的公审相泽的军法会议，使皇道派和统制派的对立面日趋尖锐。

1936 年 1 月，日本军部下达派遣驻东京的第 1 师开往中国东北的命令，因为第 1 师是驻防东京的两个师之一，是皇道派少壮军官的主要据点，于是出现了这次派遣是为使他们远离东京的传说。第 1 师的少壮军官，遂下定决

天皇机关说，指美浓部达吉博士依据明治宪法解释统治权属于国家，天皇应作为国家最高机关而行使统治权，否定国家统治权单属天皇的学说。

心实行早已准备好的军事政变，以建立法西斯独裁政权。

2月26日凌晨，驻东京第1师第1营和第3营的3个连，近卫第1师的1个连，共约1400余名士兵，在野中四郎上尉、安藤辉三上尉、栗原安秀中尉等21名尉级军官的策动下，占领了东京政治中心永田町一带，包围了闲院宫、高松宫、内大臣、首相、陆相、外相等官邸，枪杀了首相的秘书（误认为是冈田启介首相），杀害了内大臣斋藤实、藏相高桥是清、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枪击侍从长铃木贯太郎使其身负重伤。兵变的军官会见了陆相川岛义之，递交了《奋起宣言书》，敦促陆相向天皇转达，并提出了《希望事项》，要求将事态引导至维新方向，统一警备司令官等活动，勿使皇军互相厮杀。同时，兵变军官已准备好起事成功后的组阁名单。

“二·二六”事件发生后，皇道派头目真崎甚三郎提出，应按兵变军官的《奋起宣言书》和《希望事项》稳定局势。接着，他又与海军的皇道派加藤宽治一起拜会伏见宫，要求建立“皇族内阁”，并建议“发布昭书，赦免事件参与者”。随后，陆军军事参议官聚集在宫中，在荒木贞夫和真崎甚三郎的操纵下，拉着川岛陆相，写出承认兵变内容的《陆军大臣告示》，并通知给军官们，承认他们占领的区域是他们守备的地区，答应他们的要求，准备建立法西斯军事独裁。

26日9时，川岛陆相进皇宫向天皇宣读了兵变军官的宣言书，天皇裕仁说：不管他们以什么为借口，我不高兴，他们给民族带来了耻辱，我求你尽快镇压他们。

27日，参谋副总长杉山元接受天皇镇压叛军的主张，但他一心想避免日本军队相互残杀，所以对事件采取拖延的态度。他首先发布戒严令，任命香椎浩平中将为戒严部队司令官，并由第1师第1团的小藤上校负责东京市内的警卫，进而将叛乱部队置于第1团指挥之下，这说明陆军已承认叛军为戒严部队。

2月27日，在中国厦门的日本领事馆发表声明说：叛乱的目的是为了将当时的内阁更换成军部内阁，日军青年军官的意思是席卷全中国和准备立即对苏作战，以便使日本成为亚洲唯一的强国。

与此同时，裕仁天皇的侍从武官长本庄繁，也极力袒护叛军，他说：“其精神纯系出于忧虑君国的前途，不必深究。”裕仁则愤愤地说：“对杀戮朕之股肱老臣的残暴军官，即使在其精神方面也是难以饶恕的，因为这等于谴责朕。”并表示：“朕要亲自率领近卫师平定叛乱。”

日本海军对“二·二六”事件从一开始就持否定态度。因为遭受袭击的斋藤、冈田、铃木等高级官员是海军出身，海军方面担心建立的法西斯政权最终会导致陆军独裁。所以，海军从横须贺调联合舰队开进东京湾，让陆战队登陆担任海军省等处的警备。

2月28日下午，陆军参谋副总长杉山，从甲府和千叶县佐仓以及仙台、高崎调来配有坦克、火炮的大批部队及部分航空部队，以便从数量上压倒叛军。次日14时，全部叛军投降。

皇道派发动大规模军事政变，为统制派整肃军队提供了借口，他们认为

〔日〕祢津正志：《天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第112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374页。

〔日〕祢津正志：《无皇裕仁和他的时代》.世界知识出版社，1988年版，第112页。

叛变部队的行动，破坏了天皇制军队的基本秩序，如不加以制止，便意味着天皇制秩序的崩溃。而且叛乱的下级军官无视军方首脑竟擅自进行“革新运动”，严重损害了军部的威信，使人民谴责的锋芒转向军部本身，不利于军部政治地盘的扩大，必须严厉地镇压皇道派，确立统制派即军部中央的领导权，才能以此为交换条件，加强军部对政府的控制力。因此，“二·二六”事件后，进行了严厉的肃军活动，以处罚叛军。1936年3月4日，天皇发布紧急敕令特别成立了东京陆军军事法庭，7月5日，第1次判决对叛军的全部首领19名均判处死刑，其余70名分别判处有期徒刑。

1936年3月和7月，实行了包括对有责任者的处分在内的两次调动；8月，又实行了包括3000余人的大规模的走期人事调动。通过3次的人事调动，撤免了大批军官，基本完成了肃军工作。从此陆军中的皇道派被彻底清洗，统制派的统治权终于稳固地确立。

“二·二六”武装政变，是日本政治史上一次空前的大事变。以新陆相寺内寿一上将为核心的军部统制派充分利用这次事件，在对内严厉肃军，彻底清除皇道派势力的同时，对外展开强大政治攻势，以对付叛军的威胁为借口，全面控制政局，并将皇道派提出的要求为我所用。2月26日，军部立即宣布在第1师管区（东京市、千叶、埼玉、神奈川、山梨等县）内实行战时警备。2月27日，又对东京市区发布了日本历史上第一次戒严令，而在叛乱结束后也不予解除，一切政治性的集会结社都被完全禁止。在戒严令下的临时议会，制定了危险印刷品管理法，思想犯保护观察法等一系列法西斯的法律。从这一年起，“五一”节被禁止，陆军工厂中的工会也被取缔。法西斯军部超越政府和一切机关之上，掌握着独裁的绝对权力。

1936年5月18日，日本军部按照敕令以修改陆海军省官制附属别表的简单手续，恢复了军部大臣的现役武官制。规定陆海军大臣必须由现役中將以上，次官必须由现役少將以上军衔的军官充任，以堵塞预备役军官就任军部大臣的道路。这是对日本政治至关重要的事件。从明治时期以来，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就是军阀干预政治的最有力的武器，大正初期开始的护宪运动，经过反复斗争，才干1913年将大臣现役武官制废除，这次军部乘势收复过去失去的权势，利用军事政治压力，向广田内阁推荐寺内寿一出任陆军大臣，条件是恢复“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广田只好被迫答应。这样，法西斯军部就掌握了内阁的生死予夺大权。只要军部拒绝推荐或撤回现役陆海军大臣，内阁就不能成立，即使成立也得垮台。军部不会容忍不实行法西斯政策的内阁存在。同时，军部为了左右政府的内外政策，迫使内阁俯首听命，在军务局的军务科内，专门设立了政策班以“指导”政府。

“二·二六”事件成为日本历史上一个重大的转折点。皇道派叛乱军官所期待的法西斯主义体制和军部独裁统治的目标，都由统制派军阀实现了。统制派利用皇道派的武装政变，出来镇压叛乱，控制政权机构，确立法西斯军部的统治地位，迫使政府成为法西斯侵略战争的工具。

二、广田内阁与准战时体制

广田内阁成立前的冈田内阁（1934年7月8日至1936年3月6日），采取了许多措施推进日本扩大侵略战争的准备。

1934年12月，日本宣布废除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1935年12

月，日本宣布退出伦敦海军会议，走上无约束的发展陆海军军备的道路。在同一时期内，日本又在从国联接受的委托统治的太平洋诸群岛（马里亚纳、马绍尔和加罗林群岛），建立航空基地和储藏设备，以及为阻止外人进入各该岛的周密警戒措施。日本政府在內务省直接管辖下，实施了严格的新闻检查制度。警察对于一切公共舆论媒介机关，都采取了广泛的检查和取缔。陆军省对各类学校开展了军国主义的军事教育和训练，鼓吹振兴“皇运”，灌输武士道精神。日本与法西斯德国的勾结也在加紧进行。虽然日本政府沿着扩大侵略战争的道路快速前进着，但是，日本陆军仍感到不满足，认为冈田内阁抑制着陆军的激进政策和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发展，必须清除陆军省的稳健势力，彻底清洗内阁，才能建立全力推进侵略战争的军部独裁内阁，排除对外侵略扩张的种种障碍。皇道派发动的“二·二六”叛乱，杀害冈田内阁的主要成员，使冈田内阁不得不于10天后辞职。

1936年3月9日，在陆军宣布戒严的情况下成立新的广田弘毅内阁时，对冈田内阁的成员，除外相广田本人留下担任首相外，其余阁员一律更换。陆军方面以寺内寿一上将作为陆相的继任人选，并直接干预组阁事务。寺内寿一率领陆军省军务局骨干军官武藤章中校等人，经常前往组阁本部，代表军部对内阁成员及其政策提出强硬意见。寺内说：“新内阁对打开空前出现的时局负有重任，绝对需要气魄和实力，根本刷新内外存在的真正时弊，实行充实国防等积极有力的国策，不应该依然带有自由主义色彩，根据维持现状或消极的政策妥协退让。应该说，采取积极政策，革新国政，是全军一致的希望；妥协退让，不能收拾时局，反而会使事态发生混乱，而且会贻害将来。不符合上述宗旨的内阁果真能克服涉及内外的困难局面吗？陆军方面的根本态度是彻底更换阁僚名单，并具体指责了不该入阁和留任的人员：“——一起用牧野的女婿吉田茂担任外务大臣；——让自由主义的急先锋朝日新闻社的下村宏入阁；——让川崎卓吉这种党人占据内务大臣一职；——让小原直这种对国体明征观念持怀疑态度的人留任法制长官；——让中岛知久平这种与军需产业有关系的人入阁。”总之，陆军方面要排除任何自由主义分子，并以法西斯主义分子取代他们。直到内阁成员名单基本按照陆军的意旨大致内定的最后一瞬间，寺内寿一在另一房间与等待的军务局官员磋商半小时后，转回来就说：“尽管先前决定由政党派两名人员入阁，但军部仍然只能同意派1名入阁，否则就不行。”在军部的压力和威胁下，以广田为首的多数成员得出结论：“此时，如果凭一时感情放弃组阁，在各方面将会带来不少恶劣影响。因此应排除万难，坚决完成组阁任务。至于陆军方面的主张，有道理的采纳之，应实现的尽可能实现之。使其反对态度有所缓和是最为妥当的。”这样，在顺从军部的要求下，广田内阁终于产生：外务大臣有田八郎、陆军大臣寺内寿一、海军大臣永野修身、大藏大臣马场镒一。

广田内阁从一开始就接受陆军“庶政一新”和“建设国防国家”的要求，积极推进侵略战争的政策。新内阁用“广义国防”的口号，在政治、经济、财政、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都涂上清一色的军国主义色彩，使内阁从组织机构到施政纲领，都成为军部的傀儡。广田内阁的建立及其“广义国防”、“庶政一新”的推行，实质上标志着日本天皇制军部法西斯主义的形成。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29～230页。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30～231页。

广田内阁对财政方面的负责人，是由军部的推荐出任大藏大臣的日本劝业银行总裁马场镁一。他在就任的当天即3月9日，就发表了推进战时财政的增发公债、增加税收和降低利率等3项政策。他说：“……我认为当前的财政经济问题在于保证实现一系列重要国策，包括贯彻我国对‘满’政策，加强国防，复兴农村、渔村的经济，增强国力，巩固国家基础。因此，不但不能设想减少财政开支，相反地，还要估计到可能增加新的开支。一部分经费当然可以用发行公债的方式进行筹措；同时，也不能认为目前公债的发行已经碰壁。”马场的财政路线是，对内增发公债、增加税收，实行军事预算的膨胀；对外以侵略战争的手段，在掠夺中国东北经济资源的基础上，进一步独霸中国的资源和市场，打开财政的出路。马场说：“在许多情况下，也唯有依靠背后的军事压力，产业和贸易才能对外起作用。”马场镁一为了全力贯彻准战时经济的方针，在财政预算上首先保障军费的开支，从编制预算的程序上也打破过去的惯例，废除先由各省（中央部）会计科长和大藏省主计局长进行洽商的办法，而采取“军费未确定以前岁出就不能确定”的方针，使财政总预算完全围绕军费并以军费开支比率为转移。在广田内阁的一次“国策阁议”上，在决定的重大国策项目中，首先提出“加强国防”，并以贯彻陆军的大陆政策和海军大力扩充军备为内容。其次以广义国防的目标，制定了发展燃料、原料，统制电力，发展航空事业等国策，并动员这些工业部门为战时经济服务和建立有关的设施。马场镁一藏相对军部的预算，采取极其宽大的态度，对1937年度32亿余日元的直接军费，内阁会议仅仅用1个半小时，就在阁员们谈笑之中通过了。这完全是一个以军费为中心的“畸形预算”，马场财政宣告了日本战时财政的开始。

广田内阁为将整个国家纳入战时轨道，1936年8月25日，由陆、海军省和“革新派官僚”，拟定了自1937年起开始实施的所谓“全面革新政治”的7项政纲，内容如下：

（一）加强国防；（二）改革教育；（三）整顿中央、地方税制；（四）安定国民生活……；（五）发展生产，扩大对外贸易：（1）加强电力统制；（2）实现液体燃料、钢铁自给自足；（3）确保纤维资源；（4）奖励并统制贸易；（5）发展航空、海运事业；（6）奖励国民向海外发展；（六）制定重宴的对“满”政策——移民政策和奖励投资政策；（七）调整改进行政机构。

以上作为“七大国策”的政纲，是按照军部的要求，为准备总体战而建立高度国防化的准战时国家体制。

陆军迫不及待地敦促广田内阁加快准战时体制的建立。陆相寺内寿一认为，作为“全面革新政治”的基本问题，应首先改革中央和地方的行政机构及议会制度。他与海相永野修身协商后，由陆海军双方共同拟定出改革的方案。

1936年9月21日，陆海两相会晤广田弘毅首相，向他提出上述方案，并坚决要求从1937年度起实施。陆海军共同方案的主要内容是：对一切政治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2页。

《东京朝日新闻》1936年5月31日。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8~39页。

和行政机构，进行全面的、彻底的改革。关于中央行政机构改革：

(1) 设立集中掌握国策的机构，在内阁首相之下，设立担任有关重要国
务的调查研究、统辖、预算的控制和安排等工作机关，并设情报委员会；(2)
在内阁首相下设立管理和改革人事行政的机构；(3) 合并外务、拓务两省，
统一和加强对外政策；(4) 合并农林、商工两省，并扩大或新设掌管 贸易、
燃料、电气的机关，以便加强产业行政的合理化；(5) 将内务省神社局掌管
事项移交给文部省，以便鼓舞国民精神，增强国民体质；(6) 改组内务省和
内务行政机构，统一和加强卫生行政机关；(7) 统一铁路、航空、邮电行政
事务，统一加强有关船舶、港口的行政管理；(8) 整顿改进各省内部，调整
重复机构。对地方行政机构，在配合中央机构的改革中，适时进行整顿改革。
关于议会制度的改革：(1) 废除由议会中占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政府的政党
内阁制；(2) 制定一项政党法的法律，规定政党在议会中的活动范围；(3)
修改现行政府和议会互相对立的制度，取消议会可以通过弹劾政府之类的决
议的权力；(4) 改变贵族院的职能，在众议院内附设经济参谋部；(5) 修
改选举法，只赋予家长（户主）或服过兵役的公民以选举权。

陆海军提交内阁必须坚决实施的所谓改革方案，无论就裁并政府机构、
集中统治权力的行政改革，还是改变议会制度，废除政党内阁制，取消议会
对内阁的监督权，修改选举法等政治改革，实质上都是使政权逐步独裁化，
确立法西斯体制和准战时国家体制。

广田内阁的成立及其准战时体制的确立，为日本法西斯加快扩军备战的
步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在这个内阁之下，陆军建立‘东亚新秩序’的
计划成了日本政府的确定政策。”

日本历史学研究会：《太平洋战争史》第2卷，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第39~42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72页。

第二节 摆脱裁军会议的约束及日德的勾结

一、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

1922年2月和1930年4月，美英日法意5国先后在华盛顿及伦敦签订了《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限制和裁减海军军备的国际条约》，使日本全力发展海军的野心受到一定的遏制，引起日本对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的不满。1930年的伦敦条约，规定在1935年由各缔约国开会订制新的条约。1933年七八月间，斋藤内阁时期的海军军令部次长高桥三吉公开说：“我们打算以贯彻平等要求的决心出席会议。如果不接受我们的要求，我们就撤退回国。”

1934年10月，美英日3国代表在伦敦举行海军裁军预备会议。日本天皇裕仁就日本出席海军裁军会议，事前即对海相口授了指令，又于10月6日批准发电报给会议代表，指示“在谈判时间机尽早”宣布废除条约。日本在《给帝国代表的训令》和《帝国政府对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的方针》中指出：“倘沿用1922年在华盛顿签订的限制海军军备的条约，对我帝国国防建设甚为不利。为实现我帝国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根本方针，务须在本年度未以前，向条约成员国发出废除此条约的通知。”日本代表山本五十六按照日皇和日本政府的指令，在到达英国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说：日本再不能屈从于海军比例制的约束，在这一点上，我国政府没有任何妥协的可能性。

1934年10月，在举行伦敦会谈中，日本政府还发表了一个指导舆论的正式声明，其中说，从日本在国际联盟中的经验看来，公正的主张并不一定经常能获得国际会议的承认。由于日本已拿定主意决定废除华盛顿条约，不承认各国问的海军比例数，因此，日本代表在会议上只不过是听一下各方的陈述，弄清各国的意图。在此期间，日本政府曾煞费苦心地寻找既废除条约，又不背拨弄是非、缺乏信义污名的妙法。它不想首先提出废约，而希望各与会国共同发出废除条约的通知。为此，日本政府向法、意等有关国家建议，共同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但未得到他们的赞同。巧计不成，只有赤膊上阵。于是，12月3日，日本内阁会议通过，并于12月9日经由枢密院批准，单方面宣布废除华盛顿海军条约，原文如下：

华盛顿

国务卿考代尔·赫尔阁下

迨启者：本大使依据本国政府的训令，将以下内容通知阁下，实为荣幸：

日本国政府根据1922年2月6日在华盛顿签订的关于限制海军军备条约第23条，现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通告废除上述条约的意思，为此，该条约于1936年12月31日后应即无效。

本大使现向阁下谨表敬意。

斋藤 博

于华盛顿 1934年12月29日

12月30日，日本政府为对其单方面宣布废除华盛顿条约的行动辩解，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82页。

〔日〕阿川弘之：《山本五十六》，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52页。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年版，第83页。

又发表了外务省当局关于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通告的谈话。谈话中说：

“帝国政府在这次进行海军军缩准备谈判时，希望与有关国家合作，获得帝国国防的安全和巩固，……”

然而，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不但承认保有舰艇中最富有攻击性的舰种——帝国认为这种舰种必须完全废除，并且根据比例原则规定了大海军国之间的战斗力等级。因此，对照帝国政府的根本方针，毕竟不能承认这个条约继续存在。并且，国为受相形见绌的比例规定，伤害了我国国民的自尊心，这是永远不能使国民得到满足的原因。……

……我方认为，如果有可能，就和有关国家一起通告将该条约废除，然后再合作致力于签订新条约，这样最为适当。由此，帝国政府在此之前对有关各国说明了以上要旨，劝告他们一起通告废除，可是没有任何一国同意这一点。……

……至于进而扩张军备或有害于国际和平，这完全是帝国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自从1922年2月6日签订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以来，日本始终对这种限制不满，总是梦寐以求打破条约的限制，以便不受束缚地全力扩充海军军备。当时任外务次官的重光葵也认为：日本“废除华盛顿条约，意味着日本要同英、美第一流海军国展开军备竞赛。”但是，在日本外交当局的谈话中，无限制发展海军军备的主旨，竟变成了“帝国做梦也不会想到的事”。

在伦敦召开的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经两个多月的会谈未达成任何的协议。1935年12月7日，依据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召集的5国海军会议，正式在伦敦开会。美国代表提议，按现存比率对各种类型的舰船，从整个量上裁减两成，并讨论对火炮口径等质的限制。但日本首席代表永野修身海军上将，重申日本不赞成华盛顿条约，主张共同最高限度原则，由于日本固执必须首先决定对等问题的主张，大会于1936年1月15日，讨论了共同最高限度的原则。因为没有其他代表发言支持这个提案，日本代表便于1月16日正式宣布退出裁军会议。

1936年8月，日本五相会议决定建立足以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的强大海军。这样，限制海军军备的华盛顿条约和伦敦条约，都在1936年12月31日失效。从1937年1月起，进入了无条约的时代。当时英美日3国舰艇的总吨位是，英国100万吨，美国80万吨，日本70万吨。日本开始了不受任何条约限制的军备扩充和竞赛，以图争霸于西太平洋。

二、《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

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悍然武装侵占中国东北，引起中国人民的反抗和世界人民的谴责，国际联盟中的英、法等大国虽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但一些小国仍要求谴责日本的侵略行径。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287～288页。

《重光葵外交回忆录》，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135页。

1933年2月24日，国联大会以42票对1票的表决通过19国提案，日本遭到失败，恼羞成怒，退出国联。日本在国际上的孤立，使它感到必须寻求志同道合的同盟者，以便在实施扩大侵略的行动中，相互支持和配合，并与国际上的反对势力相抗衡。

1935年7~8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提出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任务，揭露了法西斯势力崛起的原因及其阶级本质，指出了反法西斯主义和制止侵略战争的关键，就是建立和发展广泛的反法西斯人民阵线。这对于法西斯主义国家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

当时的法西斯德国，是继日本退出国际联盟后，于1933年10月又一个退出国际联盟陷入孤立的国家。日、德两国都奉行着法西斯主义和疯狂的扩军备战政策，它们都对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不满，企图通过重新瓜分世界和对外侵略来谋求出路，都自称“穷国”，要向“富国”控制的国际秩序挑战，它们有着广泛的共同利害关系。日本指望通过和法西斯德国的勾结，在它进攻中国、苏联和英美时，得到德国的支持和帮助；德国认为它和英法及苏联冲突起来，光有意大利的援助还不够，最好在远东有一个伙伴，从东方威胁英法和牵制苏联；同时，以反共为幌子实行这种联合，也不会引起英法美的反对。

1934年3月，日本政府任命大岛浩上校为驻柏林大使馆武官。此人是原陆军大巨头大岛健一的儿子，受过德国式的教育，能讲流利的德语，对德国有着特别的亲热感，是日本陆军中首屈一指的德国通。日本陆军参谋总长以训令指示大岛，调查纳粹政权的稳定性，德国陆军的现状及发展，德苏两国间的关系等情况。从此，大岛即通过纳粹党的外交代表里宾特洛甫，与纳粹首领希特勒表示亲近。1934年12月，伦敦海军裁军预备会议结束时，里宾特洛甫曾特意请求参加会议的日本代表山本五十六，离开伦敦回国时顺路到柏林，并打算让希特勒接见他，以密切双方的关系。1935年6月，里宾特洛甫派助手哈克拜访了大岛武官，建议两国缔结反共的军事同盟。此后，日本参谋部即派情报部欧美科德国组长若松中校到德国，与大岛先后同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国防部长勃洛姆堡等进行了多次会谈。德国方面提出了缔结《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建议，若松表示了日本陆军方面的同样意图后，于1936年1月底回到东京汇报了会谈情况。

1936年日本“二·二六”事件后，法西斯的步伐进一步加快，与德国法西斯勾结的愿望更为迫切。4月，主张日德合作的有田八郎出任外相后，致电日本驻德大使武者小路：“各种情况表明，有必要在日德间建立更为密切的关系”。此时，日德之间的谈判便由陆军移到内阁，由武者小路和里宾特洛甫通过外交途径进行。7月上旬，德国向日本提出了经希特勒亲自修订的《反共产国际协定》草案文本和秘密附件。8月7日，日本广田内阁四相会议通过了《帝国外交方针》，确定在欧洲方面，以日德合作牵制苏联。该外交方针提出：“德国在对苏关系上大概和帝国有同样的利害关系。鉴于法国和苏联的特殊关系，德国在国防上和对赤化的政策上，易于和我方取得协调。由此，应采取措施，一面增进和该国的友好关系，一面根据必要，实现日、德合作。增进与波兰等国的友好关系，以牵制苏联。”由于日德法西斯双方

〔日〕阿川弘之：《山本五十六》，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224页。

〔日〕外务省：《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2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346页。

扩大侵略战争的共同需要，两国对互相加强勾结、缔结反共协定的谈判进展迅速。

1936年11月25日，日德两国于柏林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及其《附属议定书》和《秘密附属协定》。主要内容如下：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

大日本帝国政府及德国政府……为防范共产主义的破坏而共同合作，签订协定如下：

第1条 缔约国商定，就互相交换有关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进行协商，并以紧密的合作完成以上的措施。

第2条 缔约国对于国内安宁由于共产国际的破坏活动而受到威胁的第三国，应根据本协定的宗旨采取防范措施，或共同进行劝导，使其参加本协定。

第3条 本协定以日文本及德文本为正本。本协定自签订之日起实施之，有效期为5年。缔约国应在期满前的适当时期，就以后两国合作的形式取得谅解。

……

大日本帝国特命全权大使

子爵武者小路公共（印）

德国特命全权大使

约希亚姆·丰·里宾特洛甫（印）

1936年11月25日于柏林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附属议定书

……

1. 两缔约国的有关当局应在交换共产国际活动的情报、对共产国际采取揭发和防范措施方面，进行紧密合作。

2. 两缔约国的有关当局，对于在国内或国外，直接或间接为共产国际服务，或助长其破坏活动者，应在现行法律范围内，采取严厉措施。

……

（签名略）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

……

第1条 两国约定：缔约国的一方，在非因挑衅而受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攻击，或非因挑衅而受到攻击的威胁时，缔约国的另一方不得采取在效果上足以减轻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负担的一切措施。

在发生上述情况时，缔约国为了维护共同的利益，当就应该采取的措施，立即进行协商。

第2条 缔约国在本协定有效期间，未经相互同意，不得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缔结与本协定的精神相抵触的一切政治性条约。

.....

(签名略)

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文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才被同盟国拿到手的。

1936年10月25日和11月25日，以德国法西斯为枢纽，在1个月内分别和意大利、日本签订两个协定。

10月25日，德意两国在柏林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规定意大利不干预德国兼并奥地利，德国承认意大利侵占埃塞俄比亚，并在重要的国际问题上采取共同方针，形成了“柏林——罗马轴心”。11月25日，日德两国在柏林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规定双方在反苏反共的侵略行动中，取得相互的谅解和支持，从而达成东西方法西斯的勾结。因此，《反共产国际协定》的签订，是德日意法西斯在扩大侵略的道路上，实现世界性的勾结的重要一步，它标志着法西斯轴心集团的初步形成。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是反苏反共的，在协定的秘密附属协定中，更是赤裸裸地指明了这一点。心怀鬼胎的日本政府在谈判缔结协定的过程中，特别注意保守秘密，防止任何消息的泄露。当时，日本驻德国大使武者小路给日本外相的电报说：“坚信，只有上述秘密协定对德国将来的对苏政策才具有决定性作用。”11月14日，当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第2东方司司长在询问日本驻苏代办，关于日德协定的传闻是否真实时，代办回答说：“传闻不合事实，外务省责成他正式辟谣。”然而，在日德反共协定签订的当日，日本外务大臣有田八郎在枢密院会议公然宣称：“苏维埃俄国应该懂得，它所面对的是日本和德国。”这是日本政府对协定实质最有力的说明。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也是针对英法美等国的。日德法西斯在东西方的扩张侵略，必然加剧和英法美在这一地区的矛盾，直接间接地损害它们在这一地区的利益。而且争霸世界斗争的发展，最终必然要与英法美等国决一雌雄。日本驻英国大使吉田茂就道出了该协定的要害，他说：“尽管军部说防共协定只不过是反共的意识形态问题，但这完全是表面上的借口，骨子里显然是想联合德国对抗英法并进而对抗美国。”采用《反共产国际协定》的名称，也是日德法西斯的一种阴险策略。他们打着“反共产国际”的旗号，便于给英法美等国以迷惑和麻痹，有利于侵略者首先从弱处开刀，对弱小国家和民族进行侵略，逐步扩大自己的势力，避免过早地和英法美正面冲突，以便积蓄力量，进行最后的决斗。希特勒曾对齐亚诺表示，如果英国认识到德意是在“反布尔什维主义”的旗帜下结盟的，那么他深信，英国非但不会反对这种结盟，反而会“寻求同它达成协议和谅解的手段。”

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对日本法西斯来说，首先是为全面侵华战争服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文书》第352～354页。

〔苏〕·H·斯米尔诺夫、E·扎伊采夫：《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7页。

〔苏〕·H·斯米尔诺夫、E·扎伊采夫，《东京审判》，军事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第158页。

〔苏〕C·维戈兹基等：《外交史》第3卷下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885～886页。

〔日〕猪木正道：《吉田茂传》下册，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第244页。

马尔康姆·莫格里奇约：《齐亚诺外交文件》，1948年伦敦版，第43～48页。

务的。从 1931 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的内政、外交主要是围绕着侵略中国、变中国为独占殖民地的总目标而展开的，这一点在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中，已作出明确的规定。日本侵略者周密地计划着使外交配合军事侵略以及牵制第三国的策略，它“希望借这个协定加强日本在对华交涉中的地位。”同时，也“是为了想把苏联牵制在西方，至少在几年内得到稳定的环境。”这就清楚地说明，日本是把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当作它全面侵华战争的外交保护伞。在该协定缔结仅仅半年之后，日本的全面侵华战争就发动了。这也是对签约意图和协定本质最有力的证明。

以日德反共产国际协定签订形成的日德意法西斯集团的勾结，使他们沆瀣一气，在东西方扩大侵略的胆子更壮。加之英法美等国继续以本身的安全有保障的幻觉来安慰自己，不但不制止法西斯的侵略，反而实行绥靖怂恿政策，这就使东西方新战争的危险急剧增长。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58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 ，朝云新闻社，1983 年增印，第 100 页。

第三节 制订全面侵华战争计划

一、早期的侵华作战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在国防方针中，虽然也提出以俄国（苏联）和美国为首要的假想敌国，中国为第二位的假想敌国，但是按照对象强弱的程度，预定的侵略步骤却是先中国后苏美。因此，在确定用兵计划时，始终把中国作为首先的侵略目标，拟定其侵华作战计划。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中国东北3省后，陆军当局进一步研究和制订全面侵华的作战计划。由于只出动少数部队就兵不血刃地侵吞了东北，进一步增长了日本对中国抵抗力的轻视。因此，其作战计划的基本点，是要乘中国国民党政府对内全力进行内战，对外推行妥协、退让的不抵抗政策，不可能出现全国抵抗侵略的有利时机，以“保护”日本权益和侨民等借口，出动少数兵力，“尽速”占领华北、华中和华南的“必要”地区，迫使中国国民党政府屈服投降，变中国为日本的独占殖民地。

1934年，日本陆军中央部制订了1935年度侵华作战计划，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对华北方面作战

在平津地方作战时，第7集团军（以中国驻屯军、关东军的1个旅以及由日本国内及朝鲜派来的3个师为基干）占领北平及天津附近要地。

在山东方面作战时，第8集团军（以两个师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山东半岛及海州附近登陆，占领青岛、济南、海州附近要地。

根据情况，可合并第7、第8集团军为1个方面军。

2. 对华中方面作战

第9集团军（以3个师为基干），与海军协同，在上海附近长江下游地区登陆，占领上海附近地区。

根据情况，可由华北方面沿平汉铁路南下，策应沿长江向汉口方面作战。

3. 对华南方面作战

以1个师的兵力，主力占领福州，一部占领厦门，必要时占领汕头。

以上对华作战总兵力，为3个集团军共9个师。

1936年度日本侵华作战计划，大体沿袭了1935年度的计划，不同之处，只是取消了深入腹地的汉口作战。

二、《帝国国防方针》和《用兵纲领》的修改

1936年，日本国内的法西斯统治已经形成，准战时体制已经建立，在国际摆脱了裁军条约的限制，加强了和法西斯德国的勾结，对中国的侵略进一步得手。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独霸东亚和称雄世界的侵略计划，即“以迅速巧妙之手段使中国本部归我支配，以日满华三国为基本范围实行自给经济，以武力对付苏联陆上及英美海上之武力，切实掩护我东亚联盟地区，进而寻求制服敌人之方策，开拓战胜之途径。”日本陆海军中央部经过近半年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朝云新闻社，1985年增印，第101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 1，朝云新闻社，1969年增印，第379页。

的研讨和协商，于5月对《帝国国防方针》进行了第3次修改。

日本新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于5月1日修订完毕，6月3日经裕仁天皇批准，其要点如下：

帝国国防方针

（一）帝国国防的根本意义在于，根据建国以来天皇的宏图，经常以大义为根本，倍加发扬国威，保证增进国家的利益和人民的幸福。

（二）帝国的国防方针在于，根据帝国国防的本义，充实国力，特别是军备，使之名副其实地成为稳定东亚的势力，同时付之以相应的外交活动，以确保国家的发展，一旦有事，制敌机先，迅速达到战争的目的。

而且鉴于帝国国情，竭力增强作战初期的威力尤为重要。另外，将来的战争很可能要长期化，因此必须有能够经受住这种战争的认识和准备。

（三）帝国国防鉴于其本义，应以与我发生冲突的可能性较大，并且拥有强大国力特别是军备的美国和俄国为目标，同时防备中国和英国。为此，帝国国防所需兵力，必须足以控制东亚大陆及西太平洋，满足帝国国防方针的要求。

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

（一）帝国军队的作战基本要领是：

根据国防方针，陆海军协同行动，采取先发制人的攻势，谋求速战速决。

为此，陆海军应迅速摧毁敌野战军及敌主力舰队，同时占领所需疆域。

此外，随着作战的进展或鉴于外交上的需要，可以必要的兵力占领政略上的要地。

陆海军共同担任国内防御，在不违背上述作战的基本要领的范围内实行之。

对马海峡的海上交通线由陆海军协同，经常确实防御之。

（二）以俄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

（三）以美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

（四）以中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如下：

初期的目标是，占领华北要地和上海附近，保护帝国权益和日本侨民。

为此，陆军在击溃华北方面之敌，占领京津地区的同时，应协同海军攻占青岛，并占领上海附近。

海军在协同陆军攻占青岛的同时，协同陆军占领上海附近并控制扬子江流域。

（五）以英国为敌时，其作战要领……

（六）以便、美、中、英四国中两国以上为敌对，基本援用第二条至第五条，根据情况对这几个国家尽可能逐次作战。

（七）参谋总长、军令部总长，应根据本纲领起草各项作战计划，经相互反复协商后，奏请天皇裁可。

日本修改后的《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的用兵纲领》，露骨地反

〔日〕服部卓四郎：《大东亚战争全史》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第260~262页。

映了日本的世界战略的侵略性和疯狂性。它公然宣称要实现天皇的宏图，发扬帝国的国威，以先发制人、速战速决的战略，逐次向中、苏、英、美进攻，消灭其陆海军主力，占领其疆域，控制东亚大陆和西太平洋，最后称霸世界。

三、《国策基准》的制定

日本陆海军中央部在完成《帝国国防方针》和《帝国军队用兵纲领》的修改后，展开新的政治攻势，促使议会通过适应扩大对外侵略的基本国策。

日本陆海军对外侵略的方针，历来存在着分歧。陆军主张以陆为主、以海为辅的北进方针，海军则主张确保大陆、发展南方的南进方针。因此，陆海军分别拟定国策纲要的提案，双方分歧很大。海军坚持“北守南进”的方针，对陆军的方针无论如何也不同意。为解决战争指导方面的分歧，日本陆军参谋部进行了改编，在第1部内设置了主管战争指导和判断形势的第2科，专门研究国防国策，调整陆海军之间的意见。

1936年6月30日，日本陆军参谋部作出《国防国策大纲》最后方案。它是一个包括军事、外交、财政等各方面的广泛的国防政策的纲领，其中陆海军在方针方面也达成一致协议，将“北守南进”改为“南北并进”。

1936年8月7日，日本在首相、外相、陆相、海相、藏相参加的五相会议上，通过了《国策基准》，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国家大政的根本，在于根据大义名分，内则巩固国家基础，外求发展国运，……帝国鉴于内外的形势，认为帝国当前应该确立的根本国策，在于外交和国防互相配合，一方面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的地位，另一方面向南方海洋发展，基准的大纲如下：

(1) 排除列强在东亚的霸道政策，……具体体现皇道精神，……

(2) ……确保帝国在名义上和实质上成为东亚安定势力的地位，应充实必要的国防军备。

(3) 对大陆的基本政策，在于希求满洲国的健全发展，日满国防的巩固，消除北方苏联的威胁，同时防范英、美，具体实现日、满、华三国的紧密合作，……

(4) 对南方海洋，特别是对外南洋方面，努力促进我国民族的经济的发展，一面避免刺激他国，一面以渐进的和平手段扩张我国势力，……

2. 以上述根本国策为轴心，统一调整内外各项政策，力求适应现在的形势而实现刷新国政。其纲要如下：

(1) 扩充国防军备

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于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

海军军备，应配备和充实兵力，足以对抗美国海军，确保西太平洋制海权。

(2) 我国外交政策，总的说来，应以不折不扣地完成根本国策为基本精神，加以综合地革新，……

3. 政治行政机构的革新改善、财政经济政策的确立以及其他各种设施的运用，都必须和上述根本国策相适应，关于下列事项，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1) 指导和统一国内舆论，使在打破非常局面上能够巩固国民的决心。

《国策基准》又称《基本国策纲要》、《国策大纲》。

- (2)对行政机构和经济组织应进行适当的改革。
- (4) 为航空及海运事业的飞跃前进，应采取适当的措施。
- (5) 加速制定国防和产业所需重要资源、原料的自给自足计划。.....

上述《国策基准》，是日本政府第一次明确制定的向大陆和海洋同时扩张的全面侵略计划。它具体地规定了侵吞中国、进犯苏联、待机南进的战略方案。它首次把北进和南进两个方面并列为国策，妄图独占东亚大陆，控制西、南太平洋，争霸世界。《基准》强调以整備国防为主要手段，推行法西斯的内政和经济政策，并以积极的外交相配合，以实现其战略计划。这一侵略性的《国策基准》，一直成为日本政府在亚洲和太平洋扩大侵略所遵循的方针。在以后的年代里，日本政府始终按照这一基准行动。

四、1937 年度侵华作战计划

1936 年，日本陆海军中央部照例于 9 月末前制定第 2 年度的作战计划（年度是从本年 4 月起至翌年 3 月止），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准备日趋完善。日本感到自从实行侵吞华北的计划以来，和英美等国的矛盾进一步加深。

1935 年 12 月 5 日，英国外相贺尔表示，英国对华北情势“密切注视”。次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声明对“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但是，他们对日本的军火贸易继续在进行。苏联明确谴责法西斯国家在东西方的侵略，但为了自身利益，亦尽量避免激化矛盾，并于 1935 年 3 月将中东铁路非法卖给日本。国际联盟也仍在推行着怂恿侵略的绥靖政策。同时，日本看到，意大利自 1935 年 10 月侵入阿比西尼亚后，于 1936 年 6 月即将其吞并。德国于 1935 年 3 月宣布重新发展军备，建立 50 万军队，1936 年 3 月撕毁凡尔赛和约和罗迦诺公约，悍然进兵莱茵非军事区，并于 7 月与意大利开始了干涉西班牙的武装侵略。德意法西斯国家在西方的侵略行动，使日本法西斯的侵略野心受到鼓舞，它急欲在中国扩大侵略战争。9 月 3 日，恰巧在中国广州北海日商丸一药房的中野顺三被杀，系何国人所为尚属疑问，日本海陆军中央部却借机向中国发难，其出兵计划如下：

海军军令部《时局处理方针》

1. 国家需要定下对华惩罚的决心。
 2. GF（联合舰队）立即从佐世保方面开始行动。
 3. 促进对华作战准备。
 4. 促进现在进行的对华交涉，并适时要求其限期答复。
 5. 根据中国方面对上项采取的态度，可对河北、山东及青岛进行保障占领。根据情况也可对海南岛进行保障占领。
 6. 对华作战要极力限定于局部，且准备持久战。
- 因此，在华中、华南的侨民，要相机使之撤退，但上海可就地保护。

〔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15）》下卷，1969 年再版本，《文书》第 344～345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 年增印，第 92 页。

陆军参谋部《对华时局的对策》

1. 对华中、华南方面，按目前形势，不以陆军行使实力。
2. 为预防因抗日行为波及华北而爆发不祥事件，看时机先派 1 个师去满洲，在锦州附近待机。
3. 在华北，万一发生……中国驻屯军应坚决奋力给以惩罚。此时将给中国驻屯军增加上述待机的 1 个师和关东军司令官所辖部队的一部，有关指挥问题另定。

在以上场合，军队的行动应神速机敏，在最短时间内给以闪电般打击，以最小限度的要求，就地解决问题。

4. 其余的关东军作好对苏作战准备，以求万全。

以上陆军参谋部《对华时局的对策》中，虽主张先侵占华北，但是陆军省主张选择中国的要害地区上海、南京大举进攻。至于外交如何配合，9 月 26 日，日本陆、海、外 3 省局长会谈，设计了由外交导致行使武力的三部曲：“1. 促使蒋介石回京，进行外交谈判；2. 如蒋介石拖延回京，则以最后通牒强迫之；3. 如仍不回京，则采取行使实力之手段。”与此同时，日本海军省部又作出了杀气腾腾的“对华处理方针备忘录”，内容如下：

1. 国家迅速确立惩罚中国之决心，尤应促使陆军速与海军采取同一步调。
2. 做好对华作战各种准备，并依靠已下令增派兵力之威慑力量，促进外交交涉。
3. 蒋介石不回京，或南京政府对我最后要求事项不表诚意时，海陆军应分别进行必要的兵力配备（对华作战）。
4. 在接受我最后要求情况下：
 - （1）固守上海（海陆军协同）。
 - （2）对青岛进行保障占领（海陆军协同）。
 - （3）封锁华中、华南之要地（海军兵力）。
 - （4）轰炸华中、华南之航空基地及主要军事设施（海军兵力）。
 - （5）陆军向华北出兵。

日本的一个侨民，不知何故被何人所杀，日本政府和军部却掀起轩然大波，决心向中国政府兴师问罪。日本法西斯政府明目张胆地以最后通牒的形式，勒令一个主权国家接受其无理的要求，如遭拒绝就以全面战争相威胁。竟然要以“神速机敏”的行动，给中国“闪电般打击”，占领华北、华中、华南的青岛、上海、南京、海南岛等各要地，并对华中、华南实施海上封锁和空中轰炸，一举灭亡中国。

这就是侵略成性的日本法西斯政府和军部，利令智昏跃跃欲试的真实写照。

1936 年下半年，日本没有实现这一侵华计划，只是因为侵略者想选择更为有利的时机而已。

日本 1937 年度的侵华计划，是在 1936 年就准备付诸实施的计划上修改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 年增印，第 91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 1 ，朝云新闻社，1969 年增印，第 92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 1 ，朝云新闻社，1969 年增印，第 419～420 页。

而成的。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如下：

“当以中国为敌时，依下列要领进行作战。根据华北、华中以及华南地区形势，以击溃必要方面的敌人，并占领各要地为目的。为此陆军应协同海军击溃必要地区之敌，并占领各要地。海军消灭敌舰队，并控制中国沿海以及扬子江水域，协助陆军占领必要之要地。”“因此，决定在对华北作战时，除过去的两个集团军（5个师）外，根据情况再增加3个师，必要时还可能在华北5省进行作战。”“对华中方面原来计划以第9集团军（3个师）占领上海附近，但是这方面的中国军队增加了兵力，构筑了坚固的阵地线，考虑到作战规模将会因此而扩大时，限定在这一狭小地区，对我战略态势显然不利，因此，计划调新编第10集团军（2个师）从杭州湾登陆，从太湖南面前进，两集团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占领和确保包括上海、杭州、南京在内的三角地带。”“对华南的作战计划，同去年度一样，计划大致用1个师的兵力。如此，按去年度计划充作对华作战的兵力为9个师，而昭和12（1937）年度增加到14个师。”日本海军方面认为，限定局部作战可能是不现实的，“必所作出全面战争的计划。海军用兵不能固定在一个地方，它富于机动性，所以一开始就是准备去全中国所需要的地方，用必要的兵力，迅速达到目的。”

为了贯彻1937年度侵华作战计划，便于侵华日军各兵团制定具体作战方案，日本陆军参谋部又发出《昭和十二年度帝国陆军作战计划要领》，训令规定如下：

1. 日本陆军在华北方面作战的作战要领，大体规定如下：

（1）河北方面军（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属下部队以外，还包括关东军司令官及朝鲜军司令官派遣的部队，以及从国内派来的部队），以主力沿平汉铁路地区作战，击溃河北省南部方面之敌，并占领黄河以北的各要地。此时，可根据需要以一部自津浦铁路方面协助山东方面作战军作战，也可根据情况，向山西及绥东方面进行作战。

（2）山东方面作战军，在青岛或其它地点登陆击溃敌人，并占领山东省各要地。

2. 帝国陆军在华北作战时，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之任务如下：

作战初期要以原有的属下部队确保天津、北平、张家口，可能的话包括济南等各要地，为在华北方面的陆军初期作战创造有利条件，尔后的任务随机而确定。

3. 于上述场合作战初期之中国驻屯军作战地域是，独石口以东满华国境以南的地域，至于和山东方面作战军的分界线临时决定。”

日本帝国主义历来是把中国作为首先要侵吞的假想敌国，照例编制年度对华作战的计划，而且对作战方针、原则与入侵战略方向，以及作战兵力的编成和部署，军事与外交如何配合等等，谋划得愈来愈具体和周密。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2～104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9～140页。

第四节 扩充军备，加强部署，频繁演练

一、增加军费

日本为了扩大侵略，把增加军费、扩军备战作为历届内阁的重要任务。从1931年12月“非常时期财政”的高桥(是清)的财政，到1936年“二·二六”事件以后的准战时财政的马场(镒一)的财政和结城(丰太郎)的财政，各届大藏大臣都实行军事预算膨胀的政策，使军费的增加逐年直线上升，财政经费迅速膨胀。财政经费的膨胀，主要是因为军费增加。如所谓的“九·一八事变费”，从1931年至1936年，累计达10.7亿日元。这项费用的大部分是以陆海军省费的名目支出的。又如“军备改善费”，从1933年至1936年，陆军方面是4.95亿日元，海军方面是8.37亿日元，两者共计13.32亿日元。如以陆海军两省省出的合计为军费，同一般会计岁出总额对比，则可明显看出军费比率逐年提高，详见下表：

军费的增长

(单位：亿日元)

年度	岁出总额	军费	比率
1933	22.5	8.73	38.8%
1934	21.6	9.41	43.5%
1935	22.1	10.32	46.7%
1936	22.8	10.78	47.3%

从1933年至1936年的4年间，日本内阁拨出的直接军费即近40亿日元。实际上军费不只限于陆海军省费，大藏省拨付的军事公债利息总额，递信省的勋章和养老金，内务省的征兵费等，虽属于其他省但仍归于军费的项目还很多，所以军费的绝对数和比率要远高于上述数字。

1936年3月9日上台的广田内阁，更是实行空前的军费膨胀政策，“国策阁议”优先讨论陆海军的“国防”发展计划，完全支持军方的要求。于是陆海军陆续提出自己庞大的军备计划，如陆军的第1次计划：扩充航空、防空设备，第1年度经费约6亿日元，经常费约3亿日元；扩充关东军的兵力，第1年度经费约6亿日元，经常费1.5亿日元。第2次计划：改善日本国内的军备，经费约3亿日元；整備作战资材，经费约1亿余日元。上述经费约20余亿日元，要求自1937年起继续5年至10年，海军也提出了以建造主力舰及扩充航空部队为中心的庞大经费计划。为执行上述扩充军备计划，1937年度军费预算总额达到32.7亿日元之多，军费的比重大大增长，仅直接军事费，就超过了岁出总额的69%。

日本政府推行军费膨胀政策，军费连年大幅度增加，使年度财政赤字随着连年增长。为了弥补预算的亏空，一方面修改税制、增加税收，仅在1937年预算中即增税6亿日元。但这同庞大支出相比，仍不能解决根本问题。因此，日本政府只有从增发大量公债中寻找出路。从1932~1936年，日本每年发行的公债，都在10亿日元以上，5年间，公债发行总额达71亿日元，年

度末公债的余额，从 70 亿日元增加到 105 亿日元。

军费膨胀和增加税收加重了日本国民的沉重负担，而公债发行的增长又加剧了通货膨胀，使国民的生活进一步降低，这些都加深了日本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的矛盾。

二、扩充军队

陆海军是日本对外侵略的主要工具，对其扩充和加强历来受到重视。特别是日本在 1935 年 1 月退出裁军会议后，更以全力发展陆海军，扩充军备，增强实力，力争与世界列强匹敌。到 1936 年初，日本陆军常备兵力从 1930 年初的 25 万人增至 40 万人。

1936 年 6 月 3 日，日本在改定的《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中，确定陆军的扩充军备计划为陆军 50 个师，航空兵 142 个中队。根据上述计划，陆军省于 11 月 26 日制定陆军军备充实计划大纲，其主要内容是：

1. 战时兵力

到昭和 17（1942）年度，大约配备 40 个师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航空兵约 140 个中队及与之相应的各部队。

2. 平时兵力

到昭和 17（1942）年度，大约在满洲配备 10 个师，国内及朝鲜配备 17 个师及与之相应的部队。航空兵 140 个中队及与之相应的部队。同时增加补充、动员、教育、补给、卫生等各项设施。

3. 作战物资的整備

伴随昭和 12（1937）年度至 17（1942）年度之间，增加战时兵力，改善编制装备，对其所需作战物资要大部配齐。

为了上下一致全力贯彻军备充实计划大纲，1936 年 12 月，日本陆军中央部召集各集团军和师的参谋长等人，密示该大纲的精神。“象这种内容属于军事机密，并且在预算尚未决定之前就向下传达的事，这是以前完全没有过的事例。所以这样作，是因为圆满实现这一划时期的充实军备，还需要军民的一致协力，所以事先告诉大家，作为指导舆论的参考。”这种无先例的作法表明日本陆军中央部对加速扩充军备，掀动全面战争升级按钮的迫切心情。

日本海军对扩充军备的劲头，较之日本陆军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退出裁军会议后，已无任何的国际约束，海军即在造舰方面与美国展开竞赛。1936 年 6 月《帝国国防方针》及《用兵纲领》确定海军的扩充军备计划是，海军主力舰 12 艘，航空母舰 12 艘，巡洋舰 28 艘，水雷战队 6 队（驱逐舰 96 艘），潜水战队若干（潜水舰 70 艘），航空兵 65 个队。日本海军连续进行了 3 次海军军备补充计划。第 1 次是从 1931 年起至 1936 年的“01 计划”；在第

日本不设独立的空军，航空兵分属于陆海军。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决书》，群众出版社，1986 年版，第 69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朝云新闻社，1983 年增印，第 96～97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 1，朝云新闻社，1983 年增印，第 97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 1，朝云新闻社，1969 年增印，第 395 页。

1次补充计划过程中，又进行了第2次的1934年至1937年的“02计划”；第3次是1937年至1942年的“03计划”。列入第3次军备补充计划所建造的军舰，有世界最大的战列舰“大和”号和“武藏”号，以及13艘潜水舰。“大和”号战列舰长256米，宽36.9米，吃水10.4米，排水量69100吨，装有460毫米主炮9门。按照“02计划”到1937年，日本海军的总吨位与美国海军总吨位的比例，已远远超过华盛顿条约规定的64%，达到80%的最高状态。

日本陆海军经过大力扩充，到1937年7月初，其总兵力及配置如下：

陆 军

1. 关东军：第1、第2、第4、第12师，独立混成第1、第11旅，独立第1~第5守备队，骑兵集团（第1、第4旅），骑兵第3旅，独立炮兵3个团，关东军飞行集团（飞行第10、第11、第12、第15、第16团）、铁道第3团，汽车第1、第2团，电信第3团等。

2. 朝鲜军：第19、第20师。

3. 中国驻屯军：驻屯步兵旅，炮兵团等。

4. 台湾军：第1、第2团，炮兵团。

5. 日本国内：近卫、第3、第5、第6、第7、第8、第9、第10、第11、第14、第16师，共11个师。

6. 航空兵团：第1飞行旅（驻日本国内）、第2飞行旅（驻朝鲜）、第3飞行旅（驻台湾）

海 军

军舰：战列舰9艘，巡洋舰33艘，驱逐舰97艘，潜水舰55艘，航空母舰6艘，合计199艘、77.1万吨。

舰队：联合舰队（第1、第2舰队）、第3舰队、练习舰队。担任对华作战的为第3舰队，司令部驻上海，所辖第10、第11战队及第5水雷队分别活动于中国沿海及长江。另外还有第27驱逐舰队驻旅顺港，第5驱逐舰队驻马公港。

海军航空兵：共37个中队，基地航空兵飞机512架，舰载航空兵飞机173架，共计飞机685架

三、掠夺和储备战略物资

日本是岛国、小国，战略物资贫乏，石油、铁矿石、棉花等工业原料，全部或绝大部分依赖从海外进口，在非铁金属中，铝、镍、钴、镁的全部，铜、锡、铬、锰的大部分原料都依靠进口。日本侵占中国东北后，在鞍山、本溪、沈阳、抚顺，安东（今丹东）、营口、旅大、吉林、牡丹江等地，开办采矿、钢铁、制铝等企业，对东北的铁、煤、铝、镁等资源，进行强盗式的开采掠夺。从1932~1936年，日本平均每年从东北掠夺的铁和钢，分别约

〔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88年版，第101~103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96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09~110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陆军航空军备和运用》1，朝云新闻社，1971年版，第472页。

占其总产量的 50%和 10%。

日本帝国主义为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进而争霸世界，加速各种战略原料的进口和物资储备。

1936 年，用于进口贸易的金额，较 1935 年增长约 10 亿日元。从 1932 年至 1936 年，铁矿石进口增长 2.5 倍，废铁进口增长 1.5 倍，铜进口增长 26.5 倍，石油和煤的进口各增长近 1 倍。日本的大部分战略原料是从美国进口，由 1932 年开始，日本每年从美国进口的原料，占其总进口额的比例是：废钢铁 90%，钢铁半成品 45%，铅 45%，铜 90%，铝 18%，石油及石油产品 45%。美国的战略原料出口，大大帮助了日本以扩张侵略为目标的军事工业的发展。

日本战略物资大部依赖海外进口，这就决定了日本战争经济的脆弱性。随着军事工业的迅速膨胀，所需战略物资与日俱增，缺额越来越大。截至 1937 年，日本主要战略物资对海外依赖程度如下表：

日本主要战略物资的对海外依赖程度及进口地
(百分比)

日本主要战略物资的对海外依赖程度及进口地____
(百分比)

物资名称	对海外依赖程度	物资进口地					
		朝鲜	台湾	南洋	中国东北	小计	其他地区
石油	82				0.91	0.91	99.09
煤炭	10	9.90	3.73		43.68	57.31	42.67
铁矿石	89	8.81			7.18	15.99	83.97
废钢铁	72		1.15		1.80	2.95	97.05
生铁	33	12.00			19.00	31.00	69.00

〔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解放军出版社，1984 年版，第 103 页。

〔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对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 年版，第 9 页。

续表

物资名称	对海外依赖程度	物资进口地					
		朝鲜	台湾	南洋	中国东北	小计	其他地区
铝矾土	100						100
菱镁矿石	100				99.30	99.30	0.70
棉花	100	0.96				0.96	99.03
羊毛	100				0.18	0.18	99.82
纸浆	68						100
生橡胶	100						100
磷矿石	100			9.31		9.31	90.69
硫酸铵	25	20.13			34.31	54.44	45.55
盐	75		5.58		31.72	37.30	62.66
大豆	75	21.04	1.01		77.95	100	
小麦	30	3.28			6.39	9.67	90.30
玉米	76					26	74
大米	15	60.45	37.66			98.11	1.87
糖	88		80.28	4.00		84.28	15.67
机床	46					54	46

由于坦克、飞机等新的技术兵器大规模使用于战场，以致钢铁、石油、各种非铁金属以及橡胶和各种化工原料等，在战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显著，成为扩大武器装备生产和维持军队作战必不可少的重要物质基础。日本帝国主义为扩充军备，实现对外侵略的战略计划，从其本国战略资源贫乏的情况出发，差不多每次发动向外侵略的战争，都把攫取重要战略地区和战略资源作为其首要的目标。从“九·一八”鲸吞中国东北的资源，到蚕食中国华北的资源，从谋划制造各种挑衅事件，到不宣而战肢解中国的领土，都反映着日本帝国主义的贪婪本性——通过侵略战争夺掠资源，再通过侵吞的资源扩充军备和扩大侵略战争。

四、加紧工业的军事化和武器装备生产

在 20 世纪 30 年代初期，日本的经济实力与其侵略世界的野心相比，是很不适应的。作为军事工业基础的重工业，在工业中所占比例仅为 38%，其中冶金业和机器制造业的产值，总共不过占工业总产值的 20%，而且工业技术落后，许多机器制造部门，如机床和重型机器制造业等部门几乎没有发展，郑铝业等还是空白，汽车工业和飞机制造业才刚刚生产。因此，实行工业军事化、经济军事化，就成为日本统治阶级准备扩大侵略战争和摆脱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必由之路。这样既可转移国内人民的视线，又可使垄断资本家大发横财。

为了实现经济的军事化，1936 年日本设立专门研究机关“日满财政经济研究会”，首先对扩充重要产业等进行研究。

1937年5月，日本设立企划厅（以后又改为企划院），作为国家战争经济的参谋部，就各项产业、资源适应扩大侵略战争需要，进行通盘的谋划。

为推动政府加快经济军事化和军事工业的扩充，日本陆军参谋部于1936年7月23日和29日，先后向陆军省提出“为战备迫切期待开发产业”、“备战计划方针”两项计划，强烈要求于1941年前完成。1936年底，参谋部又拟定出“重要产业五年计划”。1937年5月29日，陆军省根据参谋部的计划，向日本政府提出了《重要产业五年计划纲要》，其主要内容如下：

第一、方针

大致以昭和16年（1941年）为期，有计划地发展各项重要产业。……由此取得国力的飞跃发展，亦可确立安定东亚的实力。

第二、要点

1. 本计划以昭和12年度至昭和16年度的5年为第1期，先严密选定国防上重要产业的种类及指标，予以统制，促其实现。……根据第1次5年计划的进展，亦拟订第2次5年计划。

2. 发展重要的国防工业，是以帝国为主体，因地制宜地根据日满一体化原则进行安排的。由于考虑到国防上的必要性，尽力使必要的产业在大陆得到发展，……选定最为必要的资源，通过日中提携，努力在华北进行开发。

3. 本计划实施中应避免对帝国现在的资本主义经济机构作急剧的变革，但对于金融、财政、物价、贸易、对外结账、运输、配给、劳务及非重要的国民生产消费等统制上，应先发制人，讲究必要的对策，以求本计划的综合顺利进展。

4. 发展重要产业，须综合技术、资本及原料等各方面，……分出轻重缓急的程度，首先选择重要和急需的产业，促其实现。第1期计划中首先着手的有下列各重要部门。

（1）军械工业；（2）飞机工业；（3）汽车工业；（4）机床工业；（5）钢铁工业；（6）液体燃料工业；（7）煤炭工业；（8）普通机器工业；（9）制铝工业；（10）制镁工业；（11）造船工业；（12）电力工业；（13）铁道车辆工业。

军械工业及飞机工业的发展，按照军部另行设计的方案进行，但和它有关的资金、机械、原材料、劳动力、燃料及动力等一般重要产业的发展，……已包含于本计划中。

5. 根据以上要求，规定发展重要产业的一般目标及在日满的分配额列成下列3表：

重要产业五年计划一般目标

类别	单位	生产发展指标			增加的指标		
		合计	日本	满洲	合计	日本	满洲
飞机	架	10000	7000	3000	民用机 2000		
汽车	万辆	10	9	1	30	26	4
工作母机	万台	50	45	5			
钢铁	钢材	1000 (1300)	700 (900)	300 (400)			
	生铁	1150 (1550)	750 (1000)	400 (550)			
	铁矿石	2250	1050	1200	存量 800	800	
液体燃料	挥发油	330	190	140			
	酒精	50	45	5			
	苯	20	14	6			
	重油	235	135	100			
煤炭	万	11000	7000	3800			
铝	公吨	10	7	3			
镁	千公吨	9	6	3			
船舶	万吨	(93)	(86)	(7)	700	680	20
电力	万千瓦	(1257)	(1117)	(140)			
铁道车辆	辆				机 2200 货 52700	1000 30000	1200 22700

4. 军械数字未列入本表。

5. (略)

计划产业的生产力扩大率表和重要产业扩充计划所需资金概算表(略)，需要资金为 85.36 亿日元。

关于兵器工业，是把改造多年的旧式军备纳入产业计划，使之按总体的要求完备起来。其具体指标为：

(1) 飞机工业：根据产业计划，保持年产 1 万架的设备能力，第 1 年生产 1 万架，第 2 年生产 2 万架。

(2) 军械工业：除加强官营设施外，还要把民间设备能力约增加为 4 倍，并通过教育和定货等办法，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为 3 倍。

(3) 弹药工业：官营设施，重点设在满、朝并予以加强，民间设施能力的增加为 7 倍，特别是在增加榨出设备的同时，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约扩

大3倍。

(4) 坦克工业：设备能力增加为2.5倍。

(5) 机械器具工业：把准备转为战时的规模扩大为2~3倍。

(6) 汽车工业：计划根据产业计划年产10万辆，保持30万辆。

满洲的建设，飞机3000架，其他以适应10个师的军需生产力目标。

为了加速扩军备战，日本政府将军事开支的绝大部分用于扩大军火生产。首先对陆海军的官营军工厂进行大规模的改建、扩建，使其成为综合性的大兵工厂，生产能力显著提高。从1932年至1936年，陆海军兵工厂的固定资本均有增加，陆军兵工厂固定资产从1.39亿日元增至1.503亿日元，海军兵工厂固定资产从0.167亿日元增至0.47亿日元。由于日本的军工厂大批扩建，陆海军工厂的工人迅速增加。从1932年到1936年，陆军工厂的工人人数增至1.9倍，海军工厂的工人人数增至2倍多。随着军工厂固定资本的增长，新设备和工人不断增加，各项军工产品的生产额迅速提高，军工厂生产总额急剧扩大。从1931年至1936年，在兵器生产中，步枪增长6倍，计2.53万支，机枪增长3倍，计2400挺，火炮增长6倍，计590门，飞机增长2倍，计600架。从1932年至1936年，年造舰能力（标准排水吨）增长7倍。日本加速扩军备战，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仅靠官办军工企业已经不能满足急剧增长的军工产品的需要，日本政府遂在大力扩充官营军工企业的同时，开始向民间垄断资本安排大批国家军事订货，将飞机、军舰、火炮、弹药以至新式武器的制造也交给民间企业。巨额的军事订货和超额的利润，吸引大批私人企业迅速向军事工业方面转化，民间企业形成了一股发展军工生产的热潮。

1931~1936年，日本政府向民间企业的军事订货和军事投资的金额，为向官营军事工厂投资金额的3倍。日本军火生产增产计划的实现，主要依靠民间企业。如从1931~1936年的6年中，陆军的军事费合计为25.295亿日元，其中约51.2%即12.955亿日元，作为兵器制造费的支出，而兵器制造费的70.2%即9.09亿日元，支付给了民间企业，支付给官营工厂的只占29.8%即3.864亿日元。海军方面，从1933~1936年的4年中，军事费合计19.973亿日元，其中61%即12.19亿日元，用于舰船、兵器等的生产，而舰船、兵器等制造费的75%即9.18亿日元，用于向民间企业订货，仅以25%即3.01亿日元，用于向官营工厂订货。由此可以看出，在军工生产中，民营企业所占的比重超过了官营企业。为了准备发动更大规模的侵略战争，日本的军事工业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巨额军事订货和军事利润的增长，推动日本老财阀资本迅速转向军事工业方面。“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政府指定生产军工产品的企业有110家，其中拥有实力的工厂，基本上全部属于三菱、三井、住友、大仓、久原等老财阀。它们纷纷改变经营方针，扩大军事工业投资，从事军舰、飞机和机械化装备的制造。在经济军事化的过程中，日本政府又扶植了一批与军阀密切勾结，以生产武器和军需品为主的新兴财阀即康采恩。如：日产、日氮、森、日窒、日曹、理研等军人康采恩。这些新兴财阀在军方的支持和扶植下，乘

〔日〕堀场一雄：《日本对华战争指导史》，军事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5~36页。

〔日〕中原茂敏：《大东亚补给战》，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版，第56页。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房，1972年版，第217页。

着“军需通货膨胀”的浪潮，迅速发展成为日本军事工业中最富侵略性的一支力量。1931~1936年，民间企业同军事有关的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老财阀为14~26%，主要投资于为军事工业提供原料的基础军需生产部门，而新财阀为50~95%，主要投资于直接生产军火的部门。

在军事工业的带动下，日本的工厂企业由1932年的6.73万个，增加到1936年的9.06万个。日本的工业产值从1930年的59.63亿日元，增至1937年的163.56亿日元。重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由1930年的38.2%（即22.83亿日元），上升到1937年的57.8%（即94.52亿日元），轻工业产值在整个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则由61.8%，下降为42.2%。日本已由轻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进到了以重工业为主体的工业。至1936年，日本重工业产品的产量，有些已进入世界的前列，船舶居世界第3位，水泥、钢块、生铁、汽车的产量，分别居世界第5、6、7、8位。从1931年到1937年，某些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增长见下表：

1931~1937年某些重工业产品的年产量-

产 品	1931 年	1937 年	增长倍数
钢(千吨)	1883	6352	2.3
钢材(千吨)	1664	5630	约 2.4
石油产品(千吨)	1112	2462	20.8
汽车(台)	434	9462	20.8
造船(吨)	100515	428188	约 3.3

从1931年至于1937年，日本陆海军兵器的年生产量，更是有数倍至数十倍的增长，详见下表：

1931~1937年日本兵器年产量-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御茶水书房，1972年版，第199页。

〔日〕东京大学社会科学研究所：《战时日本经济》，东京大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8页。

〔美〕战略轰炸调查团：《日本战争经济的崩溃》，日本评论社，附表c—21、C—22（钢、钢材）。

〔日〕东洋经济新报社：《昭和产业史》第1卷，东洋经济新报社，1950年版，第61、325、265页（石油产品、汽车、造船）。

〔日〕小山弘健：《日本军事工业的历史分析》，1972年版，第175页（坦克）。

〔日〕安藤良雄：《太平洋战争的经济史的研究》，东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74~375页（步枪、机枪、火炮、飞机、军舰）。

兵器名称	1931年	1937年	增长倍数
步枪(支)	3613	42754	10.8
机枪(挺)	541	2295	3.2
火炮(门)	90	478	4.3
坦克(辆)	12	479	38.9
飞机(架)	410	1580	2.8
军舰(吨)	5100	51724	9

五、增加在华驻屯军

(参见附图 15)

所谓驻屯军，是按照帝国主义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不平等条约，即 1901 年八国联军迫使清政府签订之《辛丑条约》建立的。它应允诸国“常留兵队，分保使馆”，“酌定数处，留兵驻守，以保京师至海通道无断绝之虞。今诸国驻守之处，系黄村、廊坊、杨村、天津、军粮城、塘沽、芦台、唐山、滦州(今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并对各国驻兵数目作出了规定。据此，日本编成“清国驻屯军”，在北京、天津等地驻守。但是，日本从 1911 年起即增加了“北清派遣队”步兵 1 个营、机枪 6 个排。1927 年 4 月，又扩大编制在天津成立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1931 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除上述驻守部队外，又配属了 1 年轮换制的临时派遣队(步兵 2 个营及工兵、通信、炮兵等分队)。

1936 年，日本随着侵华战争步伐的加快，广田内阁决定再次大幅度地增加中国驻屯军，扩大其编制，在驻屯军司令部下设驻屯步兵旅司令部(辖步兵第 1、第 2 团)、坦克队、骑兵队、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及医院、仓库等。总兵力由改编前(6 月 1 日)的人员 1771 名，马 174 匹，增至改编后(6 月 10 日)的人员 5774 名，马 648 匹，兵力增加近 3 倍。同时，将过去每年的轮换制，改变为永驻制。上述扩充的日军各部队，6 月上旬先后在中国登陆，强行部署于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地，控制战略要点。据 1936 年 9 月 22 日《申报》讯：华北日驻军总数已达 1.4 万人以上。

日本政府在 1936 年如此猛增中国驻屯军，是与扩大侵华战争的战略企图相关联的。正如日本陆军参谋部在给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命令和指示中所指出的那样：增加驻屯军的“目的在于，暗地增强驻屯军的威力，配合帝国外交工作的刷新”，“中国驻屯军司令官为维持停战协定地区的治安，需要时可对该地区行使兵力。”在使用兵力时“应在不声不响之中发挥威力”，驻屯军的“战时任务，比过去稍显积极。”这就一语道破了此举的用心，增加驻屯军是日本侵华战争全面升级的预兆，是加强战略先遣支队的必要部署，是对中国主权的公然侵犯，而绝不是什么防卫使馆、保护侨民。当时，任日本驻屯军参谋长的桥本群，在 1939 年回忆中也承认：“按照条约，在各国驻

屯军中日本兵力是很多的，日本驻屯军的兵力在事变前，即 1936 年 3 月（应是 6 月——笔者注）增加到一个旅，把这样多的兵力放在华北还认为没有关系，我觉得很值得研究。”日本陆军参谋部有关方面也承认：“如此增加兵力，中国人自不待言，即对住在化北的日本人和外国人，也都给以将对华北以武力推进工作之感。”

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猛增兵力后，首先以一部加强原驻兵据点，控制北宁铁路沿线的塘沽、滦县、山海关、秦皇岛等要地，以保障运兵线和后勤补给线的畅通。接着，便谋划对北平实施战略包围的新部署。按照不平等的《辛丑条约》，日本除在北平使馆区可驻守少数的警备兵力外，不得在北平的任何地点驻扎兵力，即使在北宁铁路线，也只允许在指定的地点驻兵警备，通县和丰台两地，是北平东西两面的战略要地，失去该两地，北平即陷于被东西包围的态势。特别是丰台地位更为重要，它是连接平汉、北宁铁路线的交通枢纽，是北平西南的咽喉。日本将驻屯军开进通县和丰台，这是对中国主权不能容忍的侵犯。这一点就连日本军阀陆军次官梅津美治郎也不得不承认，驻屯军驻守点“根据议定书的规定不能离开北宁铁路而置于通州”而丰台即非《辛丑条约》指出的地点，它又是平汉铁路的通道。1936 年 5 月，日本驻屯军开始在丰台非法建造兵营，并不断派人到中国驻军兵营挑衅制造事端，然后提出抗议，要求第 29 军从丰台撤出。7 月下旬，日本驻屯军步兵旅第 1 团第 3 营强行进驻丰台。9 月中旬，再次挑起两军枪击事件，逼迫宋哲元从丰台撤出中国驻军。

日本在增加华北驻屯日军的同时，在华中等地也不断增兵。1936 年 9 月，日军借口所谓“北海事件”，即以“调查”为名向中国南海方面派遣军舰。同时派舰艇和特别陆战队进至上海，增强原上海特别陆战队兵力。日本海军第 3 舰队调集部分舰艇，进至汉口，增强原驻之特别陆战队。此外，组成第 11 航空队集中于台北。

日本如此穷兵黩武地增加在华的日军，有的日军高层人士仍认为增加得不够，还要加强。如 1937 年 6 月 5 日，日本陆军教育总监香月清司中将，即向陆军中央部报告：“华北形势相当紧迫。因此，中国驻屯军增强兵力很有必要，也许马上还办不到，最少希望增强热河的兵力，以备华北方面使用。”

日本在华驻屯的日军，经过 1936 年以来的大量增加，其在华北的主力中国驻屯军 1937 年 7 月初的兵力和部署如下：

驻天津部队：军司令部（司令官田代皖一郎中将、参谋长桥本群少将），中国驻屯军步兵第 1 团第 2 营及步兵第 2 团（欠第 3 连及第 3 营）、坦克队、骑兵团、炮兵团、工兵队、通信队、宪兵队、军医院、军仓库。

驻北平部队：中国驻屯军步兵旅司令部（旅长河边正三少将），步兵第 1 团、电信所、宪兵分队、军医院分院。

分遣队：通县、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分遣

〔日〕《现代史资料 9-日中战争 2》，美铃书房，东京 1978 年版，第 334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大本营陆军部》<1>，朝云新闻社，1969 年增印，第 375 页。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 年增印，第 78 页。指 1936 年 9 月 3 日广东北海日商侨中野被杀事件。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 年增印，第 133 页。

队。其中丰台分遣队，兵力为步兵第1团第3营及步兵炮队，其余分遣队，兵力多数为1个连。

除以上部队外，还有陆军特务机关，分设于北平、通县、天津、太原、张家口、济南、青岛等地。

此外，日军还在张北、嘉卜寺、归绥、保定、郑州、平凉、额济纳等地设有特务机关。

六、频繁的现地侦察和军事演习

日本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方面的政略战略动态，摸清现地中国军队的防御部署和作战准备，掌握必要的兵要地志情况，便于策划侵华战争的全面升级，从1937年3月起，由陆海军中央部派出高级将校参谋要员，以所谓“视察”、“旅行”等名目，多次到华北、华中等现地进行秘密侦察，或召集现地将校回东京，汇报当前中国军政的形势。3月上旬，日本陆军参谋部将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少将、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中校、关东军参谋大桥熊雄少校3人召回东京汇报现地形势。4月起，派遣教育总监部部长香月清司中将，对中国华北和东北，进行了为期1个半月的“视察”，6月令其就华北状况向日军中央部作了报告。5月下旬，派遣陆军省的军务科长柴山上校、外务省的东亚局长森岛守仁、海军方面代表藤井茂少校3人，到中国华北地区，向现地日军传达陆海军中央部的方针。同时，又派遣参谋部第7科科长永津比重上校，偕同柴山上校在华北现地“视察”，征求当地指挥官的意见。5月下旬，还派遣参谋部3科部员公平匡武少校和井本熊男上尉，以“旅行”为名，先后到天津、北平、张家口、归绥、大同、太原、济南、青岛等地“视察”和了解情况。井本于6月中旬回东京汇报，公平少校又去华中方面探听情况，6月底返东京作了报告。6月中旬，日军参谋部派遣军事科高级科员冈本清福中校，到中国现地了解卢沟桥附近的形势，并处理配备参谋人员问题。在短短的3个多月中，日本竟频繁地派出6批将校幕僚，前往中国华北、华中和东北地区，进行战略性的侦察，仅仅这一事实本身，就足以说明问题的实质。

日军为了检验和完善全面侵华战争的计划，训练部队以适应新作战计划的要求，提高其战斗准备程度，在日本国内和中国现地，进行了反复的指挥官演习和部队战术演习。1936年末，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西尾寿造中将，率领将官10名左右，在日本京都、名古屋进行了一次异乎寻常的图上军事演习。这个高层次的演习想定，是首先全面进攻中国，夺取其人力、物力资源，然后在有利的态势下，再向苏联进攻。这是日本将侵华战争扩大升级，尔后向第三国发动侵略的世界战略的预演。因此，日本组织全部现役和退役上将，参观了这次演习，以统一战略思想。亲自参加演习的将官，随后都担任了日军全面侵华战争各兵团的司令官。1937年5月，日本陆军参谋副总长今井清中将，率领参谋部及有关方面的幕僚，赴中国东北进行参谋旅行演习。这次演习，实际上是上年末日军高级指挥官图上军事演习的延伸和具体化，是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38-139页。

〔日〕《现代史资料9，日中战争2》，美铃书房，东京1978年版，第310页。

司令部指挥机关和参谋业务的演习，用以提高指挥机构适应全面侵华战争的效能。

1936年9月，日本的中国驻屯军通过卑鄙的手段，非法侵占丰台后，在丰台附近地区开始频繁的挑衅性军事演习。他们明火执仗地以中国军驻地为目标，指挥部队演练攻击。有时，日军演习的散兵线，竟冲入中国军队防守的步哨警戒线内百余米。有时，日军的演习部队，竟无理要求通过中国军队驻守的宛平城和卢沟桥。企图以武力威胁，逼退中国守军。日军演习的次数由每月或半月1次，增加到每3~5日1次；演习的时间由白天演习，增加到昼夜演习；演习用弹，由空包弹射击演习增加到实弹射击演习。与此同时，在华北各地的日军，均在现地进行军事演习。驻塘沽日军30余人，乘小船在海河进行军事演习，竟悍然在中国驻军第29军防守的东大沽阵地登陆，并且不听劝阻，开枪射击，酿成“大沽冲突事件”。在北平市内的日本驻军，更野蛮地擅自在东单牌楼和长安街邻近东交民巷使馆区一带演习巷战。日军在民房顶上以沙袋筑垒、架设机枪，坦克由街道隆隆而过，俨然成了城市的“占领者”。

1936年10月26日至11月4日，中国驻屯军在北平西南郊举行秋季大演习，这是以夺取北平外围卢沟桥、宛平城等要点，最后攻占北平为目标的一次预演。步兵、骑兵、炮兵、坦克协同配合，进行综合演练。在1937年上半年，日本的中国驻屯军的军事演习，更是进入紧张的阶段，连、营级的战术演习，不分昼夜连续进行，实弹射击经常不断，已进入全面战争升级的待命阶段。在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写的《中国事变陆军作战》中，就此寥寥提到几笔：“我们部队的以下行动可能刺激了他们的神经，兹举数例如下：（1）驻丰台部队的中期（5月至6月为连及营教练演习期间，特别是连教练的完成期为5、6月）的连教练，不分昼夜地进行。（2）（驻屯）军司令部随时对驻丰台部队进行检阅。5月下旬，军的大部幕僚齐集于一文字山（即大枣园山），检阅该部队。（3）团长去丰台部队按教育计划检阅了连教练；以后辅助官又经常去该地一带检查。（4）旅长、团长去该地附近视察了演习情况。

（5）本年6月至7月上旬，步兵学校教官千田上校为普及新步兵操典草案，曾在卢沟桥城北面实施演习。北平及丰台部队的干部多数参加。”中国驻屯军不分昼夜地紧张演练，旅、团各级指挥官反复督促检阅，力求完成预定的扩大侵华的准备，以便东京一声令下，能立即挑起事端，进而按照规定的侵略计划，发动全面战争。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1〉，朝云新闻社，1983年增印，第144页。

第二编 小 结

自 1933 年 1 月至 1937 年 7 月 6 日，是日本帝国主义继武装占领中国东北之后，又向华北扩张，制造华北事变，进而加速进行全面侵华战争准备的阶段；也是中国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由分裂到团结、由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由局部抗战走向全国抗战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内外矛盾错综复杂，中国社会处在激烈动荡和变化之中，它给人们以多方面的启示。

日本不断变换侵略中国的策略，但是万变不离其宗。为了实现先取满蒙再占全中国的既定目标，日本帝国主义在武装占领东北、进攻上海、炮制伪满洲国之后，又武装进攻热河和长城以南，打开了入侵华北的大门。尔后改变策略，将武装“鲸吞”变成和平“蚕食”，企图以军事为后盾，通过政治压眼，不战而取华北。日本这时之所以要对华北采用“蚕食”策略，主要是因为：日本自身力量的不足；国际舆论的压力；中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国民党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到 1936 年，随着日本法西斯政权的正式确立和战争准备的逐步就绪，德意法西斯在欧洲和非洲动武，再加上西方列强继续对日本实行绥靖政策，促使日本又由和平“蚕食”华北转向准备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妄图一举灭亡全中国。这一演变过程表明：日本侵略中国的策略手段是为其根本政策服务的，尽管策略手段不断变化，但其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这个“宗旨”是不会改变的。

国民党政府实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得人心，必然破产。“九·一八”事变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使中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团结御侮，抗日救亡逐渐成为历史的潮流和全民族的共同要求。可是执政的国民党违背历史潮流和民族意志，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内用兵，全力“围剿”红军，破坏局部抗战，镇压抗日救亡运动；对外步步退让，造成东北沦陷，淞沪、长城等抗战夭折，并先后与日本签订了上海、塘沽、秦土与何梅等一系列丧权辱国的协定，加深了民族危机。蒋介石国民党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以及国际进步舆论的公愤。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推动下，在全国抗日救亡特别是“一二·九”运动的冲击下，在国民党内抗日派的促进下，在华北事变后英美等国在华利益和国民党中英美派的利益受到损害的情况下，特别是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迫使蒋介石国民党终于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实现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从提出到推行到破产告诉人们：历史潮流不可阻挡，民族意志不可违背。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之所以破产，就在于违背了团结御侮，抗日救亡这一历史潮流。

中国共产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反映了中国人民抗日救国的根本利益，因而深得人心。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族意志，多次发表决议、宣言和内部指示，积极引导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大力支持国民党爱国将领的抗战行动，直接领导东北的抗日游击战争，适时地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并坚持不懈地为“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而奋斗，因而得到全国各阶层人民和爱国人士、爱国将领、爱国侨胞，以及世界进步人士的拥护和支持。经过“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和“联蒋抗日”的发展过程，最后终于迫

使蒋介石国民党抛弃了“内战、独裁和对外不抵抗政策”，接受了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初步实现了国共两党的再度合作，中华民族从此由分裂走上了团结抗战的道路。中国政局的这一重大变化，不仅给予日本的全面侵华政策以沉重的打击，而且对于全民族抗战的发动、坚持与胜利具有深刻的影响，同时也为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借鉴。

附录

大事记

1931年

6月19日日本关东军制订征服满蒙的方案，后经陆军中央修改为《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成为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行动纲领。

6月25日日本为入侵中国制造了“中村上尉事件”。

7月1日日本警察在万室山地区镇压中国农民，制造“万室山事件”。

蒋介石率大军对中央苏区开始进行第3次“围剿”。

7月23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攘外应先安内”的反动方针。

8月16日蒋介石致电张学良谓：“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张学良将这个“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长官一体遵守。

9月15日工农红军粉碎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第3次“围剿”。

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发动侵华战争。东北军奉命不战而退。

9月19日日军占领沈阳、长春、四平、公主岭、铁岭、抚顺、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等地。

中共满洲省委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武装占领满洲宣言》。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就柳条湖事件向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提出严重抗议。

中国代表施肇基向国际联盟大会报告日军侵占沈阳情况。

9月20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

9月21日日军侵占吉林市。吉林省府代主席、东北边防军驻吉林军署参谋长熙洽投敌，26日宣布成立伪吉林省长官公署。

北平各校东北籍学生成立“东北学生抗日会”。

驻朝鲜日军第39混成旅越境侵入中国东北。

苏联《真理报》谴责日本对中国的侵略。

9月22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提出组织东北游击战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

国联在英、法代表操纵下，通过两项决议：（1）停止一切冲突；（2）双方撤退军队。

国民党中央发表《告全国同胞书》，提出要坚定沉着，信任国联之公理处断。

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党员大会上演说，谓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公理之判断。

9月23日张学良通电在锦州设立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公署，以张作相代理司令官。

9月24日苏联表示在道义上、感情上完全同情中国。

美国政府以内容相同的照会，分别致中日两国政府，对“九·一八”

事变表示“遗憾”、“忧虑”。

上海 3.5 万名码头工人举行反日大罢工。

9 月 26 日上海 100 多个工会和各界群众数万人，举行抗日救亡大会。

9 月 27 日张景惠在哈尔滨成立东三省特别区“治安维持会”，自任会长。

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在北平成立。

北平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发表《为东三省事件告全国民众书》。

9 月 28 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发表《告全国学生书》，谓对日宣战与否，政府自有决断，学生不得相率罢课。

北平各界 30 万人举行抗日救国大会，通过 29 条决议案。会后分三路出发游行。

南京、上海请愿学生愤怒殴打了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

9 月 30 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第二次宣言》。

国联理事会作出 9 项决议，呼吁日本撤兵。

10 月 1 日洮辽镇守使张海鹏投敌，宣布脱离东北军当局“独立”，就任伪“东北边防保安总司令”。

10 月 2 日全国商会联合会发表《告世界各国书》。

10 月初东北抗日义勇军第 3 纵队在辽宁省北镇县组成。

10 月 6 日日本军舰 4 艘（陆战队 400 名）到上海挑衅。

10 月 8 日日本关东军飞行队轰炸锦州。

10 月 16 日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发表“独立”宣言，公开降日，成立“东边道自治保安司令部”，自任总司令。

叛军张海鹏率部向嫩江之江桥进犯，守军将其击溃。

10 月 20 日马占山就任黑龙江代理省政府主席兼黑省军队总指挥。

10 月 21 日日本军部法西斯“樱会”激进派同右翼团体头目策划“十月事件”，因事泄失败。

10 月 24 日国联理事会作出 7 项决议，要求日军于 11 月 16 日以前完全撤退。

10 月 29 日苏联政府发表声明，对满洲事变采取严格的不干涉政策。

11 月 4 日马占山指挥的江桥抗战开始，到 19 日结束，给日军以沉重打击。

11 月 6 日英、美、苏各国报纸披露《田中奏折》内容。

11 月 8 日土肥原策划“天津事件”，组织汉奸便衣队大事骚扰，制造混乱局面。

11 月 10 日溥仪在日本特务接应下秘密离开天津，前往东北。

11 月 19 日日军攻占齐齐哈尔，马占山率黑省军政人员退往克山、海伦。

11 月 25 日国民党政府向国联提议划锦州为“中立区”。全国舆论纷起反对。

11 月 30 日蒋介石发表讲演，声称“攘外必先安内”。

12 月 5 日南京军警镇压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学生，制造了“一二·五”事件。

12 月 8 日国联理事会决定放弃设锦州中立区的计划，但同意保留日本在该地区的所谓“剿匪权”。

12 月 10 日国联理事会决定派遣以李顿为首的代表团调查中国东北事

件。

12月12日国民党政府准张学良辞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职，改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

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降日，就任伪奉天省长。

12月17日南京军警制造“珍珠桥惨案”。

12月26日日军向辽西、锦州发动进攻。

12月下旬黄显声、熊飞组织起“辽宁抗日义勇军”，后改称“东北民众自卫义勇军”。

12月31日苏联向日本提议签订互不侵犯条约。

1932年

1月1日东三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叛变投敌。

1月3日日军侵占锦州。

关东军司令部下达命令，集中主要力量攻击义勇军。

1月4日黄显声在辽宁北票设立东北民众抗日义勇军总指挥部，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反对日帝国主义占领锦州号召民族的革命战争的宣言》。

1月7日汉奸张景惠在齐齐哈尔就任伪黑龙江省政府主席。

美国政府照会中日两国，就所谓满洲的新事态，发表“不承认主义”的声明。

1月8日美国国务院表示：“丝毫无意干涉日本在满洲合法条约之权利”。

1月9日英国照会日本，要求满洲门户开放。

义勇军刘存起部在锦西伏击日军骑兵第27团，毙伤团长古贺传太郎以下60多人。

1月20日日本驻上海特务机关指使暴徒，借口日僧被殴，袭击三友实业社，制造事端。

1月28日日军制造“一·二八”事变。第19路军奋起抵抗，淞沪抗战开始。

日军进攻哈尔滨。

1月30日国民党政府发表迁都洛阳宣言。

宋庆龄、何香凝等在真如慰问抗日将士。

1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为上海事变第二次宣言》，再次号召武装群众，保卫上海。

李杜、丁超等组成吉林自卫军，联合抗日。

本月中共满洲省委制定了《抗日救国武装人民群众进行游击战争》的纲领性文件。

中共饶河中心县委组织的反日会，已发展会员300多人。

2月1日蒋介石在徐州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对日作战计划。

日本决定向上海派遣陆军。

华侨义勇军通电全国。

吉林自卫军在双城附近全歼伪军刘宝林旅，并袭击进攻哈尔滨的日军。

2月3日国联调查团从欧洲出发，绕道美国去日本。

英、法、美、意、德五国公使建议上海为“中立区”，中国表示同意，日方拒绝。

2月4日中国吴淞守军击败日军进攻，日军更换主帅。

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表《划分全国为4个防卫区通电》。

日伪军分兵两路向哈尔滨进犯，丁超、李杜、宫长海、冯占海等部奋起抵抗。马占山派苑崇谷部往援。

2月5日哈尔滨失守。吉林自卫军各部向宾县、依兰等地退却。

日关东军司令部自即日起至25日，连续召开10次“建国幕僚会议”，密谋建立伪满洲国。

日军全力进攻闸北，又被中国守军击退。

2月13日汪精卫在洛阳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外交方针。

日军调第9师增援上海，并二易主帅。

2月18日张治中率第5军抵吴淞前线参战，归蒋光鼐指挥。

2月24日日本编成上海派遣军，白川义则为司令官。

马占山变节投敌，在龙江任伪黑龙江省省长。

2月26日中共临时中央发表为取得上海战争的胜利告全国民众宣言。

2月29日国联调查团到达东京。

日军对上海再度发动总攻，守军在八字桥、天通庵与敌激战。

3月1日日军在江湾、庙行镇一线进行全面攻击，并在浏河强行登陆，蒋光鼐令极沪守军撤至黄渡、方泰镇、嘉定、太仓一线。

伪东北行政委员会发表《建国宣言》，宣布成立伪满洲国。

3月2日第19路军向全国各界发出退守待援电文。

3月3日国际联盟特别大会决定，要求中日双方停止战争。

日军占领浏河、嘉定、南翔、真如一线，并发表停战声明。

3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为反对伪满洲国傀儡政府成立发表宣言，号召人民武装起来，驱逐日帝，打倒伪满洲国。

3月6日蒋介石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委员长。

3月9日溥仪到达长春，在关东军导演下，就任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充任伪“国务总理”。

3月10日溥仪与本庄繁签署密约。日本帝国主义据此操纵了中国东北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等一切大权。

国民党政府外交部照会日驻华大使，绝对不承认日前成立之伪满洲国。

3月12日日本内阁通过《满蒙处理方针纲要》。

3月14日国联调查团由日本抵达上海。

3月18日李延禄率救国军补充团在宁安县墙缝一带伏击日军上田支队，毙敌百余人。

3月19日李海青部救国军攻克扶余县城。

3月31日苏炳文在海拉尔通电就任黑龙江省自卫军总司令。

本年春张平洋、张文藻、赵尚志组成巴彦游击队。

李红光、杨佐青等成立盘石游击队。

4月2日马占山反正，再举抗日旗帜。

4月3日吉林自卫军和吉林救国军将领在宁安召开联席会议，成立吉林

抗日联合军，推举李杜为联合军总司令兼吉林自卫军司令。丁超为护路军总指挥，王德林为救国军总指挥。

4月5日中共满洲省委提出反日战争的10条纲领。

4月7日黑龙江省抗日救国军总司令部成立，马占山任总司令。

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布《对日战争宣言》。

4月21日唐聚五、黄宇宙等组成“辽宁民众自卫军”。

国联调查团到沈阳。

本月中共满洲省委派军委书记杨林到磐石，领导创建抗日武装。接着，又派继任军委书记周保中到吉东地区指导抗日斗争。

5月5日国民党政府与日本签订《上海停战协定》。

5月7日东北抗日自卫军李杜部袭击日军。吉林救国军攻克和龙县城。辽宁抗日军攻占辑安（今集安）县城。

5月9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发出《反对国民党出卖淞沪协定通电》。

5月15日日本发生“五·一五”事件，首相犬养毅被杀。

5月18日日军侵占汤原县城。

5月21日蒋介石兼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赴汉口策划对中央苏区的第4次“围剿”。

5月26日日本斋藤内阁成立。

5月27日辽宁义勇军项青山等部攻占辽中县城。

6月4日日军在呼海路发动总攻，海伦失守。

6月9日蒋介石在庐山召集豫鄂皖赣湘五省“剿匪”会议，宣布“攘外必先安内”为基本国策。

6月11日抗日救国军王德林部袭击吉敦线蛟河镇。

6月12日日军第14师对马占山部发起总攻。

6月13日日军对奉海铁路沿线开始大“讨伐”。

本月崔石泉、金文亨建立起饶河反日游击队。

7月1日邓铁梅指挥所部攻克凤城县龙王庙，毙伪军100余人。

7月11日李海青部救国军攻占通北县城。

7月13日冯占海部自卫军攻克舒兰县城。

7月18日东北义勇军攻营口。

7月31日日军袭击安固镇，谎报马占山战死。

8月1日东北义勇军进攻长春。

8月8日日本任命武藤信义接任关东军司令官，兼任驻伪满全权大使及关东厅长官，实行所谓“三位一体”。

8月16日国民党政府准张学良辞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

8月17日国民党中政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改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蒋介石兼任委员长。

8月28日抗日义勇军一部进攻沈阳，占东塔机场，烧毁飞机多架。

9月4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北平签字。

9月15日日本正式承认伪满洲国，双方签订《日满议定书》。

9月16日国民党政府外交部为日本承认伪满洲国事提出抗议。

日军制造平顶山惨案。

9月24日吉、黑抗日义勇军联合进攻哈尔滨。

9月28日苏炳文中东铁路护路军反正，占领满洲里。
10月1日宣布成立东北民众救国军。
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
10月4日中国全国民众救国团体联合会通电全国，要求一致猛醒，誓死抵抗，全力自救。
10月5日《中共中央告全国民众书》谴责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是帝国主义强盗共管中国的具体计划。
10月6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发表《反对国联调查团报告书通电》。
10月7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及加强反帝群众斗争的决议》。
10月9日冯玉祥、李烈钧、柏文蔚、程潜等15个国民党中央委员通电全国，指摘国联报告书之谬误，要求全国动员，以抗暴日而收复失地。
10月27日国民党政府训令国联代表，原则接受李顿报告书。
本月初中共满洲省委派杨靖宇到南满巡视工作，指导抗日斗争。
11月11日日伪军对东北抗日武装开始第2次全面“讨伐”。
12月1日国民党政府由洛阳迁回南京。
12月4日苏炳文部弹尽粮绝，退入苏联境内。马占山也随同退入苏境。
12月12日中苏两国恢复外交关系。
12月17日宋庆龄、蔡元培等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
12月29日日伪军对南满三角地带开始第3期“讨伐”。

1933年

1月3日日军攻占山海关。
1月5日日军侵占绥芬河。
1月7日日军占领李杜军根据地密山。
中共中央通过《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进攻华北的决议》。
1月9日吉林自卫军一部在李杜率领下，自虎林附近退入苏联境内。
1月10日抗日救国军王德林部被迫退入苏联境内。
1月16日热边义勇军进攻通辽。
1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给满洲各级党部及全体党员的信》（简称“一二六”指示信），提出在东北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
1月27日蒋介石到江西督剿中国工农红军。
本月童长荣、王德泰组成东满游击队。
2月21日日伪军10余万人，兵分3路大举进犯热河。
2月24日国联大会通过19国委员会关于接受《李顿调查团报告书》的决议，日本代表当即退席。
2月25日中国守军在朝阳、凌南一带与日军激战。
3月2日日军侵占赤峰。
3月4日日军侵占承德，并向长城各口推进，遭中国军队抵抗。
日军占领冷口。
3月6日日军向滦平推进。
3月7日商震部黄光华师收复冷口。

3月9日 第29军在喜峰口与日军展开激战。

3月11日 中国守军在古北口与日军激战。

3月12日 国民党政府发布命令，准张学良辞去本兼各职，派军政部长何应钦代理北平军分会委员长。

3月24日 蒋介石在北平召开军事会议，与何应钦商谈对日妥协办法。

3月26日 蒋介石在南京与汪精卫会商，决定全力“剿共”。

3月27日 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退出国际联盟。

3月30日 日关东军间岛辎重队日共党员伊田助男，用汽车送给中共抗日游击队10万发子弹后自杀身亡。

4月10日 蒋介石在南昌宣称：“抗日必先剿匪，征诸历代兴亡，安内始能攘外。”11日蒋召集七省治安会议，布置对中央苏区的第5次“围剿”。

4月11日 日军侵占冷口。

4月16日 日军侵占北戴河、昌黎。

4月17日 日军侵占滦东地区。

4月23日 滦河西岸中国守军全线反攻，收复卢龙、迁安等县。

4月26日 南天门已激战5昼夜，双方伤亡惨重。

4月28日 汉奸李守信建立察东特别区，自任行政长官兼军长。

4月29日 何柱国所部攻克北戴河。

多伦失守。

4月30日 北平军分会调傅作义部由张家口开赴昌平集结待命。

5月4日 国民党政府行政院设立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任黄郛为委员长，与日方谈判停战。

5月6日 日军参谋部制订《华北方面紧急处理方案》。

5月13日 日军渡过滦河，大举西犯。

5月16日 唐山失陷。

5月21日 傅作义部在怀柔城西与日军激战。

5月22日 日军相继占领滦县、遵化、玉田、平谷、蓟县、三河等县城。

5月23日 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调19路军赴福建“剿共”。

5月25日 中共中央发表《为反对国民党出卖华北平津告民众书》。

5月26日 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建立，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

5月31日 《塘沽协定》签订。

6月1日 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通电反对《塘沽协定》。

6月13日 国民党政府派庞炳勋、冯钦哉部准备进攻冯玉祥率领的抗日同盟军。

6月25日 苏联不顾中国反对，与日本就买卖中东铁路问题开始正式谈判。

6月30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蒋介石电令冯玉祥取消抗日同盟军名义，即日离部赴平。

7月1日 吉鸿昌指挥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收复宝昌、沽源，伪军纷纷反正。

7月6日 日本陆军省和参谋部向内阁提出《对华政策大纲》。

7月7日 何应钦下令庞炳勋、关麟征、冯钦哉三路进攻抗日同盟军。

7月16日关东军参谋部炮制出《暂行蒙古人民指导要案》。

8月6日冯玉祥在蒋介石派兵逼迫下，宣布即日起将察省一切军政交宋哲元负责办理。9日，冯撤销抗日同盟军总部。14日，冯离张家口赴泰山。

8月21日方振武、吉鸿昌部集结张北一带，继续坚持抗日。10月16日，在日军和国民党军围攻下失败，方、吉离部赴天津。

9月16日海伦游击队成立。

9月18日以盘石游击队为基础的东北人民革命第1军独立师成立，杨靖宇任师长兼政委，李红光任参谋长。

9月25日日本海军省提出《海军对华时局处理方针》，策动分离华北的活动。

本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兵力对革命根据地开始进行第5次“围剿”，其中50万兵力用于围攻中央革命根据地。

10月2日日本陆军提出《帝国国策》，要求在华北设“缓冲地带”。

10月4日~23日日本驻承德特务机关长松室孝良，在多伦召开蒙古王公大会，策划建立“蒙古国”。

10月26日冲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第19路军，在瑞金秘密签订《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本月赵尚志等成立珠河东北反日游击队。

11月9日吉鸿昌在天津被国民党逮捕，24日在北平就义。方振武被迫流亡香港。

11月20日第19路军将领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本年冬夏云杰、戴洪宾组成汤原反日游击队。

本年末吴义成越境入苏。周保中率部到敦化、宁安一带活动。

1934年

1月1日蒋介石下令对驻福建的第19路军发动总攻击。1月21日福建人民政府失败。

2月19日日伪军在东边道、辽东、辽南向三角地带实行大讨伐。

3月1日溥仪在长春由“执政”改称“皇帝”，改年号为“康德”。

4月1日日军在唐山沿线举行野战演习。

4月10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华北并吞中国告全国民众书》。

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声称要排挤英美在华势力，独占中国。

4月20日毛泽东就天羽声明发表谈话，指出此为“日本帝国主义企图强占全中国的最明显的表示”。

由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经宋庆龄、何香凝、李杜等1779人签名发表。

5月20日中共宁安县委决定正式建立宁安游击队，白殿贞任队长。

6月8日日本借口驻南京副领事藏本失踪，酝酿事变。

12日，藏本在明孝陵被寻获。

7月7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将寻淮洲、粟裕等领导的红7军团改编为

北上抗日先遣队，由江西瑞金出发。

7月8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成立。

7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政府和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宣言》。

8月13日驻山海关、秦皇岛日军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9月7日日本内阁决定废除《华盛顿限制海军军备条约》。

10月10日中央红军主力开始长征。

10月20日中共满洲省委发出《为粉碎冬季“讨伐”给全党同志信》，提出要建立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和第2军以及第3军独立师的任务。

10月27日日军借口宋哲元第29军在张北盘查过境的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川口清健一行8人，挑起张北事件。

11月7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成立，杨靖宇为军长。

12月7日日本内阁制定《有关对华政策的文件》，指导分离华北的活动。

12月东北抗日同盟军第4军成立，军长李延禄。

1935年

1月15日~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

1月18日日本关东军发表文告称“断然扫荡”察省中国驻军宋哲元部。

1月19日蒋介石表示日军进攻察东系“地方事件”，应“就地解决”。

1月28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成立，赵尚志为军长。

2月2日中日代表在热河丰宁县大滩就察东事件正式谈判，达成“大滩口约”。

2月10日绥宁反日同盟军改编为东北反日联合军第5军，军长周保中。

2月27日汪精卫、蒋介石联名向全国各机关团体发布命令，严禁排日运动。

3月23日苏、日、伪满签署中东铁路转让协定，议定路价为1.4亿日元。

4月16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决定5年内由日本向中国东北移民300万人。

5月2日天津日租界《国极报》社长胡恩溥被枪击，次日毙命。

5月3日天津日租界《振报》社长白逾桓被杀。

5月20日关东军追击抗日义勇军孙永勤部，侵入长城以南。

5月29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会见何应钦，借口天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等，向国民党当局提出无理要求。31日，南京电令何应钦与日方谈判，“妥善办理”。

5月30日东北人民革命军第2军正式成立，王德泰任军长，魂拯民任政委。

6月1日河北省政府由天津迁往保定。

6月4日何应钦与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谈判。

6月5日日军再次制造张北事件，要挟国民党政府。

6月11日梅津就华北问题提出备忘录，7月6日，何应钦复函全部承认日方要求。实际形成《何梅协定》。

国民党政府发布《邦交敦睦令》。

6月27日《秦土协定》签订。

6月28日丰台事件发生。

7月25日日本关东军参谋部提出《对内蒙措施要领》。

本月李济深、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等人在香港成立中华民族革命同盟。

8月1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通称《八一宣言》），呼吁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8月5日日本外相广田弘毅提出对华三原则。

8月12日日本新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离东京来华赴任。

8月28日国民党政府任命宋哲元为平津卫戍司令。29日，下令撤销行政院驻平政务整理委员会。

9月24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多田骏发表声明，宣称“必须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团体的工作予以指导。”

10月2日国民党政府在西安设西北“剿匪”司令部，蒋介石兼总司令，张学良兼副总司令。

10月19日红军抵达陕北保安县吴起镇（今吴旗县城），中央红军胜利完成了两万五千里长征。

10月22日在日军策动下，河北发生香河事件。

11月1日平津10校学生自治会发表《为抗日救国争自由宣言》。

11月4日国民党政府公布“币制改革”、“白银国有”令。

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表《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

11月18日北平市大中学校学生联合会成立。

11月19日蒋介石宣称：“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不轻言牺牲。”

11月25日日本策动的“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

11月26日国民党政府撤销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派何应钦为行政院驻平办事处长官，派宋哲元为冀察绥靖主任。

11月28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抗日救国宣言》。

12月6日美国国务卿赫尔发表文告，表明“美国对于华北自治运动不能熟视无睹”。

12月7日国民党中央决定设冀察政务委员会。

12月9日北平爆发“一·二九”抗日爱国运动。

12月16日北平各大中学校学生再度举行示威游行。

全国各地学生游行，反对冀东伪政权。

12月18日中华全国总工会发出《为援助北平学生救亡运动告工友书》，呼吁全国工人奋起救亡。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

12月20日共青团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各校学生和各界青年同胞宣言》。

12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通过《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确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2月26日平津学生联合会在北平成立。

12月27日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

1936年

1月5日蒋介石令平津各学校放假，强迫学生离校。

北平朝阳门发生日兵枪击中国守军事件。

1月9日日军参谋部写出《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作为扩大侵略的参考。

1月13日日本政府向在华日军发出《处理华北纲要》。

1月14日冀察绥靖公署在天津成立，宋哲元就任主任职。

1月15日日本宣布退出伦敦裁军会议。

1月21日日本外相广田在议会发表演说，再次阐明所谓“对华三原则”。

1月25日中国工农红军将领发表《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月26日乌兰夫率领德王警卫队2000余人起义，捣毁“蒙疆政务委员会”。

1月28日东北反日联合军军政联席扩大会议（即“汤原会议”），在黑龙江汤原召开。会议决定成立东北民众反日联合军总司令部（后改为北满抗日联军总司令部），选举赵尚志为总司令，李华堂为副司令，张寿钱为总政治部主任。

2月1日北平各校学生代表在师范大学开会，成立“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

德王盗用“蒙政会”名义下令成立“察哈尔盟公署”。12日，德王成立“蒙古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李守信任副总司令。

2月10日中共中央下达《为建立全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

20日，发表《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

2月17日中华苏维埃政府和工农红军军委联合发表《东征宣言》，组成红军抗日先锋队。

20日，开始渡黄河东征。

2月23日蒋介石下令调重兵堵截红军东征抗日。

2月26日日本发生“二·二六”事件，导致法西斯军事独裁政权形成。

2月东北抗日联军第5军成立，周保中任军长。

3月9日日本广田弘毅内阁组成。

3月29日苏联宣布已与外蒙订立《互助条约》。4月17日，国民党政府向苏联提出抗议。

3月东北抗日联军第2军成立，王德泰任军长。

4月9日周恩来与张学良在陕北延安举行联合抗日会谈。

4月东北抗日联军第4军成立，李延禄任军长。

5月1日日本命令田代皖一郎继任中国驻屯军司令官。

红军抗日先锋队开始撤回黄河西岸，回师陕北。

5月5日中国共产党向国民党政府发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抗

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

5月8日北平民族解放先锋队发表《对时局宣言》。

5月9日日本拟定《向满洲移住农业移民百万户计划》。

5月12日伪“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市成立。

5月15日日本借口保护侨民，又增兵华北。

5月25日毛泽东致书阎锡山，争取共同抗日。

5月31日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上海分会成立，通过了《抗日救国初步政策》。

6月3日日本新的《帝国国防方针》与《用兵纲领》修订完毕，并经天皇批准。

6月20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

6月30日日军参谋部决定《国防国策大纲》。

7月15日国民党国防会议成立，蒋介石兼任议长。

7月16日毛泽东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指出中国战胜日本的主要条件是中国人民的大联合，预言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7月东北抗日联军第1军成立，杨靖宇任军长。

8月1日东北抗日联军第3军成立，军长赵尚志。

8月7日日本内阁制定《国策基准》和《帝国外交方针》。

8月11日日本政府确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

8月14日毛泽东致书傅作义，表明举国抗战主张。

8月25日中共中央致书国民党，再次呼吁停止内战，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8月日军参谋部制订《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

日伪军开始进犯绥远，国民党将领傅作义率部抵抗。

9月1日中共中央向党内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

9月3日日侨中野在广东北海被杀，即“北海事件”。

9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抗日救亡运动的新形势与民主共和国的决议》。

9月18日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在太原成立。

东北抗日联军第8军成立，军长谢文东。

9月19日日军侵占丰台。

9月22日毛泽东写信给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等，阐明联蒋抗日的意义。

9月东北抗日联军第6军成立，军长夏云杰。

10月22日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宁静地区会师，伟大的长征胜利结束。

蒋介石飞抵西安，着手“围剿”红军。

10月薄一波、杨献珍等受中共北方局委派，接办了阎锡山创办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

日本中国驻屯军以北平为目标开始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

11月5日绥远抗战爆发。

11月9日国民党第29军举行演习，以对抗日军演习。

11月20日冀东保安队哗变。

11月23日“七君子”事件发生。

11月24日傅作义部队收复百灵庙。

11月25日日德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

11月东北抗日联军第7军成立，军长陈荣久。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5日毛泽东写信给冯玉祥，赞扬其“一腔抗日救亡之义愤”。

12月7日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的命令。

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良致电中共中央，邀请派员共商大计。

12月13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分析了西安事变的积极意义。

何应钦以国民政府名义褫夺张学良本兼各职，并派飞机到西安侦察。

12月14日张学良、杨虎城宣布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

日本陆军省制订《西安事变对策纲要》。

苏联《真理报》发表社论，称：“张学良部队叛变无疑是中国亲日分子的一个阴谋”。

12月15日中共中央以红军高级将领名义给南京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两次发出通电，表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委任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调集20个师的兵力对西安进行威胁。

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等通电全国，反对内战。

12月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飞抵西安，同张、杨商议和平解决西安事变问题。

12月18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中央，提出五项抗日救国主张。

12月1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再次召开扩大会议，进一步确定并完善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

12月20日端纳陪宋子文到西安，张学良向来讲述了自己的意图。张、杨发表《告东北军、17路军将士书》。

12月21日中共代表团同张学良、杨虎城共同决定集中东北军、西北军和红军主力与刘峙决战的方针。

12月22日宋美龄等到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子文、宋美龄举行会谈。24日，会谈达成6项协议，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6日，张学良陪蒋介石回南京被扣留。

12月23日日本广田首相称：“倘国府与张学良以容共为妥协条件，日本则予断然排击。”

12月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发表。

冬东北抗日联军第10军成立，军长汪雅臣。

东北抗日联军第9军成立，军长李华堂。

1937年

1月7日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由陕北的保安（今志丹县）迁到延安。

1月8日中共中央发表《为号召和平停止内战通电》，敦促蒋介石实行诺言，下令停止进攻西安。

1月31日周恩来、叶剑英同东北军主和主战派和17路军举行三方最高军事会议，决定对南京采取和平方针，派李志刚赴潼关与顾祝同签字。

2月1日华北各界救国联合会成立。

2月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制定《1937年度关东军治安肃正计划纲要》，加紧对东北抗日武装的“讨伐”。

2月8日国民党中央军进驻西安，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五项要求、四项保证。

2月15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召开，22日结束。全会通过了实际上接受国共合作的决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2月20日日本政府发出《第三次处理华北纲要》。

本月中旬至3月中旬，第二次国共合作第一次谈判在西安举行。3月下旬，蒋介石与周恩来在杭州谈判，4月初结束。

3月24日日舰20艘来华，拟在青岛大演习，以中国为假想敌。

4月16日日本外、陆、海、藏四相会议决定《对中国实施的策略》和《指导华北方针》。

4月25日华北日本驻军开始在津郊、平郊及通县附近演习。同时，策动伪军进犯绥远。

4月30日杨虎城被蒋介石革职，后被迫出国考察军事。

5月2日中共全国代表会议在延安举行，14日结束。毛泽东在会上作《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的报告和《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结论。

察北伪蒙军在商都增兵南犯。

6月4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组成。

6月9日日本关东军向军部呈报《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的意见书》。

6月25日连日来，日军在卢沟桥一带不断举行夜间演习。

6月28日日本关东军司令部、朝鲜总督府、中国驻屯军司令部及满铁总裁等各方人士，在大连举行会议，侵华形势日趋严重。

7月初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

